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八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目　　录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本月7日夜10时，日本在芦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芦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解放》周刊10期，1937年7月12日出版）

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万万火急！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武装部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据各方面消息已证实冀察当局宋哲元已接受日方所提出下列三个条件，即(一)冀察当局向日军道歉；(二)二十九军从平津芦沟桥永定河以东撤退；(三)镇压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实行中日共同防共。这些条件已开始实行。此外有无秘密协定，尚不得而知。

全国同胞们！这些丧权辱国的条件同全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的要求完全相反，同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对于芦沟桥事件之最低限度的四点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能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亦完全相反。我们的政府与人民万万不能接受这种投降屈辱的条件！我们坚决反对冀察当局宋哲元接受这类亡国灭种的条约！我们要求为保卫平津，保卫冀察的每寸土地而血战到底！

全国同胞们！形势是万分紧急了！日本帝国主义大量海陆空军正向中国前进。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的让步与妥协了！正象蒋介石先生所说的：“今日的北平若果变为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亦何尝不可变成北平”。问题的中心就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放弃平津，放弃芦沟桥永定河以东的大块中国领土，则冀察必然不保，必然成为第二个东北四省，冀察不保，华北与全中国即将垂危，亡国灭种即将相继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冀察当局宋哲元对于日寇的让步与妥协！

全国同胞们！我们决不能对于宋哲元的投降屈辱的“已成事实”与中日间的所谓“地方解决”，表示默认与软化。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与要求，来贯彻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所宣布的抗日方针。在今天，仅仅是激烈的宣言，不承认的声明与抗议，已经不够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不怕这些的。在今天，希望九国公约签字国，出来干涉，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横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不管这些的。今天，我们需要最实际的办法来保证全中国人民的希望与要求的实现，来保证蒋介石先生所宣布抗日方针的执行。这些办法应该是：

(一)立即命令冀察当局宋哲元拒绝执行日本所提的三条件，率领全部二十九军实行武装抵抗，如宋哲元拒绝执行中央命令，则立刻明令撤销宋哲元现任职务，另派大员领导英勇的二十九军将士及华北各军实行抗战。

(二)立刻派遣大军增援二十九军，并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立刻召集国防会议，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以积极抵抗的方针去对付日寇的进攻。在日军四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以配合抗日主力军的作战。

(三)立刻实行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实行民主权利，满足人民生活上的迫切需要，实行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建立各种各样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

(四)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武装缉私，抵制日货，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银行矿山工厂与财产，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的与经济的特权，封闭一切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与特务机关，逮捕一切日本侦探与汉奸，解除日寇与汉奸在中国内地的一切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团体。

(五)立刻改革政治机构，使中央与地方政府民主化，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使国民会议真正成为代表民选的权力机关，使国民政府真正成为抗日救国的国防政府，肃清潜在政府内部的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这样使政府与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敌。

(六)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团结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方针。

(七)立刻实施财政经济土地劳动文化教育等各种新政策，以巩固国防，改善民生。

(八)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美英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

全国同胞们！只要我们的政府与人民能够坚决地实行这些办法，我们就有力量战胜日寇，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一切失地。只有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坚强的力量才能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新中国。

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现在是民族存亡紧急关头。大家紧密的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

反对一切对于日寇的让步妥协，坚决抗战到底！

只有坚决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保卫平津华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附〕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讲演——

蒋 介 石

各位先生，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意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政 府 的 一 贯 主 张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芦沟桥事件能否解决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不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札。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

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我们是应战而不是求战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国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更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希望和平解决但固守我方立场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系，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

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北民族作一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

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幸侥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转自《总裁言论》（4））

〔附〕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

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近年来，中国政府及人民一切所努力者，在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以期获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以是之故，对内致力于经济文化之复兴，对外则尊重和平与正义，凡国联盟约，九国公约——中国曾参加签订者，莫不忠实履行其义务。盖认为“独立”与“共存”，二者实相待而相成也。乃自九一八以来，日本侵夺我东四省，松沪之役，中国东南重要商镇，沦于兵燹；继以热河失守；继于长城各口之役；屠杀焚毁之祸，扩而及于河北；又继之以冀东伪组织之设立；察北匪军之养成；中国领土主权，横被侵削。其他如纵使各项飞机在中国领土之内不法飞行，协助大规模走私，使中国财政与各国商业，同受巨大损失；以及种种毒辣之手段：如公然贩卖吗啡海洛英，私贩枪械接济盗匪，使中国社会与人种，陷入非人道之惨境。此外无理之要求与片面之自由行动，不可胜数。受一于此，已足危害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生存，吾人敢信此为任何国家任何人民所不能忍受，以迄于今，吾人敢言中国之所以出此，期于尽可能之努力，以期日本最后之觉悟而已。及至芦沟桥事件爆发，遂使中国几微之希望归于断绝。

芦沟桥事件之起因，由于日本大举扩张天津驻屯军，且屡于辛丑条约未经允许之地点施行演习。日本此种行动，以足随时随地引起事变而有余；而本年七月七日深夜，日本军队竟于邻近北平之芦沟桥，施行不法之演习，继之以突然攻击宛平县城。我守土有责之驻军，迫而为正当防卫；我无辜之人民，于不意之中，生命财产毁于日本炮火之下，凡此事实，已为天下所共见。

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之行动有深足注意者，即其口头常用就地解决，及不欲扩大事态之语调；而其实际，则大批军队及飞机坦克车，以及种种新战争利器，由其本国及朝鲜与我东北，源源输送至河北境内。其实行武力侵略，向各我地节节进攻之事实，绝不能为其所用之语调，所可掩蔽于万一。

中国政府于芦沟桥事件发生后，犹以诚意与日本协商，冀图事件之和平解决。七月十三日，我外交部曾向日本大使馆提议双方及时停止军事行动，而日本未与置答。七月十九日，我外交部长复正式以书面重提原议，双方约定一确定日期，同时停止军事动作，同时将军队撤回原驻地点。并曾声明：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此次不幸事件起见，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认之任何处理国际纠纷之和平方法，如双方直接交涉，斡旋，调解，公断等等。然而以上种种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

于此之际，中国地方当局为维持和平计，业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议之解决办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之容忍，对于此项解决办法，未予反对。乃日本军队于无可借口之中突然在芦沟桥廊坊等处，再行攻击中国军队，并于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致哀的美敦书，要求中国军队撤出

北平。此则予双方约定解决办法以外，横生枝节，且为吾人所万万不能接受者。日本军队更不待答复，于期限未至之前，以猛力进扑中国文化中心之北平，与中外商业要枢之天津。南苑附近，我驻军为日本轰炸机及坦克车所围攻，死亡极烈；天津方面，人民生命横遭屠戮，公共建筑文化机关以及商店住宅，悉付一炬。自此以后，进兵不已，侵入冀省南部，并进攻南口，使战祸及于察省。凡此种种，其横生衅端，扩大战域，均于就地解决及不扩大事件语调之下，掩护其进行。

当此华北战祸蔓延猖獗之际，中国政府以上海为东方重要都会，中外商业及其他各种利益，深当顾及，屡命上海市当局及保安队加意维持，以避免任何不详事件之发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军官兵竟图侵入我虹桥军用飞机场，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至发生事故，死中国保安队守卫机场之卫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当局于事件发生之后，立即提议以外交途径公平解决；而日本则竟派遣大批战舰陆军以及其他武装队伍来沪，并提出种种要求，以图解除或减少中国自卫力量。日本空军并在上海，杭州，宁波以及其他苏浙沿海口岸，任意飞行威胁，其为军事发动，已无疑义。迨至昨（十三）日以来，日军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区猛烈进攻。此等行动，与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向河北运输大批军队，均为日本实施其传统的侵略政策整个之计划，实显而易见者也。

日本今犹欲以淞沪停战协定为借口，将使中国于危急存亡之际，尚不能采用正当防卫之手段。须知此等停战协定，其精神目的，即欲于某地点内双方各自抑制，以期避免冲突，不妨碍和平解决之进行。若一方自由进兵，而同时复拘束他方，使之坐而听受侵略，此为任何法理任何人情所不能曲解者。

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苟非对于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与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也。

〔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

时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

地点：汉口中央银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列席：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

主席：汪副主席。秘书长：张群。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二十九号下午，又见王部长，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如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新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方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复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徐谟自称——下同）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德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之条件并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

"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高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辰（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编者）。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的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末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一)德国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者相同，但加一句谓：如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非如此。蒋委员长表示：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约可撕破，说话可以不算数；但对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调停，因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但尚有两点须请德大使报告德国政府：(一)关于我国与日谈判中，德国要始终为调停者，就是说，德国须任调人到底；(二)华北行政主权须维持到底。在此范围内，可以将此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惟日本不可自视为战胜国，以为此条件乃是哀的美敦书。德大使乃问：可否加一句？蒋委员长说可以。德大使说：在谈判中，中国政府宜采取忍让态度。蒋委员长云：两方是一样的。蒋委员长又谓：在战争如此紧急中，无法调停，进行谈判；希望德国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战。陶大使称：蒋委员长所提两点，可以代为转达，如德国愿居中调停，而日本亦愿意者，可以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两方先行停战。蒋委员长说：如日本自视为战胜国并先作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判下去。在归途中，陶大使表示：以为此次之谈话有希望。在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长说：此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即去电东京与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复，此后发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临全大会通过——

中国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以抗战建国之大业，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戳力同心，共同担负，因此本党有请求全国人民捐弃成见，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统一行动之必要，特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各纲领，议决公布，使全国力量得以集中团结，而实现总动员之效能，其纲领如左：

甲、总　　则

1．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

2．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

乙、外　　交

3．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

4．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

5．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

6．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

7．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

丙、军　　事

8．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

9．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对于华侨回国效力疆场者，则按照其技能，施行特殊训练，使之保卫祖国；

10．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

11．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并优待抗战人员之家属，以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之鼓励。

丁、政　　治

12．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

与推行；

13. 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

14. 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

15. 整饬纲纪，责成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为国牺牲，并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为民众倡导，其有不忠职守，贻误抗战者以军法处治；

16. 严惩贪污官吏，并没收其财产。

戊、经　济

17. 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18. 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19. 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20. 推开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21. 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22. 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23. 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

24. 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

己、民众运动

25.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

26. 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27. 救济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施以组织及训练，以加强抗战力量；

28. 加强民众之国家意识，使能辅助政府肃清反动，对于汉奸严行惩办，并依法没收其财产。

庚、教　育

29. 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

30. 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

31. 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

32. 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

〔附〕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
日寇以军事进攻为主灭华方针的有关资料

芦沟桥事变到南京占领

杉山的战争演说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社东京电：陆相杉山，七月二十七日，在议会（按即七月二十五日开幕的特别议会）演说华北事件，结论谓："事态如此，因华武力妨害，致保护侨民及保护平、津间交通线陷于危殆，驻屯军已不容隐忍。为遂行其任务及自卫，决定断然膺惩，陆军当局已决意采取适当之重要措置。"（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大公报"中央社电）杉山当时又谓："中国事件，前途之发展如何，不能逆料，但军部已决意向前进行，克服一切之困难，俾能达到膺惩华军之目的。纵令中国计划作长期之抵抗，日本军部于达到膺惩华军，令其失去战斗精神之目的以前，亦决不罢手。"

（铸成：《第一次对外抗战》，《国闻周报》14卷33—35期，1937年10月4日出版）

开战以后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

据英国"标准晚报"传出外交上可靠之消息称：日政府负责人曾以议和条件送达蒋介石氏，内容为：

第一，中国承认内蒙为独立国；

第二，华北五省有决定自治之权，中国政府应予承认；

第三，直至停战时为止，日军在沪附近所占领之土地当改为日租界，并许其取得通海道路；

第四，中国沿海自山海关起，至越南界止，所有各岛附近之捕鱼权，让给日本；

第五，中国退出国联；

第六，中国不得设立军用航空。

（《反对汉奸的〈和平〉运动》，《解放》周刊23期，1937年11月13日出版）

南京占领到武汉占领

日本政府十二月十一日的决议

今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本阁议批准五相会议对华政策之决定。此种决定，包括下列几点：（一）除非中国改变对日态度，日本决不放弃其十字军的“征讨”政策；（二）不承认蒋介石政府，帮助新中国之建立。

（1937年12月11日同盟社东京电）

（编者按：这个十二月十一日内阁决议，到一月十二日通过于御前会议，一月十六日以政府宣言形式公布。）

日本海军司令长谷川十二月十七日的谈话

日驻舰队司令官长谷川，对外国记者团发表谈话，大意如下：“击败中国军队，日军现已占领中华民国之首都南京，期于今日举行有历史意义之入城式，数小时间，日本陆、海、空军将在南京成为一体。日本帝国决不满意今日之成功，盖因距总局的前途尚远。帝国军人基于日本帝国之总意，为东洋永久之和平，希望到达彻底的进步的目的。中、日事变发生以来，帝国对第三国之呼诉，虽曾付以极大之努力，但仍向其目的迈进。最近对于美舰英舰之不幸事件，实表示诚心诚意之遗憾。

（1937年12月17日同盟社上海电）

广田外相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谈话劝中国投降

一九三七年最后一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发表谈话如下：“友邦中国，今日实遭逢最不幸之境遇，若中国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中国自能免除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在迎接一九三八年之时，能与友邦中国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则中、日大局，即可展开一新局面。”

（1938年1月1日同盟社电）

日本政府一月十六日宣言

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书，阐明对华态度，略谓：“此次日本政府，于南京陷落后，对于中国国民政府与以反省其态度之最后机会。而至今日，国民政府依然不解日本真意，策动抗战，不察国内人民涂炭，对于东亚和平毫无顾忌。因此，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凝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并协力建设新中国。日本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及列国在华权益之方针，当然毫无变更。现今日本对于东亚和平之责任愈重，政府切望中国更为发奋，实行此项重大任务。”

（《日本政府侵华宣言》，《时事类编》特刊9期）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一月二十日谈话

川越茂顷对记者发表谈话，谓渠“接奉东京训令，即将于日内离沪返国。驻华大使馆参赞日高，及其他馆员，仍将留沪。惟彼等留沪之目的，并非意在与国民政府交涉，而仅在与沪上外国外交人员讨论将来可能发生之事件”，川越并谓：“日本与国民政府重开交涉之门户，现已关闭，纵然国民政府将来重新考虑其态度，亦仅能与中国新组织交涉，而不能以日本为对手。”

（1938年1月20日海通社上海电）

一月二十二日广田外相在议会宣布德国调解的和平条件

一月二十二日路透电：外相广田在议会宣布，最近经由德国调解，日本向蒋介石氏所提出之四项议和条件，内容大意为：(一)中国政府须放弃联共以抵抗日本及“满洲国”之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形成对抗共党之壁垒；(二)在若干地带成立非战区域，并在非战区内成立特殊行政管理；(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中国对日赔款。广田谓“以上为最低之议和条件”。并谓“中国已拒绝德方之调解，并拒绝答复日本之提议”。广田又称：“日本对华并无领土野心，亦不欲华北脱离中国，日本希望中国认清现势，重新合作，以达共存共荣之目的。”广田谓：“日本并无驱逐各国在华权益之意，中国之门户继续开放。”

一月上旬时第七十三届议会中的对华政策

在会议开幕的演说词中，近卫曾声言：“中日战争离结束之期尚远，战争之解决尚须长久时日。”又说：“现政府采取坚决的政策，嗣后不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外相广田说明日方对中、日和解所持的四原则：“(一)中、日‘满’合作反共；(二)特殊政权的设置；(三)经济合作；(四)赔款。”……民政党议员劈头便求政府保证“嗣后决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讨论媾和条件”因为他恐怕有第三国出而从中干旋，则现政府或有重与国民政府开谈判之可能。在二十三日（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议席上，政友会议员岛田俊维，除了暴露政府的野心之外，还质问政府为什么还迟疑对华宣战。民政党议员觀见祐补质问：“如国民政府重新考虑其立场时，日方应持何种态度？”并提议：“除非国民政府放弃武力抵抗而屈服，日政府应拒绝其要求”，后来又询问政府，是否欲对华宣战。近卫答称：“日政府将继续以军事及其他手段颠复国民政府。同时，日政府宣布对华政策四要点：(一)绝对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二)日本为阻止军火运华，仍可对华宣战；(三)日本对华北‘新政权’居监护人地位；(四)绝对不容第三者出而调解。”日政府的这些答复，似乎真把“和平”之门关闭了，怎知到了二十九那天（一九三八年一月）近卫在议会中又表示：“日本对国民政府宣战之举，政府仍在考虑中，而其决定将视中国将来态度为断。”由这话看来，“和平”之门仍是有缝儿的。

（《日本七十三届议会的苦恼》，《世界知识》
7卷5期，1938年2月16日出版）

日本政府中的主和派

据一月三十日香港传来的东京路透电，谓近日以来，此间有人主张停战，与中国谈判议和。日内阁各派，与日皇左右，及参谋本部人员，虽大多数主张集中实力对付中国，及时改编军队，长期作战；但一部分稳健派军人亟欲迅速结束中日战争。必要时甚或引起阁潮，俾新内阁组成后与中国开始谈判。

（《日本七十三届议会的苦恼》，《世界知识》
7卷5期，1938年2月16日出版）

主战派的对抗

一部分稳健派军人，亟欲迅速结束中、日战争，甚或将引起阁潮，俾新内阁组成后与中国开始谈判。因此，杉山陆相发表“必须准备长期战争”的文告，与之对抗。

（《日本七十三届议会的苦恼》，《世界知识》
7卷5期，1938年2月16日出版）

日本驻沪大使谷正之三月九日发表谈话谓如能议和则耗费小而效力大

三月九日同盟电：日本驻沪大使谷正之对新闻记者之谈话，宣称：“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但须继续加紧战争，促进蒋氏政权倒台，并使第三者各国放弃援蒋企图。战争以外之法如能使蒋氏议和，则耗费较少，效力更大。华中新政权前途光明，希望不仅苏、浙、皖受此新政权统治，即赣、鄂、湘亦加入其版图，赣、鄂、湘人口有一万八千万人，肥沃领土有一百万方里。”

五月二日近卫演说准备长期战争

日本为调整国内大政适应二期战争，而召集之地方长官会议，于五月二日午前十时在首相官邸开幕。首相训词大意如下：“政府为推翻蒋介石政权，铲除东亚祸根，虽费数年光阴亦所不惜。同时，全国民应极力援助华北、华中两防共亲日政权之发展。为实现此种伟大政策，七十三届议会通过八十六件法律案及八十亿元总预算。今后为遂行战争达到长期目的，应总动员物质及精神两方面之力量。事变发生后，不论战场和后方，均见发挥日本精神反对抗日容共之思想与政策。吾人当将日本夸跃世界之信义、正义及日本之跃进与真姿，明示世界全球。”

（1938年5月4日同盟社电）

五月九日广田外相演说：鉴于国际环境恶劣主张慎重处理事变

地方长官会议最后一天，广田外相说明日本对华方针及列国今后对华之动向如下："中国事变进行到第二阶段，蒋介石政权宣传长期抗战，从事于国内之团结，但未能达到团结之目的。他方面，各国军需品之输入及苏联援助中国，这是事实。因此，帝国政府必须顾及此种事实，慎重处理此次事变。在占领区域内，已成立'临时''维新'两政权。津浦线完全被我占领之时，两政权即刻实行合并。帝国对此极力加以支持，使其合并统一，并能完满健全的发展。"

（1938年5月10日同盟电）

五月二十二日敌前线指挥官发表谈话谓占领徐州后要继续打到昆明

我（日本）最高指挥官（按指寺内）在前线与记者团谈话，据云："徐州被我攻陷，但战争并未因此停止。我军此后之路线可分三步，第一即徐州大战，第二进攻汉口，第三进击重庆或昆明。

（1938年5月22日同盟电）

五月宇垣初上台时发表半硬半软主张

日本占领徐州（五月十九日）后，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就将它的内阁加以改组（五月二十六日)。这次改组的用意，承继广田弘毅出任外相的宇垣一成，曾经很明显的表示过，是在对付中国之"第二期抗战"。他说："在中国既有决心对日本延长它的抗战，日本内阁即须在它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上，重新加以决定，以应付由长期抗战所产生之环境。日本现在料定在华之战争，须再延长数年。但内阁改组之后，日本将用全力以结束战争之决心，当已无疑义。现在援助中国作战之各国，即应因战事之延长，充分了解日本欲推倒蒋政权之决心，已牢不可破。而彼等如果明白的认识日本之所欲为，即宜避免不必要的干涉。"

（见6月7日及8日香港《南华晨报》所载同盟电及海通电）

宇垣外相的主和政策

宇垣外相继任广田外相后，仍称对中国无领土野心，只冀中国放弃抗日政策。若中国愿意接受日本的提议，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地位，与日本合作，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一月十六日的声明。对各国在华权益，日本政府并不妨害，且向英国提携，以外交路径解决远东纠纷。

（《日制〈东亚联邦〉与世界三分论》，《世界知识》8卷10期，1938年11月16日出版）

六月十七日永井递信大臣发表谈话谓必须打倒中国政府

永井递信大臣，西下参加大阪递省医院奠基典礼，在车上对于目前对华诸方策作如下之谈话："目前政府之对华政策，在于打倒蒋政权，援助新政府建设新中国，借此奠定东亚永远之和平。其他之政策，亦须沿此线进行。"

（1938年6月17日同盟社电）

七月张姑峰事变时外传日本曾向中国提出和平的五条件

当日、苏边境纠纷日烈，将有成为大规模的战争可能时，中、日和平的空气今日突又盛传于香港。上午是"孖刺西报"首传日本向中国求和五条件，下午则各晚报均已刊载。细察那五个条件：（一）日本军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军；（二）承认"满洲国"的独立；（三）将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九十九年；（四）双方各赔偿此次战事之损失；（五共同防共。

（陈荣丸：《日本向中国求和的问题》，
1938年8月5日《星岛日报》）

七月坂垣发表：坚持一月十六日的方针，打倒中国政府之强硬论

七月一日同盟电：由某地视察返京之坂垣陆相，发表帝国对蒋政权态度之重大意见："最近有第三国出而调停中、日战争之说，此为蒋政权所指使，或第三国自动出而调停，尚不可知。但帝国是不收回打倒蒋政权之决议的。帝国政府已于一月十六日发表不与蒋介石政权交涉，且常常强调此点，但蒋介石政权及第三国常常想调解中、日战争，对此事现无议论之余地。若使蒋政府及第三国对于帝国一月十六日之宣示即认为策划和平，这是认识不足。不知我国朝野打倒蒋政权之决心，在蒋政权依然存在之时，中、日间绝无和平之可能。今日日本不能再与蒋介石携手开和平谈判。"

七月四日同盟电：正午，近卫首相与坂垣陆相在首相官邸密谈二小时半，坂垣对收拾时局的根本方策对首相作重要之进言云："帝国政府以今年一月十六日之声明，即不以蒋政权为对象之根本方策为旗帜，彻底向消灭蒋政权的路上迈进。当蒋政权尚存在之时，中、日间无和平之可能。此次之事变，带有国力战的新性质，应与建设平衡。所以我国必需清楚的认识此点，官民一致的整备战时体势，来完成此种目的。"在五日的五相会议之前夜，首相陆相之会谈，颇甚注目。

七月七日同盟电：中、日事变一周年纪念日，坂垣陆军大臣发表谈话如下："今后战事，无论延长多少年，帝国所走之路只有一条（按指以武力征服中国），除此以外，不能达到东洋百年之和平。现在吾人应认识时局之重大性，实现近代战争所要求之国家总动员，使战争早日结束。现在之战争，乃经济或思想战。因此，在后方不得发生使前线将士惊异之事件。皇

军在二千基罗的前线上作战，在辽远的敌军后方作战，忍饥耐寒的毫不动摇的继续战争。吾人知道这种之情形，应即刻觉悟，努力支持战争。"

九月近卫准备改变策略以诱降为中心

抗战继续了十四个月，大量消耗日本国力的结果，促成敌国十分疲弊，而朝野人士皆有早日结束战争之企望。财阀由于保全获得利润的旧地盘和开拓新路线的见地，这种企望尤其迫切。其事实的反映，就是日本侵略者一方面仍决心准备长期战争，一方面再作速战速决的尝试。在侵略者急激攻袭武汉的今日，日本朝野又充满着结束战争，以从事于所谓"长期建设具体化"的工作的空气。其具体的方针，表现于近卫见西园寺后的谈话中。他固然依旧大吹其"彻底毁灭"的论调，但是他的谈话的要点却在于：(一)幻想在汉口攻陷后认我中央政府为一地方政权；(二)今后的重大的问题是"长期建设的具体方策"；(三)以占领地权益引诱第三国，缓和国际的孤立；(四)设置对华中央机关，统一开发我国经济的工作。这里很浓厚的表露着日本财阀的要求，所谓"长期的建设"，正是财阀资本的要求。因为继续作战下去，不但投资的新路线无法保证，即旧地盘也有动摇的可能，所以在"长期建设方策"当中，于经济开发物资需给关系之外，还列入"治安维持"为首项。又因为经济经常的发展，需要看各国关系的圆滑化，所以对第三国要避免无用的刺激，用"尊重既得的权利"为钓饵，诱惑各国。其调整国际关系的具体工作，是明显的表现于外交新方针上。又为急速而有效的进行对华经济侵略，所以急需设立对华中央机关。但这对华中央机关的设置，即为关西财阀所急逼要求的。近卫内阁大改组以来，日本内外施政方针，决定于所谓五相会议。这种寡头独裁机关（日本朝野皆认这会议为永久性的制度)，自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以来，前后开过十七次会议，其重心始终在于侵华的大方针上。大阪商工会议所，特于八月二十三日举行对华问题调查委员会，要求统一对华诸机关的分立运用统合的强力的国家机关，以做一元的活动。

（宋斐如：《战时日本内外政策变化的基调》，《世界知识》8卷7期，1938年10月1日出版）

十月上旬近卫还有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话

十月三日同盟电：本日上午，近卫兼任外相与前外相宇垣办理移交手续后，接见记者团，发表帝国外交方针云："关于帝国之外交方针，如屡次所发表之声明，基于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之根本方针，来处理中、日事变。关于此点，毫不变更。宇垣前任外相之辞职，并不是因为此种之根本政策。今后，因基于此种原则，使五相会议之决议更加具体化。"

〔附〕日寇侵略华北的战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十一月九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镇压我国人民的抗日民族斗争，仍不断对我国发动进攻，其势力已逐渐深入到华北地区。至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寇先后侵占山海关、热河（今河北承德市）及长城以北地区；同年三月九日至五月二十四日，经过二个半月的“长城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长城防线，侵入华北内地，逼近平、津。日寇得寸进尺，又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对华北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妄图完全占领我华北，进而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狂妄野心。

一、日寇挑起事端，中日战争爆发

“七·七”事变是日寇一手挑起来的。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深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国的声势不断高涨，已严重威胁和阻碍了其侵略扩张政策的推行。日寇为实现其以武力霸占华北的野心，蓄意制造事端，从一九三七年春季就在平津一带一再举行军事演习，越出驻扎区横冲直撞，日军多次有意向中国军队挑衅，企图挑起冲突。是年六月，日寇将平、津驻屯军河边旅团的两个多联队，调至北平郊区丰台一带；七月七日夜，在靠近芦沟桥中国兵营的龙王庙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再次蓄谋挑起争端。当时，驻这一带的国民党军，未敢越出城门一步。但在演习刚要结束之时，日军硬说从头上飞过一发子弹；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强占宛平城，限令国民党军无条件撤出。但其未等中方答复，就发起全面进攻，守军奋起抵抗。这就是所谓芦沟桥事变的起因，中日战争从此全面爆发。

二、战争概要经过

1． 平、津弃守

当“七·七”事变爆发时，坚持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毫无准备。事变发生以后，虽仓促进行了一些消极抵抗准备，但仍幻想谈判解决。而日寇却毫无诚意，它利用谈判暗中向平、津地区增调兵力。

当时，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兵力只有河边旅团，驻在平汉线北段及北平、丰台附近与分驻在冀察及平汉线北段的国民党宋哲元之二十九军对峙。事变发生后，日寇即按预定战略计划分三路大举侵入华北：一路由关东军派遣两个混成旅团，经热河向北平北侧地区进犯；一路以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经山海关，向北平南侧地区入犯；一路则以平、津驻屯军河边旅团为基干，部署在北平东侧地区，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另又从国内调来第五师团，经朝鲜

入关，会合敌海军围攻天津、塘沽国民党守军。七月十二日，集结在北平郊区、丰台、通县地区的日军，在二百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在北平近郊发起进攻，但因日军援兵未到，战斗规模尚不大。至七月十六日，敌第五、二十师团，二十旅团，酒井旅团等五个师团先后到达北平附近地区，连同原来的河边旅团和伪满军等，总兵力已达十万人以上。援兵到达后，敌首先攻占了丰台和宛平。十八日，又分三路向北平进攻。二十五日，敌强令国民党赵登禹师撤离北平，未逞，遂于当晚对廊坊发起进攻，企图切断平、津联系。在此期间，芦沟桥、丰台、南苑、廊坊等地守军与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但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消极抗战政策的影响下，守军不仅得不到后援，反而受到其上司责难和钳制。七月二十九日天津失守，八月四日又放弃北平。国民党守军全部撤出平、津、芦沟桥之间三角地带，被迫在永定河西岸重新组织防御。敌人在攻陷平、津之后，为解除后顾之忧，除以一部兵力扼守平汉线上之长辛店和津浦线上之独流镇附近地区外，集中主力向南口、居庸关方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企图夺占八达岭要隘，控制平绥铁路。

2. 南口及张家口地区战斗

八月九日，日军以第二十师团全部，第五、十两师团各一部及酒井旅团等，沿平绥线进攻南口。国民党军汤恩伯部，由绥东经柴沟堡仓促东调南口后，遂以两个师会同由北平后撤的国民党守军扼守南口；另以高桂滋率两个师防守独石口、赤城、延庆、怀来一线。日军从正面进攻南口受挫后，即以主力一部攻击德胜口；另一部经门头沟、沿永定河向怀来方向进犯，企图迂回侧击居庸关、南口。汤恩伯即调王万龄师在南口以南向西展开，阻击迂回之敌，激战数日，日军于八月二十一日始突破守军防御，从侧后向居庸关迂回，并向怀来方向进攻，南口遂于八月二十六日失陷。在此期间，驻石家庄国民党军卫立煌之一部，曾往援南口，八月二十一日进至青石口（估为青白口，位于石景山西北30公里）被敌迟滞，该军未待到达，南口即已落入敌手。

与此同时，敌以关东军之本间旅团、铃木旅团进攻张北、张家口；另以大井支队，由沽源经龙关（县）切断平绥交通，并于八月二十日，突破长城要隘神威台口（估指龙关），遂又协同长城外各军，于八月二十七日攻陷张家口。

3. 永定河之役及保定、沧州失陷

南口、张家口沦陷后，敌已解除后虑，遂分三路南犯：一路自天津沿津浦路南犯；一路由永定河上游迂回渡河，袭取长辛店、良乡；一路由北宁（今京沈）线上之廊坊方向，强渡永定河，从侧后迂回京汉线北端国民党守军。

日寇为夺取沧州，打通沧石线，于八月中旬，以第十、十六师团主力，分别沿津浦路东西两侧向南突犯，先后攻陷杨柳青、良王庄、独流镇、静海、唐官屯等地。九月十日，敌第十师团又突破马厂守军阵地，国民党之三十九师，即在姚官屯东西一线展开，掩护二十九军部队向南撤退。九月十八日，日军向姚官屯一线守军阵地发起进攻，至二十四日，敌攻占沧州（县），尔后继续南犯，二十六日攻占冯家口，二十九日又占领泊头镇、东光、连镇等城镇。守军溃往德州方向。

在此期间，敌第十六师团主力，与国民党吴克仁军在子牙河、大城、文安之线对峙。九月十五日，吴军以主力向位于子牙河西岸的北赵扶、姚马渡之敌发起攻击，夺回该两点，敌退至子牙河东岸。敌援兵到后，于二十日起，又向守军反击，至二十三日，守军弃大城，退至牛各庄、牛庄一线。

由永定河上游渡河之敌，于八月二十一日，始与国民党军孙连仲部争夺良乡城及房山西北高地，经数日激战，良乡及房山西北高地失守，守军于八月二十七日转至马头镇、琉璃河一线组织防御。此时，北路之敌已占领涞源，并有出紫荆关攻易县之企图，直接威胁了在琉璃河地区的国民党守军。日军攻陷南口后，以第五、二十师团主力，加强了平汉线上的进攻力量，企图迅速攻取保定，进窥石家庄。

九月十四日，坂垣征四郎率三个师团，由固安方向渡永定河，向守军右侧后进击，十五至十八日，相继攻陷固安、琉璃河，涿州（县），迫使守军向涞水、张坊方向撤退，敌则追踪而至；此时，涞源方向之敌已占领紫荆关；国民党军孙连仲部耽心敌断其后路，而继续南逃。九月二十日，日军突破徐水方向守军前沿阵地，二十一日晚又突破守军白洋淀至满城之间的主阵地。九月二十四日保定失陷。早已退至完县、唐县之孙连仲部，在望都、张登镇一线展开，掩护从保定方向溃退之国民党军南撤，随后孙部亦退往获鹿地区。

4．石家庄失陷

保定失陷后，日寇继续沿平汉线南进，企图一举占领石家庄，打通沧石路之联系，打开晋东南之门户。敌第十四师团及第二十师团之一部和河边旅团主力，沿平汉铁路南下；另以一部兵力由满城、完县方向侧击国民党军，并于九月二十八、九两日攻占定县、新乐。日寇遂即向正定、石家庄方向进犯，正定国民党守军商震部一个师及鲍刚的一个旅，一触即溃，敌于十月八日，占正定、灵寿后，尔后继即分三路渡滹沱河，向石家庄进攻。其主力由正定沿平汉线从正面进攻；一部由灵寿方向渡河向正太线守军左翼进击；另以一部兵力在藁城附近渡河，从左翼迂回侧击石家庄。国民党守军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于十月十日撤出石家庄，右翼滹沱河南岸之守军，亦相继后撤。

敌攻陷石家庄后，即以第二十师团全部，六师团之一部，河边旅团一部转攻娘子关；另以第十四师团主力，第六、十六师团各一部分两路南进，一路沿平汉路南下；一路由宁晋、柏乡向内邱方向突犯。

5．晋北之役

张家口失陷后，国民党守军一部退守柴沟堡一线，企图阻敌西进；另一部在涿鹿，蔚县地区，欲阻敌南进。敌亦以两路进犯，一路沿平绥路西犯，一路沿宣蔚公路南犯。沿平绥路进攻之敌，首先于九月八、九日连续攻陷天镇、阳高，十一日又攻陷大同。尔后该路敌又分三路进犯：一路沿平绥铁路出得胜口连陷丰镇、集宁，与尚义、商都方向之敌相呼应；一路在攻占丰镇之后，即迅速西向攻占了凉城、和林格尔，进攻矛头直指归绥(今呼和浩特)，归绥国民党守军不战而退往包头；另一路南下，接应沿宣蔚公路进犯之敌。由于国民党军望风溃逃，沿宣（化）蔚（县）公路南犯之敌遂占蔚县、广灵、灵邱、阳原、涞源、浑源等县城，切断了平汉、平绥二路之联系，威胁了恒山诸要隘。大同以南国民党守军畏敌断其后路，相继撤至雁门关东西一线。日寇乘国民党军仓促撤退之机，集中万余兵力，沿宣蔚公路南犯，企图一举攻下平型关，向山西腹地进犯。但于九月二十六日，在蔡家峪附近遭我第八路军伏击，被歼三千余人。敌遭此打击后，改变进攻方向，于九月底乘国民党守军不备，于恒山中部茹越口突破守军防御，并进占繁峙，从侧后威胁了恒山各要口。雁门关、平型关之间守军即弃阵退守五台、崞县、宁武一线。至此，恒山天险拱手让敌，晋北门户大开。

6．忻口之战

十月初，日寇以第五师团一部向五台山方向进行警戒，而以铃木兵团由繁峙向崞县（今

山西崞阳）进犯，本间旅团由雁门关向原平方向突犯，另以一部兵力由朔县向宁武进犯，企图直下太原，解决华北战局。国民党军为了确保山西要地，则于十月二日令卫立煌率四个半师，连夜由石家庄向太原以北集结，并以山西省原守军坚守崞县、原平一线，以争取时间。但至十月八日，崞县失守，十日，原平再陷。此时卫军大部已集结于忻口及其以西地区。敌攻下崞县、原平后，即以第五师团及关东军第一、第十二师团等部，约五万余人，于十月十三日，从正面向忻口南之怀化高地发起进攻。守军主力则于十月十二日，展开于龙王堂、界河铺、大白水、南峪之线，形成以忻口附近阵地为核心的阵地防御。守军（含阎锡山部）共区分为三个兵团：以刘茂恩为右翼兵团；王靖国为中央兵团；李默庵为左翼兵团。自十三日交战后至十八日，阵地稳固，并曾多次出击，歼敌数万；此时我八路军亦积极出击，袭击敌后方，给敌以重大打击。但由于晋东战局不利，忻口守军于十一月二日夜，弃阵退向太原方向，忻口遂告失守。

7．晋东之役

国民党守军放弃石家庄后，其一部撤至漳河一线，阻敌南进；另一部则退往娘子关地区仓促组织防御，企图阻敌西进。日寇在夺占石家庄后，即乘守军溃逃之机，跟踪追击，并于十月十二日，突破井陉关及其以南之长生口守军防御，接着又夺占娘子关东南之雪花山，使娘子关受敌瞰制之下。不久敌军集中全力从正面进攻娘子关，遭守军坚决抵抗，进攻受阻；敌又转移主力攻击旧关，再被守军包围，并遭重创。二十二日，敌第十四师团前来解围，以一部兵力向娘子关正面实施牵制攻击，而以主力四个联队由横站口（井径东）向南漳城，渔镇进犯，企图迂回守军侧背；守军恐受包围，于二十六日弃娘子关退往平定。娘子关、旧关陷入敌手。当守军于十月三日撤至平定时，发现晋阳(估指昔阳)方向有敌约一个旅团西进，因而守军继续西撤，企图在阳泉、寿阳之间组织防御，但由于敌军追击迅速，守军未及展开，阳泉、寿阳就相继陷落了。

8．太原失陷

由于晋东、晋北守军节节败退，日寇很快从东、北两个方向逼近太原。晋北方向，石岭关防线，被敌一举突破；晋东方向，敌很快越过寿阳，逼进太原。国民党守军为保卫太原，于十一日，令太原北面各军迅速向太原以北青龙镇既设阵地转移，与晋东守军协同作战。另以傅作义部防守太原城。晋北卫立煌部于二日夜向青龙镇撤退，但在敌追击下，在青龙镇未能立足，就又撤向太原北郊。晋东方向，十一月八日阳曲失陷，太原东山亦告失守，卫军被迫再行后撤。不久，太原城北被敌突破。十一月七日发现太原以南清源地区有敌骑窜至，有切断守军退路之可能，傅作义见大势已去，于十一月九日夜率部向西山突围，太原遂告失陷。

三、几点分析

1．国民党消极抗战是华北抗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声势的压力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口头上虽答应一致抗日，但实际上他却仍然执行着“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在日寇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蒋介石仍把大批嫡系部队放在“剿共”前线攻打红军，而把华北战略要地交给“杂牌”——二十九军防守。在战斗过程中，国民党军望风披靡，不战而退，把北平、天津、石家庄，太原等战略要点，拱手让给日寇。致敌人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之内就基本夺占了整个

华北。

2. 毫无准备，被动应战。早在“七·七”事变之前的1937年5月，毛主席就分析了1936年以后日本陷入的严重危机，洞察到日本为了摆脱这种危机正在加紧准备大规模侵略战争。毛主席指出：“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盗战争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并指出“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出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一心企图消灭共产党，不惜出卖中华民族，把希望仍寄托于与侵略者的谈判上，对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毫无准备。既没有统盘计划，又没有具体部署，使整个抗战过程，基本上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

3. 战术上“单纯防御”。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讲到华北抗战的教训时说：“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还说：“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注： 此材料是依据反动头子何应钦编印之《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国抗战地理》、《太平洋战争史》及有关材料整理而成。

（原载北京军区编《我国北方战例选编》）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解放报记者以共产党中央最近由南京中央社广播发表之宣言，影响中国时局甚为广大，特请共产党中央负责人发表意见如下：——

“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救国之伟大事业，已在九月二十二日经过中央通讯社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及九月二十三日该社继续发表的蒋介石氏的谈话，建立起必要的基础了。

蒋氏的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在蒋氏谈话中尚没有抛弃国民党自大主义的精神，尚没有能坦白的承认国民党过去十年来在民族危机中自己所应负的责任，不免遗憾！共产党的宣言及蒋氏的谈话，宣布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启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用以极大的增强抗日战争的力量。这个宣言是一个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本应早日发表，还是在七月四日起草，七月十五日就交付国民党了的，可是推迟了两个多月才发表，然而宣言的基本精神是没有损失的，这个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其基础”。宣言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实现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的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诚之必要。因此，中共

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势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的团结呀！我们伟大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解放》周刊18期，1937年10月2日出版）

〔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蒋　介　石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碍，国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益趋危殆。此数年间，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意见，而共趋于一致。足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中国不但为保碍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战，亦为保持世界和平与国际信义而奋斗，世界明达之士，必能深切了解之也。

（转自《"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

〔附〕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于上海）

宋 庆 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进攻芦沟桥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奠定了正式合作的基础，以代替西安事变后所获得的停战。

孙中山一生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主张国共合作的原因。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倘使他所主张的国共合作一直不间断地继续到现在，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强国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转自《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

〔附〕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向国民党提出的抗日主张

（一九三七年）

一、提前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上下一致遵守之政治纲领，俾全国各阶层力量，能迅速集中，各方政治意见，能彻底融洽，以树立政府之坚实抗战基础。

二、实现最低限度之民主政治，以增强人民对政府之信赖，并使人民得以自由发挥其抗战能力。

三、建立特殊机关，统一各党派所领导之民众活动，俾全国宣传组织与训练，完全趋于一致。

四、成立武装民众指挥之机关，指挥全国义勇军之活动，使其与正式军队之动作，有适当配合，借收指臂之效果。

五、于全国各地成立在乡抗日志愿军，以备征兵制未完成前之调用。

六、成立战时经济计划机关，计划战时必需之生产与分配，并分设于各省、市，以促成战时计划经济之实现。

七、对广大战区中之劳苦人民、自由职业者、中小工商业者、失业公务人员等须有妥善之救济方法。

八、除汉奸外，宜从速开释全国政治犯；并取消以前有碍民众运动之各项特殊条例。

（张执一编：《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读书生活社出版）

〔附〕少号召多建议

章乃器

出狱已经一个月了，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没有发表过政治的主张，而仅仅不过发表几篇关于民众组织设计和时事分析的文章，我的答案是：

第一、在国策还未确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多作政治的号召，使国策能够早点确定下来；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意标新立异以鸣高。大家应该是集中力量，培养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别之见，在明争暗斗中再消耗一丝一毫的国力。

第二、国策的轮廓和大政的方针，人民是不能不要求知道的；国策的详细内容和大政的具体步骤，人民是不应该要求知道的，好比坐船一样，目的地是必须问明白的，航线也不妨问一个大概，但是究竟怎样经过这条航线，达到目的地，我们却只好信任舵师。我们反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观念，然而也绝对不能主张船客可以去干涉舵师的职务，就是典型民主制度之下的议院，参加的也只有少数的代议士，而代议士也不能处处干涉政府的行动。国家在非常的时期，议会往往还要给政府以较大的职权，使它可以作应急的处置。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特别在这全面抗战已经爆发的时候，我们为民族的利益打算，不能不多信托一些政府，使他能够运用较大的权力，同时保守较多的秘密，所以，我们要求民主，但是决不能马上梦想一个典型的民主，时代和环境是必须顾到的。

根据上述两点意思，我再做一些具体的说明。

比方，中央加紧民众组织的方针，我们已经知道了。对于党员“泯绝平日党内外一切彼此之偏见的”指示，我们也已经见到了。那末，对于民众组织方面，我们现在就用不着而且不应该再提出原则的“开放民众组织”的政治号召，而只须在这个原则之下，从实际方面多建议一些如何加强民众组织和如何彻底克服偏见的计划，因此，我就只能发表一些平淡无奇的里弄组织和职业组织的建议，消极的使后方秩序可以安定下去，积极的使民众对于前方的援助，可以作有组织的动员。同时，许多青年在“没有工作可做”的呼声之下沉闷着的，也可得着一条可以做工作的康庄大道。

再比方，在军事方面，全面抗战的形势已经展开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也已经由最高军事领袖明白表示过了，我们以后就只须在全面抗战和抗战到底的原则之下，在如何动员全国物力人力和如何加强国防建设等问题上多做建议的工作，至于一时一地的攻守进退，那是军略上的问题，是军事当局的职权，是国家的最高秘密，人民是没有理由过问的。

再比方，在金融方面，目下已经施行战时的金融政策了。我们便不必再以“实施战时金融政策”的口号来号召，而且也不必再来一套耸人听闻的战时金融政策以扰乱人心。现在内地贴放办法，已经颁布，五万万元的救国公债也已经决定发行，这表示目下的金融国策决不致于消极的紧急应付，而是积极的包含增强国防建设的意义的。消极的紧急应付，不过是过渡时期中一种不可少的处置罢了。自然，这个积极性还很不够，那也许为国力所限，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在这时候，也只好在现行的原则之下，在如何运用金融力量推进生产，巩固国防、动员全国的问题上面，多做一些设计建议的工作，以增加现行金融国策的积极性而充实其内容，应该建议的我们丝毫不必犹豫；而原则才别有主张的却应该特别慎重。倘使我们认为财政金融当局过去的措置还算得当，那末，现在除了多信任他们一些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人民多多在国策的原则之下建议政府充分考虑人民的建议，这是上下一心共同对外的唯一办法，我再提出：我们目下要少号召多建议，立宪国家平常时期竞争选举的方式，目下是万万不能用了。

（原载1937年9月1日上海《申报》，转自人民大学编
《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3辑）

〔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我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之成立，其目的端在促进全民族力量之集中，对日抗战，以达到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自芦沟桥及上海事变发生后，全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毅然作神圣之自卫战争，我民族已呈现空前未有之统一，在此伟大民族战争逐步展开之时，吾人应本公诚之态度，共求民族统一之巩固，促进全民抗战之成功。故于八月发表宣言，号召国内外盟员及

全国同胞，全体动员，各尽其力，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复于10月25日经最高会议议决，正式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之组织。吾人深信此种光明表示，足以增强全民族团结之信念。我海内外同盟组织一律结束后，所有力量，自当贡献政府，效力抗战，以贯彻吾人之素志。所望全体盟员，此后各自淬历，本历年抗战之决心，作民族忠贞之战士；并望我政府在此存亡一发之秋，积极动员全国民众，共赴此神圣之民族战争，以争取最后胜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谨此宣言。

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由陈铭枢、李济深等人于1935年12月组织起来的。

（转自人民大学编《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3辑）

〔附〕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励致蒋介石汪精卫信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

介石总裁，精卫副总裁赐鉴：

本月三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宣言，举诗经“嘤鸣求友”之意，昭示海内；同人等捧读之下，怦然有动，岂敢不勉竭愚诚，冀赞盛业。

同人等以为一国人民言行之所不能逃者，厥为历史上遗留之民族性。吾国重贤之宇宙观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惟其心目中注意之方面多，故不好为一编与排他之论。反之，最近欧洲各国政局，常有有我无他之象：立足于无产阶级者，不容资本家之存在；立足于个人自由者，不顾及全社会之幸福。以是，党派对立与其相残之酷，颇有为我东方人所不克了解者矣。中山先生奔走革命以还，举“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为立国要义；主张个人自由而不忘社会公福，主张民族本位而不忘世界大同；其于采用西方政制，固已贯以吾国民族性于其中矣。今之持共产说者，渐自阶级立场转而努力于民族生存；持极权说者，亦知法西斯派主义难行于中土，此吾民族性不走极端而好调和之明证也。惟吾国有此民族性，故言治术则“儒”“法”同进，言宗教则“释”“道”并尊，未尝有如欧洲之相排相残。此实吾族含宏广大之优点，而应谋所以保存之而发挥之志。此次大会宣言，即为代表此种中庸性之重要文献。语云：“和气致祥”，吾国而有此气象，其为民族性本然之表现，同时即为复兴之朕兆，有何疑乎？

同人等鉴于十余年来，青年惟务外驰，竟忘国本，乃标国家社会主义，且组织国家社会党以矫正之。昔年曾刊布我们要说的话一节，胪举各项主张，内容繁复，非一函所能详，然吾人之言与中山先生遗教有若合符节者。兹举三点言之，以资参证。

第一，国家民族本位，吾辈政纲中曾有语云：

我们相信，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以往的历史，

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日本人压迫到我们这种地步，虽平日在对抗中的资本家与劳工，亦都不由得不联合一气，从事于抵抗。所以，民族观念是深中于人心，而较阶级为强。

只有民族的纵断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能推翻民族的联合，即以苏俄论，他的成功处不在阶级斗争的国际化，而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化。

第二，修正的民主政治。吾辈政纲中曾有语云：

我们所想出的修正的拟案是甚么？首先可说的便是：必须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在原则上完全合乎民主政治的精神，在实施上必须使党派的操纵作用有所凭借。于是这种政制在平时，不拘两党或多党，都能运用，即假定无党亦可运用；而在紧急时候，立刻可集中全民的意思与力量，不分党派，我们相信，这样制度不是不能创造的。

但欧战之后，批评民主政治者往往而见，如今之义德等国，竟目民主政治为恶劣政治。同人等以为，政治的社会之要素，不外乎二：其属于国家者为权力，其属于个人者为自由。为行政之敏捷与夫应急之处置计，岂能不提高权力；为个人之自发自动与养成自己负责心计，岂能不许以言论结社之自由，地方自治，与夫参政大权。惟有此等权利，而后人民有实际上参与政治之机会，而后知舆论界议场上政府中言论之不可以苟发，而高调与笑骂之无济于事。盖民主政治之下，人民得真正参加政策之决定，其责任心自养成，其政治智识自增进。及至国难临头，尤贵乎事权之统一，与执行之敏捷，待此同心一德，以最高权力托之于战时政府。可见正惟平日民主政治之实行，及至战时，人民自然感觉权力集中之必要。如欧战时之各民主国之战时内阁，皆其彰明较著者也。

第三，社会主义。关于经济制度，同人期望社会主义之实现。政纲中曾有语云：

一、为个人谋生存之安全，并改进其智能与境况计，确认私有财产；

二、为社会谋公共幸福，并发展民族经济与调剂私人经济计，确立公有财产；

三、不论私有与公有，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之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之；

四、依国家计划，使私有财产趋于平衡于普遍，俾得人人有产，而无贫富悬殊之象；

五、国家为造产之效率增加及国防作用计，须以公道原则，平和方法，移转吸收私人生产或其余值，以为民族经济扩充之资本。

自此三点观之，可知同人等之主张，与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之三大要义，措词容有不同，而精神则并无二致。所以中山先生之三大要义，固已确定我国立国之大经，而莫能出其范围；然立说内容，间有出入，则以政象因时而变，药石自难尽同，此环境使然也。况衡诸抗战建国纲领二十六条，“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合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碍”云云。则政府态度与在野党派所要求不谋而合；在同人等，自当开心见诚，以国家社会党之主张行动，向公等公开而说明之。顾政治不独限于若干项之大纲，尚有因时因地因事而生之问题，非今日所能预测；同人等更愿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与国民党领导政局之事实，遇事商承，以期抗战中言行之一致，此同人等愿为公等确实声明者也。更有进者，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吾辈同志之中，有参加民元之革命者，与反对洪宪之帝制者，平日自命对于中山先生创建民国之工作，亦尝负弩前驱；因此，爱护民国之心尤为深切。则今日强寇方张，窃据僭起之际，尤当追随公等之后，巩固主权，保全国土，

使中华民国长保昔日之光荣，且得今后之自由发展，此亦同人等区区志趣所在，当蒙鉴察者也。

特布肺腑，惟祈亮照。专此，敬颂

勋安！

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拜启

（转自冯子超编《中国抗战史》）

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

（一九三八年九月）

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之声明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上，宣读了下述的宣言：

（一）中国共产党及时的预见到：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会限制于仅仅侵占东北四省，而是并吞全中国。为了团结一切民族力量以保卫祖国起见，中共从自己方面尽了一切可能去结束十年来的内战，以取得对于国民党的友好的合作。这一努力，对于国民党也发生了影响，在西安事变中尤其是如此。因为在西安事变中，中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而打破了日本走卒所准备的卑污的谋害蒋介石以挑拨中国新的内战之行为。从此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就开始接近，以后就进到了合作。

（二）日本法西斯军阀，于一九三七年秋开始侵夺中国北部及东南部的广大的领土，他们希望得到迅速的、容易的胜利，希望逼得国民政府屈膝投降，希望以华制华。可是他们的打算是惨酷的失败了。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没有投降，他们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中国人民则起来进行伟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争。因此，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迅即遭受中华民族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给了日本以巨大的损失，使他们对于中国的进攻，转成一种对于他们甚为繁重的持久的战争。这一战争，日益要求日本使用更大的军事力量。战争越是继续，日本的困难愈是增加，日本侵略的完全失败的日子，便越是迫近。

（三）但是在最近的时期中，中国民族，还须要以英勇的努力克服极大的困难。反对残暴日本帝国主义的自卫战争，是对于我们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巨大的锻炼。只有民族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进行这一伟大的斗争，才能保证中国民族的胜利。可是最近数月来的经验已经指明正是这种自卫战争，是有伟大的力量，来团结中国民族。在战争的烈火中，旧的数千百年的分裂国家的屏障是被破坏着，团结我们四万万人民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成为一个真正统一民族的伟大过程是在完成着。这就是中国人民之所以不可战胜的基本保证。

（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立起来了。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这些正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收获，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亲密的战斗的团结的基础。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是胜利的保卫中国的决定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包括中国的一切抗日党派。这一统一战线的参加者，必须真正亲密地联合起来。国民政府的正确政策，必须被实行。彼此间必须有完全的相互的信任，共同工作与共同负责。

（五）中国劳动群众的组织性的缺乏，妨碍着并延缓着动员一切人民力量来进行抗日斗争

的事业。为着克服这一弱点，必须由国民党及共产党加紧努力，去吸收劳动群众到各种现有的及新的组织中来，这样来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强的下层群众基础。首先应当把工人组织于职工会中，把现有的职工会转变为真正广大的群众组织，使之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中特别重要与可靠的堡垒。在日军占领区域，应当以适当形式，建立职工运动的许多不大的据点。

(六)在中国人民占最大多数的农民，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来积极参加保护祖国的斗争，要胜利的进行长期战争是不可能的。为着增加收成，提高农民对于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与各种保卫国家工作的兴趣，必须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与法律地位，同样必须注意农民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在日军占领区域，农民应被组织到游击队中，以进行反对日本强盗的斗争。

(七)同时还有一个任务，是要在保卫祖国的各种工作中，在后方，在前线，在生产中，去发展青年的积极性，不仅帮助青年学生，而且帮助青年工农组织到那些参加伟大救国事业的各种团体去。首先，共产党赞助国民党所建立的全国青年团，帮助它发展成为中国青年的真正统一组织，使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下工作，并使他包括青年一代的最广大的群众。

还须要有广大的工作，吸收千百万的中国妇女来有组织的参加保卫祖国的事业，以争取中国人民的最后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中国妇女自由的光明的将来。

(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害怕的，再没有比中国民族的团结更厉害的了。他们不仅在前线上进攻，而且在中国后方进行经常的破坏工作。日本侦探与走卒，挑拨中国各政党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间的关系。特别阴险恶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托洛茨基派走狗，他们尽力散播与引起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及蒋介石彼此间互不信任的空气与新的仇视。

所以，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人以及中国的一切爱国人士，应当警惕的注视日本法西斯蒂及其中国走卒的下流阴谋，这些阴谋，是要来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以帮助日本军队，在前线上的进攻。必须做到把狡猾敌人的这些秘密的恶毒的走狗，必须迅速的加以揭露，坚决的加以消灭。

同时党巩固自身的队伍，驱逐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分子，党开除了前中央委员张国焘，因为他是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事业的叛徒与逃兵。党在以后也将无情地对付将自己私人利益放在我们伟大人民利益之上的人们。

中国共产党深信，从一切方面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保证我们民族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完全胜利。我们的党，并不把自己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准备在战争之后，还继续与他们共同工作，以建设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

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

(二)主席团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之党籍，他背叛了共产主义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业，他将自己出卖给中华民族的敌人。主席团深信，张国焘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

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

中国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引起了国际无产阶级及一切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同情。一切进步的人类都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起来反对野蛮的暴力，不仅是为保卫自己国土，保卫自己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是保卫全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的事业。假使日本法西斯蒂军阀，竟然征服了中华民族，那么它将在亚洲，在太平洋上，在欧洲，在世界其他各地，大大加重与发展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而中国之胜利，却正是对于一切法西斯蒂侵略者的掠夺计划之严重打击。所以中国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及整个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一切民主与和平的力量，有必要和责任去用全力援助中国民族的斗争，与继续加强对西班牙人民的援助同时并进。这种国际的援助，还没有被充分的组织起来。它的规模远不能适应现有的群众对于中华民族的广大同情。必须到处把这种同情引导到积极的行动，并且把事情组织成这样，使得第一，从政治上、道义上以及物质上给中国以援助；第二，增加日本军阀在中国进行侵略行动的一切困难与阻挠。

为着这一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谨向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各支部、以及一切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们宣告，号召他们首先执行下述的任务：

(一)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的援华运动，在国际的报章上以及在一切宣传运动中，应当比已往更强有力地反映出一方面日寇侵略者在中国的残暴兽行，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为自由而斗争的英勇。

(二)开展反对日本法西斯蒂对于中国的强盗进攻的广泛抗议运动。召集群众大会，游行示威等等，并且还把群众的愤怒，引向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内被收买的亲日报纸。

(三)组织并扩大对日本侵略者的群众制裁（抵制日货运动，工人拒卸日本货，拒制运往日本的军用材料及其他各种资材至日本等）。

(四)加强募捐帮助中国，派遣医药救护队来华。

(五)帮助日本劳动群众在一切困难中加紧开展反法西斯蒂反战争的工作。

(六)在中国政府同意之下，从各国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中国去，经过他们来加强国际援华运动。

如果国际工人阶级与一切国家民主力量实际的援助中国，毫无疑义的，团结一致的中华民族的英勇，将使它能打倒野蛮的日本军阀，获得完全胜利，而建立自由的独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它将成为全世界上和平民主与进步的最重要柱石之一。

〔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为欲对于一般和平之维持，有所贡献，并将两国现有之友好关系，巩固于坚定而永久的基础之上；又欲将1928年 8 月27日在

巴黎签订之非战公约中，双方担任之责任，重行切实证明起见，因是决定签订本条约，两方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长王宠惠。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驻中华民国大使鲍格莫洛夫。

两全权代表业经相互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约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两缔约国重行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并依照此项诺言，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

第二条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第三条　本条约之条款，不得解释为对于在本条约生效以前两缔约国已经签订之任何双面或多边条约，对于两缔约国所发生之权利与义务，有何影响及变更。

第四条　本条约用英文缮成两份，本条约于上列全权代表签字之日发生效力，其有效期间为五年。两缔约国之一方，在期满前六个月，得向彼方通知废止本条约之意思；倘两方均未如期通知，本条约认为在第一次期满后，自动延长二年；如于二年期间届满前六个月，双方并不向对方通知废止本条约之意，本条约应再延长二年；以后按此进行。

两全权代表将本条约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王　宠　惠

鲍格莫洛夫

1937年8月21日订于南京

（中苏文化杂志社丛书《中国抗战与苏联》转自新华时事丛刊《中苏关系史料》）

〔附〕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抗战以后，苏联就不断贷款给中国。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的贷款数目如下：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	五千万美元
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	五千万美元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	一亿五千万美元

这种贷款作为中国向苏联购买物质的用途，中国用输出的农副产品价款偿还。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又签订了“中苏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在当时起了极大的作用，它打击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英日之间成立“缅甸禁运协定”，将滇缅路封锁，但是中国抗战需要的物资仍能通过西北公路从苏联源源运来。

一九四〇年的苏联援华物资数目，根据现有不完全的材料可以举出两笔：一笔是在七月

间，约有一亿五千万美元。另一笔在十二月间，约有五千万美元。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需要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但在那种情况下，一九四二年仍有物质运来援助中国。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苏联对中国抗战贷款的热诚态度。在上海抗战前夜，苏联驻中国大使即主动表示愿意贷款援助中国。当第一次贷款时，因战争关系，双方也没有谈条件、写文书及办理签字手续，只要中国开出中国抗战急需的物质，苏联就马上照办，打破了国际上订定贷款合同的先例。直到第二次贷款时，才完成了第一次贷款的手续。第三次贷款时，中国提出借一亿五千万美元，苏联慨然应允，没有一点周折，并表示只要中国团结抗战，援助是不成问题的。在这里充分的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关怀和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苏联人民便关怀着中国人民的斗争，他们认为能够帮助中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最大的愉快。当一个中国的参观者在莫斯科近郊参观工人航空俱乐部和航空降落伞表演的时候，许多青年向他表示："假如中国需要志愿兵，只要一下命令，保管一天之内，就有十万人去报名。"苏联工人没有一个不愿意帮助中国兄弟们去打仗。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后，苏联人民志愿空军人员及其他军事专家等，在一九三八年到中国来支援作战。他们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进行忘我的劳动。空军大队长库里申科说："说实话，我象体验着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我每当看到日本飞机炸毁的建筑物和逃难的人群就难过。"

当苏联志愿空军在中国天空的时候，日本空军的疯狂气焰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原来日本轰炸机的基地，都是在离前线五十公里以内的，但当苏联志愿空军出现后，日本空军不得不把基地转移到五百或六百公里的距离后方去。

苏联志愿空军人员在中国上空树立了光辉的战绩，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有：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的武汉第一次空战击落敌机十二架；同年二月二十一日的远征台北；同年二月二十四日的粤北空战；同年四月十日的归德空战；同年四月十三日的广州空战，击落敌机八架；同年四月二十九日的武汉第二次空战，击落敌机二十一架；同年五月十一日的南海之战，击落敌机二架，击沉敌舰一艘，击伤敌舰二艘；同年五月二十日的远征日本；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武汉第三次空战，击落敌机十四架；同年六月十六日的第二次粤北空战，击落敌机六架。被日本侵略者一度视为不可一世的"空中武士"、"四大天王"和木更津、佐世保等航空队，都相继遭受到歼灭性的打击。苏联志愿空军人员不仅直接参加空战，而且担负着训练中国空军人员的任务。

一九四〇年，根据国民党官方统计，抗战四十个月来日本飞机先后被击落和炸毁的有九百八十六架。这是和苏联志愿空军的艰苦的努力分不开的。

（转自彭明著：《中苏友谊史》）

日本共产党给在华日本士兵诸君的号召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抢掠中国人民的最残酷的战争，现在是大规模地爆发了。如诸君开到中国替强盗的军阀当炮灰一样，内地正在疯狂地进行着总动员，日本的年青的劳动者农民，正成群地被迫换上黄呢军服，往中国战场上送。

天皇的反动政府为蹂躏中国四万万的兄弟，已经通过了前后将近六十亿元的军费。十五亿元的杀人公债，已经在开始发行了。这样当着诸君被迫地送到中国来屠杀中国的兄弟的时候，诸君的家庭就被压上了空前的重担，无法继续生活下去，陷入了饥饿的命运。华北的侵略战争一发动，内务省就立即颁发了一个法令，罢工是被禁止了，所有职工会的会议被禁止了，连反动的社会大众党的各种集会，都被禁止了。很明显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明白我们日本劳动者农民的强大的反战运动，明白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和中国人民兄弟的携手，就要将日本帝国主义送入坟墓去。日本有觉悟的劳动者农民绝对反对这样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战争。日本进步的劳动者农民的真正要求，便是将全满洲和华北立即归还中国人民，由中国撤回全部陆海空军，推翻由日本劳动者农民身上每年榨取七十亿元杀人军费的天皇政府，建立全人民的民主政府，和中国人民手携手地实现远东的真正和平。只有实现这些要求，全日本的劳动人民才能从帝国主义统治的地狱中解放出来。

现在，全中国各民族都奋然起来，英勇地和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强盗进行着抗争。日本共产党代表着日本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向伟大的中国民族致热烈的兄弟的敬礼。因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就是日本反战人民的胜利。同样的，倘若日本的军阀强盗达到他们的预定目的，那就是日本人民最悲惨的命运的到来。因此，每一个进步的工人农民出身的士兵诸君的阶级任务，就是尽量向这战争怠工。应该迅速地使日本军阀强盗的战略计划归于失败。应该使每一个战友都了然于日本军阀进行的战争就是等于绞杀七千万日本的人民，等于将全日本的人民推入饿死冻死的道路，因此只有使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失败，日本人民才能获得和平、面包、土地、与建立民主政府的出路。

因此，诸君应该到处和前线上的中国兄弟进行联欢，应该到处与中国人民的游击队合流，应该到处组织哗变来响应中国弟兄的争斗，应该有组织的将枪口掉转来对着最反动的军官，应该将日本帝国主义军阀所布置的全盘战局归于失败。

你们起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斗争吧！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就是我们日本劳动人民的胜利！

你们起来，拥护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吧！因为中国人民的胜利，就同是日本劳动人民的胜利！

打倒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天皇政府，打倒强迫群众参加战争、迫使群众陷于饥饿的天皇政府，打倒蹂躏中国人民的天皇政府，打倒强迫诸君来屠杀中国人民的天皇政府！

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团结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共产党

〔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致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的照会

阁下：

十月三日承蒙接见时，我曾口头传达了敝国政府关于中国局势的意见和愿望，认为中国的局势是由于日本政府的代理人或代表所造成，并且违反并损害了美国在华权益。当时我曾应允于会谈后随即送来照会一件，列述并申论所陈各点。兹为实践上项承诺，曾经敝国政府之训令，谨向阁下陈述如下：

美国政府曾经几度向阁下政府提出关于日本人在华所采的行动及所推行的政策的意见。

美国政府认为这种行动与政策是与中国“门户开放”或机会均等的原则及条件相抵触的。为答复这种意见，并在其他公私的场合，日本政府曾完全保证维持中国门户开放或机会均等。但是美国政府被迫着不得不指出，虽有日本政府在这方面的保证，日本代理人对于美国权益仍一贯持续其侵害。

与美国政府所欲请求日本政府注意的局面有关的一件事，不妨作为例证。我们记得，当日本占领满洲时，日本政府曾保证维持满洲的门户开放。但是，在这一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现今已被日本国民控制下的特种公司所把持，而这种公司是根据特别特许状而设立，特许状中给予它们以优先或排他的地位。由于日本在满洲享受优先特惠的结果，以前在满洲开设的美国企业不得不被迫退出。日本与目前在满洲行使的政权间的安排，容许货物及款项在满洲与日本间自由流通，而严格地限制货物及款项在满洲与日本以外的国家间流通。

达到这种物资流动的管束，主要利用外汇的管制的办法。外汇管制是根据一些条例，而这些条例所根据的法律明文规定，在该法律的范围内，日本不被视为一个外国，日元不被视为一种外币。依照敝国政府的意见，虽然日本政府保证在满洲维持机会均等或门户开放，事实上机会均等或门户开放在满洲已失其存在。

美国政府现在担心，惟恐在目前军事冲突发生以来，日军武力占领下的中国其他地区，发展出如在满洲一样对美国商业竞争地位有不利影响的局面。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我曾请求阁下的前任注意，美国政府曾得到报告，其中指出有利日本对华北贸易的差别待遇，同样将采取外汇管制的方法。我曾要求保证，日本政府不支持或容许歧视美国利益的财政措施。当时外相虽然申明日本政府将继续支持在中国机会均等或门户开放原则，但日本政府对于所提出的问题迄未作任何确切答复。

合众国政府现在获悉，青岛的日本当局事实上已经设立了外汇的管制。他们在行使自由裁量的权利禁止货物出口，除非把出口单卖给横滨正金银行，而正金银行，除非按照他们任意订立远低于上海天津一般公开市场的兑换率折算，即拒绝购买这种出口单。在烟台仿佛也有类似的情形。更有进者，美国政府不断接获报告，说一个广泛的外汇管制制度即将迅速地在全华北建立起来。由外汇交易的管制即可得到贸易与商业的管制。日本当局如在华北无论直接或间接实行外汇管制，则日本当局势必可以阻挠日美两国在华北的机会均等或自由竞争。在这种情形下，对美的进出口及华北经纪商的选择势将完全听从日本当局的分配。在青岛的外汇管制虽然施行的时间很短，已经有两件差别待遇的事件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一件是：一个美国批发商因为当地日本当局坚持他的出口单必须以远低于公开市场的华币兑换率卖给日本银行，而无法把货物运到美国。如按日本所定的兑换率而成交，这笔生意就要蚀本而赚不到钱的。但是有一个日本竞争同业新近却完成一大批输出，出口单的美元价格系按照当时公开市场兑换率的当地市场价格计算。另一件是一个美国公司被阻不能在山东购买烟草，如在山东购买烟草，便须以外币按照任意定立的低廉兑换率，购取所谓联合准备券或日元，而这种条件并不强加于该公司的日本或中国的竞争者。

美国政府已经向日本政府指明，在日本武装部队占领的中国地区内行使的政权对于中国海关税率加以改变，而日本政府且正式支持这种改变，这种改变实为权力的专断与非法的僭越，对此日本政府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不用说，如果管理、科税及禁止贸易的最后权力直接或间接地系由一“外”国的当局所行使以推进该国的利益，中国的机会均等或门户开放是不可能存在的。中国门户开放或机会均等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就是在该国经济生活上没有优先或独占的权利，用来直接或间接偏惠于任何一个外国或任何一个外国的人民，这道理是不说自明的。七月四日我曾告诉宇垣将军，由于在华设置特种公司及独占企业之结果，美国贸易及其他企业受到限制及障碍，美国政府希望能够避免这种限制及障碍。承他惠告：中国的门户开放将予以维持，并谓美国政府可以坦然相信，日本政府会完全尊重机会均等原则。

虽然为了这些保证，北平的临时政权于七月三十日宣布于次日成立中国电话电报公司，传闻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在控制并独占华北电话及电报交通事业。七月三十一日上海有华中电信公司的组织，日军特务部已通知外国海电及电报公司，这个新公司准备管制一切华中的电信交通。据一个半官方的日本报纸的报导，七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组织起来一个上海内河航行轮船公司，由日本人控制，据闻该公司的目的是要控制上海三角洲地带的水上运输。据敝国政府接获的情报，一向是公有并公营的青岛码头，准备由一个新组织成的日本公司接管。如果有这样一个发展，无论那一国家的一切航运都要靠日本机关分配给它货运空间及装卸的便利。华北羊毛贸易刻传已归日人独占，该区的烟草独占据传已在组织中。并且依照敝国政府接获的许多报导，日本政府现正进行组织两个特种开发公司，该公司等已得日本政府特许并将由日本政府控制，目的在对中国经济企业的某些大部门投资并加以统一及规定其管理。

我已经提到的那些发展，说明日本在华政策的显明动向，而且清楚地指出日本当局现正寻求在日本军事占领地区内，为日本利益建立一般性的优先制度及卓越地位，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要破坏门户开放原则的实际应用，和剥夺美国人民的均等机会。

我愿意唤起阁下的注意，日本军事当局加于美国在华侨民的无理限制——虽然有美国在华条约权利的存在，虽然日本政府一再保证，谓已采取措置可保美国的人民利益及财产不至遭到日本当局的非法干涉——更使美国利益遭受严重而持续的不便与苦难。所述限制特别是

指被战事驱迫离开了他们的产业，而现在要想重回旧业，而产业尚被日军占据的美国侨民所受日军的限制。此外，还可以一提日人检查干涉美国在上海的邮电，限制美国人民贸易、居住及旅行的自由，包括铁道、船运和其他便利的使用。当日本商船在上海南京之间载运日本货品时，此等船舶拒绝载运其他国家的货品，而美国及其他非日本国的船运则以军事必要为理由，被排斥不得在扬子江下游行驶。美国侨民申请准许回到扬子江下游某些地区的通行证遭到拒绝，理由是治安秩序尚未十分恢复，但许多日本商人和他们的家属却大家都知道是住在这些地区内的。

由于直接可归咎于目前中日冲突的原因，美国侨民和他们的利益在远东已遭到严重的损失，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之下，对华的美国贸易，也难期望早日恢复旧观。因此，美国政府对于目前局面更觉难以隐忍。在这局面下，在华日本当局不断无理干涉美国侨民的权利，日本的行动与政策实行剥夺美国贸易及企业在华的均等机会，使得美国侨民不得不在这种干扰下挣扎。在这里也应该提到，由于日本对华的军事行动，日本政府强制施行工业、贸易、外汇及其他各种管制的结果，美国贸易及其利益在日本也受到严重的苦难。

虽然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在日本当局手下遭到如此的对待，美国政府无论在它自己本土或在第三国的领土内，迄未谋求设立或诱使设立禁运，禁止入口，外汇管制，优先限制，独占或特种公司——企图淘汰日本贸易及企业或使之产生淘汰日本贸易及企业的结果。在对待日本人民及其贸易与企业时，美国政府一直不仅以一九一一年的日美商约的文字与精神为指导，而且以国际法及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为依据，这种原则形成美国政府对于一切民族及其利益的政策之基础。日本人的商务和企业在美国仍继续享受机会的均等。

阁下不能不承认，在日本和中国的日本当局对待美国的侨民及其贸易和企业，与美国政府在其管辖地区内对待日本的侨民及其贸易和企业，其间有巨大并日在增长的差异之存在。

鉴于上述局势，美国政府请求日本政府实践其业已申明关于门户开放及不干涉美国权利之保证，采取迅速有效措置，俾：

(一)停止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内强制施行的有歧视性的外汇管制与他种措施，这种措施之施行，直接或间接地歧视了美国贸易和企业；

(二)停止任何剥夺美国人民在华从事任何合法贸易或工业之权利的独占或优先制度——停止关于中国任何区域的商业或经济开发上给予日本利益以一般的卓越权利之任何办法；

(三)停止在华的日本当局对于美国财产及他种权利的干扰，包括下列形式的干扰，如检查美国邮电，限制美国人民的住居及旅行和限制美国的贸易和船运。

美国政府相信，为美日两国关系的利益起见，早日答复，将有助益。(下略)

约瑟夫·C·格鲁

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于东京

一〇七六号

（转自《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卷）

〔附〕抗战初期美国援助日本战略物资的有关材料

以一九三七与一九三八年美帝输日物资的数量为例，即可窥出美帝对日军需供给数量的

庞大了。

一九三七年，美帝输日物资总值二亿八千八百五十五万八千美元，其中军需物资值一亿六千七百九十六万二千元，原棉值六千一百七十二万四千元。一九三八年，美帝输日物资总值二亿三千九百五十七万五千元，其中军需物资值一亿五千八百五十二万七千元，原棉五千二百六十四万四千元（由于一九三八年美帝国内数种军需品价格的跌落，所以是年输日军需品的总值虽较一九三七年低，但在实际数量上却增加许多。）一九三七年与一九三八年的二年间，在美帝输日物资的总值中，军需物资即占百分之六十一点二（一九三七年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五，一九三八年占百分之六十六点三），一九三七年美帝输日军需物资的价值占日帝军需物资输入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五，一九三八年占百分之五十六。

当时日帝由美国输入的主要军需物资是汽油、废铁、废钢、机器零件、橡皮、金工母机、皮革等，最可注意的是：在一九三七年，当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时候，美帝输日军需物资的数量却突然地增加了，兹择数种最重要军需物资列举如下：

（一）油类（以千桶为单位）：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前三个月）
原石油	10,381	16,668	22,207	16,904	12,373	2,168
机动油	1,013	1,093	1,059	13,198 （前十个月）	未　详	未　详
煤　油	—	182	1	51	未　详	未　详
汽　油	未　详	1,479	1,696	1,967	3,912	1,097
重柴油	4,265	4,045	3,030	3,942	3,324	未　详
滑　油	308	444	289	549	764	未　详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前三个月）
飞机用之汽油	未　详	未　详	628,560	556,613	161,675

（二）钢铁：一九三〇年输往日本废铁废钢的数量为十六万八千一百六十八吨，一九三四年即增加至一百一十六万八千四百九十六吨，一九三九年骤增至二百零三万五千吨，美帝供给日本废铁废钢的数量即占日本废铁废钢入口总数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吨数（千吨数计）	1,058	1,912	1,382	2,035	963
价值（千元计）	14,177	39,386	22,061	32,732	17,082

美帝除供给日本废铁废钢外，还供给大量的铸铁及铁砂，如一九三五年美帝供给了二分之一的日帝所需的废铁废钢，四分之三的铁砂，三分之一的铸铁。在一九三七年头四个月中，美帝输日铸铁的数量即超过前者六年中所输往其他国家的总和，由一九三八年起，日帝开始向美购买大量的铁砂，即在是年中购买了菲律宾所出产的铁砂的百分之九十八。

大量购买废铁、废钢、铸铁、铁砂，仍不敷日帝在膨胀中军需工业的需要，美帝遂又供给了大量的钢铁制成品。在一九三六年为五万四千吨，一九三七年即升至八十八万吨，一九三八年为四十八万吨，一九三九年头七个月为八十六万吨。

一九三八年后美帝输日钢铁半制成品及炼钢设备品的数量年形减少（一九三六年值二千九百三十七万九千元，一九三七年增至一亿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元，一九三八年减至七千零十五万二千元，一九三九年减至四千八百二十万零八千元，一九四〇年复减至四千三百四十一

万八千元)，这说明日帝极力扩展国内钢铁工业，避免由美输入钢铁制成品及半制成品，上述数字表明这种成效。在扩充钢铁工业上，日本由美帝获得的帮助很大，日本由美国购买钢铁工厂的设备，并由美国工程师代为装置，即在一九三九年中就成立了两个大规模的炼钢工厂（一个值一千万日元，一个值五百万日元)，美帝即售予价值一千八百万日元的设备，是年六月间，美日钢铁公司又合资建立一个炼钢工厂，价值一千六百万日元，其中日本占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金，美国公司的投资全用在购买工厂设备上面，同时美国公司负责派遣工程师担任技术的指导。(注一)

除钢铁工业外，在其他工业上美帝亦予日本很大的帮助，如"三菱之汽车、飞机、军舰制造业，特别是潜水艇、水雷所急需的狄塞尔发动机及磁力发电机之制作，在美国军火钢商（阿姆斯特朗——狄塞尔公司）技术指导下，大大的改进了。美国洛克菲勒财阀不仅供给日本军部军需企业'帝国燃料国策会社'足够的石油，而且还供给了创办新石油工业所必需的技术设备。"(注二)

(三)橡皮：美帝不产橡胶，橡皮亦须由外输入，但在中国抗战期间，美帝供给日帝的数量仍是有增无已，一九三七年为四千五百二十四常吨，一九三八年即增至七千四百二十六常吨，一九三九年美帝因为国内橡皮储量不足，曾以棉花向英交换橡皮（总值三千万元)，但在是年中，美帝输日橡皮的数量还是节节增加（如一月三百一十二万六千三百八十一磅，二月四百三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三磅，三月四百七十五万三千八百二十三磅，四月五千零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二磅)。

(四)废铜、熟铜、锡、铅、机动金工母机、皮革等：上列输日物资的数量在一九三七年突然增加，熟铜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中。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废铜（千元计）	432	1,215	351	983	715
熟铜	7,293	17,997	22,402	27,936	25,108
锡	2,002	6,595	1,794	145	1,215
铅	未详	754	2,100	2,154	733
机动金工母机	20,459	34,203	49,019	24,578	23,321
皮革	298	1,836	2,435	1,616	1,348

（摘自《历史教学》1卷2期《抗日战争期间美帝如何武装日本》）

〔附〕英日初步协定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原编者按语：英国为了应付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引起的紧张局势，曾多次向东方的日本妥协，直到让出它有很大经济势力的上海和广州等市场。但是这些并不能使日本满足。一九三九年六月

〔注一〕 《美亚月刊》三卷八期
〔注二〕 《知识》八卷一期

十四日，日本借口天津英租界拘留了四名杀害"临时政府"重要人员（汉奸）的中国恐怖分子，而对英租界实行封锁，逼迫英国承认它的"东亚新秩序"。同时日本又向英国表示：假如英、日合作，战争结束后，日本将允许英国继续插足中国。英国政府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下，即派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进行谈判。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到二十三日签订"英日初步协定"，二十四日英首相张伯伦在众议院发表声明，披露了协定的内容。承认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事实状态"，并且表示无意妨碍日本奴役中国人民的行为。张伯伦声明的协定内容如下：

英国政府充分承认中国之事实状态，大规模之军事行动在该处进行。知悉：在此种状态继续存在期间，日本在华军队为保障其安全及其统治下区域内之秩序起见，有特殊之需要。并知悉：日本军队不得不制止并铲除任何妨碍日军或有利于敌人之行为与因素。英国政府无意赞助有碍于日军达成上述目的之任何行为，并将乘此机会，对在华英国官员明白指令，彼等应避免此类行动与措施，以符合英国之政策。

（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

〔附〕英日缅甸协定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

原编者按语：英国的反动政治家们坚持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立场，继英日初步协定之后，又背信弃义地和日本签订了一项英日缅甸协定。英国只图获得日本的"谅解"，借此保存一些它在远东的权益，不惜与日本进一步勾结起来，封锁中国输入战略物资的国际交通线，迫使中国不战而降，以便必要时在东方重演"慕尼黑会议"的老把戏。

因为没有找到协定原件，只好将邱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报告和《国民年鉴》所记载的协定内容收在这里。

一　邱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报告

据称日政府于六月二十四日要求本政府设法禁止军用品及其他某种货物由缅输入中国，对香港方面亦有同样之要求，日方认为此项货物如继续输入中国，对于英日关系必发生严重之影响。故英、日两国政府，现已成立协定如下。（香港）自一九三九年一月起，香港即已禁止军械弹药出口，故日政府所重视之军用品，事实上并未由香港运出。缅甸政府同意停止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经缅甸输入中国。停止时间定为三个月。缅甸禁运之货物，香港亦予禁运。本政府于研究日方要求及成立协定之际，均曾注意及本国所应负之各种义务，包括对中国国民政府及英国属地之义务在内。但本政府亦须顾及目前之国际形势，不能忽视一种主要之事实，即吾国正在作存亡绝续之苦斗是也。本国对远东战乱之一般政策，业经迭次明确声明，希望中国确保其自由独立；同时，吾人亦屡次表示，愿与日本改善邦交。欲求达此目的，有二要素焉：一为假以时间，一为消解紧张空气。盖一方面日本反对

军用品经缅甸输入中国，以致空气日趋紧张，一方面英国如允永久封锁滇缅路，则不能履行吾人对中国应负之义务，因英国立场为中立国，且为中国之友邦。因此议定临时办法，希望在此时间内，可以觅致一种公允之解决办法，使双方均可自由接受，吾人不愿与远东任何国家发生争议，吾人希望中国确保其地位，维持其完整。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我政府致中国照会中，业经说明英国准备于战争结束之后，根据互惠平等原则，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及修改条约，同时吾人希望日本国家繁荣，使每一日本国民所愿望之社会福利及经济稳定，均能获得保证。为求达此目的起见，吾人准备对中日两国竭尽棉薄，但有一事必须明白的认识者，此项目的不能以战争或战争的威胁以求达到，而应以和平及和解步骤求其成功云。

（原载1940年7月20日重庆《中央日报》）

二　民国三十年国民年鉴所记载的英日缅甸协定的内容

关于封闭滇缅公路运输问题，英、日双方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在东京签订协定，内容规定自即日起，禁止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经缅甸运入中国，为期三个月。缅甸禁运之货物，香港亦予禁运。至同年十月十八日宣告废止。

（原载1941年《国民年鉴》，第333页）
（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

〔附〕德意日军事协定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原编者按语：德、意、日为了对付英美帝国主义的日益接近和日渐合作，三个法西斯侵略国便在柏林成立了这个军事协定。在协定中，规定彼此支援侵略战争，并且互相承认它们在欧洲和亚洲的领导地位。接着，德、意与法西斯西班牙又订立了同盟。

德、意、日军事同盟的签订，完全撕破了日本对欧洲问题“不干涉”和德、意对远东问题“不干涉”的假面具。它们虽然在协定上宣称：“对于签字国之任何一国与苏联间现存之政治地位，并不发生任何之影响”。其实，这也不过是烟幕弹。这一军事同盟成立以后，德国便积极准备对苏联举行背信弃义的军事进犯。铁的事实说明了三国当时对苏联的保留条文的虚伪性。

德、意、日三国政府，鉴于以适当地位，畀予世界各国，乃造成世界永久“和平”之先决条件，特决定对三国各在大东亚及欧洲方面以促进其“共存共荣”与“福利”为主要目的而尽之努力，彼此互助合作，三国政府更愿扩大其合作范围，及于世界其他区域内，愿与三国作同样努力之国家，俾彼等对于世界“和平”之愿望，得以实现，德、意、日三国政府，基于上述理由，特议定下列条款：

第一条　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

第二条　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

第三条　德、意、日同意按照上述两条之规定，彼此合作。三国并保证：签字国之一苟被目前尚未参加欧战或中日争议之国家所攻击时，彼此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之各种方法互相协助。

第四条　为实现本协定起见，三国立即组织联合技术委员会，委员由德、意、日三国政府各自指派之。

第五条　德、意、日三国言明上述各条，对于三签字国之任何一国与苏联间现存之政治地位，并不发生任何之影响。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有效期间自生效时起十年。在本协定时效告终前相当之时期，签字国得由其中任何一国之请求，谈判续约。

（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

〔附〕法西斯德国在中日战争初期以调解为名，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的几个文电

一　德驻日大使（狄克逊）给德外交部电

（1937年11月3日上午5时，东京。）

(一)在今日与外务大臣广田的谈话中，我根据训令解释了关于调停一事我们所采取的立场。在随后的谈话中，广田详细说明了日本的议和的基础。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照这个先例看起来，中国不应该有所反对。2.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这个非军事区里，由中国的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

假如和约立即缔结，则华北的全部行政都交给南京政府，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假如现在不能缔结和约，因此有必要在华北建立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他们将……（电文脱落）行政继续至以后和约缔结的时候。据此，日本已经放弃了在华北建立任何自治政府的要求。

在经济方面，战事爆发以前开始的关于让与矿产的谈判必须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3.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由国际察警管制。其他不变更。4.停止反日政策仅指履行1935年在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那些要求（修改学校教科书等）。5.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据此间中国大使获悉的消息，这一点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不抵触，只要没有秘密协定

的话。6.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7.尊重外侨权利。广田着重地表示，假如日本被迫继续作战，他就要把战争进行到使中国完全溃败，然后再提出远较现在为苛刻的条件。

(二)从与外务大臣的谈话中，我得到一个信念，正如陆军武官与此间和上海的军事首长谈话中所得到的信念一样，日本确实希望在上述那些条件的基础上的和平，假如南京政府现在不接受那些条件，它也确实决心无情地继续战争，直至中国最后崩溃为止。照我看起来，这些条件是很温和的，南京可以接受而不致有失面子，我们现在似可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它接受这些条件。请考虑可否令军事顾问们在向蒋介石报告战局时鼓吹和平谈判。

同样的电文给南京。

二　德驻华大使（陶德曼）给德外交部密电

（1937年11月5日下午7时25分，南京。）

遵照训令，我于今日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长孔祥熙。蒋介石要我向德国政府表达他对于德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所作的努力衷心的感谢。他首先问我的意见。我说，我和你一样，认为这些条件提供一个谈判的基础。我们从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看到，一个国家不应该等待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对于军事局势，我不能作判断。于是他说，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但是只有在这一点做到了之后。他又很机密地告诉我，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日本人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他们现在不对中国作友好的姿态以奠立日后友善的基础，却提出要求。假如他们继续作战，中国当然不会有在最后获得军事胜利的机会，但是她也不会放下她的武器。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我说，我刚才重读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那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孔祥熙也承认那是可怕的。但是假使那样的话，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委员长又说，他也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我告诉他，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委员长要求我对于我今日采取的步骤严守秘密，我允诺了，也要求他同样地做。孔祥熙要我留下一分日本的条件，我没有能很好地拒绝他。

我从另一个来源获悉，南京的，并且最重要的还有上海的，许多高级人士反对妥协 .于右任私下告诉大使馆的一个馆员说，重要人士的政策是主张由英美调停，而英美调停的第一步是建议双方成立停战协定。

山西的最大一家中文报猛烈抨击我。因为根据一个日本传出的消息，是我有意要调停。因此对于今日采取的步骤，在日本也要保守秘密才好。

没有通知东京。

三　德驻华大使（陶德曼）给德外交部电

（1937年12月3日上午12时55分，南京。）

蒋介石首先对于德国促致和平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因为她认为我们是她的朋友。我把日本上一次的声明明确地重述了一遍，蒋介石就问日本的……（电文脱落）是否还是一样。我答说还是一样。电报谨提到要点，但是条件只包括要点。对于这一点，蒋介石说，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我答说，全世界都赞美中国军队的英勇伟绩。蒋介石于是……（电文脱落）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谍。我答说，这并不是最后通谍。蒋介石乃将中国的意见列举如下：

（一）中国接受这些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二）华北的主权和完整……（电文涂改）独立不得侵犯。

（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

（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

关于第一点，我告诉他，我认为中国必须宣布她自己愿意以协和的精神和意念……（电文脱落）讨论这些条件。蒋介石说，他是想这样做，但希望日本也这样做。

关于第二点，我要蒋介石注意日本的条件，就是华北的最高首长应该是对日本友善的。蒋介石答说，假如要选派一个人去担任那个职务，那个人自然不会是反日的。

关于第三点，我向蒋介石声明，德国无意直接参加和平谈判或主持谈判。我们宁愿就我们力所能及在幕后尽量帮助中国。蒋介石希望我们能够斡旋到底。

关于第四点，我提醒蒋介石注意到日本的反共的要求。我认为这个要求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不冲突。蒋介石没有反对我的意见。

关于停止敌对行动问题，我和他说，我以为停止敌对行动的步骤是这样，在蒋介石的声明已经交给日本而日本的同意的答复也已经收到之后，元首和总理（指希特勒——原编者）就向双方政府建议停止敌对行动。蒋介石同意。

蒋介石最后再三的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初步的谈判，特别是条件，保守秘密。这是和平的一个初步条件。我认为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支持这个要求。否则蒋介石的地位将会大为动摇以至于下台，而使中国政府落入亲俄的人的手中。日本对于蒋介石这种勇敢的愿意和平的态度，应该给以种种便利，俾使他能够完成谈判。蒋介石在上一次我和他会见的时候曾说过，中国不能接受关于蒙古自治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要失去两省；我就问他是否愿意对这个问题表示意见。他说，蒙古的问题可以和日本谈判。在全部谈话中，蒋介石的态度极为友善，精神很好，一点也不紧张。他自己对于防守首都表示很乐观。我今日将回汉口去，希望在那里接到以后的训令。大使馆的人员和德国侨民都安好。

同样的电文给东京。

四　德驻日大使（狄克逊）给德外交部电

（1937年12月23日下午1时13分，东京）

密！外交部长亲阅。

参照你的12月4日的第306号电报。

(一)今日外务大臣将日本政府对于我们的备忘录的答复口头通知我，后来又给我一份他的书面声明。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声明的全文如下：对于德国政府的友谊和德国驻华大使关于中日直接谈判以解决目前事件所作的斡旋——那是承你在12月7日我们的谈话中和在我的〔原文如此〕同日的备忘录中告诉我的——我谨表示我的衷心的感谢。

鉴于最近战事方面的迅速发展和一般情况的巨大改变，日本政府考虑以下列……（电文脱落）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假如中国全部接受这些条件并且向日本表示媾和的意念，日本政府准备进行两国之间的直接谈判。

关于这一点，我谨报告阁下，假如中国不接受这些条件，日本——虽然很不愿意这样做——就将被迫以完全不同于前此所持的观点来对待目前的局势。

(二)基本条件：

1．中国必须放弃她的亲共的以及反日的和反满洲国的政策，并且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执行她们的反共政策。

2．在有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

3．日本、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缔结关于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

4．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三)外务大臣也向我宣读了下面的声明，他让我记下来，但是没有把声明的原文给我：

1．假如中国接受这些基本条件，她必须以行动——反对共产主义——来表示她的诚意。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的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日本希望在本年底左右获得答复。

2．当蒋介石声明他愿意接受刚才我机密地通知阁下的那些基本条件的时候，假如德国政府不向日本和中国建议扩大（原编者注：此处“德国对外政策文件”编译者原注说：“此处德文本作 Aufbau（扩大），”是 Abbau（停止）之误。当这个电报转给德国驻华大使馆时，电文已经改正。）敌对行动，而建议开始两国之间的直接谈判，日本政府是很欢迎的。

关于这一点，广田解释说，在和平谈判中日本必须继续军事行动，不到和约缔结时，敌对行动的停止是不可能的。

3．外务大臣在回答我提出的详细的问题的时候，关于和平条件又作了下面的补充说明，他说这些说明是很秘密的，绝不能让中国知道。

关于基本条件的第一点。这一点意味着〔要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本虽然不要求中国废止中苏协定或参加反共公约，但却很希望中国这样做。

关于基本条件的第二点。除北方的非军事区之外，现在显然在考虑中的是在长江流域也建立一个。

“特殊政权”，只考虑在蒙古建立，华北政府必须具有广泛的权力，不从属于中央政府，

但是在中国主权之下。外务大臣对此不肯作任何确切的说明。

关于基本条件的第三点。这一点意味着就关税、一般贸易等[问题]缔结协定。

(四)我告诉外务大臣，这些条件远超过11月2日（原编者注：按当作11月3日）他所告诉我的那些，并且我认为要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件是极端不可能的。广田回答说，由于军事局势的改变和舆论的压力，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案。

(五)新条件是最近数周日本政府内部激烈争执所产生的折衷方案。最近陆军方面曾要求在蒋介石详细地获悉条件以前，要他承认战罪，但没有成功。关于基本条件，最初也曾有人争执，要出之以更严厉的形式。这些条件的现在的形式已经内阁决定，并由天皇批准；因此这些条件构成有约束力的日本官方文件。我机密地获悉，由于陆军方面和实业界的压力，内阁中许多人都认为这些条件太温和了，他们希望这些条件为中国拒绝，以便可以贯彻对蒋介石进行歼灭战的政策。

(六)我故意避免了直接转告汉口。

五 德外交部给德驻日大使馆密电

(1937年12月29日，柏林)

根据此间接到的报告，中国政府寻求苏俄援助的迹象日益显著。财政部长孔祥熙最近告诉一个德国的联络人（编译者原注：指 Klein）说，假如举行和平谈判的努力不成功，中国将继续抵抗到底，甚至使国家经济崩溃，使中国人民投入俄国的怀抱，亦在所不计。毫无疑问，俄国那时一定是战争中的胜利者。

当然，我们已训令陶德曼大使着重地警告中国政府不要与俄国作任何进一步的亲善，指出如果中国政府这样做，我们就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你要在适当的场合向日本政府指出一旦中国布尔什维化所能引起的危险，并且指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与反共公约不符的。德国和日本反对共产国际的共同利益要求中国的正常情况尽速恢复，即使只能在不能完全满足日本愿望的和平条件下才能做到的话。日本应该考虑从凡尔塞条约的历史所得到的教训。

六 德驻华大使（陶德曼）给德外交部电

(1938年1月13日下午7时40分，汉口)

中国外交部长今日向我宣读了下面的口头声明，他请求我们将这个声明转达日本政府：

“1937年11月5日，承阁下在南京将日本所提出的若干和平条件告知了我们。后来在11月28日和29日以及12月2日，阁下又将日本政府的意图转达给在汉口和南京的中国当局，并且告知我们说，日本当局曾经声明说，尽管日本在军事上获得了极大的胜利，日本政府在11月初提出的条件仍然不变。鉴于德国所作的斡旋和日本方面希望恢复和平的意念，我们请求阁下告知日本政府说，我们准备以日本提出的各点作为讨论的基础。

“12月26日和12月27日，阁下将日本的若干‘基本条件’转达给我们，并说，日本外务

大臣曾经告知德国驻东京大使说，因为情况的改变，所以日本提出了那些新条件。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是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加以仔细的研究，作出确切的决定。”

部长告诉我，这个声明在昨天晚上就已经拟好了，但是他必须得到一个同僚对于这个声明的同意。我问他是否想到日本会认为这样的答复是搪塞。并且，我觉得这样的答复没有表示希望和解的意念。部长回答说，除非知道了日本的要求的详细内容，〔中国〕政府不能作决定，也不能表示意见。

同样的电文给东京。

七　德驻日大使（狄克逊）给德外交部电

（1938年1月16日下午2时53分，东京）

密！外交部长亲阅。

（一）今晨10时30分，外务大臣将下面的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1月13日的声明的答复的全文交给我，并且请求我尽快转给汉口。广田一再着重地表示，日本政府感谢德国政府为安排和平谈判所作的努力。他后来又把日本政府将于今日下午向日本人民发表的声明交给我，这个声明将由德国新闻社拍发。

（二）答复照会的全文：

“绝密

“我谨对阁下的政府和阁下为推动直接谈判以和平解决中日事件所作的斡旋和热心的努力表示最真诚的感谢。但是，中国关于上面所说的谈判的答复，已经推延了好几次，甚至在1月10日我们还没有收到，因此我们不得不再等几天。当昨天最后收到的时候，我们发觉中国的答复仅仅是一个敷衍的答复，要求知道我们的条件的详细内容。我们只能认为：中国政府方面的这种拖延的态度，表示没有以接受全部和平谈判的基本条件来谋求和平的意念，而这一点是我以前就已经说明过的。因此帝国政府现在决定放弃（帝国政府对此是深为遗憾的）承阁下的政府竭诚帮助而进行的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目前的和平谈判，并且从一个完全新的立场来处理目前的事件。

“让我再向阁下对于德国政府对这问题的友好的关切和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最后，外务大臣要求我们同意公布我们参与安排谈判的经过。我回答说，我要向德国政府请示。广田要求尽快答复。请及早以电报给我训令。

（四）意大利大使处，正由外务大臣通知中。

同样的电文给汉口。

（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洛川会议）

（一）芦沟桥的挑战与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整个计划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一切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

（二）南京政府在日寇进攻和人心愤激的压迫下，已经开始定下了抗战的决心。整个的国防部署与各地的实际抗战，也已经开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三）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和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

（四）在这一新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

（五）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

（六）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同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

（七）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和发展。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与此纲领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

（八）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文如下：

“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否认日本外债，废除日本条约，收回日本租界。

为保卫华北与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二 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

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

建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与决定国防计划与作战方针。

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

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与战斗员团结一致，军队与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

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与东北义勇军。破坏敌人的后方。

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从雇佣兵役制变为义务兵役制。

三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

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

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

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四 改革政治机构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

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驱除亲日分子。

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

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政策。

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　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

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战线。

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　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物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七　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

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废除苛捐杂税。

减租减息。

救济失业。

调节粮食。

赈济灾荒。

八　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

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

九　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　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毛　泽　东

一　我对敌人的面孔应该认识得更清楚些

六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六年来，中国从日寇得来的教训，本来已经够多了。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对它本身及其行动的观察，常常“认识不足”，甚至犯严重的错误。就拿最近日寇大规模进犯中国这一严重事件来说吧。对于这一事件，就有许多离奇怪状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次日寇向华北以至向上海开火，完全是日本少数少壮派军人的行动，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整个的国策（他们认为连日本金融资本家以至近卫内阁也不同意）；有些人认为这次事件的爆发，为出于“偶然”的，而不是日寇预先有布置有计划的行动（他们的证据是，在日军未发动进攻中国以前，东京金融市场并没有紊乱。等到日军在华发动以后，公债及各种产业股票才开始惨跌）；甚至还有些人认为日寇这次行动只是“示威”的性质，最少在主观上并“不愿意把事件扩大”；等等。

不消说，这些看法，都是极端错误的。第一种看法的错误在于把日本的“少壮派军人”看到太神化，而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和近卫内阁的本来面目认识清楚。固然，在华北发动战争和指挥作战的（是）日本的“少壮派”军人；但是，这些少壮派军人是谁派他们来的呢？他们的行动代表谁的利益呢？稍为留意一点时事的人都知道，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华北的驻屯军干部，大部分都是在“二，二六”事变后，或在去年华北驻屯军强化计划实施后由东京调来，现在华北驻屯军的首脑，被称为荒木派的香月清中将则是在芦沟桥事件发生后，才由东京方面派来的；经过“肃军”后的东京当局，假如预先没有“放火”的计划，为什么要派这些“点火者”到最容易发火的华北来呢？尽管这些点火者在点火和扩大火焰的瞬间不一定要得到东京方面的同意，尽管他们在某些部分的问题上甚至会和他们的主人——金融资本家地主等——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的行动无疑是忠实于他们主人的利益的！老实说，日本帝国主义老早已把“征服支那全土”的计划布置好了，驻华北的少壮派军人不过忠实地活泼地按着这计划做去罢了。若果有人认为日本的金融资本家大地主以至近卫内阁不同意华北驻屯军人这次在华北发动战争的行为，那是完全不合事实的谬误之谈。要知道东京的金融资本家大地主等，希望无事平稳地继续五年来资本收益日益增大的过程固是事实；但是到了除非用战争不能解救他们的危机和延长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不同意发动战争的！只要看在芦沟桥事件发生后，东京各政党对“近卫政策”（其实就是军部的政策）完全表示支持，就可以看到政党背后的金融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态度如何了。至于说，近卫内阁也不同意这次战争，那就更加荒谬！我们早已指出：近卫内阁的出现，主要的就是为了调和日本统治

阶级内部的矛盾，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第二和第三两种观察错误的根源是和第一种相同的，不过其意义来得更加严重；由于没有看得清日本统治阶级的矛盾的一致性，由于没有把握住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必然性，而只凭一些极表面的事实或不可靠的材料不加思索地乱下断语，那自然会在有意无意间中了敌人宣传的毒计了！但我们必须指出：敌人天天宣传这次中日“小冲突”（！）是出于“偶然”，日本政府“不愿意把事件扩大”……完全是具有烟幕作用的！它所以要散在（布）这次烟幕弹，一方面是为要向其他帝国主义掩饰它独占中国的既定计划，使得这种计划能畅行无阻；另一方面则是为要动摇中国不坚定的分子，使这些分子继续保留一线的苟安的幻想！对于这些烟幕，中国的舆论界早就应该给以揭破；可惜中国的舆论界，当华北战事发生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华北的问题，当上海战事发生的时候，又往往只注意到上海的问题，而对于敌人对中国进攻的整个计划，却不但很少有正确的把握，并且有些论调还陷于严重的错误！反问这次战事真的是出于“偶然”的吗？日本政府真的“不想把事件扩大”吗？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日本政府对言论界彻底的统制，关西几个师团到了除队时期而不下解散令等等，为的是什么啊？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即下总动员令，在短时间内即动员近三十万大军（包含第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五、十六、十九、二十等师团）到中国来，又为的是什么啊？我们根据事实，不能不强调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次向中国实行大规模的进攻，不但是有计划的行动；而且这种计划的严密性及其广大性是以往所没有的！不健忘的读者总应记得，当日本军阀在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统治阶级间的意见是非常分歧的。当时的日本币原外相居然敢向日本军阀诽议“日本吞下了满洲，等于吞下一颗炸弹”（大意如此）；但是这一回情形却不同了。根据东京通讯：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各报的专电，各杂志的言论，各政党负责人的发言，差不多是“句句一样，众口一词”的，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对这次事件在事前事后，都有严密的布置，其严密性甚至连日本的“交易所”有可能在发动战事之前也不知情（代表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当它执行对主人有利的计划，特别是军事计划时，不一定要在事前完全得到它的主人们的同意），至于说到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次侵略计划的广大性，我们可以断定，是“九一八”以来所没有的。现在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战和全国性的抗战了。

二　日本为什么要在目前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

日本帝国主义者自从完成了在田中奏折里所明白记载的“征服满洲”的计划后，天天在准备着实现“征服支那全土”的计划，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要选择在目前下决心执行这个计划，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原因所促成的。

首先，我们从日本经济方面观察。日本新的经济恐慌的征兆已经非常明白地表现出来了，不管日本的军需工业有怎样畸形的发展，但是由于军费无穷尽和无限制的膨胀，致使赤字公债无法消化，物价的高涨无法抑止，同时由于军需原料须从外国大量购入，致又引起对外贸易的空前入超，跟着国际收支的无法平衡，大量的黄金也不能不往外送了。据日本官厅发表的统计：日本自去年四月到今年一月间，物价总指数高涨了百分之三十一（国内商品高涨了百分之十三，输入商品高涨了百分之五十六），几个月来物价高涨之势，还是有加无已；至于入超和黄金外流之数，尤为惊人，本年上半年的入超达六万万四千万元，截至目前为止送

往美国的现金共分四次，总额达二万万七千万元。照目前情形看来，日本经济的恶化，只有日益深刻，而丝毫没有“好转”的倾向，如此发展下去，新的恐慌的来临，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无论是怎样蹩脚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惯于向中国抢劫以“打开”危机局面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在这样的时候，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不是“偶然”的了。

第二，我们从日本内政方面观察。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国内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这也是应有的文章了！据日本官方发表，本年一月到五月发生的罢工事件达一千三百三十二次，比去年全年七百次几增加一倍；农民斗争则仅一月至三月已达一千六百五十六次之多了。由这些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到日本国民生活的不安，和日本工农大众在世界无比的残酷的警察制度压迫下面，如何英勇地要求生存了。

至于日本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也始终不易彻底缓和，虽则日本统治者在面对着各种危机之前，极力设法使军部和党政间的矛盾和缓下去，然而以实现“军资合作”为任务的林内阁的“不幸短命而死”(只有一百十七日的寿命)，表示调和前途的不可乐观。近卫文麿的登台，虽则也以“缓和国内之彼此对立，以收举国一致之实”为己任，但是近卫登台以后，不但“军资合作”既得的成绩，无法维持（结城不愿再当财长），不但已成的许多对立，无法消解，就是在内阁之内，马场广田贺屋之间也未见融洽。光阴易逝，特别议会召集之期已经不远，可是“新党”的组织，毫无把握，这不能不使近卫内阁感到前途的黯淡。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是连结在一起的，日本统治者在这样的危机的威胁下，当然要发狂起来，拼命向中国狂噬了。

第三，我们从军事方面观察。侵略主义的日本为要补救军需工业资源的缺乏，为要完成建立进攻苏联和对抗英美的有利的军事根据地，在获得了和相当巩固了满洲热河等“生命线”之后，进一步夺取华北、华中以至华南，原是必走的路径和既定的方针。现在眼看着苏联的第三届五年计划行将开始。中国抵抗的实力显著地增加，同时世界和平势力和侵略势力最后搏斗的时期也日益迫近，在这样的种种刺激的下面，不能不使这位“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全，而又偏要硬撑好汉”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它日夜企图要实现的既定方针，加速地“断然”执行起来！

第四，我们从日本国际环境来观察。在这一方面，从日本统治者看来，目前执行它的“既定方针”是相当有利的。他们认为欧洲的国家正忙于应付他们的盟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西班牙的“硬干”，当然没有余力干涉远东的事情，他们特别高兴英国“友谊的态度”。实在的，英国绅士这种态度对于日本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给予不少的鼓励。

苏联消息报早已指出，英日谈判是促进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中国抗战与英国》一文中，也已说明。英国在远东一贯的动摇不定的老政策对于帮助日本进攻中国是有着莫大的作用。

此外，美国的爱玩“中立”政策，和日本军阀对苏联的厉行清党肃军错误的估计，都使日本军阀误认是有利的条件。

最后，最近中国内政的动向，对于日本的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这样断定：假如中国内部的团结早已十分巩固，民主政治早已实现，那么，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是要踌躇一下的；然而不幸得很，中国自西安事变后，和平统一虽已得到初步的成功，但是中央政治机构的彻底改革，国防政府的建立，亲日势力的肃清，民主政治的实现，还相去很远，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便乘着这些空隙，赶快向中国开炮了。

以上的几种因素当然是互有连系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这些因素的交互促进和影响下，便决定向中国找寻出路。

三　侵略中国是不是日本的出路

在六年前，日本军阀曾在国内危机非常深刻，国际环境却相当顺利的条件下，干过一回，结果可以说相当得手。现在，它又要干第二回了。这一回是不是也象前一回那样的顺利呢？

要解答这一问题，也应该从几方面来观察。

第一，日本统治者以为进攻中国可以“打开”经济的危险，我以为这完全是一种错算。在战争还没有发动以前，日本的经济危机已经如此深刻，财政方面已经如此没有办法，在战争发动以后，日本每年将需要多少战费呢？据专家估计，起码要一百五十亿到两百亿元，这是罄日本全国民的收入也不足此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战争除了引起财政的破产以外，将使对外贸易更加恶化，物价更加高涨，那也是意想中的事情。据最近东京通讯：“华北事变发生后，金融市场已经被搅得一塌糊涂，一般粮商更乘机操纵粮价，囤积居奇，致使粮食价格，猛涨不已”（申报）。将来战争愈持久，财政和经济的破产必然更加显著，所谓“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将是日本这次企图以战争来打开经济危局的必然归趋！

第二，日本统治者企图以进攻中国来缓和日本国内的政治危机，结果也必然适得其反，不能不使日寇企图在中国造成“既成事实”，而逼使英国承认。

日寇以其素来狡猾的手段，一方面实际上在侵略行动上，对中国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在表面上，在外交辞令上，则散布“不扩大事态”“地方解决”。日寇这种狡猾的手段，一方面用以掩盖他的为世界人类所攻击的侵略战争，以便在这种外交辞令的掩盖之下，进行“不宣而战”的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借以减弱对国际舆论和英美的刺激。另一方面则用这种外交辞令，以减弱中国的自卫行动，以勾引某些人对日寇的幻想，企图作和平的幻想以牺牲中国，同时以便给某些亲日派的分子，还在南京政府中保持“有用的”地位，因为这些亲日派久为全国人民所痛恨唾弃，自国内和平统一开始以来，他们逐渐的在南京政府内失去地位。

芦沟桥抗战的失败，平津的陷落，正是由于日寇这种狡猾的手段所达到的。宋哲元氏就上了日寇的老当，受了日寇的欺骗，由于宋哲元氏对日寇和平解决的幻想，企图苟且偷安，临事犹豫动摇，不去积极的进行自卫战争，反而与日寇进行妥协谈判，因此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重镇轻易的失去了。当然平津的陷落也有其他的原因，如过去南京政府的退让政策，使日寇在平津造成优势的地位，但这种已成为错误，如果在芦沟桥事变，采取坚决抗战的方针，积极进行自卫战争，是能够补救的。可是冀察当局宋哲元氏没有这样做，而南京政府在芦沟桥虽有蒋介石先生坚决抗战的方针，但对于冀察当局与日寇的妥协并没有表示反对，相反的却是容忍了这种妥协，在八月十四日南京政府发表的申明中说：”中国地方当局，为维持和平计，业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议之解决办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的容忍，对于此次之解决办法，亦未予反对”。在芦沟桥事变开始的时候，对于平津之增援，亦未采取积极的自卫战争，平津失守的教训，已经是再一次的说明，此（如）果对日寇还保存“和平解决”的幻想，是要上日寇的老当，是要受日寇的欺骗，而使中华民族遭受莫大的损失。

（中略。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

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到今天为止，还是把抗战限制于单纯的政府抗战，到处限制人民和拒绝人民的参加抗战，阻碍政府军队和人民的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肯彻底改革政府的政治机构，这种抗战的方针，是包含极大的危险性，虽然可能取到暂时的局部的某些胜利，但决不能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

南口失利的经验，就可证明这一点。某些前线作战的部队，不但不发动人民参加抗战，而且反而压制人民的救国运动，解散在前线的人民的救国团体。

上海抗战中也同样表现这种现象，上海和南京的救亡团体遭受当局禁止活动，文化界出版的救亡刊物亦遭受查封，当八十八，八十七师在上海英勇抗战的时候，上海人民自动的参加和慰劳，都被上海某些当局所拒绝。在某些人操纵下的上海抗敌后援会，没有积极的援助八十七，八十八师的抗战，结果使两师在前线一天一夜没有饭吃没有水喝，而抗敌后援会却有堆积如山的慰劳品，让其腐烂而不愿送给前线的部队。因此前线抗战的部队埋怨的说这次上海的人民不如上次（一二八）的积极。其实这次上海人民积极援助上海的抗战，是大大的超过上次（一二八），可是因为国民党的控制政策，使得人民与军队隔离，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上海的抗战又有重复南口的教训的可能。

芦沟桥抗战的失败，平津的陷落，虽有二十九军英勇的抵抗，佟麟阁赵登禹奋勇的牺牲，但是由于宋哲元氏没有抗战的决心，当然也就不会去实行正确的抗日战争的方针，当平津的人民和全国的人民起来援助二十九军时，宋氏不但拒绝了人民的援助，而且宣布戒严禁止人民的爱国运动。平津虽有许多不利的条件，但这并不能说明平津绝对不可以保守，如果当时发动广大的人民，武装人民，平津是能够保持相当的时间在中国的手里，以待中国大批援军的赶到，可是当宋氏深夜退出北平时，宁愿把北平给日寇占去，而不愿北平人民起来保卫北平。

我们号召全国的人民，只有坚决的实行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抗战方针，才能保障中国抗战的胜利，我们号召全国民党全体党员，应当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放弃统制的政策，采纳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方针，这是保障抗战胜利唯一的方针。

阿比西尼亚的亡国，并不是因为他发动了对意大利侵略主义者大规模的民族战争，而是因为他没有实行正确的民族抗战的纲领。阿比西尼亚的国皇，没有依靠在全国人民的力量上，他控制着民族战争，他个人曾成为民族英雄，但全民族则陷入亡国的运命，反之，西班牙的民族战争，则依靠在人民的力量，争（结）果能够与德意两国最大的法西斯侵略者战争到一年多，而仍保持马德里在政府军的手里，并击退了法西斯屡次的进攻，并取得胜利，我们还应知道西班牙政府抵抗弗朗哥叛军的进攻时，西班牙原有的军队百分之八十在叛军手里，因为西班牙政府取了正确的抗战的方针，迅速的就组成了新的军队，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必须要从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两个民族战争中去学得教训。

救中国的关键，就在实行一个正确的抗战的方针。要把政府的抗战变为民族的抗战，要把单纯的军事抗战变为全面的抗战。中共中央的十大纲领中，就是包括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方针。

要实行中共中央十大纲领的最重要的条件，必须是为着抗战而发展民主权利，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发动人民参加抗战，方能使人民自由的参加抗战，只有人民参加抗战，才能使政府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才能把单面的军事抗战政府的抗战，变为全面的抗战

全民族的抗战。

国民党中有些人说，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才能实现民主。这种意见的错误，显然不懂得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胜利。因此中共的决定中提出："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与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争取抗战胜利与实现民主权利不是互相分离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互相依赖的。

国民党中有些人说，要抗战要牺牲自由。这种意见的错误，也正如对于民主与抗战的关系的错误了解是一样。如果没有政治自由，爱国的自由，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就成为不可能，要争取抗战胜利也就无保障。

我们赞成在民主的基础上，以争取抗战胜利为目的，进行全国民众运动的统一。但统一民众运动，并不能解释为统制民众运动。现在国民党某些人，把统一民众运动，解释为统制民众运动。对民众运动的统制，事实上即是对民众运动的压制，在统制政策之下，自然不能动员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战。所以我们主张民众运动的统一，而反对民众运动的统制。

某些民族失败主义者的分子，在全国抗战空气压倒的情形之下，不敢公开的揭起反对抗战的旗帜，于是在各种的言词的掩盖之下，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如说"中国是弱国不能抗战"，如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是了。这些民族失败主义者，都不了解中国虽然是一个弱国，正因他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进行正义的神圣自卫抗战，依靠民众力量，是能够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发动全面的民族抗战，我们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如果把抗战看作只是政府的抗战，单面的军事抗战，那么这种抗战是包括极大的危险性，有遭受重大的挫折与失败可能，为要避免这种危险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那只有坚决实行正确的抗战的方针，即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这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保障。

拥护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

坚决实行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

动员一切力量为着争取抗战的胜利！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着将：

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周恩来

第八路军总副指挥就职通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衔略） 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敞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本月养日（八月二十二日）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委任令开，特派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等因奉此，遵即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宣布就职。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肃电奉闻，敬候明教。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叩有。

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报告大纲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红军中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彭德怀

Ⅰ、十年艰苦斗争的总结

一、为什么要有一个正确的总结？

1．为了正确了解改编的意义，不是失败投降，而是为了便利于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

2．为了了解我们十年来的流血斗争，不是无意义的。我们创造和锻炼出一支工农军队，这支军队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是最坚强的军队，而且是将来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保证力量。

二、红军的产生与发展：

1．第一次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叛变，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的特性。

2．无产阶级举起革命的旗帜，继续大革命未完成的事业，表示唯有无产阶级才能不怕一切困难，为革命奋斗到底。

3．南昌起义创立工农革命军，八一成为我们历史的纪念日。

4．湘南秋收起义，海陆丰起义，广州起义，树起了苏维埃的红旗。

5．土地革命发展和壮大了红军，使红军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6．红军经过长征，集中陕北抗日前进阵地，大大的推动了中国抗日运动的发展。

三、九一八以来红军一贯的抗日主张。

1．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那时的国民党毫不抵抗，帝国主义者帮助日本取得东北，以便进攻苏联。党提出了三个口号：

(一)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

(二)推翻出卖民族、污辱民族的国民党政府，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三)只有苏维埃中国与中国红军才能够保证中国民族独立解放及统一中国。

2．一二八事件发生，国民党中开始有十九路军抗日，我们提出联合抗日的三个条件：一、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三、武装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蒋介石下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以五次围剿来回答我们的要求。

3．长征之中，日本占领华北益急，全国国民倾向于抗日，但无具体主张，我党就发出八一宣言及十二月瓦窑堡决议。

4．殷逆汝耕成立冀察政府，我军在党的领导下东渡黄河抗日讨逆，提议停止内战，召开国防会议，放弃反蒋口号。

5．双十二事变发生证明国民党实力派中已有人同情我们的抗日主张。我军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争取和平统一的前途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使事变化为大规模国内战争的企图，结果取得了胜利，人人佩服我党的远大眼光。

6．本年二月，党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个条件，四个保证，推动国民党放弃其十年来的错误政策。

7．总起来说，九一八以来，党一贯路线是正确的，虽然还有关门主义，李德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国焘路线等，都被克服了。

四、十年奋斗的收获：

1．最重要的，是十年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使全国人民受到深刻的影响，深入到全国民众之中，连穷乡僻壤的人们都知道了苏维埃政权是保障劳动群众利益最好武器。

2．创造了红军，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民族解放的先锋，社会主义前途的保证。

3．保存了第一次大革命留下来的好干部，使我们有了基础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彻底胜利。

4．兴奋了东方殖民地民众和国际无产阶级。

5．经过十年奋斗，革命向前发展了，造出了新的发展前途，十年的苏维埃运动，以土地革命为主。新的发展前途，以民族革命为主，土地革命为附属，在民族革命的过程中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

Ⅱ 芦沟桥事变与红军改名的意义

一、南京政府在基本上现已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为日本的侵略，危害了资产阶级自己的生存，非起而抵抗不可。而要想抗日，就不能不联共。因共产党是最有群众拥护的政党。

二、南京虽要抗日，但在芦沟桥事件发生后，仍无最大决心，而且并未放弃对于我们的斗争，不过不用战争，而用其他的更巧妙的方法。

三、芦沟桥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华北的开始，我们的任务，是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面抗战。

四、为了推动国民党进行全面抗战，我们向南京政府要求立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五、改名同时要缩编，缩编的意义，是改变我们目前庞大的不统一的编制，加强部队抗日的战斗力。

Ⅲ 改编后的中心问题——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

一、为什么要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

1．我们的军队，不但是民族革命的军队，而且将来还要担负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任务。这种任务，不论在改名以前或改名以后，都是一样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队，才能担负起这样伟大光荣的任务。

2．地主、资产阶级，虽然可以做我们的临时同盟者，共同抗日，但在抗日的过程中，仍不会有一刻放松削弱和破坏我们的工作。这不能不使我们仍有警觉性，来努力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

3．从土地革命中产生和锻炼出来的红军，有比较巩固的布尔什维克骨干，这是要估计到的，但是我们自己仍有许多缺点，主要的是：

A．对新的环境还不善于对付。

B．无产阶级成分薄弱，干部中农民成分占大多数，在部队实际工作中常感觉锐敏不够。

C．党内基本教育不够。

这些缺点必须克服，才能保障党的单一领导。

二、怎样保障共产党的单一领导？

1．保障工农成分占绝对优势，在抗日战争中，要吸收大批产业工人到红军中来，并且从中提拔出军政干部和驾驶新式武器的技术干部来。

2．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没有党就没有红军。

3．保障与加强政治工作传统。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4．健全党的生活。

A．党的教育，不但懂得党的组织原则，而且要了解党的策略，使党员能宣传党的主张。

B．支部要在群众中积极的起核心作用。而不是消极的起监视作用，这样来成为巩固部队的堡垒。

5．提高党员在群众中的模范作用，主要的在政治上和作战上。消灭少数党员比群众落后的严重现象，主要的用教育的办法，不是用清党的办法。

6．开展党内适当的民主生活，发扬党员的积极性与自动性。反对国焘路线民主办法。容许在适当范围内自下而上的批评。

7．密切党员与群众的关系，消灭群众对党员的怀疑。党员应成为群众所爱戴的人，什么话都向党员说，什么问题都向党员来解决，党员对群众亦要用最和气的态度，不要对群众用“打击”的办法。

8．吸收党员须郑重。党还应注意用吸收战士来旁听有教育意义的支部大会，发动战士发表对某一问题或某一党员的意见，许其推荐积极分子入党，得到群众推荐的人，党应给以调查审查，合格者许其入党。

9．党员要交党费，并坚决为党工作。消灭一些“特别同志”不交党费不到党的会议的现象。消灭在某些问题上讲价钱，讲条件，把红军当做“自己的”军队（军阀主义，本位主义），对党的调动命令发生怀疑等现象。

10．实行单一首长制后，军队中党的组织如下：

A．师以上组织军政委员会，向党中央及上级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军队中党、政、军全盘的工作。此军政委员会之委员由中央及军委指定。

B．师团以上党的委员会，均由党员大会选举，领导党的工作。

C．团的党委员会，由党员代表会选举，职权如下：一、领导党的工作；二、依靠党的力量来保证军事政治等任务的完成；三、对干部起审查与保证的作用。

D．连仍有支部委员会，应注意支部书记的选择（经过民主选举）及加强支部的工作。

Ⅳ 正确的干部政策

一、正确干部政策的重要性。

改编以后，干部的选择与教育更为重要了。因为：

1. 军队是集权的，而且实行了单一首长制。

2. 环境复杂，任务重大，不是好的干部，不能很好的执行党的政策，保证任务的完成。

3. 各种诱惑都增加了，没有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就容易堕落。

4. 十年的奋斗，已经培养出最强的布尔什维克骨干。但是干部政策中还有不好的倾向，主要的是军阀主义的倾向。

二、什么是正确的干部政策？

1. 提高干部的责任，经常检查其工作，赞扬其成绩，批评其缺点错误，使他求得进步。

2. 选择干部的基本条件是政治条件，次之是工作能力。对于干部的政治面目应有清楚的认识。国焘路线的干部政策，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必须反对。另一种错误的干部政策，不从政治上去认识干部，而拿一件事办得合意的人就认为好干部。“吹毛求疵”，不是正确的选择干部的办法。

3. 干部在工作中犯了某些错误时，要给以耐心的教育，指出其根源及改正的道路，特别注意提高其政治水平。只指出错误，而不耐心指出怎样改正，不从提高政治水平的基本工作上着手，只用简单的方式要干部承认错误，这些办法都会阻碍干部的进步。

4. 了解干部，不是从口头上，而是从检查其实际工作。有些干部，只讲得好，而不会做，但也有些干部会做不会讲。故需经常检查其实际工作的结果。

5. 土地革命中出来的老干部，政治上一般是坚定，应特别注意给以基本的教育，养成他们的工作能力。

6. 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即使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稍微差些，应当用加强其学习，派有能力的干部去帮助他的办法，不宜任意调动他。

7. 教育干部，要采用轮番教育的办法，同时在工作中也要不断学习。

三、反对军阀主义的干部政策，反对不认识党的干部。

1. 军阀主义，以能把部队造成拥护他自己个人的干部，作为“模范干部”。军阀主义在部队中培养个人的信仰，而不培养党的信仰。正如斯大林所形容的：

“工作人员的选择，大部分不是根据着客观的观点，而是根据着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多半都是选取所谓熟人、朋友、同乡，服从个人的人，以及崇敬上司的能手，不问他们的政治的与实际的能力。”

我们的干部要时刻自己检查，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2. 军阀主义与宗派主义不能分离，虽然宗派主义不一定就是军阀主义。宗派主义不克服就能发展成为军阀主义。

3. 不去发挥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一切他职权范围的事情都要他听命于自己，使他服从于景仰自己个人。象张国焘同志那样包办，是极端错误的。应当切实实行按级负责制，参谋机关的工作也要正确建立起来。

4. 我们的干部，应当献身于党。应当了解，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指示与培养，如果脱离

了党，就不能成为干部。不要以为自己作了领袖，就自高自大起来。要学习朱德同志的绝对忠实于党，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以便担负更大的任务。

Ⅴ　保存红军固有的特长和改正缺点

一、红军在十年奋斗中，因为他是阶级的军队，所以创造了自己的独创、特长、特点。我们要保存这些传统，成为友军的模范。

我们的特长值得保留的有：

1．艰苦奋斗迅速机动，坚决勇敢的斗争作风。

2．良好的群众关系，不侵犯群众的一线一针，替群众谋利益，因此到处得到群众拥护。

3．自觉的纪律，革命的阶级友爱。我们的纪律，不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绝对纪律，而是建筑在政治的自觉之上，我们军队中上下级的互相友爱，是任何别的军队中找不出来的。

4．最高度的团结和政治热情。我们的团结是政治的团结。我们干部和战士，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往往一切劳苦都所不辞。

5．没有白军中的一切坏习惯，如嫖、赌、喝兵血等。

二、但我们也有缺点，应当改正。缺点是：

1．游击队的习气。如缺乏工作的计划性经常性，不爱护公物，各种工作系统（司令部门、卫生部门、供给部门）不健全。

2．军阀主义倾向最近有了增长。如对群众关系不好，对群众态度恶劣，买物不照市价，利用联保摊派粮秣，拿群众东西不还，干部政策的不正确，用个人感情来估计干部等等。应严防这些倾向的发生和增长。应经常教育所有的干部和战士，不要忘记自己的出身。

Ⅵ　改编后的待遇和保存干部的办法。

一、待遇问题：

1．过去干部和战士待遇一律平等，这个制度的好处是表示了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精神，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扩大自己的影响，即全国军队的武器。

但也有缺点，阻碍了若干干部积极性上进心的提高。

2．今后待遇的原则：

A．实行津贴制度，稍加改善干部的生活。

B．普遍的改善战斗员的生活。

C．保持战斗员与干部生活水平不相差太远。

3．要在全体指战员中宣布定新的原则，并进行解释工作。

A．对干部说明保留艰苦卓绝的精神之必要，不要羡慕其他军队中军官的生活。

B．爱惜自己阶级的干部有革命的意义，并鼓励战士的上进心。

二、在改编时会有干部多出来，对于这些干部应好好保存与加强，以便适应将来更大的开展。保存的办法如下：

1. 添设副职，容纳干部。

2. 入红大受训，以便轮番深造。

3. 组织教导营、教导队等。

4. 选拔人才学习新技术。

5. 派往外地工作。

Ⅶ 正规化问题。

一、 正规化，即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提高军队的政治军事质量。

二、标准：

1. 提高指挥员的战术素养，掌握新的军事技术，以便完成新的战斗任务，以小的牺牲取得更大的胜利。

2. 改善部队装备，统一编制和各种制度。

3. 严密管理教育，克服散漫现象。

4. 严肃军风纪。正确的军容姿态，良好的礼节。

5. 提高政治水平，保障一切军事政治命令之执行。

6. 消灭文盲，首先是干部，能写报告及简单命令，看文件和报纸，为消灭文盲之标准。

7. 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育，保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抗日友军的模范。

Ⅷ 开展反倾向的斗争

一、目前一般的说，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

二、在红军实际生活中，右倾机会主义正在生长着，贪污，逃跑，忘掉阶级，失掉立场，失去阶级警觉性等，就是日益增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

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军阀主义，在改编之后，军阀主义生长的机会更多。

四、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主张的实现，必须反对左倾的关门主义，同时对日益增长的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军阀主义作斗争。

五、如此，需要提高阶级警觉性，加强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党的生活。特别是干部的教育，更为重要。

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一）由于国内和平的实现，更由于华北事件加速了对日抗战的爆发，使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的基本特点是：第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停止了九年来的内战，在红军面前放着新的敌人——具有现代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第三，红军改名后，各种破坏者对于我们的破坏将必然采取更多更巧妙的方法；同时我们改编后的环境，一方面给了它的活动与外界不良影响的传入以更多的便利，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扩大自己影响的便利。

因此，这一阶段中，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在抗战中的胜利。这一工作不仅在未加入作战前的每一分钟去进行，特别要抓住抗战中的每一空隙去实现。第二，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创造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这些都是使红军成为抗日的模范军队，以及成为全国抗日武装和人民大众团结的核心的重要条件。

（二）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为此必须：A，改善党的生活，充分发扬军队中所能允许的党内民主，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这里，对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民主运用的伸缩性，应有正确的解释。防止极端民主化的发生，防止把党内的民主用到军事上去，以致影响到指挥员的威信。B，党的工作方式，应与一般政治工作分开。党的工作主要方式，是经过各级活动分子与推动整个的组织去进行，而不应用简单的行政方法去代替。C，严密党的组织，保障工农成分。吸收党员应从政治上考察，经常的有系统的进行个别吸收，反对竞赛突击的方式。D，提高党员的质量，这就需要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党员不仅懂得党的建设的各种问题，而且要懂得党的策略，对时事问题的分析与革命的前途，使每个党员的政治水平高过于非党群众，在思想发展上保持党的模范作用。E，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必须确立严密的分工与个人负责制，建立有系统的检查和报告制度。这里，必须纠正包办与代替下级的工作方式，大量发扬下级和支部的自动性与创造性。F，密切党员与非党战士的关系，党员应成为团结非党战士的核心。党员和支部固然应注意群众一切实际问题和每一表现的反映（但不是监视），但更主要是在于政治的解释与实际问题的解决。G，加强干部意识的锻炼，发扬党的干部的模范作用。党对于党员的和非党员的干部都应起到审查

与保证的作用。

(三)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机动灵活与英勇的战斗作风，指战员间的友爱和团结，与居民的和爱关系，干部的以身作责和艰苦的斗争精神，都是红军历来的优秀传统。保持和发扬这些传统，是使红军于改名后，完成其抗日模范军和团结中心的任务的决定条件。然而必须估计到红军的改编，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则上的改变（如政治委员制度的取消；政治工作地位在组织形式上的降低，采用官阶制度等），以及外来的影响，特别是军阀军队的影响的容易侵入，可以侵害这些光荣的传统。我们对于自己的基础，应作足够的估计，但防止这些外界的影响与敌人的破坏，并与部队中一切足以防害部队传统之保持的各种不良倾向，作不断的顽强的斗争，仍然是政治工作的重要责任。

(四)选择干部的标准，应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而以政治条件为更重要。我们不拒绝新的技术人材的吸收，而且需要吸收一些来提高部队的技术水准，但必须经过郑重的选择。对于自己从长期斗争出来的干部，应有足够的估计与信赖，他们始终是我们部队的坚强骨干。其次，我们的部队必须保持绝对大多数的工农成分。在补充与扩大的过程中，应注意及此。

(五)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战士和干部忠实于民族解放的事业，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和主张，并依靠于军事政治教育的加强，创造大批的新干部，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应该特别着重干部的政治教育和意识锻炼，造就他们成为有远大眼光，能够正确认识国内国际环境与斗争的前途，并能独立的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的人材。为此，必须：A，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进行民族的与阶级的教育，编定各种必须的教材以保证这些教材和课本以及课外读物的供给。B，确定统一的政治教育制度，分期推行；固然战争的环境将使系统教育的进行遭到不少的障碍，但应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来补救这一弱点。C，除基本的系统教育外，应特别着重时事问题与具体策略的讨论，干部必须阅读并讨论党报(解放)的重要论文和时事述评。各师小报亦应经常供给这类适合于战士的材料。D，提高文化水准是提高政治军事水准的钥匙。必需纠正过去所谓消灭文盲的错误认识；消灭文盲的标准应该是最低限度能看报纸文件，能写普通的通报和命令。E，干部的教育应采用轮换训练为基本方式，并加紧日常工作的学习。F，教育的方式应采取“不求多而求深入”与“有计划的逐步提高”的原则，反对一般的条文公式化与呆板的死记的方法。

(六)为了要战胜具有现代技术的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大大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的素养，培养干部对于新的技术的基本知识，以便利于进一步的掌握新的技术。为达上述目的，政治工作必须积极提倡军事的研究，保证对司令机关每一战士的和干部的军事教育实施计划的完成。而政治工作人员的本身，亦须以身作则，加强自己的军事学习和战斗能力。这不仅在学习军事的模范上，而且在战场的模范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上有重大的意义。

(七)估计到公开环境给予我们活动的便利，对于友军和地方居民工作，应该特别加强起来，不要把自己束缚于狭小的工作范围内，而应采取完全公开的方法，在友军中居民中进行各种宣传工作，进行上层与下层的公开活动，用联络联欢参观等等方式，在友军和居民中广泛散播党的主张，解释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实现民主的重要，号召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斗争，并以红军素有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他们，团聚他们。在友军中，不应由部队去进行任何的组织，主要的工作，应放在提高其抗日的情绪与巩固其战斗力的方向上。在群众中更需进行各种抗日的组织，吸收当地进步分子负责这些组织的工作，保证其在我们的领导之

下。反对包办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关于日伪军占领区域的地方工作，需要专门的讨论和指示。

（八）在工作方式上应适合于新的形势的改变。估计到战时的环境，要求高度的发扬下级的自动性，保证在上级的意图之下，完成每一个工作上和战斗上的任务。因此，在领导上要具体，但不可呆板和代替了下级的工作，以免限制和束缚各级自动性之发扬。其次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把政治工作的经常性保持与巩固起来。战时的工作，固然需要有更多的突击性，但是必须反对用突击来代替经常工作的方式。这里的关键是在于如何把工作的经常性与突击性很好的配合起来，并依靠经常基础来进行另一工作的突击；而且对于突击工作的决定，亦须经过郑重的选择。最后，正由于新环境的复杂工作条件的不同，要求我们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来适应新的工作的需要。

（九）保证红军在思想上的一致，比任何一个时期还更重要。在红军中关门主义的倾向依然存在着，主要表现在地方工作和友军工作束缚于狭小的范围内，不善于运用旧的形式来实现新的内容；对部队战士的要求过高以及个别同志对红军改编的怀疑等。但是今天在红军中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情绪的增长。右倾情绪的重大表现是军阀主义的开始抬头与可能的发展，以及贪污腐化、动摇堕落、失掉阶级立场、易于外界所影响与乎对于革命的厌倦和对抗战缺乏胜利的信心。而轻视党和政治工作，建立个人系统，忽视群众利益，侮辱战士等等，则是军阀主义的重要表现。只有用最高度的警觉性和不断的正确的思想斗争，才能预防与克服这些倾向的产生与发展，也才能保证红军的传统和党给我们的伟大任务的完成。

（十）最后，战时政治工作，基本上适用过去十年的战时政治工作的原则和许多宝贵的经验。但估计到敌人对象之不同，作战地区和作战方式的差异，要求我们对本军、敌军和居民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加以很好的研究和适时的转变。这一工作，今天就应该要求各政治工作同志开始准备起来。

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根据中央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之原则，具体规定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如下：

一　党的组织

（一）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负责，由该部之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五人组织之（其余二人由上级指定）。其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指定与批准。

军政委员会的组织不向下级宣布。其关于军事政治和党的工作的决定，分别交给军事政治及党的机关执行。但不干预单一首长的日常职务和工作。对一般问题，也只作原则上的决定和定期的检查。单一首长对于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不同意时，则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解决之，但在未解决前仍须执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二）师团两级及总部和师的直属队，组织党的委员会，完全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选出，师的由九至十一人组织之，团的由七人至九人组织之。党委会（以下同此简称）的职权是：

1．师党委会在上级党委会及同级军政委员会领导之下，团党委会在上级党委会领导之下进行全部的党的工作。

2．各级党委会的任务是：（一）领导党的一切工作，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二）依靠党的工作和组织的基础，保证上级每一任务的完成；（三）对于干部的审定和保证；（四）监察党的道德和党的纪律之执行。

3．团一级无军政委员会的组织。团党委会的职权，应较过去的总支部为扩大，也应较师的党委会为扩大，即须相等于过去特别小组的作用。团党委会的决定，同级首长在党的组织上有执行之责任，如有冲突则诉之于上级党委会和军政委员会。

4．各级政治部（处）主任，有代表同级军政委员会和上级党委指导同级党委会之责任。

5．各级党委会互推三人至五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常委委员任职于政治部（处）的组织部（股）内，负党的工作之责。

（三）旅营两级由军政主要干部，组织特别小组，讨论本部队的工作，与进行相互间适当

的自我批评。

(四)连队的党的支部，是党在部队中的基本组织，支委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五至七人组织之，其分工为支书、副支书、组织、宣传、民运、青年等委员。

(五)连队的干部不另组织干部小组，混编入一般小组内，遇有关于干部的问题时，可由支委召集专门的干部会议解决之。团以上各机关，则须在支部之内，组织干部小组，以便于本身工作的讨论和自我批评之发扬。

(六)支委会三个月改选一次，团委会半年改选一次，师委会一年改选一次。在选举之前，须事先提出一倍以上之名单，交给党员或代表讨论，并可由党员或代表自己提出名单。

(七)支委会至少一个月向党员作报告一次，团委会至少两个月，师委会至少四个月向党员或活动分子会议作报告一次，并发动党员对于报告之批评与讨论。

二　政治机关

(一)改编以后的政治机关，仍为团师以上之组织。师以上设政治部，团设政治处。

(二)确定各级政治部（处）主任为同级单一首长的政治助手。

(三)各级政治机关在上级政治机关和同级军政委员会指导之下工作，其职务是：

1. 确定政治工作即是党的工作，故其中心仍是进行党的工作，保障党的策略路线的执行。

2. 实施部队的政治文化教育，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

3. 保障部队每一具体任务的完成。

4. 进行友军敌军（日伪军）和地方居民的工作。

(四)适应于上述的职务在政治部（处）主任指导之下，应分设组织部（股），宣传教育部（股），民运指导部（股），敌军工作部（股），分任各项工作，各部（股）的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1. 组织部——专负党的工作和干部的审查与政治干部的配备之责。

2. 宣传教育部——专负部队内的宣传教育文化娱乐之责，并于下设青年干事，指导青年工作。

3. 民运指导部——专负对外宣传及对居民和友军的工作。

4. 敌军工作部——专负破坏日伪军、处置俘虏等工作之责。

(五)营设政治教导员，连队设政治指导员，负责政治教育并依靠着支部进行一般的政治工作。

(六)团设俱乐部，连亦设俱乐部（列宁室改名），组织与进行部队的文化娱乐及各种课外的活动。在连队俱乐部之下，设立经济委员会，由军人大会选出，负责审查连队的经济，防止贪污，改善部队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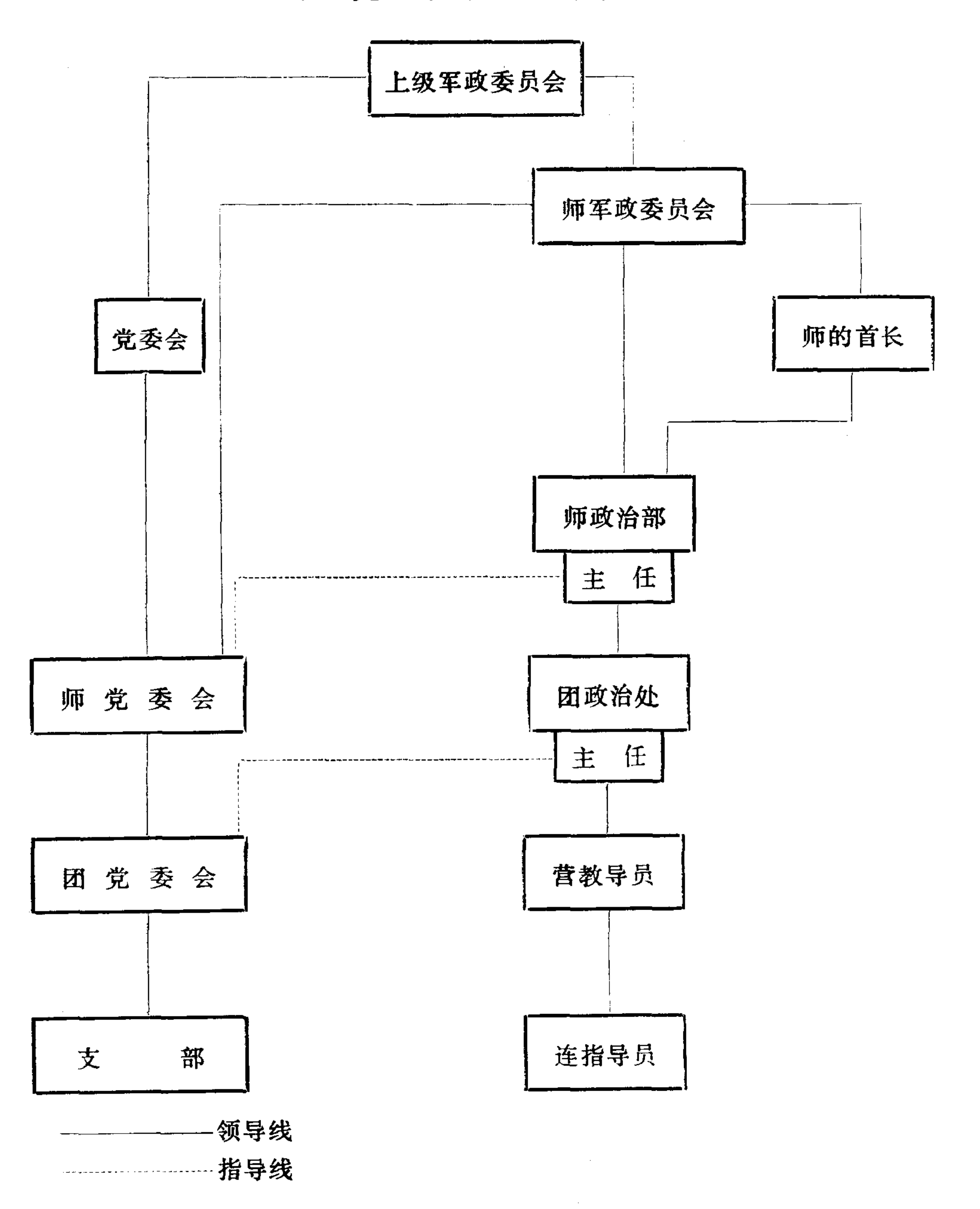
(七)青年工作系统仍保存师团两级设青年干事，连设青年队(取消朱德青年队的名称)，其工作中心是组织青年的积极性，活跃连队的生活，发扬青年在政治文化的学习上和战场上的模范作用。连队青年队长，由支部青年委员充任之。

(八)在部队中以师为单位，设立互济会的组织，采取自愿加入的原则。连设互济会组织员，由会员大会选举之；团设三至五人的委员会；师设五至七人的委员会，由各级会员代表

大会选举之。

（九）连队的组织，除党的支部、青年队、互济会组织员及俱乐部和所属的经济委员会外，必要时可设立民运工作组，在支委民运委员领导之下进行地方居民及维持纪律等工作。

部队党及政治组织系统表



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根据目前统一战线开展与抗日战争将要开始的形势，各游击区域为着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目的，应该依据下列原则，配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的全面的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

（一）政权问题。争取地方政权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进行的步骤是：（1）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取消苏维埃的制度，采取国民党现有的政权组织形式，用普选的方法选举保甲长，分区长；保障政权实际上仍在党的领导之下。（2）凡游击区域没有旧政权的，同样建立现有国民党式的政权，有旧政权的则力争旧政权的民主化，争取党的领导。（3）邻近游击区域周围的国民党区域，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旧关系打进旧政权中，去充当保甲长或区长及职员等等，尽量实施一切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如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等。

（二）土地问题。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注意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争取与团结群众在党的周围。（1）尽可能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求得群众生活的改善（如增加工人雇农的工资，改良待遇，减租，减息，减税）。（2）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组织，如农村复兴会与合作社等等，到里面去工作，在真正在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去取得领导。没有这类组织的地方，组织这类合法的组织．这类工作，也应该完全利用合法的形式。（3）在已没收分配土地的地方，注意保障群众已得的土地革命利益。豪绅地主至多只能与一般人民得到同等的利益。（4）已被移民的地方，应该用各种方法争取移民回家，设法解决其土地耕具房屋等问题。

（三）武装问题。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1）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2）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与副队长，政治处主任及总支部书记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一切工作。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均须改变以适合于新的情况。（3）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性的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4）赤少队取消，有计划有组织的改变或混编在当地壮丁队民团中去起作用。（5）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与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捉杀汉奸，扩大党的新政策的影响。但在取得与国民党驻军停战谈判机会后，即当用大力量，利用时机，进行整顿与训练，并掩护当地群众工作。用一切方法提高部队每个战斗员的政治水平及坚定的意识，防止一切收买利诱分化的阴谋。（6）关于部队给养问题，在未与对方谈判好以前，我们可采取由富有者募捐的方式募集钱粮。只有确实是汉奸的财产，才取采没收的办法。

(四)群众工作问题。(1)在顺利的条件下，原有苏区及游击区域已有的群众组织，应保持其存在与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民主化与党的领导，改善群众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使之成为团结广大群众的组织。纠正党内代替包办群众团体和改变群众团体为第二党的倾向。(2)在顺利的条件下，如果革命的群众团体还不能公开的存在时，党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与组织形式去进行组织群众的运动。(3)在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争取人民的权利，动员人民参加抗日的民族革命等群众运动与群众斗争中，党必须及时注意防止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以及右倾的尾巴主义与失掉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党时时刻刻应当注意能去团结与领导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参加到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这是领导群众的基本方针。(4)必须有计划的去开展四周国民党区域的群众工作。

(五)对国民革命军工作。现在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军工作的方针一般的不是瓦解它，而是采取争取其官兵共同抗日的方针。(1)站在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向官兵宣传解释我党的主张，首先是以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主张，去争取停止内战互不侵犯，以至进行和平谈判，成立协定。(2)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下级的官佐士兵，提高官兵政治的民族的觉悟与抗日情绪，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从部队的日常生活出发，逐渐的进行改善士兵生活，改良部队的纪律组织与教育。(3)但在它们继续向我们进攻时，我们仍应坚持自卫的游击战争。

对于民团，一般的要同样采取以上的方针。但顽固的反动的民团与土匪的坚持与我们作对者，争取不可能时，可以以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消灭之。在我们和当地驻军与政权谈判好时，可同它们共同解决之。

(六)关于党的组织与工作。(1)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不必公开的干部与党员，不应在群众中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头。对于党要注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执行。对于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或左派分子，决不要他们直接作党与群众工作，仅能做群众工作的掩护者，只能在他的地位上作他自己可能作的工作，如政权的民主化，以及经过政权力量减少人民的压迫与剥削等等。(2)必须改变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首先要把党的工作与其他政权的、武装的、群众的工作方式分别清楚，不能混淆，不能代替包办。要真正建立党团工作，一切工作经过“党团”。党不应直接干涉其他组织的独立工作。不仅政权中、群众团体中应当广泛实行民主制度，即党内在可能条件下，亦应发展党的民主，实行集体的讨论与党的领导机关的选举。(3)有组织有计划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与党员，了解党的新政策。要有计划的有系统的举办党校与训练班。

(七)解释工作的重要。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这种改变的必要。但同时应该指出，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在没有和平以前，一面要进行坚决的自卫战，一面又要坚持统一战线的工作求得和平。在和平之后，我们的任务不但不减轻，而且更为加重了。我们仍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

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

（一）一切地方工作，以争取抗战的胜利为最基本原则。一切斗争的方法与方式，不但不应该违犯它，而且正是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

（二）对于所有参战的政府与军队，我们应该完全站在积极拥护的立场，在这一立场上，对于它们的缺点与错误进行善意的严肃的批评。

（三）可能时，应该同各地政府与军队进行各种具体的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并尽可能的吸收其他党派及人民团体参加进来。凡已有这类官办团体的地方，我们应该积极的参加，逐渐扩大内部的民主，使之更加群众化。

（四）应该普遍组织合法的统一战线的人民参战团体，或某些已经普遍存在的合法组织（如抗战后援会）转变为这类性质的团体。在它的总的领导下，可以发起各种吸收群众参加的活动与组织（如各种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慰劳队、运输担架队、募捐队、义勇军、侦探队、抵制日货十人团、国防文艺团体等），保证一切愿意抗日的派别到内面工作，并发展其中的民主。或者可以首先组织各种上述的个别的统一战线团体，然后再把它们联合起来，组织总的领导机关，这可以就各地的情况来决定。

（五）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如民团、保安队、壮丁队、义勇军等，实行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并取得其中的领导地位。并用一切其他合法的可能，达到这一目的。

（六）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政府的确表示坚决抗日，容许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与公开活动，欢迎共产党到政府工作，我们可以公开用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去参加，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推动抗战运动的前进与胜利。

（七）在抗战中，应该坚持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众团体。或加入到已有的国民党所控制的机关（如黄色工会、农会、学生自治会等）中去工作，转变他们为这类的群众团体，利用一切方法动员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扩大政府所允许民主的范围。一直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八）应该领导改善民众的生活的斗争。但斗争的方式亦应适合于抗战的利益。以采取用群众压力为后盾的民主的与合法的方式为主，在改善群众生活的过程中，应该鼓励一切同国防有关的生产事业中群众革命的热情，自觉的提高生产率。在抗日的直接后方，应竭力避免采取对抗战有害的罢工之类的斗争方式。

（九）在日寇占领区域及其侧后方，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游击小组，抗日义勇军，人民革命军，到处实行骚扰破坏，捕杀日本官吏，解除日军小部队的武装等。同察北义勇军及东北人民革命军义勇军取得密切联络。组织各种合法团体（如在家礼等）以组织群众。或打入到合法的汉奸组织中与武装部队中去，以争取群众。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的口号下，经过秘密的或半公开的活动方式去组织伪军及伪保安队的全部叛变与倒戈。在这类区域中，党的组织应绝对保守秘密。

(十)在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共同抗日的口号之下，组织与武装全体韩民、蒙民、回民参加抗战。应该争取这些少数民族的动摇上层分子（如德王之类）到抗战中来。汉人的政府与军队，应该同少数民族的上下层建立良好的关系，反对大汉族主义，使他们自愿的同我们亲密的联合。

(十一)同各党各派的政治斗争，是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的，但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的问题，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心。应该到处公开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胜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它党派的不彻底与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

(十二)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但同时应该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党的工作与组织应适合于战时形势，加强地方党独立工作的能力。共产党员应该以自己的正确主张，艰苦工作，模范行动，谦虚态度，去取得群众的信仰、拥护与爱戴。

(十三)红军在抗战中，应该成为一切抗日友军的模范。取得友军与群众的信任。应利用现在公开的与合法的地位进行多方面的活动。

(十四)坚决同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做斗争。但不要轻易把这类帽子戴到动摇分子的头上，必须耐心的用一切方法争取他们到抗战中来，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应该经过政府机关或群众团体来进行。

(十五)必须同民族失败主义做斗争。在斗争中巩固民族的自信心，指出抗战必然胜利的前途。

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给彭德怀同志——

（上略）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已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与部署，他只想以陈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王震率一个团暂时到五台也是可以的，但请注意到适当时机，仍以转赴晋西北为宜。依情况判断，林率陈旅即使能打一二个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统请斟酌处理。



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同志——

（一）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

（二）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的但是有计划的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周是否应与冯治安、黄绍雄等再谈一次，请酌。

（三）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军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

（一）自我第八路军出动晋北前线，特别在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大大的兴奋了全国抗日军队和民众，提高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我们的出现与胜利及各游击支队的积极活动，虽然还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而且敌人突破长城险隘后，还是继续向太原进攻，但是增加了敌人许多新的困难与顾虑。

（二）三个月中华北的抗战，由于当局还不愿意动员群众来配合与参战，战役战术上指挥的守旧与愚笨以及兵力配备上的不适当以致平汉津浦平绥各线战局都处于不利的状况，直到沧州保定雁门关连续失守后，由于我党及我军之策动，现在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已警觉华北战局之危险，而有集结与增加新的力量于晋北，求得部分决战胜利以争取战局开展之新的决心与布署。

（三）目前山西成为华北战局中最后争夺的主要目标如能打击深入雁门关以南敌人取得晋北战役的胜利，保卫太原巩固太行恒山山脉及晋西北地区则可依托山西高原地带为堡垒争取将来向平汉线战役以至战略上的反攻，以改变华北战局求得华北抗战的持久，在国内国际条件有利变化下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否则太原石家庄均被敌夺占，敌人达到占领黄河北岸各战略要点之目的，而使整个抗日战争将陷于更加困难与不利的形势。

（四）目前华北战局虽处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但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已渐认识保卫山西为华北抗战堡垒的重要，增强晋境军事力量，如果改善军事上的领导坚决实现已定战役计划真正实现民主改善民众生活纲领动员广大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加上我军以自己积极行动的配合推动和领导晋北战局胜利的开展在敌人远离铁路交通增援接济困难条件下争取歼灭深入晋境之敌巩固山西实现反击敌人改变华北战局之可能是存在的。这种前途的争取成为我们当前最中心的政治与战略上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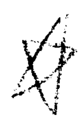
（五）由于我军积极的胜利的行动模范的群众纪律，我们在全国友军及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而且对于我军抱着极大的期望，我们逐渐取得对于华北抗战的政治军事领导地位，然而在过去一时期中我们还存在有某些弱点，如某些部分行动欠积极发动群众与开展游击战争还未收到必要的成绩，这些都是由于对争取巩固山西以支持华北战局重要性的认识不足而产生的。

（六）在目前晋北决战当中，我们虽在决战的军事上仍然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但我们正确的运用运动游击战对敌侧后的袭击与捣乱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供给的积极行动以打击钳制分散敌人配合友军歼灭敌人，我们的活动应当成为达成晋北战役计划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依据

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以高度的积极动作，争取新的胜利，以影响友军在战术上及对群众关系上的改进，巩固我军的威望，提高我们的领导作用，这里必须反对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这种情绪是可以减低我们行动的积极性，削弱我们的领导作用。同时也须防止一切轻敌的冒险行动，这种左的乐观是要妨碍我们的艰苦动员和冷静考虑行动将要招致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应运用平型关及游击支队胜利的经验教训来教育战士，以巩固和提高抗战的胜利信心，加强适用的战术教育。

（七）我们在积极行动当中，必须加强地方群众工作的领导，创造太行恒山山脉及晋西北地区的根据地，要运用和扩大在山西已经获得的民主与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纲领正确执行党的策略去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游击队配合主力行动，争取壮丁加入我军，以补充战斗中不可避免的减员并求得部队的壮大。这里反对一切把作战与地方工作对立的观点，而须组织适当的干部有计划的分配于工作地区，以加强地方工作的领导（地方工作总政另有指示）。

（八）此指示应在党内进行深入的传达与讨论。



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刘 少 奇

一 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

在芦沟桥事变以前，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主要是非武装的斗争方式（如游行、示威、抵货等），当时敏感的学生与知识界常是站在反日斗争的前线；但在芦沟桥事变以后，中国民族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已经提到武装斗争的阶段了。这是一个对日抗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站在抗日前线的是抗日的军队和那些武装起来的人民。因此，大多数的学生与知识界反而转到抗日的后方了。在今后的抗日斗争中谁想表演他重大的作用，谁就必须武装起来，参加武装的抗日斗争，并站在武装斗争的最前线去。

一般说来，武装斗争有下列三种主要的方式：（一）正规战争；(二)游击战争；(三)武装暴动。在全中国来说，今天中国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是正规战争，在华北也主要还是正规战争。

但是不幸的，在今天反日的正规战争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领导战争的政党与军政当局还坚持着许多错误的方针，不能全部执行正确的政策。这就使得今天的抗日正规战争在华北受到相当严重的失败，大部分的土地与交通要道和许多主要城市沦于敌人之手，被敌人利用着向中国内地进攻。这虽然是十分遗憾与痛心的事，然而正规战争中这许多错误与缺点，还不是一天或一个月所能全部纠正的。另一方面八路军又还不是华北正规战争中的主力，真正人民的武装也还没有广大组织起来，因此，华北的正规战争继续遭受一些严重的失败，仍是可能的。

在华北抗日的正规战争如果继续遭受一些挫败，游击战争就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虽然在全中国来说，中国民族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还是正规战争，在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

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因此，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的组织与发展反日游击战争。广大的游击战争仍然是华北人民反日最有效的方式，一切愿意在华北继续进行反日斗争的人们，都不应该放弃或逃避游击战争。如果真能在华北动员数十万以至数百万人民武装起来，从事与坚持游击战争，那末这一件事实，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有着下列伟大的意义与光明的前途。

(一)牵制日本极大的兵力在华北，在战略上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更易于获得胜利。

(二)在华北长期坚持着抗日战争，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三)围困日本侵入内地的军队而最后消灭之，部分的收复失地。

(四)给华北人民以斗争的出路，给汉奸以威胁，暴露投降者与患恐日病者的可耻面貌和民族失败主义者的错误，给某些可能的对日妥协企图以极大的牵制。游击战争将告诉全世界，华北人民为保卫华北的每一寸土地而血战到底。

(五)最后在游击战争继续扩大与胜利的过程中，重复转变到以正规战争为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驱逐日军出华北。

有许多人对华北发展广大游击战争的政治军事意义，是估计不足的，对游击战争的前途是怀疑的。他们以为有数十万久经训练的正规军，都不能支持华北的战局，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少过数倍的日军连续击破，难道在这数十万大军失败后，由人民组织起来的新的零散的游击队，能长期与更多的日军作战，取得胜利吗？但是这些人的思想是错误的。一方面他们不了解华北正规战争的失败，是不能由这数十万军队与人民来负责的，不是由于这数十万军队与华北人民的力量不能战胜日寇，而是由于没有发扬这数十万军队与华北人民伟大的力量并错误的使用了军队与人民的力量。这是应由政府当局负责的。然而这种错误与缺点在今后的游击战争中，必能迅速的纠正与克服，也必须迅速的纠正与克服。所以在今后的游击战争，是有着胜利的前途，也必须胜利。

为什么游击战争能够胜利？怎样争取胜利？这就要看今后游击战争能否执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与各种基本政策来决定。

二　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胜利的可能

如果华北的交通要道和主要城市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那末华北的抗日武装部队将在何种条件之下与敌人斗争呢？在敌人方面来说：

第一、敌人能在主要的城市军事要地集结优势的兵力，利用华北的铁路主要公路及工业中心，容易得到补充并能迅速的调动兵力。

第二、敌人有优良的器械。

第三、华北的人民不帮助敌军，到处要受到华北人民的反抗。

第四、敌军不能没有后方作战，在断绝后方接济的情况之下，敌军即不能生存。

第五、华北的地区广大，在山西、冀北、绥西有广大的山地。敌军的运输联络线很长，到处有被游击队截击的危险。敌军不能在广大的乡村到处配置兵力。

第六、敌军大多数士兵是被强迫着到中国来作战。

这是敌军在华北作战的优点和弱点。

至于我们的军队游击队呢？

第一、我们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处在敌人后方和侧翼作战，外面的补充和接济很困难。

第二、我们的器械与军事技术低劣。

第三、我们能够到处受到人民的帮助。风土习惯，地形都很熟习。

第四、有广大的山地以及敌军不能经常驻扎的广大的乡村，作为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

第五、我们的官兵是自愿的和敌人作战。

第六、在华北有具备游击运动战特长的八路军作为中心。

这些是我们的优点和弱点。

此外，过去华北的政府及豪绅资本家一贯的压迫剥削人民，人民生活状况的困苦没有改善，这次许多抗日军队的纪律不好，在人民中新种下的恶劣影响，人民长期没有民主权利，没有组织，以及中国政府在历史上对西北蒙回等少数民族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和华北有些地区的会门土匪很多等，都是在华北广大开展游击战争应该重视的条件，都应该作为确定游击队战略战术与基本政策的出发点。但是这些条件在游击战争广大的开展以后，在正确的政策执行以后，即将逐渐的改变，而对于我们有利。

华北的抗日武装部队是在上述基本条件之下和敌人作战。我们的战略战术与各种政策，都必须根据这些条件来确定。

关于游击战术战略问题，有许多专书论及，我这里不说了，我只说如果在华北能广大的发展游击战争，能遵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与正确的政策，那末敌人愈加深入中国内地，他的后方联络就愈加困难，延长数千里的铁路公路交通，到处都有游击队去破坏和截断，就要逼使敌人用极大的兵力来保护交通联络线，就可围困深入内地的敌人，便利主力去消灭这部分敌人，收复被敌人占驻的一些地区。游击队能够对付超过自己数倍的优势敌人，并能打胜仗。东北义勇军的经验，和八路军过去的全部经验完全证明这一点。所以在华北数十万正规军不能战胜少数的敌人，但华北数十万游击队是能战胜多数敌人的，华北的反日游击战争，是有着光明的前途。

但是游击队要战胜敌人，除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外，还必须（一）游击队要取得人民充分的有组织的帮助，才能隐蔽自己的行动，了解敌情，并从人民中取得给养与补充，否则游击队不独不能胜利，而且不能存在；（二）游击队在各方面都要有正确的政策，代表人民的利益与意志，才能取得人民充分的有组织的帮助；（三）游击队必须有很好的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并实现官长与士兵的平等待遇，才能保证各种政策的正确执行。如果没有上述三个条件，虽有正确的战略战术也是不能最后胜利的。因此，我们为使华北游击战争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除开广大的组织与发展游击战争而外，还必须建立能够在各方面执行正确政策的游击队，并且改造那些不能执行正确政策的游击队。应该建立巩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上建立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游击战争的抗日政权。

三　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和改造

华北如果沦陷于日寇的手中，决心反抗日寇的，当然不会只是共产党，其他一切有民族意识和决心的党派、军队与人民，都会要拿起枪来，参加游击战争，和日寇作战。这自然是很好的，华北游击战争就能广大的开展。但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华北的抗日武装部队是会很复杂的，极不一致的，各种游击队会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政策与立场。对于这种情形，我们主张各种不同的抗日部队联合起来，配合作战，并执行一定的共同的政策。

估计将来抗日游击队的成份约有下列数类：（一）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的队伍，（二）原来在华北抗战的各派军队之一部，（三）以前在地主指导下的民团警察，（四）人民中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五）土匪会门中之抗日的队伍，（六）从伪蒙军中反正过来的队伍，（七）蒙民回民组织起来的抗日部队。以至将来还会有：（八）从日军中哗变过来的士兵及俘虏兵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这些部队在抗日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主张与政策上是极不一致的。我们为了战胜强大的日寇起见，我们应该提议：

(一)所有在华北抗日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建立联军总司令部，受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二)联军总司令部以及各军区的联军司令部设经常的军事会议，由各种抗日部队的代表组成之。军事会议决定战略战术方针和作战计划并选举联军司令官等。

(三)为了便于作战起见，共产党主张各种零散部队互相集中合并起来，成立正规的抗日军队，只要一有可能，共产党即为团结集中与合并各种零散的部队成为正规军而努力。但必须以自愿为原则，共产党反对强制的兼并或改编。

(四)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不独是需要自己的胜利与发展，而且需要一切友军的胜利与发展，共产党并不隐瞒自己一切成功与胜利的经验，它以完全诚恳与坦白的态度，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帮助各种抗日部队的改造使一切抗日武装都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部队。但共产党对各友军的错误与缺点也将不隐讳的进行批评。

在抗日战争中迫切需要到处组织武装部队，也迫切需要各种武装部队的联合、集中、合并与改造。因此，共产党反对南京中央及某些地方当局禁止人民自由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的方针，应该让人民武装起来，发给人民枪枝，帮助人民武装，不要怕反日的武装部队太多太复杂。同时共产党也反对各种抗日武装部队的分立主义，主张联合与集中。共产党还反对强制的联合与集中，主张民主的联合与集中。

我们认为许多参加抗日的部队是需要彻底改造的。否则这些部队就不能胜利与发展，甚至不能在华北存在。这种改造是：

第一、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教育，然后才能在政治上巩固部队，提高纪律，并提高对日作战的勇气与牺牲精神。

第二、必须改善对士兵的待遇，禁止打骂虐待士兵和肉刑，实现长官与士兵的平等待遇。因为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斗争，士兵已经不是为了没有饭吃要赚几元钱来当兵的，而是为了救国与反日来当兵的。他们光荣。因此士兵就不能再受打骂与虐待，让别人把他们不当作人看待。过去军阀主义的一切恶习如果继续在今后抗日部队中存在，那这个部队必然逃亡的很多，没有人愿意到这个部队当兵，这个部队也不能高度发扬士兵的英勇与敌人作战。终久这样的部队是不能胜利甚至不能生存的。

第三、必须实行部队的经济公开；并由士兵举人管理监督经济，然后士兵才能在给养困难的条件下不生怨恨，与剔除坏人的中饱。

第四、必须淘汰对抗战动摇，没有信心与不坚定的分子，然后才能使这个部队长期坚持抗日，并取得胜利。

共产党主张有上述缺点的部队进行改造，并愿尽一切的可能帮助友军的改造。自然共产党同样虚心接受友军的特长和好的经验来改造自己的部队。

四　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与游击区域中抗日政府的组织

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就不能长期坚持。在华北日军虽然占领着交通要道与主要城市，但各省边区山地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是不能到达或不能经常武装

占领的。在这些区域中就应该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队活动的后方。

但是在这些区域中有的还存在着原来的政府，这些政府或者继续抗日，或者投降日寇准备转变为汉奸政府。有的因为原来政府人员逃走，汉奸们就准备重新建立维持会等。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人民的抗日政权。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等，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为了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政府来领导战争，原来的政治机构是必须实行民主的改造的。

首先应该召集这些区域中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各武装部队及原来政府的代表与民众大会选举的代表举行会议，选举这些区域中临时政府的委员会。在该区政府之下，各县、区、乡、村的政府，同样召集会议，实行改造。这个临时政府的职务是除开执行政府一切职务外，要筹备正式政府的建立。起草政府的组织纲领，选举法，并办理各级政府的选举。待民选的该区政府代表大会召集后，产生正式政府，临时政府的职务即行终了，将政权移交于人民选举的正式政府。这是改造政府所应经过的手续。

这种政府实行何种制度呢？实行民主制度，实行普遍、秘密投票的选举，开始时或者还应采取复选制，凡男女公民年满十八岁无精神病者均有选举与被选权，各级政府采取委员制，由委员会任命各部部长，表决时以多数赞成为通过。

这种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接受中央政府的法律与命令。但它同时是地方自治的政府，它有权利颁布地方性的法律和命令在自己区域内实行。

这种政府应该是地方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现在中央与地方的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一切在抗日战争中坚决奋斗并取得民众信任的政党、团体、军队和个人，均应有代表参加政府。同时这些政党、团体、军队和个人又应有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共同纲领，作为政府施政的准绳。

这种政府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并争取胜利。因此它一切施政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一）普遍的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战；（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三）改善人民的生活；（四）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与破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行为。这种政府的一切政策，一切施政方针，是为了最高度的达成上列四项任务，也就是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种政府如果能够最高度的完成上述任务，就能取得群众最高的信仰，发动群众最高的积极性去参加战争中的一切工作，去组织自己训练自己，并愿意将自己的一切交给政府去与日寇作战。这样就将这个区域建立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游击队的给养与补充可以取之于这些地方，后方可以设在这些地方，可以引诱敌人到这些地方来消灭敌人。群众会以最高的热情从各方面来帮助政府与游击队。这样就能使游击队长期支持与优势的敌人作战并取得胜利。

五　抗日政府的各种政策

为了最高度的达成上述四项任务，政府的各种具体政策应该如下：

1　财政经济政策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与破坏，使得外货很难进口，使得沿海各工业中心不能继续生

产，使得中国许多带着买办性的民族工业难于维持或停止工作。许多地方的农村也因为战争的破坏与影响使生产低落。而在另一方面又因为战争的消耗，需要大批的工业品与农产品去供给。如是在国内就引起货物的缺乏，价格的提高与货币的跌价。这种情形在被敌人断绝交通的游击根据地中，是更加严重的。在那里许多工商资本家和大地主是要逃跑的，或者还有企图投降的。敌人也将特别封锁这些区域，断绝这些区域与外面的商业往来。因此，这些区域的财政经济状况将是极端困难的。但是这种情况又为中国纯粹的民族工业——道地的土著资本造成了极顺利发展的机会。战争为他们造成了从来未有的广大市场和高度价格与利润率，这种民族工业的发展，不论对于全国及这些区域的抗日战争和民族独立，都是有利的。这要使中国在经济上逐渐脱离对帝国主义的依靠而走向独立，并且也帮助中国的封建地主和高利贷者投资于土著工业，转化为工业资本。因此，抗日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应该根据下列的基本方针来确定：

（一）保障抗日武装部队的给养及人民必需品的供给。

（二）提倡土著工业的发展——发展农业生产，并在抗日战争中附带肃清残余的封建剥削关系。

（三）努力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四）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把负担加在有钱人身上，口号是有钱出钱。

根据上述的方针，抗日政府的具体财政政策，应该是：

（一）取消过去一切的捐税和摊派，重新规定统一的累进税。对于不劳而获的收入（地租、房租和放款利息）课以重税。

（二）没收汉奸及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

（三）地方公款由政府管理监督，提出一部分充作抗日经费。

（四）向富户征求救国捐。

（五）发动群众自愿捐助抗日经费。和战争中的需用品。

（六）节省开支，禁止浪费，严惩贪污中饱，建立廉洁的政府，取消薪饷制，规定公务员最低的平等的生活费。

（七）在可能与必要时发行救国公债。

（八）尽可能规定大体的预算，将军事经费提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将其他一切经费减到最低限度。

（九）在适当的地点筹集与储藏部队所需用的一定数量的粮食。

在经济政策方面：

（一）保护一切工商业的自由营业，取缔奸商。

（二）协助对抗日战争有利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

（三）协助生产合作社及消费合作社的组织。

（四）因为资本家的怠工逃跑而停工的工厂，政府应利用之，组织合作社，或股份公司，或转租给私人开工。

（五）改组生产奢侈品的工业来生产军用品与人民生活必需品。

（六）发展农业生产，进行耕种运动，保护牲口农具，禁止破坏农具及无限制的出口与屠杀牲口。

（七）组织输出输入，允许敌人占领区域的商人及英美等国商人进入根据地营业，一般的

不禁止日货的输入（因为货物缺乏，敌人将会禁止）。

（八）取缔牙行的垄断。

（九）一般使用法币，不禁止日币的使用，尽可能不单独发行纸币。维持原来的银行或建立银行在政府监督下指导金融。

（十）限制高利贷及地租的剥削，办理低利及无利借贷。

游击队与游击区域的财政与给养，应以独立自筹为原则，但在可能时应努力取得中央政府及附近省政府的津贴和帮助。

还没有根据地的游击队或者游击队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去活动时，一切给养更加应该自筹。但游击队筹措给养时必须严格遵守上述财政经济政策的原则，丝毫也不应该乱来。这时候游击队的给养，主要是以没收敌人的资财与汉奸的财产，及向富户募捐来维持。只有在十分必要时才向一般群众募捐。向富户募捐也应尽可能不采用强迫摊派的办法，应该说服富户自愿捐助，只有在不得已与说服无效时，才可以指定富户摊派若干金钱粮食。游击队绝对不应该经过村长区长或商会等去摊派捐款粮草，必须直接向富户募捐或摊派，或者指定某家富人要出多少东西。因为经过村长等摊派就必然要派到穷人身上，引起大多数人民对游击队的不满，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游击队不独不应该向穷人摊派，而且必须在没收汉奸财产及敌人资财时分配大部分给穷人，要帮助敌人占领区域的工农群众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加工资、减租、减息、抗税等）。游击队在筹措给养时，有一定的鲜明的政策，有严格的纪律，不乱拿人家一点东西，就不会引起群众的恐慌与逃避，就会取得广大群众的赞扬与拥护，在游击队困难时，群众也乐意自愿的帮助，如果游击队没有一定的政策去筹措给养，随便向人派款或拿人家的东西与不公平买卖，那就必然要和广大的群众闹翻。

2　农民土地政策

抗日战争没有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参加，是不能胜利的。但是全国各地最大多数的农民都是处在救死不暇的状态中，因此，他们就更无力来救国。所以在抗战的时期中正确合理的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着。

共产党从来就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及地少的农民。这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最直接最彻底的办法。但是因为民族危机的紧迫，我们为了联合国民党及其他一切党派共同抗日起见，我们作了政治上的让步，停止我们过去直接执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个让步虽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我们在抗战阶段中不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我们停止了采用暴力从下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但我们主张由政府采用法律命令等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使农民获得土地，使耕者有其田。

在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区域中关于农民土地政策我们有下列的提议：

（一）没收汉奸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

（二）逃走的地主的土地，无租息的分配给农民耕种。

（三）地方公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四）颁布普遍减租的法令，规定最高租额，减租至最低限度。

（五）保障农民佃耕土地之永佃权。

（六）由政府认真办理水利及救灾等事。

(七)协助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帮助贫农的耕具、种籽、牲畜等。

(八)废止旧的农会法，保障农民有组织农民协会及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九)惩治敲诈盘剥农民之土豪劣绅。农村政权由农村人民直接选举，组织农民武装自卫队。

(十)整理农民债务，禁止高利盘剥，办理低利或无利借贷。

在彻底执行上述各项政策之后，广大农民的参战积极性是能发展起来的。虽然有些地主是不赞成的，但是为使农民吃饱饭好去救国，只好牺牲他们一点。亡国之后，地主的牺牲一定比执行这个政纲的牺牲还要大。开明的人应该赞成上述纲领。没收汉奸的土地，应该首先分给本村无地的抗日军人家属，然后再分给其他的农民。

3 劳动政策

抗日政府必须有正确的劳动政策，然后才能发动工人参战的积极性，同时又能发展生产。在游击区域中必有许多的失业工人须要救济，同时因为市场与外面隔绝，土著资本家可以独占市场，又造成了提高在业工人劳动条件的可能性。共产党在这些区域中对于劳动政策的提议是：

(一)救济失业工人。

(二)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星期日的休假。

(三)增加工人的工资，规定最低工资额。

(四)保护青工、童工及女工。改善对学徒的待遇。

(五)规定资本家对工人疾病、死亡及各种不幸事件的抚恤救济办法，或实行社会保险。

(六)禁止克扣及罚工人的工资，禁止包工头的残酷剥削，禁止打骂及虐待工人，解散厂警队，组织工人自卫队。

(七)保障工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自由，承认工会在法律上的权利，及订立团体契约权。

(八)颁布保护农村雇农的特别法令。

在政府机关中废除薪饷制，但对于工人工资的制度绝不能废除。政府保障劳动条件的改善，颁布劳动法，并首先在政府工厂中执行，工人就会为了提高生产而发展高度的劳动热忱。因此，政府的劳动政策是以改善工人职员的生活，提高工人劳动热忱，增加生产为原则的。

4 内务政策

抗日政府的内务政策以肃清汉奸，保障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及逐渐破除封建关系为原则。

在这些区域内应宣布与日本断绝国交，因此，凡与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关系的，在这些区域都是违法的。汉奸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来反对和破坏中国抗日战争的人，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并接受日寇的指示而工作的人，也是汉奸。但是有许多无法逃避的人民，不得不在日寇强迫下而表示投降的，甚至被日寇强迫从事劳役与守望的，这些人均不得称为汉奸一律处办。因为日寇的压迫，有时人民还不得不向日人报告游击队的行动，游击队还应该谅解人民的苦衷，不使人民为难，组织人民向日人谎报等。

在这些区域内的内务政策应该是：

(一)处汉奸以死刑。

(二)处罚阻碍与破坏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官吏、豪绅及厂主。

(三)改组原来的警察民团并将他们编入抗日游击队。组织特别的人民自卫队来维持地方秩序。

(四)改组法庭，法官民选。

(五)颁布法令——宣布婚姻自由，信仰自由，禁止大烟毒品，禁止缠足，禁止人口买卖等。

(六)组织地方的人民警卫，实行守望放哨及通行证。

(七)抚恤因抗日而牺牲的家属及残废者，救济难民。

(八)优待抗战军人家属。

5 教育政策

抗日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培养抗日战争中急需的干部，提高人民的民族觉悟与文化水准为原则。因此必须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及旧的课程。应该：

(一)改组大学成为各种军事政治及技术干部的训练班，缩短修业期限至数个月或一年以下。

(二)广泛发展免费的小学教育。

(三)广泛发展补习教育，民众社会教育，组织识字运动等。

(四)提倡简易的文字，改造旧的戏剧歌曲等。

(五)建立各种文化团体，研究会，读书会等。发展新闻纸及印刷事业。

(六)改善对教职员的生活待遇，承认教职员联合会及学生会的法律地位。

6 民族政策

抗日政府对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政策，应以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援助各少数民族自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为原则。应该坚决改变现今国民政府及中国历来所执行的臣服与笼络各少数民族的政策。应该宣布：

(一)中国境内一切少数民族实行自决，协助他们组织自己的自治政府，在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处之地，如果汉人占多数，即在该地政府中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

(二)少数民族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武装。

(三)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四)严禁商人重利盘剥少数民族。

(五)禁止汉人一切侮辱少数民族的文字、言论和行动。

(六)邀请各少数民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倘若中国政府不执行上述的政策，赞助各少数民族的独立与自治，而日本帝国主义反用赞助各少数民族的独立自治去欺骗，这是很危险的。这要使少数民族中的一部分感觉日本政府比中国政府和汉人要好，在日本的欺骗之下向中国要求独立，反对中国。要免去这个危险，只有中国政府更在实际政策上去赞助少数民族的独立自治，然后才能揭破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少数民族的独立自治，并不可怕，因为他们独立自治后还可以与中国联合起来共同去反对日寇。可怕的是少数民族在日寇的欺骗与利用之下来反对中国与汉人。错误危险的主张与

政策是中国政府至今还反对少数民族的独立自治。这是实际帮助日寇欺骗少数民族的主张与政策。

只有承认少数民族有独立自治之权——才能取得各少数民族诚意的与中国联合起来去抗日。不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就不能有平等的民族联合。

7 对外政策

抗日政府的对外政策应以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努力取得其他各国的援助及世界的同情为原则。因此应该：

(一)对日绝交。

(二)除开日本的侦探官吏及资本家外，对其他一切中立国家的侨民一律保护。

(三)日本侨居中国的诚实人民，亦予以保护。

(四)优待从日军中俘虏过来的士兵及伤兵，并护送他们回队。

(五)组织与援助朝鲜台湾人民的独立运动。

(六)注意进行国际宣传，努力取得国际的援助。

抗日政府与游击队必须坚决执行这样的对外政策。必须向部队及人民解释侵略中国的只是日本少数的军阀资本家，日本大多数人民是不能负责的，是反对日本政府的，是可能同情中国抗日的。因此杀害日本人民及俘虏兵是错误的。因为这样更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欺骗人民，并使日军中的士兵不敢同情中国，不敢缴枪，不敢哗变过来，这更增加中国战胜日寇的困难。

8 关于群众运动的政策

在抗日政府之下关于群众运动的政策，应该分作以下两方面来说：(一)政府对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的政策；(二)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对各种问题及各方面的政策。

政府对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的政策应该是：

(一)除开汉奸外，保障一切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的自由；

(二)确立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在法律上的权利与合法地位；

(三)在物质上协助群众团体；

(四)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不在组织上去直接干涉群众团体的内部生活。

以上是政府对群众团体及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只有政府允许群众运动的自由，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才能取得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对于政府的忠诚帮助。有些人因为恐怕群众运动反对政府，如是就禁止或限制群众运动的自由，妨害与干涉群众团体的独立，强行委派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或指导员去监视群众，命令改组群众团体等，这样只有更增加群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怨恨，也就更加不能取得群众对政府的帮助。

还有一些人因为要群众有组织的帮助政府，如是就下命令要群众组织起来，甚至强迫群众去加入某种官办的团体。这同样也是不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与自由，同样不能真正组织群众与取得群众的帮助。因为群众是有思想有要求而且能动的人类，群众只有自动的组织起来，而不能被动的组织起来。

至于群众团体对各种问题及各方面的政策应该怎样呢？这是只能由群众团体自己来决定的，政府及群众团体以外的任何其他势力是没有权利来直接干涉的。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种群众，首先自己应该组织起来。在群众自己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种要求纲领上，建立真正

群众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及青年、妇女、儿童等团体。要使最大多数的工人、雇农组织在工会之内，最大多数的农民组织在农会之内。

工会应该按产业与职业的界线，组织起来，成立独立的雇农工会，及各种手工业工人联合会等。在农会中要包括一切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雇农、贫农、中农、富农都在内。但不从事农业劳动的地主豪绅，不能加入。

这些群众团体的内部生活，应该有广泛的民主，一切领导机关由会员选举，经常召集会议报告工作及决定重要问题。这些团体的经费应该独立，征收会费。但在不妨害团体独立性的范围内可以接受会外的帮助与捐款。

这些地区的商会应该动员商民来改组，打破少数大商人的操纵。

救国会、抗敌后援会等组织，在这些地区是须要组织的。但它只应该是各种群众团体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联合起来的组织，而不应该由它来代替与统制一切其他的群众团体。当着基于完全民主制度的政府机构从下至上建立起来以后，这样的政府是比救国会后援会等更高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时候救国会等就不应该再有代替政府的行动。

这些群众团体应该提出自己明确的在当时可能实现的要求纲领，动员群众为实现这些要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而斗争，并进行广泛的订立契约的运动（工人与雇主订立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契约，农民与地主订立减租减息的契约等），依靠群众团体的努力与群众的斗争，彻底实现政府改善群众生活待遇的政策。

为改善群众生活待遇的群众斗争，在这些区域不独不应该停止减弱，相反，应该广大的发展起来，只有这种斗争的发展，才能团结与组织群众，改善群众的生活，实现民主权利，并发动广大群众去参加民族革命战争的最高积极性。反对在抗战时期发展群众改善生活的斗争，认为在抗战时期应该停止一切群众斗争的理论，是最错误、对抗战最有害的理论。因为停止群众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就等于停止群众运动，就不会有群众生活的改善。

在抗战期间，为了对付顽强的资本家地主及不可救药的官僚，群众斗争的方式如罢工示威等原则上均不应该拒绝采用。但是群众团体自己应该切实避免采用足以妨害抗日军事行动的斗争方式。应该采用更多的更复杂的方式去斗争。对于政府的调解与仲裁，不应该拒绝。但群众团体要推定自己认为适当的人去参加仲裁。

群众团体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应该是当时能够实现，对方能够担负的要求。不应提出过高的，当时没有实现可能的及为对方所不能担负的要求。因为过高的要求与过左的斗争方式对群众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抗战都没有好处。

工会、农会是抗日政府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柱石。没有强大而有力的工会、农会作为抗日政府的基础与柱石，抗日政府是沙洲上建立起来的房屋。工会、农会及一切群众团体的中心任务，是在广泛发展群众为改善生活待遇斗争的基础上，引导广大的群众去参加抗日政府与抗日武装部队的建设。派遣自己最好的干部到政府与军队中去负责工作，动员群众去加入抗日军队和游击队，发动群众去参加抗日战争中各方面的工作。

群众团体参加到政府中应该起积极推动政府的作用。应该在政府中提出各种建议及法律命令的草案，应该动员群众帮助政府一切进步的对抗战有利的法律命令之实行，应该与政府中各种错误的主张及消极怠工的官僚和动摇分子进行斗争，要求撤消这些分子，但群众团体不应该代替政府的职权。群众团体直接逮捕与审讯人民，都是不对的。群众团体更不应该与政府整个对立。

在政府公有企业中的工会，除开为改善工人生活而努力外，应发动工人为提高生产而努力工作，提高劳动热忱，劳动纪律，工会并应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这些公有企业的管理。

由工会及政府来监督与管理一切私人企业的办法，是不对的。只对于个别有汉奸嫌疑及怠工的企业，才可由政府去监督。在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如果政府已经实行了民主的改造，群众团体的任务就是：(一)使自己变为真正有广大群众的团体；(二)普遍的彻底的改善群众的经济生活；提高群众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地位，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三)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日政府及抗日军队的一切建设。

六 结 论

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之初，即已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认为全部实现这十大纲领是争取抗战胜利所必经的途径，并且指出目前抗战中还包含着各种缺点，这些缺点如继续存在，就决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并且有遭受严重失败的危险。不幸这些缺点在今天还是严重的存在着，也不幸已使华北的抗战遭受了相当严重的失败。这一方面证明中共中央在数月前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一切抗日救国的领袖和民众应该学习这种血的教训。

游击战争是比正规战争一种更困难的武装斗争方式。因为这些缺点的存在已使正规战争在华北受到失败，如果这些缺点不能全部纠正，那末今后的游击战争也是没有胜利前途的。甚至根本就不能使游击战争广大的发展起来。这篇文章上所提出的各种政策，是根据于中共的十大纲领，是十大纲领进一步的具体化。在游击区域中如果能够全部实行上述的政策，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就可能巩固的建立起来，并可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不论是有无根据地，有无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政府，从游击队产生的第一天起，自己筹措给养，以及对各方面的关系，就必须根据上述明确的政策。抗日武装部队是抗日政府的一部分，武装部队的一切行动必须是根据于抗日政府的政策，代表抗日政府的政策。所以上述各种政策必须首先在一切抗日游击队和军队中部分的与全部的执行。自然这些政策的实行，是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的。比如在小块的不巩固的游击区域中，就还没有全部实施上述政策的条件。但只要一有可能，必须最大限度的实施这些政策。

凡是能够彻底执行上述各种政策的政府、游击队和军队，那它就能取得群众极大的信仰与帮助，它就能够巩固与发展自己，它就能够取得胜利，有光明的前途。凡是不能执行或违反上述各种政策的政府、游击队和军队，它就要引起群众的怨恨与反对，它就不能巩固与发展自己，它就不能取得胜利，没有自己的前途。共产党素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共产党愿意自己成功，也愿一切抗日的政府、军队、团体、党派和游击队大家成功，所以共产党愿意公开的提出自己对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全部基本政策，贡献给华北一切从事抗日的政府、军队、团体、党派和游击队的志士之前！

（编者按：此文系以陶尚行之笔名发表。）

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周　恩　来

这是周恩来先生在临汾党政军民联欢大会上的一篇演讲记录，对目前抗战有重大的贡献。当时会场听众曾自动集资刊印数万分散发。今特专载于此，以备研究与采择。——编者

一　目前抗战形势及其危机

在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后，目前抗战局势，正遇着一个新的危机，这个危机的特点，是政府军队抗战颇难为继而全民抗战，犹未兴起的青黄不接，国内外调停的空气相当抬头。具体的分析来看：

甲、在战局方面——日寇已占领上海，突破松江，我军防线已退至嘉善苏州昆山浏河之线。华北方面，自占领太原后，敌人已进逼汾阳休介子洪镇之线。平汉津浦亦有前进消息。日寇企图是想在稍加整理后，压迫我大军退过黄河南岸，以便其向全世界宣告：华北战事已告段落，上海亦已占领。他将从事于华北自治，上海中立，分化蒙回，捣乱华中华南的计划。这一计划可以在口头的停战协定掩护之下来进行，以欺蒙列强，利诱汉奸，这比明枪真火来得毒辣！

乙、在国际方面——九国公约会议，虽表示了英美的接近与积极，但他们中心仍在调停。他们不愿考虑制裁手段，因此日本愈强硬他们愈无办法，而其调停中心，仍在企图苟安。这只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才能做到，因此，驻沪领事团公开从事和平运动，德意完全赞成日本说话，日本不但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并提出他的六项要求，英美并预言如果日本态度强硬，中国坚持抗战，他们将使九国公约会议延续下去，准备觅取新机从事调停。苏联因英美态度如此，自不能单独行动，虽说他在道义上，在实际上已给了中国以有力的帮助。

丙、在军事上——中国正规军队，现已用到相当的数目，而全民全面的动员，军队的改造，战略战术的改变，后方工作的改善，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没有开始。战争的失利，部队的损伤，给养的不充，这使部份的军人发生颓丧失望的心理。如恃着现有的正规军，持久抗战其胜利信心确已锐减。

丁、在民众动员方面——三四月来，不但政权没有开放，民运也没有开放，直到现在，党部仍固执其统制民运的政策。因此，包而不办，是普遍现象。于是许多大城市民运，反不如过去局部抗战时的活跃，前线则不得民众的响应，后方得不到民众的援助，民众武装不能

组织。这是给日本造顺民给自己造反对者。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

由于上述的严重现象，遂至国内外妥协调解空气渐渐抬头而发生了下列的危机：

甲、汉奸政权的活跃——华北自治政府，上海华北维持会，内蒙独立，汉奸的活跃等等。

乙、投降主义的生长——亲日派的活跃，主张对日直接谈判，英美系的软弱，主张依靠英美谈判条件，没有自力更生的信心。对苏联失望的人，主张结束战争。这一切都是投降主义的变相。汪说主和者是汉奸，蒋亦说抗战到底，目前讲妥协者是汉奸。政府给中国代表团的训令，亦说日军不从中国撤退，没有调解的余地——这是反对投降主义的当头棒！

丙、特殊化思想的增长——从冀察特殊化的影响，至今尚引诱着许多人企图在此特殊化之下苟安。这是可能吗？绝对不可能，而且是创造汉奸，颓丧民气，出卖正义的过渡政治机构。故对日绝交，十分必要，战败不能使中国民族屈服，特殊化，可使中国民族万劫不复！

丁、"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认为军事失败，一切都无办法，不是幸求一拚，便是退求自保；拚而求幸，胜已不可能，便更倾向于退过黄河以自保。果真在华北已无战的可能吗？如无可能，退过黄河也不能自保。故无命令自由退过黄河的是等于让日寇来便利统治华北。

我们为要消灭这一切现象与克服这一切危机而奋斗，而战斗到底。要如此，就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只有坚持抗战，才能得到国际友邦的赞助，才能拒绝任何不利于我们的调停，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二　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及其前途

抗战危机发生了，日寇更集中全力来加深我们的危机。但其中心的一环，仍在压迫我军迅速退过黄河，拿着华北，好做文章。上海原是其牵制方面，次作战线，谁知沪战中的损失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因而进迫苏州，现正向南京前进。但日寇的战略中心，第一步仍在取得华北，故华北的抗战，如真告一段落，抗战的危机，便严重到万分。而且日寇也可以喘一口气再干。

因此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目前太原已失，华北抗战能继续么？能持久么？我们回答绝对的能。

第一、假使中央能有得力的生力军开来，能实行各线配合的出击，能增加生力军到敌人后侧，改变过去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能动员广大民众参战，则华北战争，可转变目前的危机，进入胜利的反攻！

第二、如果上述这些条件一时做不到，甚至于敌人继续前进，占领了我们的渡河点——风陵渡，晋城，企图占领我们黄河要口，我们也还是有办法。在华北在山西进行持久抗战。这持久战有下列各条件：

甲、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村子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即使是铁路公路要道，也不能普遍占据。因之，敌人不能不用汉奸部队来统治许多城镇，用他的重兵火力，巩固他的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来和我们的部队作战。正好，我们便以游击部队消灭汉奸，武装民众，以一部轻装部队袭击，截断敌人大道交通，劫夺敌人辎重弹药，并以

主力部队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证以八路军在敌人后方恢复了十四个县城，烧毁了二十二架飞机，最近又夺回了南怀化，击败了敌人许多前进的部队，就可以相信。

乙、在地形上，持久战也是可能的。因为敌人兵力的准备，只能适用于铁路公路线上，最不适应于山地；且不熟识中国内地道路。而山西全境，冀察西部，热冀边地，都是山地，最便于我军的活动，存在与扩大。

丙、在气候上，外国人总不能较中国人适宜。尤其是冬春两季，更于日军不利。

丁、民众的条件是基本的。日寇侵略中国，不论他怎样欺骗利诱，只能收买少数汉奸，大多数人民的财产是遭蹂躏的。故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战的最主要的条件，敌人愈摧残，群众将愈觉醒起来，为民族的最后生存而奋斗。

戊、民众武装已有了初步的发展。特别是晋冀察边的广大发展，将是我华北持久战的模范根据地。

己、政府领袖和军队他决心成为争取华北持久抗战的主要条件。现在蒋阎及不少军队，正在加强着这个战争。我们还望他们有进一步的全局的布置。

庚、最后，八路军留在华北作战，也为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因为八路军是红军改编的，他有着长期运动战及游击战的素养。他将要发挥他在这方面的特长，来影响友军，来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齐来抗战。

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抗战的极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争的主体，来持久华北抗战。这虽然会有一个时候，但他决不同于六年来的东北四省。他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掩护全国新的军队的组织，全国抗战的开展，也正支持着他，同时也使着日本无法结束他的战争，而要影响着全世界援助中国抗战的运动。因此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他要在持久战中，壮大了自己，武装了人民，恢复了许多城镇，破坏了敌人交通，消减部分敌人，最后得到了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

三　坚持华北抗战中我们的任务

怎样来坚持华北抗战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说的问题，也就是实现华北持久战的任务如何？最主要的我提出四项问题：

第一、军队的改造。原有的正规军，虽越打越少，但打仗要用组织好了的军队来打，因此，改造旧军成立新军，便成为目前迫切的任务了。改造军队，目的不是在换一批人而是在改造他的组织制度。在这里，今后在华北作战的部队，其组织必须适合山地运动战和游击战，应采用三三制，而附有游击队，及轻便后方辎重与多数的通讯资材的编制。其次，政治工作制度必须建立，而且要成为军队的生命线来巩固部队。提倡自觉纪律，保障部队与人民密切关系。其三，部队的生活必须改善，政治生活要平等，连队经济要公开，士兵生活要提高，官兵要团结一致。其四，部队的指挥要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利，要使其能独立作战，分区活动，不怕留在敌人背后，不怕被敌人切断。其五，作战的战略战术要改变，要认识现在是野战，是运动战，是游击战，争人不争地。其六，要建立各部队的后方，要有源源不绝的后方接济，在困难时也要独立自给。这样的军队是活的，是人民的，是革命的军队。这样的军队，这样

的指挥，便能坚持华北抗战到最后的胜利！

第二、开放政权。现在全华北，已不是中华民国的统一政权，而是日寇汉奸的政权。日寇的自治是伪自治，我们应该以真自治来活动民众，开放政权。因此，目前华北的政权，应该是国民政府一部份的地方政权，首先他在制度上应该是民主政治，应该团结全华北的抗日人民，不论何党何派何军，均应容纳他们的代表，来共同担当国事，主持救亡大计。其二、在组织上应该从县区分上施行地方自治自给，以坚持中华民国的正统，然后及于省区。其三、在政策上，应实行抗日的纲领。我们提议应该根据共产党提出的十大纲领来实施战区的救亡政策。

第三、开放民运。华北要再不开放民运，军队就无法补充，作战将无人援助，民众武装将无法建立。强悍者，将受日寇的屠杀，懦弱者，将变为日本顺民，狡黠者，将变为汉奸，而奸商劣绅将首先悬挂日旗，担任维持。我们如不愿意这样，只有无丝毫迟疑的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起来，共同来担当华北的持久游击战，首先应向民众作广大深入的抗日宣传。其二、要组织广大的民众在工会，商会，农会，学生会之中，并吸引他们到政治团体中来。其三、要发动民众为保护其自身利益而斗争，并联系到民族利益上来。其四、要组织他们在武装训练之中，引导其参加人民自卫队，游击队，义勇军，并吸引到部队中来。

第四、肃清汉奸，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是争取持久战的先决条件。只有反对这些汉奸，才能团结全华北人民，全华北军队，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坚持华北持久战争，而取得最后胜利。

（原载《群众》周刊1卷2期，1937年12月18日出版）

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一）今天抗战的形势，急需要有一个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才能有利于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准备参加这样的政府，即直接公开担负政府的行政责任，并在其中起积极作用。然而今天还没有这样的政府，今天有的，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

（二）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即在今天的国民党政府（甲）接受本党所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依据此内容，发布施政纲领时；（乙）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开始表示实现这一纲领的诚意和努力，并在这方面获得相当成绩时；（丙）容许共产党组织的合法存在，保证共产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自由时，中共才能去参加。

（三）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地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因为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人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

（四）但在特殊地区的地方政府如战区的地方政府中，由于旧的统治者已不能照旧统治，基本上愿意实行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公开活动的自由，并且由于当前的紧急形势，使共产党的参加在人民和政府看来，均已成为必要，共产党可以去参加。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

（五）共产党在没有公开参政以前，参加全国国民大会之类的商讨民主宪法与救国方针的代议机关，在原则上是许可的。因此，共产党应力争自己的党员当选到大会中去，利用国民大会的讲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用以达到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在共产党周围，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

（六）共产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在一定的共同纲领并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下，可以组织统一战线的组织，如各种联合委员会（例如国民革命同盟会、群众运动委员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共产党应该经过国民党的这种共同行动，以达到国共两党的合作。

（七）在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红色政权机关改为特区政府之后，它们的代表可以拿自己已经取得的合法地位，参加到一切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军事的和群众的机关中去。

（八）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中央书记处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一封公开的信

陕西省党部诸位先生：

自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在日寇大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前面，我们根据本党数年来一贯的抗日救国主张，曾于七月十九日致书于贵党部，对贵党发起组织之抗敌后援会，表示赞助。为了开放民众运动，增强抗敌力量，以便实现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并向贵党部提出下列六项建议：

一、立刻扩大救亡运动到各县各区各乡各界民众中去！

二、加紧组织民众，对当前各救亡团体加以保护，对一切无组织民众立刻加以组织！

三、武装民众，训练全陕青年壮丁为抗战后备军！

四、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以抗日救国之民主自由！

五、发动民众肃清汉奸，巩固后方！

六、给华北抗战将士以种种切实有效之援助！

这些建议，不仅是全陕民众全国同胞一致的要求，而且也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三个月来，日寇对华侵略战争的炮火，已经蔓延到全中国的领土，三十师团寇军、无数的军舰、飞机、大炮、坦克车、毒瓦斯，横行于中国华北及华南，今日之北平天津，已变为当日之沈阳长春，平绥线上从南口到大同，平汉线上从良乡到保定，津浦线上从马厂到德州，均已先后为敌人占领，目前敌人的铁蹄，则已踏入山东绥远和雁门关内！敌人在上海的进攻，已经继续了两月，敌人的海军，封锁了全中国的海面，敌人的空军，袭击着全中国的城市，敌人的目的，是要把中华民族归于毁灭而后已！

在敌人的侵略战争前面，中华民族已经在中国共产党所指示的抗战道路上怒吼起来了！政府亦已下了抗战决心，神圣的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了！在南口、在上海、在晋北，我们的军队，都同敌人做了最英勇最残酷的抗战！他们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他们光荣的流最后一滴血！这些都是证明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是不能征服的！只要执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抗战方针，我们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然而在短短的三个月内，我们的察哈尔全部沦亡了！我们的河北丧失了大半，我们的山西失掉了一角，我们的鲁绥也被敌人侵入了！如果我们来研究华北抗战的教训，不能不指出这些失利的根源，就在于这三个月的抗战，还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还不是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凭着我们英勇的前方将士，孤单的与敌人肉搏，而不把战区及后方民众发动起来，予以援助和配合！宋哲元氏宁愿将平津拱手让于敌人，而不愿开放民众运动，不愿平津民众武装起来保卫平津！张垣大同没有例外，保定沧州也是一样，这是何等痛心的教训！华北和上海抗战的经验，更加证明中国共产党屡次向全国人民指出的真理，即没有数万万中国民众直接起来参加抗战，那末这个抗战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中国抗战已经发展到今日如此严

重的阶段，我们对于华北抗战失利这些教训，岂能不警惕吗？岂能重复华北与上海抗战中这些错误于今后的抗战吗？不能！不能！一千个一万个不能，否则便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可是我们看看陕西省党部在三个月来对于民众救亡运动是抱着何种态度和采取何种方针呢？芦沟桥事变后，省党部虽然在全国民众热烈的抗战救亡情绪下面，组织了陕西抗敌后援会，但这个抗敌后援会，不是为了开放民众运动，而是为了“统治”民众运动！不是为了扩大救亡运动，而是为了“限制”救亡运动！利用“统一”之名，取缔救亡团体，假借“合法”之权，压迫救亡运动；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与学生救国联合会，党部施行种种压迫威胁阴谋欺骗加以“取缔”，而设计委员会不过空有其名而已；青年学生在街上募捐，党部不准；青年学生演救亡戏剧，党部禁止；青年学生到乡下宣传，党部骂他们是“自由行动”；青年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党部不准他们开会；青年学生在街上讲演，党部派便衣队跟在他们后面；几十种救亡前进书籍杂志，党部下令禁止销售；若干存有救亡书籍的青年学生，党部查出加以逮捕；若干教育界的抗日分子，党部授意撤职了！有的还在准备撤职；若干抗日分子在“汉奸”罪名下逮捕起来了，而真正的汉奸却未见抓到几个！或者抓到手又把他们放掉！党部主要人员正在宣传“读书救国”的理论，周伯敏氏要学生读十年书后再参加抗日！否则便是“汉奸”；公安局侦缉队有人说“现在主要的是对付共产党，汉奸是其次的”，这当然是执行着党部的意志。在二号报上我们看到设计委员会民运组通过一个比较进步的“民运工作纲要”，但四号报上就看见党部方面有人声明那是要不得的！抗敌后援会中间不少对救亡事业的积极分子，但他们不能把自己的热心努力贡献出来！因为当他们真正到民众中去进行救亡工作的时候，党部就说他们是共产党，就要停止他们的工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西安事变特别在芦沟桥事变后，全陕民众对省党部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省党部在抗战发动后能够改变从前对民众运动那种传统的错误政策，我们也曾屡次致书于省党部，要求省党部开放民众运动！但是三个月来省党部始终抱着“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的政策，不但不信赖民众，反而更加惧怕民众；不但不开放民众运动，反而处处限制压迫民众运动！致使三个月来陕西民众救亡运动，不能大大开展起来！几百万民众还在无组织状态！还没有把他们吸收到抗战阵线中来！这是我们认为非常可惜的事！这个责任自然当由省党部负责！

在我们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今天，我们认为民族利益应当高于一切！一切个人利益与一党利益，都应服从于总的民族利益！我们诚恳的忠告省党部诸位先生，请你们把头脑放冷静点！把那些对日寇有利而对于自己民族有害的糊涂思想，赶快清洗掉吧！请你们把眼光放远大点！把对于最忠实于民族利益的共产党的心思和注意力，转移到我们民族敌人那边去吧！不要再斤斤于一党利益和个人利益了吧！诚恳的忠实的拿出力量来为民族解放而共同奋斗吧！这是我们对省党部热烈的希望，也是全陕西全中国民众对省党部的希望！

敌人的炮火与铁蹄，眼看就要到陕西来了！陕西民众，再不能坐着不动！再不能象华北民众一样无组织的听天由命！陕西民众领略到华北抗战的教训，要一致的怒吼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之下，结合成为千百万民众的民族抗战的军队！为保卫西北华北上海与收复失地而奋斗到底！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在西北这个抗战的巨潮即将到来！这是任何力量不能加以阻挡的！我们欢迎这个巨潮的到来，我们愿为这个抗战的巨潮的胜利而斗争！我们希望省党部能有深刻的觉悟，不要再固执自己的错误方针，不要使自己离开这个巨潮，更不要走到与这巨潮相反的方向！我们希望省党部加入这个

巨潮！推进这个巨流！我们希望省党部与全陕西全中国民众站在一起！为全民族的全面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因此我们坚决要求省党部立刻进行自我批评！改变自己过去对民众运动的种种错误政策！立刻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救国抗战的民主自由！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彻底实现我们七月十九日向省党部提出六项建议！彻底实现陕西民众救亡统一战线！

国共合作万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三七年双十节

（原载《解放》周刊24期，1937年11月20日出版）

〔附〕中共陕西省委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争论的真相

从中共陕西省委于双十节写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一封公开的信后，西安各报于十月二十二日登载鲁迅纪念大会一段消息，指谪中共省委的公开信为“汉奸挑拨离间”，于是中共省委有十月二十三日的谈话发表，加以说明。省党部复于二十九日登载“省党部负责人谈话”于西安各报，并指中共省委有与中共中央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相违背。我们最近才获得中共省委一切材料及省党部的谈话；经详细审阅后，认为中共省委的公开信和谈话，与中共中央的宣言，完全一致，而且是具体的在陕西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就是省党部二十九日的谈话，也说到中共省委所提的六项建议，“都是本部本市各关系机关已推行或正在推行的诸项工作”。中共省委的六项建议既是国民党省党部“已推行或正在推行的诸项工作”，又何得指为是“汉奸挑拨离间”呢？如果中共省委的公开建议确系汉奸挑拨离间，那么国民党省党部岂不是自己承认“已推行或正在推行”“汉奸挑拨离间”吗？我们想省党部不会这样做的。这只能证明省党部并不否认中共省委建议的正确，中共省委的建议正是省党部“已推行或正在推行的诸项工作”。这又何能指为与中共中央的宣言违背呢？

这里的道理是很明显的，省党部只是想用“汉奸挑拨”的方法来拒绝中共省委对他正确的批评。这种方法是愚笨的，因为指中共省委为“汉奸挑拨”，这是全国人民所不能置信的，徒然降低省党部自身的信仰。

省党部开始想用否认中共省委的存在来拒绝中共省委的批评，但是中共省委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立场，却愿意派自己的代表与省党部接谈。省党部在这些方法都失效之后，只能出之于一些谩骂。这也是非常愚笨的，因为政治上的问题并非漫骂所能了事的。这也徒然只能丧失自己的信仰。

我们诚恳的希望省党部内开明的国民党负责者，能开诚布公，以自我批评的态度，收回自己的谈话，接受中共省委的公开建议，共同讨论布置和进行陕西的民众运动，这是国家民族之福。

同时我们希望国民党中央党部应当站在为发展陕西民运的立场上来检讨省党部的工作。对省党部内某些不能执行与违反中央党部意旨的份子，给以必要的处分。

因为省党部的谈话在西安各报已登载，而中共省委的公开信和两次谈话均未能在各报公开登出，恐外间未明真象，或信一面之词，故将中共省委的各文件登载“解放”。

——编者11月11日。

（原载《解放》周刊24期，1937年11月20日出版）

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纲——

王　　明

I　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三个主要因素

（1）中国人民力量的团结和统一。

（2）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点和弱点。

（3）国际无产阶级及主要国家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一）国共合作和全国抗战后中国形势中的三个新优点：

A．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的开始：

一、国民政府转到抗日的政策，因此，它已在开始执行中国国防政府的任务。

二、国民政府的法令已开始在全国各地有效，因此，它已开始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政府。

三、国民政府还未能成为能担当胜利抗战任务的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这因为：

甲、它的成分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亲日派分子；

乙、它还只是国民党一党的政权，而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

丙、它还未能实行保障抗战胜利的对内政策。

但是，自从苏区改为民主区而公开宣布服从南京后，地方政权开始取消与中央对立现象，而形成统一国家政权的规模，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这件事实，对于开始抗战，和继续抗战，以及争取抗战胜利，有极重大的关系。

B．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的开始建立：

一、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二、各省地方军队对南京中央军态度的转变。

三、国防会议的召集及各省出兵抗战的事变。

四、统一指挥部的开始建立。

虽然还没有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国家军队，但是，中国军队正向这个方向前进，且已开始有了初步的基础，这一点对于抗战及抗战前途有极严重的意义。

C．政治制度的开始民主化和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的日益增长：

一、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公开和半公开地位之取得。

二、政治犯的开始释放。

三、救国言论机关及救国团体之逐渐合法化。

四、救国运动和救国组织之日益增长。

五、边区在推进全国民主化运动中之作用。

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有充分民主自由及救国运动日益增长，为不可否认之事实。

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在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达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之创造，全中国人民之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

(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华战争中的强点和弱点：

A．强点：

一、军事技术较我优越；

二、海陆空的直接邻近；

三、海陆空根据地的事先准备；

四、汉奸及亲日派的长期培养。

B．弱点：

一、财政的困难；

二、原料的缺点；

三、国内矛盾之增长：

甲、民众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之增长。

乙、法西斯军阀与和缓资产阶级间的冲突。

四、后方的不巩固——日本、满洲、台湾、高丽等；

五、战线延长与兵力分散和消耗之危险。

但是，强点在战争长期性条件下将逐渐减少其效能，而弱点却随着战争之延长而逐渐增强。

(三)国际无产阶级和主要国家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A．国际无产阶级对我同情运动之迅速增长：

一、共产党及民主制度下之群众——对西班牙及对中国；

二、英工党及其工会；

三、法工会；

四、美工会；

（以上各项）对中、对西同情程度之比较。

五、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职工国际之态度；

B．主要国家对中日战争之态度：

一、苏联；

二、法国；

三、英国；

四、美国；

五、德国；

六、意大利。

三个因素中之最重要者为第一个因素，而三个因素基本上均有利于中国人民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Ⅱ　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教训

(一)四个月抗战的事实证明了日寇"以华制华，不战而胜"的政策是失败了，中国无力抗日的不抵抗主义者的理论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及其各党派能够为抗日救国而团结，中国军队能够为民族生存而英勇牺牲奋斗，而八路军的胜利，尤其证明中国军队能够战胜武装优越的敌人；但同时

(二)四个月抗战的过程也暴露了中国的弱点，这些弱点说明了依靠现有政治机构，现有武装力量和继续实行国民政府现有对内政策，是不能战胜日寇的。

(三)北方及上海战线上部分军事失利和领土损失的重要原因是：

A．军事技术的薄弱；

B．一部分将领的叛变与动摇（芦沟桥后的议和与坐失戎机，平津、南口、张家口、大同等例子）；

C．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北方战线的疏忽，上海战线的偏重，正规战的过大损失；

D．武力未与人民结合和人民力量的动员不够；

E．统一战线刚才开始建立（国共两方及地方与中央相互态度的批评），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还未真正形成。

(四)目前之危机——部分军事失利，主和、即主降派势力抬头，日寇以华制华的政策之加紧，德意日争华加入反共同盟企图之加紧，英国之动摇及其主和企图等。

Ⅲ　怎样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决定一切的条件

A．怎样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

一、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枢纽，如何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呢?

甲、在党内外正确说明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因、意义、内容和前途：

(1)原因——反对共同敌人，争取民族生存。

(2)意义——国共为中国两大政党，不合作便无以救亡。

(3)内容——(a)两党的合作，(b)建立统一抗日民主的政权，(c)建立统一的国防军队，(d)保证全体人民总动员，争取抗战胜利。

(4)胜利共同建立新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新式的民主共和国，但还不是非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国家）。

乙、在党内外正确说明统一战线之实质和内容：

(1)一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政治团体。

(2)划分友敌之主要标准（抗日与不抗日），为共同纲领和共同目的而奋斗。

(3)共同纲领外，各有不同的主张，各有不同的组织，因此磨擦可能在总目标下减弱而不会消灭，可以因力量的不同而在民主原则下解决谁占优势的问题，但不应有谁投降谁或谁推翻谁的企图。

(4)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5)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西班牙、德国经验，满洲经验）。

丙、在党内外正确说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间之相互关系：

(1)三民主义主要口号之正确解释；

(2)首先为民族独立而共同奋斗；

(3)共产主义者与真正三民主义者之向前合作；

(4)共产党员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

丁、对国民党中派别的正确认识及我们对蒋及其黄埔系之关系：

(1)分成左中右三派，还主要地是以抗日降日为分野（西班牙例与中国实例）；

(2)黄埔系及国民党中之进步青年应为主要合作之对象；

(3)对复兴社与CC"关系问题"；

(4)对阎及其军队之正确关系。

戊、使党内外对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问题，有清楚的认识：

(1)共同建立新中国；

(2)握紧民族统一战线的武器；

(3)民族战线与人民战线关系。

二、如何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甲、巩固地方政府与军队对国民党及共产党之合作。

乙、设法吸收各种群众团体加入统一战线的组织。

丙、组织广大还无组织的群众——在原则上应该是以加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口号和组织方式。例如：

在工人中——以现有的合法的工会为基础，组织统一的职工会；有组织的地方赤色会员加入，无组织的地方采取合法方式组织，一切组织采取合法方式工作；

在农民中——利用原有的合法形式进行合法工作（合作社、农协、农会、大刀会、红枪会等均可）；

在青年中——建立抗日救国统一的青年组织（少共、民先、学生会、青年会、体育团体等）。

(二)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

具体办法：

A. 逐渐从政府中淘汰亲日派分子。

B. 共产党员及一切反日派别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加入国民政府。

C. 陕甘宁边区正确作用之了解（1）中华民国的组织部分和地方政府，(2)民主化的发动机和模范，(3)八路军和全国军队抗日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及边区问题之必须迅速解决。

D. 八路军新占领区域的正确处置（行政制度及政策均须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发点)。

E. 议会式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问题的正确了解：

一、为什么现阶段上取消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目的及原因；

二、民主共和国的国内和国际意义；

三、民主共和国的实质和形式；

四、边区之选举问题及制度的问题；

五、民主共和国口号主要为求同而非立异。

(三)在现有军队基础上建立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

具体办法：

A． 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改造现有的各种军队。

B． 逐渐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

C． 公开说明军阀与军人问题之相互关系。

D． 扩大国防军的数量。

E． 扩大和改变军队的武装。

F． 建立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

G． 八路军问题：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组织部分。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甲、八路军内共产党员骨干及政治工作制度和革命传统之坚持；乙、如何扩大八路军；丙、如何巩固八路军；丁、八路军对中央及地方军之关系；戊、八路军之模范作用。

(四)动员和武装人民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

A． 利用一切合法可能及一切机会组织各种群众。

B． 如何达到军民一致？一方面靠军队；另一方面也靠人民；共产党是先锋和桥梁。

C． 如何达到武装人民？甲、夺取敌人武器；乙、利用合法方式；丙、要求和取得方式。

D． 改善人民生活问题：甲、可能改善的必要；乙、服从抗战的必需；丙、共产党的领导者的作用。

(五)建立军事工业

A． 设立军事工业部问题。

B． 将现有军事工业集中与分散问题。

C． 建立飞机与坦克厂问题。

D． 整理和增加兵工厂生产问题（枪炮子弹生产问题）。

E． 建立八路军军事工业问题。

F． 培养军事工业干部问题。

(六)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强国际援助

A． 国际同情之增长与国际宣传之薄弱。

B． 加强国际宣传之具体办法：

一、与国民党共同议定计划；

二、各党派及各界团体共同派代表团赴欧美宣传；

三、摄制抗战电影；

四、摄制照片及画册；

五、出版外国文小册杂志及书籍等。

C． 国际宣传之内容和目的：

内容：一、日寇之侵战和兽行；二、中国人民之自卫与正义战；三、中国斗争与世界和平的关系。

目的：一、取得无产阶级及一切和平民主力量的同情；二、达到不卖给日本军火原料和抵制日货的目的；三、达到中国政府有购买军火原料及运输军火原料入口自由的目的；四、取得其他物质的援助。

D． 苏联之对外政策及援助问题：

一、苏联和平政策之实质及其对战争问题之根本态度。

二、苏联与援助其他国家革命问题。

三、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与一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四、资本主义包围与苏联外交政策。

五、国内外“谁战胜谁”问题的意义和现势。

六、目前国际形势与所谓“出兵”问题。

七、现势中苏联对外政策之特点。

E． 对内政策及对外政策之相互关系：

一、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对外（英、美、法）问题中之作用；

二、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相互联系（西班牙的例子）；

三、如何能达到对内动员人民和对外使日孤立的目的？——苏维埃与民主，民运与抗战，国共合作与政策问题等。

最后，中国国内团结与坚决抗战，是取得外援的最重要的和决定意义的条件。

（七）如何使共产党成为全中国范围内的政党？

A． 巩固和增强共产党的领导及其领导机关和人物的威信。

B． 建立各区域的独立工作的领导机关和党的组织，建立全国交通网。

C． 发行日报及统一宣传。

D． 征收党员和增强工人成份，改变工作方法与组织方式。

E． 加强党内马列教育。

F． 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培养大批新干部，培养军事技术干部及专门干部，实行建立全中国青年救国联合的工作，加强党在青年工作中的责任，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

G． 加强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准备召集六中全会和七代大会。

（八）提高革命警觉性和加紧反奸细反托派的工作。

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

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全国各界同胞们！

自芦沟桥事变以来，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对暴敌已进行了五个半月的英勇抗战；虽然由于日寇军事技术的优越，由于我国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存在有不容否认的弱点，以致平、津、察、绥、太原、沪、宁相继失守，遭受部分的领土损失和暂时的军事失利，然而五个半月的英勇抗战，表示出我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觉醒，造成了我民族力量空前未有的团结，显示出我军将士惊人的英勇牺牲精神，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提高了我民族抗敌致胜的信心，相当地打击了日寇的凶焰，部分地消耗了日寇的力量，增加了日寇前进的困难，助长了日寇内部的矛盾，同时，增加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进步力量对我人民和政府的同情和援助，因而也就奠定了我们今日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宣言：蒋介石先生本年十二月十六日告全国国民书所提出之“贯彻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之主旨，与本党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正相符合。中共中央坚决地相信国共两党同志和全国同胞，定能本此方针，亲密携手，共同奋斗。

中共中央郑重地向全国同胞宣告：我国抗战目前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困难关头，然而部分领土和中心城市的得失，初期战线上的部分军事的成败，均不能决定中日战争的最后命运；而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坚强团结和长期艰苦抗战之毅力与信心，实为争取最后胜利之保证；且目前最大难关，既不在于兵力不济、武装不足和财政困难，亦不在于日寇的前进深入，而在于日寇于暴力之外，又加紧“以华制华”的企图，并在于汉奸、敌探、托匪等正在加紧挑拨离间以破坏我国民族力量团结的阴谋，尤其在于我国民族力量的团结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

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同胞宣布：当此民族危机更加紧迫之时，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实为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团结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根本方策，在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则为巩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中共中央认为当前足以告慰于全国同胞的，就是在国共两党方面不仅都有了更加精诚团结必要的认识，而且都有了更加亲密合作的决心，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在目前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相信国共两党同志和全国同胞，为保证继续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定能共同努力实现下列工作：

（一）动员全中国的武力、人力、智力、财力、物力，继续守土卫国的长期抗战——这首

先要坚持华北和东南的持久抗战，巩固江防，保卫武汉，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援助东北及各地的义勇军，来击破敌人的前进，阻止敌人的深入，以便争取时机，加强力量，准备进行决定的战斗。

(二)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武装上，加强现有的军队，建立新军队，有组织的进行征募兵役运动，使我国在持久抗战中，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三)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吸收坚决参加抗战的各党派各团体的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刷新各省吏治，肃清贪污腐化分子，使政府一切机构和施政方针，能适应抗战胜利的需要。

(四)实行国防经济政策——首先须努力建立军事工业，加速军事交通和实行战时财政政策。

(五)建立巩固后方，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协助军队和政府积极抗战——一方面坚决肃清汉奸、敌探及日寇走狗的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另方面广大地动员组织和武装政府统治区域和被敌占领区域的民众，使之积极参加各种有利于战胜日寇的工作，同时加紧动员千百万国外侨胞尽力于保卫祖国的各种事业。

(六)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

中共中央坚决相信，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力量定能在最近期间内，共同完成这几项迫切的基本工作，我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中华民族，在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民和国家的同情援助之下，定能在持久抗战中，最后战胜内受人民仇恨外遭列强疾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挽救时局的关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王　　明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十二月二十五日对时局宣言）郑重地向全国同胞指出："我国抗战目前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困难关头：然而部分领土和中心城市的得失及初期战线上的部分军事的胜败，均不能决定中日战争的最后命运，而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坚强团结和长期艰苦抗战之毅力与信心，实为争取最后胜利之保证。目前最大难关，既不在于兵力不济、武装不足和财政困难，亦不在于日寇的前进深入，而在于敌寇于暴力之外，又加紧'以华制华'的企图，在于汉奸敌探托匪加强挑拨离间以破坏我国民族力量团结的阴谋，尤其在于我国民族力量的团结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先生也说："外敌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由此可见，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同时，事实已经确切证明：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策，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怎样才能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首先须更加巩固和扩大我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大家都晓得：国民党已经实行了联共抗日的政策，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名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苏区已改为中华民国的边区，因此，国共合作的基础，实际上已经奠定了。但同时，大家也晓得：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种种原因，国共两党的合作，直到现在，还未达到中国现时环境和两党主观愿望所要求的应有程度。因此，当目前民族危机更加紧迫的困难关头，怎样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团结，已经不仅成为国共两党同志所日夕关切的问题，而且已经成为每个关心国事的同胞和每个中国友人所深切系念的问题。

怎样才能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呢？一方面，须要将有关两党合作的各种基本问题解释得清楚明白；另方面，须要采取许多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的具体办法。应当毫不隐讳地说：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虽然国共两党领导机关和大多数党员都有了两党合作必要的组织和决心，虽然国共两党合作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事实，但是，在两党方面的确都还有少数人不清楚了解两党合作的许多基本问题。

这些人不清楚了解的有那些主要问题呢？

第一，他们不清楚了解今天两党合作的主要原因和主要目的——他们不清楚了解，今天两党合作的主要原因，不仅由于十年来的沉痛经验和教训证明，国共两党的合作，能使中国达到独立自由的境地，国共两党的分裂，造成十年来的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局面；而且首先

由于在国共两党和全中国人民面前，扑来了穷凶极恶的公敌——日本法西斯军阀；因此，他们有时忽略了甚至忘记了今天两党合作的主要目的，便是共同战胜民族公敌的日寇，以争取和保障中华民族之生存和独立；因此，他们有时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共同纲领，于是忘记了以抗日与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于是忽略了"凡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敌"的简单真理，于是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因为有时把其他问题与抗日问题并列或对立，以致模糊了今天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有时甚至把抗日问题看得比其他问题为次要，以致引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垒中的许多不应有的磨擦或裂痕。

第二，他们不清楚了解对统一战线中的友党应有的态度和方针——他们不清楚了解，统一战线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的政治团体，在共同纲领基础上为反对共同敌人和达到共同目的而共同自愿的团结，他们不清楚了解，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友党友军力量的削弱即等于自身力量的削弱，即等于敌寇力量的助长，即是为"仇者快"和"亲者痛"的事情；他们不清楚了解，在统一战线营垒中有时某些磨擦虽难于完全避免，但双方应该设法减弱磨擦以增进共同抗敌的效能，而不应故意去挑动和扩大不必要的磨擦；因此，他们不清楚了解，对同盟者应有态度不是一方面压迫另方面或者一方面投降另方面而是双方面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因此，他们不清楚了解，对同盟者应有的方针不是互争雄长互相倾轧和互相捣乱，而是双方面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和共同胜利；因此，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有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对付敌人的态度和手段拿来对付自己的朋友，因而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作下了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和有利于敌寇的事情。

第三，他们不清楚了解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他们对于中国现在所处的具体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认识不清楚，他们对于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得还模糊，因此他们看不清楚中国最近历史时期应走的道路，因此他们时常容易听信日寇和汉奸有意散布的各种谣言，因此，甚至那种最无根据的所谓"抗战失败了是日本人天下，抗战胜利了是共产党组织苏维埃的天下"这类挑拨离间之词，对他们还能发生若干的影响。我记得，还在今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后，便有过这种类似的谣言，那时便有人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不过是一时的手腕；在这种合作建立以后，或者更具体些说，在反日斗争的终结甚至过程中，共产党员一定很快掉转枪头去反对国民党。"当时我们对这种说法便曾公开地回答说："第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和为中国民族独立的斗争，一般地讲来，绝不是一件很容易和短时间的事情；第二，中国共产党员不仅希望与国民党在反日斗争的期间合作，而且准备着与一切优秀的国民党员——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一起，为伟大中国人民的完全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将来而奋斗。"（见拙著"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现在，为的使这个问题有更清楚明白的了解起见，我认为必须更明白地解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现在阶段上放弃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的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在现在阶段上放弃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并将苏区改为中华民国底边区的这件事实，既不是仅仅将苏维埃改变一下名称，也不是玩弄一下什么暂时的手腕，而是真正地在一定革命斗争阶段上改变了自己的革命战略方针，即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更，根据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团结全中国一切民族力量去实现抗日救国的任务，自动地由原来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的战略方针转变到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所提的这一民主共和国的性质，虽不能不有别于

过去历史时期中由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所形成的欧美某些国家的旧式的民主共和国，但它还绝不是苏维埃式的或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共和国，它将是而且一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胜利过程中产生的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是一切参加对日抗战到底的各种力量所共有的民主共和国。由此可见，听信"抗日胜利了是共产党苏维埃的天下"这种谣言的人，至少是对于共产党在现在革命阶段上的政策的实质不曾真正了解。第二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就是中国现有的实际情形。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形是：如果国共两党以合作的力量和方式达到驱逐日寇出境的胜利，那么，国民党在实际上证明其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国民党的领袖蒋先生及其他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那时候，谁能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而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呢？当然，同样，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将是更加为中国人民所爱戴和拥护的重要政党之一，谁也不能违反民意而进行打倒共产党的行动。那时候，很明显地，国共两党将因患难相共艰苦共尝而更加亲密携手地进行共同建国的工作。如果不幸而抗战失败，国共两党将为反对共同死敌而更加互助之不暇，更那里谈得上谁打倒谁呢？由此可见，听信"抗日胜利了是共产党苏维埃的天下"这种谣言的人，不但是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形太隔膜，而且是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无信心。这显然是非常有害的事情。

由此可见，明白地解释有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各种基本问题，首先是使大家明白了解：今天合作的主要原因，为民族大敌当前；今天合作的主要目的，为共同抗日；对同盟军的应有态度和方针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前途，应当是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都是现在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

为了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现在须要采取那些主要具体办法呢？

第一，须协商和通过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第二，须成立一个由国共两党代表组织的经常协商和计议各种问题的组织；

第三，在军事问题、政府问题和民运问题各方面，国共两党应该更加巩固和扩大合作的范围和程度，以便达到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加强和充实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真正达到全中国人力、武力、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对日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目的。

只有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才能真正更加巩固和扩大团结全中国人民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同时必须清楚明白地承认：国共合作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中心，但决还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在国共两党之外，一方面，中国还存在有若干已经有组织的党派和团体；另方面，还有极广大的尚无组织但必须组织的各阶层的民众。因此，国共两党必须共同努力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即是将国共两党以外的一切抗日党派团体和广大民众吸收和组织到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怎样才能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呢？同样是，一方面，必须清楚明白地说明与此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另方面，必须采取许多有效的具体办法。

有那几个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关的主要问题必须说明呢？

第一，必须承认国共两党以外，在中国还有其他抗日党派和团体的存在——不错，国共两党是中国力量最大和群众最多的政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同时，从严格意义上说，除国共两党以外，在中国的确没有其他的群众性的政党；但是，必须承认：国

共两党今天还未能包括中国社会中的一切抗日力量。在国共两党之外，因中国社会的各种历史条件的关系，还存在有相当数量的政治集团。他们虽然都未形成群众性的政党组织，但他们当中有许多已经形成为相当的政治派别。为着团结全民族力量去进行抗日救国的事业，国共两党应该共同设法吸收他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中来。

第二，必须打破三人称派五人结党，甚至把汉奸敌探（例如日寇特务机关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徒等）也当作党派看待的错误倾向——必须明白认识：团结各党各派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的最主要的意义和内容，一定是团结真正抗日的各党各派，汉奸敌探如托匪之流，不仅不在统一战线对象之列，而且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和必须反对的对象；此外，能以某个党派名义和资格去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一定要有相当数量的党员或会员以及相当可观的群众政治影响，否则五个人也有自命为一个党，三个人也造成一个派，结果不仅不能真正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团结，而且恰恰足以增加抗日力量团结的困难和障碍。

第三，必须除党派之外，努力将各界群众团体算入抗日统一战线力量之内——指明工农军学商各界群众团体应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参加者和组成员；只有将各种群众团体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一方面才能真正扩大和强固抗战的力量；另方面才能更加巩固和扩大政党军队和政府与广大民众的亲密关系。

第四，必须解除抗日力量内部的各种不恰当的有害的误会——首先必须解除一部分人士对于救国会或国民党内某部分人们的误会；例如，有一部分人硬要把救国会的抗日爱国志士们叫作“人民阵线派”，另一部分人硬要把国民党中某部分参加抗战的朋友们叫作“法西斯蒂派”。大家应该说句公道话：中国既没有什么人民阵线派，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我所以说中国没有人民阵线派，这不仅由于救国会的朋友们再三恳切申明过他们的主张绝不是什么人民阵线，而是抗日民族联合战线或抗日救国阵线；而且是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事实证明了：中国今天只能有反抗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绝没有反对内部敌人的人民阵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地，与人民阵线有分别；人民阵线主要地是劳动者的阵线，它首先反对的是人民的内部敌人；而民族战线不仅比人民阵线的社会成份要广泛得多，而且它的锋芒是用去反对外国的敌寇及其走狗的。我所以说国民党内部某部分朋友们不是法西斯蒂派，也不仅是由于这些朋友们再三坦白说明过，他们绝没有什么法西斯蒂一类的组织，他们相信的依然是中国国民党；而且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证明说：中国今天只能有反抗法西斯民族侵略的理论和组织，绝不应有赞助法西斯民族压迫的言论和团体；中国优秀青年今天只能追求和信仰推动社会进化的思想和组织，绝不应堕入和误信反社会进化的主义和团体；国民党员应当是忠实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学生，绝不能成为背叛总理背叛三民主义的反动的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信徒。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三民主义的根本主张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实质恰为民族侵略、摧残民权和戕杀民生。因此，谁也不能相信：任何优秀的国民党员愿从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变为反动的法西斯主义走卒。我们相信，救国会的朋友们和国民党内的某部分青年们，都是中国社会中的抗日救国的一部分力量；因此，我们诚恳希望他们相互打击奸人的各种挑拨离间，手携手地共同奔赴抗日救国的战线。

由此可见，明白地说明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关的各种主要的问题，首先是承认国共以外有其他抗日党派的存在和有吸收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必要；其次，认清

汉奸敌探不但不在联合团结之列，而且为统一战线反对之对象；承认吸收已有组织之群众和组织及还无组织之群众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以及解除一部分人错认救国会为“人民阵线派”或国民党内某部分人为“法西斯蒂派”的误解：这都是现在在国共合作基础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

为的在国共两党基础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天须要采用那些主要办法呢？

第一，须将国共两党以外其他一切真正抗日救国的党派，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中来，为共同纲领而奋斗；

第二，须使现存的各种工农军学商群众组织，有权利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中来，增大抗日救国的力量；

第三，须将还无组织的广大各界民众，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方式组织起来，使他们能成为有组织的抗战生力军。

只有巩固和扩大以国共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更加巩固和扩大全中国民族力量的精诚团结；只有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有组织的力量，才是世界上任何势力不能征服的力量，才是能够最终战胜日寇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保障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必须记住和认清：中国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坚强团结，不仅是克服我国目前抗战内部严重困难的唯一基础，而且是增强国际进步力量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给予深刻同情和有效援助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不仅是挽救目前危难时局的中心关键，而且是实现“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主张的基本保证。

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

——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一九三八年春季彭德怀同志在三四三旅团级以上党的活动分子会的报告大纲——

一　目前抗战的形势

1．中国抗战的现状和估计

（一）华北基本区域已被日本占领，长江流域敌自占领松沪、南京、芜湖后，仍继续沿江而上，以占领武汉为目的，进占首都之敌，渡江由浦口向徐州西进，企图占领陇海铁道，截断山东后路，在南方，日敌除轰炸各重要城市外，亦正积极向闽、粤沿海及内地活动。所有这些，证明日本军阀的野心，非至灭亡全中国不止。

（二）敌人企图以占领南京，来威逼分裂中央政府，承认其已占领的区域，迫蒋下野，组织亲日政府，但因为全国人民均已认识，和平妥协便是灭亡，只有继续抗战才有生路的形势，并未为日寇和汉奸亲日派的挑拨威胁所动摇，蒋委员长十二月十六日的告国民书，更给了日寇和亲日派以坚强的回答，抗日战争，仍在继续发展着。

（三）不可否认的，五月来的抗战，中国遭到了部分的严重的失利，领土的被占领，军队的消耗很大，但这仅是暂时的部分的锉折，绝不是最后的失败。最后的谁胜谁败问题，要在长期的持久战中去解决。

（四）敌人虽已占领了我国的大块领土，取得军事上暂时的部分的胜利，但是遇着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付了很大的代价，特别是军队的消耗（伤亡在二十万以上，国内征兵已到第三期），财力的损失（战争公债已准备发第二期）等。这证明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反之，我国则能在持久抗战中生息与加强自己的力量，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2．军事上失利的原因

（一）日寇强于中国，特别是凭借了它的优越武装力量，中国则国防力弱，技术远落后于敌人。

（二）日寇有长期的准备，与有计划的进攻，中国则没有。

（三）日寇有汉奸、亲日分子、托派作内应（供给情报分裂统一战线，散布和平妥协空气等），而中国现尚未取得日本国内反战运动的有力响应。

（四）日寇有德、意法西斯阵线的帮助，中国仅有少数民主国特别是苏联的帮助，英美今天还是动摇的态度。

（五）最后，也由于中国本身的错误和缺点，如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某些错误，军队还未完全统一指挥，军队与民众关系尚未密切结合起来，群众的动员和组织非常不够等等。

主客观上的弱点和某些错误，都是可以变动的，主观的错误可以纠正，客观的形势亦正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变化，在长期抗战中，我们的力量逐渐变强，敌人则逐渐变弱，我们能够

最后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3． 五个月抗战的收获

(一)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全国的统一与团结。

(二)国民政府开始起了国防政府的作用，政府的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有效。

(三)中国政府开始了初步的民主，如各党各派已取得公开和半公开的合法地位，及政治犯的释放，民众的战争动员等。

(四)全国军队的参加抗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自卫解放战争，使全国军队开始了统一，开始起到国防军的作用。

(五)提高了民族抗战的自信心，粉碎了恐日病和积弱的传统。

(六)提高了中国在国际间的地位，取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与赞助。

4． 目前时局的危机与困难

(一)由于抗战的局部失利，使汉奸、托派、亲日派的活动表面化，他们以似是而非的词句和方式来破坏统一战线，以无力继续抗战来主张屈辱投降。但他们亦有其弱点，主要是：(A)无民众的拥护，民众要抗战。(B)没有军队力量，军队在抗日派手里。

(二)抗日派内部，部分人的动摇，感觉军队消耗太大，无法接济，缺乏坚强的胜利信心，同时也由于各党各派对统一战线的认识不够，可能产生离心的倾向。

(三)政府和军队的进步，还落后于抗战的需要，还需要我们努力的推动。

(四)财政经济与军火接济的困难。

中国现在已处于上述危机与困难中，需要努力去克服。

二 中国抗战能否胜利

1． 中国持久抗战胜利的因素

(一)中国已在抗战中，走向团结与统一，抗战愈持久愈坚决，国内的团结愈统一，亦必愈扩大与巩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充分具备了持久抗战的条件。

(二)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与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时的形势，有基本的不同。那时，国际资本主义是处在暂时局部稳定的时期，今天则不然。同时主要的民主国家，对中国的自卫战争，表示同情与援助，英美虽仍未终止其动摇，但一般是向反日方向发展。即德国虽在基本上是站在日本方面，但仍有矛盾。国际工人亦给了我们以同情的援助（如英国工党，美国工人联合会，法国工会等均起来抵制日货，反对运输军火供给日本）。

(三)日本内部的困难矛盾增加：日本虽有技术优于中国的军队，但仍有以下的弱点：(A)财政经济的困难。(B)军事原料的缺乏。(C)国内矛盾的增长，反战反法西斯阵线在发展着。(D)日本深入中国内地，战争愈持久，战线愈延长，其后不巩固。(E)朝、台、满人民的反日运动之增长。

2． 巩固与扩大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我们应紧握住统一战线的武器，团结全国力量，坚决抗战到底，我们的口号是：

抗日高于一切！

一切为着抗日！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三　统一战线的实际运用

1．五月来的经验和教训

党的正确领导停止了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国的抗战。但因为有下面的缺点，使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应有的开展与巩固：

(一)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由不抗日转到抗日，由剿共转到联共等等），使国共合作的程度没有得到应有的进步。

(二)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国防政府的作用，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国防军队的作用估计不够，因而对友军的团结赞扬与帮助不够，加之强调独立自主的结果，也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磨擦，反而给了亲日分子以分裂统一战线的口实。

(三)过分强调了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因而把民生与民主的口号与抗日的口号并列起来，有时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实现民主与改善民生是保障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但有时过分强调民主民生的结果，反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磨擦。

(四)对于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对友党友军的批评态度的原则，在运用上欠审慎，因而引起一些刺激与反感，然而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亦仍然保持过去的成见阻碍了两党的合作与发展团结巩固。

2．统一战线的认识

(一)巩固与扩大国共合作的基础，首先建立两党合作的明确观念：

(1)国共合作是各党各派各军建立统一战线的枢纽，国共两大政党不合作，便无以救亡。

(2)国共两党应是长期的合作，共同担负起统一政权、统一军队，保证全国人民总动员，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实现民主共和国的伟大事业。

(3)两党的合作是平等的，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如满洲共产党帮助组织国民党），谁想领导谁，都是不可能的，谁要吞并谁，谁要消灭谁，谁便犯了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

(4)正确说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应是"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现阶段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应与革命的三民主义者彻底的合作，反对假的与曲解的三民主义。

(二)在党内外正确说明统一战线的实质和内容：

(5)统一战线是全国各党各派的政治联合，是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独立和解放的共同任务下联合起来的。

(6)认清今天的敌友，其主要标准是抗日与降日，一切抗日的人都应吸引到统一战线中来（包括地主阶级），今天抗日就联合，明天降日就反对。

(7)各党各派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互相发展（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均是如此）。

(8)统一战线应是长期的，应相互采取诚恳的态度，不应有谁想谁投降，谁消灭谁，谁削弱谁的观念，因为这是破坏统一战线的。

(9)统一战线的前途，是建立独立自由和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新中国，而不是苏维埃的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10)统一战线应有共同的纲领，基本上应采用我党提出的十大纲领，但不是马上能够完全的实现（不可能），而是逐渐的争取实现。

(11)统一战线中，因为是各党各派的联合，磨擦是难免的，但应避免不必要的磨擦，既对民主与民生的斗争，也应采取推动与调解的方式去解决。

(12)在统一战线中，应保持我们的批评态度，但是诚恳的善意的而不是站在岸上说风凉话，对友党友军的好处，应奖励与发扬，而不是只宣传自己的好处。

(13)对国内营垒的分法应是亲日派和抗日派，分为左派中派右派的方式是不妥当的，反可给亲日派以分裂的口实，CC、复兴社不是法西斯，因法西斯主要的是侵略者，而CC、复兴社今天是抵抗侵略者。

3． 怎样去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

(一)巩固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合作，地方军与中央军的合作，及与第八路军的合作。在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与国防军队，减少地方与中央的磨擦，统一军队的指挥、供给、加强与扩大各军的战斗力量（不是改造）等。

(二)在政府中实现：

(1)逐渐淘汰亲日分子，争取动摇分子。

(2)吸收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有威望有能力的分子，加入政府。

我党在下列两个条件下，即可加入政府：

(1)这个政府坚持抗战，反对和平妥协。

(2)容许各党各派联合起来，参加政府。

(三)吸收各种群众团体参加统一战线的组织，未组织的群众应以扩大统一战线为中心，运用各种合法形式的组织，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

(四)密切军队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1)实现军民一致，动员民众帮助友军，巩固友军。密切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调解政府与人民的争端。

(2)这些工作，共产党员应起到先锋的作用。

(五)边区作用之正确的了解，应该是：

(1)中华民国的组织部分和地方政府；

(2)民主化的模范和推动者；

(3)八路军和全国抗日友军主要根据地之一。

4． 八路军的工作

(一)八路军应组织推动坚持华北山西抗战。

(二)不管在恢复区域或其他区域均应：

(1)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

(2)一切行政制度仍须保持旧有形式，但须帮助其进步，使之适合于抗日的需要。

(三)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组织部分，同时应在下列三个条件下保持其光荣的传统：

(1)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2)保障工农成份的绝对优势。

(3)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加强各种教育。

(四)对山西当局及军队应尊重，与帮助其恢复和扩大力量，帮助其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多建议少号召(不是不号召)。多说诚恳的话，巩固山西统一战线，对全国有重大意义。

(五)八路军对中央军地方军的关系要很密切，反对自骄自大。

(六)八路军应在民族抗战中，起到一切模范作用。

(七)八路军本身应加强教育，和党的工作，在目前应继续克服堕落与忽视本军传统的倾向。

5. 肃清托派

(一)托派是日本在华的奸细和侦探，他主要以两面派的方式，进行挑拨离间破坏统一战线的工作，供给日寇以情报，帮助日寇的进攻；

(二)如果以为中国的托派，在实质上与世界托派有多少的不同，那是非常错误的，结果必会放松我们对托派的警惕性；

(三)我们应不断的揭破托派的阴谋，号召群众来肃清托派。

四 保障党的独立性

(一)保障党在政治上织组上的独立性，党的组织应更严密。

(二)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应在每一具体环境具体事实上去进行，机械的划分某一时期以左倾或右倾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

王　　明

三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三天会议，议事日程是：（一）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二）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在报告和讨论中，充分的表现出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

一　目前抗战形势的估计

在报告和讨论中，大家都一致认为：从去年十二月上半月前一次政治局会议到现在的三个月过程当中，我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表现一些新的进步，军事方面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

(一)南京失陷后一部分军队溃退的现象已经克服了；

(二)我国军队在第一期抗战中所受的相当严重的损失，在基本上已经补充起来了；

(三)我军作战的战略逐渐转向到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的战术也较前更广泛的运用，并且开始收到这一战略转变的成效；

(四)军纪和士气的提高，军队一般的都提高了作战能力和牺牲决心。如在第一期作战时，战斗力较强者为中央军、两广军、八路军等，而第二期作战中，其他各部队均有显著的进步；即有些原来抗战不力的部队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而英勇地走上抗敌的前线为国效命；

(五)大部分部队能够留在敌人占领区的后方和两翼坚持抗战；

(六)大批新的军事的、军事政治的和军事技术的青年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开始具体准备建立有新式武装技术的部队；

(七)空军力量的增长和空军战斗的屡建奇功；

(八)政治部组织的成立和工作的开始。

政治方面的进步，主要表现在：

(一)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有进一步的巩固；

(二)政府中骈体和重叠机关的裁撤，军事委员会效能和威信的提高；

(三)对抗战将士奖惩条例的颁布和执行；

(四)惩治贪污明令的颁布和在有些地方开始反贪污的斗争；

(五)许多省分庶政开始有部分的改革（如山西省明令废除苛捐杂税，广西、广东方面

民众运动和民众武装工作的更加开展；安徽、山东、湖南各省的政务开始改进等)；各省开始大批培养青年政治工作干部；

(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式的民众运动有初步的开展。

同时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第二期抗战中的这些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进步，远赶不上日寇继续侵略和民族危机继续加深的速度和程度；我国这些进步，不仅还未能造成全线反攻驱逐倭寇收复失地的一切必要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条件，而且还不足以打破敌人第二期进攻的主要危险。敌人的第二期作战计划的中心内容是：打通津浦平汉，联贯自己南北的交通；截断陇海粤汉，断绝我国的国际联络；完全占领山西、河南，部分地占领陕西(特别是潼关、西安一带及陕北边区)，以便达到肃清黄河北岸我国军力和包围武汉以至占领武汉的阴谋。敌人企图实现这一计划，以便达到巩固其第一期作战收获和准备其第二期进攻基础的目的。两个月来虽然我军在山西、山东、河南各个战线上给了敌人以多次的打击，消耗了敌人的部分军力，挫折了敌人的战略计划，但是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的危急情形依然继续，武汉被包围威胁的危险形势依然存在。而如果为北方锁钥，西北门户和武汉屏障的山西、河南、陕西等省不能免于被敌盘据，如果，中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武汉不幸终于被敌占领，则我国的抗战，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要处于比今天更严重更困难的局面；因此，保卫山西、河南、陕西以达到保卫武汉的目的，是一切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今天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

二　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有许多人问："现在我们固然要用一切力量去达到保卫武汉的目的，但是，设若万一不幸而武汉不保，中国是否能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呢？"政治局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我国军民现在应当尽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来达到武汉不被敌占领的目的；同时，并且应当对保卫武汉事业具着最高度的热忱和抱着最坚强的信心。但是，我们也应当有更深远的认识和更长期的准备，即我们应当假定和确定：在武汉不失的条件之下，我国固然能够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即在武汉不守的情势之下，我们抗战虽然要遭遇更大更多的困难。但继续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依然存在的。

有那些基本条件决定我国能够继续长期抗战和能够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呢？

第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件，是我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本身具有伟大的能够坚持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许多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就是：

(一)全民族力量的坚强团结——首先是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

(二)全国统一的政府，数百万统一的军队和民众武装的存在和发展；

(三)最众多的人口；

(四)广大的领土；

(五)丰富的物产。

正因为我国具有这些优良的基本因素，所以敌人虽然能挟其较我优势的兵力，六年之内占领了我东北辽、吉、黑、热四省领土；八个月之中又占领了我冀、察、晋、绥、鲁、江、浙七省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最近又将其兽蹄践到皖、豫两省一部分疆土；但敌人"以华制华"和"速战速决"的企图均宣告破产，而我国的抗战力量却再接再厉，屡败屡战，愈战愈强。

也正因为我国具备有这些优良的基本因素，所以，不仅使我们保卫武汉和第二期作战抱着极大的信心，而且使我们敢于假定和相信，即在武汉不保的情形之下，我们依靠着湘、赣、闽、粤、桂、川、滇、康、藏、陕、甘、宁、青、新等十四省区两万万以上的人口、广大领土和富源作根据地，配合以我国广大军民在敌人占领区域中的广泛运动战和游击战，定能坚持长期抗战并在长期抗战过程中达到消耗敌人以至最后驱逐和歼灭敌人的目的。

第二个条件是敌人具有的许多重大困难和弱点。这些困难和弱点是：

(一)财政的困难和枯竭——敌国内公债已达一百七十万万的巨额，对外借款发生空前的困难，人民的捐税负担已非常繁重，战事的消耗是与日俱增（在战争开始时，敌人每日军费消耗，即在五百万日元以上，现在当已数倍于这个数目了），对外商业是与日俱减。

(二)军事工业原料的缺乏——钢、铁、汽油、棉花、橡皮等重要军事工业原料敌国内均极感缺乏，平时即主要地仰给于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印度、荷兰和中国，战时更极端感觉到这些原料品的缺乏；如果国际工人团体——首先是运输工人国际反日援华运动能有更大的开展，真正作到不运军事原料和军火到日本去，则敌人便很难支持较长期的对华大规模作战。

(三)国内反战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众运动日益增长——敌国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在平时已感受到极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痛苦；几年对华战争的结果，使民众的生活更加处于水深火热的状况之中；大批壮丁被征入伍和被迫送来中国作战，使农村经济遭受打击，使许多家庭失去父、子、兄、弟、丈夫，以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六七年来日本法西斯军阀所努力进行的“占领满洲，日本一切困难问题都可解决”的宣传，事实上既经证明失败，多年来日本法西斯军阀所狂喊：“三个月内，皇军可以完全占领中国”的谰言，事实上也宣告破产，日本广大劳苦群众从自己切身经验中日益感觉到：法西斯军阀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不仅是反对中国人民利益的，而且是违反日本劳苦民众利益的；不仅是无端加中国人民以无穷的灾难，而且是借端加日本人民以无限的痛苦。因此反战反法西斯的民众运动，在日本国内不断增长起来。虽然因为法西斯军阀实行严密的新闻统制政策，日本民众的许多壮烈的反战反法西斯运动，外间不能完全知道，但即从敌人报纸和外国通讯上有时偶然发表的片断消息看来，也可看出这一运动的严重性：许多次成团的士兵公开表示不愿离开国土去异乡作战；大批组织的索夫团和索子团；今年二月东京七千五百人（其中多数是大学生!）因反战运动被捕下狱；大批的作家、教授和社会名流因反战而被逮捕；在战死和俘虏敌兵日记中，不断发现厌战和反战的记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敌人在这方面恰与我国处在完全相反的情形：敌人方面，因为是法西斯军阀进行奴役别国人民和荼毒本国民众的侵略战争，所以敌国民众与军阀间的矛盾和裂痕愈演愈深；战争愈延长，敌人内部民众反政府的斗争愈广泛愈尖锐。而我国方面，则因为我国军民进行的是保卫民族生存的民族自卫战争，所以愈战愈持久，社会各阶层愈团结，人民和政府及军队的关系愈密切。敌人国内民众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增长，这毫无疑问地是敌人的心腹大患。

(四)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日深——这首先表现在法西斯军阀与政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在日本政友、民政两党中，显然存在有一部分反法西斯军阀进行对外持久战争的资产阶级分子，虽然这些分子各有不同的见解，有的是害怕在军阀长期对外冒险战争中将日本经济闹到完全破产的地步；有的是害怕军阀在长期对华战争中遭受失败，因而引起日本国内不可收拾的危机；有的是简单地希望有和平环境以便继续对华的商业关系；但他们对法西斯军阀消耗

一切来对华长期作战，显然是不满意的；民政、政友两党中大多数党员及一部分开明领袖对法西斯军阀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军事预算和总动员法案在议会中经过长期斗争才能勉强通过的事实，法西斯军阀公开提出所谓合并一切党派为一个法西斯党的威吓……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敌国内军阀与政党间矛盾的增长。

(五)军力不敷分配——敌人有五十个师团的动员部队，原来计划以十五个师团进攻中国，以三十五个师团对付苏联，现在敌人派到中国来的已经在二十五个师团以上，而且因为战线延长几千里，来华的二十五个师团的兵力又已经感觉到顾此失彼不敷分配的困难；在这样情形之下，敌人如果继续增派军队来华，则国防上感觉到极大的空虚，对苏联进攻的计划方面受到极大的破坏；如果不增派军队来华，则不仅战胜中国的计划归于泡影，而且已来的军队，有被中国歼灭的危险。因此，敌人现在用尽威胁利诱的方法，企图在已被他占领的区域内，利用汉奸组织中国人的伪军队来协助日军作战。虽然在有些地方，敌人曾经能够在汉奸帮助之下，组成以日本人作军官中国人当士兵的军队来助战。但无疑义地，这些少数中国同胞受欺骗受威胁是暂时的，只要我们进行艰苦的政治争取工作，他们早迟是会掉转枪头去攻打中华民族公敌的。

(六)战线延长，有被我各个击破的危险——敌军深入我国土数千里，所居的是中国领土，所残害的是中国民众，所敌对的是中国军队，所依靠的是中国给养和中国交通工具，因此，四方八面感受到各种威胁和危险；同时，因为兵力分散在各个战线和城市及交通要道，时常被中国军队和武装人民袭击和打击；最近敌人在山西、山东各个战线上每日遭受数千人马的损失，便是他遭受这种危险的开端。

(七)来华军队的迅速堕落腐化——敌军在我国被占领区域内的奸、掳、焚、杀的非人暴行，固然给了我国成千累万同胞的人格、生命、财产以莫可言喻的损害，但同时他也造成了敌军在思想上、行动上迅速堕落腐化的结果；因而一方面形成敌军纪律废驰和战斗力减弱的现象，另方面形成敌国政府不许来华军队再回本国的企图，以致造成敌军将士悲观绝望的情绪。

(八)远近后方的不稳——敌人国内各种矛盾的增长，不能不影响到后方的不安；此外，不仅敌人特别倚重的我东北后方，有变成前线的可能，而且台湾、朝鲜均正在酝酿着与日俱增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台湾数千矿工武装起义进攻日寇的驻军，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弱小民族准备进行大规模解放运动的信号。日寇这种后方不稳的危险，一定随着中国抗战的坚持和日寇困难的增长而与日俱增，这是毫无疑义的。正因为日寇具有这些基本的困难和弱点，正因为日寇这些困难和弱点随着战争延长扩大而日益增长，所以，我们不仅深信我们能够制止日寇的无止境的侵略，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在坚持长期抗战中取得最后打败日寇的光荣胜利。

第三个条件是国际形势基本上与我国抗战有利。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主要地表现在：

(一)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及一切爱好和平人士对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我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自卫战争，不仅是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的战争，而且是捍卫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的战争，因此，我国抗战不仅能获得国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团体（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首先是苏联共产党，西班牙、美、英、法、日、德、意、捷、墨西哥、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社会民主国际及各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首先，是法、英、美、西班牙、德、意等各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

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各种工会国际和苏联、英、法、美、捷、西、墨等各国家的工会组织）的同情和声援，不仅能得到亚洲、非洲、中美、南美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赞助。而且能得到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拥护和援助（如包括各界、各党派参加的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国际青年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国际联盟之友邦联合会，世界学生会，国际妇女反战反法西斯大会，许多基督教青年会和天主教青年会，英、美、法、加、捷等各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等等团体)，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及爱好和平人士给我们的实际帮助虽然还不够，但是他们对我们抗战的同情和援助是与日俱增的，我们必须认识和相信：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帮助，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曾经帮助苏联人民打退过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进攻；这种力量曾经而且正在帮助西班牙人民坚持反抗德、意两法西斯国家军队及其走狗的侵犯；这种力量，对于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的事业，一定表现出一天比一天增强的伟大作用。

(二)社会主义的苏联民众和政府，对于我国民族自卫抗战的精神同情和实际援助——在我国抗战开始时，苏联政府即与我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给侵略者精神上以打击，给我国精神上以援助；苏联各种报纸杂志上充满对我国抗战同情的文字，苏联外交代表在国际联盟各种会议上仗义直言地对日寇谴责和对我同情；苏联在物质上给中国政府以援助；苏联人民对我国的同情和援助一定是随着我国坚持抗战和中苏友谊增进而逐渐加强的。苏联现在是一等富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与中国有数千里疆界连接的国家，是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本着其社会主义国家根本立场而抱着绝对真诚而同情的国家，是中国在反对侵略和捍卫和平问题方面有共同利害的国家；因此苏联对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同情和援助，是一种莫大的实际力量，是中国能够坚持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国外条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三)世界三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法、美、英对我国抗战的友谊态度——虽然法国在远东方面没有英美那样重大的利益，虽然法国主要的忙于欧洲紧张局势的应付；但是由于法国人民战线各党派——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急进社会党、法国总工会等——对于反法西斯反侵略和捍卫和平的极大努力，由于法国政府依靠着人民战线的力量，由于法国感觉到其安南的统治和中国的利益受日寇的威胁，所以法国人民和政府对于中国反侵略的抗战，始终抱着友谊的态度。虽然美国直到现在未能公开改变所谓“孤立”政策，虽然美国直到现在对远东问题未能采取其应有的积极态度和行动，但是从美国国家的根本利益立场看，美国是不能放弃或漠视远东问题的。近年来罗斯福和赫尔再三发表反对侵略和捍卫和平及拥护民主的声明，美国民众和正义人士不断表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美国在太平洋上海空军力量的逐渐加强，都是表示美国准备在必要时采取适当办法保障其太平洋东岸安全和利益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政府对中国对日抗战保持着友谊的态度。英国张伯伦政府最近采取的公开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者让步的政策，的确不仅鼓励了德国法西斯蒂实行武装并吞奥国和德意法西斯蒂大举增兵西班牙的举动，而且实际上造成了日寇在中国更加放胆横行的环境，不过截至目前止，我们虽然还未见到英国对制止日寇侵略采取应有的积极政策，但同时我们也还未见到英国已经决定采取与日寇妥协来宰割中国的政策；我们固然知道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既不愿日寇独霸中国，也不愿中国战胜日寇，而是希望中日双方在长期战争中相互减弱，以便增强英国在远东和中国的地位；但正因为英国是不赞成日寇独占中国的，所以直到现在英国政府对我国抗战还是在许多方面加以帮助的。

（四）日德意法西斯侵略者内部的冲突——虽然德日是订有所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同盟国，但日德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显然有两种冲突存在着：第一，德国法西斯蒂害怕日本在中国战争中消耗过大的兵力，甚而有遭受失败的危险，以致不能执行德日意军事协定的义务；第二，德国法西斯蒂每日狂呼收复战前殖民地和租借地，以及重新分配殖民地，中国不仅过去有德国的租借地，不仅一般地是一个广大的市场，而且中德经济关系近几年来有极大的进步，因而德国不愿意日寇独占中国；正因为这样，所以德国政府不仅再三企图出来“调解”中日战争，而且同时也出卖军火等给中日双方。至于最近德国法西斯蒂承认伪满一事，这不仅是为的表示他所谓侵略同盟国的精神上的帮助，而且是作为他自己以武力并吞奥国的一笔伏案和张本。由德国并吞奥国和准备进攻捷克以及德意增兵西班牙所引起的欧洲战云密布的紧张环境，的确给远东法西斯强盗暂时更横行无忌的机会，但事变发展的最终结果，未必会即有利于日寇侵略的；最重要的，日寇现在所谓同盟国，实际上不能真正以军事同盟国应有态度和程度来帮助日寇的。德国法西斯蒂并奥暴行和扰乱全欧的大阴谋，并不是由于其国内政治力量加强和巩固的结果，而是由于国社党与国防军冲突尖锐化以及国内经济困难增加和人民对法西斯政治不满深刻化的，德国法西斯蒂企图用对外冒险行动来转移国人对内视线和强迫国防军对外作战的结果。德国既忙于干涉西班牙，又忙于并吞奥大利，更忙于准备扰乱全欧的大变乱！同时，国内的经济情形和政治情况又极端严重，当然很难于给日寇以有力的帮助。意大利法西斯蒂既忙于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又忙于西班牙的干涉，更忙于应付欧洲行将到来的大事变，同时，国内经济财政更到了极窘的境地，当然也难于给日寇以有力的帮助。

正是根据上述的这种情形，所以中共中央认为虽然我国的国际形势还不能满足我国抗战的要求和愿望；但是，一般的说来，国际形势对于我国的抗战是有利的；至少我国的国际形势，比我们的敌人要好些，日寇除德意法西斯蒂的同盟者外，已成为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公敌！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虽然在抗战中始终着重于“自力更生”的原则和信念，但同时，我们经常指出要善于运用我国有利国际环境作为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自始至终坚决反对和揭露那些用“中国国际环境与抗战不利”或“中国的国际环境根本没有出路”等作遁词，来掩饰“抗战必然失败和没有办法”的投降主义的人们的原形。这些人们既否认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声援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又故意造谣侮蔑素以平等待我的社会主义的苏联，而把它与资本主义国家混为一谈；更否认今日愿意维持现状和保卫和平的民主国家与已经武装进攻西班牙和中国以及已经武装占领阿比西尼亚和奥国的法西斯侵略国家之间的分别，当然他们不能不归结到国际形势不利于中国的抗战；而这些人们，既对本国民族力量的团结表示怀疑和反对，又对国际形势抱悲观失望的态度，当然不能不得出不能抗战和抗战无出路的失败主义的结论。当然，说这些话的人，有些是作日寇应声虫的托派政治间谍，有些是国际常识不足的幼稚朋友，我们对他们的批评态度是不相同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分析国际形势的“理论”，事实上是妨碍抗战事业和便利日寇侵略行动的。

由此可见，无论中国本身条件，无论敌人方面条件，无论国际条件，基本上都是说明我国能够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

然而，这是不是说：我国抗战的国内外条件全都顺利，我国抗战已经没有严重的困难和弱点，我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预先有了保证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八个月的抗战，固然造成了我国空前未有的进步：全民族的空前觉醒和空前团结，统一

政府和统一军队的建立，政府与人民关系的开始逐渐改善，武力开始与人民结合，中华民族和国家地位在国际上的增高和世界先进人类对我国同情的空前增长，所有这一切都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同时，我国抗战无论在政治方面，无论在军事方面，都还有极严重的困难和弱点：军队新式武装和新的军事干部的不够，军事工业的缺乏，军事运输的迟缓和不够，军事战略转变的不充分，统一军队条件的不充分具备，这一切，都是军事上不容否认的弱点和困难。抗日各党派本身力量都还不能满足抗战形势的需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未达到应有的巩固和扩大的程度，政府设施还不能完全适合抗战的需要，战时民意机关的缺乏，民众运动和民众组织不发展，贪污土劣的横行，这一切都是政治上无容讳言的弱点；大批难民和失业同胞的流离失所和饥寒交迫，许多军事原料和军用品的供给不足，大量的财政消耗，许多地方物价的高涨，这一切，无疑义的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欧洲的紧张局面，英国张伯伦的对侵略者让步的政策，国联的软弱无力，美国的动摇政策，这一切，都是目前我国抗战的国际形势中的困难和弱点。

全中国军民的任务就在于：不仅清楚的认识中国抗战的国内外的一般的有利条件和优点，而且能够勇敢地看清我国抗战中的各种严重的弱点和困难，不仅明白地认识这些困难和弱点而且能够大胆地找到克服这些困难和补救这些弱点的有效办法。

为的使第二期抗战能胜利地进行，为的使我国能继续长期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我们对于目前的许多重要问题有坦白表明意见的必要，这不仅是为的使我们的党的全体同志对这些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和共同的了解，而且是为的使我们这些意见能提供国民党同志和国民政府当局以及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抗日团体和全体爱国同胞，作为讨论和实行的参考材料：

第一，对军事问题的一般意见：

（甲）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战初期只是八路军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八路军不能作阵地战，因为没有重炮），在平型关、广阳等战斗中，获得显著的打击敌人和歼灭敌人的胜利。在第二期抗战中，大部分在山西和山东、河南等战线上的我国部队，也都开始采取运动战为主的战略；在江、浙、皖各地，我军和地方人民武装也开始比较广泛的采用游击战术；所以能获到最近一个时期部分打击敌人和歼灭敌人的成效，特别是鲁南和山西各战线上的相当重要的胜利。为的保卫武汉和在河南、山西、山东各战线上给敌军以更大的打击，我们必须坚决确定及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之以游击战和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为的能够真正顺利地实行这一战略，必须：（1）组织相当数量的野战军团，在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打击敌人和消耗敌人；（2）组织相当数量的挺进军团，深入敌人后方游击；（3）扼守几个重要支点，以阻止敌军的前进深入。

（乙）建立真正统一的、政治坚定的、战斗力强的国民革命军：为的战胜武装优越的敌寇，须要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还远在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中便即公开的提出。我们所提的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口号，既不是脱离开中国原有军队而纯粹另外去创造新军队，也并不是说把中国所有军队联合统一起来，作抗日联军的名称，而只是表示我们希望：第一，把原来国内各种不统一的军队，联合而成为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第二，这个统一的军队要担负起来保卫国防的责任，在中国现在具体条件下，即是说，担负起抗日的责任。统一军队要具备那些基本条件呢？我们始终认为它应有下列几个基本条件：（1）统

一指挥；（2）统一编制；（3）统一武装；（4）统一纪律；（5）统一待遇；（6）统一作战计划；（7）统一作战行动。

现在我国已经开始有了统一的军队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1）过去各种不同系统的（如中央军、红军、各种地方军队等）军队编成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2）这些军队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这些军队正在努力执行统一作战计划和表现统一作战行动。但是，同时对于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等问题却至今还未能做到。统一待遇和统一武装，既为抗战本身的事实需要，已成一切抗战军队的共同要求，所以毋庸加以解释；至于统一纪律和统一编制方面，我们提议：一方面根据作战需要和利益，另方面选集各军队的优点和长处，来建立一个真正尽善尽美的统一纪律和统一编制。怎样才能做到部队的政治坚定呢？在今天，这至少需要进行下列三件基本工作：（1）立即在军队中普遍地建立起有系统的政治教育制度；最近军事委员会下已设立政治部，这是一件值得注意和称赞的事情。我们希望政治部负责人员和工作干部，能毅然恢复北伐军时代的政治工作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参照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在军队中普遍地建立起政治工作机关，慎重地选择工作人员，认真地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以达到提高我军政治觉悟和战斗意志，以达到建立军民一体的亲密友善关系，同时，达到瓦解和夺收敌军的目的。（2）军官与士兵共甘苦、共死生，达到官兵一体的地步。（3）迅速普遍地改善征兵制度——我国既无国民必需服兵役的教育准备，又无详细的人口登记和调查；同时，再加以实行征兵时也未明白规定应征兵役年龄和期数（即第一期应征者为某年出生，年龄达若干岁之壮丁，第二期应征者为某年出生之壮丁等），因而变成普遍抽丁的办法；于是，许多地方的土劣及保甲长，乃乘机将征兵变为敲诈勒索的差事，有钱的人家虽壮丁多也可以出钱买别人去顶替，没钱人家虽壮丁少也被强迫拉去当兵；甚至在许多地方发生强迫捉人当兵，闹成天怒人怨的现象；那些被强迫捉去当兵的人，既然不能明了当兵的意义，当然不能有充分的战斗力。为补救征兵制现在缺点和特点，我们以为一方面必须在广大民众中作抗战和兵役解释的准备工作，另方面暂时仍采取以募集志愿兵为主要办法，以逐渐过渡到实行普遍征兵制；当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人民爱国热潮风起云涌的时候，绝不愁没有千百万壮丁自动到抗日军队中去尽抗日救国的神圣天职。只有战士们都懂得为什么而战为何人而战的军队，才是政治坚定的武装力量。怎样才能使部队的战斗力强呢？在中国今天的具体条件下，除上述的统一和政治工作等外，必须：（1）提高和加强官兵的现代军事战略战术的训练；（2）提高和加强官兵的现代军事技术（航空、坦克、铁甲车、军事化学、炮科等）的教育和学习；（3）培养大批新的军事的和军事技术的干部人材；（4）加强现有军队的近代武装。

（丙）建立几十师团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军的骨干：我们绝不能使我国几百万军队都有足够数量的新式武装，但我们不能不努力建立几十师有现代武器的部队为全军的骨干，为的达到这一目的必须：（1）利用一切时间空间和争取更多时间空间来建立这种部队；（2）坚决抽出成立这几十个师为建立这种新军之用，平时绝不轻易动用这些部队；（3）努力取得必要数量的新式武器；（4）认真培养善于使用这些新式武器的技术干部和能指挥近代作战的军官人材；（5）以大公无私的态度从各种政治坚定的战斗力强的部队中抽调一部分队伍出来作为建立这种新军的组成员，抛弃一切派别和门户的偏私之见，只有在一定时间内我国能创立出相当数量的有新式武器的国防师作为全军的骨干，才能真正谈得上准备了对敌人反攻的军力，才能达到在长期抗战中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中央再

三要求我国政府及军事当局和全国军民，用异常严重的注意和决心来解决这一个对抗战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丁)迅速建立和扩大军事工业和加速军事交通线：以我国落后的技术基础和抗战的时光迫切，当然我们不能很快建立高度的军事工业(如摩托及重要机件制造等)；但是，我们应当而且可能把我国一切工业基础和物质条件搜集和利用起来，在友邦技术和人材帮助之下，迅速建立起最起码的新式的军事工业（以装修飞机、坦克、装甲车等开始，直做到买得摩托后，可以自己制造这些武器)；同时，应大大地扩大现有的兵工厂，以便大大地增加枪炮子弹等的出产量。必须努力改良和扩张军事交通网，以便利用国内外军事运输，现有的军事交通情形，是不能满足军事需要的。建立和扩大军事工业，不仅是现时抗战中的一个最紧要的问题，而且是使中国国防力经常巩固和加强的一个根本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中央再三建议我国政府及军事当局严重注意这个问题。

(戊)加速普遍地给军民以防毒的常识和设备：日本法西斯军阀在上海和北方战线上曾开始试用过毒瓦斯来毒死我国军民，今后当敌军困难增加和失败屡见的条件之下，将不可免地要采用放毒杀人的非人暴行；因此我国政府和民众，应该一方面加速努力进行防毒的教育和设备；另方面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工会和民主政党和团体、卫生慈善团体，以及国际联盟和英、美、法、苏等各国政府起来抗议和制止日寇的此种野蛮举动。

第二，对国内政治中几个迫切问题的意见：

(甲)对巩固和扩大国共及一切抗日救国团结问题：信仰自由和各党派不能取消而应并存合作，以挽救民族的危亡这一个真理，不仅由毛泽东同志在其今年二月十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谈话中，代表中共发表过明确的意见，而且已为国民党的贤明领袖和绝大多数干部党员等所共信；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但巩固和扩大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既为人民愿望和抗战事业所必需，因此，政治局会议一致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在于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这种联盟建立的基本原则，应有下列三点：（1）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2）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3）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统一战线纲领内容，由各党派（国民党、共产党、国家主义青年党、中国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社会党等）代表共同商讨和拟定；统一战线组织形成的方式，或采取各党派、各团体选派代表组织的方式，或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的办法和方式，只要与团结抗战有利，中国共产党均愿与国民党及其他一切抗日党派诸同志共同计议和执行。

(乙)对国民党的关系和希望：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个大政党，因此，凡是真诚抗日救国的人，都热望国民党本身工作有更大的改进和加强。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才企图在南京等地伪造国民党组织来污蔑国民党，才希望国民党坏。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儿女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的民族国家抱着生死与共的真挚的热爱，对于侵略我国的日本法西斯军阀抱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对于继续坚决对日抗战和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事业，抱着无限的忠诚和信心；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我国领导军民抗战的第一个大友党——国民党，抱着诚挚

的友谊，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改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发展，有更大的增强；因为国民党愈加改进、愈加强、愈有力量，就是等于抗战事业的愈改进、愈加强、愈有力量；因此国民党愈加进步和强大，不仅是国民党本身有利的事情，而且是全民族有利的事情，同时，也就是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有利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诚恳和热烈地希望国民党本身有如下的改进和加强：（1）淘汰贪污腐化及一切不忠于党、不忠于抗战革命事业的分子，以刷新党的组织；（2）大量吸收先进青年和进步人士到国民党组织中来，以增进新生力量；（3）在组织内实行真正民主集中制（即：少数服从多数，问题未决定前党员有充分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权利，决定后，无论个人意见如何，必须执行组织的决议；下级必须执行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如对上级决议和指示有不同意时，可向上级提供意见，但上级未改变决定前仍须执行等等）以健全党内生活和培养大批干部人材，民主集中制与党的领袖和领导机关威信绝不冲突，恰恰相反，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领袖和领导机关才更有威信、更有作用，以前中山先生为国民党的总理，同时，他在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时，在党章上毅然采取民主集中制，结果，使中山先生威望作用更加增大，同时，党的组织内健全生活也建立起来，党内大批新的干部人材，也产生出来，便是明证；（4）加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以巩固党的统一；（5）提高和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使党员均能自觉地为党、为革命事业而努力。国民党的贤明领袖和党员同志们，对于国民党本身工作改进和加强，当然具有卓见，我们谨以友党兄弟之谊，向国民党提供上述几点意见，不过作为参考的资料。

（丙）对于统一政府问题的意见：为的保证抗战事业的胜利，必须有全国统一的政府，这是我们自始至终的坚强信念，所以不仅在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上，中共中央便提出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同时，再三说明这一口号的意义和内容，既不是推翻现有的国民政府，也不是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名称，而只是说明，须使国民政府成为统一的政府，并实行抗日以尽保卫国防的任务；而且我们早已在实际上将苏维埃政府改成为地方边区政府，以推进和促成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之一，服从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这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关于边区政府人选及行政系统问题，中共代表曾再三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负责同志说明，并再三得到蒋先生的同意和答应，明令不久即可发表。在陕甘宁边区中不仅共产党有合法地位，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均有合法地位。在陕甘宁边区中，因为地瘠民贫，我们还做不出什么值得满意的成绩。我们现在做到的，不过是：肃清了贪污土劣，废除了苛捐杂税，相当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广泛地给予了人民以民主自由，教育和组织民众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所有这一切，我们认为不仅是陕甘宁边区民众热烈欢迎的事情，而且是全中国同胞急切盼望的事情；不仅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实行的事情，而且是一切真正中山先生信徒应该进行的事情。因此，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应有的事情，而且是整个中华民国领土内应该普遍的事情。所有这一切，绝不能说是违背中央政府的意旨，相反地，照我们想，应该是为中央政府赞许的地方自治的庶政。此外，在八路军收复的晋冀察边区三十几县中，一切行政系统和人事问题，均系事先征得战区司令长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对中央政府与任何地方政府因某种问题有误会和摩擦时，中共总是始终站在维护统一和抗战的大原则下去力求取得合理的解决，所有这一切，都在事实上证明我们共产党对于拥护统一政府的问题的光明正大的立场。

此次政治局会议更一致坚决认为：我们不仅在现在努力维护领导抗战的统一政府，即在

将来抗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之下，我们也是竭力赞助统一政府的；因为抗战愈困难，民族危机愈深广，对内对外，统一政府的需要更迫切、更必要。因此，有少数企图用陕甘宁边区问题来诋毁中国共产党"破坏行政制度统一"，甚至污蔑陕甘宁边区为"封建割据"等，以便破坏国共两党抗日救国的团结，以便挑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误会，这不仅是一种抹煞事实的昧心之谈，而且是一种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有害之举。

（丁）关于建立健全民意机关问题：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民众和政府抗战建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设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至于民意机关的形式，政治局会议认为：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国民大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的在于：（1）此机关要真能包括抗日各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材。（2）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备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讨国是和谋划内政外交的权力。

（戊）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政府和军队尽最大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全体动员和积极参加，这是古今中外再三考验过的真理。

关于这一真理，革命导师早已向我们指明过。例如列宁在其批评卢森堡对民族革命问题错误曾说："反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它是不可免的，进步的，革命的。不过它的胜利，当然应有：或者是被压迫国家中伟大数量人民底联合的努力（例如我们引做例证的印度和中国几万万人民底综合的努力），或者是国际状况底条件有特别顺利的配合（例如帝国主义列强因为它们本身的削弱，它们本身的战争，它们本身矛盾等，足以制止他们的干涉行动），成为是大国之中某一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作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最后这一种情形从对于无产阶级胜利的观点看来，是最合乎希望的和最有利的）。"由此可见，列宁把"被压迫国家中伟大数量人民底联合的努力"，看成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可以取得胜利的一种条件。同时，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上说："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我国抗战已达八月之久，动员民众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为着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政治局会议认为我们正应急切的补救这种弱点。我们提议将工、农、学、商各界按照其职业地域而组成各种职业的联合团体，将青年、妇女、文化界等按照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要而组织成各种统一的群众团体，将已有的群众团体加以健全和充实，将无组织的民众吸收到各种群众团体内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在各地方组织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这些团体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之下，发挥各群众团体自己的工作，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以达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统一。

此外政治局会议特别指出：我们不仅应该注意帮助政府动员和组织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而且要注意去艰苦动员和组织被敌占领区域的同胞。在我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的总方针，应该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去帮助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和取得抗战的胜利；在敌军占领区域的民众运动的总方针，则是动员和组织民众去反对和推翻敌军及其傀儡组织的统治，使它们在军事上不断失败。因此，在我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以合法、统一和互助合作为原则。在敌人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工作方法，必须是严守秘密利用合法的可能以达到动员和组织民众去推翻敌伪统治的目的。

第三，对外交问题的意见：在前面叙述我国抗战的国际条件时，我们已经指出，我国抗战固然要首先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但同时必须认清国际方面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以便

善于运用有利的国际条件，争取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外援。此外我想指出的，就是我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不仅政府要更加积极地去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抗日的朋友为外援，同时，还须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国民外交行动。我国抗战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但是，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我国各种民众团体对国际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系，都太薄弱了。我们提议：（1）由我国各党派各界群众团体共同发表一告世界无产阶级团体（共产国际、社会民主国际、亚姆斯特丹职工国际及他们领导下的政党和工会）和一切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国际反战组织、国际联盟之友联合会等）宣言，请求他们给我们更有力的精神上和物质的援助；（2）迅速派遣包括工、农、军、学、商各界有威望的代表及妇孺难民等代表的代表团，到欧美及东方各国去进行宣传敌寇在华残暴及我国英勇抗战详情；（3）摄制反映中国人民生活揭露日本残暴和表现我国民族团结御侮的几部有声有色的影片，送欧美及东方各国放映；（4）加紧供给欧美及东方各国的报章杂志通讯社以各种必要的书籍材料照片等；（5）为着顺利进行这一工作，必须政府与各党派及民众团体切实合作，成立一统一机关以领导计划和执行这一工作。

第四，最后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共本身的强固和改进问题。首先，政治局会议认为：必须向党内党外广泛解释，巩固和扩大共产党力量，对于抗战和使抗战获得胜利的伟大事业，有绝对的必要。因为共产党是坚决抗战到底和为使抗战获胜利的中国第二个大的政党。因此，共产党的力量愈增加愈扩大，即是抗战的力量愈增加愈扩大；因此，巩固和扩大共产党本身的力量，不仅是共产党本身有利的事情，不仅是工人阶级有利的事情，而且是全民族有利的事情，因而也就是国民党和一切抗日党派有利的事情。今天，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托派们，才努力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才尽力造谣侮蔑中国共产党。全国同胞和一切抗日力量，应当而且必然对共产党加以爱护的。其次，政治局会议特别指出：

（一）我们党今天在数量上还远不能适应抗战事业的需要。因此，要求全党同志把发展党员看作日常工作中的一种最基本工作；

（二）我党的质量（即社会成份）须要有大的变更；过去几年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种种原因，所以，我们党员的社会成份是农民雇农和手工业工人占多数，大城市产业工人的比例不够，现在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一弱点，应当努力吸收重要产业的先进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入党；

（三）因为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复杂和紧张，因为新党员增加和老干部理论修养的不够，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常政治教育，加强党内对三民主义的深刻研究，已经成为全党各级机关和每个同志的刻不容缓的严重任务；

（四）加紧选拔和培养大批新的党的干部和非党的革命干部以增强抗战的力量；

（五）为适应抗战环境的需要，建立和健全地方党部的独立工作能力；

（六）加强党报工作和使全党同志了解党报的意义和重视党报的指示；

（七）建立正确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加紧秘密工作以防止日寇及汉奸的破坏和捣乱；

（八）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坚决反对那些不懂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持长期抗战和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的左倾关门主义的分子；同时，无情打击那些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曲解成为无原则的投降，或者对中国革命前途抱完全悲观失望态度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

（九）加强党内教育工作，保持党员的艰苦、勤奋、牺牲的光荣的布尔塞维克的作风和传

统，严厉打击那些思想堕落和行为腐化的个别分子，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

（十）提高革命警惕性，严密注意和打破日寇汉奸及一切反动分子用尽各种方法在共产党内外进行破坏工作的阴谋；

（十一）特别注意巩固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

三　抗战与中华民主共和国口号问题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所提出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问题——我们党中央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曾通过一个专门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上，我们党的中央公开说："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有人说：共产党提出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擅改中华民国的国号，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问题并不在于国号，而是在于中华民国的实质。不仅照字义说，而且照创造中华民国的诸先烈和全中国同胞的愿望说，中华民国应该是中华人民的民主共和国家；但是可惜得很，二十几年来，中华民国仍未能名符其实。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党才提出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以说明我们所希望的真正中华民国的性质，至于讲到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与三民主义国家问题，我们已经再三说过，我们所希望的是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新中国，换句话说，也即是中山先生所希望所奋斗一生而未能实现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其次说到所谓现阶段的革命战略与策略问题——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我们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并公开说明在这个阶段上放弃使中国苏维埃化的口号，愿意为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因此，在我们同志中间引起一种理论上的争论：有的说这是一种策略的改变，有的说这是一种战略的改变。到底我们应当怎样正确了解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战略与策略的互相关系怎样。什么是革命的战略呢？"战略就是根据当时的革命阶段来决定无产阶级底主要打击方向，规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及次要的后备军）底相当布置计划，在这个阶段底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什么是革命的策略呢？"策略就是无产阶级在比较短促的时期内，在运动底来潮或退潮时期，在革命底高涨或低落时期内，行动路线底决定，就是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来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等等的方法，来为实现这条路线而进行的斗争。"战略与策略的相互关系怎样呢？"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和服务于战略的。"（以上所引，均见一九三五年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印行的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第八七，八八，八九页）在中国革命的前一个时期，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的阶段上，革命要推翻的目标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和本国地主资产阶级政权。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在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阶段上，革命要推翻的目标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参加这个民主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抗日的力量。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阶层和党派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现在革命阶段上实行了一个战略的改变，即是大的革命力量布置计划的基本改变，而不只是个别的

部分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改变；当然，既然战略有了改变，策略更是随着战略改变而为战略服务了。

四　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具体准备工作问题

去年十二月间，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此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具体准备这一大会的工作问题。此次政治局会议认为，前次政治局决议所指出的，在最近期间内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工作，对于党的本身工作，都有严重的意义，是非常正确的。全党同志现在应该努力进行七次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本身应该立刻进行下列具体准备工作：一，发布为召集七大事告全党同志书；二，发表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国同胞书；三，给地方党部怎样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四，成立大会四个议事日程报告的准备委员会；五，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大会第一、第二两议程的政治提纲以及写关于第三、第四两个议程的论文和其它专门问题的论文，不仅作为地方党和全党同志讨论和研究大会问题的材料，而且作为一切对中共七次大会愿意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的人士们的参考。中央政治局要求和责成所有地方党部领导全体同志立即积极进行关于七大议程各问题的广泛热烈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任何一个同志都有权利明确详尽地发表他对于中国革命全部问题——特别是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问题的意见，在这种讨论中，来教育全党同志学习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和研究现在如何战胜日寇，以便建立自由、幸福新中国的基本问题；使这种讨论，不仅成为搜集全党同志对大会意见的有效办法，而且成为用严格自我批评方法检讨我们过去和现在工作的各种错误和缺点，以及找出改正和补救这些错误和缺点的有力工具；使这种讨论，不仅成为准备大会的最重要的基本工作，而且成为在政治上、组织上教育党、巩固党、和扩大党的重要武器；使这种讨论的结果，不仅成为共产党本身一个大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进步，而且成为对全国同胞的抗日救国团结大事业的有力贡献。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电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

（衔略）自太原失陷，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华北各大城市，侵占了各交通要道，更要伸展他的魔手到黄河边，那时晋东北区、冀西区、察南区的军政负责人及一千二百万民众，决心不妥协，不退却，继续支持华北抗战，在全体军政民的一致努力之下，晋察冀边区已成为华北抗日根据地之一了！

为了巩固这一抗日根据地，突破敌人的包围，统一边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建立边区的统一的临时政府是十分必要的。边区军政民各方面有鉴及此，爰于一月十一日在阜平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代表一百四十九人，代表着边区全体部队，代表着边区三十九个县的县政府，代表拥有一百二十万群众的一百十九个群众团体，代表着蒙、回、藏少数民族及喇嘛和尚，代表国共两大政党。全体代表都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前提下，热烈地坦白地勇敢地贡献出自己的意见，决定了统一边区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教育的各项提案，并民主地选举了宋劭文、聂荣臻、刘奕基、吕正操、胡仁奎、李杰庸、孙志远、张苏、娄凝光等九人为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

大会中充分地表现了统一战线的巩固，这一巩固给那些阴谋拆散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这一巩固显示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了华北持久抗战的主要堡垒之一，这一巩固更证明了我民族持久抗战的前途必然是胜利的！

晋察冀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任务，在抗战胜利之日即行终了。

他在国民政府主席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的正确领导下，热烈的希望全国民众予以援助与指导；更希望在全国民众的支持下，配合着国际的有利形势，全国各地游击战争的广泛的开展，迅速的完成收复平津、收复华北、收复一切失地，驱逐日寇出中国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叩印。

关于晋察冀边区通电事

——陈周博董叶致书记处并转朱彭任刘电——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关于晋察冀边区问题致全国通电事，我们有下列意见：

（一）关于我军在华北驻区，遵守形式上维持原有政权形态，实际上政在民众手中之原则，政治局会议上已有讨论。此次所采取的已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阎承认，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

（二）以边区名义书面，在客观上帮助“抗战胜利后是共产党天下”的谣传。

（三）通电不从临汾发出而从延安，更增加对国民党之刺激。因此我们提议：

（甲）以后务须避免此种工作方式。

（乙）对此事应首先设法取得阎百川之谅解。然后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

（丙）最好不用边区名称。

不知兄等意见如何？盼复。

和《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

毛　泽　东

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以近来有些报章杂志盛倡所谓《一党专政》之说，其所持理由，首先以苏联为例，其次以德意为例，因特于二月二日走访毛泽东先生征询其对此问题的意见。毛先生对该记者曾详细答复，兹将该谈话内容抄载于后，想为全国同胞所乐闻也。

——编　者

问题一：苏联现在的政治制度是一党专政吗？

答：苏联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即工农社会主义的国家，但不是以党专政的国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阶级的专政与党的专政是有分别的东西，党只是阶级的最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组织，党应当而且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不应当而且不能代替阶级去实行专政，因此，苏联的政治制度的创造者列宁斯大林从来未曾将党的专政与阶级专政问题混为一谈，而他们有时借用所谓党的“专政”这个名词时，不过是指的党在国家系统中的领导作用这一点而已。为的使你能明了和相信我的这种说法，我乐于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介绍一点给你。为的记忆和了解的便利，我特将斯大林所著“关于列宁主义底问题”这本书上对这个问题所引证列宁的意见和他自己的意见介绍一点给你，在这本书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系统里的党和工人阶级”这一节中，斯大林曾将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加以详明的发挥，例如他说：

“比方，在我们苏联这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应当把这样一件事实看作党领导作用底最高的表现，这事实就是我们的苏维埃的或其他的群众组织，在解决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的时候，都要根据党底指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产阶级底专政，在实质上，是它的先锋队底‘专政’，是它的党底‘专政’，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底基本的领导力量。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

“田纳尔说，他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但是他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完全和我们所了解的一样。他认为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底那个有组织的和有觉悟的少数底专政。而且真的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当工人阶级是遭受着不断的剥削而不能发展自己的人类的才能的时候，工人政党底最大的特点，正是在于这政党只能包括本阶级底少数。政党只能团结本阶级底少数，正好像在无论那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只是占全体工人底少数。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这个有觉悟的少数，才能够指导和引导广大的工人群众。而如果田纳尔同志说他是政党底仇敌，而同时又主张由工人阶级中少数最有组织的和最革命的分子来给整个无产阶级指示道路，那末，我就要说，在我们彼此中间，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见分歧的。”（请看“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七页。）

“可是这是不是说，可以在无产阶级底专政和党底领导作用（党底“专政”）之间放一个等号呢？可以将前者与后者看作一个东西呢？可以将后者代替前者呢？当然不是这样说。当然是不可以的。例如苏林同志就说过‘无产阶级底专政就是我们党底专政’（请参看“列宁关于党的学说”第九十五页）。这个说法显然是把‘党底专政’和无产阶级底专政看作一个东西。从列宁主义底立场上看来，可不可以认为这种把两个东西看作一个东西的事情是正确的呢？是不可以的。”

由此可见，苏联实行的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共产党的专政；把阶级的专政和党的专政混为一谈，是既不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又不合乎苏联的实际。我想，对苏联这方面问题的了解，苏联政治制度创造者列宁斯大林自己的意见是最有权威和最有信任的意见。

问题二：虽然苏联不是以党专政，但苏联只有一个共产党存在的原因何在呢？

答：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俄国各党派长期斗争中人民意志选择的结果，即是俄国人从长期历史斗争中厌弃了其他党派而只拥护共产党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国家内已没有其他政党存在的社会基础，因而也就没有其他政党存在的必要与可能。为的使你能明了和相信我这种说法，最好也还是将斯大林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说话介绍给你。苏联只有一个共产党存在这件事实，并非人工捏造或空想或行政命令辨法造成的结果，而是历史生活所形成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与第一次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得很明白。他说：

“我们共产党的地位，全国内唯一的公开政党的地位（一党垄断的地位），并不是造作而成的，也不是有意空想出来的。这种地位决不是故意造作地用行政的方法所能造成的。我们共产党的垄断是从实际生活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这是社会革命党和孟塞维克党完全破产而下台的结果。”

在苏联，除共产党以外，无其他政党存在的社会基础，无其他政党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五日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报告中，特别解释过。他说：

“末了，还有一类批评家。如果上边所述的一类批评家，责备苏联宪法草案是放弃工人阶级专政，那末，这一类批评家，恰恰相反，他们责备苏联宪法草案，说它丝毫没有改变苏联的现状，说它没有放弃工人阶级专政，没有容许各种政党的自由，仍保存着今日共产党在苏联的领导地位依然有效。同时这一类批评家认为苏联各种政党没有自由，乃是违犯民主主义基础的一个标志。

“我承认苏联新宪法草案的确仍保留着工人阶级专政的制度依然有效，同样也保全着苏联共产党目前的领导地位而毫无变更。如果可敬的批评家认为这是苏联宪法草案的缺点，那末，只能对这一点表示惋惜而已。我们布尔塞维克却认为这是苏联宪法草案的优点。

“至于各种政党的自由，那末，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略有不同。政党是社会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阶级的先锋部队。只有在有着对抗阶级、其利益互相敌对、彼此不能调和的社会里面，换一句话说，只有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社会里面，才能谈到数个政党和政党的自由的存在。在苏联，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这一类阶级，早已没有了。现在苏联只有两个阶层，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层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而且恰恰相反，是互相融洽的。因之，在苏联并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因之，也没有这些

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政党——共产党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政党——即勇敢和彻底保障工农利益的共产党才能存在。它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利益，保护得并不坏，这一点未必有人可以发生怀疑的。

"人们都说民主，可是什么是民主呢？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彼此对抗的阶级，那里的民主，归根到底，乃是对于有势力的人的民主，乃是对于有财产的少数人的民主。在苏联的民主，恰恰相反，乃是对于劳动者的民主，亦即对于一切人民的民主。由此可见，违犯民主主义原则的，并不是苏联新宪法，而是资产阶级的宪法。因此，我认为，苏联宪法，乃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

由此可见，一党存在的事实，只有在这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已在革命过程中完全为人民大众所鄙弃、所推倒和没有其他党派存在的社会基础的国家——如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样，才能够真正形成和做到。

问题三：为什么德国意大利都能实行一党专政呢？

答：首先必须把国内一党掌握政权与一国内是否真只有一党存在的问题分别清楚。在德意两国的确只有一个政党掌握政权，但这不是说，在这些国家里只有一个当权的政党存在，在德国，固然今天当权的只有法西斯主义的国社党，但是，在法西斯党上台执政以前的其他各政党——曾在末次（一九三三年）国会选举时拥有千百万选民的社会民主党，拥有五一六百万选民的共产党，拥有数百万选民和有历史传统的各种拥护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各党派——都是继续存在着和活动着，不过是不公开不合法的存在和活动着而已。请任何人到德国的城市农村里去仔细考察一下，他便立刻可以看出集中监狱里，虽然囚禁着几十万反政府党派的分子，但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一切拥护民主政治反对法西斯专政的党派，都还潜在地英勇地奋斗着，他们秘密地出版自己的报纸杂志，他们艰苦地进行教育和组织民众的工作。在法国、捷克斯拉夫、比利时等国的德国政治侨民正联合国内自己的党派，为设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拥护民主政治的人民阵线，在社会民主国际（即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领导机关里，均坐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代表。意大利的情形和德国没有两样，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一切民主主义的党派，同样英勇地秘密地进行反法西斯党的活动，这些党派的代表，同样地在国内外进行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和社会民主党代表，同样在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领导机关内占着重要的位置。

由此可见，如果说在德意两国内只有一党掌握政权，只有一党有合法地位，这是对的，如果说在这些国家内只有法西斯蒂党存在，那就完全不合事实。

问题四：有些人说：现在国民党应该实行"一党专政"，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呢？

答：对这个问题，我可以分两方面来回答你：

第一，如果你所说的"一党专政"，是指国民党一党掌握国民政府政权而言，那末，今天这是已成的事实，因为，谁都知道，在国民政府内负责的只有国民党党员，或国民党自愿指定的人物，中国的其他各党派，现在还均无代表参加政府。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以外的我国第二个大的政党，我们今天并不要求参加政府。关于这一点，我们党的领导人陈绍禹同志，在其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美国记者白得恩先生的谈话当中，以及我们党的另一领导人张闻天（即洛甫）同志，在"解放"二十八期所发表的"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一文中，已经代表中共中央坦白恳切地声明过。关于这一点，我可再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作一次郑重声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诚恳地帮助国民党对日抗战，但我们现在并不要求参加国

民政府。

第二，一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所谓一党执政，并不一定要采取“专政”的办法；如果，所谓“一党专政”的办法，实际就是等于国民党过去十年所实行的政策，那我以为有考虑的必要。在我看来，今天国民党虽可以维持一党掌握政权的局面，但为的集中抗日救国的人材和表现抗日救国的民意，似应当采取相当的民主办法，当然这些民主办法是绝对有利抗战的民主办法，是绝对巩固政府和更增加人民对政府拥护信任的民主办法。

问题五：现在有人说，国民党应该再实行“党外无党”的政策，换句话说，即是不允许国民党以外有任何其他政党合法存在的政策，先生对此问题有何意见？

答：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不仅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国家主义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的合法存在地位，而且企图以武装力量去消灭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党派，这在中国不仅不是什么新的理论，而且是曾经实行过十年的旧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的惨痛结果，是：不仅内部纷争不已，而且招致来空前未有的外患。十年来中国实际政治生活的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们：国民党企图用武力消灭其他党派的政策，已经遭受失败；同时，中共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企图造成一党领导的政权，也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一次因国共合作而取得北伐胜利的经验，十年来因国共分裂而形成严重民族危机的事实，教训了国共两党同志和全中国人民一件苦的真理，即是中国统一局面造成的真实有效办法，不是以某一党派反对或企图消灭另一党派的内争，而是把各党派力量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形成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是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六个月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实行对日抗战的根本前提，便是由于国内民族力量的团结和统一，而我国民族力量团结和统一的具体方式和具体内容，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各党派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即是国共两党不仅相互抛弃了过去互不承认和互相对立的立场，而且在抗日救国基础上实行携手合作，即是国民党放弃过去否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立场，实行一切抗日党派团结御侮的方针；共产党和其他反日的党派也放弃过去反对国民党的立场，实行与国民党合作，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事业。由此可见各党派力量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对日抗战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破坏了这个前提，便是实际上使中国继续内乱，中国一有内乱，便无法继续对日抗战，这是显而易见人所公认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法西斯军阀于军事侵略之外，时刻企图使用“以华制华”的毒计，首先是企图再挑拨中国各党派之间的内争，以便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可见今天有些人宣扬的不许国民党以外的任何政党存在的理论，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事实已经否定了的理论，是使中国回复到团结抗战以前的纷争局面的企图，同时就是使中国已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形成的统一局面不能继续，因而也就是使中国再形成无力对日抗战的局面。因此，无论宣扬这种理论的人口头上如何空喊“国家统一”，如果他们的理论不幸而见诸实行，实际上所得的结果，一定是破坏今日既经形成的统一局面；因而无论宣扬这种理论的人口头上如何高呼“抗日”，如果他们的理论不幸而见诸实行，实际上所得的结果，一定是破坏抗日团结，使对日抗战不能继续。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深信：这种借统一之名而行有害统一之实的理论，这种借抗日之名而实行有害抗日之实的理论，这种实际上要使中国退回到国内团结一致对外以前的悲惨局面的理论，一定会受到爱国人民的反对，一定会受到全国抗战军队的否认，同时也就一定会受到国民党的贤明领袖人物和一切为国为民而愿继续抗日的国民党同志们的斥责和厌弃。这是毫不足奇的，首先因为这种理论完全不合于实际，违反着实际。这些人说：国民党之外，如其他党派也有合法存在的地位，便因党争而妨碍抗日；事实的证明

是：原来只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而不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地位时，中国确实有极大的党派内争，以致中国未曾抗日——顶多也不过局部抗日，以致中国无力进行全面的对日抗战；恰恰相反，当国民党一允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存在地位并与其他政党合作时，中国的确停止了内战，消释了党争，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国家政权和军队的统一局面，因而才能进行空前未有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以保障民族的生存和争取民族的解放。这些人说：国民党以外，如允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存在地位时，则多党合法存在的事实，便成为防碍国家统一和破坏国家统一的因素。中国的事实证明是：只国民党一党有合法地位而同时不允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地位时，国内纷乱到不断的国内战争，恰恰相反，国民党一允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存在地位时，国内统一的局面立见，各政党之间，对某些问题即有争论，也绝不会用武器作批评，顶多也不过相互以友谊的批评作武器；英美法比捷瑞等国的事实证明：多党合法存在的事实，绝未曾妨碍或破坏这些国家的统一。由此可见，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中国才能统一才能抗日的理论，是不合中国实际生活的理论，是使中国既不能真正统一，又不能真正抗日的理论，这种理论绝不能为中国爱护统一和坚决抗日的军民所接受。

问题六：现在有人说共产党既宣布相信三民主义，便不能再相信共产主义，先生对此问题的意见怎样？

答：首先我要声明的是，有些人说共产党员宣布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就是等于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仰，我可以再一次正式代表我们的党郑重声明：这只会是拨弄是非者的谣言，这绝不合乎事实。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宣布愿意与国民党同志们一起去为中山先生的未竟的革命事业——即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的三民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同时，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自己虔信多年、并为之牺牲奋斗多年的共产主义。其次，有人说，如果你们宣布为三民主义实现而奋斗，同时又信仰共产主义，这便不合乎三民主义的立场，因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根本不相容。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再一次郑重指出：这种说法完全不对的。这种说法完全既不合乎手创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的理论和行动，也不合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从理论上看起来，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等主要内容，与共产主义所主张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使中国人民达到民族独立；彻底摧毁封建压迫，使中国人民得到民主自由；彻底改造中国经济制度，使中国人民达到民生幸福这些思想恰能相容的。因此，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绝不是不能容和的，因而本党与国民党也不是不能合法并存和携手合作的。关于这一点，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演讲中不止一次地明白指示过。例如，在民生主义第二讲里中山先生公开指责有些国民党员这种意见的错误。他说："所以一讲到社会问题，多数的青年便赞成共产党，要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去实行。到底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么样呢？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的主张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为政治社会问题，要正本清源，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所以他们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我们国民党的旧同志，现在对共产党生出许多误会，以为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见"中山全集"第一集"民生主义第二讲"四十二页）由此可见，中山先生公开指出国民党员中有些同志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相容，是一种误会。为什么发生这种误会呢？中山先生在这段演讲里（即同上全集的四十四页，四十五页）特别指明是：一般地是由于这般人不了解三民主义的互相结合性，特别是由于这般人不了解民生主义。因此，在解释这种原因以后，中山先生在这篇演讲里继续说："为什么我敢说我们革命同志对于民生主义还没有明白呢？就是由于这一次国民党改组，许多同

志因为反对共产党，便居然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同，在中国只要行三民主义便够了，共产主义是不能容纳的。然则民生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在前一次讲演，有一点发明，是说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的进步，都是以什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不能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照这样判断，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中接下去发问说："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常有反对三民主义的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即是不能以个人的行为，便反对全体主义。那么，我们同志中何以发生这种问题呢？原因就是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殊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中山先生这段演讲里面，我们应当得出哪些结论来呢？结论应当是：第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能够相容并存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关系；第二，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人，实际上是不懂三民主义的人，特别是不知民生主义为何物的人，这些人应该是国民党中的极少数；同样，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人，实际上也是不了解共产主义的人，特别是不了解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相互关系的人，这种人也应该是共产党中的极少数。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中山先生认为这只是某一方面的个人行动，任何一方面不能因此来反对另一方面的全党及其主义；第三，中山先生认为，不仅主张共产主义的人应该了解三民主义；同时，中山先生指示：主张民生主义的人，也应该细心去研究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态度。我们共产党员非常赞美中山先生这种态度。的确，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和主义，不会是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党的专利品，它应当而且必然欢迎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党来研究、来实行的。我们不仅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样，我们更欢迎任何人——首先是国民党的同志们遵照中山先生的指示来细心研究共产主义。因为我们深信：凡是愿意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而又真正研究和懂得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会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的理想，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最美满最愉快最幸福的社会，绝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家中山先生才说："……从前人类战胜了天同兽之后，不久有金钱发生，近来又有机器创出；那些极聪明的人，把世界物质都垄断起来，图他个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隶，于是变成人与人争极剧烈的时代。这种争斗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呢？必要回复到一种新共产主义时代，才可以解决。所谓人与人争，究竟是争什么呢？就是争面包，争饭碗；到了共产主义，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致于争，便可以免去人与人争，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最高尚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见"中山全集"第一集"民生主义第二讲"第三十八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中山先生曾说："至于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以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各国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

从以上所说的一切，你可以看出，在中山先生亲手著作的三民主义理论中，绝找不出三

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指示来。至于讲到中山先生对这个问题在行动中的表现，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一九二一年，自成立以后，中山先生与共产党员便有着亲切的关系，所以到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决心改组国民党时，便公开与共产党合作；而且合作的方式是非常亲密的，即不仅建立国共两党的国民革命联盟，而且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组织中去，共同担任革命的工作。当时共产党在全国不过几百党员，成立历史不过几年，而且共产党员并以个人资格去加入国民党，去共同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即在那种情形下，中山先生是否曾向共产党员提出过除三民主义外不允许同时相信共产主义的要求呢？没有！即在那种情形下，中山先生是否提出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存在，不允许共产党同时合法存在的主张呢？没有！不仅没有，而且中山先生还坚决反对别人提这种要求和这种主张。这正是中山先生伟大远见和洞悉实情之处，因为中山先生深切懂得：任何主义和政党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绝不是可以强制制止或取消的，古今来为信仰而杀身成仁的，不可胜数，任何有社会基础和群众拥护的组织，绝不是可以强制解散或消灭的，古今来多少革命团体在万重压迫极端镇压下依然存在和发展。而现今的情形，比之当时还更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已经有十七年奋斗的革命历史，有数十万党员，有久经战斗的坚强组织，有为主义、为党、为革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和为全人类解放而百折不屈、英勇奋斗的领导和干部，有千百万群众的信仰和拥护，那里能谈得到取消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党的组织呢？如果说只是因为我们宣布了我们愿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一层，就应当取消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完全是误解，因为我们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互关系的了解，的确如中山先生一样，即我们认为它们是好朋友是相容的，所以我们共产党员不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去与国民党同志一起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即在国共分家后，我们在自己单独的革命苦斗中，也还是为的中国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目的，即是与三民主义根本思想相符合的目的。今天和过去国共分裂时不同的，只是过去我们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单独地为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的三民主义事业而奋斗，今天在国共重新合作时，我们共产党员又与国民党同志们在一起为共同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有人要求共产党员放弃其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这不仅不能为共产党所接受，而即直接违反着中山先生的理论和行动。

从中国的实际情形看来，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造成了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蓬勃发展，和北伐军的伟大胜利；而国共关系破裂，便造成了十年来外患内忧空前严重的局面；现在国共两党一经合作，对外便能发动空前未有的光荣的民族自卫抗战，对内便能造成近数十年来空前未有的政权和军队的统一，便造成空前未有的全民族中各党派各阶层力量的大团结，使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感觉到，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的唯一生机和希望。两个主义和两个党同时合法并存，对于中国人民和国家是有利或有害，应该根据活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来判断，而不应该根据少数人的偏见和主观愿望为决断根据。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铁一般的事实既经一再证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互助合作，则国家统一，革命发展；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互相对立，互相否定，则国家分裂，革命困难。所以任何违反这种事实的意见，必然都是不能实现的，——设或不幸而实现了，定造成国家民族新的灾难。

由此可见，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能相容的意见，以及由此而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不能同时合法并存的意见，都是毫无根据而且有害国家民族解放事业的意见，这种意见既违背中山先生的理论和行动的遗教，又违反中国的实际情形，这种意见的实际危险，就是有把

目前举国一致对外的良好政局，转化成视线对内、增加内部困难的可能局面。

因此，在谈话结束时，对这个问题我再重复郑重地告诉你几句话：如果所谓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内容，即是说国民党一党掌握政府的政权，这是已成的事实，这没有问题。我们共产党员虽然自己不参加政府，但我们对领导抗战的国民党政府绝对拥护，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才否认国民政府并企图推翻国民政府，今天只有执行日寇特务机关意旨而行动的托洛茨基及其门徒们，才会造谣说国民政府是克伦斯基式的临时过渡政府，因而才对国民政府采取“表面上虚与委蛇”、“实际上准备打倒”的汉奸政策。我们共产党员对国民政府的拥护和帮助，是绝对真诚的，是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根本立场出发的。同时，如果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内容，扩大到和曲解成除国民党外不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合法存在，除三民主义外不允许共产党员有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仰等等，这绝不是新的理论，而是旧的实际，这是再重新回转到十年来走不通的道路和做不到的办法。这一思想如不幸而见诸实际行动，则既有害统一而又有害抗日，则是使中国既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体，因而也就是使抗战救国的事业发生危险。因此，这一思想客观上一定会被日本法西斯军阀和汉奸所利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确难相信，这种意见能得到国民党中以国家民族根本利害为重的有识之士的同情。当然，更说不上这种意见能得到宝贵统一和彻底抗日而无党派偏见的军民大众的同情了。不过，这个问题既恰当着民族危机更加紧迫的关头，能公然提出，这就不能不唤起共产党员和其他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同胞们的严重警惕，这的确不只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而且有关于各党各派和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命运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全国各界同胞、各党派有远见的贤明之士，都严重注视这一问题的发展趋势，尽一切努力使以各党派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受威胁，使国家统一和抗日救国的事业不受危险，以达到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任务。

（原载《解放》周刊31期，1938年2月25日出版）

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八年二月）

毛　泽　东

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先生于二月间来访延安，与毛泽东先生作了一次谈话，兹根据王先生的记录，经过毛先生审阅，在本报发表。
——编　者

（记者问）现在有许多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表示悲观，先生对此意见如何？

（毛答）我对此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经成了确定的方向了。在中日战争初期，一般形势是日本强、中国弱，可是今后的形势必是日本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中国的力量则渐渐加强起来。日本现在正借钱打仗，除过去半年已经用去二十二万万元以外，今年一年的需要据说是四十万万元，必定还不止此数，这已经消耗他大量的国力。日本的国际信用降低，公债跌落，他的“速战速决”计划已经失败，试问他那有那许多钱无限长期的打下去？就军事方面讲，日本在中国的战线已经延长到自杭州以达包头的数千里的距离，他的兵力不够分配防守之用，所以他的兵力已随深入与扩大的程度渐渐薄弱。他占领了长距离的铁路，便需要军队去防守每一个车站。日本已动员三分之一的军队来侵略中国了，如果他再要占领汉口、广州等地，至少须再动员几十万军队，那时他的情况将十分困难。因为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加上日本国内国际的其他许多大矛盾，他终必走上完全崩溃之途。

（问）先生说中国的力量能够渐渐加强起来吗？

（答）根据过去七个月作战的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我的意见，在目前除应以二三十万精兵组成数个强有力的野战军，从运动战中给敌人前进部队以歼灭的打击之外，还应抽调八九万军队组成二三十个基干的游击兵团，每个兵团三四千人，派坚决而机动的指挥员领导，加强其政治工作，配置于从杭州到包头的敌人阵线前面，从这个长阵线的二三十个空隙中间，打到敌人后方去，如能运用得宜，结合民众，繁殖无数小游击队，必能在敌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有力地配合野战军的运动战，而使敌军疲于奔命。至于阵地战，由于我们技术不足，在目前不应看作主要方式。但我们必须建设国防工业，自制重武器与高武器，同时设法输入这些武器，以便能有力地进行防御的与攻击的阵地战，这是非常必要的。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

游击战，在他对于战斗方式说来，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在政治方面，我们已有国内的统一，更拥有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和援助。但现在的成绩还不够，还应进一步加强起来，所有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加强，都是必须的。只要继续努力，也一定能够加强，这就预示着前途的光明。

（问）第八路军在日人数面包围之中有被日人驱逐或歼灭的危险吗？

（答）第八路军现在共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第一个区域是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铁路中间及其以东以北的地域，这地域拥有坚决反日的一千二百万民众，都与军队密切结合着，这是一个极大的抗战的堡垒。第八路军在这里已经立稳了脚跟，虽然敌人正在加紧进攻这个区域，但要驱逐他们是不可能的，歼灭更不可能。八路军的几个大的东进支队已迫近津浦线。第二个区域是平绥以南、同蒲北段以西和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地带。第三个区域是平汉、正太、同蒲中间的晋东南、冀西南地带。第四个区域是晋西南。他们都与地方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随时猛烈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联络线，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使敌人大减其前进的力量。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问）先生觉得此次国共合作是具有永久性的吗？

（答）我以为是的。在民十七国共分裂的时候，原是违反着共产党的志愿的，共产党一向不愿意和国民党分裂。过去十年来国共双方及全国人民都经历了艰苦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增强今后的团结。现在及将来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在这个原则之下，只要我们的友党能有和我们一样的诚意，加上全国人民的监督，这个合作必然是长久的。

（问）是的，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说过，国共两党不但共同抗日，并且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要共同建国；请问这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将来怎能合作建立新国家呢？

（答）因为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目前则更处在亡国灭种关头，连半殖民地地位都在危险中。党派与阶级虽不同，这个共同的地位则一，就此决定了两党不但能合作抗日，并且能合作建国。但合作是在一定纲领下的合作，是有原则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与貌合，如果离开纲领与原则，必变成苟合与貌合，这是任何有原则的政党所不许可的。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问）什么是共产党主张的“民主共和国”？

（答）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的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

（问）共产党对于目前的中央政府满意吗？还须召开临时国民大会吗？

（答）我们拥护现在的中央政府，因为它坚持抗战的方针并领导抗战的行动。但我们希望加以充实和扩大，并在内政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更加有利于抗战。我们曾经提出了临时国民大会这种主张，这也是孙中山先生提倡过的，我们认为有益于团结全国加强抗战的力量。但究用何种方法更于抗战有利，我们并无成见，只要真正有利于抗战，什么方法都可以采用的。

（问）东三省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有中国共产党前去领导吗？

（答）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

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那里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

（问）先生对于美国一般感想如何？

（答）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蒂，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

（原载《解放》周刊32期，1938年3月5日出版）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

蒋先生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同志们：

当大敌当前，河山破碎之时，我们黄帝子孙，首先是我国共两党同志，能更加亲密携手，共御外侮，在前线共同牺牲，奋勇杀敌，在后方共同奋斗，努力救国，这不仅证实我中华民族的伟大，而且显示我中华民族的复兴。当目前日寇深入和全国民众的抗战极积进行之际，加紧巩固和扩大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是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加强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助，已成为国共两党同志和全体我国同胞的一致热望。贵党适于此时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想对于如何推进贵党本身工作，如何加强国内的团结，以及如何发扬民意去争取抗战胜利问题，与救国建国大计等问题，必有所讨论。本党谨以兄弟之谊，对上述各问题向贵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供意见，以供参考。

（一）关于巩固和扩大各党派的团结等问题。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去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即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鼓动共同遵守的方针；同时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解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而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统一战线纲领的内容，敝党愿与贵党及各方代表共同商讨和拟定，其发表方式，或由各党派、各团体共同署名发表，或由贵党用蒋先生名义发表，然后由各党派、各团体宣传拥护和遵守，均无不可。统一战线组织形成的方式，采取各党派、各团体选派代表组织各级组织的方式，或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的办法和方式，只要与团结抗战有利，敝党均愿与诸同志共同计划和执行。

（二）关于健全民意机关问题。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民意机关的形式，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的在于此机关要真能包括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材；同时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是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

（三）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政府和军队的最大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全体动员和积极参加，这是古今中外再三考验过的真理。我国对日抗战虽已继续八个月之久，但民众动员和组织的不够，已成为前方将士和全体同胞所迫切感到的弱点。贵党为中国第一大政党，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对于抗

战中这一最严重的弱点，当能极积设法加以补救。关于此问题，敝党敬向贵党提议将工、农、军、商、学各界，根据其职业地位而组织各种职业联合团体，即将已有组织的群众团体，加以健全和充实，将还无组织的民众，组织在各种群众团体以内去；同时根据地域原则，在各地方组织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青年、妇女、文化界等应根据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要，而组织成各种统一的群众团体，以便真正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以便真正达到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的目的。当然所有群众团体及其领导机关，均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采取政府及党部的领导。敝党愿尽力赞助贵党在抗日救国大前提下，造成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群众组织。

以上各项提议，敬请贵党中央委员会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列入贵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案，作为研究和讨论参考。此外敝党拟派代表团出席贵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同时预请贵党选派代表团，将来出席敝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示两党同志兄弟的友爱团结。贵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当能促成全国精诚团结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业，敝党中央委员会谨代表敝党全体同志，庆祝贵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抗日救国事业中的伟大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全体代表同志们：

中共中央谨代表本党全体同志，向担负着领导全国抗战神圣任务的、孙总理所手创的、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同志致敬！并向坚决领导全国抗战的蒋介石先生致敬！

九个月抗战，虽是我国广大地区受到了日寇兽军的蹂躏，然而我们已经给了敌人以相当打击，增加了敌军内部的困难；尤其值得我们指出的，即是新中国正在血战中生长起来。但我们给日寇的打击还很不够。日寇现正倾其全力，继续向我国进攻，中国的西北部、中部与我们的首都武汉，正在危急中。在全国人民面前，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强全国团结，不屈不挠，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为达此目的，中共中央谨向贵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提供下列意见，尚希讨论采纳。

（一）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忍受一切牺牲，誓与日寇抗战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同汉奸、亲日派分子作严厉的斗争。

（二）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以击破敌人前进部队，消耗敌人力量。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以达到收复失地，创立许多抗日根据地与支点的目的。在我们后方，努力改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以满足抗战的一切需要。这样来准备以后胜利的反攻。

（三）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即须发布以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鹄的。再在这一纲领下，遵照孙先生过去联共的精神，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人民与全国各党派最坚固的团结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到最高限度；任何其他取消一党、一派或一切党派的勉强办法，都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四）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切实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建立有权力、有威信的政治机关；吸收全国优秀的革命青年到军队中去，担任军事的与政治的工作；严紧军队纪律，进一步使军民打成一片；认真改善征兵制度，以达到大量扩军与组织新军的目的；加紧新兵的军事、政治训练，有计划的改善军队的技术装备。

（五）继续改善政治机构。首先应该召集真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全权的国民大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制定各种实施纲领的具体办法。大量吸收全国人民中、各党派

中富有民族意识、积极勇敢、急公好义的，有威信、有能力的爱国志士参加政府。切实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开始实行区、乡、保甲的民选制度；对地方民团、警察亦应即刻加以整顿。

（六）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首先用最大力量，普遍组织民众的自卫队、联庄队、游击队，对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的各种武装队伍及全国民众的原始武装组织，应给以各方面的援助与指导，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与军事技术。各种抗敌后援会、动员委员会等，应实际上成为有广大民众参加的民众团体。大量扶植与发展一切抗日救国的与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各界的、职业的民众团体，在全国的与地方的范围内，把它们统一起来。颁布在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法令，以建立抗战时期的革命秩序。

（七）为使政府与民众进一步结合起来，为更能顺利的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必须采取具体的办法，实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优待伤病兵，严惩贪污，豁免战区地赋等改善民生的法令，具体解决抚恤流亡救济灾民难民与失学、失业的青年等问题。订立累进的派款办法，减轻贫民负担，以达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最高原则。

（八）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国防工业，改进农业。用一切方法提高工业、农业的生产，首先是国防工业的生产。鼓励海外华侨及国内富裕资产者的投资，保护与奖励工、商业，发展国家资本，提倡国货，改良土产，调剂粮食，推广合作运动，实行节约运动。

以上八项建议，是否有当，尚祈裁夺赐覆。敬祝

贵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民族革命的新高潮，由于党的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领导与党的影响与威信的扩大与提高，大批的革命分子要求入党，这给了我们发展党以极端有利的条件。

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

为此，中央决定：

(一)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倾向，反对把党的注意力局限在恢复与审查旧关系和旧线索的狭窄圈子内。

(二)打破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要宣传有了强大的党才能有强大的统一战线的真理。

(三)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

(四)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上大量的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的组织。在后方无党的组织的地区，当地党应有计划的与迅速的去重新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

(五)大量的发展党员，不是采用不经审查的拉伕式的办法，新党员的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

(六)为适合于大量发展党员的需要，新党员候补期暂时重新规定：工人雇农不要候补期，贫农、小手工工人一个月，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军官三个月，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得伸缩之。

(七)严防汉奸、托派分子、阴谋家、投机家混入党内，但不能因此妨害党的大量发展。

(八)在日寇占领的中心城市与重要的工商业区域及一切党的活动需要极端秘密的地方，则吸收新党员的数量以不妨碍建立精干的极端秘密的党的组织为原则。

(九)对新党员应注意给他们以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建设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共产主义与其他党派的理论思想的基本区别。

(十)把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

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指示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洛、刘致彭真、聂荣臻及朱、彭——

(一)由于各种顺利条件与你们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使晋察冀广大地区的抗日运动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但在各方面都是不巩固的。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基础上去继续发展。

(二)你们的胜利和发展，大大的威胁日寇的根据地——平津，日寇必然想尽一切方法来进攻与破坏你们。除开采用残酷的武装进攻外，更必然要派遣和收买大批的汉奸、流氓、土匪混入各党、政、军、群众团体，特别是军事，而从中来进行阴谋破坏。路东党委负责人的被暗杀以及党内和军队内的各种无原则纠纷，难免没有敌人的阴谋存在，这应该引起你们严重注意。

(三)为了迅速巩固你们的力量，以便继续更大的发展，我们提议：

1． 加强对部队的整理训练及党的工作，洗刷混入部队中的流氓、土匪等不良的分子，考察并团结各级干部，慎重而切实的建立部队的保卫工作。

2． 肃清根据地内部的土匪，采用慎重而有效的办法改造那些土匪式的抗日部队，加强地方上的除奸工作，恢复与建立抗日的秩序。

3． 除派员前去路东整顿党的工作外，应即从××、×××、×××三同志中，派一人去路东任吕部政治委员，并兼省委军事部长，或成立路东军分区司令部，切实整理吕孟两部。在吕孟整理就绪后，可分出一部分兵力随邓华部队向冀东、热边发展。

4． 巩固党的组织和党内的团结与统一，提高铁的纪律。在目前，任何破坏党内的团结与统一的行为，都是最大的帮助了敌人。严厉与批评纠正一切小组织的行动，加强对于党内原则的教育，提高党与主要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

5． 在群众运动中，纠正某些过左的行动与行会倾向，和缓地主富户对于我们的恐惧与反对，但中心工作仍在发动群众抗战热潮，建立真正强有力的群众团体，进行切实组织工作。

6． 政府组织方式，不必再有更多的变更。主要的工作除广泛组织训练自卫军外，就是筹给经费与粮食，解决部队给养。筹款方法除经常的税收捐款外，要注意向汉奸筹款。可组织特别的队伍到铁路车站及城市附近去没收与逮捕汉奸。我们没有可能大批帮助你们的经费。(下略)

对平原游击战指示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洛、刘致刘、徐、邓等同志——

(一)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

(二)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的方式。

(三)根据上述的方针，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的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发布简单的布告与法令，组织民众抗日战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拨给养等。

(五)在范专员丁专员的地区，仍有原来的政府，应即经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速改造与加强政府，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吸收坚决有能力的分子参加进来，洗刷腐化无能的分子，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

(六)吸收民间的枪枝加入游击队与军队，要采用宣传说服来当游击队。筹粮筹款以自愿及公平摊派为原则；并注意逮捕城市及车站的大批汉奸筹款。

(七)以人民自卫军为主要的群众组织形式，可能时，再组织农会及青年团体。

(八)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去改造他们。

(九)发展党的组织一般要保守秘密。

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同志致项英同志——

项英同志：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的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下略）

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中央书记处致长江局、东南局及项英同志——

（一）迭次来电均收到。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甚么危险的。

（二）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集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三）必须向党的干部解释：目前斗争形势与过去的根本区别，因此，目前的工作方法与方式与过去有根本的不同。要他们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力的打击造谣中伤，与打破防范限制。

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徐州失守后，对长江以北的工作，我们有以下建议：

（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将现在湖北省委的主要干部，大部派去，加强省委与各主要地区的工作。该省委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的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俊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

（二）即指示河南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省委目前即应将河南省划为二个主要区域：以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浦信公路中间的豫东与皖西北为一个区；陇海线以南、平汉线以西为一个区。省委负责人首先应分一部分到豫皖边工作，并建立豫皖边工作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准备将来成立省委。省委另一部分准备即向豫西移动，加强豫西工作，将来与鄂豫边特委在一起，即以鄂豫边为根据地，领导豫皖边工委、鄂豫边特委及整个河南省的工作。

（三）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应鼓励集中在武汉的人材大批的到长江以北的乡村中去工作。长江局应有计划的分配党员到这些地方，建立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大大发展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

（四）汉水流域党的工作，应有必要的布置。

（五）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务，为发展游击战争。江苏省委即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并应从上海有系统的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党员，到那里去工作。

中央书记处

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一）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马列主义的党。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是它的历史使命，因为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它自己。中国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是同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一致的。

（二）为了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中共的首先任务，就是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然后使中国革命走向共产主义去。只有共产主义的社会，才能完全实现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

（三）中共过去的十七年，即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艰苦奋斗的十七年。这个奋斗的基本目标，中共远在一九二二年已经明确的提出来了。十七年来，虽是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使中共的某些主张不能不有某些变化，然而在其基本奋斗方向上说来，则是始终一贯的。

（四）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首先提出了以神圣的民族自卫战驱逐日寇出中国，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的口号。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民族抗战终究于去年的七月七日开始了。中共很早指出了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并使自己成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发起人与组织者。

（五）日寇自占领徐州之后，主力正向着武汉进攻。保卫武汉、保卫全国，用一切方法削弱敌人，加强自己，克服一切困难与动摇，以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这是中共提出的当前的紧急任务。

（六）中共在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十七年中，是坚强与壮大起来了。它的基本主张的正确，是为十七年来中国的革命史所证实了。它已经在全国人民中，取得了极大的威信。它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有力因素。一年来，在民族抗战的各个战线上，中共同志已经表示出了他们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共同志必须在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以求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七）为此，中共必须在任何困难条件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坚持党在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十倍、百倍的扩大与巩固党的队伍，大大的加强党内马列主义的教育，保持与发挥历来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最后解放的保证。

毛泽东同志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雅德先生、傅路德先生、雷克难先生之谈话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

第一个问题：目前边区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们，我们很需要明白这点。

答复：明白了边区的性质，才能明白它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首先，在民众方面，都有他们自己的组织。边区人民，只要在抗日原则下，都有他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不论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知识分子，妇女，儿童以及宗教团体，自由职业者的团体，都有这种自由。共产党与边区政府从而积极地扶植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更普遍的发展下去。这里仅仅限制汉奸的活动，对于汉奸，是不给任何自由的。

其次，边区已成了直接抗战的区域，这里留了八路军的一部分，还有地方武装部队。这些军队，其内部官长与士兵的关系，其对外与人民的关系，也都有一种民主的精神，能够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使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不能被战胜的力量。

其次，边区的教育，同样是抗日的与民主的，你们从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就可以看出这种精神。

其次，经济方面也是这样，以有利抗战为主旨，而以民主精神经营之。例如这里颇为发达的合作社，得了土地后的农民之于农业，都是按照这种精神，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良，同时又有利于抗日事业。这里是有租税的，但没有苛捐杂税，实行一种统一的累进税，符合于上述的主旨。

还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里证明一点，就是有些人说："知识落后的工农，不能实行选举制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实行民选的结果并不坏，每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当人民选举他们所欢喜的人去办政府的事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对于动员人民力量参加抗日战争，特别积极而有效。与过去苏维埃不同的，是推广了选举与被选举的范围，即不论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学生，商人，有产者，只要不反对抗日而年满十八岁者，都有选举与被选举之权。

以上所述的各方面，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都能收得很大的效果。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那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

都可以表现出来。

这就是边区的性质，边区的特点。明白了这种性质与特点，就可以明白它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了。全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全国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充分自由，全国军队中官兵打成一片，军民又打成一片，全国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实行之，全国经济建设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与改良人民生活相连结，全国各级政府都实行选举制度，并有各级人民的代议机关，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日可期了。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这种制度要全国采用，是需经过全国人民切实了解，认为可行，然后才能实行的，所以我们欢迎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的人都来看一看。来看的人也不少，青年学生尤多，除了少数人说这种制度不好之外，大多数人都说是好的，这是可以引为庆幸的事。边区是中国之一部分，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与中国其他部分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

现在有些人对于边区有两种不正确的观点：一种说边区什么都不好，有少数顽固分子这样说，这种说法显然不合事实。另一种说这里象个神圣天堂，什么缺点都没有，这种说法也过分了。正确的说应是这样：这里的民主制度与抗日精神是很好的，值得供全国人民仿效与参考。但这里的工作还受某些条件的限制，例如物质困难即其一例，许多工作也还待继续努力，方能更好，并不是样样都好得了不得不须再求进步了。因此，欢迎外界的批评，加重了这里工作人员的努力，这也是要指出的。承诸位好意来延安参观，我就欢迎诸位的批评，指出这里的缺点，以便加以改正，使之更利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第二个问题：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

答复：这个问题很简单。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这就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工作与作用也就在这里。

什么叫做坚持抗战？妥协还是坚持抗战，这是存在着的问题。我们是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任何妥协的，我们愿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一道，坚持抗战，绝不动摇，直至收复失地打到鸭绿江为止。

什么叫做坚持统一战线？就是全国团结到底，但还要更加团结，不但团结几个党派就行了，还须团结全国的人民。只有全国各界人民都团结在一定的组织之中，都发动了抗战的积极性，才算巩固与扩大了统一战线。

什么叫做坚持持久战？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说："中国会亡，不能作持久战。"另一种人说："中国很快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也无需乎持久战。"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不对的。首先，中国决不会亡。理由是日本虽强，但它先天不足，国内外矛盾很多；中国虽弱，但是大国，又有许多国内外的优良条件。因此，中国虽在战争的一定时期损失了许多地方，但仍能坚持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要很快的打胜日本也困难，因为虽有争取胜利的可能条件，但不能很快的全部的实现，这不论中国的进步也好，日本的内溃也好，国际的援助也好，都非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们应准备长期战争，不能希望即刻胜利。

这样，现在的方针应该是：第一，坚持抗战；第二，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第三，坚持持

久战。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干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干的这些事情。中共愿与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起来，一定要把这个方针贯彻下去，这就是中共在全国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中国是否有什么条件可以缩短这一持久战的时间呢？

答复：要缩短战争时间，必须加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扩大，这是基本的。在统一战线的方针下，各项工作须大大的发展与进步，这些工作多发展与多进步一分，战争时间就能缩短一分。第二个条件，是日本国内人民的帮助。现在这种帮助已经开始，譬如他们的士兵不愿意战争，有自杀的，有投降的，有发反战传单的，日本人民反战思想也在发展之中。如果日本的士兵与人民更多的觉悟一分，战争时间也就可以缩短一分。还有一个条件，是世界各国的帮助。我们需要世界学生的帮助，需要世界人民的帮助，也需要各国政府的帮助。如这些帮助更多更快，那末我们的战争也就会缩短。这三个条件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中国加快进步，加快团结，就能使日本国内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世界各国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如果日本及世界各国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我们国内的抗日力量加快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更大的打击，也就是给了日本人民的帮助，将使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发展更快。对世界也是一样，中国的抗战，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所以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这三个条件多具备一分，则战争时间就能缩短一分。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抗日党派及全体人民的任务，同时也是日本及世界各个先进政党与全体人民的任务。我们的战争是持久战，但我们应极力争取尽可能缩短时间的条件，如没有这些条件，则缩短时间只是空想。

第四个问题：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

答复：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在这个国家内的各个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则下，建立联合的关系。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的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在这个国家内，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民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在这个国家内，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全国的一切党派与人民，大家努力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是全国人民几十年来所希望所力争的，也是孙中山先生所希望所力争的。进行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就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联。不过许多重要工作是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经济建设等等。在抗战中，是要具备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先决条件，主要的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这样的任务，不但是共产党的，也应该是国民党与其他革命党派的，同时是全国人民的，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

第五个问题：你以为现在中国的学生及青年在抗战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世界学生与青

年在援华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复：中国青年们的任务，可以分为一般的与特殊的。一般的任务，与前面所讲的相同，就是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的人民之共同的任务，没有什么分别的。有分别的，是其特殊的任务。中国青年们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就是争取自身的特殊利益。例如改良教育与学习，在学习中有参加救亡运动的权利，有组织学生与青年团体及组织救亡团体的权利，十八岁以上的青年有选举与被选举权，贫苦学生有免费入学之权，青年应大批上前线等等。说到世界青年们帮助中国抗战的主要任务，我想，首先是经过世界学联，使世界大多数青年与学生了解有共同反对日本帮助中国的必要，并使他们了解，这种工作是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系的。因为和平不可分割，法西斯的世界侵略，是世界和平的仇敌。其次，学生是联络人民的桥梁，经过学生，使各个民族的人民懂得反对日本帮助中国的必要以及这种工作与他们自身利益的关系。至于具体的帮助方法，例如用口头和文字作宣传，劝告人民与政府给我们以物质上的帮助，不买日本货与不卖货给日本，直至组织国际抗日义勇军，准备于适当时机来华参加战争等等。诸位代表着广大的国际学生团体来华视察，给我们以广大的同情，全中国人都感谢你们，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希望你们回去之后，把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的真相带给世界学生与人民。我们与你们永远团结起来，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战，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与永久幸福而战！

（原载《解放》周刊45期，1938年7月15日出版）

干 部 政 策

——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抗大"讲演——

陈 云

同志们：

你们已经毕业，快要走了，在你们临走以前，学校里叫我来讲一个问题，叫做"干部政策"。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为何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同学们要走了，你们到敌人占领的后方去工作，就不单是当一个游击队员，而且要当干部，当领导者的。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非常重要。有一句这样的话："干部决定一切"。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不但是共产党通用，任何政党也通用，而且全国各个阶层都通用。

可惜得很，中国共产党在十年斗争中，干部损失了十几万，假如没有边区的话，连这一点干部也保存不了。假使全中国一千八百县，每县能够保存三个党员，就不讲开展的话，也算不错了。

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我想只讲十二个字，用四个问题来解释：

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魄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先讲第一个：了解人。

了解人，要了解得彻底，不是容易的事情，严格的讲来，是很难的。就拿我们共产党来讲，是不是个个党员都了解人呢？还不够的。最近就发现有两个毛病：第一种毛病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一面，不全面看人，面面看到；第二种毛病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事，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高低的一面，但是没看到他本质的好坏。

只看到坏，不看到好，或者只看到好，不看到坏，但是这两种看法，那一部分多？一般的我们同志总是看坏的多，看好的少。有什么证据呢？如分配干部时，往往听到许多不好的话，如这个家伙是自高自大，那个家伙是懦弱无能，不然呢，又是背景复杂，等等。

自高自大当然不好，是极坏的，但这往往是片面的看法。我们要进一步的看，每一个坏处同时也常有他的好处。这个人自高自大，但做起事来有他的自信心，这种人多少有点才能，因为他起码总有点本领才敢自高自大。这种人我们就利用他的好处，避免他的坏处。假如你指定一个范围，告诉他正确的方向，让他尽量的去发展，他可以做出一些工作来的。对于这种人给他不十分重要的工作，使他放胆做去，发展他的长处，在工作的过程中间，随着经验的增加，弱点就可以慢慢克服的，经验和弱点的克服是分不开的。

再来讲到懦弱无能。懦弱无能当然是不好，可是其中也有他的好处，好处是小心谨慎，因为无能，所以特别唯谨唯慎。这种人不能做大刀阔斧的事，但可以担任小心谨慎的工作，

例如做秘书，做调查统计等等的工作。我不提倡懦弱无能，但是它有它的好处，我们可以利用它的好的一方面，利用它的小心谨慎。

背景复杂的问题。当我们发展党员的时候，同志中间有能说话的，有胡子的，懂得各党各派情形的，于是就以为他背景复杂，不敢吸收。然而这种人在社会上常常是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了解许多问题，只要他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而且现在愿意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一同革命，一同前进，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拿我自己来说，我的背景就非常复杂。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比较最好的主义。我们说这种人复杂是复杂的，但他从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这种人也是纯洁的，青年是纯洁的，但纯洁的不仅仅青年，老头子也可以很纯洁的。

由上面所说的看来，每个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每个短处内同时也含着一些优点。用人就是向他的长处发展，把短处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无一点短处，无一点错误的。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天下也无一人不可用，个个都可用的，只要你放大眼光来了解人，不要只看到一面。

第二种毛病即是了解人的时候只看到今天不看昨天，或只看过去不看现在；只看见功不看见过，或只看见过不看见功；只看见今天的好，不看见昨天的坏，或只看见今天的坏，不看见昨天的好。这些都是对于干部没有根本的估计。这种毛病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共产党中也有过这种情形：今天这个干部表现得好一点，就把他一抬抬上了天，明天同一干部表现得坏一点，就把他一打打到地下去。你们看见过老百姓盖房子打椿，一上一下；使用干部不能也像打椿子一样，今天看他好，便把他提得高高的，明天看他做得不够，便把他打下去，后天又把他提起来，再后又打下去。这种一上一下打椿式的用人是不对的。造房子打椿愈多愈好，如果对干部也这样来几次，我说顶多只要三次这个干部就算断送完了，因为他的自信力早已失掉，再也不敢做工作了。

过去我们在江西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毛泽覃同志（是毛主席的弟弟），人家说他犯了一个错误，要不得，便认为这个人不能用。后来扩大红军需要人工作，于是派他到一个区域去作扩大红军工作，结果不但完成了任务，并且还大大的超过，成绩非常的好，于是回来的时候，许多人又把他抬高起来，调他到闽赣边界的游击区去工作。隔了几个月，又因为看他说了几句似乎有些近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正在这个时候，恰巧又派他去扩大红军，没有得到很好的成绩，于是又都说他不能用。完了！大家都不要这个人：送到这里拒绝，送到那里拒绝，一个这样的同志，竟会到处无人要，连饭都吃不成了。后来红军退出江西的时候，他在勇敢的战斗中牺牲了，他为着革命流了最后的一滴血。所以我们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用人没有根本的估计，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了解人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气魄大。

何以要讲这个问题？气魄大就是气量大。现在时代变更了。一九三八与一九二八有何不同？芦沟桥事变以前和芦沟桥事变以后有何不同？我说今天许多人归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今天我们抗大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其他陕公、鲁艺、党校，在延安就有一万多个学生。一万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抗大在武汉登了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的

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从几千里外，男男女女都来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还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从这些地方看来，复杂是复杂的，但是到底是复杂好还是简单好呢？从前办学校只有六个人倒很简单。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要复杂。领导全国的时候，更加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无数群众打在一块，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抗大、陕公的同志去和敌人搏斗还不会成功。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复杂革命就好办。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辛亥革命起义几天之内全国就有十几省起来响应。何以孙中山先生能够得到成功呢？就是因为他气魄大，什么红枪会、哥老会、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份各种人都要，所以能作大事。我们也必须善于用人，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可以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共产党员都是些了不得的人材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材不知有多少，社会上的人材不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魄，善用各种人材；单枪匹马，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同志们毕业出去到被占领区域，到敌人的后方去工作，在那些地方用人，更要有大的气魄。那里有许多从大城市避难出来的人材，都躲在田野山里。你组织游击队只要干得好，包你到处躲在山里的人都统统出来归你了；有学者、艺术家、政治家、经济家，假装了农民的，这时候都拿出真面目来投奔到你的地方，这些都是人材。山东有一处地方只去了几个共产党员跟一个八路军的人，招老百姓来打仗，一来就来了几千人，现在已经有一万人了。

第三个问题：用得好。

要有什么方法才能用人用得好呢？我想没有旁的道理，只要在你领导下的人都很高兴工作，都很积极工作，能够这样，工作一定会做得好。任何事情都是一样。你们以后作地方工作，军队工作，或共产党的工作，只要使每一个人对工作都很负责，都很积极高兴的努力工作，也一定会把工作弄得很好。就怕在你领导下面常常发生问题，如请求调动工作，不安心工作等等现象。如果一个同志他工作得很好，绝对不会提出请求调动工作的。首先他已经不能安心工作。根本的原因是领导的不好。那么要怎样领导才能使干部很好的高兴的安心的工作呢？只有一条，就是要上级信任下级，下级信任上级，上下互相信任。要想达到任何目的，都要做到下级敢说话敢做事六个字。有许多下级干部，把意见放在心里不讲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服从，开会的时候你问他："同意不同意呀？""同意呵！""同意的举手呀！""举手呵！"然而实际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一定要使下级敢说话，同时还要使下级敢做事，就是做错了也不害怕。如果这个下级既敢说话，又敢作事，一定会积极起来。

先讲使人敢说话。不敢说话为什么不好呢？如果有人有某些不同的意见，又不敢说，而议案已经经过表决通过，这些决议案在执行的时候就不能发生很好的效力。所以宁可争论，不要单看形式上的一致通过。

用什么方法使别人敢说话呢？有几点需要注意的：第一，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如果在一个领导机关里，一个领导者别人见了他就不敢说话，事情怎么办得好？如果大家都喜欢亲近他、都爱和他说话，这个领导者一定很能团结人。如果一个人架子搭得很大，脸子死板板的像阎王那么可怕，一定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讲话，十句话也要忘记了八句。其实领导者又何必装得很凶很庄严的样子呢？同志们也许要问我，领导者的好坏是从政治上来讲的，

为什么要看面孔呢？但是很多人都要看面孔，不要说别的，就是共产党员中间也有这种习惯，所以领导者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其次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刻板这种方式是很不适宜的。开会时尽可让到会者随便、热烈的争论，否则规规矩矩请他们一个一个发表意见，就会没有意见，因为一个人常常不敢在严重的场面中间说话。

总而言之，如果下级有话就讲，敢说话，这就是好的现象，也就是证明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的。这就是第一件事：敢说话。

第二件事是少戴高帽子。譬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于是你就对他来一个批评，不是说这个人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那个人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这样给人家戴上这顶大而无当的高帽子，一个人头上装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

还有些人专门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的高点。譬如有某某同志犯了些小错误，于是就说他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政治上的动摇。小的错误能说是因为政治上的动摇吗？把每个问题都提到原则高点是最不对的，这种机械的了解十分危险。因为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我可以说几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有一个女同志她把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后来大家把它检查出来了，于是就推论它的道理说：“大概是不愿意拿出来给人家用吧？”于是下了个结论，批评她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我们共产主义是多么的不相容？又有一个同志在吃饭的时候吃菜吃得很多，向来是“打冲锋”，另一个同志就批评他叫做自私自利。假如这个同志也是共产党员的话，凭着自私自利这四个字就得开除他的党籍了。还有一个例子，陕北公学有一个学生，他丢了一把洋刀，据说这是一件纪念品，所以他心里很不好过。一个同志见了他那种样子，问他什么原故，他就告诉他因为一把刀子丢了，于是这个同志就批评他“没有牺牲精神”。我们一个革命的人连性命都要牺牲，难道一把小刀还不能牺牲？这在道理上好像很对，实际上这种批评用在这件小事上未免太冤枉了人家。对于一件纪念品非常爱护，这并不是一件怎样不应该的事，怎能因此断定这个人对革命没有牺牲精神呢？所以这也是一个高帽子。高帽子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把每个错误提到原则的高点。我们不应该机械的去看事情，一定要分出错误的大小轻重，不要随便乱给别人戴高帽子。

第三件是当你去批评人家错误的时候，要指出人家错误的来源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出气，主要的是在于真正能纠正人家的错误。一般的说，批评的人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声势汹汹；第二种是和颜悦色的说服人家，能善意指出别人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只有后一种办法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服意满，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上级领导人对下级的批评，务必要适当和正确，万不要戴高帽子，因为上级领导人批评下级，与下面同级的互相批评所发生的影响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同级的人，他们认为大家都是差不多，即使你批评他过火一点，或不大正确，还没有什么要紧，他也不会十分在意；如果是上级给他的批评，那就不同了。因为下级对上级所说的话，都是很认真的，所以不能随便的任意的批评。假如批评得过火或不正确，那要花费很大的力量，才能使得被你批评的人对你解去误会，才能使别人对他不至于蔑视。当然下级也要想到上级的出发点是好意的，不要只看态度或语气的不妥。

批评的时候还要注意到：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老干部还是新干部？参加共产党久不久？革命的历史长不长？比如对于老党员批评的态度和方式好不好，没有多大关系，然而新党员因为是刚刚加入，他们的意识观念与老党员多少有些差别，所以对他们批评宜于采取温

和的曲折的方式去劝导、说服，不要给他们打击。

总结起来，就是使人敢说话，要人敢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高到原则的最高点，要能善意的、诚恳的批评人，态度要好，还要指出错误原因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

用人用得好的第二个办法便是要使人敢于做事。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脾气，使得在你领导下的人都不敢作事，任何一个小的问题，任何一件小的事情都要来请教你，都要先徵求你的意见，像这样你才觉得很快活，很舒服，以为自己很像一个领导者了，这种脾气妨碍很大。一个人能有多少力量多少时间？即使你精力很强，"天下第一"，也要有天下第二、天下第三来帮助扶持才会成功。假使没有他们，你一个人也第一不起来。这种毛病，会将干部的责任心降低，束缚下面同志的工作自信力，如果这一件事情做得很对，他说这是上面叫我做的，如果一件事做错了，他也说这是上面叫我这样做的，他完全不负责任，好像事情作得对不对与他没有直接关系。下面的干部没有责任心，工作一定不会弄得好，并且还会减少他们的自动性和创造性，妨碍他们工作能力的发展。

也许有些同志要说你这种方式不大好，恐怕要生出许多错误来。然而我看错误虽不可免，但也不必怕。没有错误就不会进步。一个人犯了一次错误，同时也就是得到一个教训，不断的教训方能不断的改进自己，所以正确的常常是从错误中得来的。比如科学家发明东西，那一件不是从试验和错误中得来的？今天流线型的汽车漂亮得很，灵活得很，但是到博物馆里再看一看那最初发明的汽车，四四方方的真不好看，笨得要命。那么何以会由从前的不好进步到今天这样好呢？这中间就是经过几千次的试验，几千次的失败才得到这种成功的。如果一个同志真的犯了一点小错，没有什么关系，犯一些错误他的经验一定增加。所以不要怕下面干部犯错误，让他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能力。

总结起来说，使干部敢说话敢作事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积极性，很安心的去工作。假使你说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那他就等于电话机，不能发挥干部的才能。这个干部不要求调动工作，必定领导很好，如果要求调动工作，中间一定有些什么毛病。以后大家出去能做到这六个字，工作效果一定会好的。

第四个问题：爱护人。

爱护人，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一、提拔干部不要今天拉起来明天又放下去，好像打椿一样，这是我前面讲过的。如果你要提拔这个干部，首先就必须全面去估计他的能力，看他各方面是否合式，要详细考虑一番。既然提拔起来，要经常留意他的工作，到他实在不能支持的时候，就要想办法，不要等他坍台以后再来检讨他的工作，撤换他的工作。

二、对于下面干部任何不安心问题，都要想法子去解决。我住在那个山上，有时候也烦得很：刚刚看文件，就是一个人来看你，到底会不会呢？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人家热心来找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所以还是应当会一会。有时候正在写一件东西，一个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就跑进来了，你不能还是直挺着腰板坐在那里不睬人家，只得放下笔来倾听他的说话；谈话的时候还要聚精会神，耐心的郑重的谈话，这样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如果花了几个钟点，替一个干部把事情弄好，也还是值得的。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除非不接受人家的要求，既是接受了，就得彻底的替人家解决，花一些时间，也不是白白浪费的。

三、对于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他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组织所开除。如果在政治上发生这种问题，他就会认为前途没有希望了。所以不是到了必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要随便开除党籍。

在中央组织部常常有许多被开除的同志不服来上诉，或者写上诉书。有一个人被开除党籍，他还很年青，因为有人供他是托派；这个人虽然已恢复党籍，但是七年来光荣的历史完全抛弃了，和一个新党员一样。他要求把它弄清楚。这个人的证人是有的，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延安，一个在一二九师，还有一个在外国，就一一写信去调查，经过很长时间，直到最近各方面复信收集齐了，才得到解决，知道以前是弄错误了。我们承认他过去光荣的历史，于是这个人由过去一个"死人"，只想"我还是到前线去牺牲掉算了"，现在变成活人了。时间花了两个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很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的。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男一女，有人告他们男的是托派特委，女的是托派分子，他们到这里来读书，要求进党校，进训练班，便来找我想法子。但是人家已经告了他们，于是我就照实告诉他，有人说你们是托派，这年青的一男一女听了我的话，马上就惊异得哭起来了。我便保证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来的时候一跳一跳的非常活泼，走的时候都哭了回去。后来查清不是托派，花了两星期工夫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是值得的。

因为我们同志中常常有不敢正确的替别的同志作证明人，所以领导人更要郑重的办理，否则这个人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使被嫌疑的同志冤沉大海。这一点无论是领导党的工作、领导军队，都要绝对注意。

同志们！做父母的爱护他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共产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他的子女。任何一个人犯了错误，应当使他纠正。如果他犯过的错误非常严重，甚至是很大的罪过，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看他过去有没有功，如果有功就把他功过比一下。如果他从前犯了错误，现在还在犯错误，那么只要赶快觉悟，下一个决心，回头是岸，将来能够转变得好，还可以将功赎罪。我们共产党是讲公道的。犯了错误只要以后能切实改正，在革命队伍里应当允许人家继续革命的；今天犯了错误，你以前的功劳可以拿来相抵；若是今天有错以前也有错，可以将来赎罪。我们共产党要尽最大可能把别人挽救回来，因为这样对于革命有利益。

四、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抬干部的轿子是欺骗干部，这是不对的。如果对于下面干部只说干部的好，隐饰许多缺点，以致养成干部的自高自大，工作不求实际，这样教育，只会害干部，而不会帮助干部。

干部中间也有些常喜欢别人说他的好话，因为说他好，他就感到舒服，不然他就生气很不乐意。其实说话好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并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但是干部中常常不了解这一点。俗话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所以我想每个同志都要注意这一点。

总结起来：爱护人很重要。如果提拔干部，得估计他全面的能力；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的去解决。当一个干部将要发生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绝对要很郑重很谨慎的处理。对干部的教育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

我这个讲演完了。但是有两点必须申明：第一，同志们不要引起这种感觉，以为革命纪律这东西也可以不要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一个革命的队伍必须有铁的纪律，来保障完成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如果没有铁的纪律，也就不会存在，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革命的纪律还是要的，希望同志们不要因此而违犯革命的纪律，我这篇讲演不能帮助那犯纪律的人的。第二，同志们不要使用我这篇讲演来打反攻，过去受了什么冤屈、处罚，今天乘机来反攻、报复，这样就不好。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谁能够不做一点错事？只要以后能够改正就算很好。同志们要气量大些。

我的报告就在这里完了。

中央关于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工作原则的决定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以我们之知识、力量、干部及经验，来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工作，应根据以下原则：

（一）凡我们的帮助，能推动国民党及其军队之进步，有利于整个抗战者，应决心帮助之。

（二）但他们想利用我们的知识、经验、干部，造成对付我们的条件，制造磨擦，而不利于整个抗战者，我们应拒绝帮助。

（三）因此，帮助必须有条件的、有限度性的、有进展程度的。否则，所谓大公无私、披诚相见，实际只自己搬石头打自己脚，不但于我无利，且于整个抗战有害。

因此，凡我对国民党及其军队各项工作之建议、计划、供献经验及供给干部等，均应遵守上述原则。望加注意。

中央书记处

中央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二日）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过去现在都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地位。抗战以来，工人阶级虽然遭受空前的牺牲，但是他们英勇参战，忍受饥寒退出日本工厂，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日夜维护交通运输，积极生产保障军队与居民的供给，购买公债，募捐慰劳等等，这些都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是最觉悟的，并且是抗战中重要力量之一。但是由于许多地方对于工人组织之歧视，由于许多厂主资本家只顾私利，不明大义，对工人运动之压制，由于工人内部统一运动的努力不够，还由于我们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工作还未达到必须的程度，所以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作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组织工人阶级并发挥其力量到最高度，是争取抗战胜利最重要工作之一。

第二，我们党在工人运动中基本的方针，是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的工人运动进行统一战线，在统一运动中把工人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战争的各方面工作，在抗战中去解决工人失业、饥饿的问题与改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以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

第三，组织工人的方式上，应该依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运用一切可能去参加或组织各种工人的团体，进行各方面组织与教育工人的工作。

（一）在敌人占领的大城市，党必须运用各种方法与方式加强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组织工人阶级，教育他们，善于保持力量，积蓄力量，巩固和扩大已有的阵地，准备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二）在某些将被敌人占领的城市产业中，党应该在短时期内准备动员最大部分的工人去参加乡村的游击战争，留下的应该只是必要与可能存在继续工作的力量，以便继续的在群众中工作。

（三）在华北及一切可能组织工会的地方，应该尽可能的把工会组织起来，吸收最大多数的工人于工会之内，与农民及一切抗日团体结成亲密的关系，使工会成为抗日政权下有力的团体。

（四）对于各地抗日各党派所领导的工会，我们党应该赞助他们，领导工人去参加这些工人团体，赞助他们的扩大与充实，尽我们一切可能去提高这些工人的政治觉悟。

第四，在准备今年“五一”的工作中，各地党部应该根据这一决定，按照各地不同的情况，参加或组织“五一”的大会、纪念会、座谈会，解释“五一”的意义与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作用，进行组织工人及领导工人参战的各种工作。

第五，为了开展职工运动，在党的组织上应该：

（一）立即建立与健全各级党委员会下的职工部与职工运动委员会，或民运部中的职工

科：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职工部与职委应成为地方党委员会的重要工作部门之一。

（二）各级党的组织应该用最大力量去建立工厂支部，发展工人党员，经常吸收因日寇进攻而由城市工厂散到乡村中的觉悟的工人入党，吸收乡村中觉悟的雇农入党。

（三）加强对工人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注意培养工人干部，吸引工人干部来参加适当的工作，并经常在政治上、工作上教育他们。

（四）各地党部应经常的向中央作该处职工运动的报告；"五一"的工作报告，必须迅速送来，使中央有可能根据各地具体情形给各地和全国职运以指示。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报告通过的决议——

中共扩大的六次中央全会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之间的工作以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同时一致指出党在这时期的进步与成绩。党在政治局领导，全党同志努力，和全国军民拥护之下，在极艰难复杂的条件之下，顺利的完成了有历史意义的政策转变——从国内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各政权对立的局面，转变到提出和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于抗战基本趋势的分析，对于目前抗战形势的估计和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以及其他事项，扩大的六中全会完全同意。同时，扩大的六中全会一致指出下列诸项，以为全党同志努力奋斗的准绳：

一　中华民族十六个月抗战的基本总结

日本法西斯军阀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起武装侵占我东北四省之后，去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以来，更实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来进攻我国北部、中部及南部各省。其目的是企图灭亡我中华民族，吞并我整个国家。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由于国民党国民政府对日实行民族抗战政策的结果，由于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的坚持的奋斗，由于全国军民奋起抗敌，已经掀起了伟大的英勇的民族自卫战争。十六个月来的抗战，是我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伟大历史事件，造成了我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团结和进步：长期受外敌压迫的民族抬起头来了，分裂的国家政权统一起来了，对立的党派携手合作了，互相斗争过的军队变成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了，国家政治制度开始走向民主化了，穷苦的民众大批的起来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了，在敌人后方空前规模的游击战争发动起来了，中华民族的英勇苦斗已为全世界所同情所钦佩了。在抗战烈火中，旧的阻碍进步的和分裂国家的屏障是在破坏着，团结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为一个统一力量的过程和民族自强的新生命是在生长着。

十六个月的抗战，虽因敌我力量的悬殊，损失了许多的大城市与铁路，牺牲了数十万的英勇战士，全国人民遭受了莫大的灾难。然而我们打破了日寇的速战速决的计划，消耗了敌人数十万兵力和数十万万经费，增加了敌寇内外的困难，博得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对敌谴责和对我同情。十六个月抗战的经验证明：中华民族有抵抗外寇的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然而求得速胜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这是因为，敌是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比较发达的工业和军事技术。但敌为小国，人少兵少；其进行的战争是野蛮的侵略战争，违反本国人

民利益，遭受世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是在死亡的道路上向下发展。我是半殖民地国家，工业与军事技术比较落后。但我为大国，人多兵多，地大物博；其进行的抗战是进步的民族自卫战争，合于全民族利益和受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在抗战中的中国是在解放、自强的道路上向上发展。因此敌在长期战争中将愈战愈难，愈战愈弱，一直到最后失败。我在长期抗战中将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一直到最后胜利。这个过程将表现在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在敌方为进攻——相持——退却，在我方为防御——相持——反攻。在第一阶段中，我国的统一团结与进步，建立起持久战的必要基础。但因敌我力量的悬殊，使我不能不在正面采取运动防御的战略，在敌后则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使敌人战线延长，兵力分散与消耗。这样坚持的结果，将迫使敌人停止其战略上的进攻，而使战争进入到敌我相持的阶段。在我力量准备完毕时，我将配合日寇的更加困难与国际的有利条件，实行反攻，以达到驱逐日寇出中国的最后胜利。战争的长期性，要求我中华民族长期的艰苦奋斗，要求我国共两党和一切抗日党派长期的亲密合作，用一切努力，团结和组织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这是保证抗日持久战获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

二　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

目前的抗战，正处在抗日持久战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与将来相持阶段的基本特点就是：一方面我国的困难加多，另方面我国更加团结与更加进步。武汉广州相继不保，大工商业的丧失，主要铁路的被占领，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在地域上的被分割，主要海道的被割断与外援的暂时减少，以及财政经济交通的困难，军火供给的不易，这些都是目前抗战形势及将来相持阶段中的困难现象。同时，日寇正在计划成立全国的伪政权，并加强其挑拨中国内部的阴谋，而汉奸亲日分子也正在利用这些困难加紧其投降妥协的活动。由于这些困难，可能在一部分人中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由于这些困难，抗战营垒中可能产生意见分歧甚至某些分子的动摇与局部叛变。这些都是目前及今后抗战中的严重问题，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方面。然而我们同时又必须估计到中国的更加团结，更加进步，与日本困难的同时增多。蒋委员长与全国人民的不动摇的坚持抗战，国共合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国共两党数量上的发展与其政治影响的扩大，全国人民对日仇恨与同生死共患难的团结，中国还保有广大的完整地区（西北、西南）作为抗战的总后方，而在敌后方则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抗日根据地正在强大着，英勇的中国军队积蓄了丰富的抗战经验并正在巩固其战斗力，全国政治制度正在逐步的民主化（尤其在敌后方抗日根据地中），广大民众正在发动与组织起来。同时，日本因战线延长将更感兵力的不足与分散，离开海岸铁路大河的山地战斗，将给日寇以更大的困难，敌后方广泛的游击战争的发展，将陷敌军于到处受击，忙于应付，消耗疲惫的境地。日本在华南的行动，势将引起美日、英日、法日关系的更加尖锐化。日本坚持侵略与中国坚持抗战的结果，将使日本人民处在长期战争的威胁中，而日益增长其反战反法西斯的运动。所有上述一切，都是我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客观有利条件。而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中心关键，就在于进一步团结我全民族，强固我国共合作，坚定我抗战信心，增长我新生力量，以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百折不挠的民族自卫战争。诚能如此，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反攻，无疑的是能够实现的。

三　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

根据上述的抗战总结与抗战形势的估计，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在此基本原则下，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具体任务则应该是：

(一)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

(二)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三)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扩大原有的军队，创造更多的新军，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技术装备和训练，保卫西南西北，停止敌之进攻。

(四)广大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

(五)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

(六)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改善政治机构，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效能。

(七)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工、农、商、学、文化界、妇女、青年、儿童各种组织），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

(八)为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和生产热忱，实行相当必要的民生改善。

(九)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增加收入，节省支出，克服抗战中的财政经济困难。

(十)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

(十一)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使日寇断绝外国军火和军事原料的供给，使我国能够得到友邦的军火、军事原料、医药材料、技术人员及财政的帮助。

(十二)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

(十三)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傜、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

(十四)厉行锄奸（汉奸、敌探、托洛茨基分子等）运动，巩固抗战的前线和后方。

(十五)发展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强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

上述各项，实为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具体的任务，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相信，由于这些任务的执行，中国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之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四　国共长期合作，保证抗战建国大业的胜利，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

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为了顺利进行抗日持久战，就必需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因此，建立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不仅是国共两党同志的热望，而且是我全中国人民和一切中国朋友的希望。抗战建国是长期的事业，抗战时期的合作，造成战后合作的基石。强敌的存在，三民主义之成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两党十余年来的相互关系所给两党党员及全国人民的深刻的教训，全国军民对于两党长期合作的切望以及为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共同目标，所有这一切，就使两党长期合作的事业，具有坚定的科学基础和理论根据，因此就能够由希望变成事实。为此目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正式决定：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再一次恳切的责成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互助互让和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以尊重合作中各政党独立性的立场，以谦和互敬互商的工作态度，去亲近国民党同志和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这不仅是为了减免国共两党间的磨擦，不仅是为了改善和加强两党合作的关系，而且是为了达到两党长期合作的目的。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国民党总裁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称：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加入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及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第二种形式则是由两党组织各级的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的事宜。六中全会认为两党合作组织形式的适当解决，对于亲密两党关系保证两党长期合作有极重大的意义。

由于国共长期合作的实现与持久抗战的胜利，将产生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中国的内部环境（以各党派各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取得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和国际的条件，都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既不会是所谓“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不会是苏维埃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出现，而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这一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在长期艰苦抗战中去打下基础和在抗战胜利后去发扬光大的。抗战建国纲领的公布，国民参政会的召集，省市参政会召集的实现，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的取得，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利的逐渐实现，陕甘宁边区、晋冀察边区及敌后方抗日根据地中民主之实施，民生之改善，——所有这一切，都是抗战以来国家制度走向民主化道路的具体证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将与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的过程相因相成。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的时候，一定就是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奠定其基础的时候。这一新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的建立，将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上的空前进步，将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起着光前裕后的伟大作用。

五　民族自卫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先进的儿女，以满腔热忱和无限英勇参加反抗日寇保卫

祖国的事业，是真正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国际主义战士应有的态度和必需的工作。共产党员必须在民族自卫战争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起模范战士的作用。共产党员的岗位，首先应该是在最能打击日寇的地方——前线和敌后方。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根据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共产党员对友党友军应该采取精诚团结和互助互让的态度，对执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应该采取最诚恳最积极的立场。共产党员应该根据民权主义的精神，在政治上组织上尊重各党派的独立性，应该成为尊重国民党和各抗日党派的独立性的模范；同时，应该坚持保证共产党本身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队伍中，应该成为智勇善战，执行命令，服从纪律，建立优良的官兵一体、军民一体与争取敌军的政治工作的模范。关于这一点，全会特别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共产党员，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及战斗员，在抗战中已经起了极光荣的作用，以后应该更加发扬这种作用。共产党员在行政工作中，应该成为廉洁奉公，不贪污，不腐化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成为不仅教育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不包办，不独断，与他人友谊的民主合作的模范。在对待一切非共产党员的态度上，应该是真诚和蔼尊重合作的模范。因此，广大的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使之成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性的布尔塞维克的政党，不仅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本身的迫切任务，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为了保证共产党员能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广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伟大力量，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的使用、教育和爱护这些干部。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提高工农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文化水平，更加改进《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的内容，大量设立各级培养干部的学校、训练班等。必须建立和加强能独立工作的地方党部，培养在党、政、军、民各种工作中有声望有信仰的领导人材。同时，必须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去反对危害党、危害统一战线、危害抗战事业的“左”右不正确的倾向。目前左倾关门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他们不了解在现时条件之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建立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同时，在于他们不认识抗战形势而产生的左的急性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同时，他们在困难前面失望，而发生对抗战形势及前途的悲观主义。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和采取两面派手腕，进行反党反中央斗争的张国焘，现在成了公开背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和逃兵。政治局代表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是绝对正确的。六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中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的意见，即是：“张国焘的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当然，各级党部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因不了解和无经验而犯错误的同志们，应当加以耐心的说服和细心的教育，乱加同志以“左”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错误，必须严格的纠正。同时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的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最后，六中全会特别唤起全党提高革命警惕性，以锐敏的注意力去严防日寇及

其走狗——托洛茨基分子及一切汉奸和反共的分子们在共产党内部外部所进行的各种挑拨离间和破坏危害的阴谋诡计，以布尔塞维克应具的党性来揭发和反对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采取两面派方法的）反党的和危害党的分子。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六中全会提醒全党同志注意：共产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中央及各级领导机关，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党的领导干部，和各中央局及省委的团结和统一，是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前巩固和扩大的最基本前提，同时也就是争取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和实现建国大业的最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指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死敌，而且是日本人民的仇敌，同时又是全世界爱护和平的先进人类的公敌。因此，“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与全体先进人类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坚决相信：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我伟大中华民族，在全民族团结，国共长期合作的条件下，在日本人民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条件下，在全世界爱护和平的民族国家与所有先进人类的同情与援助条件下，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在持久的艰苦的奋斗中，进行反对日寇的胜利的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光明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光明的前途已见曙光，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中华民族的。

论新阶段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

毛 泽 东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扩大的六中全会作报告，我准备说些什么呢？我要说的分为下述几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要说的就是这些问题。

同志们，在全国炮火连天全世界战争危机紧迫的环境中来开我们的六中全会扩大会，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我们的目的何在呢？我们一定要同全中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永远的团结起来，克服新的困难，动员新的力量，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反攻，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之目的，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我的报告的总方向。

一　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1)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召集

我们党的中央全体会议，自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开过第五次中央全会以来，差不多五个年头了。因为各中央委员分散工作于国内外各种不同的环境，使我们不能聚集一块。此次则除了几个同志之外，最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到了。而且到了全国各地许多领导工作的同志，使我们的这次中央全会成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本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本年召集的，因为战争紧张的原故，不得不把七大推迟到明年，而当前时局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必须作明确的解决，以便争取抗战的胜利，所以召集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

(2)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五年以来，我们党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变。最大与最主要的是：由国内各党派各阶级互相对立的局面转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内战争转到了抗日战争。

过去国内战争形成的原因，在于一九二七年不幸破裂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这是由于

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乃是由于新的历史环境。大家都已非常明白，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侵略东四省的第一步骤，进到准备并实行向全中国侵略的第二步骤。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使得国内国际情况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变化了与变化着国内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变化了与变化着国际间的相互关系。因而我们的党，根据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根据新的国内国际关系，沿着远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开始采取了的新的政治立场（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内任何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成分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道路，把它提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因而发表了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宣言，十二月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八月的致国民党书，九月的民主共和国决议，并且根据了这些，使得我们能够在当年十二月间发生的西安事变，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送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一个团结抗日的具体建议。去年五月，召集了一次临时性的代表大会（名曰苏区代表大会，有当时苏区非苏区及红军代表参加)，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红军实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实行改为民主制。这样，就在事实上由国内战争的状态转到了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当时，中国国民党也逐渐改变了它的政策，逐渐转到了团结抗日的立场。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那时，救国团体在许多地方有了组织，其他党派亦有了抗日要求。由于国共两党双方政策的转变，由于蒋介石先生的领导，由于全国军民的拥护，由于其他集团与其他党派的协力，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步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反抗。去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芦沟桥事变后的第二月，即去年八月，我们党发布了一个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同时，八路军改编完成，开赴华北作战。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党发表了公开宣布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与国民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宣言。第二日，国民党、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生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存在并与之团结救国的谈话。从此以后，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完全建立起来了。十二月，为着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又发表了愿与国民党不但合作抗日而且合作建国的宣言。此时未久，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江南作战。从此以后，抗日团结便日益进步了。

同志们，这种由两党十年战争转到两党重新合作，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执行了这个转变，奠定了两党长期合作的始基，是经过了许多的艰难曲折才完成的。然而由于中央与全党的努力，总算是完成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党的这个新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决议，九月八日《新华日报》）。并为了中华民族的胜利，号召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同志们，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那种难堪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已经发现了。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一伟大的民族战争，和中国过去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都不相同。

因为这个战争是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自寻死路走向崩溃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全世界先进人类正准备着空前广大与空前深刻的斗争力量以便抵抗与战胜德日意法西斯魔王争取世界光明前途的时期进行的。这样三方面因素的结合——以中国进步并且继续进步为主要基础的三方面的结合，就保证了我们的抗日战争一定能够最后取得胜利，而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一定要出现于东亚，并成为未来光明世界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一个中国，不但将造福于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而且将造福于全人类。

(3)六中全会的任务

这次扩大的六中全会，是处于抗日战争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关头开会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担负了重大的历史任务。

完全不错，抗日战争英勇奋斗了一年多，全国有了伟大的团结与伟大的进步，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虽然失地很多，但同时就有了很多胜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战争发展下去，主要的由于中国继续进步，同时配合着日本增加困难，国际助我增强，最后胜利定属于我，不属于敌，这也是可以预断的。谁要是看不见过去的伟大成绩与未来的胜利前途，谁就要陷入悲观主义的深坑而不能自拔。然而单看到这一方面，是不够的，抗日战争还有另一方面，还有它的消极方面，这就是我们面前摆着的许多困难。目前的情况告诉我们，一年多以来中国所有的奋斗，团结，进步，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还没有反攻敌人的力量。武汉现正处于敌人的威胁中，敌人还要向广州、长沙及西北等地进攻。因此全国人民都盼望共产党发表意见，新的环境提出了许多问题。同志们，我们必须发表意见，必须解决问题。对的，我们党早已发表了意见，许多根本问题也早已解决了。但新的环境要求我们发布新的意见，解决新的问题。

什么是新的问题呢？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增加新的力量，渡过战争难关，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达到驱逐敌人之目的，这就是当前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在全国无数人们中议论着，焦思着。我们应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呢？无疑是应该回答的。

这个问题展开于各方面，发生了许多的问题。

例如，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十五个月经验证明抗战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呢？战略方针是持久胜敌，还是速战胜敌呢？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还是敌人的？抗战有出路，还是妥协有出路呢？如果战争是长期的，又用什么方法去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呢？所有这些，是否能在十五个月经验中找到根据给以明确的回答？并是否可以依据这些过去基础而在抗战的新阶段中起其积极作用，借以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呢？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这是一类的问题。

又如，整个抗日战争将怎样发展变化呢？所谓新阶段，究将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阶段呢？假定武汉不守，战争趋势将怎么样呢？今后全国努力的方向，即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应是什么呢？有些什么好办法足以渡过战争的难关呢？这些更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又如，国共合作的前途与远景将会怎样呢？共产党有何根据来说长期合作呢？共产党有何办法来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呢？所谓不但合作抗战而且合作建国，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怎么样呢？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又如，世界风云如此紧急，其趋势将怎样呢？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有何利害关系呢？这也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还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如何呢？共产党员为着其党的政治方针而奋斗时，其工作态度应该怎样呢？共产党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同他党合作，同人民联系，足使艰难的时局走向顺利呢？共产党的内部关系怎样？有些什么好方法团结全党使之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在当前艰难的时局中起其大的作用呢？共产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究将怎样呢？这也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党内党外迫切要求解决的，近几个月来，我们经常遇到要求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们。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广大而复杂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现正处于同一个强的帝国主义作决死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已接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向新阶段发展的过渡期间。我们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是在这个时候开会的，扩大的六中全会的责任非常重大，我们要解决许多的问题。

二　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

（1）十五个月经验证明了什么？

让我们从十五个月的经验说起罢。

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给了我们以什么呢？我以为主要的有三方面。第一，证明了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因而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第二，证明了中国的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悲观论者之没有根据。第三，证明了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之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借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不是其他。

（2）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

抗战初期之时，许多人不从敌我力量基本上的对比出发，而从若干一时的与表面的现象出发，设想战争不久就可解决，速胜思想笼罩一时。然而蒋委员长在去年双十节即明白指出："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我们则在很早的时候就指出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决不是一个短时间可以解决的。"战争的结果，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要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所有这些都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完全证明其正确。

理由何在？在于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

我们很早就指出过，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的进步，这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是日本的困难；第三是国际的援助。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条件在抗战十五个月中已经怎样了？一句话回答：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但距必要的程度还很远。

拿第一个条件（战胜敌人基本的主要的条件），中国的进步来说，十五个月来确已有了一

个基础，但惟有继续进步，才能最后胜敌。所谓中国的进步，包括国内政治、军事、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一切方面。这些方面的进步，十五个月来是非常显著的。然而单拿这些已有的东西，还不能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反攻必须有一个准备时期，必须经过全民族的努力，使我们民族中一切生动力量有了一个广大的与深刻的发动，才有反攻胜敌之可能。因此速胜论是没有根据的，他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忘记了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具有很大的潜势力，发动起来足以使自己转败为胜，转弱为强，根本变化敌我形势，然而还待今后的努力，不是现成的事实。

拿第二条件，日本困难来说，也是这样。十五个月中，敌人出兵百万，伤亡数十万，用费数十万万，军队锐气日减，财政经济日形竭厥，国际舆论纷起谴责，这些都是日本的野蛮侵略与中国的英勇抗战造成的结果。然而敌人这些已存的困难，还不足以停止他的进攻及利于我们的反攻，还须待到敌有更大的困难我有更大的进步之时，才是反攻胜敌之机会。因此，速胜论在敌情方面也没有根据，十五个月经验已经证明了。

拿第三条件，国际助我一点来说，现在也还未至最大有利之时。十五个月来，我们有了国际间广大的舆论声援，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根据国联决议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证明了我们不是孤立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和平阵线各国有其各不相同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则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其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还在大量输送军火与军火原料给日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援华问题上已经具体的表现出来；然而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因此，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十五个月经验证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在这点上，过去经验也否定了速胜论。

总起来说，不论中国方面，敌人方面，国际方面，十五个月经验，都证明速胜论主张之毫无根据，相反，显露了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决不能是速决战，而应该是持久战。持久胜敌——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唯一正确方针。过去不相信这种方针的，现在事实给了明白的教训，应该再没有疑问了！

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第一个总结。

(3)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悲观论者毫无根据

抗战以前，唯武器论大张旗鼓，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亡，中国必会作亚比西尼亚。抗战以后，这种议论表面没有了，但暗中流行着，抗战每至一紧张关头，这种议论必兴风作浪一次，认为中国应该停战议和，不堪再战，再战必亡。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持久抗战的结果，依据于全民族的努力，中国必能逐渐克服自己的弱点，增加自己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必逐渐增加，国际方面对我之援助必逐渐增大。综合这些因素，最后必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蒋委员长早已明白宣示："战事既起，惟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去年七月庐山谈话）"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为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交战国势均力敌者大异其趣。故凭借不在武器与军备而在强毅不屈之革命精神与坚强不拔之民族意识。"（去年十二月告国民书）中国共产党亦早已指出："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的奔腾高涨。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因

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作最后的攻击，驱逐日本的侵略军出中国。”（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只要真的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的。”（中共去年八月决定）所有这些，都被十五个月的经验证明了。悲观论或亡国论者认为敌人强不可抗，中国不堪一战，妥协才是出路等等荒谬说法，已经证明是完全错的了。

理由何在？在于敌强我弱仅是一方面的事实，敌人尚有弱点存在，中国尚有优点存在。

什么是敌人的弱点呢？第一，他是比较小的国家，他的兵力、财力不足，经不起长期的消耗。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在中国的坚强抵抗面前又不得不分散与消耗，使他无法占领全中国。即在其占领地区，亦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与某些平原地带，其他仍然是中国的。第二，敌人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是退步的。他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举行侵略战争，并迫使他采用异常野蛮的掠夺政策。这样，就使他的战争，一方面变为同整个中华民族绝对对立的战争，迫着中国无论什么阶层，无论什么党派，都不能不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另一方面，变为同他本国人民大众绝对对立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悉率人财以应战争的结果，已经在他国内人民与前线士兵中间逐渐酝酿了许多的不满，战争发展下去，无疑有迫使他的人民与士兵大众走上用坚决的方法反对战争本身的趋势。这些都在十五个月中已经开始证明了的。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敌人自己方面而使敌人必归失败的最主要的根据。第三，正是由于敌人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换句话说，损人利己的，就不得不把他自己同一切和他利害相反的国家处于对立地位。除了两三个法西斯国家之外，一切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大众，都不赞成日本的侵略战争。这样，就使得日本不得不日益缩小其国际活动的范围，日益处于孤立地位。这也是十五个月中已经开始证明了的。

这样，日本国度比较的小，影响到他兵力、财力的不足；日本战争的退步性；日本国际地位的孤立：这三者同时结合在一块，成为日本战争中存在着的先天性的弱点与困难，而这些弱点与困难又正在日益发展之中。对于这些，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是瞎子，他们全没有看见，而仅仅看见了敌强我弱这一点。所以亡国论与悲观主义在敌情方面并没有根据，因而他们的妥协政策只能是亡国政策。我们是最后胜利论者，我们的观点则在敌情方面有充足的根据，十五个月经验已经开始证明了。

什么是我们的优点呢？第一，我们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不管敌人占去了我们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然而我们还有大块土地作为我们长期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的根据地。即在敌占地区我们也还有许多游击战争根据地。这个特点，是和小国如捷克、比利时等根本不同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优点。第二，我们今天的抗日战争不同于中国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我们的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是进步的战争。不但战争本身的性质是进步的，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进步基础之上进行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不同于一切历史时期的中国，我们有了比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的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与进步的军队。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它本身包含着可能继续发展进步的伟大力量。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我们方面而使我们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的根据。十五个月的经验证明，在原有进步基础上进行着的伟大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已经推动了全中国的进步，旧的民族腐败传统是在破坏着，新的民族进步力量是在生长着，一个全民族统一团结进步发展的伟大过程是在向前完成着。抗战以前的中国不同于抗战以后的中国，这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的了。而抗战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目前尚未完结）的中国又将不同于抗战

尔后阶段的中国，也已经可以预断。还有，第三，我们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不管资本主义国家现时还保存其许多矛盾政策，也不管国际局势可能暂时地影响到各国助我的程度，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澳洲人，以及其他亚洲人。十五个月来世界各国的同情与援助，给了我们以这种确信。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的中国，能够同时配合着世界的援助，因为今天的世界已不是从前的世界，整个世界先进人类已成为休戚相关的一体，敌人要使我们陷于孤立的企图，只会是徒然的。

这样，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我们又有国际的援助，这三者同时结合在一块。这些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不但已经存在，并在日益发展之中。在这里，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同样是瞎子，他们一点也看不见，而只看见我们是弱国，是劣势，是半殖民地这一点，喃喃发出其"抗战必亡"、"再战必亡"的胡说，其中许多坏蛋就根据这种胡说暗地进行其投降妥协的阴谋。我们相反，我们要根据十五个月经验中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向全党全国明确地指出我们国家与我们战争的长处与短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并指出长处与有利条件在全战争中占居着优势，号召全国努力奋斗，发挥自己的长处，增强自己的有利条件，克服自己的短处与不利条件，为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最后胜利将是谁的呢？我们确定地答覆：中国的。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我们的政策：坚决抗战还是动摇妥协呢？我们确定地答覆：决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妥协，只有坚决抗战才是出路。东四省之沦亡，奥国之灭亡，捷国之瓜分，都并非因为抗战，这是有目共见的。现在还是一样，在中国的许多优良条件下，抗战必兴，但如走妥协道路，则灭亡无可避免。因此坚决反对妥协论，反对悲观主义，唤起全民奋战到底，乃是唯一无二的方针。

总起来说，敌强我弱这个矛盾着的对比，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决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我们是持久胜敌论者，不是速胜论者。敌小，我大；敌人战争是退步的，我们战争是进步的；敌之国际地位比较孤立，我则比较能得外援：这几个矛盾着的对比，又决定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定属于我，不属于敌。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经验的第二个总结。

（4）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两个基本问题已从十五个月抗战经验中证明了。但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方案如何？则过去国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许多人认为照老样下去就可以了，他们不注意团结全国，不注意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的改进，甚至加重磨擦，阻碍进步。我们则从来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唯有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力求进步，依靠民众，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国国民党在其抗战建国纲领中明白指出："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负担。"中国共产党亦早已指出了："抗战时期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中共去年八月决定）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十五个月经验已经证明了。

抗战以来，把国内各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党派、集团都团结起来了，各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军队，都统一于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了，抗战十五个月的坚持，没有这个统一团结是不可能的。也只有抗战，才能统一团结各方面。这种统一团结，就是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但十五个月经验又向我们证明：敌人破坏阴谋之严重与内部团结巩固之不足。抗战为什么遭受很多挫折，为什么至今还不能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除了客观原因之外，统一战线力量之不足，统一战线还没有必要的扩大与巩固，是其最主要的原因。由此可知，只有更加统一团结全民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这是第一。第二，十五个月抗战，不但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同时又暴露了这种团结之不足；而且推动了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的进步，同时又暴露了这种进步之不足。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全民族各阶层中一切生动力量，而欲达此目的，非从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力求进步不可。没有各方面的更大的进步，就不能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也就不能更进一步的统一团结全民族。第三，十五个月抗战又证明了民众援助抗战力量之伟大；同时也证明了民众力量之仅在开始发动，因而使抗战得不到民众的广大援助而遭受了许多挫折。从此得到教训，国人必须进一步的认识抗战依靠民众这个基本问题。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中国今后的进步，还必须充分表现在发动民众力量这一方面。

总之，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于巩固与扩大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在于力求进步以发动全民族的生动力量，在于依靠民众以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总结。

同志们，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只要我们与全国坚持这个总方针，并作了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抗日战争正在向着一个新阶段发展，新阶段中有许多新的任务，但这个总方针是不变的，十五个月经验作了我们观察新的形势提出新的任务的基础。

三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1）研究战争与统一战线的规律性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同志们，在我们总结了过去经验之后，重要的问题，在于看一看当前形势发展的趋向。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怎样从过去基础之上向前变化发展的？这是我们现在要答覆的问题，这一点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变化发展的行程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我们就只能跟着战争打圈子，让战争把自己束缚起来，而不能将其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加之以调节整理，造出为战争所必需的条件，引导战争向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必须懂得抗日战争的规律性，才能实现对于它的战略指导，才能决定为战争服役的一切战略，战术，政策，计划与方案。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只有我们研究了与认识了它的规律性，我们才能有效地推动统一战线使之进入巩固发展之途，而为战争的胜利起其支柱的作用。

我们现在先来说战争问题。

（2）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主观能力的优劣决定战争的发展过程

历史上的战争有一个阶段就完结的，例如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只有日军进攻，俄军败退，就结束了。又如意亚战争，也只有意大利进攻，亚比西尼亚失败，就告结束。中国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情形，这是由于一方面双方强弱不同，又一方面双方指导能力优劣不敌而造成的，这是第一类战争。第二类战争，以两个阶

段宣告完结。例如法俄战争，拿破仑从进攻到退却，俄国从退却到反攻，双方都有两个阶段。中国古代有名的吴魏赤壁之役，秦晋淝水之役，也是这样。虽则两军强弱不同，但弱者善于利用其他优良条件，给以正确指导，故于退却之后，接着反攻，战胜敌人。但是还有第三类战争，例如外国的七年战争，八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乃至二十年前四年的欧洲大战（特别表现于西战场），都有三个阶段。甲方进攻，乙方退却，为第一阶段。双方相持不决，为时甚长，为第二阶段。乙方反攻，甲方退却，为第三阶段。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类的战争。这类战争的特点，在于有一个较长的或很长的相持阶段，这也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战争指导集团的特性而造成的。

中日战争属于那一类战争呢？我以为是属于第三类战争的。这是由于双方不同的历史条件与不同的战争指导集团之特殊情形而造成的。

（3）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战争的三个阶段

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将表现于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由于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故出现了敌方进攻，我方防御的第一阶段。不说退却而说防御，是说以战略的运动防御即节节抵抗的姿态而表现其退却，不是一下子乾脆退却。但又由于在敌则小国，退步，寡助，在我则大国，进步，多助这些特殊的条件，我之英勇抗战又使敌在进攻中受到分散的困难与消耗的损失，而不得不于一定时机结束其战略上的进攻，转入军事上保守其占领地而从政治上与经济封锁上向我进攻的阶段。此时敌虽消耗，但一时尚未消耗到使之转入失败的程度；我虽坚决抗战与各方面向前进步，但一时也难进步到足以转入反攻驱敌出国的程度，依上诸因，一个双方相持的第二阶段，或中间阶段，就形成了。由于第二阶段中敌之困难与我之进步俱日增，又配合着国际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形势，就能使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原来状态逐渐发生变化，进到在全局看来日益于敌不利而有利于我之局面，先到敌我平衡，再到我优敌劣，彼时，就可转入我之反攻，敌之退却的第三阶段了。

上述三个阶段的看法，是依据敌我既存的与将来可能发生的双方相反对比之具体条件而作出的一种对于整个战争过程的估计，现在并不是事实，而是一种可能的趋势。要依我之主观努力，创造出为这种可能趋势所必要的条件，才能使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然而依据既存条件，加上正确指导与全民族广大而坚持的努力，是能够使这种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的。

（4）速胜论者与亡国论者都反对这种估计

速胜论者反对三阶段论，认为我能迅速反攻，无需乎要一个中间阶段。这是不对的。抗日战争面前存在着许多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一定的时间，迅速反攻是不可能的。速胜论者的反对三阶段，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过低估计了敌人力量，一方面又过高估计了自己力量的原故。亡国论者也反对三阶段，认为相持与反攻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是一个亚比西尼亚。这是不对的。他们与速胜论者相反，过高估计了敌人力量，而过低估计了自己力量。在他们面前只有黑暗，承认敌人能够灭亡全中国，我之抵抗与努力只是徒劳，办到敌我相持亦不可能，更不说什么反攻胜敌了。因此，必须一方面反对速胜论，又一方面反对亡国论，才能坚持我们的三阶段论。而在当前情况下，反对亡国论比之反对速胜论更加重要。另有一些人，口头上赞成持久战，但不赞成三阶段论。这也是不对的。所谓持久战，所谓长期战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战争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

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

（5）三阶段论与国际形势的关系

当张高峰事件发生之时，国内一部分舆论兴高彩烈，以为日苏战争如果爆发，中国就可以转入反攻，无需乎要持久战了。在这种观点下，三阶段论当然不能成立，我们的估计是错误的了。这是主要依靠外援的思想，是速胜思想之一种。然而国际形势不是照着这些朋友们的主观志愿发展的，而是依照它自己的规律。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世界的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正在为着欧洲战争危机问题，在西方纠缠不清，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拿这种情况来看中日战争，迅速反攻的两阶段论也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但不怕三阶段，而且正要造成三阶段。三阶段是中日战争的规律，不但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有其根据，而且也在国际形势上有其根据。

（6）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

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在于包含一个过渡的中间阶段。这就是说，第一，我之抗战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停止敌之进攻，假如敌之进攻不能在一定时间与一定地区停止下来，就无所谓性质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二，相持阶段出现了时，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准备我之反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设若不然，就不能过渡到反攻阶段里去，而只是永远的相持，也无所谓三阶段。在这里，对于速胜论者，我们肯定地说：必须经过一个准备时期，才能团结全国，克服困难，生长新的力量，同时配合着敌人的困难，国际的援助，然后实行反攻，驱敌出国，否则是不可能的。拿主要依靠自力胜敌的观点来看问题，不可避免的要作出这个结论。对于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我们肯定地说：只有这个过渡阶段，才是全战争的枢纽。中国化为殖民地还是获得解放，不决定于第一阶段中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中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是可惜的，增加了敌人的力量，减少了自己的力量。然而很多没有丧失的东西尚可作为制胜敌人的资本，唉声叹气于宝物的丧失是无益的。第一阶段中保存着的领土与各种有生力量，特别是已经获取的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的进步，是最可宝贵的，这是第二阶段中继续进步与准备反攻的基础。然而这仅仅是继续进步与准备反攻的基础，还不能决定反攻，决定反攻的东西是第二阶段中增加上来的力量，没有伟大的新生力量之增加，反攻只是空唤的。

（7）三个阶段的特点，第一阶段

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特点，已经出现了的，尚未出现而可以预计得到的，有概略指明之必要，对于指导战争与决定政策有重要的关系。

第一阶段有些什么特点或重要标志呢？

有如下三方面的东西。

第一，中国方面：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全国军队的参战，抗战的坚决性，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发布，国民参政会的开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取得合法地位，游击战争的创造，全国军队的进步，民众运动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方面表现进步的大事件。但同时，却又有许多有不利事件与不良现象，例如：主要大城市、交通线与主要工商业的丧失，土地与人口的丧失，全国进步的不平衡（有些地方进步得非常之慢），政治制度之一般还仅在开始走

向民主化，顽固分子与腐败现象的存在，妥协倾向的酝酿等等。

第二，敌人方面：军力财力的消耗，世界舆论的责备，军纪的败坏，军队战斗力的相对地减弱，国内人心与前线军心不满的酝酿，张高峰战争的失败，汉奸军队的难于组成及已经组成者的无能等等。这些都是表现其困难的大事件。但同时却又有表现其能力的东西，那就是：进攻的坚决性，军力的顽强，占领地的扩大，政治组织力的强韧，阴谋机关的有力等等。

第三，国际方面：援华运动的增长，苏联力量的壮大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的东西。但是还有别的东西：欧洲大战的酝酿，英日间某种程度的妥协倾向，各国军火原料的助敌，这些都于中国不利。

以上中国，日本，国际的许多东西，都是抗战第一阶段中十五个月来表现的特点。这些特点，将分别生其影响于新的阶段之中。

（8）第二阶段

在假定武汉不守的情况之下，战争形势又将出现许多新的东西。虽然敌占武汉并不即等于旧阶段的完结，新阶段的开始，由现在敌人尚能继续进攻到他被迫停止进攻之时的这段时间，还是一个由旧阶段转向新阶段去的过渡期间。虽然如此，但武汉不守成为事实之后，就将发生许多新的情况。

武汉不守之后，以及新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可以预计的基本情况，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又一方面则更加进步。这是新阶段中的基本特点。

更加困难将表现于下述各方面：(一)由于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敌分割了，由此将发生许多新的问题；(二)财政经济之异常困难；(三)英日某种程度的妥协倾向（或相反，在日本坚持独占与威胁南洋的条件下，英日有进一步冲突的可能）；(四)如果敌攻广州，中国主要的海道交通有被割断之虞，国际援助将暂时的部分的减弱；(五)全国性伪政权有形成的可能及其对于抗日阵线的影响；(六)抗日阵线中部分叛变的可能，妥协空气的增长；(七)悲观情绪的生长，意见纷歧现象的增加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发生而将加诸抗日战争身上的新困难事项。估计到这些困难，才便于有准备有计划地克服之。

更加进步将表现在下述各方面：(一)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在政治上的更加进步；(二)国共关系的改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三)军队改造工作的进步；(四)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五)国家民主化的进步；(六)民众运动的更大发展；(七)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实施；(八)抗战文化教育的提高；(九)苏联援助的继续与可能增加及中苏关系的更加亲密等等。

整个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是中国准备反攻的阶段。其时间长短，依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及国际环境如何而定。但我们应该准备长期战争，熬过这一段艰难路程，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

第二阶段中虽然敌我在战略上是相持的，但仍有广泛的战争，主要表现于主力军在正面防御，而广大游击战争则发展于敌人的后方。那时，游击战争在许多重要战略地区将变为非常艰苦的战争，现在就应该准备对付这种艰苦。

（9）第三阶段

具体情况不能预计。但彼时必是我之反攻条件业已准备完毕，同时敌之困难程度大大增加起来，国际形势又大大于我有利。彼时战争形势，不是战略防御或战略相持，而是战略反

攻了；不是战略内线，而是战略外线了。彼时国内政治上必须有大的进步，军事上必须有新式技术，否则反攻是不可能的。

(10)保卫武汉是争取时间问题不是死守问题

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战略决战，在一二两阶段中都是不应有的，都足以妨碍抗战的坚持与反攻的准备，因此必须避免。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的决战，应是持久战的方针之一。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是持久战方针内所许可的，并无为之震惊的必要。

(11)由目前过渡到相持阶段

只有停止敌之进攻，才有利于我之准备反攻。而要达此目的，还须给一个大的努力。故由目前过渡到敌人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其占领地，出现整个敌我相持的阶段之时，还是一个斗争的过程，须克服许多困难才能达到。因为敌在占领武汉之后，还不会立即结束其进攻，他必定还想向西安、宜昌、长沙、衡州、梧州、北海、南昌、汕头、福州等地及其附近地区进攻。我要停止敌之进攻，还须针对着敌人这种企图继续执行战略的运动防御战，用极大努力进行坚持的战斗，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而又不为敌人所算，使敌之进攻不得不停止，把战局过渡到敌我相持的有利局面。

(12)但相持局面快要到来了

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如果他再要进攻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地并作占领之企图，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抗与我之敌后广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这一形势——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在我则正面防御与敌后威胁，这是敌之极大劣势，我之极大优势。当然，在整个敌我力量对比上说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形势并未变化，这只有在长期相持阶段内我用全民族的极大努力，并配合国外条件，才能使之变化。然而敌在进攻武汉的战斗中，他之强的力量已经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强的力量之进一步发挥，一方面固然给了我们以损失，然而同时就给了他自己以困难。因为敌之强的力量（同时即是其不足的与分散的力量）在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之后，气力势将衰退下去，就不得不使其总的战略进攻接近了一个顶点。我们承认敌之进攻还有一点余威，并最好与最恰当的是估计到他的这点余威还相当的大，因此还有充分可能他要攻略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处及其附近地区，甚至要准备他向着整个粤汉路与西兰公路之进攻。然而这在总的敌人力量上将只是一点余威。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的差不多了。并且在其正面与占领地内必须对付的广泛战争还依然存在，日苏，日美，日英，日法之间的矛盾在增长着，国内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前线官长与士兵的矛盾，大量支出与财政竭蹶的矛盾在加深着，这些都是使得敌人大大皱眉的地方。我们及全国人民必须看到这些地方，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赞助政府调整全国之作战，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

陇海路、西兰公路及其他战略地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胜利地与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

(13)敌力在逐渐减少我力在逐渐增加中

敌人是否增加了力量呢？就其原有的力量来说，没有什么增加，相反，他的力量大大地减少了。敌人原有的军力与经济力，是大大消耗了。十五个月战争中，他的军力伤亡了数十万人，消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与军用资材，毁灭了数百架飞机与百余艘军舰，支出了数十万万元经费，这个消耗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直到他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之时为止，他还要消耗一大批力量。在这点上，他的盟友希特勒早已大大地发起愁来了。然则敌人毫无力量的增加吗？有的，这就是对于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及部分乡村之占领，从各国手里及中国民族资本手里夺取了市场，从中国手里夺取了资源与生产工具，夺取了许多人力，这些是日本战争之唯一目的，他是暂时地增加了这些东西。然而问题是：这些东西能抵偿已有的战争消耗吗？不能，消耗了的全部战争“投资”是已经消耗了，他要取偿还需付以新的生产投资。问题又是：抛开日本生产投资之无能不说，假定他能的话，他能取偿其战争消耗吗？也不能。因为往后依然存在着广大战争，依然每天要消耗。只要有广大的敌后游击战争存在，例如现在华北的游击战争那样，他的取偿是很困难的。由于不断的战争，他将不但不能取偿旧的，而且还须支付新的，只要我们的抗战坚持下去，日本的这条可怜命运是大体确定了的。我们说日本在第二战略阶段即相持阶段中将逐渐化强为弱，化优为劣，这样继续消耗是决定的一方面。现在说到中国方面。中国力量究竟是减少了呢？还是增加了？我们的回答是减少了，又增加了。减少的是原有力量的质与量，这表现在军队人员武器的消耗，人口、工业、土地与资源的损失等上面，这是使得我们感到困难的重要的一方面。然而不是没有增加的，增加的是新的质与量，这表现在全国的团结，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文化的进步，人民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的提高。主力军虽后退了，游击战争却前进了。一部分地方虽损失了，另一部分地方却进步了。问题是在：增加的程度今天还不够，今天还不够停止敌之进攻，今后更不够实行我之反攻，因此发生了必须用广大持久的努力去增加新的力量的问题。而这种增加，即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生动力量之更大发动与党政军民各方面之更大进步，基于今后之广大持久的努力是完全可能的。在主要的依靠自己生长的力量，再配合之以敌人困难之加重，国际助我之增强，就能使整个敌我形势发生变化，由敌优我劣之现时形势，先走到敌我平衡，再走到我优敌劣，这就是长期相持阶段中必须解决也可能解决的根本问题。

(14)敌据城市我据乡村，所以战争是长期的，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

于是问题在：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不但由于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而且由于这个帝国主义又复占据我之城市，我则退至乡村以抗敌，因而造成了长期性，速胜论在此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半殖民地小国也不可能。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数十年前也很困难。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

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的地区，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在数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则不同，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其次是敌人退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已临到衰老的境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与造成着把他自己送进坟墓的条件。又其次是国际形势变化了，旧的世界接近死灭，新的世界已见曙光。这些道理，我在《论持久战》中已详说过了。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毫无疑义，乡村反对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困难的，因为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我之行政区域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给了我们以很多困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在内战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还当帝国主义各国一致反共的时期。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毫无疑义是能够的。并且现在的所谓乡村，与内战时期的乡村有很大不同，不但地域广大，而且在云、贵、川等省大后方中，尚有许多城市与许多工业，尚可与外国联络，尚可建设。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从长时期中生息我之力量，削弱敌之力量，加上将来国际有利条件之配合，就能举行反攻，收回城市。蒋委员长在去年十二月告国民书中指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这是完全正确的，战争虽困难，胜利前途是存在的。

(15)妥协危机严重存在，但是能够克服的

我们早就说过，一部分患着恐日病的人们时刻企图动摇政府的抗战决心，主张所谓和平妥协，过去曾见之于南京失守之后，现在又在蠢蠢欲动了，这是敌人阴谋在抗日阵线内部的反映。这种危机是严重存在的，国人必须充分注意，不让亲日派得售其奸。亲日派的企图和敌人的企图是一致的，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假令得售其奸，抗战的前途就成大问题。因此，全国上下憬然觉悟于敌人阴谋与内部反间之可畏，自动自觉地努力反对这种阴谋，一刻也不容放松。这种危机是否能够克服呢？那是能够的。在国共两党及一切爱国志士团结一致并作了必要的努力之后，克服妥协危机，驱除助敌张目的妖魔鬼怪，而把抗战坚持下去，不但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亲日派究竟没有多大的势力，抗日派的势力大于亲日派。

(16)相持阶段中游击战争的新形势

新阶段中，正面防御的是主力军，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但敌后游击战争在敌我相持的新阶段中，将采取一种新形势发展着。什么是游击战争的新形势呢？即第一，在广大地区中仍能广泛的发展。这是因为在我则土地广大，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只

要我能坚持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正确地指导之，敌要根本限制我之发展是不可能的。但第二，在某些重要战略地区，例如华北与长江下流一带，势将遇到敌人残酷的进攻，平原地带将难于保存大的兵团，山地将成为主要的根据地，某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可能暂时的缩小其数量，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在现在，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在将来，为了配合正面防御使主力军得到休息整理机会，为了生长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坚持保卫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长期坚持中，把游击部队锻炼成为一支生力军，拖住敌人，协助正面。一般说来，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是比较前一阶段要困难得多的，我们必须预先看到这种困难，承认这种困难，不可因为前一阶段的发展容易而冲昏了头脑，因为敌人一定要转过去进攻游击战争。然而是能够坚持的，一切敌后工作的领导人们必须要有这种自信心。因为民族战争中的游击战争，不论敌人如何的强，总比内战时的条件优良的多。在这里，争取与瓦解伪军以孤立日寇，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17)抗日战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以上说的都是抗日战争的形势问题，以下要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

抗日战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之时，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之时。由于新阶段中将遇到比前更多的困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应该适应这种情况而表现其向困难斗争并将任何困难战而胜之之伟力。为了在目前过渡期间以及到了将来的新阶段，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表示其对于困难之无能，而是表示其具有克服困难之伟力，就必须认真的巩固统一战线与扩大统一战线。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战争的长期性与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是不能分离的。

(18)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忱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要求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只要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

然而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他们对于国民党怀疑的问题，就是能否继续抗战，能否继续进步，与能否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是互相结合不可分离的。我们的意见怎样呢？我们认

为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根据各种主客观条件，它是能够继续抗战，继续进步，与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

由于敌人进攻的坚决性，敌人对于中国各个阶层的严重的打击与掠夺，全国军队对于敌人的愤怒与抗战的英勇，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国际有利形势之存在等事实，基本上决定了全中国与国民党的政治方向。第一，任何党派，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政党与团体在内，是非继续抗战下去不可的，谁不继续抗战，谁就只有一条当汉奸的出路，此外没有任何出路。第二，任何党派，只要它是继续抗战的，就非继续进步不可。诚然，国内政治的进步不迅速不普遍，因此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也正因为损失，使得今后不能不在政治、军事、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求进步，以便能够抗拒敌人，恢复失地。这不论是当权的国民党也罢，其他党派也罢，都非继续进步不可。第三，国内进步的重要一环，是国民党组织形式的民主化，使其本身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可能有没有呢？我以为也是有的。抗日战争的大势所趋，国民党如果不向广大民众开门，容纳全国爱国党派与爱国志士于一个伟大组织之中，那要担负起继续抗战与战胜敌人的艰难任务是不可能的。在国民党五十多年的历史中，每遇大的革命斗争时，总是把它自己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最显著而最有历史意义的有两次。第一次，从同盟会组成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为了反对满清建立民国之目的，联合了一切反满的革命党派（从光复会到哥老会），在这个期间，它的党员充满了英勇斗争的事迹，再接再厉，富于朝气，因而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第二次，民十三年至十六年，为了反帝反军阀之目的，对内联合了工农与共产党，对外联合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了有名的“三大政策”，因而创设了黄埔，建立了党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所有这些，不但表现了国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也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今天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三次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时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必须也可能把它自己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这一伟大的运动已在开始，承认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合法存在，承认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系统，抗战建国纲领中明白宣布“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负担”，以及国民参政会的召集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都表示了把它自身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之开始。现在问题是：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这一扩大组织的运动将取何种态度？赞成还是反对？我们说，我们任何时候都是赞成国民党把它自己扩大发展成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民十三国民党改组之时，我们就取了赞助政策。今天更当民族危机万分严重之际，我们将尽一切可能赞助之。理由是抗日的友军越大越好，单单一个共产党的发展进步，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处于第二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起了与坚持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并在自己的组织上向着广大革命志士开门，用以力争抗日的胜利。但若处于第一党地位的国民党依然保存过去那样的老状态，那就对于抗战，对于统一战线，都非常不利的。抗战将不能获胜，全民族陷于危险，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也逃不脱这种危险。所以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而且十分希望与坚决赞助国民党扩大与巩固其组织，实行党内民主化，并使其本身变为革命的民族联盟，以利继续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

(19)但在国民党的前途上尚有障碍物，须努力克服才能发展

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是存在的，其进步与发展是可能的，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的大多数是在领导和推动国民党前进。然而谁都明白，国民党中还存在着一些守旧分子，障碍着国民党进步的速度与程度。由于这些分子的存在，并与社会上许多守旧分子相结合，就在民族革命

战争的洪流中造成了一股逆流，顽固地抵抗进步之舟，相当有力地阻挠着国家民主化，阻挠着一切为抗战必需的进步事业之推行，阻挠着蒋介石先生在历次宣言、谈话、演说、命令中所说很多很好的方针方法之推行，阻挠着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之实施，阻挠着国民政府救国法令之实施，阻挠着民众运动之发展，这些都是事实，都是国民党进步所以不迅速不普遍与抗战所以受到许多不利的重大原因。他们是反对国民党进步，反对国民党发展，甚至主张妥协的，如果这些分子占居优势，那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就要受到极大挫折，所以值得严重注意。然而我们坚决相信，这种守旧势力是不能永久存在的，是没有占优势也难于占优势的，他们是逆流，但并非主流。在蒋委员长的领导，国民党大多数人的努力与全国人民的赞助之下，这种守旧倾向是能够克服的。共产党坚决赞助国民党的进步，而对于阻碍进步的守旧分子则希望他们弃旧图新，一同进步。我们希望这些人变一变，"君子之过如日月蚀"，改变过来就是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守旧的人在抗战过程中进步了，今后必仍有许多人会从抗战教训中发生觉悟而和大众一齐进步起来。这就是抗日战争中守旧分子的可变性，但也可能有少数人变得更坏，甘心被抗战巨涛席卷以去，这也是可变性的一面，对于这种人，就没有什么可惜的了。

(20)其他党派同样有光明前途

一切加入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发展的前途，我们都愿意与之建立长期合作，并给以尽可能的赞助。这不论对于第三党，国家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派，或其他任何集团，任何党派，都是一样。很明显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守旧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这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都应充分注意的。

(21)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历史原因，使得今天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任何外国的统一战线，如人民阵线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线，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有它今天的中国的特点。认识这些特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的。

这些特点是什么呢？归结起来，共有八个，即是：全民族抗日的，长期性的，不平衡的，有军队的，有十五年经验的，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三民主义的，处于新的国际环境中的。

首先是全民族抗日的。这个特点规定了我们统一战线的根本性质。一方面，我们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侵入国土的异族日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与发展起来的，又一方面，我们统一战线的组成，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不同国内民族之一个最广大团体。由于是反对异族侵略的，所以组织成分能够如此之广大。由于组织成分之异常广大，所以这个统一战线具有伟大的力量；但同时，统一战线内部又难免许多相互间的磨擦，而须恰当地调整之，才能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我们统一战线的这种最基本的特点——政治目的之反对异族侵略与组织成分之异常广大，不同于法国与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也不同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民族阵线（当时的国共合作），使得今天的统一战线产生了许多的特殊内容与特殊结果，这是今天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特点与优点，虽然在其组织复杂一方面不免同时包含着缺点。

第二是长期性的。这个特点是从第一个特点产生的。由于这个统一战线是用民族战争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就产生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因而又产生了统一战线的长期性。这一点，我在报告的第五部分还要说到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这一点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不相同。

第三是不平衡的。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各党派各阶层政治力量的不平衡，同时在地域的分布上也表现这种不平衡。国民党是第一个具有实力的大党，共产党是第二党，其他又在其次。这一情况，产生了许多特殊的东西。

第四是有军队的。国共两党都有军队——这个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由于有两党的军队，使得抗日战争中两党克尽分工合作的最善责任，互相观摩激励的好处也更多了。这一点和西班牙相同，但和法国不同，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不同，这也是使得两党能够长期合作的因素之一。

第五是有十五年经验的。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四年，一九二七至三六年国共分裂的九年，现在国共重新合作又有了两年，这个十五年中合作——分裂——又合作的经验，最深刻地教育了国共两党、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结论是：只应合作，不应分裂。这也是长期合作的基础之一。这种宝贵经验，世界各国都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也没有的。

第六是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这是中国的特点，西洋各国与此不同，所以是一个缺点，使得统一战线缺乏现成有组织的民众基础。但同时，各党之间可以分工地去组织民众，不须挤在一块老是磨擦，因为有的是尚无组织的民众，正待组织起来以应抗战之急需。

第七是三民主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条件，比之第一次合作与两党内战两时期都不同。今天只有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如日德意等反对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由于他们与日本的矛盾，现时也并不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反而采取赞助的立场。所有国家的先进人民都是赞助我们的，苏联更是诚挚的赞助。这种新的国际环境，对于我们的长期合作有重大影响。

深刻地研究与认识上述这些特点，才能采取恰当的政治上的政策与工作上的态度。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应付政治问题与工作问题，而是站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问题，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是需要这种科学基础的。

(22)统一战线的新形势

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十五个月团结抗战的教训，将促使各党认识这种发展与巩固之必要。发展方面，是扩大各党的组织与扩大民众的组织。巩固方面，是各党采取新的政策与新的工作，减少相互间的磨擦，办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抗战新阶段中存在着许多的困难，唯有统一战线各党广大发展其组织与高度巩固各党的内部关系与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有力地执行新的政治任务，战胜新的困难，达到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这就是抗日战争新形势中统一战线的新形势，由于各党的共同努力与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种新形势的到来是完全可能的。

四 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

根据过去抗战的总结与当前抗战及统一战线发展新阶段的估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和过去有些什么不同呢？

总的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

分别说来，有如下各方面的具体任务。一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应该赞助政府，并在政府领导之下，动员全民族实行起来，共产党员应成为执行这些任务的模范。

（1）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情绪，反对妥协企图。

估计到新的抗战形势下，必有一部分人，因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财政经济的困难，国际援助的不及时，因而发生着与增长着对于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而日寇，汉奸，亲日派，必将利用这种情绪，大放其和平妥协空气，企图动摇我抗战的决心。因此，全民族的第一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坚决拥护政府继续抗战的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这一任务，比过去任何时期为重要。

为此目的，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反复地指明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指明妥协就是灭亡，抗战才有出路，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用以达到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目的。

为此目的，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

（2）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反对分歧与分裂，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

新环境中，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企图推翻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针对着敌人的这种方针，全民族的第二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统治中国。

为此目的，必须调节国共两党之关系，调节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调节抗战各军之关系，调节政府与人民之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提倡公平合理互助互爱之精神，减少磨擦，减少意见分歧现象，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为难之行为。号召全国严重注意敌人，汉奸，亲日派在我

们内部的挑拨离间，制造不满，制造分歧，鼓励磨擦之阴谋鬼计。务使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响，务使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日益亲密起来，树立在困难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坚固重心，用以对抗敌人与汉奸政府，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3）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停止敌之进攻

针对着敌人现时进攻武汉并继续进攻华南与西北之企图，全民族的第三个任务，在于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整理现有军队，增编新的军队，为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而战，停止敌人进攻。为此目的，中国主力军方面，第一，必须发展高度的运动战，同时辅助之以必要的与可能的阵地防御，节节抗拒敌人，消耗敌之实力。第二，必须在大后方建立可能的军事工厂，并提高制造能力，接济前线的枪械与弹药。第三，必须在军队中认真实施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实施政治文化娱乐等教育，提高全军英勇奋斗持久苦战的精神。第四，就现有物质基础改善士兵生活，在连队中组织经济委员会，由士兵管理伙食。第五，提倡自觉纪律，废止打骂制度，提倡官兵之间的亲爱团结，以改善官兵关系。第六，实行公买公卖，待人和气，不强迫征粮，不强迫拉夫，不强迫当兵，改取政治动员方式解决食粮、夫役与新兵问题，以改善军民关系。第七，在前线各军之间，前线与后方各军之间，提高友爱互助精神，作战则互相策应，工作则互相观摩，消除互相观望互相嫉忌等不良现象，以改善各军之间的关系。第八，整理现有军队，补充缺额，同时增编新的军队，加紧教育训练，以利持久作战。用这一切办法，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为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而奋斗。

（4）广大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配合主力军作战

针对着敌之目的在于还要继续向我进攻，又将于一定时机抽兵进攻游击战争，企图巩固其占领地，使中国反攻困难，全民族的第四个任务，就在于广大地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许多根据地，巩固已有的根据地，用以缩小敌之占领地，在目前，配合主力军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在将来，配合主力军为实行反攻而战。半殖民地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游击战争的广大性与长期性，没有这种游击战争，便不能牵制大量敌军，有力地配合正面主力军之作战，而停止敌之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领地限制于一定地带，使之无法全部占领；便不能在敌人后方建立多数的抗日堡垒，坚持游击战争，并准备将来配合主力军之战略反攻。因此，第一，必须广大地发展一切敌人后方地带的游击战争，并创立多数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第二，必须依照华北榜样，留置或派遣足够数量之正规军队于敌后各个战略区域，作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骨干。这些军队应该逐渐学会游击战术，加强政治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创立根据地，并帮助敌后民众游击队与游击战争逐渐提高到正规军与正规战争的道路上去。第三，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必须发动所有男女人民卫国保乡的热忱，除动员他们大批加入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与补充留置敌后的正规军外，把他们组织到半军事性质的抗日人民自卫队中去。抗日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应成为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的普遍与经常的民兵制度，他们是不脱离生产的。第四，必须协助人民组织广泛的游击队。这是脱离生产的，各县各区都应该有，成为袭击敌人保卫地方的普遍的小队伍。第五，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其军事政治文化娱乐的教育，用以提高其战斗力。第六，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正确的军事政治制度，实现官兵的平等待遇，经济公开。第七，改造土匪部队，使他们走上抗日；肃清我军后方的及被敌利用的土匪。第八，游

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第九，依照敌情与我之战略需要，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新的战争情况。第十，必须依照战略需要，统一敌后各部队与行政区之领导，以便集中抗敌力量，消除内部矛盾；但应反对互相吞并的军阀行为。

（5）提高军事技术，创立机械化兵团，准备反攻实力

敌以不及我数之兵力而能节节深入者，除了我之政治原因外，我之技术落后是主要原因。针对着敌之长处与我之短处，全民族的第五个任务，在于提高军事技术，增加飞机大炮战车等之数量与使用人材，为着实行反攻而准备实力。为此目的，一方面须就现有的及可能继续增加的制造能力从部分制造与修理开始，认真从事这个工作。另一方面，多方设法从外国输入新式武器，用以逐渐改善军队的装备，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毫无疑义，我们应该从实际看问题，在现在，实际上战斗着的是大数量的低级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军队与人民武装，相信低级武装也能胜敌，提高政治精神，改善作战方法，发展游击战争，以补新式技术之不足。不在这方面着重致力，我们就忽视了当前的实际问题，无以克服目前的困难。在将来，为着准备战略反攻，非提高新式技术建设新式军队不可，须知没有现代新式技术装备的足够数量的军队，要实行反攻，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不在这方面提高注意力，并就可能范围内认真开始去做，我们就只看见现在，忘记了将来，无以克服前途的困难。在人力物力丰富的中国，只要政治条件改善，动员方法进步，加之以外国的协助，逐渐改善技术装备，决不是不可能的。

（6）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能力

敌人乘我弱点之处，不但在军事，而且在政治，在我政治制度之不民主化，不能与广大人民发生密切的联系。为补救此弱点，全民族的第六个任务，在于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没有这一方面的改进，要最后战胜日寇也是不可能的。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有了这种制度，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将会不可计量地发动起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渊源。我全民族彻底地统一团结的伟大过程之完成，也只有依靠民主制度之建立。关于这一点，须从各方面实际有所设施。第一，国民参政会的开会已开始了国家民主化的第一步，尔后应使该会工作公开的顺利的进行，该会议决事项应全部付之实施，并依据该会已经决定的方案认真的建立各省各级地方参政会，推进民主政治。第二，保证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在全国范围之充分实施。这种自由是在抗战建国范围之内的，只有充分地保证了这种自由，才利于普遍发挥抗日建国的力量。这里问题是保证中央法令在各地方之实施而不受地方之随意的限制。应该限制的只是不利于抗日建国的那种自由，即汉奸、亲日派的自由，其他都不应在限制之列。第三，从战区与敌人后方开始实行多量的民主制。例如：民选各级地方政府再由上级加以委任。战区各级政府采用民主集权的委员制，并设立各级人民代表机关。战区政府增设某些必要的工作部门；改变公文程式；清除贪污腐化无能分子，吸收抗日积极分子；减低薪俸，提倡艰苦生活；用以适合战区艰苦、复杂与流动的环境。战区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有颁布地方单行法令之权。战区男女公民，除汉奸外，均有选举被选举权，均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与武装抗日之自由。战区一切抗日党派均有公开合法地位，等等。在战区尤其在敌人后方，没有这些政治改革，要支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是不可能的。以上这些办法，都是

为着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增加政府的实力，使之能在抗日战争中起其最大的作用。没有问题，全国任何地方政府，应集中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不应因行政区域在地域上之被敌分割而有任何不尊重中央领导的表现。全国必须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

（7）扩大统一的民众运动，全力援助战争

全民族的第七个任务，在于扩大各种民众运动，并使之统一起来，全力援助战争。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一切须取给于民众，没有普遍发展的并全国统一的民众运动，要长期支持战争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亟须这样做。抗日战争正在遇到新的困难，唯有动员民众，才能有效地克服这些困难。在全国，尤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亟应做到下列各项：第一，保障一切抗日民众团体与抗日民众运动的自由，确立民众团体在法律上的地位。第二，物质上帮助民众团体，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第三，认真建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自由职业者、文化人与儿童的各种救国会，并使之依照地域与职业两种原则建立联合的组织。第四，发动民众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抗战工作。积极援助政府与军队，尤其在战区不可或缓。

（8）改良民众生活，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

改良民众生活问题，过去实行的太微弱了，因此不能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对于坚持长期战争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今后全民族的第八个任务，在于实行下列各项改良民众生活的政策。第一，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与残废的抗日军人。第二，救济战区灾民难民及失业工人。第三，在战区及敌后开始适当的减租减息。第四，调剂粮食及重要的日常必需品。第五，适当的增加工资，改善工人职员的待遇。第六，承认工人农民对雇主地主的团体契约权。第七，禁止雇主、地主、师父、工头等对工人学徒的虐待打骂。实行这些初步的生活改良办法之后，必能提高工农贫民群众拥护政府，参加战争与参加生产的积极性，不但战争需要的一切动员帮助将大大改观，而且工业农业生产的数量质量与商业的流通也会大大增加与提高起来，国家财政也就在新的农工商业基础之上而得到满意的解决。

（9）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渡过战争难关

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丧失之后，国家财政经济必大现困难，没有新的有效的办法，便无以渡过战争的难关。然而只要实行新的政策，动员人民力量，便任何困难也能够克服。因此，全民族的第九个任务，在于实行一种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事项如下：第一，新政策以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必要供给，满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并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与经济破坏作斗争为目的。第二，有计划的在内地重新建立国防工业，从小规模的急需的部门开始，逐渐发展改进；吸收政府、民间与外国三方面的资力；并从政治上动员工人，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物质待遇，改良工厂管理制度，以提高生产率。这些，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三，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发展全国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使全国农业手工业在新的姿态下发展起来。在战区注意保护农具牲畜及手工作坊，保证被隔断区域的经济自给。第四，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同时，注意发展合作事业。第五，在有钱出钱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的累进税，取消苛杂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第六，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征募救国公债、救国公粮，并发动人民自动捐助经费及粮食，供给作战军队，以充实财政收入。第七，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第八，厉行廉洁运动，

改订薪饷办法，按照最低生活标准规定大体上平等的薪饷制度。第九，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第十，恢复与发展战区的邮电交通。以上所指，不过大端，必须有认真改革旧制实行新制的决心，并持之以毅力，才能消除新的困难，支持长期战争，其重心在于组织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为着战争供给而效力。中国的抗战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被敌占领，抗战的主要依靠是乡村与农民。农民是有伟大力量支持战争的，但须实行必要的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的改革。这里所说各项新政策，就是根据这种特殊情况而提出的。

(10)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一切这些，也必须拿政治上动员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配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抗战以来，教育制度已在变化中，尤其战区有了显著的改进。但至今还没有整个制度适应抗战需要的变化，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

(11)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当前的第十一个任务，在于第一，坚决反对一部人所谓走德意路线的主张，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准备对敌投降的步骤。第二，力争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物质援助之增加，同时尽力促成各国实行国联制裁日本之决议。第三，设立一定机关，系统的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法西斯。第四，从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代表，组织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唤起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对我同情，与我国政府的外交活动相配合。第五，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及其和平通商传教等事业。第六，注意保护华侨利益，并经过华侨的努力推进各国反日援华运动。一切这些，不管各国助我之程度如何暂时的没有增加或甚至可能部分的减少，国联决议可能依然是一句好听的话，我们都应努力的做。根据抗战的长期性，外交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这一点远见是必要的

(12)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但是危害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是危害日本全体兵民与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要使日本的侵略战争失败下去，必须中日两大民族的军民大众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作广大而坚持的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为此目的，全民族的第十二个任务，在于：第一，向两国人民士兵大众及朝鲜、台湾民族提出这个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方针，号召他们为此而斗争。第二，由政府下令所有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与恰当内容的日本话，由高级政治部准备与派出教日本话的教员到各

军队中实行施教，从学几句话起到能够同日军官兵讲一篇道理为止，教育全体抗日官兵向全体敌军士兵与下级军官作口头宣传，同时补助之以文字图画宣传，逐渐感化他们，要求他们同意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使百余万日本侵略军变成我们的友军，退出中国，推翻日本法西斯。第三，尊重与优待敌军俘虏，给以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为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而努力。第四，设法从日本内地组织反侵略的文化人员到中国来参加这一斗争。第五，保护在中国的诚实的日本侨民。第六，教育我国军民大众，一方面提高民族自尊心，又一方面则须纠正军队与人民中的一些错误思想，区别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敌军军官与士兵，并区别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实行了上述的方针与办法，付以广大而坚持的努力，这个反侵略统一战线是能够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胜利，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增加；但同时，敌人的困难与国际的援助，必须争取其配合。在敌人困难方面，除了因我之坚持长期战争给以逐渐的消耗，努力外交活动使敌日陷于孤立而外，和日本兵民大众及朝鲜、台湾等民族建立其共同反侵略战线的政策，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侵略战争愈延长，这一个统一战线便愈有建立的基础。

(13)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为此目的，必须注意下述各点：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一方面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

(14)厉行锄奸运动，巩固前线与后方

新的形势下，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必然较前更加猖獗，大肆其造谣，污蔑，分裂，破坏的阴谋，因此当前的第十四个任务，在于实现下列办法，厉行锄奸运动。第一，唤起前线与后方一切军民人等的警觉性，严密注视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之活动，依照政府法令，毫不容情的镇压之。第二，注意保护国家机密，以叛国罪惩办泄漏机密之叛徒。第三，学校教科书中加进锄奸一课，实施提高警觉性的教育。第四，军队中设置各级管理锄奸工作之部门，民众团体中人民自卫队中设置锄奸小组，国家警察加重锄奸教育，使奸徒在众目集视下无法藏身。抗战以来，吃这些奸徒们的亏真是不可计量的了。前线的将士，惊叹汉奸之多与损害作战利益之大，早已异口同声。即在后方，单是泄漏国家机密与引导敌机惨炸二事亦已天人共愤。长期抗战中如不肃清奸徒，将不能设想战争的胜利，发动广大民众之民族革命的警觉性，厉行上述锄奸办法，并使之成为广泛的运动，是争取胜利不可缺少的严重的任务。应该指出：锄奸运动应注意区别首要与胁从，自觉的与被骗的，坚决分子与动摇分子，分别处理。前者从重，后者从轻，并注意争取后者使之回心向善，决不可一律看待。还须注

意确实证据，勿用刑讯，严防诬陷。锄奸目的在肃清真正奸徒，只有用正确政策与正确方法，才能达到目的。

(15)发展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强固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战争

所有前述各项紧急任务，有待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推动全民族，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之下，坚决的实行起来，而欲达此目的，非发展统一战线中各个党派的组织力量不可。现有力量，无论何党都太小，都需发展，而大大发展国共两党尤为当前的紧急任务。在这个发展的任务中，各党均应互相赞助他党的发展，而不可互相嫉忌与互相妨碍。须知只要是抗日党派，任何一党的发展，都于抗日有利。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之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承认与拥护这个主干而又同时发展各党，是互相联系并不互相冲突的。

在数量上，我以为国民党应发展至五百万以上，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应发展至一百万以上，在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中，当着伟大抗战时代，吸引数百万优秀分子加入各抗日党派，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诚能如此，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扩大了，随之也将更巩固了，执行战胜敌人的一切任务就有了充分的保证，支持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驱除日寇与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根本目的就不患不能达到。

五　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

现在，我们专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问题来讨论一番，向着异常关心国共两党关系的人们所已经发生了的许多疑问，作一个全般的答复，这一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国共合作，顺利地执行当前紧急任务，渡过战争的难关，是有重要意义的。

问题有如下各点：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战争中的合作决定战争后的合作，长期合作的内容与主要条件，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让政策，民主共和国问题。这些，都是很多人所关心的，我们都得明确的给以答复。

(1)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

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其中主要的两个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此，我们的政策，无论如何要一个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要一个长期合作，无论如何要共同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歧与分裂，方才有利于渡过战争难关，对抗敌人破坏，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并于战后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这是和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根本不同的，那次是短期的，这次是长期的。

(2)战争中的合作决定战争后的合作

所谓长期合作，不但是在战争中的，而且是在战争后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中的合作已经算得是长期的了。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继续合作下去，也一定要继续合作下去。这有什么保证呢？保证就在：战争中的合作决定着战争后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主要的国共两党，必须同患难，共生死，力求进步，并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不能。战争之后，这样长期同过患难的有了进步的两个党，就造成了继续合作的基

础。那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将更有利于合作，也是现在想得到的。没有疑义，战争中的合作必有其各个合作阶段的内容，战争后的合作将更有新的内容。然而战争中的合作，将决定着战争后也能够合作，这不是没有根据的预断。

（3）长期合作的内容与主要条件

所谓长期合作就是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所有阶级，从资本家到工人，所有政党，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所有民族，从汉族到苗瑶弱小民族，所有军队，从中央军到八路军，所有政府，从国民政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只有民族叛徒除外，一切都在内，而且是长期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内，有些人在长期战争中，当着熬不过艰苦斗争，个人利益超过民族利益时，会要变为民族叛徒的，因此民族统一战线是要不断地把这些民族叛徒们除外的。但这些除外，依然是民族统一战线。其理由，即长期合作的主要条件，首先是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与长期性。由于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严重地危害着全民族各个阶层的生存，这样就迫使上层阶级也不得不与其他阶级一道抗日。上层阶级中一部分是难免退出抗日战线的，但其他部分和其他阶级大体一样，是受压迫的，不反抗便无出路。又由于这种野蛮性的战争是长期的，就决定了合作是长期的。这些是决定长期合作的一方面。但是还有第二方面，要合作中的各党，首先是国共两党，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必要的工作。什么样的政策与工作呢？应该是从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的基点出发而规定出来与实行起来的政策与工作。应该是照顾现在又照顾将来，照顾这一阶级又照顾那一阶级，照顾这一党派又照顾那一党派，照顾这一军队又照顾那一军队，照顾这一民族又照顾那一民族的政策与工作。否则政策不对，工作不行，自乱步骤，将使合作难于持久。这样，一方面，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与长期性，又一方面，统一战线中的正确政策与必要工作，就使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应该是长期的，而且能够是长期的。是民族战线，不是人民阵线。是包括战争中与战争后的国共合作，不是企图在战争后又分裂又内战的国共合作。

（4）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共产党员对三民主义应取何种态度呢？直至现在还有一些人不清楚，因此有再一次解释的必要。

还在一九三六年五月间开的我们党的临时性的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如下的关于“坚决实行三民主义”的提纲：

“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同共产党合作与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发动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胜利的大革命。又曾经因为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实行相反的政策，而失去人民的信仰，招致革命的失败。现在则因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极端严重，全国人民与国民党中爱国分子，因而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的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共产党有自己的党纲与政纲。其党纲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与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民主革命政纲，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纲领，则是基本上没有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

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第十一项）

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党的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成立的宣言中，又着重地说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很明显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的总目标，并非某一党派单独要求的东西。只要看一看从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文献，它的政治纲领，就会明白。因此，在过去，不但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我们共产党员曾经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就在一九二七年两党合作不幸破裂之后，我们的一切做法，也没有违背三民主义。那时，我们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这是符合于民族主义的；我们实行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这是符合于民权主义的；我们又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是符合于民生主义的。那时，我们的一切做法，并未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本范畴的私有财产制。在现在抗战的阶段与战后彻底完成民主共和国的阶段，都是三民主义的阶段，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阶段。为了彻底完成这个民主阶段的任务，一切共产党员，毫无疑义，应该依照自己的一贯的革命总方针，自己的决议与宣言，同中国国民党与全国其他党派，全国广大人民一道，诚心诚意的实行三民主义。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义主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并且应该懂得：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所谓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孙中山先生也曾经认为必要实行它，才能解决将来的社会问题。所谓现在的实际任务，就是三民主义，这是“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因此，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行动，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而斗争。

（5）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

为了保证长期合作，还要解决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我们曾经批驳了一党主义，不论是对于过去历史上说，对于当前任务上说，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上说，所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那末，各党共存，而互相结合为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不要一种统一的共同的组织呢？要的，必要的，没有这种统一的共同的组织，不利于团结抗日，更不利于长期合作。因此，各党应该认真研究，找到一种最适合于长期合作的统一的共同的组织形式。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及各党派的历史特点，今天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有下述三种组织形式。

第一种，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但与第一次

国共合作不同。如果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员加入，我们将取何种态度呢？首先，我们是赞成这种办法的，因为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好的一种统一组织形式，有利于抗日建国。不但共产党，任何其他抗日党派都可加入国民党，只要国民党同意，我们是决不反对的。如果这样做，那我们可以实行同十三年合作不相同的办法，即第一，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是公开的，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第二，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有要求加入的，劝他们顾全大局，不要加入。第三，如果我们的青年团员得到国民党同意，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话，也是一样，不组秘密党团，不收非共产党员入党。用这种办法，可以大家相安，有利无害。这是第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第二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就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我们也是赞成的。这种形式，我们很早就提议了，可惜还没有实行。

第三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就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但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的及时的得到解决。例如许多大政方针之推行，下级磨擦问题之调整，都因没有一种固定组织，让它延缓下去，所以这种办法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第一二种办法不行，这种办法暂时也只得仍之。

总之，长期战争中的长期合作，组织形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极力赞成有一种统一的形式，使之利于长期合作。

（6）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让政策

长期战争需要长期的统一战线，前已说过，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此，共产党员在其工作中，在其同友党发生关系中，随时随地都要顾到这个长期性。凡于长期合作有利的，应该坚决的勇敢的做，不利的，则决不应做。

这里就发生各党之间互助互让的问题。说互助，例如各党都要发展，都要巩固，任何一党除了发展与巩固自己之外，还应对友党的发展与巩固取赞助态度。国民党的发展与巩固，共产党员应取何种态度呢？一句话，赞助之。其理由是国民党的发展巩固利于抗日战争，利于全民族，因而也利于劳动人民与共产党，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国民党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员应取什么态度呢？没有问题，取赞助态度。我们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有广大的发展，依照蒋介石先生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言做去，该团的发展是有光明前途的。也正是为着赞助，我们对于该团现行办法中之某些事项，希望有所修正，不然，好的动机，将难得好的结果。三民主义青年团应该成为全国广大青年群众团结救国的统一组织，吸收各党各派各界的青年个人与青年团体加入进去，成为使整个青年一代集体地受到民主革命的教育训练之一个大集团。因此，组织上应该民主化，政治上应该发挥团员的自动自觉精神，发扬青年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态度与意见。

互助就不是互害，损人利己，在个人道德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更加不对。因此，无理的磨擦，甚至捉人杀人等事，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共产党员决不应该以此对待友党。而如若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决不容置之不理。凡无理的事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之，才是待己待人的正道。互相规过，是朋友间的美德，也是政党间应该提倡的作风。

统一战线中有什么互让呢？有的。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共

同对敌的必要步骤。我们的友党也作了让步，那就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等等。这种为了团结抗日为了长期合作的互让政策，是很好的，很对的。只有政治上糊涂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说：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或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

现在我们又主张所有各统一战线中的党派，互不在对方内部招收党员，组织支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认为这种政策是必要的。现在当然和过去不同，在过去内战时期，国共两党间除了公开的战争之外，还互相使用秘密手段，进行破坏对方的活动。合作以后，当然不应有互相破坏的动机与行为了，但是互相在对方内部秘密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办法，也应该停止，使彼此安心，才能适合于长期战争中长期合作之目的。我们现在正式向国民党同志申明：我们停止在你们内部作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活动，不管统一战线采取何种的共同组织形式，我们都是这样做。但同时，也希望你们这样做。双方约定之后，下级党员如有违背，由违背之一方的上级负责处理。

此外，双方同志接触，应采谦和，尊敬，商量态度，不采傲慢，轻视，独断态度，以改善双方之关系，这也是必要的。

一切我们所说的，共产党员应该首先实行，不管对方某些人员或尚未用同样的政策，方法，态度对待我们，但我们仍然这样做，做的久了，对方某些一时尚未明白的人员也会明白了。

共产党员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不变地向着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的方向走去，谁要违背了这种立场，这个方向，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但共产党员又必须有互助互让的精神，必须有尊重友党及和友党同志用谦和商量态度解决问题的精神，一切有友党同志的地方，都应和他们商量解决有关事项，不应独断。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巩固统一团结，所谓为国为民事业，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之目的，也就达不到。因此，决不能把必要的互让政策解释为消极行为。不但互助是积极的，互让也是积极的，因为必要的让步，是巩固两党合作求得更好的团结与更大的进步之不可缺少的条件。

（7）民主共和国问题

虽然我们的党还在一九三六年的九月间，就公布了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案，虽然中央同志曾经多次的说明过这个问题。但外间对于我们的主张仍有许多不明白的。这是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问题。抗战的结果将怎么样呢？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这是存在着的问题。再一次解释这个问题，对于巩固各党各派长期合作的信心，是有利益的。

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

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即是说，改变中国原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它独立起来了；但同时，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要变为这样一个国家，要同谁作斗争呢？要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剥夺我们的独立，我们就要向他要独立。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当奴隶，我们就要向他要自由。日本帝国主义使我们陷入饥寒交迫，我们就要向他要饭吃。怎样要法？用枪口向他要。一句话，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就有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

六、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1）中国与世界不可分

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新的抗战形势中可能暂时地减少一部分外国的援助，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现在更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用战争闯进全中国来，全中国人都关心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关心目前欧洲时局的变动。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国际形势，是有意义的。

（2）重新分割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资本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但是和本国人民大众矛盾的，是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矛盾的，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而且是帝国主义诸国之间自相矛盾的。这最后一种矛盾在历史上的最尖锐表现，就是二十年前的世界大战。那次两组帝国主义互战的结果，产生了新的国际形势。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新的发展的结果，使得世界又临到新的大战面前。在东方日寇侵略东四省西方希特勒登台之后，新的重分世界的战争业已开始了。“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一点也不错。在此情势下，一方面日德意组成了侵略阵线，实行大规模的侵略。另方面各民主国家却为保守已得利益而在和平的名义之下准备战争；但至今不愿用实力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实际上帮助了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东四省首先被牺牲，接着亚比西尼亚亡于意大利，西班牙则助长了叛军的气焰，中国又受到日寇新的大规模的侵略，到最近，奥国与捷克又先后牺牲于希特勒。全世界已有六万万人口进入了战争，范围普及到亚、非、欧三洲，这就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况。

（3）现时世界战争的特点

由于一方面日德意诸法西斯国家的坚决的侵略意志，又一方面各民主国家不愿实力制裁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使得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态表现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特点，这就是首先侵略中间国家与采取各种不同的战争形式。中国、亚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大利、捷克等国，都是半独立国家或小国，日德意诸国就拣了这些肥肉先行吞蚀。在侵略这些中间国家中，侵略者采取了三种特殊的战争形式。第一种是日本对中国，意大利对亚比西

尼亚的战争，这是公开的直接的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在不宣而战的形式下进行的，开了战争史上的新纪元。采取这种不宣而战政策的目的，在于侵略者利用各民主国家的无意制裁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暂时避免和它们的直接冲突，便利其先夺取中间国家的行动。第二种是意德两国侵略西班牙的方式，采取了援助叛军的办法，这是历史上老办法的重演，历史上这类办法是有过的。第三种是希特勒侵略奥捷两国的方式，这里没有战争的表面（没有打响），但有战争的实际，出动了强大兵力占领奥国全部与捷克一部，并使捷克余部归属其统制，这是不战而亡人国的最巧妙的办法。这三种战争形式的采用，都是由于一方面，侵略国本身力量还不充足，暂时未便和各大国直接作战，因而采取了巧妙的战争方法，企图使自己先行壮大起来，同时即是使各大国削弱起来，再与各大国作战。又一方面，则是各民主国家不愿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怯懦妥协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便利其侵略各中间国家。

（4）英国妥协政策将引导法西斯各国实行更大规模的战争

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保守党内阁，正在逐步进行其所谓四强合作的政策，慕尼黑协定之后，欧洲政局有暂时逆转的可能。英国大部分保守党的政策，历来是以排斥苏联妥协德意为原则的，由于他们畏惧苏联的强盛，畏惧自己过早卷入战争，畏惧本国人民运动与殖民地独立运动，早已决心牺牲西班牙、奥国、捷克等国，成就其排斥苏联妥协德意的企图。过去因为保守党内部的不统一，法国人民阵线的积极政策，国内国际舆论的责备，而没有成功。现在则利用了英国及全欧人民不愿战争的心理，利用了法国佛兰亭党的右倾，在希特勒威迫之下，订立了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是英国妥协政策的结果，假如英国不改变它的政策，势将引导法西斯各国进行更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各大国间的战争虽暂时还可能不爆发，暂时限制于侵略中间国家的过程虽还在继续着，但最后势必引导各大国卷入空前残酷的战争里去，这是没有疑义的前途。“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

（5）全世界多数人类在逐渐动员中

在资本主义各国方面，由于经济的总危机，资本主义已走到毫无出路的地步，六万万人口的战争牵动了全世界，新的更大的战争在威胁全人类。在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则一切都是光明的，进步的，强盛的。在这两种相反的对比之下，全世界大多数人类逐渐地找到了如何保卫自己与解放自己的方向，正在用空前的广大性与空前的深刻性逐步地团结自己并准备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盛，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六七年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国的伟大抗日战争，西班牙的人民战争，乃至张伯伦的妥协政策等等，逐渐地教育了英法等国与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懂得惟有组织与斗争才是出路，惟有团结世界一切自求解放的人类为一体，惟有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才有出路。这个全世界人民觉悟，组织，斗争，与统一战线的伟大过程，是在向前发展着，但须经过广大而艰苦的努力才能完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与张伯伦的妥协政策，最后将遇到伟大的反抗，这也是没有疑义的前途，也是法西斯战争与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的结果。

（6）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

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现在，由于日寇进攻的深入，又加深了英美法苏对日本的矛盾。虽然英国在西方的妥协政策可能搬用到东方，为了企图多少保存在日本占领地区的商业，为了幻想减轻日本对南洋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根本妥协

是困难的，至少暂时有困难，这是日本独占政策的结果，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

七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略)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八　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

现在我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召集七次大会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自从一九二八年开过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由于环境的原因，已有十年没有开大会了。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准备召集七次代表大会，但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今年尚难召集。此次全会扩大会应该讨论加紧这个准备工作的问题，并决定在不久时间实行召集大会。这次大会的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它将总结过去的经验，主要的是全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讨论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讨论如何进一步的团结全民族，团结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进一步的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讨论如何在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针方法与计划。讨论如何动员全国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更积极的参加抗战。并应讨论党在新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的团结自己，加强自己，巩固自己与国民党、其他党派及全国人民的联系，以便顺利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除了这些政治的与组织的问题之外，七次大会应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将全党中最有威信的许多领导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来，加强对于全党工作的领导。同志们，这次大会的意义如此重大，因此，扩大的六中全会闭幕之后，诸位同志回到各地工作，便应在努力发展党与巩固党的基础之上，依照民主的方法，适时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托的干部与党员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使七次大会能够集全党优秀代表于一堂，保证大会的成功。我们相信，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最庄严的最有力量的回答，让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面前发起抖来，滚到东洋大海里去，中华民族是一定要胜利的。

我的报告就此完结。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

王　　明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在其政治报告中，将我们党自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做了一个基本的总结，对中华民族十六个月的英勇抗战，和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做了一个详尽的分析，对中华民族和共产党的当前紧急任务，提出了正确的方案，所有这一切，我都同意的。洛甫同志在其组织报告中，详尽地说明了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方式；同时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王稼穑同志、项英同志、陈云同志，对许多重要问题，作了详细的报告；此外贺龙同志、杨尚昆同志、关向应同志、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罗荣桓同志等又做了许多地方工作的报告；林祖涵、吴玉章两同志昨天已经做了极有兴趣的发言；而其他许多同志当然还有许多宝贵的意见继续发表。我已经将共产党员参政员的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做了报告，同时行期又很迫切，所以已经不预备发言，但是因为有些同志要我对某几部分问题发表点意见，所以就匆忙地对几部分问题说一说个人的意见。

一　日本法西斯军阀是中华民族的死仇是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公敌

（Ⅰ）日寇是中华民族的死仇

甲、日寇侵略中国的一切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1）国小土地少（“日本论”一二——一三页）；

（2）人口过剩（同前）；

（3）原料缺乏；

（4）本国市场小；

（5）防共{对中共 对苏联}（防共可以变成地质学的名词）；

（6）安定中国秩序；

(7)维持东亚和平；

(8)帮助满洲民族"自决"（根据斯大林所说之民族定义，民族须具备条件：子、固定区域的集体生活，丑、特定文字，寅、特定语言，卯、特定经济社会生活，辰、特定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从这种科学观点看，满族已同化，不备此等条件，即还有少数满族子孙，但绝没有成立满洲国的必要和可能。满洲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国人。热河呢？其他中国各地呢？借口不成立）。

乙、日寇侵略中国，乃系长期预定的所谓"大陆政策"的实施：

征服中国为明治以来日寇之既定政策。日寇侵略中国之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一八九四——九五年中日战争至一九一四——一八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此时期日寇抢去琉球、台湾、澎湖群岛、高丽；第二阶段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后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不仅先后占领我胶州和青岛，出兵济南，且在一九一五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件；第三阶段从"九一八"事变至芦沟桥事变，日寇占领我东三省热河及察北六县；第四阶段从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起，日寇进攻和决心灭亡全中国的阶段。

丙、日寇侵略战争之目的，在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

(1)日寇一年来所占中国之领土及铁道线之统计材料说明；

(2)日寇在侵占区内所施行之政策：强夺中国主权，消灭中国军队（包括伤兵、俘虏、老弱、杀人比赛等），屠杀、掠夺、焚烧、奸淫、毒化、奴化、侮辱等残酷兽行；

(3)飞机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的罪行；

(4)日寇开始使用毒瓦斯屠杀我军民；

(5)寇机袭击我国境内民航机。

向全世界舆论及全人类控告日寇的残暴兽行。

（Ⅱ） 日寇进行侵华战争给予日本人民莫大的苦难

甲、百万军队的动员与四十万将士的伤亡；

乙、巨大的消耗与严重的财政困难；

丙、战争使劳苦大众生活更加恶化；

丁、法西斯军阀权力之增长与国内反动政治之加强；

戊、日本国际地位的孤立及日本有卷入更大战争漩涡之危险；

己、日寇对出征军人的非人残暴（逼迫作战，自杀的很多，火烧伤兵惨剧等）。

我们对日本人民表示极大的同情，我们深深痛惜他们因战争而遭受的痛苦，我们愿意以同文同种兄弟之谊与他们手携手起来反对共同的死敌——日本法西斯军阀。

（Ⅲ） 日寇是一切先进人类的公敌

甲、日寇进行对华战争，威胁了一切列强在华的权益：

(1)日寇暴行给予第三国主权生命财产之损失；

(2)日寇在占领区内对第三国权益之公开掠夺和危害（东北、上海等，美十五万万元损失，纸烟卷内放毒事）；

(3)中航机及欧亚机被袭击之意义及教训。

乙、日寇征服中国，是进攻东亚及欧美各国之准备。

丙、对苏联进攻之准备及张鼓峰事件。

丁、日寇是新的瓜分世界大战的祸首，是德意法西斯强盗的帮凶。

日寇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死仇，而且是一切先进人类的公敌（此处引国际公开决议上所说的中国抗战与国际关系一段），因此中华民族反抗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的事业不仅是中国人的事业，而且是一切先进人类共同的事业（此处对德意人民、西班牙人民、奥国、捷克人民说话，说明彼此利害及敌友是共同的）。

二 中华民族处在空前灾难的时期，同时也正处在无上光荣的时代

（Ⅰ） 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急关头

甲、目前的民族危机，与过去任何历史时期的所谓民族灾难不同，与元、清时代也根本不同。（1）日寇为异族，元、清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2）元、清为经济文化较低于汉族的本国少数民族，日寇为帝国主义。（3）元、清之所谓征服汉族，不过是推翻汉族的君主而实行所谓“入主中原”，日寇之政策在使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

乙、目前的民族危机，超过百年来民族灾难的总和——自鸦片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中国被列强分割去的领土，主要的是各藩属和辽远的边疆（安南、伊犁西部、缅甸、不丹、尼泊尔、暹逻、朝鲜、台湾、澎湖列岛、香港等）；列强只强迫中国政府以一部分沿海沿江口岸的城市做为所谓租界（上海、天津、福州、厦门、广州、宁波、镇江、青岛、九江、芜湖、汉口、万县等）；列强主要地只是在租界内及沿海沿江有租界的口岸和城市驻有一定数量的海陆空军力；列强直接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着的只限于一定租借的区域。因此中国国家地位虽然实际上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但仍拥有自己的领土主权等独立国的资格。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已经占领了我东北四省全部，占领了冀、察、绥、鲁、豫、皖、江、浙、赣、粤的领土的一部，特别是这些省份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及交通线；现在日寇更侵入鄂粤二省的领土，并积极向我国最后的两个大的沿海沿江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武汉和广州进攻。在日寇占领区域内，我国家政权完全被摧毁，我国的重要经济、财政、交通、机关完全被强占，日寇悍然横行无忌，我国的同胞完全被置于牛马奴隶的地位，殖民地的亡国奴的悲运，已经加在几千万同胞的头上。七年来日寇所加于我中华民族的灾难，实超过百年来我民族危机的总和。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生死交叉的道路——或者是完全沦为日寇的殖民地牛马奴隶，或者是奋斗以求民族的生存和独立！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急关头！

中国共产党中央可以向全党报告和可以告慰于全中华民族的一点，就是我们自“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一天起，就确切指明日寇所企求加于我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就恳切说明我们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不断呼吁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为民族生存独立而奋起自卫！

（Ⅱ） 中华民族在英勇自卫战争中强固起来了

甲、中华民族已经进行了十五个月的英勇自卫战争——不仅日寇的“以华制华”、“不战

而胜”的政策完全失败了，即“速战速决”、“三个月内征服支那”的迷梦也完全破产了！“东亚病夫”变成了“东亚英雄”，“东亚睡狮”变成了“东亚雄狮”，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真正发扬着，忠、孝、仁、勇、礼、义、廉、耻，由被封建势力曲解了利用了为统治阶级服役的道德，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只有充满了为民族尽忠，为民族尽孝，为民族报仇雪耻的光荣自觉，才能生产出抗战以来的我们许多民族优秀儿女所表现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慷慨牺牲的丰功伟绩。保卫平津战斗中。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的奋战成仁，保卫宝山战斗中，姚子青营长率五百健儿的壮烈牺牲，保卫上海战斗中，四行仓库内谢晋元团附率八百壮士的英勇奋战，在保卫南京战斗中，我数万将士的奋斗牺牲，在北战场上，有郝梦龄师长的英勇殉职，在台儿庄血战中，有王铭章师长的壮烈殉国，在保卫山西战斗中，有周建屏旅长的积劳致死，有叶成焕团长等的奋战至最后一滴血，有林彪师长的亲临前线受伤，在历次空战中，几百个英勇的青年空军战士，不顾伤亡奋勇杀敌，其中最著名的有大队长李桂丹等的壮烈牺牲，有陈怀民的以“肉弹撞敌机”的成仁壮举。在十五个月的战斗中，我数百万武装战士，在劣势武器条件之下，在敌军海陆空军毒气进攻之下，前仆后继，愈战愈勇，其内心和精神力量的来源，便是伟大的民族自觉和伟大的民族美德——为国忘家，为公忘私，为民族命运忘个人生命，所以才能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举！也只有将士和民众的英勇牺牲和艰苦奋斗，才能保卫淞沪至三月之久，才能保卫南口、忻口至最后关头，才能有平型关、台儿庄、乐溪等处的重大胜利，才能使敌人的占领地缩小到重要城市及交通线，才能在山西、河北、察哈尔许多敌军后方省区内，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和进行敌后方的长期苦斗。也只有数百万武装军民的英勇苦战，才能支持已经进行的十五个月的民族抗战，才能建立下今后长期抗战的现有基础。只有把民族命运和民族荣辱放在第一位的民族儿女，才能使原来敌对的阶级，相互礼让，才能使过去敌对的党派，相互尊重，才能使过去敌对的军队，相互敬爱。只有充满民族大义凛然不可侵犯的正义感，才能有当代的史可法、文天祥一流的人物出现——如马士宏县长等之被俘不屈，如范筑先专员等的为国起义，如各地救国献金时，工人、车夫、小贩、老乞妇、小孩等均踊跃尽献其一日数日或甚至一生血汗之所得，军界、政界、文化界、商界等个人或团体，大都能慷慨解囊，踊跃捐输。只有把个人爱、家庭爱转成为民族的伟大仁爱，才能见到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代表们现在所努力进行的“老人之老如吾老，幼人之幼如吾幼”一类的救济难民，保育儿童的运动和工作。也只有充满着大仁大勇的中华民族子孙，才能够以单机飞赴敌国境内，不投一弹，而只投下号召两国人民反对公敌的传单。也只有继承和展扬我们民族的廉洁美德，我们才能见到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内的每月由一元到五元——十元的薪水制度，我们才能见到山西、河北在敌后方区域的十五元一月的薪金的县长，十八元薪金一月的行政专员，才能相信在抗战建国过程中将肃清贪污劣习而造成全国普遍的廉洁政府和廉洁政治！

乙、中华民族现在为什么能够以空前的英勇姿态战斗起来？因为现在全民族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了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中华民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就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发动抗战、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根源。过去素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衰弱不振呢？主要地因为民族力量的分裂和不团结。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在民族大敌当前之际，为的共同反对民族公敌——日本法西斯军阀，过去敌对的阶级和阶层从工人到资本家，从农民到地主，包括中间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现在团结起来成

为统一的民族抗日力量；过去的对立党派——国民党、共产党等等，现在合作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抗日核心；过去由历史环境形成的不同系统的军队——中央军、各地方军、红军等，现在团结起来成为统一的国防军队；过去因历史条件形成的不统一的各种政府——中央国民政府、中华苏维埃政府、各地方政府等，现在统一起来形成为统一的中国政权；过去信任不够和仇忌甚深的各民族——汉、满、回、藏、苗、夷、番等，现在紧密团结为一致抗日的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伟大中华民族，有了以蒋委员长为领袖的统一的国民政府作领导，有了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作民族武装自卫的骨干，有了国共两大政党作全民族团结的核心，所有这一切，就是中华民族现在能够英勇抗战和日益强固起来的基本因素。十五个月的对外英勇抗战，不仅扫除了积习已久的民族中萎靡不振的风气，不仅空前地提高了民族的自觉、自信和自尊心，不仅空前地锻炼了民族中一切有生力量，不仅造成了中华民族空前的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步，而且大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在全世界人士面前的威信，改变了世界各国对中华民族的观感，引起了一切先进人类对中华民族的敬爱和同情。虽然中华民族今天仍然处在非常危急的境遇，虽然中华民族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还要遇到极大的艰险和困难，但新的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国的曙光（如毛所说）确已显现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面前。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现在不仅正处在空前的灾难时期，而且也正处在无上的光荣时代。

中国共产党中央可以向全党报告和可以告慰于我中华民族的一点，就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我们不仅坚决主张“要生存，唯有战”的唯一正确的反对日寇侵略的主张，而且发起了团结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仅发起了这一政策，而且为这一政策的实现作了几年继续的坚决的奋斗，并采取了最实际的有利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具体办法来促成这一政策的实现。为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斗争，并且宣布愿与国民党一起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以达到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以推进和促成全中国各种系统的军队合组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中国共产党实行将苏维埃政府改变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民主政权，以推进和促成全国各种政权的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实行停止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以达到停止内战和各阶级团结抗日的目的。

三　目前的抗战形势正处在严重困难的阶段

中国目前的内外形势，都说明我国抗战正处在一个比前此十五个月更加严重困难的阶段。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说明中国抗战可能有三个阶段，即防御、相持、反攻等阶段，同时，并特别指明现时为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含有严重困难的过渡阶段。目前这一过渡阶段的内外形势的特点究竟怎样呢？为什么目前这一抗战形势含有严重的困难呢？

（Ⅰ）　目前中国抗战的内部形势的特点和困难

目前抗战内部形势的特点何在呢？其特点在于：一方面，日寇正以强大兵力包围武汉和进攻广州，同时并声明和准备继续进占西安、宜昌、衡阳、北海以东的地带；另方面，中国军民虽然已英勇抗战达十五个月之久，虽然中国军民要尽最大可能来进行保卫武汉保卫华南的战斗，但是依靠现有的抗战力量，不仅不能阻敌前进和停敌进攻，而且有武汉广州不保的极大可能的危险。这一形势正在和将要产生什么严重的困难呢？这一严重困难的根本标志，

就是敌力增加，我力不足。第一，因武汉的危急和广州的待援，中日战争的战场更加扩大——原来是华中华北两大战区，现在又增加一大华南战区；虽然敌方也因战区增多和扩大而更加感到许多新的困难（如兵力不足，接济困难等），但敌方海陆空军力依然足以进行其新的进攻计划，而我方则大大地感到军力不敷分配的困难（抗战的主力军在以保卫武汉为中心的华中战场上，已感觉到极大吃紧；八路军等在华北战场上的力量，还仅能牵制敌人在华北的大部兵力——十三个师团左右，还不能对华中华南战场起直接牵制和配合的作用；这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第二，在不幸武汉或广州不守的情形之下，尤其是在武汉广州都不能守的情形之下——而这种不幸的情形有极大实现的可能——，即是，中国最后的大的沿江沿海沿铁道线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城市不幸失守的情形之下，无疑问地将发生更大的严重的困难（这些困难中主要的东西，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指出了，不过为的便于说明问题起见，我再简单地重复一下）。这些困难的中心问题是：抗战力量不够，和此后主要地依靠乡村边区来对抗城市中心（中例，俄例）；即是第一，是军力不足，正规军游击队的力量不够停敌的进攻；第二，是财力不足，如外汇不稳，法币跌价，税收更加短少，支出更加增多，物价高涨等等；第三，是物力不足，军事运输和给养（衣食）的困难，军队接济的困难，广九路、粤汉路被切断，平汉路、陇海路被占领，不仅国际军火来源困难，即国内各战线军火接济亦大大困难；第四，是人力不足——这一点特别严重，中国抗战主要地靠无尽的人力，但现在因办法不善，确已感到人力的缺乏——如征兵困难，前线无人服役等情形，而敌人方面，则不仅从国内增加兵力来华，并且利用占领地的扩大来企图更多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一步向中国进攻（如傀儡政权的扩大和某种程度的合流，尽力企图组织伪军，控制了中国的沿海沿江及铁路交通等）。由此就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的增长，意见分歧现象的增加，某些还在抗日营垒中的动摇分子发生消极怠工以致叛变，汉奸亲日派妥协投降活动的加紧等等相伴而来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全中华民族极大的努力！

（Ⅱ） 目前中国抗战的国际形势的特点和困难

甲、从中日战争整个形势看，说国际形势基本上与我国有利的观点，现在仍否正确呢？我们回答说：仍然是正确的。现在决定国际形势的基本因素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有三点：(1)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苏联内部“谁战胜谁”——即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成份，还是资本主义成份战胜社会主义——问题的最后解决，即社会主义完全战胜了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苏联在工业生产上成为欧洲的第一个国家，在农业机械化和集体化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在政治方面，苏联成为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即基本上没有阶级分别)的实行斯大林宪法的最民主自由的国家；在社会生活方面，苏联成为没有失业，没有贫穷，人人有饭吃，有工作，有衣穿，有房子住，有受教育权利，有提高文化和发展天才的最幸福最优裕的国家；因此，在国防力方面，苏联成为拥有最强大的海陆空各种军力的国家；因此，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苏联的比重和作用大大的增长了。“因社会主义的胜利，苏联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力量，成为一切愿意维护国际和平的人民、国家以至政府的团结中心，已经成为各国劳动者反对战争威协的堡垒，成为团结全世界劳动者反对世界反动力量的有力武器，社会主义的胜利，把苏联变成为使居民的广大阶层，各阶级，各民族，许多人民和国家运动起来的力量，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与社会主义有利，与资本主义有害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最大的变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新阶段的开始”（见共产

国际七次大会通过的“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及其全世界历史的意义”)。(2)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基本上分裂为愿意维持现状、维护和平的国家与权力主张重新分割世界、进行侵略战争的国家。代表第一种倾向的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美国，在欧洲首先是法国，代表第二种倾向的国家,在西方是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蒂,在东方是日本法西斯军阀。维持战后欧洲暂时稳定局面的凡尔赛条约，已经被德国法西斯蒂撕毁无余（停付战债，恢复全国征兵制，扩充海军，占领鲁尔、莱茵，吞并奥国,瓜分捷克等)；维持战后列强在华均势及太平洋上暂时安全的华盛顿条约，被日本法西斯军阀破坏无余（中国东北四省的被占，华北、华中、华南的被侵占，香港、新加坡、安南、菲律滨、南洋群岛等逐渐被直接威胁等)；同时,西方和东方的法西斯强盗,又公然订立了侵略同盟（即德日意的所谓防共协定)。这些事实在基本上逐渐形成着两种在世界范围内的阵线——即所谓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站在和平阵线方面的有法国、美国及动摇不定甚至时常危害和平的英国；同时，因社会主义的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坚决最有力的柱石，所以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维护和平事业上不能不与苏联合作，因此，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一世界和平阵线到现在还未正式的（有成文条约法规的）形成，但它确具有极伟大的力量。(3)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先进人类的反战反法西斯蒂进步运动的增涨（继续两年以上的西班牙人民的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者及其走狗弗郎哥的英勇斗争，法国人民阵线运动巨大的成绩，美国罗斯福总统当选的胜利及法西斯蒂蓝登竞选的惨败，世界反战大会、反战青年大会、反战妇女大会的再接再厉的奋斗，各国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反法西斯力量的人民阵线运动的进展等)。国际形势中这三点基本因素对于中日战争有什么关系呢？它们的意义就是：第一、中国人民的对日自卫战争，能够得到伟大的社会主义的邻国的援助。第二、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基本困难——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结成统一战线反对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到最近苏维埃运动均然——有了一个极大的变动；现今中国民族自卫战争所直接反对的只是一个在太平洋上孤立无援的敌寇——日本法西斯军阀，其他对中国和太平洋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列强——英、美、法，在一定程度内和一定条件下，转成了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友人。第三、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自卫战争，成为世界一切先进人类反战反法西斯的有力组成部分,因而,它能够得到欧、亚、美、非、澳各洲无产阶级和先进人士的同情和声援。此外，日本虽与德意有条约关系，但得不到有力援助，同时，德日有冲突，德在经济、军力、财力上也不能助日。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经常说：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比起中国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比起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外国干涉时期，比起现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情形，均较为有利。

乙、目前我国抗战的国际形势的困难何在？

(1)和平阵线未形成，侵略阵线已形成（主要地由英国负责——反苏政策，对德意让步政策，英美矛盾，法国政府的动摇，美国孤立派的作祟均是原因)。

(2)慕尼黑会议和瓜分捷克对于中国战争的影响。中国人一般的认识到欧战对于中国的不利，但许多人未认识到这样解决捷克问题的方法对于中国的不利。日寇进攻广州的原因，虽为海军预定政策之实行，及对武汉军事之牵制，但从国际关系方面看，是英国的慕尼黑政策的直接结果（自由党报纸的引证)。

(3)苏联外交情形的暂时困难（捷苏、法苏关系，英之四强政策等)。

(4)欧局紧张，英国对远东暂不能实行真正强硬的政策，美国孤立政策仍未打破，且军备未充实。

（5）对中国的最直接最大的危险，就是外援（首先是军火）的暂时减少或部分断绝。

由此产生的基本困难是，日寇利用这一国际形势更加紧对中国的进攻，而中国不仅暂时难于得到国际更有力的外援，甚至已有外援被技术条件（交通）限制和减少的危险。

丙、最近中国抗战的国际形势有无好转的可能？回答：有。为什么？

（1）从国联通过的制裁日寇的决议发展的趋势看——英法等态度；日英现在矛盾更加紧了。

（2）从美国主张召集国际会议解决捷克问题的态度看——华盛顿条约先例，罗斯福、赫尔再三表示（特别本年七月十七日的谈话）反侵略及不承认日寇占领中国等。

（3）苏联有更加积极援助中国的可能——根据是：子、苏联革命发展的阶段（引国际七次大会决议九二——九三页）；丑、苏联的国防利益；寅、英美的态度等。

（4）整个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基本上将是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明显对立，而和平阵线的力量终较侵略阵线强大（引斯大林与霍瓦德的谈话二五页）；丘吉尔、艾登演说（十九日通讯）及法英海军协定，殖民地问题，英日问题，英意问题等，矛盾加深。

但主要地还靠中国人民的努力。主要地努力方向应是：子、坚持抗战。丑、尽力保卫国际交通线。寅、加紧外交活动（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更亲密与英美法苏合作，促成国际联盟制裁决议的实行，首先须对英、美、墨西哥、澳洲活动，停止其军事供给日本（宋庆龄演说的引用；对墨西哥及澳洲政府的质问——新华八月二十四日）；美国虽非国联会员国，但为九国公约签字国和发起人，且为公开反对侵略者，必须断绝军事原料给日本。卯、建立与国际无产阶级团体（共产国际，社会民主国际，阿姆斯特丹职工国际等）及各国无产阶级团体（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等）以及一切反战反法西斯团体的亲密联系，争取他们对中国的更大的同情和援助，经过他们的要求和逼迫，来好转英法美各国的政策，来督促国际联盟会员国实行个别的以至集体的制裁日寇的行动。过去各国作了，我们很感激日、美、英、法、德、意等共产党及社会民主党的朋友，但帮助不够，现在必须做到政府断绝日寇外援，给我们帮助。我们请求和希望社会民主国际与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即以统一行动帮助我们！

然而国内外抗战形势的好转须要经过相当时期和中华民族极大的努力，而目前的抗战内外形势，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困难关头，这是无可争辩无容否认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及全中国人民的责任，不在于掩盖困难的真相，而在于认识困难的实质，同时，不仅在于认识困难的所在，而尤其在于不怕困难，并且找到了方法去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丁、敌人各种困难的增加。

戊、为求抗战胜利，必须向前进步。

四　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几个问题

泽东同志在其报告中已经指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具体办法，同时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五个基本任务，实现这些任务将不仅能停止敌之进攻，而且能准备我之反攻，以达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我在此地所讲的不过是与这一方面有关系的几个问题。前面我已经说过，我国抗战目前的根本困难，在于敌力增加，我力不足。由此可见克服困难的

最中心问题是增加力量，具体说，就是要真正动员全中国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来为抗战的军事服役，首先达到在军事方面能停止敌人前进深入，以便准备我国抗战的反攻力量。很明显地，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专靠军事本身，而主要地靠政治上的办法。怎样能增加力量克服困难呢？

第一个问题。继续坚持“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方针，是增加力量克服困难的基本前提。为什么？因为只有继续坚持抗战，具体些说，只有一方面尽一切可能去坚决进行保卫武汉、保卫华南的战斗，以赢得时间和空间，另方面为准备在武汉甚至广州万一不守的情形之下，仍坚决地继续对日抗战，才是在事实上表示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的决心，才能够在实际上产生出克服困难的条件。换句话说，只有坚决地继续对日抗战，才能保证民族团结的巩固和扩大，而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坚强团结和统一，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抗战威力的泉源。只有在继续抗战和加紧民族团结的环境中，才能增加抗战的军力到适合于各大战区的需要的数量和质量；只有在继续抗战和加紧民族团结的环境中，才能设法战胜财政经济的困难；只有在继续抗战和加紧民族团结的环境中，才能减少军需供给和军事运输的困难；只有在继续抗战和加紧民族团结的环境中，才能打破汉奸亲日派的挑拨离间妥协投降的阴谋；只有在继续抗战和加紧民族团结的条件下，才能增加敌方困难，才能增强国际外援；也只有在继续抗战和加紧民族团结的条件下，才能在实际上打破悲观失望和消极苦闷的情绪，才能在实际上提高中华民族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与勇气。因此在目前抗战严重困难的关头，首先必须用一切力量打破某部分人的“暂时妥协”或“局部偷安”的有害思想和企图，必须用一切力量动员全体军民在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国策（引蒋最近对华侨宣言，十九日通讯第七页），必须使全体军民认识，在抗战的严重困难关头，任何对于坚持抗战的根本思想和实际行动的动摇和犹豫，将不仅使抗战的前功尽弃，而且有使抗战事业中断，而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危险！有没有投降妥协的可能危险？有！——对国际决议了解——对事实估计：甲、突然事件；乙、阶级观点(资级对财产等)：(1)北方安福系活动为一部分大地主代表；(2)汪精卫等活动亦不能只看作个人问题；丙、国际压力：德意（最近国民党通知）英态度——让步、分赃；丁、投降妥协重大困难。因此应强调反妥协，坚决在抗战中找出路一点!!!

由此可见：坚决继续抗战，是增加力量克服困难的第一必要条件，离开了这一基本前提，则一切均无从谈起！

第二个问题。继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增加力量和克服困难和进行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这就是说，要继续巩固和扩大全中华民族的团结。怎样巩固和扩大全民族力量的团结呢？

甲、首先就是要使参加抗战而有利害冲突的各阶级加紧团结。不错，十五个月的抗战大业，已经使中华民族内各阶级在基本上团结起来了。但是，应当承认，这种团结的程度，还远赶不上抗战事业的需要，同时，应当坦白地说，这种团结不够的原因，不能归咎于中国的劳动阶级。中国的劳动阶级——工人、农民、职员等，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已经做了为民族团结抗敌的模范。试看一看我国的工人阶级：交通工人（铁路、海员、汽车、邮电、码头工人等）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之下英勇地工作着，国防工业工人（兵工厂、化学厂、矿业、军需工厂工人等）在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的情形下热烈地工作着，一切国营和私营企业及商店中的工人和职员，均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中沉重地工作着，他们为的大

敌当前，在抗战期间从未有过罢工、怠工等为难政府和有损生产的行动。试看一看我国的农民群众：认真地停止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行动，勤奋地为着满足前后方供给而增加生产，虽生活条件万分恶劣，但已少见为满足要求而进行反对本国抗战业主的激烈形式的斗争。同时，现在大家已经公认了：抗战以来广大劳动者不仅出了自己的力量和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当兵、当夫、服劳役等等），而且还出了自己靠以为生的有限资财（各种捐税、救国公债、救国献金等等）。但是，返观我国的有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们，则除了敌军后方的河北、山西有些地方的一部分有产者，在遭受敌军占领痛苦和我军收复失地重见天日的条件下，曾经在地方抗日政府调解和鼓励之下，自动地实行减租（由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减息（平均减为年利一分）之外，许多地方的地主资本家们，还多半不明国难严重大敌当前的民族团结大义，还不能自动对工农劳苦群众作必要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让步(如减租、减息、减税等)，有时甚至于相反，有些人利用国难的名义来发所谓“国难财”(对劳苦人民加租、加息、派粮、派款、敲诈、勒索、囤积居奇等)，有些人仍对于劳苦群众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以至采取危害的行动（如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省的许多县份的豪绅或地方政权的代表，逮捕甚至屠杀积极参加抗战工作的农民和劳动青年——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及非共产党员）。这些现象，无疑问地妨碍着全民族加紧团结抗战的事业。我们甚望贤明的中央和地方当局，对各地有产阶级分子，采取说服和立法的办法，使他们改正对于劳苦大众的态度，使他们对劳动群众作必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让步，以便提高劳动者法权地位和改善劳动者痛苦生活。必须认识：只有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有最低限度的人权和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才能够更加发挥他们的爱国意识和抗战热潮，才能使他们自动走进正规军、游击队，以增加抗战的军力，积极地帮助军队运输担架、侦察等工作，以增加军队作战功效，努力地增加生产和供给衣食，以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同时，只有真正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的贡献知识，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才能使全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为抗战建国大业而更加亲密团结。

乙、其次就是要使参加抗战的各党派能更加亲密团结，——尤其是国共两党的亲密团结和长期合作。不错，十五个月的抗战大业已经使中国过去互相对立的各党派建立了合作，但是应当承认，这种合作，显然地还远赶不上抗战建国大业和紧急抗战环境所需要的范围和程度。现在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提出各党派亲密合作的办法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六中全会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

首先说到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国际指示和泽东同志在其报告中，不仅指出了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必要与可能的各种条件，不仅指出了同其长期合作应成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减少两党磨擦和奠定两党长期合作的具体办法，这些办法值得党内外抗战同志们严重注意。那些办法呢？这些办法就是：

第一，再一次确切声明，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许多人挑拨国共关系的借口之一和国民党一部分同志疑虑的问题之一，便是以为共产党对拥护和实行三民主义没有诚意。我们这一次中央全会再一次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士宣称：中国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诚意地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为什么？因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是中国现代历史阶段的全体人民的要求。对日抗战的目的，不仅在求得民族主义之实现——民族独立，而且为的要建立新的民权自由和民生改善的中华民国。所有三民主义的这些要求，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以来所发表的各种抗日救国的纲领（一九三五年八一

宣言中的十大纲领，一九三七年八月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而且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在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提的基本任务是相同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一九二三——二七年曾与国民党一度合作去共同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重新建立与国民党的合作，以便共同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中央去年九月二十二日为国共合作发表的宣言中所提出共产党方面所担任的条件（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斗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地方政府等等），都已经一一彻底实行了；当然同样正实行着"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政策，但这一条的实行，不是一时一件的事，而是包括整个历史阶段的革命事业，而在今天战胜日寇的事业，首先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最具体最基本的办法和保证，因此共产党用一切力量参加对日抗战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事业，就是真诚地实现三民主义的具体有力的实证。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便是言行如一，表里一致。"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勾当，不仅是共产党所不屑为和所不能为的，而且是共产党所坚决反对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员，不仅自己诚意地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而且要向口头上说拥护三民主义，实际上不实行三民主义的任何人作斗争。

第二，再一次确切声明，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承认蒋委员长是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领袖，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许多人挑拨国共关系的借口之一和国民党一部分同志所疑虑的问题之一，便是以为中国共产党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工作没有诚意。我们这一次中央全会再一次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士宣称：我们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是国民党的总裁，同时是中华民族的抗战建国领袖。当然，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口头上这样说，而且在实际上这样做。陕甘宁边区政府诚意地服从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忠诚地执行蒋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都是有目共见、有耳共闻的事实。自西安事变以来，我们党的中央及其代表对蒋委员长的爱护和亲切关系，更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当然共产党拥护民族领袖的方法与有一部分人有极根本的区别。我们不以为口头上空喊领袖为满足，我们同时要在实际上帮助和拥护民族领袖去取得抗战建国的胜利和达到三民主义的实现，我们认为这种帮助和拥护领袖的办法，是唯一真诚和正确的办法。另外有些人们，虽然口头上将拥护领袖的口号喊得非常响亮，实际上不仅不执行而且反对领袖颁布的有利于抗战建国的法令，实际上不仅不实行而且反对领袖主张发表的抗战建国纲领，结果影响所及，将领袖"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伟大希望，造成"抗战不胜，建国不成"的悲运。这样的人，不是拥护领袖，而是危害领袖。因此，我们共产党员不仅自己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而且坚决地反对任何口是心非，危害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大业的分子。

第三，再一次声明我们现在不参加国民政府，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许多人挑拨国共关系的借口之一及一部分国民党同志疑虑的问题之一，便是说共产党企图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党的领导人曾再三声明过，中国共产党不参加国民政府，现在我们中央全会再一次正式宣布这一点，当然更有力量。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共产党员在与抗战有根本关系的问题——政权问题方面，拒绝给政府以帮助，或不愿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抗战建国的利益，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事实证明，只要与国家民族有利，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尽力帮助政府的。例如政府需要我们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便将我们最好的领导人材和中坚干部去担负这些工作；大家都晓得，担负第八路

军总副司令的便是我党的著名领导者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彭德怀两同志，担任新四军副军长的便是我党的另一著名领导者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同志，同时在这两部分军队中的军事政治工作人员，都是我党多年培养出来的有功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优秀人材和坚强干部。例如政府需要我们共产党员去帮助国民革命军建立政治工作，我们便派遣我党著名领导者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同志等去担负这一责任。例如政府成立初步的战时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需要各党各派各方面人材去参加，我党推定当选的便有我党的最著名领袖毛泽东同志，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秦博古同志，中国革命元老及我党著名领导者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等同志。例如，政府需要在敌人占领区去收复失地和恢复地方政权，八路军和共产党地方干部便努力在晋、冀、察、绥、热、鲁等省去进行建立抗日根据地，恢复我国地方政权的工作。

第四，明白地宣布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党的支部，这一点特别重要。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许多人挑拨国共关系的借口之一和小部分国民党同志疑虑的问题之一，就是说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关于此一点，这次我党中央全会将郑重声明：为的巩固两党合作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不征收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加入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共产党的支部。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抱着不重视或不友谊的态度，绝不是的；我们共产党员诚挚爱护每一个国民党军队中的官长和士兵，我们尊重他们是我们民族的子孙，我们敬爱他们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忠诚战友，我们愿与他们作个人的骨肉之亲的弟兄和生死与共的朋友。

第五，明白地宣布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员中去征收共产党员，这一点同样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许多人挑拨国共关系的借口之一，同时也是一部分国民党同志疑虑的问题之一，就是以为共产党要在国民党队伍中去吸收党员。关于这一点，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曾经一再向国民党同志说明过，国共两党党员合起来，也不过占中国人民的极少数；在广大中国民众中，存在着有成千累万的优秀儿女，可以作为两党发展党员的对象，两党尽管向无党群众大量发展自己的党员，根本用不着也不应该向友党中进行征收党员的工作。此次我党中央全会再一次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不征收国民党员作自己的党员，不在国民党组织内组织自己的支部，这当然更加正式和更有力量。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员抱着什么歧视的态度，恰恰相反，这只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整个国民党及每个国民党员抱着友爱精诚的态度（泽东、洛甫同志报告都特别说明共产党员要尽力亲近国民党同志），这只是说中国共产党能切实地注意到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利益。

第六，再一次向国民党提出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进一步的经常形式的问题，这一点对长期合作很为重要。为什么？因为虽然在去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表，及九月二十四日蒋委员长代表国民党谈话公布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便已正式建立；虽然抗战一年来，两党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已为举世共见的事实；特别是在抗战的前线上，两党武装同志的鲜血经常勇壮地汇流在一起，谁也分不清那是国民党同志的血，那是共产党同志的血，他们的光荣的血是为着反对共同敌人而洒流；两党同志的生命经常英勇地牺牲在一起，谁也分不清那个是为国民党的事业，那个是为共产党的事业；他们的宝贵的生命是为着国共两党及全体同胞的共同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但是，应当坦白地说：直到现在，国共两党合作的程度和范围，既不能满足抗战建国繁难工作的需要，也不能符合国共两党多数同志及全体同胞的希望。在共同担负挽救民族危亡这样伟大使命和艰巨工作的环境中，两党组织之间到现在还不过是存在着不经常的接洽性质的关系，实在是一种莫大的

遗憾。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共产党再三向国民党提议：建立国共合作的某种方式，民族革命同盟或国民革命同盟。具体些讲：就是国共两党须协商和通过一个共同遵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同时并成立一个由两党同志共同组成的遇事协商和共同工作的组织。关于纲领问题，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我们党的代表曾与国民党的领袖和负责同志，作过多次的意见交换。去年秋季，中央政治局曾向国民党提出过一个根据三民主义原则的包括四十余条的纲领草案；今年春季，我党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的几位中央代表同志又曾经共同协商和草就一个包括抗战建国许多重要原则的纲领草案；虽然这两种草案，我们均未曾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意见，但是今年三四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可以说实际上在基本原则方针方面，与两党负责同志过去一年多所再三交换过意见的纲领草案的内容，大致是一致的。因此，当抗战建国纲领公布之后，中国共产党便立即宣布：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之抗战建国纲领的基本方针——坚持抗战和争取民族国家最后胜利的根本方针，与中国共产党过去所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再三声明：中国共产党完全赞同国民党以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对内对外重要施政方针，同时并愿用一切力量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彻底为实现这一纲领而奋斗。正因为如此，所以关于两党合作的纲领问题，现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具体解决方案，即是可以拿抗战建国纲领作为两党抗战期间共同努力的基础。至于两党进一步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中共中央在其今年三月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信中，已经具体提出过：或采用国共两党选派代表组织各级组织的方式，或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办法和方式，只要于团结抗战有利，中国共产党均愿与国民党同志共同计议和执行。我们在党的六中全会上，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具体建议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时并说明此次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组织民族革命联盟或国民革命同盟，其方式与一九二三——二七年不同，即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将名单公开，同时并不在国民党内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这一提议是异常重要的。我们愿本此方针与国民党同志协商，以期得到实际的结果。

第七，再一次说明国共两党合作的正确关系，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人不了解两党合作的应有的正确关系，或者因为过去的成见而暴露不正确的言论行动，或者因为不了解党派合作应有态度而闹出许多无谓的行动。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及泽东同志的报告，再一次说明两党合作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友爱，既说不上某一党投降另一党的说法，也不应有某一党压迫另一党的事实，更不应有某一党并吞或消灭另一党的企图。党与党之间，互相尊重友党的党格，两党同志之间，互相尊重对方革命的人格，这是发生两党同志亲爱精诚和友谊团结精神的第一个力的来源；这是保证两党合作愈久愈坚和愈长愈密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否则以互相轻蔑代替互相尊重，以互相仇嫉代替互相友爱，引起相互间不必要的磨擦，增加相互间可以避免的误会，结果甚至引起相互间的严重纠纷和冲突，在现在中国抗战条件之下，只是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只是有利于日寇和有害于中华民族的事情。

同时，泽东同志报告说明：国共两党是共患难、共生死的关系，所以两党不应互相竞争，互相削弱，而应该是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因此报告中特别提到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力量问题。的确，从抗战建国的利益看来，国民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之统一团结，国民党力量之壮大，不仅于国民党有利，同时即是于抗战有利，于民族国家有利，亦即于共产党有利；同样，共产党之巩固与扩大，亦于国民党有利。因此，如有国民党员希望共产党削弱或失败，实际上

客观上即等于使国民党削弱或失败；同样的，如有共产党员对国民党有如此希望，亦为有害。此等党员均为不明民族大义，不知同处利害，不知国共唇亡齿寒之相依为命关系者，必须加以说服教育纠正；如知而不改，则不仅为国家民族之罪人，亦为本党利益之叛徒。当然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合作不只是靠共产党一方面的努力，而且还需要国民党方面的努力，尤其因为国民党是在国家政权中及军队中居领导地位的政党，对这个问题不能不负更大的责任。为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利于抗战的事业起见，我们希望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方面对于许多不利国共合作的严重现象，立即加以合理的解决。例如：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还有大批被监禁的共产党员，须立即释放；还有个别地方常有暗杀或逮捕共产党员的事实发生，须严加制止；还有公开反共的报章杂志出版，须严厉禁绝；还有许多地方公然不承认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地方党部合法权利的现象存在，须立加纠正；在有些训练班或学校内公然进行反共教育和反共宣传，须严加取缔。同时我们希望蒋委员长及国民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六中全会向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的建议，讨论和实行两党更进一步在政治上、军事上、民众运动方面长期合作的办法。国共长期合作，不仅是国共两党同志的愿望，而且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朋友的希望。只有国共长期合作，才能保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来增加抗战力量，才能够渡过难关、克服困难，才能够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现在说到巩固和扩大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中国一切党派中最大最有力和拥有最多群众的政党，国共两党合作是一切抗日党派合作的基础，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同时国共两党，并不能包括中国人民中所有的有组织的抗日力量，在国共两党以外，中国还存在着许多参加抗战的党派，如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这同样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主张建立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以增厚抗战建国的力量。抗日各党派亲密合作的具体办法，如能依据我们以上所说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的基本方针来采择施行，一定能得到可观的效果。为的加强中国各党派及各种抗日力量之间的合作，我们认为有几个问题须在党内外人士中间解释清楚：

子、对国共以外的其他抗日党派的认识和估计问题——许多人根据过去经验认为他们均无前途是不对的，因为(A)国内情形变了；(B)他们参加抗日；(C)他们有合法地位；(D)中国有许多中间阶层；(E)中国向民主共和国的路上走。

丑、所谓“中国法西斯蒂”派问题——我们曾经再三指出过，法西斯主义是财政资本中最反动、最主张狭义的大国主义、最无理性的“恐怖的专政”，其对内表现为恐怖专政，对外的主要标志是侵略战争。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历史条件，没有组成像德意那一类的法西斯蒂党派的可能；同时，在中国人民遭受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和德意法西斯恶魔敌视的今日，更没有形成效法德、意、日的法西斯组织的条件。因此我们再三地公开说明，不能将中国某部分人看成法西斯蒂派。然而应当坦白地说，中国虽然今天没有明目张胆的法西斯组织，但是确有一小部分人相当地受了外国法西斯思想的渲染，有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自命为法西斯蒂的学徒——至少是法西斯的手段和方法的学习者。正因为如此，不仅有些局外人有时不免把他们看作是中国法西斯蒂派的分子，而且他们本身也时常过着思想混乱和行为矛盾的生活。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自称为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但是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内容是民族解放，法西斯蒂民族主义内容是民族侵略；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内容是民权自由，法西斯蒂根本反对人民有民主自由，对人民实行恐怖的专政，对思想实行无理的统制；中山先生的

民生主义内容是民生幸福，法西斯蒂是只顾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不顾劳苦民众的死活，拼命帮助大地主大资本家剥削劳苦人民，不允许劳苦人民要求改良生活。这样一来，他们的思想怎能不陷入混乱的境地！他们之中许多人，不仅口头上宣布拥护蒋委员长、拥护政府领导抗战，而且实际上也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某些部分的工作。在对外政策上，抗战的主要对象是日本法西斯军阀，为的抗战的利益，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实行联合英美法苏的外交路线，同时反对帮助日寇的德意法西斯蒂；但是他们为的受了一些法西斯思想的熏陶，于是一方面虽然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工作，另方面却又不能不进行袒护德意法西斯和反对英美法苏的宣传。在对内政策上，为的抗战建国的利益，蒋委员长和国民党实行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合作的政策，但是他们为的受了法西斯思想的麻醉，于是虽然一方面高呼拥护领袖，拥护国民党既定的国策，另方面却又实际上或明或暗地盲目地进行反共的运动。蒋委员长的言论指示，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都一再明确的指出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必须组织工、农、商、学、文化、妇女、青年各种群众团体，必须在抗战期间尽可能改良人民生活，但是他们为的有了法西斯思想的错误，于是，一方面虽然高呼拥护领袖训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但另方面却实际上不执行领袖的这些重要训示和抗战建国纲领的这许多重要的规定。这样一来，他们的言行怎能不矛盾！为的抗战建国的利益，为的各党派亲密合作的利益，特别是为的这部分青年朋友们自己本身的利益和前途，我们诚恳地希望和忠告他们说：你们之中许多人是勇敢有为的青年，应该赶快从这种思想混乱和言行矛盾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应该毅然抛弃那些反民族解放和反社会进化的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诚诚恳恳地做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

寅、所谓“中国人民阵线派”——我们再三说过，这种称谓只是一种无根据的误会和有作用的谣言。关于这一点，不仅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曾再三客观地说明过：中国现在的国家状况和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今天只能有反抗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有进行内争的人民阵线；同时那些被指派为“人民阵线”的救国会的朋友们，曾经再三再四地在言论上、在实际上证明了：他们是坚决拥护政府领导抗战的，他们有时虽然对政府某些措施有所批评建议，但其根本动机，绝不是反对政府，而只是为的帮助政府和爱护政府。为的抗战建国的利益，为的团结全民族力量的利益，为的国家收罗一切有用人材的利益，我们诚恳地希望和忠告对救国会朋友们有这种误会的人们，赶紧放弃成见和消除误会，因为救国会朋友之中的许多人，确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一部分，确是抱着满腔热血愿在蒋委员长及政府领导之下积极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

今天中国抗战的严重困难关头，需要一切民族力量的团结，所以消除各党派间的误会和成见，建立抗日各党派间的亲密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有国共及一切抗日党派亲密团结合作，才能保证全民族力量动员起来去为抗战的军事服务。

丙、必须将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组织起来。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是“人多”，“地大”、“物博”虽然也有其一定重要的作用，如斯大林所说，十月革命胜利的六个条件中的最后两个便是——“论反对派”一二八页。对此问题引蒋的话，抗战建国纲领的话，承认都是对的，但是“人多”是一切条件中的最重要的条件。但是必须懂得：仅仅人多，并不能成为保证不亡国的力量（如印度是），人多须有组织才能成为力量（现在无组织的痛苦；有组织为什么能保证兵力、物力、财力、智力的动员——工、农、商、学、文化、妇女、青年、儿童的作用；以现在八路军区为例，以北伐为例，以红军为例，以苏联内战及反干涉为例，以西班牙为例）；

但要使民众有组织，必须给予以民主自由和相当的生活改善。

丁、加紧肃清汉奸敌探工作，加紧反对亲日派斗争。

(1)汉奸敌探与亲日派的实质和异同

子、汉奸——(A)傀儡政权及维持会等；(B)打信号枪及侦探；(C)隐伏在各机关内的日寇奸细。

丑、亲日派——还不是汉奸，他们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但(A)其客观作用与汉奸同；(B)其前途可变为公开汉奸（如王揖唐、陈中孚等)。

(2)尽量揭发汉奸敌探与亲日派挑拨离间的阴谋：

子、揭穿抱怨中国不应抗战，要求改变抗战国策的阴谋（如日寇策动北洋系军阀通电呼吁和平，或汪精卫等进行的所谓抗战办法不对等)——揭穿办法：以中日关系作例（见"陈集"一五九——一六〇页)，以奥、捷做例，阿也可作例，以俄、西作例，指明只有抗战是生路，妥协即是投降，投降即是灭亡。

丑、揭破挑拨离间的方法，坚决打击其阴谋。如：

(A)破坏国共合作，利用国共过去成见及现在磨擦，见国非共，见共非国——答复应是抛弃成见，减少磨擦。

(B)破坏蒋委员长威信——给以答复。

(C)挑拨中央与地方关系——给以答复。

(D)挑拨政府与民众关系——办法与答复。

(E)挑拨和瓦解军队——统一团结友爱做答复。

(F)破坏共产党。

(G)破坏国民党。

(H)进行德意外交活动破坏英美法苏与中国的关系。

妥协投降的企图是越战越难，但亲日派的活动是不会停止的，妥协投降的危险仍有可能发生的。

(3)托洛茨基奸徒是最狡猾的日寇奸细：

子、为什么其理论恰为日寇所欢迎？因为其理论是从日寇的武库中搬运出来的（如"胜利之路"、"斗争"、"抗战与文化"等与"新申报"、"庸报"行为主张一致)。

丑、两面派手段和方法，特别是以"左"做词句，掩盖汉奸面目，例如：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必须同时并行，民族战争必须与土地革命同时并行，各阶级各党派不能合作等等。

寅、极力钻入军队和地方武装。

卯、国际间谍网之联系。

辰、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堕落成法西斯主义的工具？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所谓不断革命论)的反动根源：一是不相信农民革命作用，二是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三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力量。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表现——打倒沙皇，工人政府，但无西欧工人同时帮助不能保证胜利。一九一五年开始争论的一国内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国内条件与国际条件；不了解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斯大林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当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胜利(羞忌——仇恨)，另方面为困难(害怕——投降)时，由不相信走到仇视，由反党走到反苏维埃反工农，由联络白党军官、秘密反党印刷工作走到公开与国内外反动分子（资

本主义残余，外国最反动的苏联仇敌）一起——苏联数次破案托派分子的供词(找几点为证）可证。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其最大错误根源有二：一是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特点，将帝国主义国家革命与殖民地革命混为一谈(否认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与必要)；二是不了解中国封建余孽的特点（商业资本与封建余孽否认农民革命作用及土地革命)。因此在一九二五——二七年民族统一战线阶段时成为反对者，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土地革命开展阶段中，走到与地主阶级一起去反对工农及土地革命；而在新的统一战线时期，一方面由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腐化堕落，另方面由于国共合作形成，遂走到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方面去——明的或暗的反对国共两党及抗战，因而成了全中华民族的公敌。一部分国民党员及其他派别利用托派的危险——如张慕陶、王公度例子。反托派斗争是反汉奸斗争的一部分，是全民族共同的事业。

戊、广泛宣传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理论，提高民族自信心。(1)民族革命战争的必然性、进步性、正义性、神圣性(引列宁均见“解放”九页)；(2)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主要条件(引列宁)；(3)几万万人的努力能克服技术落后的弱点(引列宁：举北美战争例；苏联例；战争最后的胜利由活的人来决定)。

五　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中国共产党

毛及洛甫报告说过，我不过企图根据他们的方针发挥其中几个问题：

(Ⅰ)　共产党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困难和成功

政策转变实质：对外——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到只抗日，并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内联合他们抗日。对内——(1)过去国共对立问题提法是或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现在国共合作抗战建国；(2)过去苏维埃与国民党政权对立，问题提法是或者苏维埃政权，或者国民党政权，现在共同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3)过去红军与国民革命军对立，问题提法是或者红军，或者国民革命军，现在是共同建立抗日的统一国民革命军。

所有这一切首先为的从国内战争转到对外民族革命战争，这种政策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增加大量的同盟军和后备军，增加了中国革命的力量。这种政策完全合于列宁主义策略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特点。

这种政策转变，对中共及各国共产党均是空前的，所以很不容易的，很困难的。成功原因及其条件：党中央的领导；蒋领导国民党改变政策；八路军的努力及威信；全国各党派军民的赞助；共产国际的帮助。

(Ⅱ)　中共当前的历史任务

中共要与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力量一起，为共同驱逐日寇出境，创造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共产党员要在这一伟大历史斗争中从事实上证明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一部分，是最能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事业而战斗而牺牲的英勇、坚决、先驱模范的战士，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正确的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Ⅱ） 怎样才能正确的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毛、洛均指出，我们要做模范，即是：一方面我们要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的原则，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同时在军、政、民运工作中起模范作用（八路军——起模范作用之点有七；不足之点有三；政——陕甘宁、晋察冀等地区之廉洁奉公等模范；民运——大公无私，深入群众，统战作风，不包办等模范）；另方面要保持共产党及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为的做到这样恰到好处，必须对下列问题有清楚的了解：

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内容：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的党派为反对共同敌人的政治联盟；内容在中国现在包括有各党派、各阶级、各政权、各抗日军队、各民族问题。

（2）与一般的统一战线、人民战线及民族统一战族的异同的说明。

（3）因此，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有广大力量和长期存在发展前途。另方面包括有内部的严重斗争，而且只有在适当的斗争中才能巩固才能发展。

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与互相之间的正确关系：

（1）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

子、三民主义的实质（根据第一次大会宣言解释）及其社会根源和社会实质（“列宁选集”七——三四五——三六五页）。

丑、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异同：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革命中大同，土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方法不同；同时，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则只属于共产主义的。

（2）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相互关系：

子、三民主义的实质决定了国民党在各阶段均是各阶级的联盟（毛报告指出）。

丑、民十三改组后的国民党与改组前的国民党有何根本不同：（A）前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即为资产阶级单独为领导的，后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即无产阶级带领农民加入联盟（斯大林：“论反对派”六二一页）；（B）前者工农为资产阶级的附庸的，后者工农以共产党为代表加入的。

寅、国民党中的阶级矛盾及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纲与其实行方法之间的矛盾（即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尤其是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没有革命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造成了一九二七年的两次分裂。十年经验证明国民党的当局反对土地革命，所以此次国共合作时有停止土地革命的条件，此点今后也必须注意。

卯、现阶段国共重新合作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意义，中国革命的阶段问题（引斯大林——见“论反对派”六四五页），现阶段的实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同于前次反帝资产阶级革命，又非前次资产阶级革命，因（A）除资产阶级外，抗日地主阶层及英美买办也加入，其唯一目标是抗日的；（B）有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部分领导的；（C）劳动人民有武装力量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亦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因无土地革命）。所以我们说：在某种意义上是战略的转变；所以我们说：民主共和国是新式的。

丙、国民党与三民主义能否向前发展？有可能，但要有许多国内外条件及共产党极大努力。

子、斯大林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工农党问题的指示（与中大学生讲话："论反对派"五六六页）。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讲话指示，我们的预测：(A)过去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等为反对土地革命而分裂，有一小部分国民党员赞成工农运动；(B)抗战中阶级力量变动；(C)土地问题的改变办法可能——可采取没收及付价等办法。

丑、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的说法如何发扬（列宁对中山主义的指示，见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一文）。

丁、由此可见：

子、为什么共产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为实现三民主义是诚意的；

丑、为什么与国民党长期合作是必要与可能的；

寅、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根本区别在那里；

卯、为什么共产党要对国民党起推动和影响作用——即是说：自己要前进些，同时要督促他人前进，不能完全随国民党的当时意志为转移，同时也不能走得离国民党太远。

戊、如何推动和影响？

子、对许多问题提出主张和建议，与之讨论。举例说：

(A)对抗战问题。

(B)对民主问题。

(C)对民生问题。

(D)对两党联盟问题。

(E)对青年问题。

(F)对保卫武汉问题。——附带说明宣传口号与行动口号（前途与今日口号），党的口号与变成群众口号问题（以中国为例——对抗日、对民主共和国口号等）。

丑、经过协商、说服，动员国民党内进步分子及动员群众逼迫等方法来达到目的。因此：

寅、为的交涉，提议不能过高到现在国民党根本不能接受的东西，也不能过低到只是国民党所想的那样。

己、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问题。

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本质上首先是农民解放问题（引斯大林）——在中国首先是工农劳苦大众的本身解放问题，所以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看，不仅是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和侵略，而且是反对财政资本的阶级斗争（斯大林："论反对派"一三二页），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把自己和本国人民的绝大多数看成民族的代表，而不应当把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让给资产阶级作为独占的政治资本（季米特洛夫七大报告九八页），否则异常有害：(A)中国的例子——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分裂时资产阶级以"民族"资本反对我们的教训；(B)德国共产党失败的教训。

丑、但是，同时，民族解放运动，不只是工农劳苦大众解放运动的问题，而同时又是包括一切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阶级和阶层（连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地主在内）共同斗争的问题；特别是当外敌武装侵入国土和有产阶级握有极大国家政权实力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政党及劳苦大众，不能不集中一切民族力量去反对外来武装的敌寇。因此，(A)不能不把阶级斗争的现时的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全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全部的和根本的利益；(B)

因此，不能不改变阶级斗争的口号和方式，如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停止工人反对政府的政策和反对资本家的强烈斗争形式等（附带说明阶级合作问题）。

寅、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战线中，绝不能取消阶级斗争，只能够改变阶级斗争的方式及和缓阶级斗争的程度；同时，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本身中，就含有极严重的阶级斗争——首先是争取同盟者影响及领导权的斗争，此外，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这一件事实的本身，就是推动和吸引千百万城乡劳动者（工人、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卷入革命斗争的最有效手段（引斯大林指示）。

卯、必须正确的了解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的相互关系——两者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一个东西；可以分开，可以合流；根据过去经验，这两个革命多半是分开进行的。问题是一个战争还是两个战争同时并行。过去有些人对这方面的误解，必须纠正。必须记住：反帝民族解放斗争，不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整个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运动的主要任务，因为帝国主义才是这些国家的最首要最根本的敌人，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在各阶段上握紧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和努力进行民族解放的斗争。

辰、民族解放运动和解放战争不仅是全民族有生力量的锻炼，而且是各阶级各阶层在政治斗争舞台上的大演习；因此，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自卫战争的开展和胜利，在根本上，不仅不能消灭或削弱阶级斗争，而是为阶级斗争开辟出最广泛的战场和安排下更深广的基础；因此，在民族解放斗争（或战争中）各阶级所表现出的能力和势力的程度，不仅将决定这个或那个阶级在民族解放战争阶段中的地位，而且将影响到战后一定历史阶段上各阶级力量对比的关系及其政治的和经济的地位（以中国现在为例说）。

由此可见：总的结论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员必须要用满腔热忱和无限英勇地去参加抗日民族战争的事业，因为这是他最切身的血肉关联的事业；共产党员之以所这样做，不仅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一部分，而且正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和劳苦大众的忠实代表。

（Ⅳ）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问题的正确了解

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不同；

（1）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子、狭义的以本阶级为代表、为本位；丑、反对外族对自己的压迫和竞争；寅、自己有可能时仍压迫其他民族（如中国、捷克、波兰等）；卯、在脱离民族压迫时准备同样实行民族侵略和民族压迫。

（2）无产阶级相反：子、以自己和全民族为本位；丑、彻底进行解放全民族的斗争；寅、根本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对内主张各民族平等，对外胜利后亦不压迫任何民族。

乙、革命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永远是一致的：

（1）以苏联为例（斯大林："论反对派"四五六——四五七页）；

（2）以西班牙为例（引斯大林）；

（3）以日本德意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斗争为例；

（4）以捷克为例；

（5）以中国现在为例。

丙、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1）在帝国主义国家：1、反对本国帝国主义；2、援助被压迫民族。

（2）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具体表现：1、反帝解放斗争；2、同情和帮助各国革命斗争。

丁、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特有物，同时，是无产阶级的力量之所在（世界阶级与世界联系），因此，国际主义者参加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最坚决最彻底的战士（引马克思），同时，他的参加使这一运动成为更有力的运动——国际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和得到国际的同情和援助。由此，应该得到的结论是：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党，因而不要民族主义不要保卫祖国，因此抗日不是共产党应有和应做事的人们，有些是对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实质不了解的人，有些是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如叶青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问题"便是明例）。事实上，共产党员之所以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不仅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儿女，而且正因为他们是最彻底的国际主义者。

（V） 正确的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问题

甲、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来源：（斯大林指示，恩格斯指示，见"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一九六——一九八页）；

（1）"左"右的阶级根源（恩格斯指出）；

（2）"左"右倾在革命中发生的必然性及历史时间性(引斯大林"论反对派"六四四页)；

（3 "左"（瞿、李）右（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分析问题的方法（对敌我过或不及的不合实际的看法）；

乙、"左"右机会主义的异同和相互关系（斯大林指示，见"列宁主义问题"三六三页）：

（1）以托为例；

（2）以陈独秀主义为例；

（3）以立三路线为例；

（4）以张国焘路线为例（原来"左"——硬拼，以后右——逃跑悲观；以后对统一战线"左"——对张、对蒋；以后右——主张取消党等以至叛变）。

丙、现阶段"左"右倾的主要危险和根源何在？

（1）季米特洛夫指示的危险——"左"为破坏或不注意统一战线，右为作尾巴失去独立性（见季米特洛夫中共十五周年论文）；

（2）斯大林指示的所谓"到民族浪潮中浮水淹死"的意义。右到作资产阶级尾巴，完全同化于国民党。"左"脱离群众，不能真正起先锋和模范作用，同样会使共产党孤立和失败。

丁、正确的斗争方法：

（1）真正到了倾向，则应打击（斯大林"论反对派"六四四页）。

（2）戴帽子问题——不能乱戴帽子。

（3）深广的教育说服工作（毛、洛说的均对）。过去立三路线，上海工作时期，中央苏区后期方法等不对。

（Ⅵ） 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党的理论水平

甲、现时条件下理论特别重要性（引"列宁主义问题"上册一六——一七页）。

乙、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的确，只有使马列主义深广的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民血肉之亲的东西，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必然产物，成为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

才能够真正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上对此问题指示的重要，毛、洛报告提出的全对。同时，要注意以下各点：

（1）首先须学习马列主义——不仅政治理论，而且军事理论；只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才能运用和民族化，因此，必须加紧学习马、恩、列、斯学说。

（2）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引季米特洛夫报告一〇一页）；

（3）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

（4）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而要以马列主义来了解和开发中国文化。

（5）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具体例子，联邦共产党经验的国际意义（列宁说布尔塞维主义原则对于各国均是适用的）；法国经验，西班牙经验对我党新政策之影响；德国经验的宝贵；美国此次大选及工农党经验；各国国会斗争的经验等。同时，中国经验对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甚至资本主义国家均有用处。

（Ⅶ） 特别注意党员干部和非党人材问题

甲、一部分党员对非党员的不正确关系问题。

乙、党员与非党员正确关系（少数先锋队，广大后备军）。党员离开非党员，如鱼离水，因此，善于接近和帮助非党员（否则即忘记了来源，忘记了责任），是每个布尔塞维克应有的品质。

丙、要改造社会及解放人类，必须各种党的和非党的人材共同努力。

丁、中国现在条件下非党人材的特殊作用：

（1）过去推动统一战线，如救国会朋友、鲁迅等伟大作用。

（2）现在非党人材的作用。

（3）将来还有更大的作用。

（Ⅷ） 认识领导机关及领导者的严重责任——对全党及同情者之影响，对下级犯错误之应有态度（纠正而不是袒护——如对蒋所说的）

（Ⅸ）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团结统一，是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引用国际指示及毛、洛报告，并说明政治局讨论均着重此问题之意义。中国党现在力量还不够；须使党成为全国党和群众性的党，党须有各种人材和有威信干部；现在已有宝贵人材——党、政、军、民等干部，但还不够用，因此，须使党的各种力量发展。在党发展及统一问题上，特别注意日寇利用其走狗——托匪等混入以两面派手段作祟问题。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我们党的伟大任务——四万万人最后的命运握在我们党手里，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的存亡关键由我们负责，每人须感觉到大时代的大责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不辜负国民革命导师（孙中山——见“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所载，“解放”第九页）及世界革命导师（引斯大林对中国估计——见“陈集”二二八页所载）的希望的。同时，也就是不使日寇的朋友（引德国对日估计，见“陈集”二二九页所载），这种估计失望。换句话说，有四万万人民团结统一的艰苦奋斗和长期努力，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的。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

毛　泽　东

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在蒋委员长与战区司令长官的领导之下，在朱彭总副司令及各部各级长官与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在敌人后方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揭穿了中国托落斯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国内某些守旧顽固分子的无耻造谣。

此外，八路军的一部——后方留守部队，亦保卫了河防，现正准备配合西北友军，为反对敌人进攻西北而战。八路军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托落斯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某些守旧顽固分子之外，是一致承认的。这在敌人方面，不但不敢轻视八路军，而且日益增长其畏惧八路军的心理的事实表现上，也得到充分的反证。八路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与不可战胜的事实，是明显的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动派，亲日派，与某些顽固分子之外，是无法否认的。中外新闻记者，观察家，旅行家的详尽的或粗略的纪载，早已连篇累牍；一切无成见的人，都愿意研究八路军的经验，当然不是偶然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八路军之存在及其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如果有人提出这类问题的话，那我们只有一句话答复：认为“无益”者，必是事实上不愿意抗战胜利者，只是直接帮助敌人的胡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

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罢！

八路军有无缺点呢？不但有，而且多。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这是八路军的基本缺点，也是中国军队一般缺点。因此如何加强技术装备以便战胜敌人，成为八路军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严重任务。第二，八路军以善于游击战与运动战出名，但一部分干部对于抗日的战略战术之了解与应用尚感不足，一般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对于现代新式军队的管理与指挥，至今还缺少初步的研究。若干工农出身的干部，还没有解决提高文化水准至必要程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八路军当前的第二个任务。第三，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是达到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针，八路军干部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若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尚感不足，协同友党友军一道工作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使之利于抗战，在某些地方还做得差。因此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成为重要的任务。第四，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许多成绩，但对战士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语的教授，并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官长进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还非常不足；争取蒙伪军的成绩较大，但还须更进一步。在这里，搜集与研究敌伪军的全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没有达到需要的程度，第五，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八路军某些部分的注意。但还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如何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上，不但注意执行正确的地方财政经济政策，如像过去已经实行了的，而且提出与实行在不妨碍作战条件下，由军队本身亲身参加生产的问题。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以上增加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的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的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其他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将从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进步而克服之。

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发扬八路军的成绩，纠正八路军的缺点，首先对于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时对于以八路军经验贡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军，也属需要。《八路军军政杂志》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

（原载《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1939年1月出版）

八路军新四军捷讯汇报

（甲）八路军

（一）晋东南方面：

（1）进占皋落（晋东南）之敌，约二千余人，经我军不断袭击，即于上月十九日晨分两路向昔阳溃窜。一路一千八百余人，经东冶头逃去，沿途遭我刘师×团追击，敌伤亡甚多。一路三百余人，经张庄亦遭我×支队追击。至二十日晨八时，该敌在昔阳东南之川口附近，又遇我晋东某游击队，即被我前后包围，血战至午，敌不支，图作最后挣扎，竟施放大量毒气。我官兵睹此，更为奋激，冲杀至黄昏时，即将该敌全部歼灭，无一生还。计共获敌步枪二百四五十支，轻重机枪十二挺，我亦伤亡二百四十余人。

（二）晋察冀边区方面：

（1）我杨支队之一部，上月十四日，在党城以东，伏击抢劫群众之敌百余名，激战一小时，毙敌二十余名，缴获敌军用品一部。

（2）曲阳党城之敌二百余人上月二十日晨，向我陈支队进袭，战约一小时，卒将该敌击退。

（3）上月廿二日，我骑兵某支队，在河北省平山县东南，伏击敌汽车七辆，及敌骑兵二百余，激战约四小时，卒将敌击退，缴获敌战马四十余匹。同时我××大队之一部，在平山附近之温塘，截击敌人，毙敌二十余人，我缴获敌人汽车九辆。

又上月廿五日，我×分区某营，又与敌激战于温塘，计毙敌三十余人，缴敌人步枪三支，给养二大车。我×部亦在平山附近之洪子口，与敌激战，毙敌数十人。我另一部另在平山附近设伏，袭击由石家庄开来之敌汽车七辆，骑兵二百余，激战三小时，卒将敌击退，毙敌数十人。

又廿七日，我某大队又在温塘袭敌，毙敌百余人，我缴获敌长短枪八十九支，大车三辆。

（4）我×大队于上月廿五日在河北省××地方，与敌伪军高鸿飞部激战，该伪军大部被我解决，残敌向易县逃去。我缴获马四十余匹，骡驴二十余匹。

（5）灵邱敌二百余名，于上月二十七日，西犯我孤树村，与我某团激战甚烈。二十八日敌又由灵邱增援汽车三十余辆，载步兵四百余人，并配合骑兵百余，进犯我东河南镇。当日晚我×团即向该敌猛袭，激战二小时，毙敌百余名，残敌即乘黑夜间向灵邱溃窜。我缴获步枪十余支，敌沿途遗弃军用品甚多。东河南镇孤树村二地，当即被我收复。

（6）我骑兵支队于上月二十八日，收复河北省之唐县，守敌九十余人，向望都逃去。

（7）上月三十一日，我某大队在平山之慈峪，与敌三百余，激战数小时，该敌卒被我击溃，向行唐逃去。

（8）×纵队之×××大队，上月二十八日袭占宛平南之下鞭店，俘敌百余。

（三）冀中区方面：

（1）上月间进攻我冀中区之敌，被我击溃，计俘伪军二百余人，内有营长一名。

（2）我某部于上月二十七日袭击安国县城，守敌闻风逃窜，我即收复该县城。同时我×部在安国附近，伏击敌开来汽车十辆，激战数小时，毙敌二十余人，并击毁敌汽车三辆，将敌击退。

（3）我×纵队于上月二十七日与博野之敌激战数小时，毙敌十余名，我缴步枪一支，马一匹。同时我×部在高阳与敌百余人激战，该敌亦被我击溃，毙敌数十人。

（4）本月三日，我×大队伏击出扰蠡县东南章村之敌汽车×辆，激战数小时，当即毙敌十余人，击毁敌汽车四辆，并缴获敌战马二十余匹。同日我冀中自卫队之便衣队三十余人。袭击砖河车站，当即被我冲入站内，猛掷手溜弹，站房起火，毙敌五十余人，俘伪军六名，缴得步枪七支，并击毙伪队长，站长各一名。

（5）我某部于上月二十七日，在高阳附近遭遇由定县来犯之敌百余人，完全被我击溃。

（6）本月一日我某大队袭击蠡县之敌（为桑木旅团），我当即冲入城内，与敌发生激烈巷战，是役我毙敌十余名，并缴获日旗两面。

（7）我×纵队之一部于五日，在胜芳镇北之津保公路设伏，适有敌满载物品之汽车十余辆开来，我即猛烈袭击，全部胜利，计击毁敌汽车七辆，俘获完整者四辆，已安全驶至某处。又我另一部当日晚袭击胜芳镇之敌步骑兵百余人，毙敌八名。又七日我×支队在霸县北击毁敌汽车三辆，敌兵死伤十余人。

（8）八日午我某支队在博野西南伏击进攻安国之敌，大获胜利，当即炸毁敌坦克车一辆，装甲汽车三辆，毙敌独立战车小队长藤白幸一名及其以下官兵百余人。我缴获敌重机枪二挺，轻机枪六挺，小炮一门，步枪八十余支，手枪两支，军毯百余床，枪弹炮弹文件无算。被破坏之坦克车上，装有小炮及机关枪各一，惟因装制坚固，不能取回，当即被我破坏。我士兵及当地民众，均兴奋异常。

（四）冀南区方面：

（1）我东纵队×团，上月十九日，袭击宁晋县城，当即冲入城内，激战一小时、毙敌四十余人。

（2）我东纵队另一团，于上月二十日克复晋县，残敌西窜藁城，计缴获步枪三十支，烧毁敌汽车八辆，毙敌五十余名。

（3）我东纵队之一部，于上月十五日晚，袭击彰德属柳园之王自全部伪军，除有少数逃散者外，大部被我消灭。我缴获步枪四十五支，俘虏七十五名。

（4）我津浦支队之一部，上月十八日晚，将桑园以北之铁桥破坏，并破坏铁路三里，适敌火车二列开来，至此轰然翻倒，车上敌兵，跌死极多。另一部破坏泊头冯家口间铁路一段，并与由南皮出击之伪军三百余，激战一小时，卒将该伪军全部击溃，毙敌四十余名，内有中队长一人。又我邢支队之一部，于上月十五日，破坏东光以北铁路三里，并破坏沧石公路一段，收回电线千余斤。

（5）我×分区×大队，于上月二十四日，袭击美化镇伪军三百余人，我缴获迫击炮一门，机关枪一挺，步枪二支，日本军装十余套。又二十七日，该镇伪军，又被我×大队消灭一部，缴获军用品甚多。

（6）上月二十九日，我某支队在精台封镇一带，与敌伪军丛平部七千人，激战多时，卒将该敌击退，向邢台窜去，我毙敌营长一名及以下士兵数人。

(7)我×支队一部，于上月三十日袭击东光县以东之明灯寺，当即收复该地。

(五)山东方面：

(1)胶济路我某支队在金岭镇以东伏击敌人，毁敌火车头一个，破坏铁路数里。

(2)苏鲁交界之丰县伪军王献成部四个团(共约千余人),在日寇指使下,连日不断向我地方武装进攻。上月二十九日我鲁豫支队配合当地武装，在丰县北之王楼邵楼一带，与该部伪军激战竟日，卒将敌三个团大部消灭，并击溃由丰县来援之日军五百余。是役共毙敌伪军四百余名（内有团长营长参谋长各一),俘虏百余名（内有连排长数名),我缴获长短枪数百支，轻重机关枪九挺，战马百余匹，自行车五辆，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我伤亡三十余名。此役政治影响极大。当地群众武装尤为振奋。

(乙)新四军

(1)进攻我安徽××（电码不明）之敌，现已被我全部击溃，湾沚（江南铁路线上）以南及西南各地区全被我收复。

(2)我某部向上桥游击，恰由新安镇开来敌汽船两只，敌兵正在登陆，我即施以突然袭击，毙敌二十二名、缴获子弹数百发，军用品一部，我伤战士一名。

(3)我某支队之便衣队二人，在南京附近之淳化，袭击由南京特务机关派出之便衣队五人，全被我击毙，我获机枪两挺，驳壳枪一支，手枪两支。又同日我另一部袭泗摆渡之敌，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四支，大衣七件，无线电广播机一架，子弹五百余发，军用品一部。

(4)本月六日我×支队×团，袭击合肥东南葛太店之汉奸武装，该部完全逃散，俘虏七名，缴步枪五支，马一匹。

(五)我谭支队，于上月二十六日，在繁昌（安徽）西南与敌二百余人，激战多时，敌不支，退至青山嘴，我即收复繁昌县城。

（原载《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1939年1月出版）

〔附〕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大溃退（资料辑录）

一　北平、天津在“屡战屡和”的局势下沦陷

北方的问题，在屡战屡和的局势下，日本完成了缓兵计。廊房和广安门的冲突是前哨战，七月二十八日日军正式攻击北平，南苑、北苑、西苑有极猛烈的炮火及飞机轰炸。……宋哲元于是夜偕秦德纯退出北平，翌日达保定，北平就此沦陷。二十八日夜日军同时在天津发动，……我军（这里以及后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刊上叙述国民党战场情况时所说的“我军”,系指国民党军队。这和解放区报刊上所说的“我军”——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应当严格地加以区别的。——原编者）于三十日退出。(《天津沦陷》,《国闻周报》一

周简评，14卷31期，1937年8月9日出版）

二 南口的失守

南口为平津之门户，亦平绥线之枢纽。敌为解除北平之威胁及进攻山西计，遂继平津战役而西犯南口。

八月初旬，敌第二十师团主力，第五、第十师团各一部，与酒井混成旅团等即沿平绥线西进。

……敌初自正面攻击，由南口突进数次。……继敌以主力迂回边城镇，袭击居庸关、怀来，本间旅团一军守备南口，以一军增防赤城、延庆。铃木兵团（十二留守师之一部）迂回张家口，大井支队由沽源经龙关，截击平绥线。二十五日南口……自动放弃。（《全面抗战之展开》，《抗战一年》第32页，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印行）

南口失守的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这些教训非常值得我们警惕、注意：

A、这是芦沟桥抗战发动后，当局对抗战的方针，采取消极被动的单纯防御战略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进攻芦沟桥以后，即转而向南口大举挺进。可是在这样的时机当中，指挥抗战全局的方面并没有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首先歼灭兵力尚未集结的敌人，反而给敌人利用了时机，集中兵力向我南口一点进攻。

B、在这样的情势底下，全局既处在单纯防御的被动的姿势下面，更发生了抗战部队不能协同一致，与增援部队到达不及时等情况。正当南口前线最吃紧的时候，负责防御最重要地点的部队突然自动撤退，使整个战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困难；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中，增援部队却又迟迟不继。如是，南口、居庸关失却后，整个平绥线便不守了……

C、由于不敢动员民众，不敢武装民众，而在敌人后方组织民众、在战区中组织民众工作都没有开展，反而在保定在前线一带压制民众运动，禁止救国团体的活动。甚至还有用汉奸的名义逮捕革命群众的卑鄙行为。不发动民众参加抗战，不把政府的抗战变为全民族的抗战，不把片面的消极抗战，变为全面的人民抗战，是抗战遭受失败的重要原因。

（《南口的失守》，《解放》周刊15期，1937年9月6日出版）

三 敌人在绥远竟如入无人之境

在无决心保守下，绥远正规战首先夭折。九月是一个危险的月，若不是月尾我们有了一个划时代的平型关大胜，那只可以称之为“退的月”了。因为张家口被切断了，我们拼命退，敌人拼命追。……平绥线上的丰镇也在十三日陷落了。集宁工事虽好，但城市无重兵，挺进军于是只好向后转。省政府主席最初由赵承绶代理，赵赴包头后，改由商会主席代理。蒙伪军向前出动，很容易的便把归绥占据了。这是十月十四日的事；过了两天，又是不战而放弃了包头。

（《世界知识》6卷3期，1938年4月16日出版）

四 太原在混乱中撤退

敌自晋北及晋东以合击之姿态，向太原推进，综计在晋之敌计第一师团一部、铃木兵团

第一〇九师团、第二十师团、第十四师团一部。

战区司令长官为守备太原计，将全军分编为野战军与守城军。五日晨（十一月）到达青龙镇我军一部，因受空军猛烈之轰炸，及机械化部队之追击，未能达成掩护集中之任务，东山即告不守，太原近郊一带乃受牵制。晋东之敌又紧迫而来，野战军难以立住阵地，概向汾河西及太原南撤退（原编者按：当撤退时，秩序极端混乱，若非敌后有八路军游击队之有力钳制，使敌无力前进，当时敌人大可以长驱直入之势，直下临汾）。

守城军因野战军之撤退，一时陷于孤立状态，九日，傅作义将军率部由西山突围，太原遂陷。（《抗战一年》第37—38页）

太原于十一月八日失陷。国民党军队蜂涌向西向南撤退，通向后方的大小道路，全是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的混乱队伍；他们随便向人民征发粮食、骡马，要金银首饰与钞票。溃兵所过的地方，有时和敌人过境也很难区别。有些溃兵经过村庄时，甚至采取这样恶劣的办法：在村外先放几枪，把村里的男人都吓跑，然后进村把妇女强奸，把东西抢走。国民党的将领也惊慌失措，那位曾说“游击战争不行啊！”的将领，也在敌人迫近时赶快乘火车逃跑了。

（转自《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附〕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国民党军队在华东的大溃退(资料辑录)

(一) 挨打主义与对日寇“希望和平、保持礼貌”中从上海撤退

从经济与外交的原因说，我们控制住上海，有着相对的重要性，但是从军事的立场看，在淞沪一带作战，由于敌人海军炮的射程的控制与火力高度集中，我们是处于不利地位的。但是当我们的军队到达上海时，闸北方面敌人，还没有什么防御工事，兵力配备也没有十分展开，因此我们本来在淞、沪作战是不利的。假使在这个时候，不等日本发动，立刻给一个奇袭或者强袭，那“陆上主力舰”敌人侵略华中的据点，策动“应惩”战争的司令部，是可能占领的；因为那时候，敌人不但在防御工事与兵力配备上尚未完成，同时敌人所持的重火器的效力，在这种奇袭或者强袭下，是无法发挥的，到占领了敌人司令部，就是敌人失去了陆地的军事根据地，那就于我有利，战争的形势必然要起变化的，假使那样做到了，黄浦江中的敌舰，一定要为了脱离陆上的威胁，退出吴淞口，那我们就完全控制了黄浦江与上海，日军只能活动于长江上了！在当时情形，我们无可讳言，是仍归希望和平，保持礼貌，眼看着日军构筑它的防御工事，同时，在闸北方面，我们又没有争夺横浜河，使它被控制在我们的势力下，使以后可以给日军以威胁，而反被敌人所控制，使敌人的根据地臻于巩固，而我

们却被迫静止在闸北一隅上，把攻势防御转变为死守的阵地战，敌人可以自由进出，我们却无法活动，这影响是敌人可以安心的向我们底右翼进攻，无后顾之忧，而我们的罗店、大场等地，就成为敌人进攻的重点，而遭受中央突破了！

总之，在淞沪战中，我们最大的失策，是我们处于被动地位，只死守在敌人海军炮的控制火力高度集中线上，致蒙受重大的牺牲。

由于敌军在杭州湾登陆的成功，得到如下的教训：

因为敌人处于主动地位，尤其是利用机械化部队，尽量发挥机动力，随时随地转用兵力，而我们却适得其反，我们是死守的"挨打主义"，我们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阻塞主义"，所以我们处处都不得不配置一些兵力，因此也就是处处薄弱，或者敌人不进攻的地方，我们却配置了重兵，而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的地方，敌人却来进攻了，杭州湾战术的失败，就在这里；象杭州湾这些重要的地方，看它的形势和地位，在东战场的战术上，是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对于这个地方，原应当加以重视；就杭州湾的形势而论，在当时只要抽调一师或者一团的兵力，敌人便无法实现它的战术，但是我们在全公亭只有某师的一连炮兵，在金山卫等处只有一些壮丁，这一连炮兵用零星榴霰弹消灭了比他们人数更多的敌人，这些壮丁也作了壮烈无比的抵抗，因为兵力太不相称，又是仓皇应战，在敌人已经登陆的状态下，完全牺牲，这种失败，是值得特别加以反省的。

（瘦生：《对于敌我作战得失之检讨》）

我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的前方司令部，看见了张治中、张发奎、杨虎几位总司令，商议了一会，如何进攻日本鬼子的军队。正在这时候，张一麐先生、李根源先生、江问渔先生，还有许多朋友，来到前方慰劳军队，我们大家照了一张象，当时有几十架日本的飞机在头上飞来飞去。我于张治中说，你这司令部应当赶紧移开，这里不妥当。张一麐先生等走了，张发奎司令对我说：归他指挥的军队，向来彼此都不认识，他确实知道的只有一排人，是他认识的。张问我能不能替他想办法，我说可以，我去向蒋介石说明此点。

到了十八日，张发奎问我，前头一连炮队不知那里去了，是不是我把他们调开了，我说："不知道"。查来查去才知道蒋介石把那一连炮队调到旁边去了。一个委员长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这叫什么统帅法？

前方打仗的军队，全靠着用大锅作大米饭吃，烧火是用稻草，白天点火，一冒烟，日本的飞机就来轰炸；夜间点火，一见红光，日机又来了。这时上海雨水很多，稻草一湿点不着火，就没有法子作饭，造饭的地方，距离前线远了，饭没法子送；靠得前线近了，一轰炸作饭的地方，前线的人就吃了亏。最困难的，作饭的炊爨兵没有军事训练，用他们去送饭，就没有人作饭，不用他们送饭又叫谁去送？因此前线的官兵，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一天两天还可以，要一连三天，谁也不能打仗，谁也没法子打仗，与其说日本军队能打仗，还不如说我们是因为饿的原故，才不能持久而失败，这是谁应当负责任的呢？这完全是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不打算真正抗日，才得到这样的结果：处处都没有准备，完全是去送命的。

上海附近的阵地，作的太坏了；钱却花得不少。因为那是姓黄的找了一个商家，把阵地包给他们作的。一个机关枪阵地，不但里面水有三尺多深，并且是机关枪进不去。阵地这东西若偷工减料，与别的东西不同，是要影响作战的；里面有三尺深的水，兵不能在里面久蹲，无论什么样的官兵，若在水里泡三天，也都是不成的。况且又不只三天？蒋介石为什么

找这个姓黄的作这样的阵地，谁也摸不清，三百几十个机关枪阵地，能用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可惜不可惜。

前方的伤兵没有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受伤了怎么办，用谁来抬，离开了前线的伤兵，多半是自己爬出来，死了的无人葬埋，最坏的一件事，死了的官兵身上没有番号，名姓都没法子查考，受了重伤的，运到医院，伤口上长了蛆，全都臭了。这样，不应当死的死了，不应当残废的，也残废了。

还有绅商学界团体和妇女团体，到医院慰劳官兵，蒋介石派的特务不许进去，不准同受伤的官兵谈话，这种防备人民的办法，使一切慰劳品都被那些特务们偷的偷了，拿的拿了，既见不着面，更提不到鼓舞士气，安慰伤兵的心了。有几个受重伤的连长，从上海附近爬出来上了火车，一直到南京下关车站，六天六夜没换药，到了车站，伤兵们看见有人来，他们说："我们打仗死了可以，想不到六天六夜连口水都喝不着，你们把我们枪决了，比这样活着还好。"说着说着，一面大声骂着蒋介石，说："蒋介石若不是卖国贼，绝不会这样的待遇我们这些受伤的官兵。"

司令长官对于前方的敌情一点也不知道，想着派几个侦探出去，蒋介石是一文钱也不发，他是说："你要抗战，你派侦探，为什么向我姓蒋的要钱。"这是当时的实在的情形，我真不知决心抗日的人们，有了什么罪过，必要遭受蒋介石这种待遇。常说的话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今天看蒋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如何不打败仗呢？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文化供应社，1949年6月再版）

（二） 在济南不战而退

津浦线上的韩复榘在敌军压境之时，始终是徘徊不决，他始终没有认识冀察的苦教训——幻想苟安、和平。敌军攻下平原后，与我相持于徒骇河之间。那时为十月底，敌军正在攻石家庄，攻晋东，在津浦线上的部队并不多，而在我们方面呢，还不是正规的军队在防守徒骇河，仅凭鲁省的游击队二百五六十人来支持。这样的对峙局面，居然维持了四十多天，一直到十一月九日太原失守，韩始调刘部去守齐河，另调三师的兵力来守徒骇河。敌军占了太原，将部队又抽到津浦线上攻来了。韩部的三师兵力，仅仅支持了三天，一直奔到洛口。时在十一月中旬，敌军又停顿了原可一鼓而下的济南的进攻。当时，敌人缓攻济南的原因有二：(一)希望韩能投降，俾不费一兵一弹而取济南；(二)抽调其兵力，会攻京沪线。

在这个津浦线沉寂的时间中，韩又不肯反攻，还是每天在徬徨踌躅中。十二月中旬，敌军一路从惠民登岸，直扑济阳。一路由洛口猛攻济南，遂使济南失陷。韩带了大部队到白马山一带，勉强支持了一下，逕自退到了鲁南的边境韩庄、临城一带。……后侦知敌军并未急遽穷追，于是又从新北上至兖州一带。津浦线上如此的快逃快退，实造成了北战场未有的惨局！

（直成：《北线动态》，《十日文摘》1卷6期，1938年1月21日出版）

（三） 南京在街亭式的保卫战术下失陷

南京包围战的敌人战略，是在中央突破我大场据点，左翼包抄我金山卫，猛袭松江据

点，以歼灭式的战术，对我保持追击战场以外的接触，以谋完成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敌人迂回成功以后……又恰恰遇着一位采用“街亭式战术”的某某将军，死守孤城，坐以待毙。

南京保卫战，是不可讳言的遭致了失败。在上海全局抗战发动以后的会战，误用了局部抗战速战速决的战略原则。

（陈天一:《抗战两年来各重要战役之批评》，《军事杂志》116期，1939年8月31日出版）

敌人围攻南京，我军放弃了东南阵地，困守孤城，把十五万的大军，全配备在城的附近，不但不采取出击这一战术，在退却命令中，更给十五万大军指定了同一的退却路。命令下达，并不顾虑到达时间是否有先后不同，因此从新街口到挹江门道路，全给人塞住，互相践踏。守城某师，又守住挹江门，不让别的部队退出，开枪阻止，秩序更乱。即使出了挹江门，淹死在江里的又很多。而敌人的军舰却又在此时通过江阴封锁线，到达江心。致我退却部队，陷于极端溃乱的状态。假使我们在被围的时候，能够实行出击，就是我们失败，也有相当代价可得，损失也不致和退却那样大。

（瘦生:《对于敌我作战得失之检讨》，《军事杂志》109期，1938年6月20日出版）

可叹的是若干政府官员，不了解迁都的正确意义，而认为是“逃亡”，丧失了宁静，丧失了理智，弄成动摇人心、遗笑外人的现象。

下关各码头堆着千千万万的箱笼，没有秩序，没有区分，没有适当的管理，这一部，那一署，通通挤在江岸上。公物固然有些，而其中最大部分，都是官吏私人的家具和行李，成包的箱柜不用说大小悉搬，似乎还顾虑内地物质缺乏，钢床沙发亦在急运之例。许多人同声叹息的是各码头都有不少的桌椅、澡盆、梳妆台，天上不断的下雨，如山的杂物都在露浴之中，保护得最好的是私人的行李，而公物则听他们自己的造化。……

船舶管理所把小轮扣了大批，商船完全停止。普通人民要走，只有搭外国船。而差船的分配，并不能迅速而确定，各机关彼此互相争执，又看机关主管力量的大小。命令也不统一。我们搭一只开汉口的商船，最初说不打差，后来说下部打差，上半部搭客。许多客人已经上船，又来了四个机关代表争船不相下，最后还是维持半部打差的原议。正要上公物行李等，一会又被这个机关赶走到那个码头，一会又被那个机关赶得不能靠岸。我们逼得在江中无依靠的停了半天。东耽误，西耽误，共耽误了三天才能动身。如果有效的管理与支配这船只，动身的时候，应该是在到了汉口再返南京途中了。

（长江:《感慨过金陵》，《全民》周刊1卷1号，1937年12月11日出版）

〔附〕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大溃退的若干资料

……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为解决这个问题，在十一月中旬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

议。

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几个人参加。当时刘斐的意见是：认为上海会战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战略精神，没有适时调整战线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不应该在敌海陆空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且依靠九国公约，把战略作了政略的牺牲品，致自陷于被动。我军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不应该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的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如果拖到日本对占领我国的每个县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它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它就非垮台不可。

刘斐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认为敌人利用它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既大，后方联络线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基于我军当前的战斗任务，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初期被敌强迫决战。故应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及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针对以上的情况判断，刘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对兵力使用上，刘主张只用十二个团，顶多十八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

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刘斐的意见，说应该这样做。何应钦和徐永昌也说有道理，但他们素来是矜持老成，只说三两成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的话，尽量在揣摹蒋介石的心理上下功夫的。蒋介石也说刘斐的看法很对，但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当时他没作明确的决定。但对上海作战中损失大的部队，他说应一律调到后方整补

……

过了两天，大约是十一月的十五、六，接着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谈到守南京的问题时，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刘斐仍主张只用十二至十八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并把当时敌我形势谈了一通。实际当时主力部队已下令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连陈诚、顾祝同等都已到皖南一带去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蒋在这次会上又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要改变以前的部署，只说“孟潇（唐生智的号）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着第三次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见，并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并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摘自唯真：《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唐生智于二十日就职后，立即组织司令部，设置于铁道部内。在十八日的会议上，大体决定了守卫南京的部队为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七十八军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宋兼师长），七十一军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七十二军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孙兼师长），第十军徐源泉所部丁治磐的四十一师、徐继武的四十八师，以及宪兵两个团，炮兵第八团的一个营和战防炮、高射炮、通信营等，共约七万人左右。长官部策定的守备计划，概要如左：

（一）以第十军在栖霞山、乌龙山地区占领阵地，联系乌龙山要塞炮台严密封锁长江，并竭力阻击沿铁道西进之敌。

（二）以三十六师在红山、幕府山、下关、挹江门附近占领阵地，联系狮子山要塞，阻击来攻之敌。

（三）以教导总队在紫金山、麒麟门、中山门一带占领阵地，拒击由京杭公路来犯之敌。

（四）以八十七师守备光华门、红毛山及通济门营房一带。

（五）以八十八师守备雨花台、中华门一带。

（六）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城内，担任治安的维护及防空等任务。

（摘自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以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从他坚持固守南京的一切姿态来看，象煞是有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的。唐就职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闻记者谈话，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在唐生智以固守南京为目的的方针指导下，就尽量要求增加兵力，蒋介石把一切可以调得动的兵力，都调去防守南京，……

（摘自唯真：《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现在就守卫南京的兵力继续增加的情形加以说明：

……自上海战局形势逆转后，退却紊乱不堪。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率所部五十一师王耀武部，五十八师冯圣法部，……自苏州一直退到南京附近的句容、汤山一带。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戚，曾充当蒋之侍从人员及警卫旅长多年。他到汤山后便来南京见蒋介石，蒋也没有责备他，就叫他率部参加守卫南京，经唐生智赋予这个军以守备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的任务。这大约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前后的事情。约再过了两三天，又有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率所部一五九师谭邃部及一六〇师（叶肇自兼），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率所部一五四师巫剑雄部、一五六师李江部（这两个军都是广东部队）自镇江退到句容、汤水镇一带，经唐生智报告蒋介石核准命叶、邓两军均参加保卫南京的任务。卫戍长官部令这两个军在汤水镇东西之线占领阵地，阻击沿京杭公路向北进犯之敌。这样就形成了以第十军、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第七十四军守卫南京外围阵地，以三十六师、教导总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守卫南京复廓阵地的两线配备的态势。增加了六十六、七十四、八十三三个军，由于部队的残缺，这三个军合计实有兵力约为四万人左右。加上原有的，保卫南京的总兵力约十一万多人。

（摘自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俞回到军里对王耀武说："固守南京部队最初并没有把七四军计划在内，第一军胡宗南部都过了长江，现在浦口一带，没有把他们留在南京，反而把七四军留下了，看情况南京是守不住的。何应钦、白崇禧，以所见到的其他将领都不赞成守南京，只有委员长和唐生智主

张守。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保卫南京的最高指挥官，目的是在做官发财。你看南京能守得住吗？"王耀武回答说："我看没有守住南京的有利条件：(一)各部队将从上海撤退，士气不振，一般官长身在江南而心已过江北。(二)唐生智的长官部是临时凑合而成的，所指挥的部队是临时调拨的，这些部队他过去都没有指挥过，他不了解各部队的情况，也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三)要守南京城，必须守住城郊的要点，地区大、兵力单、难以形成纵深，易被突破。因此我也认为南京不易守住。"这时不但俞济时、王耀武对守南京没有信心，留在南京的各部队长，也多认为固守南京没有把握，徒遭牺牲。

（摘自王耀武：《南京保卫战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蒋介石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亲自带着唐生智、罗卓英、周斓（长官部参谋长）、王敬久、孙元良、宋希濂、桂永清、邵百昌（江宁要塞司令）等人到紫金山、雨花台、狮子山炮台等处视察了南京的复廓阵地。政府的重心移至武汉去了，蒋介石在南京已经无事可做，为什么还不走呢？这是一个谜。在视察城区阵地完毕的那天，我问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委员长和你们什么时候离开南京？"钱悄悄地对我说："还要几天，德国大使陶德曼日内就要来京见委员长。"我觉得突然，就续问："陶德曼这个时候到南京来干什么？"钱说："还不大清楚，可能是德国想来斡旋和平。"过了几天，我向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自诚了解陶德曼来京的内幕。他告诉我说："陶德曼这次来京见委员长，是想由德国调停中日战争，他转达了日本所提停战条件六项：(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三)扩大"淞沪协定"非武装区；(四)中、日经济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绝反日运动。委员长曾征询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人的意见，他们均表示可以接受。电商阎锡山，也表示赞同。委员长向陶德曼表示，可以将以上条件做谈判基础，但对日本不敢信任，日本说话可以不算数，德国是好朋友，要求德国须始终担任调人到底。"同时又对我说："德国希望中国参加反共反苏阵线，自不愿中日间的战争演变为长期性的。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亦不希望进行长期战争，它是采取逐次吞并的策略；因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颇大。如果谈判，总需要一些时间，日军在这期间大约不会进攻南京。这样，我们可利用这个机会把部队整顿充实一下。"这虽是萧自诚的话，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想法。

十二月四日晚八时蒋介石到铁道部南京卫戍长官部所在地，召集师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讲话，内容要点为：(一)抗战五个月来，虽然军事上是暂时的失败了，丧失了许多地方，但也给了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使日军不能达到它速战速决的目的。(二)由于我国的英勇抗战，获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援。(三)为什么要守南京呢？因为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四)守南京可以牵制敌人兵力，而使其他部队得有喘息和整补的机会。(五)希望大家抱定决心，努力固守。现云南部队三个师装备齐全，兵力充实，又有作战经验，不久就可到达武汉。我将亲自率领这个部队从皖南方面来解南京之围。(六)守卫南京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大家要在唐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克尽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蒋介石讲话一个多钟头后，唐生智以悲壮的语调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最后蒋嘱大家要效法唐长官的决心和精神，服从唐长官的指挥，努力达成任务。从上述蒋介石的讲话，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多么空虚，身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由于在平汉路和上海战场的大溃退，部队完全失去了掌握，脑筋里所有的就是从云南开出来的三个师，他将亲自率领来解南京之围，如

果说他当时的动机不是虚伪欺骗的话，至少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于十二月五日（或六日）晨乘飞机离开了南京。

（摘自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必死决心，还要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第一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他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那时日军对南京分三路进攻：右路敌主力沿沪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阳、句容攻南京；左路由太湖南侧西进，先攻广德、宣城趋芜湖，截断南京守军退路，再向南京合围。十二月四日右中两路敌人攻陷句容、秣棱关，向南京外围阵地猛攻，至十二月八日先后攻陷淳化镇、汤山、龙潭各地。这时，敌左路也攻陷芜湖，即北向于十一日陷当涂，继续向南京攻击前进。南京外围前进阵地守军已逐次退入复廓阵地固守。

占领南京外围阵地的敌人，从十日起对复廓阵地展开猛烈的攻击，集中步、炮、空协同的威力对各城门猛轰。当天下午就有一部分敌人窜入光华门外廓，经尽力反击；到黄昏时才把窜入的敌人打退，抢修好被轰毁的城墙缺口。继续战斗到十二日正午，敌主攻方面的雨花台被敌攻陷。那里的守军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由城外爬进城墙内，径趋挹江门，企图由下关渡江脱逃。经卫戍司令部指定的戒严部队宋希濂部堵劝，收容约二千人，仍由孙元良率领回中华门附近作战。到下午四时许，俞济时部七十四军又由三汊河向下关搭浮桥，作向下关撤退准备，又经戒严部队请示长官部制止。这时，敌虽猛烈攻城，雨花台和紫金山第一峰据点被敌占领，但战斗并没有到最后分晓阶段，至于说到“固守南京”或给予敌人应有的损失，自然更是谈不上。

可是，据说就在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唐生智突以征求各部队长意见为名，召集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也没有经过讨论，就命令参谋长周斓把油印的突围命令交付各部队长，只说了声“照命令规定的办！”命令指定宋希濂的七十八军掩护长官部直属部队在下关渡江后继续渡江；其余部队由正面突围。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自告奋勇要死守南京的唐生智，马上同几个重要人员登车驶向下关渡江去了。听说当他船到江心，却被守在浦口的第一军挡驾。即根据他自己原来的通知不准任何军人渡江，嚷着要开枪射击。经过再三央告，才让他登上了北岸。

当天夜晚从挹江门到下关一带就进入了混乱状态，渡江船只又少，当宋希濂随直属部队第一批渡后，再把船只放回南岸继续渡江时，只见人人争渡，个个抢先，于是有的船因载重过量沉没了，有的船渡到中流又被岸上没挤上船的开枪射沉了，连掩护渡江的部队也有许多过不了江。同时长官部草率的指示突围，有的部队并没有人到会，也没有接到突围命令，如徐源泉的第二军团，因战斗中被敌炮把通信线打断了，同长官部失去了连络，用电报同长官连系又得不到回电，直到当日（十二）夜半才从避难的船夫口中知道下关纷纷撤退的情况，就独断由龙潭附近渡江向合肥撤退。本来十二日入夜以后，战况非常沉寂，反是南京守军在下关自相践踏，乱得不可开交，使许多人淹没在江里。因为许多部队并没有由正面突围，一起拥到下关去了。实际既然这么一打就要突围，当初又何必向复廓阵地撤退呢？岂非多此一举。自然在自己国内作战，由正面突围倒是比较安全的。如六十六军叶肇部就是抱定与其淹没在江心，何如与敌一拼的决心，就由太平门出城，经紫金山北麓，沿途同敌人虽有过几次遭遇战，终于经句容、溧阳安全到达宁国集中。

当时，有些部队没有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就一走了事。所以到十三日，敌人既没有进城，下关一带还在纷纷地搭木筏抢渡，自相践踏，有的淹没到江中去了。也有许多失去了官长率领的士兵，徘徊在南京街头，象无舵漂船不知往何处去好；有的只好向难民国际委员会交出武器请求收容了事。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象尘土一般一阵风吹散了。……

（摘自唯真：《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

〔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梅 汝 璈

日本兽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我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我同胞，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以及他们认为是可能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年龄的我青壮年同胞，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而这些次的屠杀又是以最残酷、最卑鄙的方法实施的。例如，在十二月十五日（即占领的第三天），我已放下武器的军警人员三千余名，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均饮弹殒命，其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又如，在同月十六日（即占领第四天），麕集于华侨招待所的男女难民五千多人，亦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使随波逐流，借图灭迹。这五千多人当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其中一人（记不清是哪一个）且曾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证言犹历历如绘地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日本兽军在南京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只怕要数下关草鞋峡的那一次，那次屠杀是在十二月十八日（即占领的第六天）夜间举行的。当时兽军将我从南京城内逃出而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男女老幼共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除少数已被兽军饿死或打死者外，全部都以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使饮弹毙命；其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均遭乱刀砍戳；事后并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目的也是为了灭迹。

以上几次集体屠杀虽然死者的尸体被投诸江中或焚为乌有，日寇自以为无罪迹可寻，但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这些暴行已经是铁案如山，不容抵赖的了。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还发现了好几处“万人坑”、“千人冢”，其在灵谷寺旁的一处且有敌伪时期南京督办高逆冠吾为无主孤魂三千余所立的一块碑文。这些坑冢无疑地是日寇集体屠杀的罪证，可能是他们使用另一种方法（活埋）实行的有力证据。由法医们后来对从这些坑冢里挖掘的数千具尸骸的检验和鉴定报告中，可以推定：集体活埋确也是日本兽军使用过的集体屠杀方法之一，而且使用过不止一次。

由上所述，可见日本兽军对我南京同胞的集体屠杀是极端残酷野蛮的，而其方法又是多

种多样的。他们对我南京居民的任意的、个别的或小规模的杀害同样地是用极端残酷野蛮的多种多样的方法实行的。花样之多，死事之惨，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之外，日本兽军对我无辜同胞还用尽了其它种种的杀人方法，例如：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割生殖器、砍去四肢、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患者所能想象得出的最残酷的杀人方法，他们几乎都施用了，而且在南京沦陷后持续六个星期之久的时间里，每天都要我无辜同胞施用成千上万次，这确实是骇人听闻、史乏前例的残暴记录。

但是最残暴、最令人发指的还是日本兽军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在这里，我只指出一桩“杀人比赛”中最突出的事例。这件事是在资格最老、声誉卓著的英文《日本广宣报》(JupanAdvertizer) 上登载并大事宣传过的。事情是这样的：

在南京被兽军占领之后，有两个兽军军官，在全城杀人如麻的空气中，忽然别出心裁地决定要进行一次“杀人比赛”的游戏，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能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杀的方法是用刀劈，就象劈柴火或我国南方儿童“劈甘蔗”游戏一样。同意了比赛条件之后，这两个野兽军官便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便是当头一刀，使成两半。

在他们每个砍杀的人数都到达了一百的时候，他们便相约登上紫金山的高峰，面朝东方，举行了对日本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

在这以后，其中一名又添杀了五个中国人，另一名却添杀了六个。于是，后者便以接连杀了一百零六个中国人而被宣为这场“杀人比赛游戏”的“胜利者”。

这种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经《日本广宣报》披露之后，日本政府、日本大本营和日军司令长官非但不加谴责、制裁，反而认为它是“耀扬国威”、“膺惩支那”的“光荣”举动。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之下现在已经屹然站起来了，而且正在本乎“与人为善”的精神争取同日本人民的和平共处，但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这样一些累累血债，我们怎能不告戒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勿忘，并经常保持警惕！

* * *

日本兽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除了任意屠杀我国同胞之外，便是随时随地强奸我国妇女，其次数之多，情状之惨，也是打破世界记录的。因此，在喧腾一时的世界舆论中，有的人称它为“南京屠杀事件”，有的却称它为“南京强奸事件”。其实，对日本兽军说来，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兽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至连同她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说：“强奸事件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是为了保护她的亲属，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便遭到杀害。……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

法庭接受了无数的关于这类强奸及奸后杀戮的证据。例如，幼女丁小姑娘，经兽军十三名轮奸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当被割去小腹致死。市民姚加隆携眷避难于斩龙桥，其妻经兽军奸杀后，八岁幼儿及三岁幼女因在旁哀泣，均被兽军用枪尖挑其肛门，投入火中，活活烧死。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在东岳庙中被兽军奸后用刀刺杀，并以竹竿插穿其阴户，以资取乐。民妇陶汤氏在遭兽军轮奸后，又被剖腹断肢，逐块投入火中焚烧。这类不胜枚举的残酷无匹的奸杀暴行，在南京被占领后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光内（迟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旬，

情况才开始好转），每天几乎都要发生几百件，乃至于上千件。

因此，远东国际法庭的认定是："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

法庭的这个认定和数字估计完全是根据曾经向法庭提出过的那些确凿证据而慎重作出的，绝对没有夸大的可能。其实，当时的实际情况还要比这坏得多。

*　　　　　*　　　　　*

有人说，日本兽军笃信佛教，敬佛畏神，只要藏匿在佛庙或庵观，便能逃避灾祸。但是事实证明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非但南京庙庭遭兽军火焚者比比皆是，即和尚尼姑被杀、被奸、以及奸后被杀者亦为数甚多。他们命运的悲惨并不比一般市民稍胜一筹。例如，著名的和尚隆敬、隆慧、尼姑真行、灯高、灯元等都是在兽军进城的第一天在庙庵中被杀掉的。此外，兽军还常以杀侮僧人取乐，其方法是：兽军于强奸或轮奸少女后，遇有过路的或能抓到的僧人，必令其续与行奸，有敢抗拒者，便被处宫刑（割去生殖器）致死，

由此可见，所谓日本兽军"敬佛畏神"之说纯系虚构；佛庙庵观实无丝毫安全之可言。

非但佛庙庵观毫无安全之可言，即避难于国际难民收容委员会所设置之所谓"国际安全区"的我国同胞亦不能逃脱敌寇之魔爪。"安全区"事实上并不"安全"。

记得远东国际法庭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时，曾传唤过几位当时实际负责安全区工作人员出庭作证。就我所能记忆的，他们在宣誓后作了如下的证言，并提出了许多文件档案去支持这些证言。证言的要点如下：

在南京沦陷初期，日本兽军曾一再闯入国际安全区，对该区所收容的难民普遍地进行了"甄别"和"鉴定"。凡是他们认为有抗日嫌疑的、当过兵的、以及适合兵役年龄的我青壮年男同胞（极大多数是工人、学生、店员）都被逮捕，成批地捆绑去供集体屠杀，尸体被投入江中、或予以火焚、或活埋于"万人坑""千人冢"内。

在"安全区"存在的整个期内（约两个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初始办理结束），兽军当局曾多次搜索该区难民，并迫令提供大量少女去"慰安所"（即妓院）"服务"，以供兽军蹂躏及发泄性欲之用。

由此可见，所谓国际安全区，其所能保护者亦仅是一般老弱妇孺而已。就是这种人所得到的保护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日本兽军经常单独地或三三两两于夜深人静时越围而入，或则不择老幼，摸索强奸；或则盗窃财物，囊满则去。

"安全区"既无铜墙铁壁，又无武装警卫，在那里服务的国际人士对兽军这些暴行亦只有低声下气、苦口婆心地去进行规劝排解或讨价还价，以期减少牺牲而已。

在这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出庭作证的老年西洋牧师，他也是当时安全区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说：在某一夜间，一个日本兽军竟光顾他的住宅达三次之多，目的之一是想强奸匿避在他家中的小女学生，其次便是想窃盗一点财物。每次经他高声嚷斥之后，这个兽兵便抱头鼠窜而逃，但是每次都要偷点值钱的东西走。为了满足他的贪财欲望，最后一次，这位老牧师索性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里扒去他仅有的六十元纸币。在得到了这份意外之财以后，这个日本兽兵便怀着满意和感激的心情，一溜烟似地从后门逃走了。

由此可见，号称纪律严明、天下无匹的"大日本皇军"，非但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所不为而且竟堕落到做小偷、扒手的地步！

远东国际法庭在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约二十天的过程中，空气一直是严肃、沉重的，惟

有在老牧师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法官同人和旁听席中的大量群众（每庭旁听的日本人都在一千以上）都不禁失笑，而被告席上的那些大战犯们(特别是松井石根)却面有难色,啼笑皆非。

所谓“国际安全区”,甚至国际人士自己的住宅，其情况尚且是如此，至于整个南京城内其他大街小巷，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被日本野兽糟踏、破坏到什么地步，便更可想而知了。

*　　　　*　　　　*

远东国际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时还接受了一个极端重要的作证文件。它是纯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打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个秘密电报。这个电报是德国投降后盟军搜查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所发现的。法官同人都非常重视这个电报，给了它很高的作证评价，因为它是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是日本同盟的兄弟国家所提供的。电报在概括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之后，其最终结语是：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由于这副“野兽机器”在兽军长官的纵容下高速度地和全火力地开动达六星期之久的结果，我南京同胞被残杀的数目无疑地是惊人巨大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个数目究竟是多大，则缺乏精确的统计，而各方的说法亦不甚一致。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精确地说来，由红十字会掩埋的是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人，这些数字是由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根据各该团体当时的纪录和档案向远东法庭郑重提出的。）

远东国际法庭这个估计无疑地又是慎重的、保守的。但是，注意到日本兽军灭迹技俩的狡黠和多样化，法庭判决书中遂有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仅就我们前面所举的尸体被消灭了的三个事例，便是六万五千余人之多。（计汉中门外枪毙的被俘军警三千余人，尸体被焚；中山码头射杀的难民五千余人，尸体被投江中；下关草鞋峡被密集扫射杀死的平民五万七千四百余人，尸体亦被焚化。）其他无迹可寻，或发现稍迟、来不及向法庭提出证据的，亦必不在少数。说这一类被害者必在十万人以上，是非常保守的。中国方面常说被灭迹的牺牲者达十九万人，也决非故意夸大。（在对谷寿夫案的判决书中便有这样的认定。）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远东国际法庭认定被杀者为“二十万人以上”不但未包括尸体被兽军消灭了的大量被害者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仅仅是“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这六个星期虽是日寇杀人如麻的高潮，但是六个星期过后，兽军杀人的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只是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是减少了，而个别的、零星的或小规模的屠杀却仍在经常地进行着，这一类的被屠杀者是不包括在远东法庭所认定的那个数字之内的。

把以上所举的种种因素考虑在内，我们可以很肯定地估计：在日本兽军占领时期，我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是在三十万至四十万之间，即三十五万左右。这个估计决非主观臆测，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虽然谁也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绝对精确的计算。同时，可以说，我们的这个估计同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是丝毫没有矛盾或抵触的。

（摘自《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

〔附〕华南重镇广州竟在国民党不设防的情形下失守

十月十一日晚深夜敌巡洋舰、驱逐舰、炮舰又运输舰五十余艘，结集于惠阳属之鲘门大小青山一带。至十二日，敌机十架由舰起飞，在大亚湾附近一带盘旋侦察。敌舰二十余艘潜入大江湾，发炮向各小岛及岸上密集射击。而敌机亦凌空投弹，掩护敌陆战队二千余在霞涌登陆。……十三日午刻敌犯惠阳，共分五路：一攻淡水，一攻稔山，一攻东涌，一攻下涌，一攻盆山。……我军……移向淡水北新阵地……。十五日敌以全力进袭惠阳，坦克车、骑兵均出动，敌机数十架，轮回轰炸，我军在惠东……应战……。十六日，我转移至郊外高地固守，敌一部窜向增城、新塘。……同时敌另有一部分突攻我博罗，并以飞机数十架轰炸我工事。十七日我以猛力堵击博罗之敌……惜乎增城固守不久，广州保卫战尚未布置成功的时候，二十一日我军便仓卒撤退了广州。

（《战局转入新阶段》，《时事月报》19卷6期，1938年11月号）

广州这次失陷之速，不但使全中国全世界惊异，更使全中国爱国的民众和全世界同情中国抗战的人们痛心。痛心的不是中国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门户失陷，而是在这失陷中，过去经历过的痛苦，残酷的血的教训，又以更痛苦、更残酷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我们分析广州所以迅速失陷的原因，不外下列三点：

第一、军事上防务空虚。这不单表现在一般人所指出的当地军队“被调一空”，而尤其表现在现有的军队政治、军事和技术训练上之薄弱。我们要知道两月前粤军精锐被调时，最高军事当局对于粤省防务并非没有补充的准备。我们得指出在粤、湘、赣边境，在粤、桂边境，中央屯驻有总共不下二十万的生力军。日军如果在粤海任何地点登陆，只要当地驻军能有效地抵抗相当时间，这些生力军就可以开来应援。谁知这次大亚湾事变发生，当地驻军竟那样地没有战斗能力和战斗意志，竟是望风而逃，使开来的援军连构筑新防线的时间都没有！

粤省军队中的健儿，确实是全中国最良好的战斗素才，只要得到良好的中上级司令的指挥。这事实，早在“一二八”，近在“八一三”，最近在长江南岸，都有过切实的例证。但我们同时要不客气地指出，粤省的地方将领中，却有不少犯着一面腐化无能，别面派别流杂，地方观念浓厚。由于后者，他们这次的作战意志，实在可说是衰颓；由于前者，他们简直不知道与日军作战和从前的军阀混战不同，事先必须有应有的防御准备，当场更必须有适当的现代技术。两种毛病兼而有之，焉能不溃败！

第二、粤省在日军登陆以前，虽然外表轰轰烈烈，口头慷慨激昂，俨然全国抗日最坚强的堡垒。然而在知道内容的人，却早就说过那完全是纸老虎。粤省的政治是一国三公。这三公在一切抗战国防要务上，不但不能合作，反而时常互相击肘，互相竞争。所竞争者大都是

有面子的事情，如大家各开国际宣传机关数个；所击肘时者则是真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如一方面委了许多“民军司令”，别一方面则一饷一弹不发，结果是“司令多于兵，兵多于枪，枪多于弹”，讲什么“武装民众，保卫大广东”！

最后然而最重要的是：粤省民众虽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但多年的不良统治，已使这传统受到很大的摧残。自抗战军兴，论理应该把这传统恢复，使革命的圣地成为抗日的真正坚强的堡垒。然而我们不能不含泪指出的是：正相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所有广州乃至广东全省的民众运动，主要完全是空洞的宣传。广州以及香港的小贩义卖运动，曾经一时震惊世界的耳目。可是这证实了粤人的真正的革命性爱国心依然存在的伟大潜力，因没有因势利导而加以组织与训练，结果只停滞在自发阶段，最后甚至昙花一现，烟消瓦解。更堪痛心的是当局者不但自己不做民众运动，更害怕而阻碍别人做。举例说：在海陆丰，在琼崖，我们知道还留有万余的革命民众武力，他们曾屡次三番请求援八路军、新四军之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然他们所得的答复是：无条件解除武装，然后酌量情形分别插编于其他部队。这结果是：在广州沦陷的前夕，虽然还有着伟大的七万人的火炬大游行，而如此热烈的民众终于因绝无武装而只好追随大军作流离颠沛的难民，或苦守田园，做敌人荼毒下的亡国奴了。

（社论：《血的教训》，《导报》，1938年10月25日出版）

〔附〕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不许人民起来抗战的各种反动措施的片断资料（辑录）

蒋介石关于对待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团体的态度的反动命令

（1938年5月10日）

本党负有领导建国之责任，全国军人之主义信仰，自应绝对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完全统一，不容稍有紊乱。近闻各军事学校及军事机关，时有反动分子混入工作，仍受其原来严密组织之发踪指示，流弊滋大，概应禁止，以保军事系统之整一。自本通令到达之日起，所有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及各军事学校之主管长官，对于所属人员学生之党派关系，概应彻底查明，凡系其它党派之分子，未经本会指明任用，而私自秘密混入者，应即负责检举，并停止其职务与学籍，仍陈报本会备查。否则一经发觉，该主管长官应受严重之处分。自经此通令之后，各该主管长官对任用人员，均应负严格考查之全责，如系他党分子非经特交任用或特许者，概不得率予委任，其确因职务上别无适任人选，而被任用者，能自行陈明党派关系者，准予报请本会核示，待核准后，方得正式令委，仍应随时严密查察。以上指示各节，务仰各该主管长官恪切遵办，毋得视同具文，并将奉文之日具报为要。

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

——1938年5月31日国民党
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79次会议通过——

(一)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凡符合下列标准者应推诚相见:

1. 放弃其原有主张,确认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
2. 服从本党及本党领袖;
3. 恪遵国法严守军纪;
4. 遵守本党抗战建国纲领为国家之统一与民族之复兴而奋斗。

(二)凡有违背上列标准或阳奉阴违者应严予取缔。

(三)党外各种政治团体之分子如脱离原隶政治团体请求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应尽量容纳其优秀分子,如加入本党为党员而仍未脱离原隶政治团体者,应严予取缔。

(四)秘密政治团体及身分不明分子,其政治活动应严予取缔。

(五)二三四各项规定严予取缔之政治团体或其分子,本党各级党部及党员应随时严密防范,并调查其活动情形报告上级党部。

蒋介石关于严禁各校学生等集队游行的密电

(1942年1月21日)

行政院转教育部社会部暨各省市政府:我国自对暴日与轴心国宣战以来,责任愈加重大,事业益为艰巨,凡我全国国民均应刻苦沉着,严守纪律,各在本位加倍振奋,克尽职责,发挥正齐严肃之战时精神,决不可再有任何粉饰虚娇之无谓铺张及影响后方社会秩序之行动,免使敌谍汉奸混入为祟。嗣后各省市及其所属地方,无论任何团体及学校学生与一般民众概不得假借任何名义集众游行,应由当地各级军政机关负责取缔,严切禁止,如有故违禁令者,不问何人主动,即以扰乱治安论罪,此实战时必须树立之纪律,亦即倡导人民力崇笃实之要图。除分行党政军各机关外,务仰恪切奉行,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并将奉电日期具报为要。

(资料第3辑第98册)

抗战初期官方脱离民众的一种典型地方

民众运动没有自由,政府对民众一向采取高压的手段,直到平津失陷,我大军积极北上增援的时候,还有逮捕欢迎过境抗日军队的学生的事件发生;救国会的分子,也有被逮捕的。政训处所拟的民众动员计划,只是一种宣传资料,爱国的分子要作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必须通过官办的制度,但事实上又有许多限制,下层政治机构太坏,不但不去动员民众,而且破坏动员民众的工作,群众开会都有侦探监视。政府虽然有民众动员委员会的组

织，但那只是一种点缀，所谓抗敌后援会，并不是民众的组织，他们不作工作，有时反限制人民作救亡工作，例如一家报馆，因为募集救国捐款太踊跃，引起后援会的忌视（因为人民信任报馆而不信任后援会），几乎将报馆查封。后援会为着统一募捐慰劳工作，要统制人民的后援工作，但因为后援会的官僚们声誉太坏，使民众望而却步，结果民众不能自由工作，经过后援会的统一之后，事实上就取消了人民的后援工作。后来因为八路军在晋北游击战争的胜利，使山东当局也注意到民众武装力量的重要，所以一方派遣游击部队到河北去作游击战，一方命令各县普遍的组织游击队。不过这种官办的游击队，并没尽抗日的任务，各县的游击队甚至强制人民参加，并有收缴民枪的事发生，尤其因为政治机构不健全，民众与政府的对立很深，一切官办的玩意，都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政府中甚至有人企图借武装民众的机会，培植个人势力。抗战开始后，山东并没有大规模的宣传队，有计划的作宣传民众的工作，而组织民众的事，更谈不到，大部分知识青年埋藏在家里，感觉报国无路，投效无门，在地方政府的压迫束缚之下，觉悟的分子不能自由活动，落后的群众不知道怎样动，没组织的群众象一盘散沙，山东的好汉们，怎样能积极参加抗战？后来，远自华南到华北参战的第×战区司令长官×××将军，为着发动民众参战，依照山西的作法，成立了一个战地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山东方面只摊派了几名委员，并没作一点工作。去年（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李韩联名发表的告党政军的宣言，山东的报纸并没敢登载，所谓约法七章，韩只署了一个名，事实上他没有一条不触犯，尤其是收缴民枪的事，对山东人民的抗日武装的建立，发生了很大的阻碍。

（岳军：《山东是怎样弃守的》、《全民》周刊1卷7期，1938年1月22日出版）

陕西省党部解散西安十三个救亡团体

二月二十二日，《西安晚报》披露了一个消息：陕西省党部奉令解散西安文化界协会等十三个救亡团体，计有：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编辑人协会、西京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西京世界语学会、西安新文字促进会、西安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分队、木刻漫画研究会、新时代歌咏团、西安民众抗敌戏剧社、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北作家抗敌协会、陕西省青年抗日决死队。

（《新华日报》1938年3月2日）

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因当局不备案，宣告结束

——筹备会的一个通告——

本会发起目的，原为统一工人组织，集中工人力量，在政府领导及三民主义原则之下，参加抗战。筹备以来，历时已两月有余，在此期间，除进行立案手续外，适逢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本会以动员民众端赖政府与民间有一致之步调，及整个之计划，庶足以广收实效，故特根据全国工人意志，及实际状况，拟具今后改进工运意见，呈献大会采纳施行。其他各项抗敌工作，亦皆兼筹并顾，参与进行。此外公开广征会员，以冀全国工人能

在总的领导之下，咸有抗敌报国之机会。截至现在，请求登记入会或派代表来会接洽加入之工人团体，计有三十余个，其地域为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四川、江西、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南京及海外等十七个单位，包含全国各职业产业部门及特种工业工人，此种踊跃盛况，实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仅见现象。足征全国工人抗战情绪之热烈，及企求全国性总组织之殷切，此为本会发起筹备情形之大概也。本会原拟定期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推进实际工作，惟因于四月十五日接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民（三）字第一六九号批示，以本会十八发起团体中有"代表未到尚未签名盖章者""因地区沦陷工会欠健全，代表产生之手续欠完备者""无实际会员者""不足以代表各部分多数工人之意见"，对于本会请求"备案各节暂从缓议"，当经提交第四次全体筹备委员会议讨论，咸以本会之发起筹组完全系适应当前抗战需要及根据全国劳工之一致要求，参加发起各团体，其成立时期容有久暂，要皆系党政军机关之立案或认可之合法组织，则为事实：代表产生亦经正当之手续，至于沦陷地区之工会，应否参加，乃属极显然之问题，盖沦陷地区亦为中华民国永久领土之一部分，不过暂时为敌人占领而已，况该地区内参加本会之各工会，实际上均尚有工作，自不能以形式停顿而谓为不健全，且此次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对于"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均有明白宣布规定，仰见本党对于民众运动重视扶植之至意，当经议决推派本会全体常委至政治部请示，并具文请求重予考虑，准许备案，或指示详细改进办法，俾有所遵循，迄今尚未奉到批复。顾本会之所以如此不避艰苦，不顾毁誉者，原欲有所裨补于抗战，然默察环境，顾望来兹，深觉前途窒碍殊多，……爰经第五次全体筹备委员会议决于五月二日宣告本会结束。……

（《新华日报》1938年5月4日）

不让民众自己动员起来

动员民众是否除了地方行政机构改善以外，还需要民众有自动组织的自由？熊主席对这一点是很肯定的认为"民众动员，不能由民众自动的去做，而要由政府统一办理"。所以江西今天各县的动员委员会，是由县长做主席，这是熊主席"定于一"的主张。他认为"凡是某一县绅士愈多，则各人都要组织什么团体，因此，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动员的事情反而置之不理，等到局势一严重便溜之大吉。这理由，是因为民众（实际只是少数绅士）没有责任心，而县长就不同了，他有责任，有省政府在后方监督，不敢不负责"。把各地方少数腐化的豪绅，看作是民众的唯一领袖，或者是民众的唯一的代表者，这大概是可以使江西省政府当局不相信民众有自动组织能力的一大原因吧，因而，民众至今也未能动员起来！

（《新华日报》1938年7月31日）

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在武汉被解散

昨日卫戍总部政治部解散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三个团体消息公布，这是非常令人惊奇令人愤懑的一件事！当武汉危急的时候，正是需要动员民众保卫武汉的时候，

而最有工作历史、最有群众基础的三个团体却遭受了解散，这不但违背全国人民一致动员保卫武汉的呼声，而且也违背政府坚守武汉的国策。这一行动不但表示国内政治还有许多未尽善之处，未开明之处，而且也表示民族团结尚未达到必要巩固的程度。

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青年群众团体，从华北事变以后，他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上，在抗日救国事业上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全国各地都散布有它的队员积极的参加军队，参加政府领导的各种抗敌工作及民众运动，尤其在沦陷区域中，他们不怕任何困苦与牺牲，在那里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在那里进行反日的游击运动。

全武汉、全中国都知道青年救国团是一个最活动最活跃的青年团体，他们在各种运动中，尤其在保卫武汉的工作，积极的艰苦的参加工作，当卫戍政治部组织工作队的命令发表了，不到几天的工夫就动员了五百人的救护队，正因为这个团体内有个别的共产党的同志积极的参加工作，才使这个团体能够获得这样的工作成绩。

蚁社是一群职员的文化救亡团体，他们在上海、在武汉都有过很好的工作。

这些团体在他们的行动中，不但没有任何地方表示违背政府的国策，而且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在政府领导下协助政府。从抗战的利益上来说，从国内民族团结的影响上来说，从国际援华同情的观听上来说，解散这些团体都是没有好处的。

（《新华日报》1938年8月21日）

报人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

关于禁书问题，最近我们已收到不少读者来信，都认为这是目前关于文化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根据中央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第二十六条的明文规定，人民的言论、出版，应有充分的合法保障。所以，除掉汉奸理论应严加取缔外，凡是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的理论言论，都不应加以摧残。尤其是拥护政府，灌输抗战知识，阐扬抗战理论等等的书籍，更加奖励出版，以提高人民对于抗战建国的认识。如果任何学校或任何个人，不遵守中央法令，仅凭一己之好恶，任意禁止阅读书籍，不仅摧残文化事业，且为藐视中央法令而有破坏抗战之嫌。即如来信所述，宋庆龄先生著的“中国不亡论”等都在禁止之列，禁止者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颇难令小索解。这样一来，不但正确的抗战理论难于阐扬，谬误的思想不能纠正，情况迷离，使青年感到无书可读的痛苦。我们深切地希望有关当局，严密调查，如果确有这些违法悖理的现象，即宜迅予纠正，使人民能有法可守，而青年不致陷在徬徨苦闷之中。

（《全民》周刊87期，1939年9月9日出版）

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

敌人正在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冀中、冀南、冀察晋、晋东南等区，而我抗战阵线中，又因鹿钟麟、沈鸿烈之极端错误行动，引起严重的磨擦与纠纷，使华北抗战遇到莫大困难与危险。因此，共产党中央及八路军领导者，提出下列主张，一面与蒋及各将领谈判，一面实行坚持自己之立场：

（一）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磨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因此，为真正统一指挥及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石友三副之；决不能任鹿胡干，危害抗战。

（二）冀、察、鲁三省，为山西、中原、西北之屏障，若无八路军在三省英勇抗战，收复失地，中原、西北均危，山西现状亦不能保。为发展三省之游击战争，巩固三省之抗日根据地，应将山西八路部队，多开一部分赴三省，而三省八路部队，则决不能减少；否则只于敌利，于我不利。且八路军在三省扫荡伪政权，恢复中国政权，位于抗战之最前线，成绩卓著，功在国家，决不能听鹿钟麟等之昏乱报告，汪精卫之汉奸胡言，而自乱步骤，危害抗战。

（三）敌后抗战形势，证明建立边区是正确的，维持原有省界是错误的。因此，冀察晋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但决不应取消，相反的，应当在山东及其他地区，依照战略形势划分新的行政区域。

（四）使敌后军、政、党、民不一致，使指挥间不统一，限制排挤八路军等之政策，是错误的，是对抗战有害的，长此下去，势将引导失败。因此必须加以纠正。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五）当敌人进攻，我军血战之时，忽闻要取消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冀察晋政委会，实使抗战将士、敌后民众闻之愤慨。影响甚大，决不能从。

（六）政府发饷甚少，八路军及游击队不能不就地筹粮。人民拥戴，踊跃输财，有利于国，无害于民。今后仍应如此，决不能枵腹作战。

（七）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决不应轻易更改。

中央书记处

中央关于精神总动员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

（一）在党内解释纲领的两面性，一方面为抗日的，这是基本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

（二）在一切党的公开机关，公开党员，公开党报上，对此纲领应采取如下的立场：

1. 基本上拥护此纲领，运用与发挥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提倡为国家民族、为精诚团结、为三民主义的全部实现、为争取抗战建国最后胜利而牺牲奋斗、而竭忠尽孝的革命精神，来养成奋发有为、朝气勃发、大公无私、见义勇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的新国民气象，同时以此来反对与打击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一面反对防共分子的观点，一面反对反民族分子的观点。

2. 指出这些积极的东西不但本党历来主张而且本党已在实际上执行了与执行着的，以事实证明共产党员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对纲领中某些两面性的条文与说明给以我们的明确解释，批评其中所包含的缺点，打击一切利用这些缺点进行防共和反八路军新四军、反陕甘宁边区等活动的阴谋，指出这种阴谋是违反团结抗战国策、违反纲领的基本精神的。

（三）在党的力量占优势的地方，应进行拥护此纲领的动员，充分运用此纲领公开批评各种不良现象及防共的阴谋，号召全国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争取民族最后胜利而奋斗。

（四）在非蒋系统治的地区，则我们应与当地进步势力及较接近我们的同盟者采取一致的步调，共同打击以此纲领破坏团结进步的阴谋活动。

（五）在我后方，如有可能，我们应以普通群众的资格运用此合法的机会去进行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认真的拥护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联系到当地反贪污腐化等的斗争，并在实际上减弱与打消国民党地方党部与政府以此来进行防共活动的阴谋。

中央书记处

中央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目前全国举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正如蒋委员长所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敌人“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吾人之意志，威胁吾人之精神”，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振奋抗战到底之精神，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同志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为使全党同志深切了解这一运动的意义，中央特指出如下各点：

（一）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战以前，就已向全国同胞号召全民族力量的总动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精神、物质的总动员。在抗战以前，我党进行这种号召，为的是准备抗战。“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我党不断的根据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上的经验，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民族的潜力，指出中国虽是一个弱国，然而如果能使全民族摆脱一切精神上的桎梏，振衰起敝，团结一致，以抵抗外寇，则将起死回生，无敌于天下。我党和那一切简单的“唯武器论”者，很久地进行过无情的斗争。在抗战发动以后，我党发表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的有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最大的努力，去注意各方面力量的动员，其中包括着对于全国人民精神上的动员。两年以来，我党无情地反对各种式样的民族失败主义者。在去冬我党六中全会上，又复指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十五条，其第一条就是：“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为达到这个目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中的报告，关于一切宣传鼓动工作，曾经这样的指出：“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赞助政府推行于全国，以达到“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之目的。

（二）按照”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所提出的“共同目标”是：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些都是根本正确的。中国这个国家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国家，尤其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绝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中国人历史上生息休养创造奋斗的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日寇侵犯我国，就是要毁灭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就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不共戴天之仇敌，我们必须抵抗到底，

把日寇完全逐出于我们国土之外，没有与之妥协的余地，这就是“国家至上”。中华民族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尤其是占百分之九十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族，我们民族需要生存，需要繁荣，需要独立自由和幸福，我们民族首先需要从日寇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不坚决抵抗日寇到底，就决不会有民族的解放；不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为民族的幸福，就决不是民族的最后解放；所以，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这就是“民族至上”。一切汉奸、汪派、托派，投降日寇，破坏团结，制造“反蒋反共”的阴谋，出卖民族国家的利益，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而有些不明大义之人，不免受其蒙蔽，陷在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的阴谋陷阱之中，企图以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来代替和掩盖全国家全民族的最高利益，认为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就等于全国家全民族的利益。这些人同样没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必须给以深刻的批评。必须号召全国人民牢牢记住：“国家民族之利益应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对于一切出卖国家民族的人，则宣告和他们势不两立。

（三）中国共产党，老早就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号召，这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我党过去一切主张与行动，都是环绕于这些号召的周围。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运动中，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继续发扬自己的牺牲精神，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同时号召全国同胞，严厉地批评一切贪生怕死之徒，无情地指摘在前线后方一切违反和破坏军事胜利的有害活动，无情地指摘一切不顾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之徒的罪行，号召全国同胞对于这些败类给予应得的制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运动中，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实行这个原则：“唯求军事之胜利乃为吾国民人人共享之光荣，唯不能获得胜利为人人最大之耻辱。一切功罪，一切是非，胥当以此为标准”。必须“竭其全部之智能与全部之时间精力以求取军事之胜利”。必须抛弃一切关于“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与个人之屈伸与荣辱”。必须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才是抗战的最后胜利。

（四）为着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目的，“必须意志集中与力量集中”，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惟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的，违反这个方针，就必然会使意志分散力量分散。过去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真理，现在的事实也证明这点。因此，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必须继续号召全国同胞加紧团结，经过民主的方式，将一切分散的意志与力量集中起来。除了争取最后胜利，不能有第二个意志。除了集中在抗日阵线，不能集中在第二个地方。除了用民主方式，也不能有第二个能够集中最大力量的方法。为此目的，必须坚决打击日寇、汉奸、汪派、托派反蒋反共的阴谋活动，因为如果不坚决打击这种阴谋活动，必然会造成意志分散力量分散之局面。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共合作，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制造磨擦、捣乱前线后方、破坏统一团结的阴谋家，并给予这些阴谋家以必要的制裁。

（五）“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这种最高的民族道德，这就是对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给了改造和扩充。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行这些道德的模范，为国民之表率。党员过去已是这样做的，今后更应努力。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汉奸、汪派、托派之

所以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叛逆，就是因为他们只顾少数人的私利，抛弃了全民族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其对国家尽其大忠，为保卫祖国而奋战到底；对民族尽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与人类之大多数给与绝大的同情与卫护，以实行其大仁；对危害国家民族危害大多数人利益之敌人、叛逆与横暴者施行坚决的斗争与制裁，以实行其大义，借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

(六)共产党员必须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号召全国同胞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抗日战线中各党各派的任何人究竟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不在其口头之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符，才可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以，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主要的不应从口头上看，而应从实行上看。只有实行三民主义，才能证明自己有这种信仰，否则只是证明他并没有信仰。对于那种行为上不实行三民主义，而只在口头上信仰三民主义的，这是一种表里不一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人，每个参加抗日战线的人决不应该如此。如果口称信仰民族主义而又企图与敌人妥协，口称信仰民权主义而又实行压制人民，口称信仰民生主义而又不顾人民生活的痛苦，都是假三民主义者，叛徒汪精卫辈就曾经是这样一种人，孙中山先生在世之时对于这种人是深恶痛绝的。国难已至极严重关头，必须广泛的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的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在为实行真三民主义而斗争中，共产党员同样应成为模范。

(七)为着实行三民主义，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厉行精神上的改造，"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所号召和实行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实行起来。在伟大的抗战时代中，如果不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不能养成，而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恶习必不能除掉。汪精卫一类人因为不能艰苦奋斗，失了朝气，而陷于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深渊，所以他出卖民族利益，叛党叛国，做了汉奸。可知一切不愿意做汉奸的人，必须在这次国民精神总动员中认识养成艰苦奋斗作风之必要，否则是非常危险的。至于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则尤为必要，这就必须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纷歧错杂的错误思想。第一，在"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的原则下，要纠正那一切有意无意曲解三民主义而成为汪精卫辈精神上俘虏的人，要纠正那一切企图利用托派奸徒把三民主义解释为反共旗帜的人，并且要纠正那一切对于三民主义阳奉阴违口挂三民主义之名躬行贪污腐化之实的人。第二，在"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的原则下，要纠正一切对日寇妥协投降的邪说。要广大地动员民众反对汪精卫派，因为他们"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他们响应日寇主张所谓"东亚新秩序"、"日满支共同体"，并进行所谓"共同防共"。要反对一切汉奸无耻地鼓吹超越民族，欢迎日寇做东亚的"盟主"，无耻地拱让自己国家听任敌人宰割。第三，在"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的统一"的原则下，必须根据"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标，要纠正一切破坏军政军令的韩复榘式的人物，要纠正一切作战不力的现象，要纠正一切无纪律现象，要纠正一切企图响应伪政府破坏政权统一的人物，要纠正一切对政府抗日动员法令阳奉阴违的人物，要纠正一切不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人物。第四，在"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的原则下，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形势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企图，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困难策动和平妥协的企图，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形势排斥异己破

坏团结的企图，要纠正一切为一己之私利或为少数集团的狭隘利益，为金钱地位职位等利益而妨碍与牺牲民族国家利益之行为。除了上述各点之外，像那一切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言论，反蒋反共的邪说，依赖外力的空论空想，以及否认劳动人民是民族基本主干的反民族论调，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三民主义好朋友的反劳动阶级论调等等，都是属于不利抗战的纷歧错杂的思想，都应加以纠正。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才能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争取抗战的胜利。

（八）国民精神总动员，应当成为全国人民的广大的政治运动，精神动员即是政治动员，它不依靠于强迫命令，而依靠于人民之政治的自觉。若以强迫命令的方法行之，必至成为虎头蛇尾，官样文章，而毫无生气。只有经过民主方式，着重宣传鼓动，才能推动全国人民，造成压倒敌人刷新自己的巨潮。

以上八点，特指出其最要者。中央希望全体党员协同友党党员与各界先进人士，一致努力，认真的进行这一动员运动。更望全国青年，不辞艰苦，家喻户晓，使这一运动推行于全国，以期组织全国人民一体进入抗战到底的伟大运动中。全国人民真正奋起之日，就是抗日建国大功告成之时，愿与全体同志全国同胞共勉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央关于精神总动员的第二次指示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一)国民党已决定从五月一日起至月底举行全国精神总动员。

(二)各地党部必须根据中央书记处四月五日指示及中央日内广播的宣传大纲主动的积极的进行工作。主要的要经过这一精神总动员的形式，根据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实际解释与发挥我党坚持抗战的正确路线，打击日寇汉奸汪派托派反蒋反共、挑拨离间、和平妥协的阴谋活动，使这一动员成为我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反对防共，要求民主的武器。但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应依各地不同的情况有区别。

(三)在我党我军占优势的地区必须：

(１)在宣传鼓动中明白的显示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实质，以我们的立场给精神总动员的条文以正确的解释，以防止和打击顽固分子利用作为防共武器的企图。

(２)在五月内举行宣传周，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大会上在有准备的讲演之后，举行宣誓，通过宣言通电等。

(３)报纸上发表文件文章讲演稿。

(四)在国民党统制区域的各种报纸刊物亦应发表各种适当文章文件讲演，积极推进此运动。

(五)在党内应根据中央前后两个指示进行讨论，以加强马列主义的教育。

中央书记处

抗大三周年纪念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毛　泽　东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他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他们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他们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的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他称赞他，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他，污蔑他。

抗大三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他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他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他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他能克服困难。

抗大三周年后，改正其缺点使之更加进步，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国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职员们学生们努力啊！

（原载《新中华报》1939年5月30日）

×　　×　　×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注：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抗大”制定的校训。具体时间不详。）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六月七日）

（一）目前形势的特点是：日寇除军事进攻外，加紧其诱降活动，并把这种活动放在第一位；正在积极策动国民党内一切投降分子，勾结英、美、法妥协派，图达其瓦解抗战阵线的目的。汪精卫正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投降分子、反共分子正在国内普遍的、坚决的进行破坏工作。因此，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共产党的压迫，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磨擦，对边区的挑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破坏等，都是准备投降的步骤。

（二）因此，党应当用全力来进行反对投降分子、反共分子的斗争，党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来给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的、坚决的反抗。

（三）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巩固国共合作，继续抗日。为此目的，党应当更亲密的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及国民党党员群众联系，向他们说明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并与他们共同动员人民群众、动员舆论，来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动员群众和巩固国共合作，就是反对投降与反共的最好方法。党应当开展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公开的揭穿反共活动即是准备投降的实质；同时，党不应给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造成借口，这种统一战线无论如何是需要巩固和扩大的。

（四）关于由此而产生的党内党外的宣传组织任务，另有电示。

中央书记处

反 投 降 提 纲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提纲——

一　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国民党投降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

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甲)日本的诱降政策；(乙)国际的压力；(丙)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今分述于后：

（甲）日本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

(一)日本对华基本方针是灭亡中国，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这是坚定的、不变的，在日本侵略者看来，也是变不得的。今年一月二日东京“国民新闻”(军部机关报）的社论说：

> “眼前现实的课题，已不容尺寸后退，瞬间踌躇。事变入于收拾期，万一国步的统制有疏漏，则不但将丧失战果，且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后期是比初期困难好几倍。历史有过教训：欧洲大战时代，德国和俄国不幸的事例，为政者和国民须得深加洞察”（“世界知织”二月一日出版的九卷一期）。

做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的侵略方针非贯彻不可，否则有德俄革命的危险。由此可知，以为日本可以根本上让步，可以不经长期战争而用英美压力恢复芦沟桥以前状态（蒋介石，国民党许多人），只是梦想。

(二)它的“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方针（总路线）是坚定的，不会自己动摇的，但是它执行此基本方针的方法（或策略）是软硬兼施的，有伸缩性的，并可作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让步，以求达其根本目的。

大体上：芦沟桥以前——政治诱降为主；芦沟桥至武汉——军事打击为主；武汉到现在——再以政治诱降为主。

(三)为了明白敌人根本方针的坚定不变，与其施行策略的软硬兼施，只要看下列各种材料就可知道：

A．芦沟桥以前——规定硬的方针，并实行占领东三省，对全中国则采取外交诱降办法。

1．满洲事变前的田中奏折——一九二六年（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兼外务大臣

田中义一函致宫内大臣一木喜法，请代奏明治天皇者，有云："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规定了灭亡中国的方针。

2．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占领满洲。

3．一九三四年四·一七的天羽申明——天羽代表外务省发出申明，有云："东方和平日本负责为之，反对中国与东方和平抵触之行为，反对他国任何妨碍东方和平之举动"。公开表示其灭华方针。

4．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的广田三原则——广田在议会正式宣布三原则，即：第一、对日亲善，第二、承认满洲，第三、共同防共。

5．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的秘密条呈——结论六条，均表示施行方法之软硬兼施。

B．芦沟桥到武汉——为执行其硬的方针，采取坚决的军事进攻方法为主，辅之以政治诱降。

6．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外相广田宣布不扩大主义——我党"八月决定"曾指出这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但同时，含有"降则免打"之意。

7．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陆相杉山在特别议会的战争演说——"断然决定膺惩，陆军当局已采取重要措置"。表示方法是硬的；打，为着降。

8．开战以后，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据英国"标准晚报"称，日政府负责人曾以这些条件提交蒋介石，内容凡六条：一、内蒙独立；二、华北自治；三、上海占领地作为日本租界；四、山海关到安南沿海的捕鱼权；五、中国退出国联；六、不得设空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解放报")。表示所要的东西，至今大体上不出这个范围。

9．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后，于二十七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凌发表谈话——"日本帝国决不满意于今日的成功，盖距总局之前途尚远，帝国军人基于帝国之总意，为东洋永久之和平，希望达到彻底进步的目的"。表示要继续军事进攻。

10．广田的除夕（一九三七年）演说——"友邦中国若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能免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于一九三八年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表示方法是可以用软的，只要降。

11．有名的一月十六日宣言——十二月十一日（南京占领前两日）阁议决定，十二日通过御前会议，十三日占领南京，十七日中国蒋委员长发表告国人书，到一月十六日政府就发表此宣言。其大意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新政府成立。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与列国在华权益"。表示方针是硬的，方法也是硬的。

12．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驻华大使川越茂对记者发表谈话，谓："奉令返国，参赞日高留沪，但留沪目的，并非尚欲与中国政府交涉，而是与外国外交人员接洽可能发生之事件。与国民政府重开交涉之门户已经关闭，即使国民政府将来重新考虑其态度亦仅能与中国新组织交涉，不能以日本为对手"。从一月十六日宣言后，以战为主，以和为辅，打倒蒋介石，建立新政府，此谈话最露骨。

13．但战中仍有和——一月二十日路透电所传广田在七十三届议会中宣布德国调解的和平条件四条：一、放弃联共抗日，承认满洲；二、在若干地带成立非战区，在此区内设立管理机关；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中国赔款。此为最低议和条件，即陶德曼交蒋之条件。蒋曾拟考虑接受，汪精卫的"举一个例"即指此（蒋、二陈、何、还有孙、于、白都参加讨论接受

问题)，最后蒋拒绝，广田乃在议会宣布。

14．一月下旬在七十三届议会中：

近卫的开幕演说——“战争之解决，尚须长久时日”，“现政府采取坚决之政策，嗣后不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

广田演说——宣布陶德曼提交之四条件（见前）；

民政党议员——要求政府保证：嗣后决不与国民党政府讨论媾和条件；

议员岛田俊雄——质问为什么不对华宣战？

日本政府宣布对华政策四要点：一、绝对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二、为阻止军火运华，仍可对华宣战；三、对华北新政权居监护人地位；四、绝对不容第三者调停。

但至一月二十九日那天，近卫又在本届议会表示：“宣战之举仍在考虑中，视中国将来态度为断”。和平之门仍然是开的。

此乃反映日本政府中主和派与主战派之斗争，杉山为此曾于此时发表“必须准备长期战争”之文告，与主和派对抗。

15．日本驻沪大使（维新政府的）谷正之，三月九日发表谈话，谓：“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但须继续加紧战争促蒋政权倒台，并使第三国放弃援蒋企图。战争以外之法，如能使蒋氏议和则耗费较少，效力更大”。一个人一次谈话中主战又主和。

16．五月二日近卫演说准备长期战争——“为推翻蒋政权，铲除东亚祸根，虽费数年光阴，亦所不惜。同时，全国国民应极力援助华北、华中两亲日防共政权”。

17．五月九日广田在“地方长官会议”演说，主张慎重处理事变——“中国事变进到第二阶段，蒋介石政权宣传长期抗战，从事于国内之团结，但未能达到团结之目的。他方面，各国军需品之输入及苏联援助中国，这是事实。因此，帝国政府必须顾及此种事实，慎重处理此次事变。津浦线占领之时，临时维新两政府即刻实行合并，帝国政府对此极力加以支持，使能合并统一，并圆满健全发展”。敌以军部与外务省，一个代表硬，一个代表软，但或硬中带软（军部之特务机关），或软中带硬（外务省），装红白脸。

18．徐州陷后，敌声言打到昆明——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二十二日敌前线指挥官发表谈话谓：“徐州攻陷，战争并未停止，战争步骤有三：第一步即徐州大战，第二步进攻汉口，第三步进攻重庆或昆明”。不亦硬哉！

19．六月十七日永井递信大臣发表谈话，谓必须打倒蒋政权——“目前政府之对华政策在于打倒蒋政权，援助新政府，建设新中国，奠定东亚永远之和平。其他政策亦须沿此路线进行”。

20．张高峰事变时，外传日本向中国提出和平五条件——“日苏边境纠纷日烈，有成为大规模战争可能时，中日和平空气今日（八月五日）又盛传于香港，上午‘孖剌西报’首传日本向中国求和五条件，下午各晚报均刊载。五条件是：一、日军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军；二、承认满洲国；三、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九十九年；四、赔偿此次战争损失；五、共同防共”（“星岛日报”二十七年八月五日香港通讯）。

21．坂垣的强硬论——七月一日坂垣发表谈话：“在蒋政权依然存在之时，中日间绝无和平可能，今日日本不能再与蒋介石携手开和平谈判”。七月七日，事变一周年纪念日，坂垣发表谈话：“今后战争，无论延长多少年，帝国所走之路，只有一条（按指，以武力征服中国），除此以外，不能达到东洋百年之和平”。

22．设立对华院，总揽对华统治大权——总裁副总裁及五相。不但占领区，而且非占领区，均归其管辖。

23．九月二十九日军部赶走宇垣。宇垣因对华政策与军部不合，愤而辞职。

C．武汉到现在——策略改变，由硬到软。

24．十月十二日占领广州，二十五日占领武汉，看见三十日蒋介石发表主张长期抗战的告国民书，故日本政府择了十一月三日明治纪念日，即所谓天长节这一天，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明显的表示改变策略。其要点为：一、"国民政府已为一地方政府，如继续抗日，则该政府歼灭以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二、"日本之目的，在于建设东亚长治久安之新秩序，即日华满三国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三、"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加拒绝"。政策已变，宣布废止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必须建立伪政权之政策，声明可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须蒋下野。

25．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即汪精卫通电拥护、蒋介石演说痛驳之声明——其要点：一、"中日满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的，互相结合，互相亲善，并实行共同防共，以及经济提携"；二、"因此，中国必须与满洲国树立完全之国交关系"；三、"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在特定地点驻军防共；以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区域"；四、"中日经济提携：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之自由，在华北与内蒙予日本以开发与利用资源之便利"；五、"日本允许考虑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重申十一月三日宣言的基本政策，加具体内容。只要降日，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允许蒋存在自此始）均可存在，华中、华南可以退出，华北是要的，但主权名义仍可不要。

26．平沼内阁继续此方针，至今不变。

27．日本在中国策动广大的"和平运动"，设立所谓"和平息战会"，到处开大会、发传单。设立统一中央政府，很久不提了，虽偶一提及，无外吓蒋；除非蒋抗战到底，他是留以待蒋的。

28．离间国共合作，利用三民主义的大阴谋——日人松本慎一做了一篇题为"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的文章，其中说：

"帝国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彻底打击抗日政权及军队，第二在要日支两民族提携，融合及东洋和平之确立，前者乃达成后者之手段，然此二者，证诸支那之现实，实为互相对立之矛盾。试观事变以来之经过，抗日政权之指导原理虽属误谬，但蒋政权已具有民族政权之本质，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数之支持。现政权所以能得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或抗日联合阵线，以及旧军人之热烈拥护者，即缘于此。今吾人，一方欲击灭蒋政权，他方，欲与支那民族相提携，事实上诚不啻缘木求鱼。盖欲倒蒋，愈使支那民族拥蒋。要倒蒋就不能抓住民众，要抓住民众即不能倒蒋，故我国根本困难即在于此"。

"临时、维持二政府，尚无民众基础。有民众基础则南北二政府，自不难合流。而新政府之纲领，应以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旗帜，新政府之任务应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实现。或曰：敌人之旗帜与我相同，难免混淆不清。但吾人可告以彼等以'一面抗战，一面实行三民主义'为号召，吾人则以'一面与日提携，一面建设三民主义'相号召"。

"国共之合作，乃抗日联合阵线之基干，实有加以打击之必要"。

"武汉作战之目的，乃在分散国共合作。故武汉占领好似在国共间插入一个楔子，战略

政略双方都在分散国共力量”(上文见“大公报”本年一月二十三日)。

29．上海“导报”还在二月十七日就指出了远东慕尼黑的危险：“一方面，他在实事求是，努力加强地方政权，组织所谓江汉政府之类。别方面，他在进行更大规模含有国际性的阴谋。这阴谋的主要企图是压迫和诱骗英法两国来用国际会议的形式（公开的或秘密的）强迫中国与日本妥协，虽然日本曾声明不愿第三国参加解决中日冲突”。并且说：“认为汪精卫完事大吉，是不对的，他将来还可起极恶劣的作用”。

以上我举的二十九件材料，说明日本对华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下列三点：

第一，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的，决不改变的；他一定要把中国变为他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

第二，但他的实行方法是软硬兼施的；并且依时有所侧重；武汉以前以打为主，但亦战中有和，武汉以后，以和为主，但仍略打一打，压使投降。

第三，他还努力策动英、美、法召集远东和平会议，远东慕尼黑的危险就压在中国人的头上。

(四)以上三节，第一节指出他的基本方针坚定不变；第二节指出他的实行方法软硬兼施；第三节从二十九件材料说明其施行方法由硬到软的历史发展，证明投降是当前的最大危险。现在这个第四节从他的财政、经济、军事方面说明其主和的原因。日本已处于财政（三年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一年二、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二年四、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三年四、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经济（输入大增，输出大减，军事工业打倒和平工业，物价大涨，人民生活恶化，现金用尽，外汇不稳）军事（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大见困难的境地，他还要准备应付国际战争，故极力策动中国投降，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汪精卫，劝诱蒋介石，并准备利用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他的这个阴谋是十分恶毒的。敌人战不可怕，和则十分危险，“大公报”曾称为“缢鬼式之和平”，意谓如果这样，中国将无疾而终。

(五)为表示和之诚意给国民党看，给英美看，用大力“扫荡”八路军（华北十五个师团），现又企图进攻陕北，作为促进国民党降日反共之一步骤。

以上是日本的诱降政策。

（乙）英、美、法的压力

中国投降危险成为当前最大危险的第二个因素，是英、美、法投降主义者加于中国政府的压力。

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于他们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纯的由于他们畏惧革命，而是由于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即所谓中立政策，或不干涉政策。

他们开始即鼓励日本进行战争，说什么“三个月就可打败中国”。他们随即让出上海，使战争深入内地去打。他们宁可使香港受包围，让日本占领广州和海南岛。他们大量供给日本以军需品，使日本有可能进行消耗战争。

他们又声言援助中国，并且已实行有所援助，借点小款，供给点军需，使中国有可能与日本进行消耗战争。他们要鼓吹“中国必胜”，使中国在消耗战争中增加勇气。

一切这些，其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

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

他们容纳德、意在西方的侵略行动，同样是这个目的。

他们希望德国和苏联打，而他们从旁观战，然后乘其敝而掠夺之。

他们始终不赞成苏联提议的普遍安全计划者在此。

他们不愿意保障波罗的海三国的安全者在此（开一缺口便于德国进攻苏联）。

战争的片面性（侵略战争是危害英、美、法利益的，但英、美、法却取旁观态度）的原因在此。

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现时政策。

这些非侵略国与侵略国之间是有深刻矛盾的，但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其"渔人"政策的。

莫洛托夫谓："英、法有进步，但所谓进步是浮而不实的"。斯大林谓："不要被人利用"，即是说英、法的渔人政策并未放弃，不要上当。

英、法、苏协定有成立可能，但目前尚难乐观。成立了之后，又有破裂可能，新慕尼黑危险并未消灭。

六中全会指出英、美、法政府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其人民。英、美、法人民反战反法西斯势力正在逐渐增长，只有这种势力才是最后可靠的。

苏联声明继续援助中国，决不赞成中国投降。

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

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敝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

中国投降危险的第二个因素，就在这样的国际情况上面。

（丙）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

(一)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A．一九三六年四月苏区代表大会曾经指出：

"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正确点说，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会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达到目的。"

B．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央决定上说：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平津的丧失就是东四省丧失后最严重的教训。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C．六中全会指出妥协危机的严重存在，把反对投降妥协放在第一条。指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但同时指出其前途尚有障碍物，如不克服，则没有什么光明前途。

"很明显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守旧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这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

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

(二)五中全会以后的国民党：

A． 五中全会还是以联共抗日为主要方向，但同时已包含反共降日的因素：

1． 决定了依靠国际压力和平解决中日问题的方针；

2． 决定了防共与反共的方针（但不是战争），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B． 主和空气笼罩一时：

禁止反对远东慕尼黑，最近到的一期重庆出版的“文摘”，把一篇题名“英国会在远东来一个慕尼黑吗？”的文章删去了。

许多刊物发表提倡依赖英、美裁制日本的文章，其意即开国际调和会议解决问题。

政府中党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军队中也有这种人。

“国民党投降可能”这一点，历来就存在，但在今天已成了最大的危险，如不克服，中国抗战将受到极大挫折。

C． 国民党已在进行其投降的主要准备工作，即是反共，反共是投降准备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半年以来，华北、华中、南方、西北，反共活动特别厉害。在华北：八路军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国民党从共产党手里“收复失地”。在西北：共产党没有超越边区寸土，国民党则用武力侵入边区许多地方（镇宁、宁县、栒邑、靖边、瓦窑堡）。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

一切都是借口，进行投降准备工作则是实际。

制造了无数的假文件。

以上三个因素、三种原因，使目前时局处于投降派与抗战派的严重斗争中，投降可能成为当前的最大危险，而反共正是准备投降的一个必然步骤。

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因，如不自己动摇，则敌人的诱降政策无所施，国际的劝降压力无所用。

这种情况是与六中全会时不同的。那时，抗战还在高潮，十月三十日蒋之宣言，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之驳斥近卫演说，就是明证。现在，是在敌人以诱降为主并已生效的时候，是在英、美加紧策动投降的时候，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依靠英、美并执行反共政策之后。所以，那时，虽以反投降为第一条，但实际没有现在严重。

八个月以来，时局变到反共与投降最为严重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增加了新的具体的任务，这就是用全力反对投降。

准备投降各种的借口：

第一个借口——共产党捣乱，这是不对的。伪造文件。边区的被攻，八路军的无饷。全国执行良好的统一战线政策，拥蒋拥政府。全国无土地革命。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作战。

第二个借口——苏联阴谋，这是不对的。一九二七年帮助中国革命。两年来帮助中国抗战最大。他没有阴谋侵略过任何一国，各国多与他通好结盟。

第三个借口——财政经济困难，这是不对的。只要采取六中全会的新政策就能克服任何困难。红军八路军克服困难的经验是明证。

第四个借口——人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日本正作这种宣传，这样说不啻是响应日本宣传。人民不满兵役法，是怨恨方法不对，不是怨恨抗战。又极端的压制民运。

第五个借口——军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污蔑抗日军。多数官兵的为民族解放而战。多数军兵的厌恶内战。

第六个借口——国际无援，这是不对的。抗战主要靠己不靠人。苏联的有力援助，各国人民的同情。英、美、法政府本来不可靠。

第七个借口——敌人太强，这是不对的。敌人已消耗了很大，三年要用一百二十万万元，兵力不足与分散。我之地形好，士气盛。

还有许多借口。

二　抗战的前途（大概估计，不能死看）

然而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三民主义旗帜与三民主义共和国口号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是党的基本任务。

国民党投降可能与抗战继续可能是两个可能。有投降者，有抗战者，又是两种状况。

"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与局部的妥协"——这是一方面。"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只要真正的组织千百万人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的"——这又是一方面（均见"八月决定"）。

抗战可能有两个前途：第一前途——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第二前途——大部投降，小部抗战。

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第一前途，也是长期的曲折的；第二前途，则更是长期的曲折的。

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直线论（一字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不发动全国人民，不实行国家民主化，可以克服投降，取得胜利。

克服投降，取得胜利，是要人民的大多数来干的，是要各党各派的一切爱国进步分子来干的。

不能设想，国民党整整齐齐一人不剩的投降。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全党投降帝国主义，举行反共战争。但那时的情况是：(1)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来；(2)所有帝国主义都赞助蒋介石反共，各国在暂时稳定局面之下；(3)国民党没有吃过反共战争的苦，能够动员军队；(4)全国人民没有尝过反共战争的味道，没有受痛苦的教训，也没有被欺骗的经验；(5)共产党没有统一战线失败期间的经验，又没有武装力量（都失败了），主要的没有战争经验；(6)世界不是革命与战争时期，而是反动时期；(7)苏联没有今天强大。

然而还有宋，何，邓演达等坚持革命，没有叛变。九一八以后，有冯玉祥，有蔡廷锴，有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有吉鸿昌，任应歧，有张学良，杨虎城，有陈济棠，孙科。

况在今天，有两年抗战历史。

假如有米亚伽，有哈柴——中国也不是西班牙、捷克。

A．　有投降者（这是必然的，已有汪精卫，还会有张精卫、李精卫），也会有反对投降者。

B．　有坚决投降，一往不返者，也会有一时投降准备再战者。

C. 有先降后战者（有些人要当一回汉奸才能变好），也会有先降后战再降者。

D. 人民与军官可能初受蒙蔽，后来觉悟反抗。如像“共产党捣乱”、“八路军叛变”、“国际情况不佳”、“财政异常困难”、“苏联要赤化中国”、“暂时屈服徐图反抗”等欺骗是必然会到来的。

E. 敌人必不让有一个全国统一不受干涉的投降集团存在。他必然采取四分五裂政策。那时，可能有许多傀儡政权同时存在，以便利其统治。各种武装投降者之间可能发生内战——中国是内战最可能（地大、经济分散）与最有经验的国家。

F. 敌人可能先让一步，然后干涉。当其让步时——可能投降；当其干涉时——又可能决裂。

G. 弗郎哥并没有收容米亚伽，希特勒也没有收容哈棠。日本最后只会收容汪精卫一类。

H. 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如果大家知道了？

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缴枪必打——这也是肯定的。

总之，那时必是一个混乱局面，不是一个统一局面。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那时，日本与英、美、法的冲突是可能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正是中国革命长期性、曲折性的实际。

不能设想，不民主的政府如现政府，能够“抗战到底”的。不能设想，这种政府能够争取最后胜利，我们一次也未希望过，也未说过。

只有愿意动员全国人民的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府，才是抗日胜利的政府。

旧东西的改造，经过叛变与克服过程。

那时，可能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

那时，中国政府可能有三种性质的：日本的傀儡政府，半傀儡政府，抗日政府。这几种政府间的斗争，将组成所谓相持阶段的局面。所谓相持阶段，可能正是这样情况的阶段。

不能速胜也因这种情况。

不会亡国也因这种情况。

将来抗战局面不外二途，如前所说：（1）大部抗战，小部投降；（2）大部投降，小部抗战。如果是第二种前途，则其可能情况如上所述。但第一种前途，目前并未绝望。原因在于：

在国内——

A. 许多军队拥护抗战；B. 国民党中的抗战派；C. 共产党的反对投降；D. 人民的反对投降。

在国际——

A. 苏联的援助；B. 西班牙、捷克的教训；C. 欧美人民的舆论。

在日本——

财政、经济、军事的困难。

但是要巩固扩大统一战线才能办到。

如果出现第二种前途：那就不但是政府的分裂，而且是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分裂：

日本人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在已做，经过汪精卫，这是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

中间性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萌芽，正在奔跑，这是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

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发生，正在发展，这是真三民主义与真国民党。

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是否可以避免上述那样分裂（分裂是必然的），要看国民党、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如何。

因此，相持阶段的可能情况，便有几种：

（甲）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的相持阶段——即克服投降可能，取得大部抗战，打下去，除开破坏日本的政治阴谋之外，还停止它的军事进攻。

这是第一种情况的相持阶段，这是最理想最希望的。

（乙）大部投降，小部抗战的相持阶段（共产党与一切不愿投降的人是要继续抗战的，即使是小部）——即使大部投降了，剩下小部抗战，但只要能巩固小部，巩固抗战根据地，亦能与敌相持，如同过去小部红军在根据地上与敌相持一样。不同的：过去是内战，今后是对日本与对汉奸，而不是内战。

在站住了脚，不是继续后退了这一点上说来，在他是全国唯一的抗日军这一点上说来，这也是一种相持局面。

这是第二种相持局面。

（丙）由小部再到大部的相持阶段——这是第三种相持阶段。

由于小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民主义，将投降派所把持的阵地分化过来，再争取大部抗战。那时，如果还不能对敌人反攻，则还是一个相持阶段。

我们力争第一种相持局面。不得已再是第二种。且其前途还有第三种。

危险是存在的。但总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还在一九三七年苏区代表大会就指出了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还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又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

十一月又指出民族投降主义与阶级投降主义的危险。

这些，我们都预料到了的，他的发生并不是突然的。

抗战前途，不外好坏二途；我们力争好的前途，同时准备即使很坏，我们也有办法。

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短期的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我们历来反对速胜论与亡国论，今天仍一样。

以为地主资产阶级叛变，就等于亡国。这是没有看到：A． 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B． 抗日友军中的抗日情绪；C． 国民党中的抗战派；D． 资产阶级中目前不愿投降者；E． 沦陷区仍然受压迫的资产阶级；F． 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民；G． 苏联的援助。不看见这些正在生长的力量，只看见地主资产阶级投降了，就认为整个世界都黑暗了，于是发生惊慌失措动摇逃跑的现象，这是完全不对的。

六中全会说，相持阶段必是“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的阶段。更加困难，就是敌人之外，还加上投降叛变。更加进步，这是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抗日的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便能更加进步。

一部叛变，大部抗日——这种情况是我们希望的，过去这样希望，现仍如此，要力争之。大部叛变（甚至一时表现为全体），一部抗日——这种情况，不是我们希望的，但是可能的。如果出现，我们就要把他颠倒过来，这也是可能的，也要力争。

三　当前的任务

估计到上述好坏两种可能情况，特别是可能的坏的情况，党的任务是什么呢？

(A)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

(B)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

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

(C)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党的一般任务就是这样。

基于上述的任务，党应注意下述各问题了解、解释并进行必要的工作：

(一)六中全会的方针与现在的方针之间是否一致问题

六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的，六中全会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积极团结全国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因为六中全会文件的发布，更加深入人心了。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因为六中全会的指示在全国更加发展了。

现在，投降危险与反共阴谋成为当前主要危险，故须指出这种新的情况（过去还不是事实，只能一般指出，现在已有成为事实之可能，故须具体指出），才能克服投降危险，并准备如果投降由可能变为事实时及时的必要的对付政策，但基本方针仍然是六中全会的，并且指导适当，可能使抗战的实际内容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二)为什么此时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问题

这里要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

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必须要有准备。

那时，不能再是民族战线，但我们也有太绝对的地方；现在，必须坚持长期的民族战线。

那时，是革命的整个失败，党的路线是退却然后进攻；现在，没有路线上的退却问题，现在是继续进攻中发生局部的暂时的战术上的保守或隐蔽随即准备进攻的问题（如果投降变为事实的话）。

那时，因为反动时期到来，党又没有准备、没有经验，以致队伍混乱，步骤错误（如盲动主义）；现在，则在沦陷区，并准备在投降者占领地，应该作有秩序的退守（有的暂时的，有的长久的）或反攻，而在其他区域则继续进攻方针。

那时，新党员大批脱党或叛变；现在，则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这类事情，故须先有准备。历史经验——革命转变关头（那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

的，也不是坏事，但须注意好好带领新党员，尤其是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将来是有用的。

那时，国内国际的情况是黑暗的；现在基本上是光明的。

那时，中央是被机会主义统治着，改造后的中央亦无经验；现在没有这种情形。

那时，尚没有造成大批干部骨干；现在已经造成了。

以上我作了八条比较。虽然如此，仍须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便胜利地克服困难发展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而避免可能的失败。

(三)为什么假如投降成为事实时还要坚持民族战线、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问题

主要理由已在说明抗战前途时说过了。这里只说：

1. 在全部抗日过程中必须都是民族统一战线，虽然由于叛变，许多地主资产阶级都走开了，并变成敌人，但地主资产阶级的叛变是逐渐的，不是同时的，留下的成份必须与之合作。忽视这一点，势将铸成大错。故终抗日过程，统一战线依然应该是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集团、各军队的统一战线。

2. 国共合作也是一样。若干国民党员离开了并成为敌人，但留下的若干仍应是合作的。我们要用真国民党对抗假国民党，争取中间性的国民党。国共两党平等联盟的前途还是存在的。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忽视这一点，也将铸成大错。

3. 三民主义也是一样，它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对抗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取的政策。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但在抗日过程中二者有其一致点，即在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那样解释时，二者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政纲上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党内党外许多人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骗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由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

4. 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的不统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谓统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统一，完全违反统一中的差别或统一中的斗争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话。在旧式半封建政权没有改变为真正革命民主政权以前，边区与八路军是必须存在的，只有在革命民主政权成立之时，反共危险消失之时，二者才可放弃现在这样的特殊性，否则只是反革命的要求而已。

(四)拥蒋问题

拥护蒋委员长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还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的表示。

但蒋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时，我们如何表示，还要慎重考虑。当然，那时不能不有表示，但须是适当的表示，应以有利团结多数抗战，有利国共继续合作为原则，而不能随便的轻率的恢复“反蒋”口号。

蒋对于共产党存在着敌意，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实，我们必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

(五)反汪问题

“认为汪已完了是不对的，汪还能起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对的。汪之汉奸系统较之其他汉奸更大的危害中国，没有疑义。汪在政府中、党部中与一部分军队中有其群众与同情者。

反投降必须联系于反汪，是更便利与更实际的。

(六)抗日除奸问题

在假如严重叛变事件发生之时，党应极力注意对付的适当，以不脱离国民党多数为原则。

那时，抗日除奸的口号是必须的，抗日除奸的战争（同时抗日又除奸）也是无可避免的，但决不可离开国民党多数而轻举妄动。只有在为多数人所了解与要求时才能（也必须）发动除奸战争。例如现在的反汪，是合乎这个原则的。

(七)民主民生问题

没有革命民主政府，要领导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国广大人民之渴望一个抗日的、给人民以自由的、民主集中制的与廉洁的政府有如望岁，故“争取民主”，应在今后“反对投降继续抗战”的运动中与之联结起来。

“改良民生”的与之联结也是一样。不过，只有抗日才有实行民主可能，只有抗日与民主才有改良民生可能，这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实际，应该明白。

(八)磨擦问题

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在边区所举行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磨擦及武装斗争，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这种抵抗是有用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磨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

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严防挑衅，不要上当。

(九)友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及从某些军队中撤退党的组织问题

半年来经验，在抗日的与我合作的军队中不去发展党，这个六中全会的决定，根本上是对的。在中国军队中发展共产党，一般应限于汉奸与准备汉奸的军队，目的是在破坏之，其他则不应发展。任何军队，只要变了汉奸军队，或直接准备变为汉奸军队，都应采取坚决的破坏方针。某些抗日军队中已因党的组织问题发生了有碍合作的问题时，应公开表示撤退，以求合作之继续。

(一〇)援助友党问题

1． 极力援助那些进步分子，但也应依程度而定援助程度之不同。

2． 拒绝援助那些退步分子，无希望分子，以免其扩充力量之后对我反噬。过去在这方面有了许多教训。一句话，不作无条件的援助。

3． 极力加强对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的工作，推动他们反对投降，必须要有很多有能力干部去做，一刻不能放松。对中间分子也要加紧工作。

(一一)六中全会后中央各部的工作

三年来，特别六中全会以来，逐渐恢复与建立了各个中央工作部门，除军委会、组织部、宣传部、敌区工作部、青委建设较久外，统战部、妇委、工委、财政经济部、干部教育部、总政治部、党报委员会、华北华中委员会、西北委员会、南方委员会都是新建立的，秘书处亦改进了组织。共十六个机关。这些中央工作部门的恢复与建立，是在长征大破坏后的一大成绩，一大令人高兴的事。

(一二)中央组织问题

1. 政治局会议以后每周一次。

2. 书记处处理日常事件。

3. 通知，大事用中央名义，小事用书记处。

4. 人员分配，以保证中央领导健全，同时加强地方领导为原则。

5. 中央各部既紧缩又加强。

(一三)干部教育

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小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十八年来未有过的现象。这些学生现在还不能看出他们大的工作成绩，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见了。

今后仍应继续这个方针。为物质与敌情原因，分在边区、华北两地办。去华北的指挥管理仍属中央，但委托北方局监督之。

(一四)学习运动

1. 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意义。

2. 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3. 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

4. 是一种长期大学校。

5. 每日二小时学习制。

6. 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7. 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学习一致。

8. 勤学者奖，怠惰者罚。

9. 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的机关与人员。

(一五)生产运动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

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

(一六)青年运动

六中全会以来，有成绩。青委与青年联合办事处集中指导青运是对的。

青运方针：坚持青年统一战线，继续采取“五四致三青团书”的态度，用以争取青年的多数，在继续抗战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之下。

(一七)妇女运动

中央发布了妇女运动的方针，开始建立了妇委的工作，地方妇女工作指导机关亦正逐渐建立中。我们历来最缺少干部的是妇女干部，妇女运动经验亦没有总结，这个缺点必须补救。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部，要展开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

(一八)工人运动

发布了工运工作方针，开始建立了工委，开办了一个工人学校。工人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是比较薄弱的，党的成份中工人亦太少，今后应该在这两方面有进步。

(一九)锄奸工作

新环境下，敌人破坏我党我军与边区政府的阴谋，已逐渐显得严重，今后必更严重，大大增加了我们锄奸斗争的重大性。因此全党必须增加这一方面的注意力，必须派出与训练有必要数量的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一部门中去。

凡国民党员，因特务工作或武装向我进攻而被逮捕或俘获时，一般以不杀不降为原则（不降为不强迫其写自首书，不强迫其声明放弃自己信仰），以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

(二〇)党的组织问题

1. 精神——现在不是普遍发展的时候了，一般应停止发展，以精干为原则。

2. 严密。

3. 消除破坏分子，保卫党。

4. 阶级教育，马列主义。

5. 严格执行秘密训令。

(二一)自力更生

党，军队，一切。

准备对付最恶劣环境。

(二二)华北问题

华北局面有变到极严重的可能，敌人主力有进攻华北可能，因此，八路军与华北党必须严格注意这种情况的可能到来；而从军事、政治、财政、党的组织、统一战线各方面进行准备，以适合坚持游击战争应付最大困难为原则。

华北的党有责任供给中央必要的经费，这种经费的政治意义是极大的。

(二三)华中问题

必须大大发展华中的党与游击战争的工作，从复杂的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为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必须有更好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新四军工作的发展与进步联系起来。边区的干部以主要输送华中为原则。

(二四)保卫边区

1. 边区是基本根据地——中央所在地，全国有威信的地方，必须坚决保卫之；

2. 敌人进攻边区是促进中国投降的一步骤；

3. 敌人有进攻延安之可能；

4. 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坚持边区，大家准备过游击战争生活，最艰苦但是最生动的生活；

5．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6．学生与工作人员大批上前线；

7．好好保护与教育青年学生，新干部新党员；

8．保存一个领导集团，一个教育集团，一个军事集团，依靠很好地形，很好民众，一定有办法。

(二五)动员大批学生及工作人员上前线

1．加强教育，加强前线工作；

2．毕业后依然上前线，早上前线为强；

3．因为敌情；

4．因为经费；

5．决定去一〇、〇〇〇人；

6．政治上、组织上好好动员；

7．后方便于领导教育，与打游击战争，但人员还是不少，

8．干部须作适当的分配；

9．学生必须酌量多留一些于后方；

10．学校名义必须保存，前后方同。

(二六)七次大会

1．八月一日前选举完毕；

2．十月开会；

3．为团结全党反对投降而斗争；

4．能够来与能够开的。

(二七)两条战线斗争

1．反对右的：

不看见投降与反共危险；

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

对时局无出路（失却前途）；

没有阶级立场；

在艰苦斗争面前恐惧消沉。

2．反对“左”的：

黑暗的中国，黑暗的世界，黑暗的边区，黑暗的自己。

准备破坏统一战线，否认国共合作，不要三民主义，自己孤立起来，盲干。

3．老干部应做基干，带领广大新党员新干部，向抗战的更高阶段前进，向困难阵地攻击。

(二八)团结战胜一切

1．必须更加团结：

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全党必能团结。

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全国人民的救星是共产党。

2．必须更加集中：

减少不必要的民主。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3． 全党团结一致，集中指挥，战胜一切。

结　　论（六月十三日）

1 时局问题

（一）投降因素中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是主要的，这是对的。

（二）要克服两种投降——(A)克服小部投降，(B)克服大部投降。A、是目前的，在大部抗战情况之下的；B、是将来的，在大部投降了的情况之下的。但做了目前工作即是便利于做将来工作，二者统一不可分。

（三）按照六中全会的定义，敌我力量平衡才是相持阶段，那末，不但现在不能说相持阶段，如出现李精卫，则是敌人已组成了（他正在努力组织）他的战略预备军，并使用之于作战，——迂回我抗战阵地之后方（民族反革命是帝国主义战略同盟军，这是无疑的），这种时候更不是敌我相持，而是我又打了一个大败仗。那时特点，打我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加李精卫（中国弗郎哥），故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而不是什么相持阶段。

（四）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二支敌人的战略同盟军。在没有打退以前，没有什么相持阶段。

（五）正面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还可能进行军事攻击，说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是不对的。它在财政经济人力军力各方面虽困难，但依实力说，依时间说，都还有军事进攻的可能。所以，不但一方面须要打败从侧面进攻的敌人，一方面还要准备继续打败从正面进攻的敌人，才能取得敌我平衡，取得相持阶段的到来。

（六）但这不是说，要把这些正面的侧面的敌人在实力上打到各方面都与我抗日军相等了，才能出现相持阶段。不是实力相等，而是：我之实力加敌人弱点加国际牵制＝相持阶段。

（七）于是相持阶段能在三种情况下出现：

1． 地域大，人数多，阵线巩固，造成敌我相持。例如：俄国内战的中期，欧战的中期。抗战到现在的中国，地域大，人数多，但阵线不固（政治腐败，投降者捣乱），故还没有相持阶段。如能努力克服投降危险，并在这种克服中改造政治，阵线巩固了，相持阶段就来了。这是第一种。

2． 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目前的华北局势，可以说是暂时的、小部的相持，把华北局势延长下去，就变成长期小部相持了。

3． 由上述小部相持再变到大部相持，经过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而达到。如果那时还不能举行战略反攻（还是战役反攻期间），仍然是相持阶段。

（八）假如大部叛变之事不可免地要在抗战行程中出现的话，那末抗战的过程也许就要以下述的公式组织成整个相持阶段：武汉以后的暂时大部相持（目前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相持，但因阵线不固，故只能是暂时的）——某时以后的小部相持——某时以后再来一个大部相持。

这种变化的主要特点，就是由阵线不巩固到阵线巩固。要长期相持，就要阵线巩固；有此条件，虽小亦能相持，无之虽大也不能。所以应力争数量之大（人多、地大），但主要的还在质量之强。所谓阵线巩固，就是抗日根据地之巩固加统一战线之巩固。

（九）华北确有相持形势，但这还是暂时的，我们提出"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想把暂时的变为长期的。如果别处都黑暗了，剩下华北（同样，新四军，陕甘宁边区），那它虽在地域上人数上是局部的，但因已没有别的抗日军了，它成了唯一的抗日军，也就取得了战略相持的意义。这是困难局面，但我们也应准备。大半边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们也要干下去，也能干下去的。这样干个三年五年，唤醒人民，吸引友军，又逐渐形成新而大的抗日阵线，我们就成了抗日救国的核心与领导力量。

所以不论如何说，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道路是艰难的。

（十）目前，正是敌我关系（敌我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看谁争取多数，更看谁的质量较好，以决胜负之谁属。谁胜谁败，这问题目前未决，双方正重新准备条件。

阵线是必然会改组，也必然要改组的。我之同盟军的一部（地主资产阶级一部）改变为敌人的同盟军，但我决不让其全调去，我必须争取其一部，也可能争取一部。我还有广大同盟军没有动员，中国农民，日本工农兵，国际无产阶级，苏联的力量，动员起来，便能制敌死命。

敌是反革命的，我是革命的，这个质的不同，决定最后胜利之谁属。但指挥战争的策略，尤其决定胜负之谁属。没有后者，单靠本质优良，胜利仍然没有的。

2 转变问题

（一）我们说准备自己，应付新的可能情况，应付可能的米亚伽，是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之下的。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下，准备对付可能的米亚伽（或哈柴），与准备在可能的米亚伽占领地区采取暂时的退却政策。到此为止，不能设想对六中全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是路线的转变，而是战术或策略之局部的暂时的转变，以防意外的袭击，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我们要坚持过去的总路线。

（二）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的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为了孤立投降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3 几个策略问题

（一）巩固党问题（组织上的紧缩政策）。去年三月会议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

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的一般的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二）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员新老干部之间一定要弄好，如弄得不好，老党员老干部负其主责。有完全的理由给新党员新干部以原谅，而对老党员老干部则完全没有这种理由。此问题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

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

要编制中级课本，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四）要提拔地方干部，没有地方干部——中级的，高级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口号。

（五）党应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复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的。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引革命知识分子。

（六）友党友军中停止发展党并撤退党问题。从大局看停止与撤退是有利益的，否则将因此一事妨碍大局，破裂统一战线。不争取中国军队，革命不能胜利，而争取目前主要的是从政治上，若组织党则妨碍政治争取。

靠嘴巴不靠组织（暂时情况下），靠上层不靠下层。

一面撤退党一面加强连络，同意统一战线工作的某种独立性。

一般只在真投降者的军队中、政府中、政党中，取组织上的破坏政策，其余一般只取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某些特殊部门不执行撤退办法。

（七）不杀国民党员。有重要意义。不是不杀汉奸，不是不杀某些叛徒，也不是不杀紧急时机的革命危害者。

（八）不应过分强调民生民主。不适当的，目前应强调反投降（强调抗战），不能同时有几个强调。是联系不是强调。

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不是行动口号。

征兵、捐税、生产问题取赞成而又批评的态度，不能取根本反对态度。

（九）地方策略。要有明确的适合当地情形与各种情形的地方策略。中央以后要注意指导。

（十）要加强群众运动。所谓准备群众即指此。不是降低阶级斗争。能够克服投降的只有正确的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十一）回民问题。

（十二）办党内刊物，立即就开始办，地方上也要办。

（十三）其他。

总的结论就是这样：团结战胜一切。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目前时局及八路军新四军之任务指示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一)关于目前时局分析及党的任务已见六月七日中央电示。

(二)在目前形势下，日寇已经并且继续集中力量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及我游击部队，而对其他国军之进攻与缓攻，则有配合其诱降阴谋之可能。因此，我们任务应当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政治工作上，巩固自己，准备自己，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联络友军，巩固统一战线，反对投降，以坚持抗战。

(三)在部队方面，华北八路军与江南新四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尤其是巩固新部队。而在华中方面，中心任务是在发展。因此八路军、新四军都要有决心的派遣干部帮助华中。

(四)在抗日根据地方面，应注意加强那些能够持久的山岳地区的工作，而将不易在平原地区持久的某些部队及地方的干部，及时的调到山地去。在我部队与友军杂居的地区中，除加强联络工作及提高自己之警惕外，还应进行准备自己的根据地的工作，以求在情况变化时我们仍有依托。

(五)在巩固部队方面，应继续整军。新四军及华中部队应采取八路军之经验加强政治教育(除抗日教育外应加强阶级教育)，加强党的工作，务求关于目前形势及我党任务之解说工作深入战士群众。清查人员，尤其是注意司令机关、通讯机关、机要部门，以保证我军机密与在困难条件下的通讯联络。加强锄奸工作，使其成为全军、全党的工作；集中注意力于反对敌探及反共分子的阴谋破坏上面。

(六)广泛的开展反对投降的运动，与地方党及群众团体协同发动反投降的舆论，反对“和平”欺骗，指明反共就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宣扬我军战绩，提高各界抗战信心。对友军工作的意义大为增加，我各军政首长应尽可能的亲身进行联络工作，尤其要争取受压迫、歧视的军队与我靠拢，一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在地方居民中，注意适当的政策，严禁无组织、无计划的筹粮筹款，争取各阶层的广大同情，孤立投降反共分子。对第三国人士及其教堂，应尊重其权益，以争取国际同情。

(七)在军队的物质方面，应有艰苦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进行深入的节省运动，节省财政、弹药、医药、通讯材料等，另方面进行征集资材的工作，进行生产运动及合作社运动，帮助地方政权开发资源，调集一批干部，加以训练，以加强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保证我军物质供给之自立而不依靠他人。这是一种艰难的刻苦的任务，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准备。

(八)关于各种工作的详细建议与指示另电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亲爱的同胞们！英勇的将士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无限之热忱与兴奋，纪念伟大神圣之民族抗战的两周年！

两年来，我前方数百万将士，以热血头颅抵抗暴寇，忠勇奋发，劳苦备尝，当此抗战两周年之日，中共中央谨向蒋委员长及我保卫国土之忠勇将士，致崇高的敬礼。

两年来，我数万万民众及海外侨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努力生产，协助军队，输财输力，支援前线；而在沦陷区域之同胞，虽身陷水深火热之中，仍群起抗敌，奋斗不懈；中共中央谨向我全国同胞及海外侨胞致亲切的敬意。

两年来，在火线上，在敌机下，在敌人暴行中，万千壮士，英勇捐躯，老弱妇孺，惨遭蹂躏，中共中央谨向我民族英烈致沉痛的哀悼，谨向英烈之遗孤遗族致亲切的慰问。

两年来，世界各国人士，或则主持公理，仗义直言，或则慷慨输将，助我抗战，或则抵货拒运，制裁暴寇；中共中央谨向同情及援助我之友邦人士致敬佩的谢意！

同胞们！将士们！

民族解放战争的两年，对于中华民族是奋发的，进步的，光明的两年。伟大的民族战争，摧毁着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阻碍我民族前进与发展的许多障碍，锻炼了全民族的精诚团结、进步统一，发扬了忠勇奋发威武不屈的精神，唤起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景仰，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奠定了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始基，开创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远景。

强盗侵略战争的两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是黑暗的、困难与危机日益增长的两年。两年战争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者被迫的进入了心所不愿力所不及的长期战争中，差不多一百万万的战费，近百万的伤亡，换来了广大辽阔的战区，处处遭受打击的战线，迫近危机的经济状况，孤立失助的国际地位，厌战反战日益蓬勃的民情，日寇正在这种国力消竭危机四伏的穷途上迈进。

两年抗战的结果，已经最详明的显示了：只要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团结统一，不畏困难，不惧险阻，力求进步，奋斗勿懈，那末，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的，而最后胜利的时机，也一天天地更加接近了。

正因为这样，日寇在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之后，采取了速和速结的政略。近半年来，日寇在军事上集其主力于“扫荡”游击区，对沿海各地作海盗式的袭击，而在前线上的部队只能保持相机进取的姿态，日寇侵略之现阶段已侧重于以政治上诱降的阴谋来灭亡中国了，那狡诈无赖的近卫声明，不过是这种阴谋的公开暴露。虽是这种声明，仅获得少数民族败类

的无耻响应，而为全国人民伟大壮烈的巨吼所反对，然自此以后，日寇却更积极施行其政治上诱降的活动，它一方面利用丧失胜利信心、阴怀贰志的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另一方面利用国际间对法西斯侵略者惯于妥协的反动力量，企图以此来达到它降服中国的目的。

在日寇策动下，汉奸汪精卫之流，公然匍匐敌前，粉墨登场，为和平之狂吠，作卖国之掮客。而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故意制造日寇可能放弃其灭亡中国之野心的梦呓，制造我军力不足、财力不足与民心厌战的胡说，散布国际调解应予接受的空气，散布不亡于敌即亡于共的谬论。迹其种种论调与行动，无非是替日寇之诱降灭华为内应，替汉奸之叛国亲敌作声援。盖日寇视中国之进步与团结为灭亡中国之最大障碍，乃不得不千方百计摧毁中国的进步，破裂中国的团结，而这些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起而应之，如捧纶暗，蠢蠢欲动。他们暗藏于抗战阵营之中，乘间抵隙，便利私图，呼朋引类，奋其魔力。对抗战之各种进步主张与设施，或消极怠工，或破坏捣乱。对一切进步的力量与团体，则肆意摧折，不遗余力，对赤忱为国忠贞正义之士，则视为仇仇，排击不休。对现代科学的进步思想与文化，则目为洪水猛兽，毁之惟恐不力，去之惟恐不尽。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则更是他们造谣污蔑、攻击陷害的对象，视之为眼中钉，明攻暗毁，无所不用其极。对国家民族前途所赖的青年，则束缚其思想，桎梏其行动。而尤重要者，就是尽力分裂国内团结，制造纠纷，鼓励磨擦，挑拨内哄。其所用手段，则为伪造三民主义，以破坏革命的三民主义；加紧阴谋活动，以分裂国民党；伪造情报，散布流言，以破坏共产党；造作事端，挑拨感情，以离间国共两党之团结，并引起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间的嫌隙与裂痕。凡此所为，或直接受命于日寇，或间接而被其利用，一言蔽之，以分裂达投降之目的而已。盖不仅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乃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亦且因为国共团结乃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三民主义乃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如不分裂这个团结，破坏这个基础，就不能造成其投降乞和的条件。阴贼险狠，愈出愈奇，国人不能不深加注意了。

至于国际反动力量，那么虽然我国的抗战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各先进人士的同情与援助，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反动营垒中却存在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主义者，存在着想以中华民族为牺牲而与侵略者妥协的阴谋家，这些分子随时准备重演慕尼黑的罪行而以中华民族为宰割之对象。此种现象现时虽尚未表面化，但暗中策动，渐见积极，稍不注意，便有被其牵入圈套之可能。

凡此所述，一则日寇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二则中国投降妥协分子之投降与分裂的罪恶活动，三则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三者汇合，便造成今日抗战形势中的两种最大危险，即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这就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重要的特点，可能的趋向。认清这个特点，克服这个趋向，才能使抗战获得胜利而避免悲惨的命运。

同胞们！将士们！

今日而与日寇言和平，就是屈膝投降；中途妥协，就是亡国灭种。日寇诱降中国的甜言蜜语，不过是灭亡中国吞并中国的钓饵。投降妥协分子的挑拨离间，分裂团结，防共反共，制造内哄，无非是出卖民族国家投降屈膝的实际准备。东方慕尼黑即令与西方慕尼黑有形式上之不同，而其实质亦将毫无二致。

同胞们！将士们！

我们以热血头颅所换来的抗战的光辉成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所毁灭所断送

吗？我们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缔结所公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所破坏所分裂吗？我们千百万先烈的鲜血，能让它白白的流去吗？我们愿意受日寇甜言蜜语的钓饵，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吗？我们愿意作国际投机交易场上任人宰割的羔羊吗？不，决不！

同胞们！将士们！

我们要：

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我们要继续抗战，抗战到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的对岸！

我们要巩固团结，团结得如钢铁一般的强固！

我们要向前进步，进步到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立！

我们要反对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

我们要反对国际反动派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同胞们！将士们！

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这就是全中华民族继续努力的总方向。

同胞们！将士们！奋斗吧！我们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

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共合作，精诚团结！

抗战胜利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原载《解放》周刊75、76期，1939年7月7日出版）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报导）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日）

"同志们！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高兴。……

"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女大现在办起来，将来还要维持下去，要维持下去，就要经过更大的持久的奋斗。我们办女大，有些人不赞成，首先就是那些"顽固分子"。他们不赞成，他们设关卡，阻止各地学生到延安来学习，不愿妇女得到彻底解放。

其次，还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

我希望女大教职员同志们，要安心工作，准备长期工作的决心，我们党应该有很多专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最后，以含有重大意义的"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两语做结。

（原载《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

中央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根据各方材料（参考三十号军政通讯），证明英日谈判中，英国对日已有了重大的原则的让步。这种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的严重局势。

（二）蒋介石的谈话，虽然指出了独立奋斗、反对依赖与观望的决心，但对英国仍抱有极大的幻想；特别由于金融上对英国的依赖，使英国对蒋仍有很大的支配力量。

（三）我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

1．在舆论、行动上表示全国人民对于英国张伯伦妥协派向日投降、牺牲中国利益的严重抗议，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揭破张伯伦政策是拥护日本侵略中国、反对中国抗战的政策，这政策只有助长世界法西斯侵略国的侵略，促进世界普遍的大战争的到来。

2．坚决反对中国抗战阵营内部任何人因张伯伦的对日投降，而对抗战表示动摇；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破坏抗战的活动；强调自力更生的口号，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打破对英国的幻想，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

3．但对英方面，应集中力量于打击张伯伦的投降政策，主张英国人民与政府应改变这种害人害己的错误政策，以争取英国改变政策，继续支持中国抗战。

4．指出即使英国停止援助中国与日妥协，只要克服内部投降危险，中国仍有一切办法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宣传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中共书记处

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一）由于策动中日妥协的英法卷进了欧洲战争，由于美国在中日问题上与英法态度还不一致，由于苏联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极大增长，由于日寇在政治上积极组织汪精卫伪政府和在军事上占领南宁，特别是由于共产党与全国进步力量的增长及其对抗战团结政策的坚持，使得国民党内占统治力量的大资产阶级成份发生了动摇惶惑的心理，即动摇于联苏联共抗战或亲英反共降日之间，时局正处在一个转变的关头。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尽一切努力争取时局的好转，即转向国民党进一步联苏联共抗战的局面，克服亲英反共降日的危险。

（二）争取时局好转的基本方针，即是更加认真的根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去组织全国一切进步力量，即一切抗战和民主的力量。

甲、在这些力量中，争取国民党中的进步领袖，保有革命传统的老同盟会员，愿意坚持抗战与团结的很多国民党军官、很多中下级干部及很多党员群众，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组织工作的第一个对象。必须使国民党中反动分子较有组织、而进步分子没有组织的现象来一个重大的改变。为此目的，必须利用国民党内部各个派别各个集团之间的各种冲突矛盾，发展国民党内部抗战派进步分子与投降派反动分子之间的斗争，而我们则帮助抗战派进步分子，打击投降派反动分子，打击最反动的少数人，以便逐渐组成国民党的左派力量，并使他们能在国民党中起决定政策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真能与国民党员大多数在一起，去克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

乙、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这一中间力量，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组织工作的第二个对象。

丙、组织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与组织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的任务，是与我们用极大努力去组织下层工农劳苦群众的任务互相配合起来的，是与我们用极大努力去加强军事力量的任务互相配合起来的。

丁、各级党部应该懂得，只有把上述各种抗战和民主的力量组织起来，达到必要的程度，并使他们互相配合起来，才能争取时局的好转，才能把时局好转的可能变为时局好转的实现。这一严重组织任务的完成，是使时局好转的唯一步骤。

（三）为了完成这一严重的组织任务，以达到争取时局好转的政治目的起见，各级党部必须注意下列各点：

甲、组织这些力量的基本政治口号，应该是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实现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而目前尤须特别着重于促成宪政，将促成宪政的口号与团结抗战等口号密切联系起来。

乙、组织方式，应该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而采用多样性与合法性，以能真正团结各部分力量于各种不同的组织中，而不致遭受反动力量的破坏为原则。

丙、在各种组织中，共产党员必须帮助其中进步分子，形成核心力量。必须派遣忠实有力埋头苦干的共产党员干部到这些团体的内部去工作，诚心诚意的去帮助其中的真正进步分子，形成有力的核心骨干。

丁、为了实现这一组织任务，各级党部必须用极大努力，动员和说服那些能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党员和同情我党的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去认真亲近国民党干部及党员，使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影响和接近国民党嫡系非嫡系以及非国民党的各个重要党政军领导人，使他们诚意地帮助各种赞成抗战和民主的人们，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在这里，文化人与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认清，不但接近国民党的各级干部及社会上的上层与中层分子，必须发动大批文化人及青年知识分子，才有办法，即组织工农劳动群众与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也必须吸收大批的文化人及青年知识分子使之起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才能达到目的。各级党部必须懂得知识分子的极大重要性。

戊、为此目的，各级党部必须在同志中及同情分子中，尽量找出与国民党及社会各方面有较多关系的人，主要是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说服和打破他们不愿与国民党干部及党员群众接近的习惯，使他们深入国民党员及社会各方面去进行活动，以便认真地进行党的这一严重的组织工作。

(四)各级党部必须认清，如果共产党不能克服党内党外严重存在着的那种骄迈的清高态度，那种同国民党员及社会各界人士格格不入的态度，因而不能认真地去亲近和影响国民党员与社会各界人士，不能更进一步的去组织全国各种抗战与民主力量，则我们党的经过统一战线经过国共合作以争取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针，我们党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大多数及一切进步分子共同一起去克服投降分裂倒退危险的政策，便将成为空谈而无法实现，争取时局好转就将成为不可能。中央盼望各级党部严重的考虑这一指示，并采取具体办法切实执行。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纪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报导）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他首先指出：“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当“五四运动”以后，到“五卅运动”，中国形成了一个全民的运动，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这个时期，“五四运动”准备了舆论，准备了干部，准备了思想和准备了人心，到后来才有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

“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一二九”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西北之时，这说明“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红军北上抗日两件事的结合，这两件事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之后，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的团结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于“八一”宣言之后，他们反对当时对青年的压迫，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一二九”运动将为历史上一个大的纪念。

“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很多道理，他们认识清楚，他们要进步，他们要民主，要参政；这民主和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现在抗战中有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叫做压迫自由，然而全国青年全中国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压迫的自由，他们不准倒退，他们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最后一点毛泽东同志讲到：“自‘五四运动’起，共产党就与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这些说明知识分子要与共产党结合，要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与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与八路军新四军结合。共产党非常欢迎知识分子，反对的是那少数坏知识分子。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知识分子一定要与革命军队结合起来，笔与枪结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出来！”

（原载《新中华报》1939年12月16日）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　泽　东

今天开大会，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世间六十岁也是难得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单单庆祝斯大林呢？而且这样的庆祝，不仅在延安，而且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只要晓得他今天生日的人，只要懂得他为人的，只要是受压迫的，都会庆祝他。原因就在于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那些人是反对庆祝他，不喜欢庆祝他的呢？这就是自己不受压迫单单压迫他人的人，首先是帝国主义者。

同志们！一个外国人，相隔万余里，大家庆祝他的生日，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呢。

这就是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苏联，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共产国际，因为他领导着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帮助中国打日本。

现在世界上分为两条斗争的阵线，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这是压迫人的阵线；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这是反抗压迫的阵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阵线，有些人觉得好象是站在中间，但是它的对头，是帝国主义，它就不能不引社会主义为朋友，不能不属于反抗压迫者的革命阵线的一面。中国的顽固分子，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一只手反共，一只手抗日，自称是中间派，但他们终久不成功的，如果不悔过，最后必要走向反革命方面去。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阵线，都要有一个作主的，都要有一个指挥官。反革命阵线的指挥官是谁呢？就是帝国主义，就是张伯伦。革命阵线中的指挥官是谁呢？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全人类中间，出了这位斯大林，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你们知道，马克思是死了，恩格斯也死了，列宁也死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那一个来发号施令呢？这真是幸事，现在世界上有了一个苏联，有了一个共产党，又有了一个斯大林，这世界的事情就好办了。革命指挥官干些什么事？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而要这样，就要领导十几万万人向压迫者作斗争，而使之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斯大林要办的事。既然这样，那么，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要不要庆祝斯大林呢？我想是要的，是应该的。我们要庆祝他，拥护他，还要学习他。

我们要学习他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道理方面，一个是事业方面。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

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斯大林同志有什么功劳呢？他发挥了这个道理，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弄出一篇很清楚很具体很生动的道理来，这就是建立革命阵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

事业方面，是把道理见之实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完成，而斯大林把它完成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之前，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天天说苏联不得了，社会主义是靠不住的，但是在今天怎么样呢？把张伯伦的口都封住了，把中国那些顽固派的口也封了，他们也都承认苏联是胜利了。

斯大林除在道理方面帮助了我们的抗日战争外，他还给了我们事业上即物质上的帮助。由于斯大林事业的胜利，他帮助了我们很多的飞机、大炮、航空员，各战区里的军事顾问，还有借款。世界上还有那一个国家这样地帮助我们？世界上还有那一个阶级那一个党那一个人所领导的国家，这样帮助我们呢？除了苏联，除了无产阶级，除了共产党，除了斯大林，还有谁呢？

现在有些人，他们自称是我们的朋友，但他们只能是属于唐朝李林甫一类的人物。这位李林甫先生，是个“口蜜腹剑”的人。帝国主义者都是口蜜腹剑的。张伯伦就是现在的李林甫。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什么驻军权、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等，那一个帝国主义废除了呢？没有一个。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在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指导世界革命。现在加上一点东西，可以在物质上帮助世界革命了，这就是斯大林的大功劳。

我们庆祝斯大林同志生日之后，还应该把这件事向全国宣传，向四万万五千万人讲清楚，使中国人民都懂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

（原载《新中华报》1939年12月30日）

中央对时局指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国际国内矛盾发展到今日，国民党正处在极大的动摇中，即动摇于亲英反共降日与亲苏联共抗日之间。现在日本急于想结束战争，国民党中的大资产阶级成份也急于想结束抗战。但国民党中与社会上的一般中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成份则仍然不愿缔结屈辱的和平，还愿抗战下去，双方是在斗争中。

（乙）大资产阶级为准备投降，已把限共政策推进一步了。在今年三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的限共政策，表现于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其实际执行中的，是以政治限共为主，以军事限共为辅，而在十一月国民党六中全会时，则已发展到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了。在这个军事限共政策下，国民党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发布了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并用中央军直接对付八路军与新四军。以中央军九十七师攻取边区的宁县镇原两城，以朱怀冰入河北，以顾祝同与韩德勤兵力在冬季反攻名义下从江南江北两面包围新四军，在河南攻击新四军留守处。阎锡山为执行这个政策，已在晋西南公开发动讨伐新军的战争，并积极准备在晋西北发动这个战争。所有这些，均带着大资产阶级进一步准备投降的性质。

（丙）在此种情况下，各地的任务是：

第一、必须依照中央过去的指示，极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力争中间阶层。

第二、深入群众工作。尤其在战区与敌后，要进一步依靠群众。

第三、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极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

第四、极力巩固党的组织，严重注意秘密工作，千万不要疏忽。

第五、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局部的突然事变。

第六、在华北西北中原一带，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言退让。

（丁）用所有这一切的办法，去巩固自己的阵地，击破大资产阶级的阴谋，争取时局好转，争取继续抗战，并准备在时局逆转时足以应付一切。

（戊）此指示只发到省委与师部，阅后即毁掉，下面由你们设法传达。

中央书记处

为陇东事件肖劲光致蒋介石等电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衔略）查陇东庆、合、镇、宁、正、环等县，关中栒、淳二县，历属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八路军驻防三年，军民相安。本年夏季栒邑被友军袭占，镇、宁被友军包围，后经调处，暂时无事，不意近日复受袭击，友军纷纷进攻，急报频来，如大祸之将至，据我庆阳驻军王旅长维舟连电报称：蒸（十日）晚宁县保安队联合九十七师之一团向我驻军罗营突然袭击，并由预先秘密掘好地道，埋藏地雷，突施轰炸，我罗营事出意外，毫无防备，伤亡过半，罗营长亦受重伤，仅一小部突围退出城外，不幸又遭九十七师联合西峰之保安队重重包围，图将该营全部消灭，文日合水县长为配合宁变，亲率全县保安队袭击王旅直属队，寒（十四日）夜十二时，镇原九十七师之五一团又步兵一个营，炮兵一个连，并配合保安队向我驻军王营猛袭，该营伤亡惨重，于铣（十六日）突围退出城外，寒日我王旅驻西峰之办事处亦遭袭击，接着马渠、孟惧、太平、赤城、佃家畔、屯子镇等地之驻军及保安队亦纷纷响应，先后向我进攻，并断绝交通，到处逮捕我方工作人员。同时一六五师正向西峰调动，准备大举进攻，皓日（十九日）更有青天白日国徽之飞机在宁县、镇原等地，盘旋侦察，并闻破坏团结制造内哄之民族败类叶青、张慕陶、张国焘等，由兰州秘赴西峰，阴谋扩大事变，大作发动内战之宣传鼓动。并闻九十师五七八团团长在赤城集合部队训话，公开宣布奉到上级命令用武力进攻边区消灭八路军，我们九十七师及一六五师攻打陇东，新一军攻打定边，骑兵第二师攻打鄜县等语。又据报：关中方面友方亦已出兵，元（十三日）邠县县长率领全县保安队开抵永乐镇，栒邑保安九团团长亲来职田镇有进攻模样，他如新民镇，团庄镇、平子镇、武汉镇、师田、盘克、下桓等地亦纷纷增兵，企图大举进攻关中边区等情。溯自抗战至今，两载有余，我八路军在中央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协同友军坚苦抗战，我留守部队对于保卫河防边防，巩固抗战后方并无过犯，对于原定二十三县地区并未越出雷池一步，现敌我相距一河之隔，抗战胞泽应如何精诚团结，共御敌寇，岂宜箕豆相煎至于此极。陇东友军，此次突然进攻，并公开声称系奉上级命令，听闻之下不胜骇异，当此日寇进攻政治重于军事，反共邪说，敌实倡之，我应拒之，我公领导群伦，主持国策，对此异动，必有合理之主张，除饬职部力持镇静外，敬祈主持公道，制止异动，恢复团结，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抗战幸甚，法纪幸甚。（下略）

（原载《新中华报》1939年12月27日）

朱彭总副司令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

（上略）

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尚是25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之区域，其中包括陇东之庆阳、合水、正宁、宁县、环县、镇原、陕西之淳化、栒邑、鄜县、洛川、安定、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县、靖边、定边及宁夏之盐池，三年以来，均属八路军后方，军民协作，相安无事，前线之军心赖以维持，后方之团结赖以树立，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为亟之际，稍有人心，诚不应挑拨事端，制造磨擦，更不应枪口对内，遗笑友邦。乃自本年3月流行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压迫之风，起于国内。湖南有平江惨案，河北有荫梧事件，山东有秦启荣之进攻，河南有确山县之流血。而在西北，则高呼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环边区之四周，处处进攻，迄无宁日，以正规之国军，行对内之战斗。于是宁县镇原则被围两月，栒邑则杀人夺城，鄜县则重兵迫境，靖边则扰乱无已，安定则两次袭击，而绥米河边区域之专员何绍南则日谋所以破坏防军，暗杀八路人员。然自7月蒋委员长令派周副部长恩来到西北调停后，一时平静，方期磨擦从此消弭，阴霾为之净扫。不意近月以来，情势逆转，且复变本加厉，所谓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乃从新发现于各方，而调兵遣将，攻城略地之消息，又不绝于耳矣。蒸日九十七师千余人及保安队袭攻宁县，我驻军罗营长受伤，兵士死伤过半；寒日九十七师二千余人袭攻镇原，我驻军王营死伤百余，两域均被九十七师夺据。现复集中大军准备向庆合进攻。陕西方面，则闻正在计划夺取淳化鄜县，准备进攻延安。而其欺骗群众动员士兵之口号，则为共产党捣乱后方。夫共产党则亦何负于国，何损于民，深入敌后流血苦战者，非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新四军乎？力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者非共产党之一切党员乎？以边区论，共产党几曾越过二十三县以外之寸土尺地乎？攻栒邑，夺宁县，占镇原，而执行其所谓“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之任务者究何人乎？大好河山，半沦敌手，而唯此区区二十三县是争，清夜扪心，能不为之汗颜乎？所望我蒋委员长国民政府维护法念于上，全国党政军领袖与各界人士主持公道于下，痛国亡之无日，念团结之重要，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语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国事至此，唯有精诚团结，消弭内争之一法，否则影响前线之军心，动摇抗战之国本。敌攻于外，而自坏其长城，国脉虚危，而自伐其腑脏，我四亿黄帝子孙，真不知其死所矣！迫切陈辞，敬候明教。

……下略……

（原载《新中华报》1939年12月30日）

八路军将领致林森蒋介石等电

（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日）

（衔略）据报，政治部陈诚主任在韶关演说，有谓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就是证据等语。事之真实与否未可知；然自汪精卫倡言八路军游而不击以来，奸人四方传播，竟以此为破坏职军信誉，破坏国共团结之口号。陈主任贤者，可信其不作此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然职军将士闻之，未免寒心，愤慨之情，殊难禁遏。群以八路军抗敌所及，东至于海，北至于沙漠，可谓处在国防之最前线。敌国来华四十个师团中，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者十七个师团，占全数五分之二以上。两年半中，八路军新四军所有防线未曾后退一步，归绥、大同、张家口、古北口、北平、天津、烟台、青岛、徐州、浦口、南京、镇江、无锡、芜湖，离城十里八里即飘我祖国国旗者，始终是八路军新四军。两年半中，我八路军伤亡达十万，而敌伪伤亡则达二十余万，我俘敌伪达二万，缴获敌伪枪枝达四万。全军二十二万人，月饷不过六十万元，平均每人每月不过二元七角二分。而币价跌落，实值十五万元，则平均每人每月不过六角七分，全国无此待遇菲薄之军。有二三千人而升级为军者，有七八千人而升级为集团军者，我八路则至今三个师，始终不要升级。八路军对于国家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毁谤之来，则谓游而不击，谓发动民众为非，谓实行三民主义与抗建纲领为非，谓恢复失地建立抗日政权为非，谓培植民众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为非，事之可怪，未有过于此者也。冰天雪地，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然而奋战未曾少懈执行上峯之命令未曾少懈，遵循人民之指导未曾少懈，八路之于国家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一切怨毒之矢，不入耳之言，则集中于八路，奇冤大辱，又有过于此者乎？我八路军在晋绥，在河北，在察热，在山东，收复沦陷区，建立根据地，展障中原，保卫西北，天经地义，至迫切，至正当也。而论者谓为非是，必欲破坏之。昨日败军之将，丧地之官，望风而逃惟恐不及者，今日貌堂皇，声磬款，戟指而骂，挥军而进，从八路阵后打入，亦谓之"收复失地"，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我游击队，取消我民众团体，杀戮我工作人员，百端磨擦，必欲同归于尽而后快，古今之奇事怪事，又有奇怪于此者乎？陕甘宁边区，八路之后方也，区区二十三县，至今不予法律上之承认。且点线工作布于内，大军包围发于外，今日袭一城，明日夺一县，亦谓之"收复失地"，更谓之"打倒伪边区"，"消灭伪八路"。警报纷传，后方不固，磨擦事件，百次千回。而我前线犹死撑硬打，一步不退，八路亦可谓无负国家民族矣。咸榆公路、陇海铁路，八路必经之交通线也。三民主义青年团，拦路劫人。特务机关，关卡林立。凡赴八路之青年，一概阻拦，设立招待所，谓之"唤醒盲从八路者"。抗大学生，无走路之自由权，一经被劫，再无踪影。勒写悔过书，绑入干训团。青年何辜，遭此荼毒。甚且盗窃八路军车，伪造八路护照，物证具在，可以复按，以此例他，他可知矣。此等行为，伤国家之侮制，毁中央之尊严，法纪坠地，遗笑万邦，其不可为训，亦彰彰明矣。特务机关，姿意横行，勾引八路与共产党人员，立有赏格，上级二百元至三百元，中级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下级四十元

至一百元。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厉行破坏，则用无数万之金钱。在湖南则有平江惨案，在河南则有确山惨案。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不足，继之以“对于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又不足，再继之以“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开训练班，上磨擦课，“限共”“溶共”“反共”之声，甚嚣尘上。山雨欲来风满楼，意者又将重演十年前之惨祸乎？然而我八路历千辛，冒万苦，忍辱负重，不敢告劳者，大敌当前，抗日第一，为国家民族负责，希望于光明之前途也。抗战两年半，全国事实昭示，军事有进步，政治无进步，贪官污吏，到处横行，土豪劣绅，作恶无尽，彼辈发国难财，吃磨擦饭，黑暗重重，屈指难数。而官官相卫，壅于上闻，此亡国之气象也。古人有言：“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今且污辱及于苦战之军，纷扰及于后方之地，阻挠及于交通之途，此而隐忍，则国家与民族危矣。凡此将士之呼声，德等未敢充耳不闻，默然不告，诚以如此下去，绝不利于抗战，绝不利于团结。再四思维，惟有请求钧座派遣陈主任诚，亲临前线，实地考查，究竟伤亡几人，俘获几事，复地几里，攻战几回，后方之纷扰几端，道路之阻挠几次，俱可一览了然。陈主任贤者，维护前线将士之心，至深且切，必不惮于一行。德等恭候莅临，如旱望云，如饥望岁，钧座一纸遣派之令，陈主任欣然命驾必矣。如此则流言可销，诬谤可止，纷扰可靖，阻挠可息，奸人可以敛迹，正气可以伸张，而前线与后方团结一致，抗战之胜利可期矣。所有请派陈主任诚到前线考察职军情形，以雪冤诬，杜磨擦，固团结而利抗战一节，敬谨上呈，是否有当，敬祈裁决示遵，不胜屏仰待命之至。（下略）

为朱怀冰石友三进攻八路军
朱彭致蒋介石电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四日）

委员长蒋钧鉴：真未令一元电奉悉，谨遵令办理，并将原委呈报如下：（一）朱军于一月来园邢沙一带，粮荒严重，向南开至涉武一带，驻扎查磁属贻壁羊台一带。自民国二十六年国军主力撤出磁县后，即由职属先遣支队一大队在该地领导游击，坚持抗战。两年以来，不无微劳。职属青年纵队第二团亦早依托该区配合作战，曾收复彭城对六河沟矿区，敌军予以极大威胁，并维护东西交通之要道。乃朱军开抵该区后，极欲将该两部歼除驱逐而后快。筑碉挖沟，形成包围，切断交通，绝其给养。该两部派员连络交涉均置之不理。朱军并于二月十八日二十一时突令两团之众，向驻贻壁、羊台等地之该两部围攻。职等闻讯后，当即令其撤退以避冲突。不意朱军乘其撤退之际，猛烈袭击，致使该两部遭受严重损失。而朱军于事后诬该部向其攻击。朱军于攻占贻壁、羊台后，气焰益张，用过去剿共办法层层筑碉，多至百余座，步步进迫。摧残抗日政权，解散民众团体，没收我资财，断绝我东西交通，惨杀我往来人员，虐待抗战军人家属，并军纪坏极。职等曾屡电鹿总司令及朱军长交涉，事过旬日，均置之不理；并电呈程主任、卫长官，请派员会组调查团，彻查真相，亦久未蒙复。职部一再遭受朱军压迫摧残，不能求得适当解决，群情激愤，被迫不得已而自卫。不幸被迫转入旋涡者，只有一二九师一个团及聂吕两司令所率获已之两个团，共计三团，不过六千人。一一五师所辖之一旅在鲁西南济宁一带，抗日一旅驻陵川高平间，与庞军杂居，均未参加。在朱军万人进逼之际，因双方官兵咸知抗日不愿内战，咸知精诚团结不愿分裂，朱军压迫其对内而其下级官兵乃不战自退。职部官兵忠于钧座抗战到底，设对内部冲突属不胜其悚惧也。朱军自退后，职等严令所部于林县境内，向平汉路之敌袭击。（二）石友三部在鲁南时，坚持抗战，职属驻鲁南部队曾助其扩大兵员，帮同训练游击，相处极洽。不意石部自到冀南后，受奸人诱惑，与日寇勾结，专意与职部驻冀南部队磨擦。最近三月来，石部曾瓦解与惨杀职部冀南工作人员至千人。以上曾迭电呼吁上峰，予以制裁，但迄无有效制止办法。职部仅出于自卫，现已通令停止所有属部与朱军及石部冲突。原委情形，谨电奉复。窃思此种事实，无论是非曲直，胜负谁属，均系亲痛仇快之结果。职等禀阅墙御侮之训，实属不胜惶悚沉痛之至。职朱德彭德怀叩寒。

〔附〕武汉失守后日寇对国民党从军事进攻为主到政治诱降为主策略变化的有关资料

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

“帝国陆海军，此次仰赖陛下宸武陵威，攻陷广州、武汉三镇，戡定中国各要地，国民政府由是降为一地方政权。但该政府如仍冥顽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该政府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帝国之所期待者，在乎建设能保东亚久安长治之新秩序，此次出师之最终目的，亦即如此。所谓建设新秩序，即由日、华、“满”三国相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以此为基础，进而确立国际正义，达到共同防卫，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此即所以安定东亚，裨益世界进化者也。帝国所望于中国者，在求共肩建设东亚新秩序之任务。且冀中国国民，理解此中真意，而与帝国政府协力迈进。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事拒绝。帝国且深信各国，必能正确认识帝国之真意，而有以适宜于东亚之新情形。尤其盟帮诸国从来之厚谊，更深有足多者。盖建立东亚新秩序，乃渊源于我国缔造之精神。完成此种精神，乃现代日本国民所负之光荣任务。帝国应断行国内诸事之革新，并扩充国家总力，排除万难，而迈进于完成此大业。兹特将帝国坚定之方针与决言，声明如右。”

（编者按：广州于10月12日失守，武汉于10月25日失守，11月3日为日本天长节，故日本发此声明。）

美国通讯社亦传日本曾向英国提出和平条件

据某著名外商发表，数月前日本特使谷正之，曾向英国大使提出日本停战之条件，内容如下：(一) 中国承认“满洲国”；(二) 中国及他国不得干涉日本在蒙古之活动；(三) 除重要地点数处驻兵之外，日军将退出扬子江；(四) 日本在华北五省有政治及经济优先权。

（《申报》11月3日北平美联社电）

日本策略转变的步骤

这次所谓“和平”的空气，竟自东京传出，甚至连谎谬的“和平”条件，也为日本半官式的通讯社所登载。其主要的内容是：(一) 中国在政治上或经济方面放弃一切有碍两国友谊之行动；(二) 中、日两国文化合作，并取反共政策；(三) 两国经济与工业合作。又日政府可以保证，倘和平恢复后，不再有战事发生。(十月二十五日“海通社”东京电) 这多么富于引诱性。即日本声明的所谓基本方针，“决不与蒋介石氏所领导的政府言和”云云，也有修改。上月二十四日招待新闻记者的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对于“中国实际领袖之意义”的质问，竟不加答复。即侵华敌酋畑俊六的谈话，也只称：“日本所愿意者，仅为中国政府

放弃反日态度”。……日寇诱降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央求德、意居间牵线。英、德调停中、日战争的消息虽曾一度为中国方面所否认，但闻希特勒与日政府之间确曾电报来往磋商过，香港德、意领事馆前的友帮车马，也曾如龙似水般热闹过一阵。希特勒“时常准备和平，时常准备自卫”的警句，对于他的这东方伙伴的日寇，当然有丰富的暗示蕴蓄其中。……所以在德、意调停搁浅以后，即刻派遣所谓“支那通”的重光葵赶赴伦敦上任，重光到任第一日即对报界发言，谓英、日两国确曾有过误会，他的职务在于泯除此种误会，并改善两国帮交。……他到任第三日，即有所谓“日本有力分子开始试探英国政府的意见，怂恿英国政府出任调人，恢复远东和平的消息”（“路透社”伦敦电）这有力分子当然是重光。同一电文又谓：“伦敦之日人方面证实，日本军事当局鉴于今日战事已使日本之人力、物力、金钱蒙受莫大之损失，其希望停战的真切，正不下于一般平民，故确信中国所能接受之条件，日本亦必能接受之。”又据明治生辰纪念日宣言（即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声明）内称：“如国民政府放弃其排日容共之新政策，并作人选上之更动，则日本将不拒绝其参加树立远东新秩序运动。”并谓：“……日本目前之军事行动，其最后目的即在树立此种新秩序。”

日本对华的四个步骤：第一步骤，武装并吞华北五省。其时适当芦变前后，借防共之名，企图将华北划成非武装地带，置于日本统治之下，达到所谓“不战而胜”的目的。第二步骤，使用武力迫我国民政府屈服。其时间适当南京陷落的前后。日本所采的策略，是勾结一部分失败主义者进行讲和，诱我订城下之盟。第三步骤，排演傀儡戏，离间我民族抗战的内部。其时间适当于一月十六日“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的宣言发布后以至现在，其方法是创造华中伪临时政府，促进华北与华中两个伪组织的合流，并引诱我国民政府参加。第四步骤企图设立所谓“东亚联帮”。北至西伯利亚，南至爪哇及印度，皆划入东亚联帮的范围内，而自己充当盟主，绝对排斥亚洲以外的人。

（宋斐如《汉口战后日寇的对华政策》、《世界知识》8卷9期，1938年1月1日出版）

畑俊六还在口出大言

日本华中总司令畑俊六，昨日向柏林“金融报”特约访员发表谈话，宣称：“各线战事，现时正在继续中”。继称：“倘有必要，渠将跟随华军至重庆昆明。”

（1938年11月6日《申报》）

编者按：这大概是畑俊六所以被免职的原因罢。

东条的两国作战计划

东条在武汉失守后之演说：“日、苏冲突，将来是不可免的。日本军部为对付东亚的新形势，为了完成天与皇国的大使命，建立东洋永远的和平，建设东亚的新秩序，非至抗日的蒋政权溃灭，是实难收兵的。从今以后，无论如何，必须做对华对苏二正面的武力同时作战的准备，不可不倾倒人马资财全力，以建设新军备。”

（吴斐丹：《日本军部的新动向》，1939年2月7日上海《导报》）

编者按：东条号称坂垣的智囊，急进派代表，任陆军次官，现已调任，未知是否因其在武汉占领后与当局意见冲突之故。

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

“日本政府，一如本年屡次所声明，始终在谋彻底扫荡国民政府之武力，并与中国卓识之士相提携，以向‘东亚新秩序’建设之途迈进。现在，中国各地更生之势，澎湃而起。而建设之气象，亦日盛一日。政府于此，爰将日本与更生中国关系之根本调整方针，向中外阐明，籍所昭示帝国之真意。

中、日、‘满’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之目的，互相结合，互相亲善，并实行‘共同防共’，以及‘经济之提携’。因此，中国必须首先消除其从来之褊狭观念，而放弃其抗日与不忘‘满洲国’之情绪。质言之，日本率直的希望中国进而与‘满洲国’树立完全之国交关系。

其次，日本不容许东亚有第三国际势力之存在，故当本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以缔结中日防共协定，为调整中、日国交之紧急要件。又鉴于中国现在之情况，为充分保障防共目的起见，在‘防共协定’继续期间，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特定地点驻军防共，以及将内蒙地方作为特殊防共地域。

关于中、日经济提携，日本既无在中国为实行经济的独占之企图，亦非要求中国对于理解新东亚情势，并顺应此种情势而动之善意第三国之利益，加以限制。其唯一希望，在使中日两国之提携与合作发生实效。即在中、日平等之原则下，中国应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以增进中、日两国民之经济的利益。再鉴于中、日间历史的经济的关系，尤其在华北以及外蒙地域内关于资源之开发与利用，应予日本以积极的便利。

以上为日本对于中国要求之大纲。如能洞悉日本发动大军之真意，自可明了日本所要求于中国者，既非区区之领土，亦非战费之赔偿，而其实际，不过要求中国对于分担建设‘新秩序’之职责，予以最低限度之必要的保障而已。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进而有完成中国之独立，对于必要之治外法权之撤废及租界之交还，亦不惜予以积极的考虑。”

（杨云竹译:《战时综合丛书》,第4辑）

平沼一月二十日的上台演说

平沼骐一郎于本年一月上旬继近卫内阁登台，于一月二十日在贵族院发表如下之演说：

“对于中国事变，天皇已定有确乎不动之方针，现内阁当然依此根本方针，向所期之目的彻底迈进。日、‘满’、支三国，应立于互相充分理解之上，互相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实现互助关系，善邻友好，奠定东亚兴隆之基础。此乃显示日本肇国精神之道，亦为固定之国是。以东亚安定之责自任之日、“满”、支三国，应从速本此公正之目标，向新秩序协同前进，俾完成永远之安定。

中国应谅解此帝国之大精神，从速协同完成东亚新秩序之建设。如始终不理解此意，继续抗日，唯有使之溃灭。然对中国卓识之士，协助帝国国策之遂行，以期奠定更生新中国之基础者，当欣然援助与挽救中国民众涂炭之苦，而欢迎其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历史的事业。共产主义已弥漫中国大陆，而有支配其政权之势，故必须实行防共之道。此次事变之最后目的，不单在武力的胜利，而在求中国更生。同时，由于日、“满、”支三国互相提携，以确立

东亚新秩序体制。在未完成此目的之前，事变绝不终结。”

有田一月二十一日的外交演说

平沼内阁之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于一月二十一日在众院发表演说如下：“帝国政府，关于此次事变之根本方针与决意，已于去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三日宣明中外。日本所希望者，为建设确保东亚永远安宁之新秩序。此所谓建设新秩序，不外维持日、“满”、支三国各自独立，一方使之充分发展其个性而互相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树立积极的互助关联之关系，以道义的基础为立场，建设新东亚。

去年（一九三八）十二月二十二日，帝国政府曾声明，希望与中国同忧卓识之士相提携，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结合。以期实现相互之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同时，并表明帝国政府所要求于中国者，既非区区之领土，亦非战费之赔偿。帝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进而为促进中国之独立起见，关于撤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均不惜加以积极之考虑。凡此皆系阐明以道义为出发点之帝国国策。

现中国各地已成立新政权，帝国政府希望其中央政府早日成立，以便与日方协助，谋事变之收拾。最近发生所谓和平派首领之脱出事件，帝国政府正注意其前途之发展。”

离间国共合作剽窃三民主义的大阴谋

敌人集中策动于一点，即是“国共之分离”。盖“国共之合作，乃抗日联合阵线之根干，实有加以打击之必要”。……敌明白声称：“武汉作战之目标，乃在分散国共合作，故武汉占领，好似在国共间插入一个楔子，战略政略双方，都在分散国共力量。”

敌谓：“帝国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彻底击灭抗日政权及军队，第二在要日、支两民族之提携融和及东洋和平之确立。前者乃达成后者之手段。然此二者，证诸支那之现实，实为互相对立之矛盾。试观事变以来之经过，抗日政权之指导原理，虽属误谬，但蒋政权已具有民族政权之本质，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数之支持。现政权所以能得中国共产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或抗日联合各界，以及旧军人之热烈拥护者，即缘于此。今吾人一方欲击灭蒋政权，他方欲与支那民族相提携，事实上，诚不啻缘木求鱼，盖愈欲倒蒋，愈使支那民族拥蒋，要打倒蒋就不能抓住民众，要抓住民众即无由倒蒋，故我国根本困难，即在于此。”

敌续谓：“然为贯彻目的起见，实有争取支那民族之必要。而争取民众，尤有赖于彼等之心服及协力。我宣抚班之活动，虽颇值注目，但亦仅系军事行动之侧面补助，华北之新民会，其本质乃教化团体，尤不足以担负政治斗争之重任。至于北京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因尚无民众基础，故其合流问题，并不重要。即或成统一政府，亦无多大意义。最重要者，乃政府之民众基础。有民众基础，则南北二政府自不难合流。为此，新政府之结成，实为目下之紧急任务，而新政党之纲领，应以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为旗帜，新政党之任务，应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实现。或曰：敌人（指国民政府——笔者注）之旗帜与我相同，难免混淆不清。但吾人可告以彼等以一面对日抗战，一面实行三民主义为口号，而吾人则以一面与日提携，一面建设三民主义相号召。新政党果能成立，支那民众果能争取得到，则事变得最后解决，南北政府亦自能统一，而抗日政权亦将失其立场，为新政党所吸收。”（引

文均见松本镇一所著“争取支那民族大众之问题”）

敌国最近新年号杂志中，亦有同样新阴谋之泄漏。杉浦晴夫在其所著“日本满洲支那——东亚联盟之诸国家”之长文中，亦谓新中国之政治，“应结成新组织体，活用中国国民所有国民党组织之经验，及孙文大亚细亚主义之思想”。

最近我华北将领在“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估计”之一文中，曾有“日寇最近更无耻的提出什么‘打回祖国去’‘实现孙总理亚细亚主义’之类的口号”之具体报告。吾人提笔至此，回想首都沦陷当时，敌将松井亲自中山陵献花祭墓，武汉撤退后，报载敌对总理遗铜象特加保存等等，可知敌早已布下剽窃三民主义之伏线矣。

（以上均见邵毓麟：«打击暴敌剽窃三民主义之新阴谋»，1939年1月23日«大公报»）

日本的积极诱降政策

汪兆铭之流的响应，是在敌寇预期之内的。所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读卖新闻”对近卫声明这样称赞道：特别是那些顾念东亚的将来的忧国具眼之士，不问地域之南北，与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声明相呼应，共同携手，向此伟业的达成迈进的机运顿已酿成之秋，我国政府将中、日国交调整之根本方针向中外阐明，诚可谓机宜之措置。”敌人的和平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个藏着利刃的原则。在武汉失守之前，敌人期待我国的统一战线将会因武汉的陷落而分裂。但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由中共六中全会的决议，衡山军事会议的决定，游击战术训练学校的设立等等，证明国共的合作反而加强，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这桩事实。……在第二期抗战开始后，敌人除了命令驻华各特务机关，从分化中国统一战线找寻和平的机会之外，还希冀以近卫声明那样的花言巧语，“一面离间蒋介石将军共产党的感情，一面挑起那些右派的爱好和平的心理。”（伦敦“太晤士报”社论）不管汪兆铭和附和他的德、意路线者，怎样把最近由敌人的门户关闭行动所激起的英、美态度的硬化，和具体的表现这事实的英、美借款，滇缅公路打通，作过低的估计，但在窘境中的敌人，不能不把这种新的国际形势加以正视或重视，他的嘴虽然还是强硬刁蛮（如对英、美的抗议的复谍，和有田谈话）。……东京“国民新闻”在评汪兆铭的行动的评论上，做了承认我国抗日统一战线加强之外，也不能不说：“苏联现已积极化，英、美、法动摇投机，不谅解日本真意，它们的局部利益会使它们的感情的行动带危险性，战争前途殊为黯淡。”针对着这样的国际形势，近卫声明想以威吓与欺骗并用的方法，来阻止英、美援华政策的继续。甚至想使英、美等国以对付捷克的压力，施于我国。近卫声明中重复有田谈话的“治外法权撤废”和“租界返还”的话，对中国是一种钓饵，对英、美却是一种威吓。同时，他声明“日本无意在中国作经济的独占，亦不要求中国限制那些理解新东亚的第三国的利益。”又强调“内蒙特殊防共区域”，以及“日本在华北和内蒙的资源开发上的特殊优越地位”，而不提华中、华南。这显然是投给英、美特别是英国的一种甘饵。不过，事实上已采用门户关闭的日寇，无论怎样饰词欺骗，已无法取信于英、美。近卫声明的自相矛盾，与以前敌政府的表示的互相矛盾，更显出破绽。所以向来主张对日妥协的伦敦“太晤士报”，虽也注意到日本要求独占的范围只限于华北和满洲两地，但仍不能说：“假如我们过信近卫所言，我们却会变成笨伯。前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英国致日本的通谍，更证明近卫声明之枉用功夫。

（思慕：«由近卫声明到汪兆铭的‹建议›» «世界知识»9卷3期，1939年3月16日出版）

敌人的新策略——政治与军事、经济与武力、东方与西方的有机配合

日本最初的吞并中国的战略计划，是政治侵略与军事侵略并进，首先确占华北五省，然后逐步蚕食兼并。……但这个计划在一九三七年底……已完全失败了。第二次的计划，是运用极大兵力，击破中国的军事主力，摧毁国民政府的政权，主要的以武力征服全中国。第三次的全盘战略计划，大体上原则有三：（一）政略与战略的有机配合。即一方面积极勾引所谓中国的"名望人物"，组织伪"中央政权"，稳定后方。别方面，移转自己的精锐兵力，去打击中国余下的中枢要害。（二）经济侵略与武力侵略的有机配合。即一方面积极榨取"占领区"的资源，补充自己日趋衰竭的经济力。别方面，利用区内的中国的广大物力、人力、打中国人自己。以上两点，都是"以华制华"的具体化。（三）是日本单独的对华侵略与法西斯集团的国际侵略的有机配合。即日本一方面继续侵略中国，别方面努力使这进攻动作与目前和今后法西斯德、意轴心日益积极压迫英、法的动作相呼应。从整个上看来，日本这新计划，确比前此一年半的都毒辣，同时它更带一点真正应付持久战的性质，比较过去专打如意算盘，速战速决，盲目瞎撞，确实高明一点。

（《日本新的战略计划》、1939年2月7日《导报》）

远东慕尼黑的极大危险

日本军阀虽狂吠着称已完成对中国"进行长期战争的计划"，但他无时无刻不想与中国言和。……眼前日阀虽口头声明绝不参加解决中国问题的国际会议，然关于这种会议的接洽，确实在暗地进行中。日本迄今未答复英、美、法的照会，主要原因即在此。因此 日军在此时之进攻海南岛，自更含有在将来可能的国际会议造成既成事实的作用。可以预料到这样的会议如果真正出现，日本一定会参加，而它的条件则主要的在北保有内蒙，在南保有海南岛，以便将来进一步膨胀的切实根据地。至于其他被侵入各省，则它或将在"撤兵""门户开放"等问题上表面让步，只要中国能与他"亲善"、"经济合作"、"共同防共"。一方面，他正在实事求是，努力加强"地方政权"，组织所谓"江汉政府"之类。别方面，他在进行更大规模含有国际性的阴谋。这阴谋的主要企图，是压迫和诱骗英、法两国来用国际会议的形式（公开的或秘密的）强迫中国与日本妥协，虽然日本表面上曾声明不愿第三国解决中、日冲突。在这里，它同时用两种手段：北面对苏联挑衅，向东四省增兵，预备在三月十五日（一九三九）渔业拍卖问题发生公开冲突时，对苏联至少象张姑峰那样来一下，借此对英、法表示它已实行"反共"，让英、法好劝中国讲和。南面，进攻海南岛，甚至或进一步在粤南、钦州、防城等与安南交界的地方登陆一下。强力威胁英、法，特别法国，叫它们压迫中国接受和议。……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将帮忙替它向张伯伦和达拉第做一番功夫。……关于汪精卫，日本原是不愿意他走出重庆的，但那懦夫已经走出，自无法挽回，可是日本决不要他跑到南京或北平当公开汉奸，变得和王克敏、梁鸿志一样。日本要把他留在南方（最好是在香港，但在河内亦无不可）做下列三件工作：（一）与留在重庆的替身通声气传命令；（二）阴谋

勾结华南的一部分将领；（三）如有可能，更与法国的投降主义者勾结。认为汪精卫完事大吉，是不对的，他将来还可以起极恶劣的作用。

（《日本的新阴谋》，1939年2月17日《导报》）

四月十二日平沼演说表示日本灭亡中国的基本方针是不变的

四月十二日平沼在精神大会中讲演，谓日本继续前进，目的有三：（一）推倒国民党政府；（二）大陆之发展；（三）国家资源之补充。

（1939年4月12日同盟电）

四月十二日小矶谓解决中日问题将采最迅速有效办法

四月十二日小矶拓相向记者谈称："平沼内阁之使命，在于解决中、日事件，将采取最迅速最有效之办法以遂行之，现已拟定具体计划，但此事关系其他许多问题，困难甚多。"

（1939年4月20日同盟电）

五月六日有田谓日本与大陆同生死

五月六日，有田发表外交演说，其要点为：（一）日本排除一切困难，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二）日本无意完全排除外国利益，在无军事行动之必要时，该地即可恢复以前状态；（三）日本外交置重于反对共产国际之破坏政策，将使防共协定更加强化；（四）日本与大陆有同生死之关系；（五）日本要领导中国实现东亚永久和平之伟大理想；（六）为以上目的，日本须发挥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之力量。

（1939年5月6日同盟电）

〔附〕武汉失守后英美等国的诱降阴谋和国民党酝酿投降的若干资料

中国问题研究会为非官方之机关，顷发表声明书，谓目前中日问题之最大危机所在，则为西方各国友人吁请中国接受和平，因和平固系日本所迫切期望者也。现惟有一事足以击

败中国，即西方各国之不断敦请中国议和，此层英美两国政府之举动为尤然。要知自武汉失陷以后，中国从此可不致受重大牺牲，反之，日本则因卷入漩涡太深，无力继续作战到底，故极盼和平。英国固定之政策，为以任何代价维持和平，故英国或有劝降中国议和之可能。美国政府亦渴望国际间一律能维持和平，故大致将支持英国之主张。且爱好“和平”之人士，亦势将跃然而起，一致呼吁和平，以为与其听任战事延长，则不如在任何情形下维持和平，此以教育人士为尤然。在此情形下，如中国稍一踌躇，接受此虚伪之和平，则就中国之立场论，就世界正义和平论，中日战争结果之不如人意，当无过于此者云。

（中央社华盛顿1938年12月24日合众社电《第二期抗战与汪精卫事件》西安行营政治部印 1939 年 1 月，转自《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

张伯伦已经表示了将来要参加“远东建设”（虽然他事后加了注解，说不是参加日本的“远东建设”，但这不过是维持目前态度的空话，英国自食其言的事是不少的），同时英国内部金融资本家之急于要想与日本妥协以共占中国的利益，更是彰明较著的事实。它们拿准了日本没钱，必需要他们的帮助，有这一点横在心里，便放弃一点目前长江利益是无关的。这一层，英国某政治家已经明白说过：“英国只要日本能接近民主国，便在长江方面受点损失与日妥协都可以。”

英国一方面争长江，另方面又在估计和研究西南的利益。未曾败北先打退步算盘，这是英国的老办法。英国关于西南矿业各产的研究报告越详细，越积极，日本就越知道英国没有决心在长江争。日本压得紧一步，英国的退让就早日实现一步。

（上海导报1938年12月 5 日社评，转自《“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

英大使卡尔曾于二十八年四月间由沪到渝，当时舆论，均指其与劝中国当局与日寇议和（即劝中国投降）有关。卡尔于二十七年冬天也到重庆，据日本人说：他曾“和蒋委员长会谈七次，并历访中国政府要人”。那次离开重庆到香港，曾对日本人表示过：“假使日本和中国两方面都能自动地接近，那时英国很愿作一个调停者。”那个日本人不久即在日本“国际知识”杂志三月号上公开说，英国不能严守中立，“英国既然不能严守中立，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居中斡旋了。这就是说英国在中日两国之间自己出任调停来保护英国的权利，并且在可能的场合想一个伸张英国权利的方法，这种办法是否可能呢？我想英国也曾十分的考虑过了。迄今直接间接的英国也几次的试验过。南京失陷后驻华德大使陶德曼出头调停时，背后多少也有英国的关系。此外去年十一月间的近卫克莱琪会谈时，虽然没有公开的谈判调停，但里面却多少有些关联。卡尔大使在重庆时，和蒋委员长的七次会谈中，大概也屡次谈到调停问题吧”？该日本人并这样断定：我“以为时机一到，英国就有出马的意思，不过目前时机尚未成熟罢了。”（以上参考日本楠山义太郎著，平子译：“国际知识及评论”三月号东京“英大使卡尔论”，“时与潮”三卷六期，二十八年五月一日）这自然是从卡尔那里得到的暗示。卡尔此次再到重庆，引起了一时舆论的警惕，这恰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他带来的，恰是诱降的最大危险性。

（摘自《“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

举世瞩目的英日谈判，进行了很久，终于在上月二十五日开始达到令人痛恨的地步。这就是英国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理人——张伯伦竟宣布英国政府再度向日本投降退让，而与敌寇

成立了初步的协议。这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英政府完全承认目前中国之实际局势，而“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区内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需要”，同时“知悉凡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为了这种“知悉”，英政府则采取避免“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与措置。

无疑的，英日这一协议的成立，赤裸裸地暴露了张伯伦的狡猾无耻，同时它是放任侵略纵容战争的又一罪恶。它不仅违背了英国历次在国联会上对中国担保之条约义务，而且违背了英国人民的和平利益，及人类的正义和公理。

日本法西斯之反英运动，是真正反对英国人民，反对英国舆论，排斥英国在华之一切利益，日本用这些威胁的手段，迫使张伯伦在远东迅速重演他原有的“慕尼黑”老把戏，同时迫使英国由“援华制日”，而彻底的转变到“援日制华”的道路上。果然，日本的这种阴谋，由于张伯伦的独断独行，违背了英国人民的意志，而订立了英日协议的初步协定。

（1939年8月11日《新中华报》）

1939年2月9日，路透社重庆电称：中国官员昨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中日问题将由列强以压力加诸中日两国解决之，并建议‘维持中国领土完整，中国尊重日本在华之条约权利’，并说，‘讨共问题，将成为一争点，此一错综事件，至今未获妥善之解决方法’。”（注：十一日上海‘导报’社论对‘中国官员谈话’评称：“今天中国之所以继续抗战，而不能造成远东慕尼黑前途，完全是为了‘讨共问题’无法解决。如其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可接受日本的条件而‘媾和’了！”）

据美联社纽约五日电称：胡适大使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讲说：“中国自广州汉口陷落后，曾向日本作非正式之和议建议，但因日方所提条件，在中国刁难接受，故决计继续抗战”。

（上海导报1938年12月7日）

路透社纽约七日电称：驻美大使胡适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说，称：“汉口广州失陷后，许多华人均感沮丧，曾有人想承允对吾人提出之无论何种和平，但并无中国人民所可接受之和平机运”。

（上海导报，1938年12月10日社论，均转自《“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

1939年9月28日，重庆外交部长王宠惠对美国合众社远东部总经理毛勒士发表谈话称：“中国自开战以来，从未拒绝和平。”毛问：“倘第三国出来调停，中国有何意见？”王答：“只要合乎我所说的光荣和平的条件，中国无不乐于接受，尤其希望爱好和平的国家如美国能促成调停。”王并请毛务将此意告诉美国。同日，上海日军发言人称：中国在外交上的运用向有三个方针：一、引诱第三国与日本交战；二、希望第三国帮助中国抗战；三、引诱第三国调解促成和平。自欧战爆发，第一、二方针无法应用，故有王宠惠的谈话。接着，张群、魏道明等等，纷纷赴香港作和平的试探。

（摘自《从七七到八一五》一书）

据十月一日香港“大公报”所载重庆电，对此事有如下的说明：“王外长谈话谓，美国于此时机，对日说话，最为适宜，并未指明希望美国调解，经合众社将其语气加重，渲染过甚，致引起各方误会。实则，即王氏原语，此间亦认为不宜，大致将有所解释”。

（摘自《“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

重庆十六日美联社电：美联社记者访问行政院长孔祥熙，以中日有无媾和之可能为问，孔院长答称："问题之重心，不在中日能否媾和，而在日本能否放弃其对华之侵略政策。全世界都晓得中国是爱好和平之国家，中国今日抗战，其目的不外系为本身争取生存，为世界保全秩序，倘日本能放弃其征服中国之迷梦，则和平自然回复。中国所求之和平，为荣誉的、公平的及永久的，此种和平，不但关乎中国福利，也与"九国公约"之签约国，所关甚大。

美国欲恢复远东之和平及保护远东之权益，固不必使用武力，只要美国稍为露出以武装干涉远东之意向，已足使日本惶惧而有余。反之，倘美国竟露出绝无保障远东权益之意念，则日本必将肆分破坏美国在远东之权利。美国远东权益之被日本侵害者愈多，则日本在远东之地位愈见强固。

你们伟大的罗斯福总统，曾明白宣示其本人之政策，主张召开国际会议，以解决中日之纠纷，以恢复远东之秩序，足见你们之行政当局，已经承认：欲求保护美国之利益，则恢复远东之和平，实为必要，而和平之恢复，尤应在日本势力未丰之前为之。倘待至日本势力已能威胁美国时，则为时已晚矣。

（1939年10月17日香港《大公报》，转自《"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

〔附〕汪精卫公开投敌致重庆政府的艳电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钧鉴：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

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义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附〕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

张　君　劢

泽东先生惠鉴：

顷读先生六中全会报告书，判析抗战情势，至为详尽，且抱定长期作战政策，决心尤为坚定，佩仰无已。窃以为战事胜败，为民族之存亡，非独一党一派之利害。彼日人先以兵力占吾领土，继则组织伪政府以代之。夫政府者行使国家最高权力者也，此而可以由敌代为指定，何异乎中国之为未成年者而须由监护人代行使其权利，彻底言之，不啻彼自居于上国，而以中国为被保护国。此而可以容忍则更有何事不可容忍。故我以为中华民国应继续作战而不可以言和者，以其视吾国为可由彼处置之一片土地，而不视为平等独立之国家故也。日人所提条件，有时出于近卫，有时出于坂垣，要不外二端，一曰国民政府改组，二曰与伪政府合流。意即在反对蒋先生，此两条果有人起而接受之者，则国民政府不成其为国民政府，降而与汉奸为伍矣。日人既已提此二条，其心目中已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更有何和议之可

言，在我更何从而有妥协之可能。惟其然也，今后之国策，除国内团结以图作战之持久外，别无他途。虽然，国内之团结如何而后可以永保，不能不惟先生与所率领之共产党是望矣。第一，号为近代国家以统一为特征，尤贵乎军事权之统一，英美俄法等，何偿一国以内而有两种军队，诚以军队之教练与任命，必须出于一源，而后行动乃能一致。而先生文中曾有下列语句："国共两党都有军队，这是特殊历史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由于有两党的军队，使得抗日战争中两党克尽分工合作的最善责任。互相观摩激励的好处，也更多了"。依吾人所见，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如以资本主义灌输于军队中，则彼等遇国内之信社会主义者将起而压迫之，反是者如以社会主义灌输于军队中则彼等遇见国内之资本主义者将起而推翻之。可见军队惟有属于国家，不可属于一党。目前之中央军不可目为党军，且信奉三民主义，未见有何特殊之政治路线，希望将来走上隶属于国家下之途径，当不甚远。先生所率之军队名曰国民革命军，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此所以增进全国之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行其时者一也。第二，各国之政党，从无有占领一特区以行特殊政策者，以一国之内惟有一种法律，一种行政系统，乃能成为现代国家。是稍有特殊化者则如爱尔兰之于英，以其本为被压迫者乃争取独立以得之者也。其次为少数民族，如昔日德意志民族之处于捷克国中。今吾国号为统一，先生等亦以拥护国民政府自号于国中，而今则特区之内，俨然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税制，自立学校。若国中凡组织政党者，皆起而效法先生等之所为，则中国将分为若干政党之若干行政区，而国家非反于封建割据之局不止矣。先生等与其同志以打破割据相号召，更望取消特区之制，以增进全国之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者二也。复次所欲与公言者，则为共产党之理论。共产党之特点与其所以异于他党者，在其阶级性，在其认定以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之出路。公等昔年所以特注意于无产者，且标土地革命之说者，即在于此，此马克思之学说，而列宁从而实现之者也。乃公等社会革命工作正在进行中，忽而有"九一八"之巨变。于是先生等悟阶级斗争之不适于中国，转而标出民族战争之说。此种转变，诚为国家之大事，应表而出之者也。然民族斗争云者以全体人民为主体，不应更有阶级之成见。至于三民主义，本以"民族"为出发点，与马克思之视阶级为历史支配者迥乎不同。而先生之报告，乃有下列之语："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自此段文字观之，似乎信奉三民主义者，即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二者之间，可以画一个等号。此种说法，不独使国人对于三民主义的内容，更加糊涂，即对于马克思主义，亦令人有迷离惝恍之感。此种名辞之意义扩张，在先生文字中之后段如"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云：亦事同一律。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是，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此所以促进全国之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者三也。抑吾人所以为此言者，皆根据近代立国之常轨而言，必如此而后抗战乃胜，建国乃成，谅高明定能鉴察。盖国家遭此大难，其存其亡，间不容发，内部多一分诚意，即抗战增一分实力。如公所谓动员民众与政治民主化云云，非各方诚信既孚，决无实现之望。苟在蒋先生领导之下，而别有一党焉，自有党军，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则先生所提出之"长期合作方式中之民族联盟"如何而有实现之可能乎？目前之障碍，既在此三点，应谋所以消除之，乃能达于真正之团结。吾辈既存心于御外敌保祖国而念念不忘者为国家至上之一义，则何必沾沾于一

党一派之利益而不肯抛弃之乎？吾人读先生报告以光明前途属望于国中各党，因此不敢自安缄默，聊奉本先生所谓“互相规过是朋友间美德”之语，而竭诚言之，倘蒙采纳，则精诚团结更进于今日，而一切鼓起民众以共趋一的之效自见矣。非然者，仍今日旧状而不变，则精力之消耗于猜疑与磨擦中者，不知几何，而天下后世必以抗战之失败归罪于今日之党争有断然矣。先生等近年爱民族爱国家之心为有目所共睹，若能更进一步而图之，岂独抗战之幸，中华民族万年不拔之基，亦在是矣。

专此敬祝为国努力

（原载《再生》10期，1938年12月16日出版）

〔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

一　绪　论

抗战迄今，时逾年半，赖我全国团结之固，将士牺牲之勇，摧挫敌寇之势焰，消耗敌军之力量，国誉增高，举世刮目。然二期抗战今已开始，来日方长，所需于吾国民之淬历奋斗以期克服之艰难，较之前期亦日见其扩大。敌人今日，已知军事力量不足以屈服吾人而达其速决之目的，故其最近计划，乃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吾人之意志，威胁吾人之精神。吾人熟察吾国历史上外患之深，皆坐朝野士大夫精神上为敌人所慑服，致不能发挥吾民族雄厚之力量，如宋如明，皆为殷鉴。则今日之所宜致力者，尤当注重于精神之振作与集中，质言之，前期抗战，军事与精神并重；而第二期即后期之抗战，则精神尤重于军事。非提高吾全国国民坚强不屈之精神，不足以克服艰危而打破敌人精神致胜之毒计。吾人回抚十八阅月以来奋斗之经过，而检讨其缺失，则物质条件之欠缺固甚明显，而精神条件之未备尤居首要，现代战争为全民动员之战争，故不仅应动员国内一切之物质与人力，亦必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而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以充实抗战之国力，不仅在于发动，而尤贵于组织；必以有组织之精神，发挥有组织之人力，利用有组织之物质，方足以适应国家当前之需要。且此次抗战之意义，不仅限于排除暴敌之侵略，而尤在于努力抗战之中，树立战后建国之永久基础，其任务之重，使命之大，在吾国历史上将为空前绝后之无上艰辛的一役。反观今日社会，则基础之团结虽立，而精神之统一未臻，忠勇奋发之表现虽所在多有，而颓唐散漫之状态，亦同时并存，组织之懈弛，基础之薄弱，如是之国民精神，何堪负荷国族兴亡之巨任！鉴往察来，不能不认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实施，为今日当务之急也。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者，自其字义言之，则在个人为集中其一切意识思维智慧与精神力量于一个方向，而提高使用之，在国民全体为集中一切年龄职业思想生活各个不同之国民的精神力量于一个目标，而共同鼓舞以增进

之，整齐调节以发挥之，确定组织之中心，以增强发挥之效率者也。然精神力量之所由表现为道德，而其所由发挥则必归着于信仰。古人有言："成于一败于二三"。凡事皆然，况在军事，况在吾国民处此存亡绝续争死生于呼吸之战时？是以就今日中国而言国民精神总动员，则其涵义应为集结全国国民之精神于简单共同之目标，使全国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据同一的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此所陈述，似极平凡，然中华民之起死回生必由斯道，吾人如确能举国一致，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则任何艰巨皆可负担，任何困难皆可克服，而最后胜利亦事属必然，反之，若国民对此不能体会而力行，或体会不真切，力行不一致，则国族危机亦将增重，制胜克敌，将益艰难，故抗战前途，国族民运，成败安危，实均系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之一举。兹特阐其要义，分节论列，愿吾国民一致接受而力行之。

二　共同目标

国民精神总动员，有国民人人所易知易行之简单而明显之三个共同目标，为国民精神所当集结者，当首先标揭之，即(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与(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是也。

甲、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吾国民今日无问知愚，应皆痛切感觉在民族生存受尽威胁之情形下，任何个人与其事业均未由保其安全，敌人之欲消灭我民族意识，拆散我民族团结，始则脔切而分割之，继必奴辱而澌灭之，其野心毒计，已日益明显，故巩固民族生存应先于一切，然民族生活之最高体系为国家，无国家则民族生活不能维持与发展，失国之民族如犹太人受人宰割何等悲惨，则巩固国家尤应先于一切，是以吾人今日必须认定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国家民族之利益应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

乙、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在此解决国族存亡之军事期中，国家民族之最大利益为军事利益，是以国民一切之思想行动，均应绝对受国家民族军事利益之支配。为达成军事之利益，为增进军事之利益，国家民族得要求国民为一切之牺牲，而为国民者，自亦必自动踊跃而贡献一切之所有，故曰军事第一。军事第一之唯一目的在求得胜利，则国民务须确立必胜之信念，达成最后胜利之目的，且竭其全部之知能与全部之时间精力，以求取军事之胜利。在此时期，应无所谓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与个人之屈伸与荣辱，唯求得军事之胜利乃吾国民人人共享之光荣，惟不能获得胜利为人人最大之耻辱，一切功罪，一切是非，胥当以此为标准，故又曰胜利第一。

丙、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吾国今当国家民族紧急自卫之时，凡为国民，所有意志，均当集中，所有力量，均当集中。有理智有良心之国民，此时除殚思竭力于如何巩护国家求取胜利之外，应无暇有其他思维，亦必不暇有其他行动。而就国家民族以言，则亦必要求国民全体的思想，绝对统一集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两义之下，不容其分歧及怀疑，不容作其他

之空想空论，更必须动员一切职业一切部门之国民，均专心一志为国家民族军事利益而奋斗，于艰苦之中，各竭其能，各尽其职，以改进一切，创造一切，以贯彻长期的军事计划，同时达到建国工作之完成，故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以上三义，意至简明，事极易举，国民对此必乐于接受，必一致接受，请进而论述吾人所要求确立之同一道德及坚定之同一信仰的内容。

三　救国之道德

今日中国之需要，为振衰起敝，攘寇患以救国家，故今日所需于吾国民全体力求实践之同一道德，厥为救国之道德，而此救国之道德，实为吾先民所固有，亦即总理所倡导之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国民对此八德，认识或有深浅，但中国民族之昔日绵延光大，实赖有此道德，今日之衰弱式微，实由丧此道德，故非要求吾国民一致确立此救国道德不可。八德之中，最根本者为忠孝，唯忠与孝实中华民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留遗于后代子孙之至宝。今当国家危急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请先言孝道，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之所谓孝，不唯尽孝于其亲，亦重在尽孝于其祖，故以不祀无后为最大之罪恶，此就人人之直系祖先而言之也。至总理讲民族主义，更将中国固有之孝道阐扬光大而及于国族，由亲亲之义而推及于同国同族之相保，由追远之义而晓然于同国同族之相关，是以吾人今日行孝之对象，应为整个之民族，应求不辱吾民族共同之祖先，吾人应时刻自念吾人数百代共同祖先所辛苦经营而遗留于吾人之锦绣河山，如竟丧失于吾人之手，则吾人上何以对先民，下何以对共同之种姓，他罪有可赎，不孝无可赎，吾同胞明乎此义，则牺牲一己以维护民族之生存，自必引为人人最高之责任。其次所谓忠者，第一须忠于国家，忠于国家实即所以保我民族之生存与发展，就中国今日而言，必须人人以拥护国家独立为神圣的责任，而后国家乃有救，国家者其绝对性者也。欲卫护国家之自由与独立，其先决条件则为军令政令之绝对统一，今当暴敌以绝大武力摧毁我国家，并于各占领区域制造伪组织，企图脔割我国家之时，凡我国民，尤必一致忠于国家，以加强国家自卫之力量，忠于职分，忠于纪律，忠于法令，万不可稍萌涣散或违背法纪，以减弱我国家之权威，吾国人诚能人人对民族尽孝，对国家尽忠，则抗战建国之使命，即有确实负荷之人，至于仁爱信义和平诸德，皆由忠孝仁义演进而来，仁爱为孝道之扩展，信义为忠道之延长，和平主义实出于同源，仁爱则不致相残而和平实由于信义，吾人今日能推仁爱之心，则必不坐视同胞之被僇辱被残害，而必有同仇敌忾之勇，推信义之心则必能负责尽职，不欺不贰以造成一致赴难之团结，推吾数千年爱好和平之固有理想，则必乐于为抵抗暴力与求取永久和平而奋斗；且必率先为勇迈无前之奋斗，凡此救国道德，当其发挥功用，即无异于坚甲利兵，质言之，此实民族精神的武器，而国民人人当以武装自身，以驱除暴敌，开创吾国家光辉之新历史者也。

四　建国之信仰

夫吾人今日所以要求我国民趋集同一之方向确立同一之道德不辞艰苦而奋斗者，其最后目的为何？曰：在完成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前已言之，此次抗战意义，不仅在却敌，而尤在确立建国之基础。故虽在战时，必当一刻不忘建国，盖唯具有一致确立的建国方针，而以全力推进之，始能充分发挥御侮之力量，以求取胜利，亦必国民全体皆能确立建国之信仰，

而后国民之精神力量与救国道德，乃有确实之寄托以为积极之发挥。故救国与建国，义本一贯，事无二致。中国建国之最高原则，厥为总理孙先生所手创之三民主义，此固为全国同胞所公认，今日国家存亡，所争一间，抗战而胜，则建国必成，民族即得永久之乐利。吾国民于吾建国原则之三民主义，必须更巩固其信仰，共同奋斗以求其实现。盖三民主义之目的，在促成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吾人理想中所欲建设之国家，外则为独立自由平等；内则为民有、民治、民享，此人人心理之所同，而三民主义即为达成此国家建设唯一无二之法门。今当战时，人心振奋，趋向更见一致，救国建国，正宜兼程并进。以言乎民族主义，则抵抗外力侵略，以求得民族之独立自由与平等，固为今日抗战唯一之目的，而国内各民族携手共肩抗敌的事业，更足以增进整个民族之团结，为博大的中华民国奠其坚实之基础。以言乎民权主义，则战时国民政治意识为普及，既足以加速培养真正之民权，而战时政府职权之集中调整，更足以造成最高度效率之政治。以言乎民生主义，则战时增加生产管制消费之努力，即所以树立民生均给之始基，而国家根据民生主义以实施战时经济政策之结果，必使战后公私产业均有平衡合理之发展，而最大多数人民必以战时之生活，战时之行动，战时之精神努力生产努力创造，因以获得进步与繁荣。循此以进，三民主义的新国家之建立，即在抗战获得光荣的胜利之时，而中国永远安乐之国基亦将于是乎克奠。前途光明，历历在望，此正吾国民所宜悬为鹄的一致兴奋共同努力以赴之，而其道则自吾国民一致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始。

五　精神之改造

国民所必须确立之同一道德同一信仰，既已阐明矣，于是吾人乃进而探讨何者为适合于今日国家民族军事利益而足以达成抗战建国目的之健全的精神？何者为违反此义之不健全的精神？从而分别扶植或淘汰之，以造成共同一致之良好环境，而彻底改造我国民之精神，类而举之则有下列之数项。

甲、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

生活者，精神之根本。无合理之生活，即无健全之精神。是以沉溺于声色货利之醉生梦死的生活，必须加以彻底改正，而实行新生活之信条，否则不仅个人之精耗神散，自误误国，且必致相习成分，使整个社会顿呈亡国现象，而招致世界之鄙视与寇仇之深入，不唯有害于国家，尤必影响于军事。

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

次于醉生梦死之生活而为国民精神之蟊贼者，厥为消沉颓废之风气。此风气之存在，实由于心理与生理两方面之原因所造成。在心理方面，由于民族自信心，与个人自强心之缺乏，不谓民族无复兴之望，即视民族复兴之事业与己无关，此两种心理若不纠正，国民奋发蓬勃之朝气即无法养成；在生理方面，则运动、卫生、整齐、清洁、乃至早起之习惯，均须提倡与实行，然后能使国民精神充实，朝气焕发，以担当非常之革命事业。

丙　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

抗战中有一不可不注意之精神现象焉，即在前方之民众欠缺誓死复仇之决心；而在后方

之人员，多有避难就易之私图也。前一现象，足使敌人之顺民增多，而敌氛益张；后一现象，足使民族之战士减少，战意薄弱。究其动机，则皆由民族至上之观念不固，苟且偷生之习性犹存，欲纠正前一现象，在于阐明春秋大复仇主义，所谓“为国复仇虽百世可也”，使沦于失地之国民，永不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观念。纠正后一现象，在提倡“见危授命”之风气，表扬殉职死难之忠烈，更须严饬纲纪，昌明正义，使人人咸视规避职守，潜图安全，为莫大之耻辱，而后革命之精神乃能树立。

丁、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

只图保全个人之生命与财产，增长个人之名位与权利，而不顾民族全体之利害与存亡者，亦犹有兵权者之欲保存其实力与地盘，同一私的动机也。充此自私之心理必至私见高于一切，乃至个人名誉地位权利欲望之扩张与满足，必先于一切，推衍所及，必至牺牲民族利益，破坏抗战计划而后已。今当抗战剧烈存亡呼吸之际，而犹不自觉悟，岂唯不智，实亦不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目的下，此种痼习，必须排除，所当发扬舆论之权威，加以尽量之指正，务使尽祛私见，共输肝胆，而归于至公与至诚。

戊、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

抗战以来，全国之思想与言论，在根本上虽已形成统一。而枝叶上之分岐，仍所在多有，若任其杂然并存，势必导民志于分散，贻战事以不利。故必于吾人上述国家民族至上，军事胜利第一，意志力量集中之原则下，确立标准，分别纠正，俾统一之基础获得进一步之巩固。尤必积极疏导，造成共同之国论，俾吾国民与青年，在认识上对国家前途怀抱同一之理想，在行动上趋赴同一之目标，既以万众一心而克敌制胜，亦所以造成战后全国永久之团结，而免于纷岐与抵牾。此之目标，当根据当前事实需要与民族利益，为全国国民所义当接受亦乐于接受者。约而举之，则为：

(一)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

(二)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

(三)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

(四)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

一切思想言论。悉以此准绳。有违此义，则一体纠绳，共同摈绝。合乎此义，则多方奖进，务使由此基础，充实发展，蔚为风气。

如上五者，仅略举其大端，吾人欲达到国民精神之彻底改造，更须推而广之，首求国民精神之充实，次求国民精神之集中，而更求国民精神之革命化。所谓充实者，即使其蓬勃焕发，坚强贞固，有克服环境抵抗艰难之力量；所谓集中者，即求其密合团结，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以达于休戚利害绝对相共及永不离散之境地；所谓革命化者，即本于爱民族爱国家。至高无上的观念以献身于革命之事业，对内则矢忠于政府与主义，对外则抵抗民族之敌人，必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进而以此精神感化同胞，更进而以此精神战胜敌国。吾国民精神之改造，诚能达此三者之标准，则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目的，始可谓完成。

下略。

（原载《国民精神总动员正解》）

〔附〕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制定的几个反共反人民的机密文件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

（分别密令各省党政军高级长官）

甲　最高原则

一、关于共党问题之症结，目前不在陕北几个县，而在共党应有实践共赴国难宣言之诚意及服从中央命令、执行国家法令、实行三民主义、彻底取消其一切“特殊化”之行为与组织，而不自居于整个国家体制之外。

二、本党所希望共党者，为巩固统一，一致抗敌，争取国家之独立，民族之生存，其有违背国家民族之利益、破坏法令纪纲、妨碍抗日者，本党断不容许。

三、对于共党应根本打破利用观念，并彻底扫除恐怖心理，一本大公无私与人为善之精神，予以精诚感格，使共党向革命之道路前进，而不复把持割据，作非法之活动。

四、共党问题之处置，必须我全体同志，具备坚强之决心，随时警惕自励，坚守我革命之立场，断不可迁就退让，或有所姑息，否则适足以演成严重之局势。

五、吾人要求共党今后一切设施与行动必须合乎国家统一与独立为唯一原则。关于目前一切纠纷之解决，端在共党首先真诚恪守中央命令，执行国家法令，使事态平复，然后始可谋正当之解决。

六、吾人处置共党问题，完全根据我最高革命领袖持平的及理智的态度，以整个国家民族利益而为长期久远之谋划，决非狃于偏见，故事吹求，以激成共党之不安，此种至大至公之精诚，当为全体同志所必须深刻了解。

乙　施行通则

一、绝对立于主动领导地位，尽我执政政党之职责，予共党以严格之督导监察，使之自反自觉，共趋革命途径，绝非如国际两个国家之对立与合作方式。

二、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当以抗日为中心，始终坚持本党抗战建国纲领，以积极领导共党参加抗日，且尤当立于抗日之立场打击共党破坏抗日及取缔其妨碍抗日之行为。

三、与共党斗争要诀，厥在健全本身，惕励自我，由各自职务上奋发淬厉，努力于工作之竞赛，谋积极的实干苦干，而不仅作消极之防止取缔，顾有侵犯我革命职责者，必当予以严格之教训。

四、处置各地共党问题，我党政军步调必须完全协同一致，且特别着重层层负责与执法以绳，即凡共党违反法令与破坏统一等事件，各级均当依照法令，随时随地予以处分而纠正之。

五、以我执政党之立场，凡国内任何团体或个人，均应一律视为国民一分子，共党自亦决不能例外，故共党所有越轨举动，均当按法处置，但我人又应了解本党之伟大精神，厥在不畏强暴，不侮鳏寡，故对守法之共产党人，不可故事欺压。

丙 具体办法

一 目前极待解决之问题

一 陕甘宁边区问题

(1)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非法组织，非但破坏国家之统一与行政体制，实为分散力量妨碍抗战之最大障碍，绝对不能令其存在。

(2)划陕西之肤施、保安、安塞、延长、甘泉、靖边等六县为陕西省第二行政区，必要时将甘肃之庆阳、合水、环县之一部，划为一行政区隶属甘省府，专员及县长人选可准由十八集团军推荐，经省府核准转请任用。

如上项办法实行困难时，则就边区政府目前所实际占据之区域，成立陕北特种行政机构，直属陕西省政府管辖，其人选得由十八集团军提出一部分，经省府核准后转请任命。

(3)在上项区域内之一切行政，应切实遵照中央法令办理，不得有特殊状态之存在。

(4)(一)陕西之府谷、神木、榆林、横山、定边，(二)自横山经米脂、绥德、安定、清涧至延川，(三)自宁夏之盐池、豫旺经甘肃之庆阳、西峰镇、正宁、宁县，(四)自陕西之长武经栒邑、淳化、耀县、宜君、中部、洛川、鄜县至宜川。以上各区域，酌量加强军事力量，以维持地方之治安。

(5)划陕西之府谷、神木、榆林、横山、定边、米脂、绥德、安定、清涧、吴堡、葭县、延川为陕西第一行政区（专员公署改在榆林），宜川、洛川、鄜县、同官、宜君、中部、耀县、淳化、栒邑为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改设耀县）。

(6)十八集团军擅委之河防司令、警备司令、应明令撤消，另由我方派员充任河防司令，担任自宜川经延川、延长、清涧、绥德、吴堡、葭县、神木、府谷一带之河防任务。

(7)十八集团军之募补区，应明令撤消。

(8)陕省及甘省封锁线内，各区之行政专员及县长，应遴选本党干练忠勇之同志充任。

在此项区域内应切实维持地方自治，县集权于县长，区集权于专员。所有各区内之党政及保安武力，统归各该区专员节制指挥。

(9)各区除现在的武力外，应按中央编制，增编保安团队各两个，经费中央补助。

(10)各区保甲经费，由中央酌予补助。

二 对晋察冀边区问题

(1)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冀中、冀南两主任公署与国家整个行政体制不合，应遵令

撤消，改划行政专员区，冀中、冀南可照去年九月阎司令长官意见，各划四个行政区，直隶河北省政府，晋东北五台等十六县，原为山西第一行政区，可仍归旧辖。

（2）以上改划之各行政区专员人选，可由原边区行政委员刘奠基、胡仁奎二同志中遴选之。各县县长人选，分别考核，重予加委之。

（3）十八集团军所设立之所谓晋察绥军区及其分区，应即撤消，统由各该所隶战区司令长官部接收管辖，其所属游击部队，统归战区司令长官指挥调遣。

（4）选择若干重要据点，配备党政军力量，发展党务行政，训练青年干部，逐渐肃清反动势力。

（5）尽量发动地方人士及本党同志，在此边区内发展本党民众运动，树立抗日肃反力量，俾增强我华北抗战基础。

二　一般取缔办法

一　军事方面

（1）第十八集团军既经改编为国军，其军令、军政，应统一于中央。所有该军编制、补给等，均应遵照中央法令办理，不得有"特殊表现"及私行征募等情事。

（2）为统一指挥机关之名称，所有以前各路名称不属于战斗序列者，均经通令取消，第八路军名义亦经同时取消，不得再行沿用。

（3）国军之驻地视情况为转移，统由军委会或战区以命令规定之，十八集团军自应服从上级命令，不得要求划给区域。

（4）第十八集团军之战斗序列与游击区划分，统由军委会以命令行之，该军不得自由变更越出命令范围，凡经命令改入于另一战区者，应受该战区司令长官统一指挥。

（5）严禁十八集团军强提团枪或缴友军枪械及私编部队，私委名义，其已委之各部名称、番号，经报由军委会核准有案者，经费由战区统筹支配，严禁向地方征发与派款。

（6）陕北由清涧河以北之河防，改派其他国军接替。

（7）游击根据地之规定及当地政权之建立，统由该管战区司令长官协同战地党政委员会核定，其地方官吏之委派及赋税之征收，仍归各该隶省府办理。

（8）十八集团军政训工作，应照军委会政治部所颁布之宣传纲领及其他规定之政训工作办法行之。而政工人员之编制与人事，亦应依政治部命令行之。

（9）军委会为求与十八集团军密切联系起见，照各军前例，派联络参谋若干员，前往联络考查，该参谋等应适时呈出报告，以便指导、考核、纠正。

（10）十八集团军除在军委会行营及战区长官部所在地，经准设置办事处外，其未经军委会核准者，一律取缔，以杜流弊。

二　党政方面

（1）全国上下均应一致遵奉抗战建国纲领，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任何纠纷，皆当依照法令处理。

（2）共党在各地不得假借名义，为任何公开或秘密之组织及民众运动，如经发现，即勒令解散，并予以应得之处分。

（3）共党外围组织，如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工人救国会、农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应即严令取消，由中央指定机关接收训练。

（4）共产党员非经中央特许，绝对不准服务于各部队、机关及军事性之学校、交通及产业机构中，上述各部门尤应严格防范共党潜入活动，发展其秘密组织。

（5）个别共产党员在各地一般公私机关团体服务者，必须开列名单呈报中央，否则一经查觉，即以战时非法活动论罪。

（6）共党应即停止违反本党政策之种种宣传及共产主义思想之传播与该党党章决议宣言实际活动情形之公布，关于“统一战线”、“新阶段”、“拉丁化运动”、“新启蒙运动”、“民主政治问题”与“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宣传活动，即应取缔。

（7）共党如办有报章、杂志、书店或印刷所等，均应依法办理立案登记等手续，并遵照法令之规定，报章、杂志不得载有违禁之文字或广告，书店不得发售违禁之书籍刊物，违则即行封闭。其他报章杂志如刊载有共党色彩之非法文字，亦应同予取缔。至出版事业收归国有国营时，共党所办之报章、杂志、书店及印刷所等，则一律不许继续存在。

（8）对付共产党员之态度可分为两种，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则予以“事实上之教训”，以“严厉”对之，但对于思想不定之青年，则宜开诚感格，善为诱导，使之悔悟。

三　行政方面

（1）绝对否认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之组织，中央决定认此为地方问题，授意各该省政府自动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

（2）共党在华北游击区内组织之地方政权，应即令移交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

（3）教育与训练机关，必须绝对统一于中央，“陕北公学”与“抗大”应令停办，或归中央接收，至少其教员应由中央遣派，课程应请教部核定。

（4）任何地方不得建立违犯本党立场及中央法令之经济制度。

（5）根据重庆财政会议，战地省政府得发行以法币为基金之省钞及辅币（军用流通券），但各省发行之数量，应先呈准，不得滥印滥发，以防流弊。

三　积极防止办法

以上所述均偏于消极的取缔，惟今日之处置共党问题，决非仅消极所可奏效，尤贵乎本党自身之充实力量，健全发展，积极推进各项工作，以与其作积极之斗争，方克有济。故吾人欲求共党问题之圆满解决，与其处处只责备他人，不如事事求诸在我，而从本身努力。

一　党务方面

（一）关于一般的：

（1）积极加强并统一本党之民众运动，使各阶层民众，皆在本党领导之下，努力实行三民主义，以杜绝共党活动之机会。

（2）全国各级党政军机关，应尽量吸收优秀青年，予以训练，分配其工作（是项经费将由中央统筹办理）。

（3）健全本党基层组织，发展本党党员，使每保或每甲皆有本党党员之分布，以任领导

民众、防止共党活动之责。

（4）严厉统制出版事业，凡书店、报社、印刷所等，一律收归国有国营。

（5）大量印行本党各种宣传书籍、报纸、杂志等，广泛宣传，并充实文化驿站，普遍于全国各地，组织广泛的发行网，以利宣传。

（6）大批训练党部中下级干部，整饬党纪，健全各级组织机构。

（二）关于游击区的：

（1）配合军事环境与游击部队密切联系，在各游击区内选择若干有利地位，作为发展游击区党务之根据地，在每一根据地开办一规模完备之训练班，大量吸收游击区内之青年，施以训练，担任党的工作。

（2）在游击区根据地以外之各县，视环境之需要与可能，亦各举办相当规模之训练班，或流动训练班，就地训练青年。

（3）在邻近游击区，如豫西、豫北、陕北、皖南及冀察晋边境等处，选择若干重要地点，各举办规模较大之训练班，以吸收离乡青年。

上述各种训练班采分科训练方式，俾养成党的组织、训练、宣传、民运等各种有专长技能之人材。

（4）大量发行报纸及各种宣传刊物，并在各沦陷县份，建立普遍之秘密交通网，以供宣传品之传递。

（5）用各种不同方式不同名义以组织游击区内之民众。

二　行政方面

（1）改善地方行政机构，特别加强战区之地方行政干部，尽量选用贤能与青年，绝对不可利用贪污、土劣，作防止共党之工具。

（2）地方各级行政人员，对于处置共党问题，必须遵重当地党团之意见，并尽力协助党团，进行检举与肃反工作。

（3）地方各级行政官吏，非经中央特许，不得引用共党分子在机关或学校中服务，利用共党之心理，必须根本打破。

三　军事方面

（1）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往冀、鲁，俾加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共党之发展。

（2）加派有力部队开入陕北，或陕北就地编组军队，以树立本党在该区内之武力，保障党政工作之推进。

丁　方式与技术

一、中央党政军高级长官每月会商一次，研讨对共党问题之处置，地方党政军每月或一旬开联席会议一次，战地则由党政军委员会分会协同当地最高军事机关，随时协商或规定例会。

二、党政军各机关对付共党之态度，中央可示宽大，地方务须谨严，下级积极斗争，在

分工上，党部负斗争责任，政府处调和地位，军队则为后盾。

三、各级处置共党问题方式，在可能范围内，应尽量以命令行之。关于各项案件处置经过，必须随时详报中央备案。

四、制裁共党活动，应尽量运用民众力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须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

五、党政军各机关，应指定本党忠实同志专责办理关于共党之案件，以保持绝对机密性。

六、搜集各地共党活动资料，每半月汇编调查专报，密令各级有关机关，协同防止。

七、以组织打击组织，仍为对共党必要之方针，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均应加强本党党团及特种组织之活动，并使中央颁布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具体执行。

八、加强特务工作，以对付共党之间谍，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党组织。

九、利用共党内部派别矛盾与思想斗争，以分化其内部力量。

九、以一切有效办法，尽量取缔共党各地组织网，通讯网及其发行网。

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

查共产党在沦陷区之活动几较普通区为重视，为积极，以目前情势而论，大有失地愈多该党发展愈速之趋势。研其原因，一半由于日伪与本党之势力均多所不逮，一半即由于该党党政军在该区域内均能协同一致切实合作，故每至一地即如羼入无人之境，致令其组织活动日益坐大。本党对付之策，一方面惟有健全本党在沦陷区内之组织机构，使每个党员发挥牺牲奋斗之革命精神，然后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处处于实际工作中与对方竞争，扫除过去放任退避之病态；另方面即须尽量统一沦陷区内党政军之领导与指挥，使各方面工作均能密切联系，彻底合作，打破过去各自为政之现象，方克有济，兹将各项办法分述于左：

一　关于组织方面

（1）对现任各级党部重要人员应严格甄别，凡不能从事实际工作及逗留后方者予以裁撤，另选刻苦耐劳不惜牺牲之干练同志充任之。

（2）对留在沦陷区内之党员，于最短期内机密办理登记，恢复组织生活，切实予以领导。

（3）对留在沦陷区内之青年，应普遍吸收为新党员，加强本党之组织力量。

（4）由中央于后方各地大量征收沦陷区域流亡在外之党员，予以短期训练，派回沦陷区，在该区内党部领导之下从事工作。

（5）沦陷区各级党部应切实执行党的纪律，对不服从及不能保守秘密者，一律予以严格制裁。

二　关于宣传方面

（1）由中央经常编制宣传大纲，颁发各沦陷区党部，向民众宣传，以增进沦陷区民众对时局动态之了解，及对本党之信仰。

(2)对共产党各种歪曲宣传与恶意宣传，由沦陷区各级党随时随地向民众揭发其荒谬之点，俾免民众受其麻醉。

(3)共产党在沦陷区之各种不法行动，如强迫摊派所谓“合理负担”、收征民枪、残害忠良等，应随时随地搜集事实，向民众宣传，揭发其罪恶，使民众易于认识共产党之真面目，而免受其欺骗。

(4)宣传之方式，应酌量当地环境，采取下列各种方式，灵活运用之：

(甲)组织宣传队。

(乙)发行油印报纸刊物。

(丙)利用群众集会之处所经常派人讲演。

(丁)写贴壁报与标语。

(戊)个别口头宣传。

(5)宣传工作应与组织工作打成一片，凡属党员均应担负宣传之责，并应列为对党员工作考成之一。

(6)针对共产党之宣传，应随时注意技巧，避免正面冲突。

三　关于民运方面

(1)斟酌环境之需要，尽量组织各种民众团体，予以党的训练，切实领导工作，毋使自由散漫，而予共产党以可乘之机。

(2)于后方各地大量招收沦陷区流亡在外之青年，予以训练，组织回乡工作队或服务团等，派回沦陷区，在本党领导之下，从事工作，以增强本党之下层力量。

(3)对于地方原有之各种封建团体，应尽量派人参加，发生党团作用，以免为共党所利用。

(4)对共产党民众运动之发展，应采积极抵制手段，避免放弃与退让等消极办法。

四　关于特务方面

(1)策动沦陷区本党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

(2)策动本党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起党团作用，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

(3)策动全体党员，从事共产党活动防范之调查监视等工作，打破过去一般党员对共产党之放任态度。

(4)沦陷区各级党部，对于防范共产党工作，应列为重要工作之一。

(5)省市县党部以下之各级党部，亦应指定专人负责策划对共产党之调查工作。

(6)对共产党在沦陷区之各种活动情形及不轨事情，应经常收集材料，具报中央。

(7)共产党各种组织活动，应运用公开与秘密等方法及本党组织力量，予以打击与破坏，以阻止其发展。

五　关于其他方面

（1）为防范共产党工作能收实效起见，沦陷区之党政军组织，应保证密切联系，统一工作步骤，尽量避免各自为政之现象：

（甲）行政官吏应尽量由党员充任。

（乙）确定省政府主席及县长为该省县内党政军之领导人。

（丙）在本党领导下之沦陷区游击队，应由当地党部派遣忠实干练之党员，担任政治训练工作。

（丁）在行政机关及游击部队中之党员，应普遍建立党员小组谈话会。

（2）对八路军新四军之游击区域，由中央严格限制，不得任其发展。

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

甲　问题性质之认识

目前共党势力，虽以华北陕北为根据，然其活动范围，则普及各地，而尤以华中各游击区为甚；故对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自由活动之处置问题，实即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活动之处置问题，如处置得当，则共党自由活动之范围，或仅及于华北陕北，其他区域则无发展之余地；如处置失当，则第八路军将利用沦陷地方中央统治力量鞭长莫及之情势，扩大其自由行动之范围。结果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日本与共党相反相成，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

乙　共党在华北陕北活动之主要方式

一、自设边区政府，形同割据，破坏中央政制。

二、自委地方官吏，俨然一独立国家。

三、擅设征收机关，任意抽捐派款。

四、宣传共产主义，发展共党组织。

五、排除非共党之政治军事力量，甚至向敌军告密，不惜借刀杀人。

六、招编散匪，收缴民枪，乘机扩充其武力。

七、以一切可能手段，使中央所派党政人员，在共党势力范围内无丝毫活动余地。

八、控制有力部队于陕北，以巩固赤色中央根据地。

九、自设班所学校，诱惑流亡青年，训练军事政治干部。

十、派遣有力干部，打入非八路军系统内之军队中，秘密活动，尤注意拉拢中下级军官。

丙　共产党在各地（华北陕北在内）发展之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在矛盾环境之中生存发展，盖有十九年陇海路大规模之战争，而后共党得乘机进袭长沙，江西四次围剿时代，亦因粤闽军队不与中央军队协同，共党得以苟延残喘，抗战以来，共党利用政治经济各方面之矛盾，得有在各地活动之机会者亦以此耳。

二、共党绝对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绝对不讲信义，只求利用一时，此为共党一贯之手段，对于共党本无信义可言，苟有可以利用之机会，彼等必不顾一切，以发展其组织。

三、在中央系统之下，除军队之统一，已逐渐完成外，党政方面之矛盾百出，相互磨擦，且地方当局亦有标奇立异未能全合于中央法令者，本党内部既如此，又安能防止异党之乘机活动！

四、目前党政机关，充满暮气，负责人员大多利用腐化分子，以排斥青年，青年忿于封建旧势力之压迫，就不免误入歧途。

丁　处置华北陕北及各地共党活动之方法

一　基　本　方　针

（1）党内党外，一致遵奉抗战建国纲领，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任何纠纷均应决于领袖。

（2）唤醒党魂，提高党德，恢复党的自信，扫除恐惧共党之心理，健全本身，奋发努力，以工作的竞争，代替意气的斗争。

（3）以执政政党之地位，严格监督共党，绝对不许有破坏抗日及违反法令之幼稚行为，同时须绝对打破利用共党之心理，盖利用共党者，终必自取失败，为共党所害。

（4）在游击区内，以全力树立三民主义政权，凡地方党政人员，均不准擅离其工作地区，且应努力接近民众，加紧本党领导作用。

（5）对于思想不正之青年，各级负责同志均宜开诚感格、善为诱导，陶养既久，必然翻然觉悟，而愿为本党效力。

（6）改善地方行政机关，尽量选用贤能，尤须扶植青年干部，使为改进地方政治之基础，绝对不可以贪污土劣作防止共党工具。

二　具　体　办　法

（1）规定游击根据地之建立及其政治组织办法，使共党失去活动之凭借。

（2）积极发展游击区内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使青年不致为共党所诱惑利用。

（3）尽量收容青年，予以适当之组织训练，及正确之政治教育，由各部分大批收容，依照统一训练青年办法，分别实施，并集中分配任用，预定每年收容十万人，十年可完成国防人材百万计划。

（4）边区政府，事实上无法取消，然听其自生自灭，亦非良策，可由中央规定，凡游击区内事实需要而成立之临时特殊政治组织，应由主管战区司令长官管辖节制，而委派地方官

吏，及征收税款，尤应严格遵照中央法令。

(5)任何地方不得建立违反本党立场及中央法令之经济制度。

(6)游击区部队，根据重庆财政会议，得发行以法币为基金之军用流通券，但各部队发行之数量，应先行呈准，不得滥用滥发，以防流弊。

(7)训练干部之权，应绝对实行中央集权，任何军队及地方政府，除特许者外，一概不许自设班所学校，或类似机关，训练政治军事干部，本党直辖军队及地方政府，尤应以身作则，首先实行，以免共党借口。

(8)健全本党组织，整饬党纪，并尽量吸收农村优秀青年入党入团。

(9)现有县党部以下之党务干部，大多能力薄弱，腐化幼稚，应遴选已受严格训练之青年，充当各县党部干部。

(10)共党常利用左倾文化人以为共党外围，今后本党同志应努力文化运动，引导文化界入于正轨，并尽量编辑阐扬 总理主义及 总裁言论之刊物，同时健全发行机关，各地分区翻印，大量出版，以阻止共党思想之传播。

(11)确定民众团体之管理指导权，以免大家可以管，大家都不管之弊，而予共党以可乘之机。

(12)参加本党机关之共党分子，须一律公开，不准有任何秘密党团活动，否则严予取缔，或竟以汉奸论罪。

异党问题处理办法

战地党政委员会公函

实奉 委座办四灰(二)代电节开："办公厅转陈该会战党瑜字一七六三号函暨附件均悉。查该会对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所拟实施方案，尚妥。关于党政部分对晋冀察边区问题三四两项，仍应由该会会同中央各党务机关确实推行情由希查照迅速办理为盼。"等因，奉此，自应遵办，除分行外，相应抄同原方案函请 查照办理，并将办理情形随时见复为荷。

此致

中央社会部

附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党政部分对晋冀察边区问题第三次第四次实施方案各一份

主任委员 蒋中正

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抄 件 第 三 项

一、办法原文

选择若干重要地方，配备党政军力量，发展党务行政，训练青年干部，增强本党力量。

二、实施方案

甲、关于配备党政军力量发展党务行政者：

1　就本党在晋冀察边区内势力所及之地，选举若干据点，配备党政军力量，密切联系，推进党务工作。可能时，或将该边区划为一个游击区，设立党政军一元化之机构，以便统一指挥，力图发展——由中央党部战地党政委员会分别转饬办理。

2　分区设立党务指导专员，负责推进各区党务工作，——由中央党部办理。

查本项工作，中央业已着手进行，所谓晋冀察边区，共划分为五个区域，其中河北三区，山西察哈尔各一区，每区设一党务指导专员负责，办理各区党务工作，经费由中央直接拨发，总计二万余元，并已选派各该省党委员兼任党务指导专员分别前往主持矣。

3　建立县以下党部组织健全边区党的基础，——由中央党部战地党政委员会，分别督促各该边区党务指导专员负责办理，普遍完成，务使未有组织之县，赶速成立组织，已有组织者，加以调整，使之健全。

乙、关于训练青年干部者：

1　就中央训练团，由战地党政委员会会同中央训练团负责在“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中，招收一部分晋冀察边区青年，予以训练派回工作。

2　就西北干训团训练班训练，由天水行营负责在西北干部训练班中加紧招收该边区青年，予以训练派回工作。

3　就边区实施训练。

(一)由中央训练团负责在边区选举适当地点设立训练，公开举办边区青年干部训练班。

(二)由中央党部、政治部、天水行营，分别就已受训练之干部，选派前往边区，分发各县，担任训练下级干部及实施训练青年之工作。

(三)由中央各机关就现有各职员中选忠实干练之同志，派往边区分任训练青年之各项实际工作。

抄　件　第　四　项

一、办法原文

尽量发动地方人士及本党同志，在此边区内发动本党民众运动，予以抗日力量，俾增强我华北抗战基础。

二、实施方案

甲、关于发动地方人士者：

1　发动党外的公正士绅，担任或领导当地抗战及地方福利工作，遵照总裁昨今两年告全国教育界及士绅书意旨照办。

2　积极争取边区内人士对于本党之同情，尤其工农大众，并进一步加入本党。

3　地方公政人士具有资望能力，且临大节而不可夺者，应尽量策动或辅助之，树立抗战据点。

4　利用公正人士作掩护，积极展开本党工作，——由各该地党政分会及当地党部负责办理。

乙、关于发动本党同志者：

1　策动当地本党同志，并联络信仰本党主义的人士，建立新的基层干部，分布于各团体内，充实并发展其组织。

2　训练青年干部，建立民运中心小组，向边区各县普遍发展，使其在各团体内发生领导作用，形成中心势力。

3　凡未成立团体的地区，或虽成立而组织不健全，分子过复杂者，应由当地党部设法调整或重新组织之。

4　本党同志应深入党外势力控制之地区，运用秘密方式，组织或参加各种团体工作；如系新组织者，可用种种不同名称（如商店工厂小学）发展本党力量；如系参加既成团体者，可以私人关系（如亲戚同学同乡）密切联络团体之主持人，并取得其信仰，使于无形中仍受本党领导。

5　如党外势力控制之团体无法取得领导权者，设法使其主持人中间发生分化作用，而自动停止其活动，但应避免明显磨擦，以及一切无谓纠纷。

——各该地战地党政分会及当地党部负责办理——

（附稿）密令各级专员县长中等学校、通知各厅各处

查西北各省失学失业青年，往往惑于异说，趋于歧途，以致陷身邪僻，贻害党国，实有厉行矫正之必要，因特设立西北青年劳动营，专收此类青年，予以精神及技能上之训练，俾成抗战建国之有用人材，业已委派胡宗南为主任，萧作霖为教长，负责办理，并于十一月一日组织成立。营本部设咸阳，直辖两大队，洛阳兰州各设一独立大队，所有招集学生办法，应由西北各省各级党政军机关负责收容保送。合行抄发办法一份，令仰饬所属严密遵照执行，务使行为煽动思想歧误之分子，咸有感化反省之机会，并须妥慎办理，免贻误党国，是所至要。

西北青年劳动营学生招集办法（极密）

一、本办法依据西北青年劳动营组织大纲第十二条之规定拟订之。

二、本营学生不分性别，男女兼收。

三、本营学生凡在十八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具有中等程度，身体健全者，不论其思想如何庞杂，意志如何错误，一律予以甄别收容。

四、本营学生之招集办法如下：

　　甲、由委员长天水行营，通令西北各省各级党政机关，负责收容保送思想错误之失学失业青年。

　　乙、由委员长天水行营通令西北各省政府，各部队，于要隘处分别设置盘查所，凡见有应行收容之青年，一律扣留，送营甄别受训。

　　丙、由本营派人前往各重要地区，会同党政军警机关及民众团体，设法收容各地失学失业青年。

五，各项招集学生详细办法另订之。

六，本办法经呈准后施行。

处理异党实施办法

天水行营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天行治字

第一四五五号密令（绝密）

案奉

军事委员会本年八月办四宥代电开："关于异党问题处置办法业经会议决定在案。查陕甘宁边区目前极待解决之问题：甲,（一）陕西之府谷、神木、榆林、横山、定边,（二）自横山经米脂、绥德、安定、清涧至延川,（三）自宁夏之盐池、豫旺经甘肃之庆阳、西峰镇、正宁、宁县,（四）自陕西之长武经栒邑、淳化、耀县、宜君、中部、洛川、鄜县至宜川，以上各地区应详酌各地现情，或增加地方保团队，或加派驻军，其力量期于能应付当地事变。乙,（一）十八集团军指委之河防警备司令应予明令撤消，另由中央派员充任河防司令，担任自宜川经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吴堡、葭县、神木、府谷一带之河防任务。（二）十八集团军之募补区应否明令撤消，其兵员补充由军政部另行规定，均希主持施行，权宜办理。至一般取缔办法，军事方面如陕北由清涧河以北之河防，应否改派其他国军接替亦权宜负责办理；在行政方面，教育与训练机关必须统一于中央。陕北公学与抗大，应否令饬停办，或归中央接收，应由教育部会商中央训练团暨天水行营程主任向十八集团军接洽办理；除分电教育部及中央训练团外，特电希查明办理为盼。"等因奉此。查本案为处理异党针对环境之实施办法，关于着手执行，务须严密，亟应联合党政军有关机关部队齐一步骤，通力合作，并各据其职责权限按照办法指定所负任务，相度机宜，尽量推行，严慎办理，以期芟夷滋蔓，而弥隐患。除分令甘宁政府省党部暨十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外，合行抄发上项实施办法一份，仰于令到之日尅日会商筹办，并将实施情形随时具报备核，切切此令。

呈奉核准处理异党实施办法

甲　关于政治方面者：

一，本会代电四项所指各县，一律划为沿边区各县份充实力量，逐步削弱伪边区，使其范围不致扩大。

二，由陕甘省府督饬各该省保安处积极加强所有沿边区各县之保安团队，并严限完成。万一有不能充实之县份，则调国军补充之。

三，限期切实整编沿边区县份之保甲，并一面训练保甲人员，一面计划广设保学。

四，除各县常派员视察督导沿边区各县各项工作外，另由本行营随时派员巡回视察督导，俾资改进。

乙　关于党务方面者：

一，沿边区各专员县长，务必须确能了解本党主义，具有刻苦耐劳精神与斗争经验，并富政事政治常识而绝对廉洁者充任，并将现有人员重新考核调整并报本行营备核。

二，令陕甘宁三党部暨省府设法酌增沿边区之党政各费积极进行工作。

丙　关于军事方面者：

一，密

二，巩固沿边区各县，应由陕西保安处调保安团四团分别布置，以两团配备于南线之栒邑、耀县、洛川、宜川一带，以两团配备于北线之定边、横山、米脂、绥德、延川一带，并择适当地点屯驻统一指挥，期以实力推行政令，遇有事变亦易解决，至宁夏之盐池、豫旺及甘肃之环县、庆阳、宁县一带，亦应同样办理，并得酌驻国军辅助之。

丁　关于教育训练及募补方面者：

一，停办抗大陕公，以符公令。（另有具体办法）

二，结束募补区域，成立陕北师管区。（另有具体办法）

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

陕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代电署字第一三九一号

事由：密

鄜县蒋县长鉴：极机密，案奉陕西省政府本年十月酉江府秘调字第一一四号代电内开："极机密。查陕北各县与甘肃陇东毗连地区，均有反动分子活动，纷扰日甚，亟应由两省遏止，以防制其发展。前经本府会同甘肃省政府商定陕甘两省防制异党活动联络办法，呈奉军事委员会电准备查，应即密为实施，借资联系。除分电外，合行抄发原来办法电仰该专员密饬所属有关各县遵照办理为要"，等因，附原办法一份，奉此除分电外，合行抄发原件，电仰该县长遵照办理，仍将办理情形具报为要。锺相毓俭印。抄附原办法一份。

陕甘两省防制异党活动联络办法

一，目标

甲、消极的：防止异党活动维持现状。

乙、积极的：制裁异党活动恢复原状。

二，原则

甲、齐一步骤。

乙、加强力量。

三，共同认识

甲、我们只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委员长）。

乙、各党各派均已接受国民党领导，无论异党之借口如何，均一律不予承认。

丙、一切畸形组织，如边区政府之类，在未经中央核定及正式委派负责人以前，应认为非法，不予承认，并绝对避免行文关系。

丁、一切由异党部队改编之部队，如十八集团军之类，均应认为中央军队，举凡中

央一切法令均应遵守。

四，共同方针

甲、地方绝对强硬不稍退让。

乙、省府秘密策动借资缓冲。

五，政策之决定

甲、两省政府应将现阶段之政策互相通知，酌加调整共同执行。

乙、政策如需转变时应将决定策略互相通知，必要时得先行征求意见。

丙、双方意见如有不同，或一方决策他方因故障不能执行时，仍应随时协助。

六，情报之沟通

甲、两省政府应将过去异党活动情形摘要通知，以备参考。

乙、异党现在从事活动之工作，应互相通知，设法防制。

丙、异党预备从事之工作，应互相通知，设法防范。

丁、异党一切阴谋，应互相通知，设法防范。

七，政治之联系

甲、现被异党占据之区域，或行使政权困难之区域，应以共同力量加紧工作，图谋恢复。

乙、两者交界之插花地，应即速共同整理清楚，以免异党之利用（在未整理前交换代管）。

丙、一省管辖之地区，如中隔特区不能管辖时，得由他一省毗邻之县代为暂管。

丁、特区不堪虐待之人民逃去时，应不分省界妥为安抚，或送回原籍县府收容之。

戊、异党虐待人民，以及一切非法行为，两省政府应为呼吁，并共同予以制裁。

己、一切受鼓惑参加异党之分子，两省政府应责成地方严加盘诘，如有截获应互为收容，或饬交原籍县政府收容。

八，军事之联络

甲、两省毗连各县，应择定若干地点实行联防会哨。

乙、一方如采取军事行动，对方应予声援。

丙、异党如有进攻某方之企图，应事先通知防范，如时间紧急时，亦得逕令有关区县遵办，不受省区之限制。

丁、保安团队及军事配置，应采取密切之联系与合作。

戊、原管县政府因情况混乱指挥不便时，得由毗连之县政府暂行指挥，不受省区之限制。

己、因联防所需之给养，由两省政府负担，事机紧迫时，得先由地方筹措，再行归垫。

九，本办法关于地方方面，由毗邻县政府商定详细实施办法，呈由两省政府核定施行。

十，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得由两省政府随时会商备修正之。

十一，本办法自两省政府核定之日施行。

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通告

案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密函开：

“查关于异党问题处理办法，业经决定在案，其中第三节积极防止办法——党务方面——关于一般的健全本党基层组织，发展本党党员，使每保甲皆有本党党员之分布，以任领导民众及防止共党活动之责，决定办法由中央组织部会商内政部妥定办法施行等语，记录在卷，相应密达查照，希即办理为荷。”

等由，准此，经与内政部会订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一种，复请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转陈委座奉谕照办在案，除由内政部通饬各省市政府遵办，并由两部会函国民精神总动员总会，及中央调查局查照办理外，合行抄原办法一份通告该党部遵照办理严守秘密，并将办理情形具报为要。

右通告　　　　　　山西省执行委员会

附抄“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办法”一份

校对监印李朴三　　　　　　二十八年十二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通告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发

发文仁瑜普字一八四二号

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极机密）

一，保甲内应尽量发展本党组织，甲长除非常时期保甲长选用办法选用外，并应以本党党员充任为原则，未入党者，设法介绍其入党，国民学校校长同。

二，保甲长就职时应举行宣誓，适用宣誓条例内自治职员誓词。

三，每月保民大会，应切实讲解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精神之改造第五项所列各款，并由国民精神总动员总会编印关于上项通俗小册子。

四，特别地带如陕北等地保甲长，必须由党政机关核办。

五，中央调查统计局各地之情报网，或特工人员，应与当地保甲长中之忠实同志（事先须经过严密考查）设法取得密切联系。

六，上级党政机关对于保甲长之思想行动应注意考查，如发现有错误者，应即予纠正或惩办。

〔附〕平 江 惨 案

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驻湘鄂边之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总司令部派特务营余连长率领士兵，至湖南平江县属之嘉义镇，将我新四军在平江之通讯处（新四军傅秋涛支队原为平江浏阳地区之游击队编成，故在该地区设通讯处）包围缴械，并将我新四军参谋涂正坤同志（年四十二岁平江人），通讯处军需吴贺众同志（年三十八岁平江人）二人当场枪毙，至半夜，又将我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同志（三十六岁浏阳人），通讯处秘书吴渊同志（四十五岁江苏人），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声同志（三十岁平江人）及傅团家属赵禄英同志（女，三十岁岳阳人）等六人活埋于平江之黄金洞。通讯处物件被掠一空，计缴去盒子枪六支，长枪二支，手枪二支，掠去纸币五千元，新四军符号军用证明书、公文、信件等一批，密码一本，十四日始释放我通讯兵八人。此次事件发生后该部既未宣布理由，复严厉禁止群众谈论，但同时又复告我通讯兵系误会所致。

至今该连长已被扣留以资掩饰。但此事已引起各方不满，平江当局对此事件即不表赞同，当地民众更形激愤，群起声援。我为顾全大局，勿使此不幸事件扩大，致影响抗战与团结，除据理力争外，对于民众之激愤情绪，特多方解释。查此次惨案之发生，纯系一部分反共分子有计划的行动。在此次惨案中，叛徒孔荷宠为重要角色，彼亲率反共人员到平布置此次惨案，而杨部乃系执行凶手。闻孔荷宠已开列大批名单准备继续捕杀新四军工作人员。

新四军负责同志，已电呈最高当局，请求严惩凶犯，抚恤被劫害者之家属，并严禁以后再发生同样事件。

（原载《新中华报》，1939年7月11日）

〔附〕确 山 惨 案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在豫南确山县的竹沟镇——就是我们新四军第八团队留守处的驻在地——发生了一件空前的、最不幸的事变。就是确山县长许工超纠合了确山、信阳、汝南、泌阳等县的常备队以及第一战区豫南游击司令戴民权（这个戴民权就是去年春在阜阳被赖副师长所全部击溃大部消灭的土匪头子）共一千八百余人，进攻竹沟留守处。我留守处为了保护工作人员和伤病人员的生命安全，起而实行自卫，打了两天一夜，我终以寡不敌众撤出了竹沟，我牺牲中队长一名，伤政治指导员、副中队长、分队长各一名，反动派的队伍进入竹沟之后，将留守处医院的伤、病、残废人员及抗战官兵家属和当地民众惨杀了二百多人，而且现在又将前方指挥作战的周骏鸣团长的家产全部没收，将留守处的财物抢掠一空。许工超所率领的千余常备队、土匪、流氓、地痞进占竹沟之后，仍继续步步逼进，确山、桐

柏一带的群众领袖王国华同志（就是那位有名王老汉）率领留守处人员退到竹沟附近的龙窝。

竹沟事变是一件大事情，较比平江惨案还要严重的多。竹沟事变，显然是反动派、土匪、地痞、流氓向着坚决抗战的新四军，向着抗战的伤病及残废人员，向着抗战军人家属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大阴谋的一部分！

事变发生以后，新四军军部即急电上峰报告，并向卫司令长官请求以下四件事：

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二、竹沟留守处工作人员速回原处办公。

三、抚恤死难员兵，退还所抢劫之财物。

四、惩办凶手许工超及其同谋者。

竹沟留守处从设立的第一天起，就被顽固分子、反动派、地痞、流氓们所嫉恨、所破坏，成为他们造谣中伤、寻衅找事的对象。为什么呢？

一、竹沟留守处，阻碍了当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竹沟及其附近的横征暴敛、有我们在，使他们不敢大胆为非作歹。

二、竹沟留守处，挡住了竹沟及其附近（那一带是泌、确、信、桐边最荒乱的地方）的土匪、地痞、流氓团结在一起，打家劫舍，胡作妄为。

因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地痞流氓和土匪们，便结成一条统一战线来反对我们。一开头总是造谣中伤，说我们绑票勒赎，说每日来往于竹沟说票赎票的就"络绎不绝"。又说我们"赤化"竹沟，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你们看，他们多么缺乏常识？

他们于造谣中伤之外，就配合着武装进攻。在竹沟以西的邓庄铺就曾抢走了我们一千套军装，杀害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他们还伪装土匪，伪装新四军到竹沟附近一、二里处抢劫，以便嫁祸于人。土豪劣绅于造谣生事之外又配合着"告状"，而且一直告到蒋委员长面前。蒋委员长电令当时信阳的警备司令王师长彻查。王师长当派一八八团夏团长轻装开赴竹沟，因为夏团长听多了先入耳之言，所以对于竹沟以疑虑的态度处之，其时我们在竹沟仅有保护伤病人员的一排人，情形自然有点严重。因为似乎免不了要发生"误会"。但是我们光明正大，问心无愧，沉着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向同志解释了不白之冤，使夏团由戒备一变而为友谊，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热烈的联欢。夏团在竹沟住了十天，各处明查暗访的结果，进一步对我们有了正确的了解，把顽固分子、反动派、贪污土劣们的造谣阴谋揭穿了。双方感情融洽，真相得以上达，于是不久夏团以任务完竣，遄反原防了。事后蒋委员长于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及河南省政府的电文中对于竹沟留守处曾说："与民间相安无事，所传各节均属子虚"等语。于是顽固分子、反动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造成的阴谋，终被"事实"所粉碎，气焰因而稍杀。但是他们还是继续活动的，他们的阴谋还是层出不穷的。这就是竹沟留守处成立之后所继续遭受不断的不幸事件。

两年以来，我们自信有功无过，我们天天在和敌寇汉奸血拼着。我们有功没有偿，反而受罚了，我们受到活埋、枪毙和一千八百人的总围攻及大屠杀。诽谤、造谣、污辱以至于没收我们的财产，四方八面纷至沓来！这实在使壮士心寒，英雄气短！古今奸臣卖国受上偿，忠臣爱国处死刑，是最令人拍案顿足的痛心之事！岳武穆精忠报国，然而报应是父子们枉死于风波亭上，还能不使人痛心吗？

确山县长许工超是"勇敢"的，然而他的"勇敢"不用于攻击他跟前的信阳的敌人，却

用之于攻打自家人的留守处。对敌则畏缩不前，对友则耀武扬威，敌人打正面，他们就打包抄，彼此之间的动作十分协同。河北磨擦专家张荫梧对待八路军的伎俩，许工超倒仿效得一模一样！

（彭雪枫：《关于竹沟事变》，《解放》周刊101期 1940年3月8日出版）

〔附〕晋西事变真相

韩钧

【新华社延安十三日电】西安西京日报所载阎锡山对中外记者团谈话中，有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准备冬季攻势时，新军二纵队负责人韩钧率部叛变等语。本报记者为使国人了解此亲痛仇快事件的真象，特访问当时亲历艰危的韩钧同志。韩钧同志首告记者，晋西事变的惨毒真象，过去因为希望阎氏觉悟，一直隐忍下来，从未发表过，此次阎锡山颠倒是非，公然向中外人民淆乱真象，实令人不能再保守缄默。韩钧同志随将事变经过情形详述如下：

阎锡山仇视人民

太原沦陷后，阎锡山即开始动摇，准备投降妥协。汪精卫投敌后，阎锡山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试探和平，他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当时薄一波同志说："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内来，要求民族独立，只有抗战到底。和平妥协就是投降，就是汉奸"。阎默然。阎锡山此种论调谈过不止一次，均为牺盟、新军所揭穿、所反对。但阎锡山投降准备，始终未停止过。牺盟、新军主张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只有实行民主，发动群众。阎锡山反对实行民主，取消民选县长、区长、村长及各县民意机关。他说："政权是个刀把子，拿到我们手里可以统治人，拿到人民手里就会危害我们，所以不能实行民主。"他又反对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自卫军等（然而这是中国抗战力量的基础）。他说："农民是个老虎，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怕他们抗战到底，不听指挥），不发动是个空子（又怕共产党来发动），现在不是发动不发动的问题，而是掌握电鞭的问题（电鞭是管制老虎的鞭子）"。他之反对民主，反对发动群众，都是为投降妥协着想。他又说："生存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七七事变时为了生存，他需要抗几天战，以后感到抗战是长期的，困难的，就想投降，这也是为了生存，正义公理、国家民族观念，在他的字典里头是没有的。他在作这些准备的时候，表面上装作抗战的样子，而暗中早已在通敌反共了，与敌开过刘村会议，安平会议。通敌使节，不绝于兴集太原道上。决死队的负责同志曾经一再表示："我们来与你合作，是为了抗战到底，并不是为了投降妥协，任何人要投降妥协，我们就要反对。"阎锡山因此视新军为投降妥协之最大障碍，用说服及其他方法都不能把决死队屈服，乃大施其"锦囊妙计"，于"不知不觉"之中"转移"新军为"叛军"，实行"讨伐"，晋西事变的真正内容就是如此。

阎日两军夹击决死队

即就晋西事件本身而论，也是阎锡山首先背信弃义发动内战。阎锡山企图解决新军，蓄谋已久，至一九三九年十月间，乃授权王靖国、陈长捷等准备进攻新军。并找反共将领一个一个地向他们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与之合作，我晋绥军将无立足之地，现在我们只有解决新军、牺盟，援用日本所提中日提携办法，达到生存之目的。有一个反动军官（刘武铭）问，如何解决？王陈答以先改组决死四纵队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再集中晋西六个军配合日寇解决决死二纵队，然后协同日军解决一三纵队。果然不久，阎锡山即委任陈长捷为“剿叛”军总司令，陈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晋西事变前第九天）发出密令：分三路向新军进攻，计南路纵队为六十一军、八十三军及警备军之七十三师等，司令由陈自兼，进攻隰县属之义泉，黄土（决死二纵队司令部所在地）；北路纵队司令为梁培璜，率十九军及三十三军之一部，进攻隰县孝义边之水头、石口、大麦郊一带（当时八路军晋西支队所在地）；右路纵队为新一旅等，司令崔道修，进攻隰县之泉子坪一带。同时，敌人亦集中临汾至平遥间驻防之敌五千余人于韩信岭一带。于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阎锡山下令决死二纵队，要准于五日向同蒲线大举破击，实行所谓“冬季攻势”。我正在动员部队执行破击命令时，阎军与日军同时开始向我进攻，我们二纵队处于日阎两军包围夹击之中，情势至为险恶，有全部被歼危险，不实行自卫，就要死亡。我只得一面对敌进行肉搏，一面又被迫不得不进行自卫以抵抗旧军，苦战兼旬，始突破日寇和旧军包围，转入晋西北。此即所谓“决死队之叛变”。从此以后，决死队就被称为“叛军”了。

究竟谁是叛军？

究竟谁是叛军呢？是谁勾通敌寇反对人民，破坏抗战、背叛民族？是新军呢，还是阎锡山？新军既未反对人民，视人民为猛虎，亦未参加过通敌叛国的临汾会议，安平会议，亦未派赵承绶、梁延武、王乾元或其他任何人到太原、北平、南京晋谒敌人和汪逆精卫，亦未与敌订立“现地协定”，而做这些事情的，恰恰是阎锡山自己。问题非常明白，即阎锡山自己也知道决死队并非叛军。一九三九年以前，他对决死队倍加赞扬，说是革命青年，一切办法都是革命的，自愧他的旧军都是昏瞶糊涂、落后、不进步，不能向决死队看齐，这且不用说。即在晋西事变以后，他也曾在他的“忠实同志”少数人圈子内说过：“决死队是革命的，抗战最坚决的”，“薄一波不是军人，但他们练下的军队能与敌人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办法是革命的，进步的”。然而他为什么还说决死队为叛军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在借此以掩饰他自己通敌反人民反共的丑事，和汉奸或准汉奸的原形。并不是什么“韩钧叛变”或“新军旧军冲突”，而是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分裂与团结及进步与倒退的斗争。事实胜于雄辩，阎锡山纵有百口亦难狡辩。

对这件事，不独薄一波、韩钧及其他在决死队、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能够以我们的亲身经验去证明，还有国民党老前辈续范亭先生（他是阎氏任命的暂一师师长，后为新军总指挥）也能以亲身经验作证明。更重要的是山西全省的老百姓，他们能够将阎氏罪恶如数家珍地告诉人们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14日）

〔附〕山西“十二月事变”

罗 贵 波

（上略）

二

向来以老奸巨猾著称的阎锡山的全部打算，都以不危及他统治山西的利益为转移。因此，当他和日寇的矛盾、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尖锐起来的时候，他就和共产党合作，大办“牺盟会”和建立新军，其目的是利用这些力量来抵御日寇的进攻和抵制国民党势力的渗入。但是，和一切反动派一样，阎锡山同工农群众有着根本的阶级矛盾，他的反共、反人民、对敌屈服投降的本质永远也不会改变。因此，当他看到人民的力量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便暴露出了本来面目，日益公开露骨地与日寇勾结起来，图谋用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来限制、瓦解以至消灭新军和一切进步力量，并向八路军和共产党发动进攻。

1938年7月，早已逃到黄河岸边的阎锡山，在吉县召开了一个秘密的高级干部会议。阎锡山在会上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合作，今后那里还有我们立足之地？”从此以后，山西形势开始逆转。此时，阎锡山提出了新的口号：“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还说什么“不能抬上棺材抗战”，意即不能再抗下去，眼看着共产党的力量壮大起来。因此，一面拼命扩充旧军，一面对新军由支持变为限制，并放出空气要取消“动委会”，要用“同志会”代替“牺盟会”。这时，全国的局势也正在变化。日寇占领武汉后，停止了正面战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当时召开的五中全会确定了“限共、溶共、灭共”的政策，企图以反共来扫清妥协投降的道路。而阎锡山便充当了这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

1939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所谓“秋林会议”。这次会议是阎锡山反共、投降的一次公开大动员，是向新军和“牺盟会”的又一次进攻。在这次会议上，阎锡山公开地发表了反共、投降言论。他厚颜无耻地叫嚣：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并说：“蒋介石已下定决心对日妥协，如果前方将士坚持抗日，蒋可以设法制造困难，追其同意。共产党、八路军要反对，他可以说共产党、八路军破坏统一、不服从命令，加他们一个‘奸党’‘奸军’的帽子。”阎锡山的这一番话显然是向新军和“牺盟会”宣布他已决心要转“抗战”为“剿共”。阎锡山还反复强调“政权是刀把子，拿在我们的手里可以统治人民，拿在人民的手里就会危害我们，所以不能实现民主”。他的这些破坏团结、反共、反人民的投降妥协言论，当即受到了新军和“牺盟会”领导人的严厉批驳。阎锡山内部的一些爱国将领也表示对新军的同情。但阎锡山分裂团结、破坏统一战线、准备投降日寇的决心已定，他把在秋林开会的新军各部队的政治委员软禁起来，整天派人“劝导”，“统一思想”，企图用高官厚禄来进行收买和诱骗。与此同时，阎锡山的投降活动和对各地进步力量的进攻也日益猖獗起来。1939年冬“动委会”被无理宣布取消，阎锡山并宣布：“牺盟会”的活动要受到限

制，许多抗日团体要解散，"武装群众""组织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合理负担、抗日救国"等进步政策、法令要废除，许多进步县长也要撤换而代之以与人民为敌的投降、反共分子（这些，在进步力量的抵抗下，大都未行得通）。阎锡山对那些公开投敌的，和日寇暗中勾结的旧军官、县长、专员等不但不予以通缉查办，以正国法、以振纲纪，反说这些人"开辟敌区工作有功"。而真正在敌后浴血苦战，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却被诬蔑为"游而不击"。阎锡山甚至还提出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等狂妄口号。他的"敌工团"、"突击队"、"精建会"等特务组织在新军内部的活动也日渐加强，暗杀、破坏事件层出不穷，并竭尽其分裂、限制、威胁、利诱之能事，直到制造武装叛变。阎锡山曾对他们这样说："到了那里要不惜作蛇蝎蚰蜒。"其用心之毒可见一般。

为了瓦解新军、控制新军和使新军变质，阎锡山采取了改编决死二纵队为独立二旅和一九六旅，改编四纵队为独立七旅和二〇三旅，改编工卫旅为二〇七旅的反动措施，使这些部队都免去带有抗日字样的番号。

阎锡山还在晋西北的兴县成立了"省府办事处"，由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第一军军长赵承绶兼任主任。各县则由旧军的团长当县长，实行以军事兼管行政、民运，以此来排挤一些进步的县长和限制、阻难八路军、新军的粮食、兵员等的补充。在军事部署上，阎锡山总是把新军部署于第一线，旧军部署于第二线，使新军前后受到威胁。阎锡山还派遣大批"联络官"、"视察员"等到新军各旅、团、营侦察、监视部队的活动，并不断抽调新军干部到秋林"受训"，企图进行欺骗收买。当时在秋林流传着这样讽刺阎锡山的打油诗："上秋林，真不错，升官、晋级、找老婆。"每期训练完毕，总要发给每人百十块银元；阎锡山还亲自逐个接见。无非是请吃饭，封官晋级等等。此外，阎锡山还积极指使新军中的顽固军官制造磨擦，搞什么"军事领导一切"，破坏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在四纵队曾发生营长支长禄（顽固分子）无理扣压政治教导员，和连长万春祥（顽固分子）毒打政治指导员的事件；在暂一师，则制造了四十四团第二营哗变事件。这一切都是阎锡山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阴谋活动，在我们缴获的赵承绶给暂一师四十四团团长冀聘之（顽固分子）的一封信中得到了有力的证实。信上说："此次纠纷，绝非个人事，纯为立场与组织问题，晋绥各级同志切不可松懈，稍萌退念，更要积极团结官兵，巩固组织。"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其它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我们遵循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时局的估计和斗争方针、斗争策略的指示，对于阎锡山的上述阴谋活动和反动措施进行了坚决斗争。

我们大力地向干部、军队和人民进行了宣传、教育和揭露，使他们认识到、警惕到山西形势的逆转和阎锡山危害抗战、分裂团结、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从而争取、团结了广大群众，积极展开斗争，并为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作了各项准备。

为了保证和巩固党在新军中的领导作用和反对阎锡山的"军事领导一切"，我们在争取维护政治委员制度、巩固政治工作制度、维护军政共同领导制度和发扬民主等等方面同阎锡山展开了不调和、不妥协的斗争。

我们利用了阎锡山的"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合理负担、抗日救国"的进步口号，并运用了"牺盟会"、"动委会"的组织和作用，以克服阎锡山对新军、八路军在粮食、兵源和军鞋等补充上的限制和阻难。

我们利用了阎锡山的内部矛盾，对旧军官中的进步分子进行了团结；对中间分子耐心争

取；对顽固分子、或使之孤立，或使其无事可作，或设法将其撵走；对最反动的旧军官和专事破坏活动的特务分子，则坚决地予以镇压和肃清，使新军在组织上更加巩固，力量更加强大。针对着顽固派腐朽的官僚组织机构的缺点，我们并采取“拖延”、“搁置”、“假报”和“打折扣”等办法，以对付阎锡山限制、阻难和瓦解新军的阴险恶毒的反动措施。

就这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争取和巩固党对新军的领导权的斗争，保护新军和反对限制、阻挠与瓦解新军的斗争，在新军各部队中日益激烈地进行着。

三

1939年11月，阎锡山进一步和日寇勾结起来，密令旧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各派代表一人，在临汾后村同日寇进行了谈判。以晋绥军实行反共当作交换条件，日寇答应将其侵占阎锡山集团在山西的工矿企业的资财归还49%，将阎锡山各将领之住宅全部归还。日寇并答应接济晋绥军枪械弹药，帮助晋绥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和新军。

阎锡山自认为一切已准备就绪，于是便公然撕下了两年来的抗日假面具，向新军、八路军发动了武装进攻。

陈长捷被任命为“讨叛军总司令”。旧军六十一军、八十三军、十九军、三十三军、警备七十五师、新三旅等部，分左、中、右三路向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驻地——隰县的黄土、义泉、子坪及孝义的水头、召口、大麦郊一带进攻。与此同时，日军也集中了临汾至平遥间的数千部队于韩信岭一带准备进行配合。

按照预置的圈套，12月1日，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向决死二纵队发出了所谓“冬季攻势”的电令，命令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同蒲路的霍县至灵石段大举破击。按其“作战计划”，将二纵队部署于第一线，旧军作为预备队紧靠二纵队之后，企图这样与日寇前后夹击，一举而全歼二纵队。据我们缴获旧军北路总指挥梁培璜给其部下二一七旅旅长的亲笔信中供称：“合围以后，要努力歼逆，断绝其粮秣。对于要紧的叛党（按指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要死的不要活的，万一内部有叛党分子则消灭之，对外可报失踪。”其阴险凶狠由此可见一般。对于阎锡山的这一反动命令，二纵队当然不能执行，于是阎锡山通电全国宣称二纵队“叛国”。这便是“十二月事变”的开端。

12月5日，二纵队一九六旅旅长白英杰（顽固分子）叛变，勾结旧军王靖国部袭击一九六旅旅部，将大部分政工人员逮捕，同时捣毁了永和县“牺盟会”办事处。6日，二纵队的一个团从灵石前线调回来休整，路经旧军三十四军驻地时，我后卫部队被旧军缴械。当天，我八路军晋西支队为了规劝旧军，望其以抗日为重，终止这种亲痛仇快的举动，曾给旧军送去一信。顽固派不仅无动于衷，反将送信的三位同志扣押。

12月16日，赵承绶在兴县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具体拟定了向新军和八路军进攻的计划。12月下旬，旧军主力纷纷向临县、方山开进。旧军骑二师逼近了四纵队的驻地，待令发动进攻。情势非常严重和紧急。暂一师师长续范亭同志在赵承绶召开的兴县会议上，得悉顽固派进攻新军和八路军的恶毒计划后，当即不顾个人安危，中途逃席，亲来向党报告。

为了反对和制止阎锡山的危害抗战，分裂团结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动，为了保护新

军和进步力量不受损失和保卫抗日根据地，我们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在自卫原则下给予武力反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经过十几天的反顽战斗，取得了隰县、暖泉头、留誉、土门等战斗的胜利。但是，当时因为敌众我寡，阎锡山又有日军的配合，为了更有力地给顽固派以反击，我二纵队和晋西支队奉命向晋西北转移与四纵队等部队会合。但这时，赵承绶部已配合日军封锁了汾离公路。

12月30日，晋西北我军各部队团以上的军政干部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了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并成立了总指挥部，由续范亭同志任总指挥。同日，我二纵队和晋西支队突破汾离公路封锁，开向离石、方山、静乐、交城一带集结休整。

1940年1月1日，我军分两路出击。右纵队肃清寨上、阳坡、白文镇之敌，左纵队肃清马坊及方山县城之敌以后，继向临县之敌合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经过几天休整后也立即投入战斗，并于12日肃清了蔚峰村、王萶村之敌。旧军残部退缩临县固守待援。我军分向临县包围合击，14日攻克临县。赵承绶和郭载阳（旧军三十三军军长）目睹败局已定，只好率领残部在离石、中阳的日军掩护下经由汾离公路向吉县逃窜。

当我军主力在临县地区与阎军作战的同时，在敌后作战的我军各部队也积极开展了游击战争，使日寇不能顺利地配合阎军的进攻。

晋东南的决死一纵队和决死三纵队以及晋西南的两个政卫旅（二一二旅和二一三旅），在阎锡山向晋西和晋西北发动武装进攻的同时，也都受到了阎锡山的进攻。一纵队由于党委的正确领导，早在秋林会议期间就作了准备，把军队的领导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当他们听到阎锡山宣布所谓“二纵队叛国”的消息时，立即号召所有新军都应拥护二纵队的反顽斗争，坚持抗战到底；并清洗了从纵队司令梁守斋到排长以上的全部顽固军官，将他们集中起来送至抗大受训。三纵队由于在事变前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都不够充分，在事变来临时，又缺乏具体措施，因之在内部顽固势力组织叛乱，并受到国民党军队和旧军队从外部配合夹击的情况下，除了一小部分部队和人员突围转移外，其余都在这次事变中遭到了惨痛的损失。

晋西北的旧军溃败后，我们遵照党中央指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没有继续向阎锡山进击。事变过去不久，党、八路军派代表同阎锡山进行谈判，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新旧军双方结束了战斗状态，并划汾离公路为界。从此晋西北摆脱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完全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军不再归属阎锡山领导指挥，完全归属我党和八路军领导指挥。

（下略）

（原载1962年5月22日《人民日报》，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

（一）目前国内时局的特点是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抗战方向两方面展开日益明显日益严重的斗争。由于国内抗日进步势力克服投降倒退的力量还不足，就使得投降与倒退的危险依然严重地存在着，依然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但由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阻力，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阻力，全国人民的阻力，日本灭华的坚决方针，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苏联的强大及其积极援华的方针等。国内国际的条件，就使得投降与举行全国的反共战争甚为困难。由于这两方面的情况，就使目前抗日进步势力和投降倒退势力形成了一个严重斗争的局面。双方斗争的结果，或者是时局的好转，或者是时局的逆转。但好转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如有正确方针，加上全国的努力，是能够改变目前局面，争取时局好转的。我们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如果以为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只是一个逆转的前途，因而不去力争好转，只是消极地准备对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二）最近日汪协定的披露，伪中央政府的准备成立，与蒋介石反汪宣言的发表，给了国内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一个新的打击，又给了抗战派联共派与进步派一个新的推动，这是对于争取时局好转有利益的。但是目前投降倒退势力不但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且有更加猖獗的可能，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还会继续发生。这是由于以汪精卫为首领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国内投降倒退势力相呼应，而抗日进步势力一时还不可能迅速团结起来去克服投降倒退势力的原故。蒋介石宣言强调了抗战，但没有强调团结与进步，而没有全国的团结与进步，则坚持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克服逆转可能，争取时局好转，还是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而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事变），仍应提起高度的警觉性。

（三）为了力争时局好转，克服逆转危险，必须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坚决执行下列的十大任务：第一，便要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坚决明确与具体地证明反共是投降派准备投降的反革命步骤。第二，便要猛力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组织进步势力，同国民党的大多数亲密地合作，用以对抗投降派与反共派。第三，便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第四，便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争就要失败。第五，便要大大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

分子，并使知识分子与抗日民众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相结合，否则就没有力量打击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第六，便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第七，便要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对一切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必须加以坚决的打击。对一切暗藏在抗日武装、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中的汉奸反共分子，必须加以肃清。第八，便要巩固与扩大进步的军队，没有这种军队，中国就会亡国。第九，便要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提高抗日人民抗日军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的。第十，便要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在无党和党弱的地方要发展党的组织。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就不能解决抗日救国的任何重要问题。如果能坚决的并具体正确的执行上述十大任务，就一定能够强固抗日进步力量，克服投降倒退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击破大资产阶级分子破坏抗战与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

（四）目前宣传鼓动的口号是：

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

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汉奸汪精卫；

三、拥护国民政府，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

四、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

五、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一切反共的汉奸；

六、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摩擦；

七、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抗日民主政权；

八、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

九、人民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

十、发展民众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减税，改良工人生活；

十一、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汉奸、反共派、顽固派的阴谋破坏；

十二、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

十三、发展抗日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

十四、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原载《解放》周刊98、99期，1940年2月20日出版）

致国民参政会电

毛泽东 陈绍禹 林祖涵 吴玉章

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诸先生勋鉴：近顷以来，此间迭据报告，陕甘晋冀豫等省特务机关，通令所属，略谓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团行将莅临，主要任务在于搜集材料，证明此数省摩擦事件之发生，其咎均在于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然后携返后方，向当局建议处理办法。并在下届参政会中提出议案，实行取消边区与八路军之特殊化，并乘机打击共产党。着各地特工人员，注意搜集材料，并配合党、政、军各机关，准备欢迎视察团，务达上项目的等情。鄙人等以事属离奇，未敢置信。顷接尊处电示，始知果有视察团之组织。复查此视察团之团长团员，不仅无一共产党参政员被邀参加，且连第四次参政会中提出组织此类视察团之原提案人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诸先生，以及素以老成硕望公正无私著称张一麐、黄任之、江恒源，张表芳等诸先生，亦无一参加，在全体团长团员中，除在二届参政会之中，因发拥汪主和谬论而与共产党参政员及坚主抗战诸参政员发生剧烈冲突之国社党员梁实秋及国家青年党员余家菊两君外，余皆国民党一党之参政员同志。由此等人选所组成之视察团，对于视察事项所收材料及所作结论，必属偏私害公殆无疑义。该团之与特务机关配合行动，尤属事有必至。犹忆前年12月间，张君劢即曾著论主张取消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特殊化及取消共产主义。未几，汪精卫发表艳电，竟倡言反共。设该视察团之目的与汪、张无殊，尽可以汪张文件为蓝本，在渝作出大文，撰成提案，何必当此朔风凛冽之际，冒此严寒，多劳往返。如以为非有实地视察之名，不足以收牢笼社会视听之效，则以此等有特殊关系之人物从特务机关手里收集向壁虚造之材料，写成一本二三十万字之视察报告书，痛骂共产党一顿，谓即足为反共限共溶共之法律根据，则亦仍属可笑之事。盖国内政治问题，原只能从合理之政治原则获得解决，岂有卖弄玄虚，而能真正解决问题者乎。或曰，你们共产党所云，未免估计不当，该视察团此行，盖十分正大光明，毫无腌臜龌龊之心理，其任务在于维系两党合作，立于团结与进步基础上，共谋边区等事之合理解决也。若然，则鄙人等所言幸而不中，而国事实获进步之益，鄙人等当于该团来延安时，准备以陕北特产之小米饭、高粱酒，接待诸参政员同人，与之对雪举杯，畅论团结救国之大计，决不至慢待嘉宾也。敬祈贵处代为转达为荷。此致，敬颂勋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林祖涵吴玉章叩江

（原载《解放》周刊98、99期，1940年2月20日出版）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

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中国国民党，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抗日民众团体，各报馆公鉴：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于2月20日举行成立大会，谨将本会对于宪政之意见，宣言于次，敬祈政府采纳实行，并希各界人士共同促进，俾真正之民主政治得以实现，抗战前途，实利赖之。

一曰今日实施宪政之意义，在于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溯自民国成立，至今二十九年矣，然民国其名，专制其实。袁、冯、段、曹诸辈无论矣，国民党当政以来，因循故辙，亦无改进。所以然者，训政之空言高唱入云，而未以发扬民意反抗帝国主义为唯一南针也。民国13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有云："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盖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善哉言乎，设此宣言见诸实行，则内战之惨祸可以不作，外患亦无自而入矣。不幸此等至理名言，竟被束置高阁，而一党专政之厉行，反美其名曰训政。实则中国境内，自南至北，自通都大邑至穷乡僻壤，几曾见训正一人，训好一事。而多年训政之结果，则徒见贪官污吏，恣意横行，土豪绅劣，作恶无尽，国家之纪纲，民族之元气，几为之斫丧殆尽，而外患乃得乘隙而入。抗战以来，全国奋起，为救亡而战斗，当前之绝大问题，为如何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论者乃欲将宪政之实施与发扬民意驱除日寇之民族存亡大问题，划然隔绝，不视宪政为救亡图存之工具，而视宪政为涂饰耳目之巧计。于是人民之宪政运动被禁止矣，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被钳制矣，国人皆曰可废之训政被宣布继续实行矣，抗战以前举办之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被认为不须改选矣，不满人意之国民大会组织法被认为有效矣。凡此诸端，均属违背人民之公意，不合抗战之需要，本会同人特表示坚决之反对。本会同人敢断言，以此等办法实施宪政，决不能解决对内对外之任何问题。自非根据民意，加以彻底改变，不足以回人心而利抗战。此本会所欲宣告于国人者一也。

二曰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其代表必须重新选举。抗战以前举办之国大代表选举，虽亦不无公正之士，然所谓选举者，大多属于伪造，盖当时指导选举者为今之汉奸褚民谊，而党部则暗中包庇一切，黑幕重重，贻笑中外。其中汉奸敌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一而足。以此等代表集会制宪，必为一篇毫无用处之官样文章，以此等代表集会行宪，必为一次换汤不换药之一党专政。夫欲为所欲为，则亦为之已耳，何必多此一举，以宪政之招牌为掩饰乎？本会同人对此特表示坚决之反对。同时建议政府，彻底修正国大代表选举法，重新选举代表。盖必如此，方与团结抗战之需要相适合。否则南辕北辙，贻笑大方，断非民族国家之福。此本会所欲宣告于国人者二也。

三曰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彻底修正，国民大会应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原组织法规定国民大会职权仅为制定宪法及决定宪法施行之日期，会毕即任务终了。此其用意，在于不

欲宪政之真正见诸实行，不欲国民大会成为救亡图存之权力机关，仍属一党专政之欲念作祟耳。本会同人对于此种不合抗战需要之国民大会组织法，坚决不能同意，主张彻底加以修改，主张国民大会应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第一，国民大会于制定宪法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外，应为执行宪法之机关。第二，国民大会有决定内政外交基本方针之权。第三，国民大会有选举政府监督政府与罢免政府人员之权。第四，国民大会有制定国家法律之权。第五，国民大会应设常驻机关，执行大会闭会期间之职务。盖必如此，方与目前危险时局之需要相适应，而使国民大会不变为敷衍门面之装饰品。如谓宪法由何项机关执行尚待宪法规定，国民大会组织法不能预先赋予国民大会以行宪之权力，此自欺欺人之谈也。盖国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孙中山先生所规定。孙先生尝云："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国民大会而非行宪之机关，试问尚有何种机关足当行宪机关之任乎？凡事之成，待于诚意，宪政而无诚意，不如不谈为佳，而诚意开放政权，诚意实行民主，诚意唤起人民管理自救救国之事业，而不作敷衍一时之计，乃为召集国民大会之根本前提。此本会所欲宣告于国人者三也。

四曰全国应发起普遍深入之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权利与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之自由。宪政而无民众运动，民众而无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抗日党派而无合法存在与合法活动之权利，则一切所谓宪政，不过空谈一阵，毫无实际成效可言，有断然者。循此不变，则不论宪法条文如何美备，亦不过一堆毫无意义之黑字。不论宪政名辞如何夸张为自己早亦已提倡，亦不过一党一派独占政权之掩饰。而如有改弦更张之诚意，与民更始之决心，则必自允许人民及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有自由讨论宪政，自由选举国大代表始。此本会所欲宣告于国人者四也。

凡此四端，为本会之主张，亦即全国人民之公意，本会同人深信，实行民主宪政为国内国际大势之所趋，虽有种种阻碍，终必达此目的。当此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秋，国家民主化，实为救亡图存之至计，而国共两党及全国抗日党派抗日人民之共同努力，必能逐渐达到民主宪政之途，此又本会同人所深信不疑而愿为我全国同胞掬诚相告者也。兹当本会成立之始，敢竭所怀，质之当世，有志之士，盍兴乎来！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

……下略……

（原载《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

……上略……

汪逆登场，全国震愤。伏读国民参政会通电及蒋委员长在参政会之演说，诛奸讨逆，大义凛然。德等率部深入敌后，为保卫祖国而战，已历三年，深知敌伪阴谋，在于分裂我内部团结，以求倾复我国家，灭亡我民族，宰割我人民。近日以来，敌伪所至各地，竟敢高揭伪青天白日旗，遍设伪军伪党，号召和平反共。夫所谓和平即投降也，反共即灭华也，固已昭然若揭。然一部分丧心病狂之人，随声附和，亦复所在多有。欧战扩大，国际阴谋分子与敌伪沆瀣一气，企图建立东方所谓反共阵线，抗战危机，千钧一发。当此之时，国内少数不明大义之徒，或策动投降，或实行反共，而以反共为投降之准备步骤。盖反共之极，势必至于投降，而投降之前，尤必倡言反共，汪精卫之覆辙，其明证也。故居今日而言，抗战之危机，实不在敌伪之猖狂，而在我抗战阵线内部投降反共分子之存在。敌人近在中条山脉附近，设置无线电广播，倡言国共即将分裂，中国即将内战，呜呼！是何言欤！？夫敌之厚者我之薄，亲所痛者仇所快，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惟求全国继续团结，不中敌人奸计，消弭磨擦，反对内战，在我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合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坚持抗战局面，争取最后胜利。以我中华土地之大，人口之众，乘敌寇衰竭之时，遇欧战方酣之会，如能加紧团结而不自坏其长城，再接再厉而不自丧其勇气，则抗战未有不胜，建国未有不成者。德等不敏，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除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尚祈各界先进，全国同胞，群策群力，共救危亡，临电不胜屏营企祷之至！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所属全体将士同叩删。

（原载《解放》周刊105期，1940年4月30日出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

全中国的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

当此伟大抗战的三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最诚恳最热烈的心怀向我全国同胞，前线将士，各党各派抗日同志致民族革命的敬礼，向我三年以来的殉国烈士致无限的哀悼，向我负伤将士与被难同胞致深切的慰问。

英勇抗战的三周年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必然要崩溃的，中国决不会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中华民族。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在我三年英勇抗战中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战到底的意志已凝结于全民族的心目中，而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基本上是有利于中国的。

但是抗战的空前困难时期也到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向中国进攻，并宣布了他的东方门罗主义。中国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人正在发生动摇，而从国际方面袭来的阴谋，则有由德意的劝和政策代替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可能。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向中国进攻，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飞机大炮互相呼应，企图借此达到他们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重新分配世界与奴役世界人民。而英美法帝国主义则在一贯执行其反苏反共与对德意日让步的自杀政策下，使法国遭受了亡国惨祸，使英国遭受了严重失败，而在美国则使其太平洋大西洋上的利益同时受到严重的威胁。帝国主义大战现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冲突没有完结。而由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正在袭击全人类的生存，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的爆发，革命危机正在一切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中间深刻的酝酿起来，我们是处在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一切帝国主义战争都是屠杀人民的战争，惟有未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旋涡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才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援助者。中国抗战的可靠的朋友，正是苏联与全世界人民。

在目前的国际新形势下，被内外危机重重压迫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其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中国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在这种增加了的压力与增加了的困难之下，必然更加动摇起来，走上对敌投降的道路。这些人头脑昏聩，意志薄弱，熬不住艰难困苦，看不清抗战前途，一遇危难，就想动摇，这些人是抗日阵线中最危险的人物。

全国的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隐蔽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全国提醒这种危险与困难，并指出：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

汪精卫的投降是破产了，他同他的党徒现在已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最下贱的玩具。法国资产阶级的投降是把全法国人民变成了希特勒的奴隶，投降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法国人民的境遇。中国共产党坚信，在法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伟大的法兰西民族是不会灭亡的，法国人民的斗争将与中国人民的斗争配合起来，战胜外来的压迫者。

全中国的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任何敌人的进攻必须抵抗，任何困难必须克服，任何投降阴谋必须反对，任何投降分子必须同他奋斗到底，全国必须加紧团结，内部摩擦必须消除，国共关系必须调整，内战危险必须根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巩固，……各党各派的诺言必须实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同胞及友党同志声明：我们是始终实践自己的诺言的。我们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土地革命，取消暴动政策，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改为地方民主政府等项，我们都已认真执行，从来没有违背。我们在陕甘宁边区内，在敌人后方各抗日根据地内所执行的政策，完全是符合于三民主义的政策，没有任何一项超出了三民主义的范围。我们现在重复声明：在整个抗日战争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时期内，我们将始终执行三民主义的政策。一切责备共产党违背诺言的，完全是恶意的诬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求中国国民党亦尊重他自己的诺言，认真实践其允许过人民与允许过我党的一切政治上与具体问题上的条件，以利团结与抗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在团结抗战与国共合作期间，采取任何对内的暴动政策与破坏政策是绝不许可的。我们始终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始终执行不暴动不破坏的诺言，一切关于共产党又将采取过去内战时期的暴动政策与破坏政策的流言，完全是奸人的造谣。同时我们要求中国国民党亦应放弃对于共产党的破坏政策，以保证两党的团结一致与长期合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约束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将其行动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其他地方作任何足以引起友军冲突的行动，而在战区及敌人后方则与一切抗日友军协同作战。但要求各抗日友军对其部下亦应加以约束，勿向八路军新四军采取足以引起冲突的任何行动，以保证抗日战线上的团结一致。同时要求国民政府极力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游击队，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游击队乃是位于国防最前线的军队，而在三年以来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大小一万余次的英勇战斗，坚持了广大敌后地区的抗战，钳制了全国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敌人，而其处境则是最险恶的，其生活则是最困苦的，其弹药则是最缺乏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继续执行本党六中全会在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所作“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的决定，一部分地方党部尚未严格执行此决定者应即加以纠正。本党对待一切抗日友军的政策是团结与巩固他们，而不是分裂与破坏他们。但是我们要求中国国民党及各抗日友军亦以同样政策对待八路军与新四军，以求泯去猜疑，齐心抗战，而使一切军队同在最高统帅指挥之下担负杀敌致果之任务。

本党同人认为：要克服即将到来的空前的投降危险与空前的抗战困难，必须取消现在存在着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因为在这个政策的执行中已经产生了削弱抗战力量，引起人心不安的严重结果。须知抗战决不能采取既要对外又要对内的两面作战政策，这样政策实无异于自杀，法国达拉第政府的反共覆辙，中国应该引为深戒。

本党同人认为：要克服空前的投降危险与空前的抗战困难，必须改变在抗战中的许多作法，必须实行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必须释放一切被捕的共产党员与爱国分子，必须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必须召集民主的国民大会，必须废止有害的特务作风，必须改变不适时宜的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与兵役政策，必须把抗战的重心放在自力更生上面，而不应依赖任何不可靠的外援。

全国的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空前的投降危险与空前的抗战困难是到来了，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这些危险与困难是完全能够克服的，中国存在着克服任何危险与困难的一切必要条件，只须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善于去利用。中国是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决非阿比西尼亚与西班牙可比，更非荷兰与比利时可比，亦非法国可比，而日本则远不如德国。中国还保存着数百万大军，有国共两党与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团结，有帝国主义互相间的矛盾可以利用，有强大的苏联与世界革命斗争可以为援。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整整一百年中，经历了无数的危难，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孙中山先生的英勇奋斗，尤足为我全民族的模范。当此民族危难深重之秋，我们一定要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遗教，执行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执行他的临终遗嘱，打破一切悲观动摇与没有出路的情绪，不屈不挠再接再励的奋斗下去，则投降危险必然克服，抗战必然胜利，建国必然成功，中华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战到底！

团结到底！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新中华报》1940年7月5日）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

——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抗战三周年纪念日——

一 目 前 形 势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都表示出我们是处在新的巨大变化的时期中。

（一）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三大阵线的斗争。第一个是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第二个是英法美帝国主义阵线，第三个是苏联和平阵线。两大帝国主义阵线的多数国家为着重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到生死斗争阶段，而苏联领导的和平阵线，则因苏联的强大国力与正确政策，未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而超脱于战争之外，这是目前形势的最基本特点。

（二）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由于德国进攻，意国参战，法国投降，英国已退出欧洲大陆的结果，陷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中，目前双方都在重新组织力量，准备进行新的巨大冲突。德意准备向英国进攻，英国收集法国殖民地准备抵抗德意，日本准备在太平洋参加德意战线，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轨道，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战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帝国主义互相间的冲突没有完结。

（三）超脱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苏联，则正在进一步解决其在波罗的海方面、在巴尔干方面、在近东方面的安全巩固问题，正在准备着最伟大的革命力量，为应付世界巨大事变与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斗争。

（四）空前激烈的搅乱整个世界秩序的帝国主义战争，正在引起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大众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迅速革命化，革命正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与印度深刻的酝酿起来，第二国际正迅速破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正迅速增加，苏联在全世界人民中的信仰正迅速高涨。

（五）由于日本切断我西南国际道路并积极向正面进攻，企图用增大的压力分裂中国内部，压迫中国投降，这样就使中国抗战局面亦处于新的环境中，空前的困难时期与空前的投降危险快要到来了。但同时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六）投降危险的来源，主要的现在已不是英美法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而是日本的压力与德意胜利对于日本的鼓励以及可能的劝和政策，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又大大的削弱了自己，因此，国民党内部的再分裂，新的汪精卫派的产生，已经不可避免，全国人民中无出路的情绪必然会增加。

（七）但国际国内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便于我们去执行克服投降争取好转的任务。这些条件是：（一）英美法已不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重要因素，英美虽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听命，我们可以利用英美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着的矛盾。（二）日本有其内部与外部的困难，其力量已在我们三年抗战中大大

削弱了。(三)苏联的无比强大与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是中国抗战的可靠朋友（以上是三个外部条件)。(四）我党抗战中的力量是大大增加了，这是克服投降争取好转的主要决定因素。(五)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抗战的积极性（这些中间势力是：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及其与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使其无法统一地进行投降与统一地进行剿共（以上是三个内部条件)。所有这些条件，给了我们以充分可能性，去避免统一投降与统一剿共的危险，而使时局逐渐走向好转。党内对于时局的悲观情绪必须在认识这些条件上加以克服。

(八)增加了的投降危险与增加了的好转可能性，将表现于抗日阵线内部的分化。首先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分化，一部分人因为日本的压力、抗战的困难与对于共产党及民众的恐惧，必然分裂出去变为投降派，其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我们的政策）实行好转，变为较前积极些的抗日派。这种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好转，虽然只能是在不损害其根本阶级利益条件下的好转，不能有彻底的好转，但延长合作抗日的时间是可能的。其次是中间势力中也会发生分化。我们的任务，在于争取一切可能好转的部分，争取国民党的主体延长合作时间，而孤立与驱逐一切投降派。

(九)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全党必须紧张起来，把自己变为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的核心，认真的明确的执行中央的政策，达到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二 党 的 政 策

根据上述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全党应当执行下列各项党的政策：

（一）主要的不是强调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险性，而是强调在日本压力下一部分人悲观失望与实行投降的危险性。不是如同国民党某些人一样蒙蔽事实真相，说什么“一切皆于中国有利”，而是指出抗战困难与投降危险空前严重，号召人民为克服这种困难与危险而斗争。

（二）指出英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反苏反共，指出法国投降的悲惨教训，今后中国如欲反苏反共，必然重蹈法国的复辙。过去的反共政策已使抗战力量大为削弱，如不改变这个政策，抗战胜利是无望的。

（三）强调抗战的有利条件。特别强调苏联的强大，强调世界革命形势的有利，强调中国抗战力量远非法国可比，宣传中国人民在三年中英勇奋斗的成绩以打击悲观情绪，孤立投降派。

（四）强调自力更生。为此必须要求国民党改变其在抗战中的作法，例如应即召集民主的国民大会，取消反共政策，改变特务作风，改变错误的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及兵役政策等，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依靠民众自力更生的模范实例。

（五）强调团结一致。我们在过去一时期内强调自卫斗争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不能打退当时的反共高潮，促成顽固派的重新觉悟。现在是反共高潮下降时期，故又应该强调团结，过去的斗争也正是为着争取团结。必须使党员懂得：现在强调团结并不是停止一切斗争，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一天不停止，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但现在我们

斗争的主要火力应该向着真正的投降派，而不是向着一般的顽固派，在反共高潮已经降低某些顽固派初步表示某些好转之时，我们应对他们强调团结，以便争取合作时间的延长。

（六）我们军事力量的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某些部队不愿深入敌后，而在时局严重时便想向国民党后方行动，便想恢复内战时期的游击生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七）在一切友军中（包括中央军杂牌军在内），根据六中全会决议最后无保留的确定不发展党的组织的政策，原有党员一律停止组织生活，以便建立党的信誉，扩大交朋友的工作，争取二百万友军继续抗战。对于这种交朋友工作毫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重责备。

（八）向国民党及全国声明：我们没有违背自己在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停止土地革命，取消暴动政策，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改为地方民主政府），我们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是坚决执行自己这个诺言的。而国民党则违背了它的诺言，例如对于党派的合法存在权问题，承认边区问题，实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等等，都与其诺言相违反，我们应要求国民党实践其诺言，而打破“共产党违背诺言”的欺骗宣传。

（九）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一年以来在反摩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例如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未能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财政经济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滥捐等的过左政策。不执行各阶级联合政权的原则，对中央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指示怠工。对根据地不作长期打算，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对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表示怀疑与不执行；对待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把国民党看成都是顽固派，而不懂得国民党多数党员都是中间派并有许多进步分子，顽固分子只占极少数。甚至把顽固分子看作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要求中间分子有进步分子一样的表现，不承认中间分子的地位。对非党干部表示不信任，不接近，没有同非党干部共同工作的习惯。以及杀戮被捕的顽固分子杀戮侦探等等。这些都是从狭隘思想出发的左倾错误表现。如不严格纠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要受到危害的。但同时，对右倾错误亦不应放松。例如对时局的悲观情绪，无原则的迁就国民党，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与发展抗日力量取消极态度，对国民党内奸政策无警觉性，混同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原则差别，干部的发财思想，贪污腐化，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与事务主义，以及惧怕自我批评等。如不纠正，便将丧失党的独立性与革命的前途。

（十）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必须使党员懂得统一战线教育即是阶级教育的重要一部分。既须使党员明白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又须使党员明白无产阶级如何同其他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共同的敌人，二者是党的教育不可分离的两方面，决不能随便放弃一方面。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他们把复杂的问题单纯化，各种错误便从此发生。因此全党必须加强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的单纯化现象。应把这种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课程，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标准。

（十一）继续巩固党的工作。目前组织上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巩固而不是发展，注重质而不是注重量。必须严格审查干部，肃清内奸，以便有效地防止国民党的内奸政策。必须从党内将内奸分子（敌人及国民党派来的与收买的分子）投机分子（为个人利益混进党内表现严重的贪污腐化与脱离群众的分子）与太落后分子（不到会、不缴党费，又不做任何工作的挂名党员）这三种人洗刷出去，而对于其他分子则加强教育。必须使党员懂得“党内要严党

外要宽”两个不同的原则，而这样两个不同原则正是相辅为用的。目前则存在着相反的现象：党内反而是宽的，党外反而是严的，这种现象必须纠正。

（十二）加强各个根据地内的组织工作。现在有些根据地内如晋察冀边区等有了好的组织工作，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上了轨道。而在另外许多区域，则由于对支持长期斗争认识不足，还存在着很大弱点。必须认识今后的斗争是异常艰苦的，而要长期支持就必须改变过去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代之以有计划的细心的组织工作，并在各方面执行党的正确政策，否则必然要失败。

（十三）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这是保证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力量。扩大的方向是敌人占领区域。在人力物力已经发生困难的区域主要的方针是巩固，而在其他区域则主要的方针是扩大，并于扩大中巩固之。

（十四）在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作战地区，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瓦解敌军与伪军的指示，必须在今后一年中表现瓦解敌伪军的成绩，必须认识过去三年在这方面的成绩是微弱的。

（十五）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组织上的隐蔽政策与精干政策。而对党外则执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以便揭穿与孤立投降派。

（十六）在日本占领区域则须认真建立党的组织，并须同样执行隐蔽政策与精干政策。对党外则在于谨慎的组织群众，加强工人运动，积极瓦解敌伪军，争取两面派汉奸，以便孤立日寇汉奸而最后驱逐之。

（十七）加强华侨工作，设法向印度、缅甸、荷印、安南、暹罗、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联系，尽量给以帮助，使它们的斗争与我们的斗争配合起来。

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为坚决执行上述各项政策而斗争，果能如此，则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是有保证的。

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日）

（一）中央七七宣言及七七决定，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与我党政策的指示，经过两个月国内外事变的发展，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目前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于这种变化，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

（二）国际方面，首先是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目前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使帝国主义战争带有扩大、持久与准备决战的性质。战争的双方，一方面英国为美国所援助，美国已日益积极的援助英国与准备参战，英国已日益依赖于美国，这样就使西方战争进到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德意与日本法西斯勾结的结果，已使日本内部发生了转换领导人物与转换政策的变化，日本参加德意与实行南进的方针已日益明朗化，这样就使太平洋上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日益严重起来。日本为了放手南进与准备对美战争，便正在采取各种方法（交通封锁，军事进攻，政治引诱），以求迅速结束对华战争。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便由劝和中日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德国为了利用日本牵制英美与利用中国市场增强德国经济，却又正在准备劝和中日结束中日战争。所有上述情形，就使帝国主义战争必然扩大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范围之内，使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都有卷入战争灾难的危险，而抗日的中国则将成为帝国主义者双方争夺的对象。这就是战争的扩大性。这种扩大性，也就带来了持久性，因为双方都还有充分的实力，特别是美国与德国。因此区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最后胜负的决战还没有到来，虽然过去已经有了一个法德的决战，目前又正处在英德决战的前夜，但结束整个战争的决战目前还只带着准备的性质。那种以为战争不会扩大，不会持久，或目前已到最后决战时期的意见，是不正确的，这是对于此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性及其对世界人民的危险性估计不足的缘故。

（三）其次，国际形势中可喜的现象，是苏联用其强大实力与正确政策贯彻了不作任何帝国主义工具与不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旋涡的和平中立政策。目前社会主义的国界已推进到多脑河与波罗的海，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已获得伟大胜利，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与国防实力已极大提高，没有战争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深深卷入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比重是增加了，并还在增加着。但是帝国主义者妥协反苏的可能性并未消灭，因此苏联的基本政策仍然是动员一切力量，巩固国防，准备对付任何可能的突然事变，并坚持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方针。那种以为目前苏联将变更外交政策的意见，也是不正确的。

（四）其次，世界革命是随着帝国主义战争日益扩大、持久，而日益普遍与深入的酝酿着。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各国无产阶级反战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势力，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正在逐渐克服自己分散与不平衡的弱点的过程中，世界革命力量将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而成正比例的发展，我们现在是处在第二次世界革命的前夜，中国革命决不是孤立的。那种对于世界革命估计不足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五）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也正处于剧烈变化的前夜。因为我党七七宣言强调团结的方针，获得各进步派各中间派的广大同情，使大资产阶级投降派（暗藏在抗战营垒内的）与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今天主要当权者），日益处于孤立地位。我党新民主主义政治与统一战线政权的提出及三三制的开始实行，给全国人民以光明的前途。我党推动的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给将来新变化以思想上干部上之准备。我党过去一年坚决的正确的反磨擦斗争，则给了顽固派的进攻以深重的打击，使他们不得不在事实上（虽然还没有在法律上）承认我党之力量与地位。而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深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现在日寇正准备向昆明、重庆、西安等地进攻，国民党与中央军日益处于困难地位。虽然当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至今尚未放弃其反共方针，其对国内政治尚未着手任何改进，其外交政策依然摇摆于亲美亲苏之间，其对国共关系依然未下认真调整之决心，但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将是日益不利于顽固派，而日益有利于进步派与中间派。在一方面日寇与投降派逼迫之下，又一方面进步派与中间派逼迫之下，顽固派的政策与地位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是不能不起变化的。虽然变化的时间、程度与方向，目前还不能断定，但目前已处在这种变化的前夜，则可以断言。党内对于时局的悲观估计与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是违背中央历来认为时局并未丧失好转可能性的估计的。一部分党员则不了解即使时局变化到极坏局面（例如实行投降），我党亦有充分的把握改造这一局面，使中国抗日反汉奸的斗争继续前进，只要我党在精神上与组织上已经准备好了，便能应付任何的突然事变。

（六）时局变化有三种可能方向。第一种，是把抗战拖到美国出来干涉时结束，使其结果有利于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维持一党专政的现状，这是顽固派的一贯计划。但是这一计划与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及独霸太平洋的计划根本冲突。自欧战德胜法败，日本为法西斯支持的近卫内阁登台，中国西南交通线被切断，及日本向昆明、重庆、西安进攻的准备日见积极后，顽固派这一维持现状计划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但顽固派依赖美国救援及希望英国战胜德国，然后与美国合力干涉远东之幻想仍未放弃。第二种，是顽固派在万不得已时，亦有在内政问题上实行某种让步之可能，例如给民族资产阶级及某些中间派以部分的让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孙科、冯玉祥、李济琛、于右任、陈嘉庚、陈光甫、黄炎培、穆藕初、范旭东、康心如、章乃器等为代表，这个阶层至今基本上还没有政权，还是我党较好的同盟者），以便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外交政策上转到以亲苏为主要方针，以便利用苏联的外交压力与军事援助。在国共关系上停止反共战争（现在是大部分停止，还有一部分未停止）与减轻高压政策（在国民党区域现在还完全未减轻），以便利用共产党抵抗日本与保护国民党。不管顽固派是如何出于利用他人保护自己的立场，这一变化如能实现，即是时局的初步好转，这一变化是顽固派不愿意的，但到万不得已时，为了保存其基本统治权起见，在顽固派一部分聪明的领导人物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一让步计划，在抗战第一时期内，顽固派即已准备过，表现在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及其发布的抗战建国纲领。但武汉失守到日本米内内阁崩溃，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内，顽固派这一让步又为英美法反苏反共的世界政策及东方慕尼黑政策所打断，因而表现了一年来顽固派的反苏暗流与反共高潮。现在则又到了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变化时期，日本的军事进行将加紧，英美的对华政策在改变，苏联的外交政策着着胜利，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力量日益分割与分散，顽固派的威信日益损失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顽固派向着这一变化前进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一变化是为民族资产

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所要求的。而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内所要求的，则是经过初步改良，到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阶层的民主的统一战线政权，因为只有这一政权的实现，才能挽救中国危亡。第三种，是暗藏的投降派及一部分顽固派所准备的，即准备在重庆失守后组织贝当政府，投降日寇，而与汪精卫合流，以求保存其在日本统治下的奴隶式的政治参与权及经济合作权。这一计划，在日本殖民地政策，我党势力强大，及全国人民反对等条件下，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权的保存是有危险的。因为实行投降的结果，必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四分五裂与全国人民的抗日反汉奸高潮，因此这一计划只是投降派与一部分顽固派所愿意而不是全部顽固派所愿意的，但在十分危急时期，例如重庆失守那种时候，投降派及一部分顽固派是很有可能实现其阴谋的，这就是抗战中的主要危险与所谓全国性的突然事变，我们应该十分警惕。

（七）目前是上述三种势力及三种可能性之间的激烈斗争时期（顽固派要求维持现状，投降派准备组织贝当政府，进步派与中间派则要求亲苏和共与政治改良），并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们任务是坚决执行中央七七宣言及七七决定，团结一切进步派与中间派，分化与拉拢一部分可能起变化的顽固派，尖锐批评维持现状的顽固派，而坚决反对投降派与可能的贝当政府，以期实现初步的政治好转，即实现亲苏和共与政治改良三大方针，然后进一步实现彻底的政治好转，即实现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阶层民主的统一战线政权。我党这一反对投降力争好转的计划是目前唯一正确的计划。因此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加速准备一切条件，以便有把握的迎接任何一个可能的变化，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而不是忽视这些可能的变化，或坐待这些变化到来，或对时局变化发生错误的悲观心里或冒险情绪。在目前日寇准备向大后方进攻时期，我们应准备于恰当时机在全国提出保卫重庆、保卫昆明、保卫西安的口号，而在这些口号下面实现我们反对投降力争好转的全部方针。

中央关于优待反共俘虏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八日）

任何国内反共派，向我进攻被我俘获之俘虏官兵、侦察人员、特务人员及叛徒分子，不论如何反动与罪大恶极，原则上一概不准杀害。这一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办法。应使全党全军，从上至下有普遍深入的了解。其处置办法：凡反动分子及无用人员，则优待释放之；凡可参加我军的士兵及有用人员，则收留之；一律不得加以侮辱（如打骂及写悔过书等）或报复。如有关系紧要，必须处决之个别分子，则须经过军分区及区党委以上，或各根据地最高政权机关中，师以上及相当于师之机关党内之批准。旅以下，地委以下，专员以下，没有批准杀人之权。关于此事之详细规定，中央另有通知，各地先照此一般规定，通令实行。

中央书记处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

（一）日本正在积极引诱中国投降。德使陶德曼已有电报致中国当局实行劝和。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投降。日本与亲日派之目的，在于引起中国分裂，使国共两党互相火并，两败俱亡，以便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

（二）迅速动员党内外一切积极分子，用口头、文字、图画、书信、电报及一切可能方法，直接间接向政府当局，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的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投降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抗日军瓦解，必使抗战统帅身败名裂，必使全国人民陷入牛马奴隶的境地。这些正是日本的诡计，正是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的诡计，我们万万不要中此诡计，鹬蚌相争，只使渔人得利，枪口对内，只使亲痛仇快。我们共产党始终爱护蒋、爱护国民党、爱护友军、爱护一切抗日党派团体人员，所要求者只是坚持抗战团结，不投降，不分裂，不内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行我党中央今年七七宣言中的一切宣示及历来统一战线方针，愿与国民党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团结到底。如果他们一时不慎，陷入敌人圈套，闹到亡党亡国，我们就爱莫能助了。对于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容忍的。对于一切抗日朋友，则始终爱护，今当存亡危急之时，我们不得不尽忠告之道。同时，要求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积极注意最近河南方面有二十万军队向八路军新四军前进，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大家应要求政府制止这些军事行动，制止内战的爆发。

（三）党内外积极分子作宣传时，应当注意自己的态度。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不要骂中央军与黄埔系，不要骂杂牌军，不要骂三青团与复兴社，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加入英美集团，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但这不是目前斗争的中心），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强调日本的诱降阴谋，响亮的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提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投降制止内战，驱逐亲日派的口号。我们态度要诚恳积极热烈，尽一切可能，到处奔走呼号，不惜舌敝唇焦，表现自己是一个团结全民捍卫民族的爱国志士与忠心朋友。当此紧张时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我们过去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如果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被击破，顽固派要投降就比较困难了。

（四）谁是具体的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应依据各地具体证据去决定。而其全国性的领袖，就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集团。这一集团与日本及汪精卫秘密联系着，目前正在包围蒋介石，劝诱蒋介石下剿共命令与调动剿共军队。这一集团的目的，是在执行日本命令，挑起国共战争，使日本军队能从中国泥潭中拔出，好去对付英美。而中国一经内战，势

必实行投降。但要全国投降，必须拖蒋下水。于是亲日派从拥护蒋之反共政策着手，极力助蒋反共。他们以为反共战争一经爆发，便把蒋置于炉火之上，下不得台，投降就可实现。然后要求日本把蒋踢开，自己充当中国的贝当。这就是何应钦等的全部阴谋。因此也就可知，蒋及蒋系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由反共而走到投降的极大危险性。这是蒋的主要危险，我们应当十分警戒，绝对不可疏忽，以免上他的当。但就目前而论，蒋还站在国际三大阵线中国三条道路（或者投降，或者加入英美集团，或者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未下作贝当的决心，因此我们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的时间，那怕是很短的时间也好。目前最危险的，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及内战挑拨者。全党应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从口头上揭穿何应钦等的巨大阴谋，用各种方法宣布何应钦等的罪状，俾众周知，深恶痛绝，仅仅暂时避免在公开文字上提出何应钦的名字。

(五)必须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要进到更加具体化，不失一个机会去联络每一个可能的具体对象。要研究如何接近与如何同每一具体对象协同进行反投降反内战的工作。要求不要过高，那怕只有一二点微小的口头协定都是有用的。要每日每时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要精密分析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各团体各个人的具体情况，看出其中的矛盾与可能性。不要只看见黑漆一团，闭门不纳，望而却步，这些都是不对的。

(六)对于国民党区域的党的一切组织，必须遵照中央历次指示，全部的完全的有秩序的隐蔽起来，并准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任何地方，都要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要经得起这种袭击。

(七)关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的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

(八)又须告诉党内外一切积极分子与抗日人员，只要大家起来进行坚决的恰当的斗争，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有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因此我党及全国人民必须为制止投降与制止内战而奋斗。今天我党及全国人民多作一分反投降反内战的工作，即是明天多得一分胜利。时局的最后结果究竟如何，主要依靠我党的政策与工作来决定。

(九)不管时局的发展如何，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我党有五十万军队，有六十万党员，有全国人民广大的同情，有很多中间派还可作为我们的朋友或者守中立，有苏联伟大力量的赞助，有世界革命的酝酿，有帝国主义间空前紧张的矛盾，有敌人内部的严重困难，有亲日派与顽固派，顽固派与中间派，以及各派内部的严重矛盾，一切这些，都使我们有把握的来说，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与中国人民。不论时局如何黑暗，我党是有一切把握去最后战胜这些黑暗的。全世界与全中国的任何黑暗都是暂时的，只有依靠着自己坚决斗争与坚固团结的革命政党与革命人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这种信心，要在全党与全国人民巩固的建设起来。党内外必然发生的一切悲观动摇情绪，必须予以坚决的克服。

目前时局的严重危机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解放》周刊社论

我们在本刊一个半月以前的社论中已经指出："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总结起来，可以说：无论在世界在中国，我们都是处在大转变的前夜。"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投降危险空前增长的局面的中间"，这一估计，现在是完全证实了。

现在世界上政治形势变化的特点，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帝国主义战争继续扩大持久与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往上增长。

帝国主义战争的火焰，已经扩大到巴尔干（意希战争）与非洲，近东亦遭受着战争的威协。德国帝国主义本来企图迅速攻下英伦，但是由于英帝国主义尚有力量与美国加紧帮助英国，所以德国进攻英伦的企图受到了暂时的停顿。但是德国并没有放弃进攻英国的企图，进攻英国还仍然是德国战略的主要目标。现在德国大概已经估计到，进攻英伦，不是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德国及意大利，现在一方面攻占小国（德国占领罗马尼亚，意大利进攻希腊），加紧掠夺东南欧的资源（特别是煤油粮食等等），以准备长期战争的物质供给，在非洲进行夺取英国殖民地的战争，以分散英国的一部分力量，同时设法笼络被战败的法国，企图使法国直接参加德意方面作战，将法国所余的海军提供德意应用（德意特别感觉海军缺乏的困难）；另一方面，密切联合日本，与日本订立军事同盟，并在订立军事同盟后加紧要求日本积极实行南进政策，以图在远东分散英美力量，俾便德意在西方实行进攻英伦的主要战略目标。

至于英帝国主义方面，那末它在法国投降以后，即积极整顿自己的力量。英国重新改编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在美国的援助下面加强自己的陆军装备与海军空军，以抗敌德国进攻英伦本岛的企图。在地中海上面，英国保留着极大的海军，加紧利用希腊，拉拢土耳其（艾登在近东之活动等），并增加在埃及的兵力，以牵制德意在这方面的行动。至于远东方面，那末在东方慕尼黑阴谋破产之后，英国与美国，即诱引中国参加英美阵线，同时加强远东的军事设备，对日本采取禁运某些物品撤退某些侨民的恫吓策略，以反对日本。在英国的这些扩大帝国主义战争的行动中，美帝国主义是积极的援助者、支持者、物质供给者与实际参加者。罗斯福的重新当选为美国总统，无疑地将更加增强美国的这种作用（罗斯福已公开声明美国要更进一步与英国合作，更多的帮助英国，将美国百分之五十的军事工业生产，供给英国支配）。英美方面显然是正在积极动员自己力量来进行扩大的持久的帝国主义战争。

当帝国主义战争往前扩大持久的时候，超脱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苏联，由于社会主义

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地大大加强社会主义的国防力量。“布尔塞维克党、苏维埃政府以及全部人民都为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而工作……为列宁斯大林的党所领导的苏维埃国家，过去与现在一分钟都没有忘记它的任务——锻炼它的战斗准备，加强它的国防力量。苏维埃国家竭尽全力用技术装备红军海军，竭尽全力给年青的苏维埃人民以军事训练，以对国家有极度的忠诚及无限的爱戴的精神教育他们。”（“真理报”社论）苏联一方面坚持不作任何帝国主义的工具之政策，“永远提防，以免苏联被敌人的威协诡计卷入战争。”（见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科的演辞）同时苏联人民加强他们与他国革命人民的联系，援助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是更加提高了。“国际形势并不允许苏联作为一个不关心的旁观者。”（见加里宁演辞）苏联在国际政治上，以后必然将更起其伟大的积极的作用。

在帝国主义战争的火焰持久蔓延的形势之下，各交战国以及好些非交战国的人民，遭受着日益加深的蹂躏与痛苦。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是在扩大着，革命的酝酿是在发展着。最近德法警察联合镇压法国人民（特别是法国人民的优秀代表、法国共产党）以及印度英当局加紧压迫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与加拿大英国加紧压迫共产党的事实，清楚地证明这一点。这点就是帝国主义的统治者，也不能不承认了。

所以帝国主义两大阵线的战争，正在走上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道路，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则正在往前发展起来。

× × ×

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不能不影响到远东形势的紧张与我们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夺中国的斗争的剧烈化与我国国内亲日派的阴谋活动的积极化。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德意帝国主义为着对付英国以及实际上已经部分参战的、并将要全部参战的美国，就在与日本订立三国军事同盟之后，要求日本迅速实行南进政策，与英美直接作战。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陷于对华的侵略战争中不能用大力来实行南进，所以德意急于要使中日战争结束，以便它们盟友日本可以抽身出来，对付英美。中共中央在今年七月七日发表的“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曾这样指明了：“从国际方面袭来的阴谋则有由德意的劝和政策代替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可能。”现在这种可能，已经成了实际的危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已向中国政府当局提出“调停中日战争”，企图在日本某些“让步”的条件下，迫诱中国停止神圣抗战，向日本屈膝投降。

在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它对于中国的一贯不易的基本政策，是要灭亡全中国。在各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虽有所变化，但其基本政策，是没有变的。在经过了三年多的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已了解到坚持团结抗战的伟大中华民族是不能被战胜的。三年多中间，由于我国正面抗战的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能够达到摧毁我国抗战力量巩固占领区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本来要在直接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再来一次对华的大规模的正面军事进攻，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战争迅速往前扩大，德意要求日本加速参战，更由于日本军队在中国遇到中国军队、特别是敌后抗战军队以及广大人民的扩大的抵抗，由于日本国内财政经济困难的增加，由于日本国内反对侵华战争的运动的增长，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现在也急于要以某些“让步”，来分化中国团结抗战的力量，中止中国的抗战，以便它可以用最大部分的力量去实行对于南太平洋的军事冒险，掠夺南洋群岛的丰富资源，同时在中国继续来“扫荡”其占领区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以便它可以大肆掠夺中国被占区

域的资源财富。这对于转移日本国内人民的视线，对于往后更进一步灭亡全中国，是有很大的便利的。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现在也急于要在掌握在华基本掠夺物的条件下，来暂时“结束中国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已经讨论了并正在积极进行着诱引中国投降的阴毒活动。

所以现在德意劝降、日本诱降的阴谋，就广大地进行着了。

至于英美方面，那末它们也是不赞成中国的真正独立抗战来争取民族解放的。但是它们现在要中国为英美帝国主义利益，拖住日本的脚，所以它们以各种方法（借款、开放滇缅路等等）来诱引中国参加英美集团，图使中国抗战成为它们帝国主义战争的附属品。因之，拉拢中国参加英美帝国主义集团的活动，亦甚活跃，而且也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所要求。

在德意向中国劝降、日本向中国诱降、英美拉拢中国参加英美集团的形势下，我国大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面前，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日投降呢？参加英美集团呢？还是按照全民族要求继续进行独立的抗战呢？由于他们对于自力更生争取抗战胜利，缺乏信心，所以他们就发生了重大的动摇，他们今天对上面的这一问题，虽然还没有作出确定的答复，但其动摇性是严重地增加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内部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就乘机大肆其罪恶的投降活动。他们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汪精卫秘密勾结着的。他们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破坏抗战，而在目前则已经加紧进行其对日直接投降的阴谋了。

这些亲日派的阴谋打算是这样的：为要使中国停止抗战、对日投降，就要破坏民族团结抗战的力量，而破坏民族团结抗战力量的中心方法，就是：挑动中国内战，引起国共分裂，以造成全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国一起内战，一经分裂，则全国抗战自然不能继续，投降阴谋，就可迅即实现。那时他们就可以在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之下登台，来作中国的贝当，而使中国成为日德意集团的工具。这种阴谋，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老方法。而亲日派则正是秉承日本的意志来实行这一方法，以图使中国陷于毁灭。

这种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目前正盘据着政府的某些要职，掌握着一部分军权，并且正在包围着抗战统帅，诱胁他下反共内战的命令，以便拉他下水，迫他走进内战的泥坑，投入投降的陷阱，以便往后进一步把他踢开，自己取而代之。这种阴谋，是万分毒辣的，万分凶恶的。

由此可以明白看到，引起反共内战，挑拨国共分裂，乃是亲日派准备投降的绝顶凶恶的阴谋。亲日派阴谋家利用我国某些当局的反共成见，以图挑起大的反共战争，进行新的反共高潮。于是从三月到十月的确曾经往下低落的反共逆流，现在又在上涨了。这种新的反共高潮，虽然对于参加英美集团，亦是需要，可是其现在的主要来源，则是亲日派阴谋家响应日本诱降、德意劝降而利用某些当局反共成见所挑拨起来的准备投降的罪恶行动。于是，反共内战的危险，现在已是直接威协着我们民族的头上了。最近有数十万军队由河南向新四军八路军前进，意图进攻在苏鲁皖各地艰苦抗战的新四军八路军。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则建筑绵亘数省的五道堡垒封锁线，并增加军队至二十余万人之多。在政治方面，亲日派极力散布诬蔑共产党的谣言，企图在舆论方面准备反共分裂投降的政治资本。

因此，在日德意的凶恶阴谋之下，在亲日派阴谋家的挑拨离间之下，反共内战的危险、抗战阵营分裂的危险是迫切地横在我们民族之前了。

这种新的反共高潮的主要实质，乃是亲日派响应德意劝降、日本诱降来阴谋利用反共成

见以准备直接对日投降的毒辣阴谋。

× × ×

所以在今天，严重的投降危险，是横在我们民族面前，这种投降，会要使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完全为日寇所统治，会要使我国土沦为日寇的完全的殖民地，会要使我人民的生命完全受日寇的宰割，会要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完全为日本所摧毁，会要使我抗战统帅完全身败名裂，会要使国民党抗日同志备受日寇魔爪的宰剥，会要使全国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一切抗日人士备受日寇铁蹄的践踏，会要使我抗日部队沦为日寇任意枪杀的羔羊，会要使我全国人民沦为日寇所役使的牛马。投降是我全民族的死路，是我抗日军队与全国人民的死路，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抗日人士的死路，也是抗战统帅、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死路。

当我们民族三年来以无数热血头颅所进行的神圣抗战，现在有被亲日派破坏出卖的重大危险之际，我们全民族必须一致起来，反对这一危险，克服这一危险。我们一定要坚持抗战下去，反对屈膝投降，我们一定要坚持团结下去，反对反共分裂，反对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反对德意帝国主义的劝降阴谋，反对日寇的诱降阴谋，反对亲日派的罪恶投降活动，我们一定要坚持团结抗战到最后胜利。

我们共产党人向蒋介石先生郑重声明，我们是爱护蒋先生、拥护蒋先生领导抗战到底的。我们恳切地要求蒋先生坚决排除包围左右、挑拨内战、阴谋投降的亲日派，镇压亲日派的罪恶活动，使我民族的、在蒋先生领导之下的伟大抗战事业，不至为亲日派所破坏。我们诚恳地希望蒋先生警惕到亲日派阴谋家贝当主义者要把蒋先生当作中国勒白伦来利用、企图使蒋先生负担罪责身败名裂的重大危害阴谋，我们恳挚地希望蒋先生坚决清除祸害民族国家祸害国民党祸害蒋先生自己的亲日派阴谋家。

我们共产党人，向国民党抗日同志郑重声明：我们认为国民党内许多明达人士及多数党员是愿意坚持抗战的。在目前，当直接投降的危险已在面前之时，我们愿意和国民党同志更加紧密团结，来共同克服这一危险。我们相信，真实的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是会起来与我们一起去克服劝降诱降的阴谋，去制裁亲日派的罪行的！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总是要和愿意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在一起，同舟共济，共同为我伟大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我们共产党人，热烈希望全国抗日的其他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的人士，以亲密的团结与积极的工作，共同起来反对空前的投降危险与分裂危险，共同起来制裁亲日派阴谋家的罪恶活动。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五十万将士，始终愿意和全国抗日友军一起共同抗战到底。三年多以来，全国抗日军队，最大部分曾经和八路军新四军，肩并肩地在一起作战，在一起牺牲，大家的鲜血洒在祖国的原野上，交流在一起。我们相信英勇抗日的我国军队是决不愿为日本寇贼和亲日派阴谋家所利用来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以造成我国四分五裂为日寇所灭亡的惨局的。真正的爱国军人是应把枪口对准日寇而不应把枪口向着自己同胞、拿中国人的枪来杀中国人的。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对于抗日友军始终坚持守望相助患难相扶的抗日统一战线原则，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共产党组织的诺言。对于奉命被迫来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友军，我们始终是坚持自卫的立场，始终是坚守我们毛泽东同志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指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如何要和坚持抗战的友军团结在一起，共同去反对日寇与亲日派。

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反对投降危险，反对反共内战。反共分裂，屈膝投降，是我民族

的悲惨的死路。只有团结抗战，才是我们民族唯一的生路。

今天帝国主义战争是更加尖锐化了和扩大化了，无论英美，无论德意日都要进行更加扩大的帝国主义战争，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却独立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日益兴盛，日益强大。这种国际形势是有利于我们民族团结抗战的。只要我们全国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抗日人士，能够亲密的团结起来，动员起来，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去冲破重重困难，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去克服空前的投降危险，就能够有力量去克服分裂危险，就能够有力量粉碎日德意的与亲日派的新的阴谋。我们一定要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达到抗战建国的完全胜利。我们全民族要万分提高自己的革命警觉性，同时我们全民族对于抗战胜利应有充分的高度的信心。

当此存亡危急之时，让我们民族的每一人，紧急动员起来，亲密团结起来，揭破日寇诱降、德意劝降的阴谋，揭破亲日派准备投降的罪恶阴谋，坚决反对投降，坚决反对内战，共同驱逐亲日派阴谋家、内战挑拨者，共同克服对日投降的空前危险，以挽救目前时局的严重危机。

苏北事件真相

《解放》周刊编者按：亲日派阴谋家正在利用种种无稽的借口，来挑拨反共内战，准备对日投降。苏北事件正是这种借口之一。本刊兹将苏北事件的真相发表，是非曲直，让全国抗日人士公断。

本年十月四日，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遣数万大军，向苏北新四军陈毅支队作武装进攻，陈毅部被迫自卫，遂发生黄桥战斗，即是最近引人注意的所谓苏北事件。

事件发生前后，韩德勤氏，利用种种便利条件，大发各种宣言通电，说新四军"擅自渡江"，"属意磨擦"，颠倒是非，隐蔽真相，而投降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更推波助澜，企图利用所谓苏北事件，作为向苏北新四军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作新的大规模进攻之借口。但事实胜于雄辩，人证物证胜于一切造谣。用将我们已得到的有关苏北事件的各方重要函电一部分披露于此，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当此敌寇政治诱降空前严重，内战危险空前紧张之际，当此全国同胞应当更加协力反对投降反对内战之时，我们衷心地希望韩主席，悬崖勒马，勿再作鹬蚌之争，尤望中央政府当局明令皖南各友军撤去对新四军军部之包围，停止十五万大军向皖东皖北开拔，向新四军进攻之行动，捐弃前嫌，一致抗敌，挽救时局危险；这不仅是我们的企求，也正是全民族所切望的。

现在，我们将苏北事件的真相略述于下，以供国人正直的评判。

一　新四军陈支队被迫渡江

新四军陈毅支队为什么北渡长江呢？请看新四军项副军长梗（二十三日）午电对这一问题的说明：

一、（衔略）新四军陈管部北渡经过：（甲）南京失陷后，镇江、大桥、高桥、扬中等地，成立了地方自卫的武装，其领导者为管文蔚。本军陈（毅）支队奉命挺进江南，即将管部加以整编，编成管聂纵队，坚持敌后作战。（乙）去年（一九三九）三月，伪军方钧地（？）部在镇江第七区抽收捐税，收缴民枪。当奉顾司令长官（祝同）及冷代总指挥（欣）命令，于五月初派队将方部驻扬中、江都两地之武装解决，其残部为张少华（韩德勤部保安第九旅旅长）所收容。（丙）本年一月间，日寇进袭扬中，管部驻镇江之一部，即渡江增援，十一日扬中失陷，交通被日寇阻隔，该部即留驻北岸。（丁）二月间，泰兴敌总攻泰州，哿（二十）日大桥失陷，管部即西进增援，协同友军作战，将敌击溃，战斗延至三月。不意苏省主席韩德勤令调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及江苏保安旅，集合兵力约十四个团，向驻大桥、江都地区之管部进攻，经八日七夜之苦战，始得突围自保。（戊）六月间，六十三师开高邮、东汇，挺进纵队第五六团开溧水、上兴一带，新四师开溧阳、竹箕、南渡，对我江南指挥部取包围形势，围攻医院，截断兵

站，陈毅不得已率部退移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己）此时正值驻大桥之管部被围告急，陈毅支队渡江欲谋调解，以期和平谈判，奈以韩李毫无诚意，未获效果。陈（毅）不得已始以一部增援管部。（下略）

由此可见，管文蔚部原是镇、扬、泰一带的地方武装，散驻大江南北，其全部北渡，则是由于奉命解决伪军方钧地（？）部，并由于日寇向北岸进攻，管部北渡增援，及至扬中沦陷，归路已断，于是管部不得不留驻江北与日寇周旋。

其次，在六十三师等部的包围进逼之下，陈毅支队为避免箕豆之煎，不得不忍痛离开江南，向江北转进。同时由于管部被围，调解既未如愿，不得已以一部增援。

由此可见，陈管两部之北渡长江，纯系出于奉命抗日，避免消耗实力于内部磨擦；即最后不得已的自卫，也是为国家民族保存抗战的实力。

二　韩德勤领导反共

陈管两部渡江进入苏北的事实，既如上述。可是，有些人却不以国家民族为念，而认为："目前苏北之危，敌伪反不足虑（！）其祸患实在共产党领导下之甲乙两军（编者按：甲军指八路军，乙军指新四军）……例如城市为敌伪所据，我方可退守乡村，照常推行政令，若某县为共产党所据，则附近各地皆无我方官兵容身之地。明乎此，当知异党为我方唯一（！）劲敌，甲乙两军为苏北心腹大患。"（见江苏省政府印发之"敌军(按指新四军八路军）内容与我方对策"）

他们从这种不顾民族国家的观点出发，根据"敌伪反不足虑"，"共产党是唯一劲敌"的分析，于是乎大举反共，其领导者就是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氏。下列文件就是铁证：

(A)江苏省政府于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发出之秘字第一一七四号密令，严饬所属执行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即系韩德勤兼任）制定之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工作人员，连保连坐办法。此办法内容是：

"(一)为防止异党活动，特制定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工作人员连保连坐办法。

(二)连保连坐办法计有二种：一，保护式——各军事政训机关各部队之军官军佐文官，凡少将以下者；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除各级党部特务机关工作人员，省党部委员书记长外；各学校各训练机关民众团体社会法团之负责人，皆由较高级长官或高级人员二人保证。二，连保式——各军官佐，军用文官，政训工作人员，凡校官以下同官阶者；公务人员，凡荐任职级以下职级相等者，各级党部及民众机关之职员；大中学校，训练机关之学生学员；各民众团体，社会法团之工作人员，皆由三人互相连保。

(三)使用办法：一，单独使用一种。二，混合使用两种并同时使用两种。即保证人对被保证人或相互保证人，有违反三民主义之言论及行动者，有××（电码不明）中国国民党以外各党派之行动者，负保证之责任。……"

(B)江苏省政府于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发出兴朋字第二八二八号密令，其内容要点为：

"(一)防止异常活动，以县为单位，由县长负责任。

(二)（从略）

(三)各县长发现异党活动各情事，应紧急呈报省府专署，并随时与驻在附近之国军地方团队，取得密切联络，尽力防止其活动。

(四)各县长每旬填具防止异党活动之工作报告表，分呈省府及专署。

(五)各县长密定宣传方法，督促区乡镇保甲长为积极有效之防范为要。”

(C)本年六月九日发出的，由特派员韩德勤，书记长蓝伯远联署的中国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特别党部之组字第四〇二号密令称：

“(上略)遵照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既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颁发之防止异党兵运方案，拟定防止异党兵运实施办法一种，仰即切实执行。附防止异党兵运实施办法（密）（一）本办法依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既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颁发之防止异党兵运方案为宗旨。(二)本办法之目的在使地方原有及日生（？）之武力细胞信仰坚定，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并运用广大民众之努力与异党投生（？）之觉醒，粉碎异党之阴谋毒计。(三)本办法之实施，以理论克服理论，以组织对付组织，以行动制裁行动，以工作领导工作为原则。(四)实施办法：一，对所属士兵党员举行直接或间接之心理政治常识行为等项之考验，以明了其对领袖之信仰，抗战常识，党义了解；二，考验结果对可疑之士兵，应即严加侦察，以明底细；三，建立报告网；四，查禁或切实检查官佐士兵之来往函电，倘发现可疑之语句，即暗中毁灭，并多方侦询，以明究竟；五，以营为单位实行连保连坐；六，考验调查属实之异党分子，应指示官员多方说服，纠正错误，使其坦白自首，如顽冥不服，应即看管。……”

(D)八月二十日发出的江苏省政府密代电兴民字第三五八三号内称：

“(上略)防止异党非法活动，这经中央及本省先后决定办法，通令遵办有案。近据查报，各地方仍有异党潜藏，足见此重要明令尚未认真率行，言之至为痛心。特再规定办法六项：(一)各县市镇保甲长，以清除奸伪，防止异党非法活动两项为唯一中心；(二)保甲长应随时检查保甲内居户及要道，遇有奸伪或异党潜入，立刻密报；(三)如确系异党分子，应负责监视；(四)如有疏忽谬误情事，一律究办；(五)如有知情不报或放纵勾结情事，应依法惩办，并予以连坐处分。……”

(E)苏省府韩主席认为这种密令之下达，犹不足以竟全功，竟更进一步于本年九月三日，对所属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训话，公然反共。训话要点由张征法吴玉书记录下来，兹摘录如次：

“训话要点第三项为匪军罪恶与剿匪决心：(一)违反国家法令，不服从三民主义的就是匪军；(二)匪军是违反中央命令，破坏国家法纪的；(三)匪军是最阴险最虚伪最无人道的；(四)匪军是没有信义，没有道德，最残酷的；(五)目前破坏抗战，危害民国的最大叛逆就是匪军；(六)剿匪与杀敌同样重要，同样有功；(七)要抗战胜利，安宁地方，必先剿匪；(八)我们不消灭匪军，匪军将消灭我们；(九)我们必须人人下最大决心消灭匪军。

训话要点第四项为剿匪必胜的信心：(一)我们奉中央命令剿办匪军，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师直为壮曲为老，此所以必胜；(二)我军是正规部队，兵力超过匪军数倍，匪军是乌合之众，真能作战的甚少；(三)人民是拥护我们，听我们领导的；(四)我们必须英勇××（电码不明）一致荡平匪犯；(五)我们必须抱定剿匪必胜的自信心，完成任务；(六)此次全力进剿，必定可以剿除匪患。”

无疑的，这是“黄桥战役”开始以前，韩主席的剿共誓师了。

(F)当然，“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焉”。在韩主席的领导之下，那些逢迎邀宠的人，自更

借此迎合上意，雷厉风行，那里还管什么民族国家、团结抗战呢?!且看江苏省邳县县长王化云所作之小册子“敌军内容与我方对策”(编者按：这里“敌军”即指八路军新四军，“我方”即指省方)，其主要内容摘录如次：

“(一)我方部队，若有弱点，即怯于内战，临阵时怨言四出，或谓弹药不足，或称武器不良，或托词在国难期间，枪口不能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意在避战，不愿牺牲，故有种种自私自利的懦弱表示。须知攘外必先安内，凡土匪汉奸维持会皆中国人，若本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之原则，听匪伪烧杀抢掠而不问，试问成何国家?古人有言，杀人目的，在于除暴始能安良。目前苏北之危，敌伪反不足虑，其祸患实在共产党领导下之甲乙两军(编者按：甲军指八路军，乙军指新四军)。因该两军，发展神速，实有突飞猛进之势；若不迅即制止，如野火之燎原，无法挽救矣。例如，城市为敌伪所据，我方可退守乡村，照常推行政令；若某县为共产党所据，则附近各地皆无我方官兵容身之地。明乎此，当知异党为我方唯一劲敌，甲乙两军为苏北心腹大患。

(二)甲乙两军初到苏北，相距尚远，联络不便。我方应派员与到达扬口汤沟之甲军联络，表示缓和，并派一部份兵力，相机监视之。再于暗中抽调各部队，进剿泰靖通如一带之乙军。如此项军事行动，为甲军所悉，我方则派员或托当地士绅向甲军解释，谓泰兴方面之冲突，系属误会，乃地方事件，我方军政当局已下令制止矣；或购买适于军用之礼物，分送甲军，施以小惠，作为缓兵之计。并将扬口、阜宁、益林等处之交通完全封锁，不准客商通过，以免甲军派人乘轮前往泰兴，与乙军联络，得悉真相。泰靖通如之交通，亦宜封锁，以免乙军派员与甲军联络。甲乙两军纵利用无线电台，传达消息，但电文简略不详，我方探知匪军电台所在地，围攻时首先将其破坏，则无线电亦失其作用。俟泰兴军事结束，即飞调各部队收复涟水，围攻甲军。”(下略)

这一小册子，得韩主席之赞赏，已由省政府翻印，发给所属及各部队，当做教育材料。

(G)再看韩德勤的机关报“情报”上的反共言论。

(甲)九月四日的社论，“论肃匪”一文内称：

“……其实借抗战的美名，曲解主义，阻碍抗战劫夺民财，实行赤化。共产党主义之虚伪，犹能回忆往年赣省民众××××(电码不明)之惨祸，而惊心动魄，应立即大张挞伐，毋使滋蔓。……此辈心目中实无祖国，人兽之分，亦几希矣。”

(乙)九月十三日的社论，“告苏北同胞”一文内称：“……汪逆借和平之美名，断送国家主权，匪伪则以抗战之美名，出卖民族利益，两者同样是国家罪人，民族叛徒。……”

(丙)九月十四、十五两日的社论“正名”一文内称：“……不遵国府命令，中共要实行民族失败主义、实行反爱国主义，其形成与存在和新民会大名会之形成与存在一样，为异族侵略中国的工具。所以，斧头牌的国徽主义等于太阳牌的东亚主义，中国共产党等于中国新民党，抗命叛国的军队等于皇协军和平救国军，毛精卫等于汪精卫，………中共不是中国人的集团，不拿中国当祖国，更希望中国早日灭亡，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等于奸党，……西安事变后，奸党军队所以愿意改编者是保留作用，是骗钱作用。目前他们祸国扰民，所以新四军是匪军加匪军。……”

这还成什么话?这难道是对友党友军之常态?!

(H)再看在韩德勤氏这种一贯的反共政策领导之下的军队政治工作。下面就是独立第六旅第十六团政治指导员刘志强之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工作日记，由此可见其努力反共之

一斑。

“(一)布告江北苏皖地区逆匪五大罪状，日期三月二十一日，地点东王庙。

(甲)研究事项：一，摧残人民，二，违背命令，三，欺诈虚伪。

(乙)实施经过：将逆匪罪状，列举通告，(详稿簿)

(丙)实施结果：民众洞悉逆匪罪状，一致声讨。

(二)告诫江北苏皖地区逆匪及被威胁的民众，日期三月二十一日，地点东王庙。

(甲)研究事项：一，准予自新，二，入匪非法组织，仍不觉悟者，则加以讨伐。

(乙)实施经过：将对自新者之优待及对不悟者之讨伐等各项办法，列举布告。(详稿簿)

(丙)实施结果：民众深知被利诱之险，被威胁之危，纷纷自新。

(三)张贴标语，日期三月二十一日，地点东王庙。

(甲)研究事项：一，逆匪五大罪状；二，告诫逆匪及被威胁民众；三，我们的主张；四，请大众研究“毛泽东先生”，

(乙)实施经过：张贴东王庙、马家集、竹镇集及附近各村庄。

(丙)实施结果：民众深深明知剿匪意义，努力协助军队讨伐逆匪。

(四)举行剿匪宣传大会，日期三月二十一日，地点马家集。

(甲)研究事项：一，演讲，二，讨论，三，歌词，四，呼口号。

(乙)实施经过：一，指导员演讲，二，知识民众发言讨论，三，政工队歌咏，四，宣传队员领导民众呼口号。

(丙)实施结果：民众深切认识逆匪的真相与讨伐的必要，并奋勇协助军队，切实实行剿匪工作。

(五)对东团官佐宣讲逆匪罪恶，日期三月二十一日，地点东王庙王庄。

(甲)研究事项：一，集合谈话，二，个别谈话问答。

(乙)实施经过：集合并经宣讲逆匪罪状、讨伐理由及办法。

(丙)实施结果：官兵认识清楚，目标准确，愿意牺牲个人，完成使命。”

(I)韩德勤氏之厉行反共也可以从其令颁之反共标语上看出，兹择要录下：

“欲抗战建国胜利，必先肃清万恶匪军。

欲安居乐业，必先肃清万恶匪军。

欲肃清匪军，必先使军民密切合作起来。

欲肃清匪军，必先使军民动作一致。

匪军是危害国家民族的罪人。

匪军是阻碍抗战，破坏统一的国民公敌。

匪军一日不消灭，国家一日不得太平。

匪军一日不消灭，抗战一日不能进到胜利之早临。”

(J)韩德勤氏的反共政策，自不免要踏上勾结日寇的前途；至少现在是已成为汉奸的逋逃薮。下面就是韩氏所属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通敌之罪证。

敌䶢䶢中尉致函并綦少尉，着掩护张英部过江。张英为张少华之弟，即在张旅任团长。原信为日文，兹特译出如下：

“(衔略)连日的奋斗，甚劳苦，特此慰问。本日特从庞村派出张英之妻，为江北

连络员……为掩护在江北之张英部队渡江起见，可命徐文郁部在圩堡镇方面采取必要的行动。该部队人员约有一百名（按系仅指渡江者而言），并携有联络旗。现先使该部队与贵队联络，恳请多方指示及帮助为盼！（下略）”

（K）六月九日，易冰心写给江苏省第七区专员王殿华的报告，原文云：

“（上略）日方决定消灭苏北共党及游击队，其办法如下：甲，建立和平建国军；乙，收容游击队；丙，每乡组织反共良民自卫团；丁，预备在三个月内实现，完成后，日军即撤回，每县仅留日军一中队或一分队而已，其余一部份割交与××助（电码不明）司令；戊，我到汪处接头，现准备明日动身。（中略）不重要时，无大紧报，俟南京回时再说，具体情形及计划由刘流芳代报。（下略）易冰心报于百忙中。”

（L）韩德勤氏之一贯的反共政策，必然要发展到军事反共，下面就是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传达韩氏的“剿办异军”的电令：

“（衔略）奉剿匪总司令韩省申策宜电开，奉总司令于佳申电转委座令一元川电开，该战区异党部队之活动，亟应遵照二十八年十二月阳酉令一元电令办理，如发现非战斗序列中所规定隶属于该战区者，应视同敌伪，准予剿办。自应严密制裁，相机铲除祸根为要。（下略）”

（M）再看顾（祝同）韩（德勤）连署的剿共密令：

“（衔略）奉军委会办此筱三电开，据报中共企图在本年完成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我方部队多数缺乏消灭中共之诚意，士兵训练，亦感不足，一经临阵，往往被其麻醉，失却战斗情绪；而指挥不统一，意志不集中，尤为促成中共扩大之主因，若不及早制谋对策，则苏北武装部队十万人，不消灭于敌寇之手，转为中共各个击破无馀矣。（下略）”

（N）五月十五日江苏省第七区专员王殿华进攻皖东北之张爱萍部之命令，原文摘录如下：

“（衔略）（一）共军张爱萍部主力现仍盘据朱湖，我军有歼灭该匪之任务。（二）第四纵队两个营攻击朱湖右翼，×××团（电码不明）附机炮连（炮一门）攻朱湖正面，淮阴常备团攻朱湖左翼。（三）五十四团二营解决永安河东岸之匪后，可重新布置攻击，策应朱湖主攻。（四）如敌退天长，应尽量截击，以期歼灭。（五）六十二团两个营随余位于马宅一带，为总预备队。（六）各部队统限于命令到达后，即时移动，务于午后一时，到达攻击准备地点，三时开始攻击。（下略）”

（O）五月敬日（二十四日）淮阴县保安团第三大队长姜培厚的作战报告，原文云：

“（衔略）职奉命攻击盘据森元集之新四军，当即率全队向森元集挺进，下午四时到达壶庄，即开始攻击，激战数小时，第七中队占领该集之东面。同时由北面攻击之第七旅部队亦已到达，协同向集内之敌攻击（中略）我各部队与七旅部队确实占领该集，并分途追击，是役毙敌十余名。（下略）”

（P）再看韩德勤氏所下的作战命令——六月有（二十五日）酉电内称：

“（衔略）鸿密，（一）据报新四军一千余人，现在七圩港与常九旅接战中。（二）为合力歼灭该敌起见，仰各该部各派精锐部队一大队，迅速前往，包围而歼灭之。（三）以上各部队，归何指挥官克谦统一指挥为要。（下略）”

（Q）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氏给所属各军的感酉电令内称：（发电日期本年六月二十七

日）

"（衔略）（一）据各方确报，匪军现在江都泰县泰兴各县境内，集结兵力五六团，有夺取两泰，进攻兴化，造根据地，而以匪化苏北之企图。（二）我军以安定地方，坚持抗战（？）为目的，决将该匪军，就江都及两泰各县内，及运河东西，并洪泽湖南北地区，分进包围而歼灭之。（三）着李总指挥（明扬），指挥所部及张星柄、何克谦、张少华各团部队及泰兴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泰兴地区所有匪军包围，一举而歼灭之。（四）着李军长（守维）指挥所部第八九军及王殿华、张能忍、秦云鹏各旅队及地方团队，迅以主力进击洪泽湖以北地区，攻击泗县境内各匪军而歼灭之，并以有力部队向盱眙天长压迫，联系李总指挥所部，肃清洪泽湖之共军。（五）以上各部队，统限电令到达后，即便实施。（下略）"

（R）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根据韩氏的感酉电令，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二时发出如下之作战命令。

"（一）约有异军千余人，现在焦家荡、焦家堡、袁孙庄、虾蟆圩、姚家×（电码不明）、大小元仙一带扰乱中。

（二）我各旅团队奉令有分进合力围击歼灭该敌之任务。

（三）右翼部队（第九旅全旅与泰兴县常备旅之一团）归孙副旅长暨丁团长统一指挥，限于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十二时占领豚土桥、张家桥、昆卢寺、十里店、姚岳一带，将攻击准备布置。

（四）左翼部队（第四旅七八两团暨第十纵队第二团八支队）统归范司令指挥，限于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前占领大蚱家庄、印庄、肖家柞暨虾蟆圩附近，将攻击准备布置，并相机占领虾蟆圩。

（五）各部队占领攻击准备布置后，即向焦家荡、焦家庄、闻家庄及虾蟆圩一带之敌攻击前进。

（六）各部队应互相切守联络。

（七）旗号及口令另表订定之。

（八）各部队就攻击准备布置后，将各项情况随时具报为要。

（九）敌我情势如略图。（附略图一份）

（十）余在黄桥指挥。"

以上为七月间"黄桥战斗"以前，韩部进攻新四军的布署配备与作战命令。

（S）宿迁县政府七月筱日（十七日）通报，原文云：

"（第一、二、三项从略）（四）津浦南进支队第一团孙向贤部刻在全镇一带，被南劲九（？）军独立团痛击，匪部损失甚大，刻已逃窜吴周口一带。（五）江苏省第七区保安司令部代电苏保参字第三〇三号内开，案奉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敬午转彭电开，顷据张旅长能忍养亥电，据泗县马县长报告，本县南方城、新行圩、孙围等处，连日来有匪部数千名，为苏鲁豫皖部队，匪首为彭明治，联络皖东北之张爱萍钟微等匪部数近万名，其企图现尚未查明。本部兵力单薄，恐不足御，请即电苏皖两省府迅派大军协剿，免致伸延，等情。除电复外，希即严防。（下略）"

（T）再看八月下旬韩德勤氏进攻黄桥的作战命令，原文如下：

"命令　八月二十一日发于东台副总部　　第三三九号

(一)盘据分界、黄桥一带之匪军，其司令部在分界镇，其前进部队约有一团，古溪、营溪、孙家庄各有八百人，运粮河、陈家桥、花园桥及北新街、苑高庄等处，时有散匪及便探出没。

(二)我军以歼灭该匪为目的，拟向分界、黄桥附近地区攻击前进。

(三)兹规定兵团区分及攻击部署如左：

(1)特派李总指挥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李军长守维，李副总指挥长江为进剿军副总指挥。并派李副总指挥长江兼右翼进剿军指挥官，陈指挥官太远为副指挥官；郭参谋长心冬为左翼进剿军指挥官，刘师长漫天为副指挥官。

(2)右翼进剿军李兼指挥官长江率所属精锐部队三个支队及苏北游击指挥陈太远全部，于八月三十日就姜堰附近集结完毕后，于九月二日起，经蒋垛及其以东地区向黄桥镇附近地区攻击前进。

(3)左翼进剿军郭指挥官心冬率第一一七师（欠一旅）附独立第六旅（欠一营）保安第一旅（欠二营）于八月三十日就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结完毕后，于九月一日起经古溪及其以东地区向黄桥镇附近地区攻击前进。

(4)左右两翼军作战地境为崔田镇、大小虎庄、鸭儿湾连线上属右（李）翼军。（缺）

(四)各守备地区布署如左：

(1)泰州城及泰州至刘家铺以南并泰州至姜堰（不含）一带，由鲁苏皖边区部队担任之。

(2)姜堰（含）至白米（不含）间由保安第九旅（欠江南两营）担任之，白米(含)至曲塘（含）间由保六旅陈旅长率兵两营担任之，均归陈指挥官熏箕指挥。

(3)曲塘（不含）至海安及用发桥栅湾（含）一带防务由保四旅担任之。

(4)以上全线守备任务，均限于三十日晚接替完毕。

各守备部队须大量运用已设之碉堡工事，节约蓄力，并在守备线南北地区搜索警戒，肃清散窜之匪。

(五)作战指导事项：

(1)各军前进时（行动待后指定之路线），对于沿途及两侧之敌匪派队驱逐或监视之；万不可以大队与其肉搏，致迟滞前进。

(2)各军前进路线及其每日到达地区，逐日由本部规定，于先一日中午前后告知。每日到达驻地，随时应即修筑防御工事，在扼隘地点派必要兵力，以每营一连为工事（一律务于中午前后完成）。夜间警戒应注意匪由四面接近，并多派埋伏战斗侦探，尽力向远方严密搜索；如发现敌人时，按其兵力兵种行进方向，以预定之记号（手电电灯光或打枪）向后方报告，非在与匪十分接近之际（尤其夜间）不得任意打枪，无谓消耗弹药。

(3)各军应互相通报及向后方报告，并携带电话为要。此外应各指定专用无线电台，不分昼夜，以简明文字（到达出发地点及日期并与匪军接触情形）联络，各部队务携带夜用之被覆电话线，随指挥官前进敷设之。

(4)逆匪如放弃分界黄桥，我军应即跟随进击而歼灭之。

(5)派本部李参谋正道随左翼军，张参谋随右翼军前进，担任联络。

(六)以上各项除分别电达外，仰即遵照办理具报。

(七)余在东台副总部。

右令

保九旅旅长张少华（下略)”

三　陈毅支队被迫自卫

——黄桥之役——

在韩德勤氏的步步进逼，大举围攻之下，陈管两部的态度如何呢？请看本年十月间各方的函电，便知实情

(A)陈毅电称：

“(衔略）我们一贯的坚持团结，不愿分裂，屡次派代表与韩主席进行和平谈判，奈迄未获允。及至我军进驻姜堰后，韩主席表示，新四军须立即退出姜堰，始能提及谈判；同时，各界民众犹信韩之诺言，以为新四军果能退出姜堰，则苏北和平即可实现。我方为坚持团结，立即服从省方意见，尊重人民公意，乃于九月三十日退出姜堰。但是韩主席以剿灭我军为一贯政策，乃违反诺言，于我军退出姜堰之际，复派大军南下征剿……”

(B)不信，请看韩德勤氏卅（九月三十日）亥电令：

“(衔略)(一)姜堰之匪，确已向黄桥方向撤退，由此足证我战略上已获先制之利。(二)现匪胆已寒，必求与我决战，我务集中力量，求主动，切勿为匪阻止，致成对峙状态。(三)欲求全胜，舍攻击而外，无他法门，攻击之时，必求匪之一翼或两翼包围而歼灭之。(四)此次决战，关系苏北及我团体整个政治军事问题至大，事已至此，应不惜牺牲，达到最后目的。希将此意通达各级将领，各自努力，切勿企图苟安为要。(下略)”

(C)在陈部退让，韩部进逼，两相对照之下，是非曲直自见，公道自在人心。因此，韩氏指挥下的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将军也以国事为重，而不直韩之所为，特于十一月二日致电韩氏，请其停止进攻新四军，原电如次：

“东台主席韩钧鉴：顷据新四军特派代表朱团长克靖来泰面称，奉陈总指挥毅意旨，以苏北情势日益严重，敌人正大举进攻，肆行“扫荡”,此时正宜团结内部，一致抗敌。新四军既已退出姜堰，并逐渐后退，表示真诚；现更进一步请求在韩主席领导之下，在沿江一带，担任重要抗战任务。恳希主席迅饬所部，停止进攻，退至海安、好家集一带。至其他问题，在整个抗敌合作条件之下，极愿洽商遵照。如何？盼示！以便转达。李明扬印”

(D)苏北绅耆在此情形下，也不直韩氏，电请中央制止韩部的军事行动，原电云：

“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军令部长徐，军政部长何，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程，并转西南办公厅主任李钧鉴：最近苏北因省方各旅及八十九军全部东调，集中海安东南各地，以致敌寇乘虚而入，于上月哿日（九月二十日）袭占樊川、老阁，烧杀甚惨，兴泰两邑，恐怖非常。恳急电韩主席，顾全苏北全局，迅将所属军旅，西调对敌，勿任丧失领土，涂炭生灵。苏北民众绅耆各界李履初，胡××（电码不明）吴云山，卢正安等二百四十五人同叩冬（十月二日）”

(F)陈毅致朱彭叶项等电

"(衔略)上月(九月)中旬，江苏耆绅韩国钧，黄逸峰等分电苏北各军，一致停止内争，共同抗敌。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氏覆电谓：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宜先退出姜堰，再言其他等语。是时，泰县、如皋、泰兴等八县代表，先后持韩复电到姜堰接洽。职即负责答复，新四军为顾全大局，促进合作，开展抗敌工作，决定自动撤退，限九月三十日以前撤完，请转知友军接防；但同时要求即在姜堰开军民代表会议，分配抗敌任务，发动苏北战役反攻。八县代表闻之甚为感动，大喜过望，乃通知省方派队接防，并派代表来姜堰集议。不料电话往复筹商，毫无结果。三十日晨，省方来电谓新四军应立即退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否则无话可说。查是时，省韩已令八十九军及独立旅共一万五千余人，由海安进攻职部，已接触于海安之南。各代表闻讯大哗，咸认受韩愚弄。知韩所提退出姜堰之条件，乃欺骗之词，不顾抗敌大局，以根本消灭新四军为既定的不可动摇的政策。职部处此危局，为自卫计，非不能以姜堰为根据，乘省韩向我进攻之际，猛扑兴化东台，直捣其后方，以作报复，然念及日寇正大举西犯，敌后国军应以攻打敌伪为神圣职责，一切内争，皆属对消国力，动摇国基。省韩措施，固属昧于大义，不顾大局；但我部奉令抗战，'言必信，行必果'，窃自厚而薄责于人，善于人交尽其在我。乃决心再事退让，忍痛退出姜堰，以使省韩觉悟。八县代表对职部此种光明磊落、委曲求全、尊重诺言的行为，肃然起致。姜堰民众代表数百人一致挽留职部长驻姜堰，请勿南撤。经再三抚慰，终于九月三十日，全部撤完，冀有以感动省方，获得谅解。不料省韩更下令作大规模之进攻，于九月三十日进占我军营溪、加力等阵地，十月一日复进逼至卢家庄之线，距黄桥仅三十里，职部一心坚持抗战，尊重抗战国策，仍不愿作无意义之战斗，乃再事退让，将全军集结黄桥，静待省方觉悟，并派代表赴泰州曲塘友军处，请李总指挥明扬陈指挥官太远出面调停，并劝阻省方，停止进攻。查黄桥处大江北岸，敌伪势力怀抱之中，省方不进攻敌寇，专与职部寻衅，着着进逼，势非歼灭职部不止。若省方进而猛扑黄桥，职部背临大江，一时退避不及，势必不得已起而自卫，成败固不足计，奈贻笑万邦，称快敌寇，损失国军荣誉，破坏国共合作，咎将安归?!应请钧座转呈上峰，制止省方行动，顾全大局，拯援职部，为祷，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职陈毅叩江(十月三日)"

(F)陈毅等呈叶(挺)项(英)军长转呈顾司令长官(祝同)并转呈蒋委员长之呼吁停止磨擦电：

"(衔略)八十九军，税警团，独立六旅，保安一、四、五、九四个旅，全部计二十六个团，于支(四日)辰由姜堰、曲塘、海安出动，分三路向驻蒋垛、黄桥、野周庄之职部进攻，来势凶猛，残害人民。职部为顾全大局，不愿内战，决心退让，未作抵抗，已于支(四日)午放弃黄桥及其以北各阵地，敬希设法转呈上峰，飞令进攻军以抗敌为重，不得节节进逼，一切是非曲直，静待上峰处理，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职陈毅管文蔚叶飞叩支(十月四日)"

(G)陈毅呈叶项转呈蒋委员长之呼吁电：

"(衔略)职于七月初进抵黄桥，调解管(文蔚)部与苏鲁皖李部纠纷，并向韩主席及李总指挥请示。蒙派一一七师仇主任霈甡及许参谋长克赖来黄桥，面商一切，当决定调整苏鲁皖军与新四军管部之方针：各守原防，努力抗敌，一切纠纷，静待上峰处

理；并约定省军担任海安、曲塘、姚堰之线，不南下，管部住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之线，不北进，庶可避免武装冲突，以珍惜国力，而安民心。仇许两代表即令我管部在泰兴、靖江、南通地区行动，于八月中旬，先后攻下靖江、南通间之老庄、头拿山、西来镇各据点，管部伤亡百余人，内中毒气者四十余人，事实俱在，可供鉴察，迄八月下旬，省方在北面封锁食粮，禁止运至黄桥，公开宣称，大兵南下剿共，并印发传单。职屡电韩主席呼吁和平，迄未得复。职处此危局，于省方态度，不敢妄自揣测，惟力求息事宁人，疏解误会，乃派朱团长克靖赴泰州李总指挥处解释一切，并与省方数要人面谈，力求各方忍耐，不应以武力解决苏北纠纷。耆绅韩国钧老先生亦出面呼吁，并同情职部主张。不意，朱团长返部后，至九月初，以省方用兵之众，势不可挽回，职不得已又派朱克靖约集黄桥绅耆代表数人，首途赴东台泰州力挽危局。万万不料省军于支（本月四日）辰出动，支午已南下猛攻管部驻地。职为顾全大局，立令该部放弃蒋垛、野周庄、营溪、花园桥之线。省方八十九军、保安旅、独立旅、税警团，计二十余团，于占领野周庄、营溪、花园桥后，支晚即派队南袭，职不得已忍痛再令管部向加力、卢家庄、×（电码不明）经之线后撤，仅留一部在古溪押送后方行李。不意省军复于微（五日）午再以并列纵队，齐头并进，未南下之职部遗留于古溪的医院、修械所、辎重队，撤退不及，被迫应战，自微晚至鱼（六日）晨发电时止，正友军放势猛攻，两方损失奇重现尚在对峙中。职部孤军被围，危殆万分，恳钧座立电韩主席，制止友军行动，主张公道，拯救职部于万难之中，不胜祈祷之至，临电迫切，涕泣陈词，伏乞钧裁。职陈毅鱼（十月六日）午、参战叩”

(H)最后，请看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复蒋委员长电，原文如次：

“委座钧鉴：文（十二日）电奉悉。当以苏省情形不明，电令一一五师陈代师长查复，同时电询新四军叶军长希夷去后。兹据陈代师长复称：职属彭明治部原在苏北徐海一带，抗击日寇，已历二年。本月东日，该部忽接新四军陈司令毅万急电报，略谓：敝部被韩主席大军围攻甚急，请求救援，等语。该部当以新四军抗战有功，忽被围击，事出非常，未敢坐视不救，故派一部南下，嘱其相机调解。迭据报告，沿途仅与保安队稍有接触，并无俘获友军官长之事，惟韩主席大军确向新四军围攻是实等语。除令该部继续采取调解态度外谨复。职陈光叩筱（十七日）。等情据此。复接叶军长希夷电称：据陈司令毅巧（十八日）电报称：职属管文蔚部，在江都泰县一带抗敌，已历年余，屡被韩主席德勤攻击，职在苏南复被冷军长压迫，进退维谷，万不获已，率两个团渡江，与管部会合，以求生存。迭请韩主席划分防区，消弭纷争，以利抗日，职部及管部均愿受其指挥。韩氏不惟不理，且压迫更甚。九月中旬苏绅韩国钧、黄逸峰诸先生通电苏北各军，主张停止纷争，共同抗敌，词严义正，职即深表赞同。乃韩德勤氏复电，略谓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先退出姜堰，再言其他等语。此时泰县如皋等八县代表，先后接到韩电，到姜堰职部接洽，职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起见，表示可以退出姜堰，八县代表闻之感动。不料职部退出姜堰之日，即韩氏开始大举进攻之时。盖韩氏对职部之退让，认为示弱，乃以所谓‘陈毅贼胆已寒，急击勿失’之理由，令其主力八十九军一一七师、三三师及独立旅，共一万五千人之众，从东台海安南下，向职部七千饥军包围前进。三十日占我营溪及加力市，东日（一日）进至卢家庄，距职部后方黄桥镇仅三十里。职以内部相残，虽胜不武，为再三忍让计，迭令所部南撤。乃我节节退让，彼节节进攻，微日（五

日）直迫黄桥城外。职部伤亡累累，军心愤激，不可遏止。职亦以南滨大江，无地可退，为自卫计，始忍痛还击，战至鱼（六日）晨将韩军击退。该军纪律极坏，逃散甚众，仅一部被俘，均加优待，绝未损害一人，一俟和解，即可释归。惟韩氏及某方全部反共文电俱被缴获，朱符信印，标志灿然，虽欲抵赖，亦不可得。庚（八日）日以来，韩氏所派代表及各县绅商代表，纷集职部，要求和平，职以求仁得仁，立即答允。当事急时，曾请八路军彭明治部南下救援，现令所有职部及八路部队一律停止，以待和解。所有韩氏恃众进攻，职部被迫自卫情形，苏皖游击军李总司令明扬、税警团陈司令太远、及各县绅商民众代表，或距战场密迩，或在职部目睹，可为证明。所有处于苏北一切抗敌友军及绅商人民，一律不辜韩氏之所为，此非职一人之私言，乃苏人之公言也。职部但求生存抗日，毫无他望，对于韩氏出此亲痛仇快行为，实深遗憾，惟有恳请转呈上峰，速令韩氏停止进攻，和平解决，以利抗日，不胜盼祷之至，等情据此。兹奉电询，理合据情奉复。叶挺号（二十日）。等由准此。查敌后抗战，日益处于艰难境地，惟有团结一致，相让为国，乃能图存。职等近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军务匆忙，日不暇给，兹奉钧示，始知苏省出此令人不快之事。除商同叶军长分令各部严守抗日防地，并就地与韩主席和平解决外，谨此奉复，敬祈鉴察。职朱德彭德怀叩马午"（发电日期十月二十一日）

由此可见，陈毅支队一再隐忍退让，各方呼吁，力求息争，一致对外。可惜这些呼吁函电均未能获得实际的效果。韩德勤氏仍不顾李总指挥（明扬）的劝告与各县绅耆民众代表的陈请，却一意孤行，大举进攻。于是陈部不得已在黄桥附近地区展开自卫的苦战。

这就是所谓的苏北事件经过情形的真相。

四　苏北事件何以善后？

现在我们来看苏北事件发生之后各方面的态度。

新四军方面：陈部根据团结抗战方针，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派人到泰谈判，据陈毅有（十月二十五日）亥电说明其详情如下：

"（衔略）甲，我军已停止军事行动。

乙，职已派人到泰州提议谈判，托李总指挥（明扬）向省府韩主席（德勤）提出五项意见：一，我军不进攻兴化；二，请韩主席向蒋委员长顾司令长官要求停止对皖南北的新四军包围；三，请韩主席放弃反共方针，划分地区，一致抗日；四，改善政治；五，召开各方合作会议，商决一切。

丙，李明扬总指挥携五项意见赴兴化与省韩面商，韩回答原则同意，由李带回三项意见：一，原则上赞成所提五项意见，团结抗日，开会决定办法；二，要求新四军八路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派人划定缓冲线；三，开会由民众代表韩国钧召集，地点在泰州。其中对冷代总指挥（欣）顾司令长官（祝同）进攻皖南北问题，要我指出地点，何种部队，以便请蒋委员长制止。

丁，李总指挥于二十四日亲来海安，经一日协商，决定即由李总指挥及韩国钧老先生发起召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地点在曲塘，定于本月三十日开会，到会者包括省政府、新四军、各保安旅团及游击军、八县代表。（下略）"

不意至曲塘和会之日，韩德勤氏又翻然变计，拒不派代表出席，据所得消息当时经过情

形如下：

李总指挥明扬及韩国钧老先生等地方民众代表均到，但因省方代表始终未到，乃改开谈话会，一致决定临时办法四项及基本改造苏局办法八项。内容如下：

（甲）临时办法：

一，双方军队就原地停止，不得再有互相冲突。

二，省韩立即表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团结与友好立场。

三，不得将内战范围扩大，以利全国抗敌。

四，照所拟基本改造苏局办法实施。

（乙）基本改造苏局办法：

一，实行三民主义改造苏局。

二，国共两党，用联席会议方式解决一切问题。

三，召开省参议会，以民选为原则。

四，整军。

五，×政。（电码不明）

六，改善民生，清匪除毒。

七，统一指挥，分区抗敌。

八，保障抗敌民权。

在此次谈话会上，各方面代表均有诚恳发言。韩国钧老先生有诚恳动人的演讲。

李总指挥明扬在会议上也有主张公道的演说。

陈毅司令在会议上说：

"我们完全为了顾全大局，绝不乘机对韩主席采取报复手段。只要各方能承认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政治地位，则八路军新四军愿与各方合作。目前，第一，应制止阴谋家扩大反共范围；第二，各军就原防立即着手各种合乎抗战需要的改革；第三，立即计划出动抗敌；第四，省方代表逗留兴化，迟迟不前，殊欠诚意，如有诚意，应立即派出正式负责代表在各方代表参加之下，开会谈判；第五，泰州成为造谣挑拨的特务工作大本营，应请李总指挥加以制止；第六，密闻省方迟不到会，意在拖延时日，等待援兵，请到会的诸位加以注意。我们新四军，为顾全大局，力求和平，已竭尽智能。此后内战责任，应由对方担负。新四军对友党友军一贯态度是只应战不求战，只要不进攻新四军，新四军始终遵行团结抗战方针，愿与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友军共同坚持抗战。"

会后将以上所述的谈话会拟定之临时及基本办法均由李总指挥及韩老先生携往与韩德勤氏面谈，再定期开会，地点与谈话会公决在海安韩国钧老先生家中。

同时，最近得各方电息，有谓汤恩伯将军奉命率四个军九个师，约十万大兵，向豫皖边集中，有谓李品仙主席奉命率三个师向皖东皖北集结，将以大规模兵力重新进攻苏北及安徽之新四军。如此，则韩氏拖延和议，等待援兵，以便再扩大反共内战之说信有徵矣！当我民族命运千钧一发之际，如再见大规模反共内战之惨剧发生，则抚掌称快者，惟有日寇汪逆，而全国同胞则没有不痛心疾首的。苏北事件究竟发展前途如何？现尚难预测，我们切盼停止内争一致抗敌之全民呼声，能为国民政府当局所采择，此不仅苏北军民之大幸，抑亦全民族之幸。

（原载《解放》周刊121期，1940年12月16日出版）

抗战三年来八路军的英勇战绩

肖 向 荣

“组织民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予八路军的战斗任务。“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予八路军的战略指导方针。“在作战上，在执行命令上，在发挥政治工作的高度作用、以配合战斗的胜利上，我们要成为全国抗战军队的模范”，这是八路军全体指战员坚强的信念。

抗战三年以来，八路军全体指战员，曾以自己的头颅和鲜血，忍受一切的艰苦困难，完成了战斗的任务，正确地执行了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使自己的信念变成为事实。

事实胜于雄辩，任何的造谣、诽谤、污蔑、辱骂，是不能把真理掩盖下去的，惟有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一 八路军三年来抗战经过概述

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八路军各部不仅曾以自己的积极行动，配合全国历次战役，起了伟大的作用；而且在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上，也曾写下它辉煌的战绩。为叙述之便利计，兹将八路军抗战三年来的英勇战绩，分以下几个时期来说：

（一） 保卫太原时期（民国二十六年九月至十一月）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敌寇侵华的战略重心，首先是在华北方面，企图完全控制黄河北岸，继向华中华南进攻。我八路军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底，从陕甘宁边境向山西出动；陆续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进。是年秋，敌寇于占领天镇、阳高之后，猛扑大同，并向平型关雁门关之线的国防工事进攻，晋北形势，突趋紧张。是时八路军一部（一一五师），在林师长的率领之下，以急行军赶至平型关之翼侧，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老爷庙、东河南镇、关沟之线，与敌坂垣师团之一个旅团展开激烈之战斗，一天之内，灭敌二千余人，缴获极多，开辟了抗战以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因此全国民心为之震奋，敌寇骄焰为之顿挫。战斗继续至三十日，敌后方联络完全被我切断，迫使已闯入平型关内之敌不得不后退，而改变其战役部署。

九月三十日，敌从茹越口（雁门、平型关之间）突破我晋北防线之后，直下阳明堡、崞县、原平，猛攻忻口；十月初忻口战斗展开，八路军各部为配合忻口战斗，遂以一部在敌侧后及其深远后方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一部则在正面配合友军，顽强抵抗。一个月之内，曾在敌两条主要交通运输线上——经雁门至大同与经平型关、广灵至张家口——不断袭击敌人，破坏其交通，夺获许多弹药辎重汽车，并乘势克复冀西察南十余县（一一五师），几度

占领雁门关，烧毁敌炮弹子弹数十汽车（一二〇师），进而袭击扰乱与破坏平汉平绥铁路，使敌后方联络被我切断，而陷于孤立无援的苦境。尤以十月十九日，我一二九师陈希廉团以一营人牺牲之代价，夜袭阳明堡敌机场，焚毁敌机二十四架，更给忻口之敌以严重之打击。

忻口抗战，坚持了二十八天，曾使闯入晋北之敌陷于危境。是时华北敌军为挽救其晋北之危局起见，遂倾平汉线之全部及津浦线之一部兵力，沿正太路向娘子关、太原进攻，因此晋东战况乃告危急。我八路军为着坚持华北抗战，挽救东线危局，协同友军保卫山西，遂以一部直趋河北转入敌人后方，深入南口；以主力从五台以北急向娘子关转进。但我尚未到达预定地区之前，而娘子关已被敌突破。因此我军遂转至正太路以南，向敌采用积极的攻击动作。十一月四日，进至正太路之敌川岸师团（20 D）一部九千余人，被我一一五师陈旅侧击于沾尚广阳之间，激战至晚，毙敌千余，俘虏二十余名，缴获战马五百余匹。结果，迟阻了敌人之西进时间，使我晋北部队得以从容撤退。

统计在这一期间，八路军各部与敌进行了大小战斗百余次，毙敌一万一千余人，缴获步马枪九百余支，轻重机枪七十六支，骡马二千余匹，毁敌飞机二十四架，汽车坦克四百余辆，其他辎重弹药，不可胜计。

（二） 从太原失守到配合徐州会战时期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至二十七年五月底）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太原失陷，山西战局陷于严重的混乱状态中，当时八路军即提出“坚持华北抗战”，“坚持山西抗战”，“深入敌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口号，并为实现这口号而战斗。

因此，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由副师长聂荣臻同志率领，遂留驻晋察冀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切断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铁路；一二〇师展开于晋西北各地，直达大同、归绥；一二九师活动于正太路沿线，并通过平汉路，直达冀南及津浦线；一一五师主力一部则转移至晋西地区，配合打击南下风陵渡之敌。

不久，敌人作战的重心，已移往东部战场，展开了徐州大会战。八路军各部为配合徐州大会战，分向平、津、济南等据点及平汉、津浦，与鲁南台潍路，台枣线等处积极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的伟大胜利。

总结在这一期间的主要战斗，计有：

1． 晋察冀边区粉碎敌人的八路围攻：由于我八路军一部留驻晋察冀边，积极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给敌以严重之打击，所以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敌人即集中两万以上的兵力，以坂垣师团为主，分八路向晋察冀边区围攻；刚诞生的晋察冀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敌苦战约一月，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将围攻之敌全线打垮下去，敌伤亡达二千余人。在胜利的粉碎敌人围攻的战斗中，八路军创造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给全国抗战军民以极大的兴奋与最好的榜样。

2． 晋东南我军打退了正太路南进的敌人：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正太路沿线昔阳、平定、阳泉、寿阳、榆次、太谷等地之敌集中六七千人，从六路向正太路以南之我军一二九师进攻，经过六天的战斗，敌伤亡六七百人而毫无所得，结果于二十七日全部溃退回到正太路沿线。由是晋东南的游击战争，便向正太、平汉沿线，大大地发展起来。

3．雁北游击战争之开展：从忻口抗战时起，一二〇师宋支队即北越长城，在雁北发展游击战争，曾攻占井坪、收复平鲁、进攻岱岳、占领雁门关，写下许多光辉的战绩。敌苦于后方之被袭扰，遂于二十六年十二月底及二十七年二月初，以酒井兵团为主举行二次围攻，前后兵力计六千余人，均被我击退；雁北游击战争从此便更广大地开展起来。

4．平汉线的奇袭：民国二十七年春，第二战区计划大举反攻太原；我晋察冀边区部队，为策应这一反攻，于二十七年二月九日夜，分九路向平汉线举行大规模之奇袭，北自保定、满城，南至新乐、定县，全线总攻。一夜之间，曾克复新乐、定县、望都三城，灭敌千余，缴获步枪五六百支，破坏铁路数百里，平汉与平津之敌为之全线震惊。

5．坚持山西抗战：二十七年二月初，太原敌一〇九及二十师团向南出动，猛攻韩侯岭，直下临汾，捣风陵渡；东线敌一〇八师团亦突破东阳关，向临汾前进，并向茅津渡等处进迫，企图把我军逐至黄河南岸。八路军各部队在坚持山西抗战的方针之下，没有一兵一卒渡过黄河，而分向同蒲路两侧散布，以积极的行动打击敌人，稳定民心。此时，晋西、晋西北、晋东南的游击战争便在八路军各部队的发动之下，大大地开展起来，牵制了敌人的前进，使敌人的计划终成泡影。三月二十四日，朱彭总副司令在晋东南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当时八路军奉令组织东路军，统率晋东南所有抗战部队），定下坚持华北作战的军事政治纲领，提高了全山西军民的胜利信念，并奠定了不久以后晋东南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基础。

6．晋西北粉碎敌寇第一次大举进攻：从二十七年二月中旬起，敌寇大举进攻晋西北，占领偏关、宁武、神池、五寨、河曲、保德、岢岚等县。我一二〇师部队，在贺师长率领下，当时正在同蒲路北段积极行动，胜利地配合友军反攻太原的时候；战报传来，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师歼灭进攻之敌。从三月初起，经十五天的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大举进攻，恢复了七个县城，给敌以严重的打击，这一胜利，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起来。

7．晋西午城、井沟之伟大胜利：二十七年三月初，敌为巩固其在晋西南之新的占领地，迫我退出晋西，并乘机夺取黄河东岸渡口起见，乃集中四千余人由蒲县西进。我一一五师陈旅所部与该敌展开激战，从三月十四日至十九日止，在午城、井沟、张庄等地，毙敌千余，毁汽车七十九辆，缴获无数。而后敌又集中四五千人向隰县前进，企图报复，又被我击溃，毙敌五百余人。至四月初，进犯晋西之敌，遂全部溃退。当徐州会战方酣之际，我晋西所部猛向同蒲路及汾离公路袭击，五月五日在南北偏城击溃敌汽车六十余辆；十五日破坏同蒲路灵介间之铁轨铁桥多处，十六日又在汾离公路毁敌汽车四十余辆，毙敌百余。

8．晋东南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由于晋东南游击战争之开展，我一二九师给侵入长治之敌——一〇八师团不断予以打击，神头村、响堂铺两次大胜，及道清沿线之积极袭扰；迫得敌从平汉、同蒲、正太三线抽调兵力万余人，分九路向晋东南大举进攻。从三月底开始，我一二九师刘师长所部及一一五师徐旅所部，与敌血战二十余天，最后于四月十五日长乐村一战，将敌九路围攻完全粉碎，毙敌四千余人，收复了十余个县城。当时正值徐州大会战剧烈展开的时候，我一二九师为直接配合徐州大会战，以大部东击东阳关，越平汉线，更开展冀南游击战争，并破坏平汉津浦沿线，亦迭获许多胜利。

9．晋察冀边区粉碎敌人二次围攻，并开展了冀中平西游击战：从二十七年三月四日起，平汉沿线之敌集中一万二千余人，在十余架飞机配合下，分四路向晋察冀边区作第二次围攻。此时我军遂转至敌侧后，予敌猛烈袭击，给敌以重大杀伤；结果敌不支，遂于十日开始溃退。三月中旬，敌又调集步、炮、骑兵十四联队，由易县经紫荆关进攻涞源，从二十一日

起，战斗经过半月余之久，大小凡四十余战，毙敌二千余人，至四月十一日又将进攻之敌全部粉碎。

同时，晋察冀军区为策应主力，牵制敌向津浦、徐州的进攻，于三月中派遣邓华支队向平西挺进，曾先后占领矾山堡、妙峰山，袭击门头沟，北平守敌，为之震恐。同时冀中部队，亦于此时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消灭高阳敌驻军坂垣师团二个中队，占领高阳、安国、献县、大城、河间等县，定下了冀中游击战争的基础。

10．山东游击战争之开展，进逼济南：八路军山东纵队自从韩复渠不战而退，政权解体之后，遂在艰苦的环境中，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创造起来；此时为直接配合徐州会战，他们曾在胶东、鲁西、鲁南等处猛烈开展游击战争。在胶东曾数度粉碎进攻之敌；在鲁西曾炸毁津浦铁桥，进逼济南城下；在鲁南曾进袭泰安、东北堡及万德三车站，炸毁官桥（临城以北）铁桥并破坏台潍路与台枣线，使敌后方运输连络受到极大之困难，直接配合了台儿庄之胜利。

统计在这一期间，八路军各部为配合保卫徐州的战斗，曾在华北各地猛烈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无数次的进攻，与敌进行了大小战斗四百余次，毙敌二万余人，缴获轻重机枪百余支，步枪三千余支，毁敌汽车五百余辆，其他弹药辎重无数。华北敌后抗战的坚持，在这个期间，便定下了初步的基础。

（三）配合保卫大武汉时期（民国二十七年六月至十月）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徐州陷落，而后敌便重新组织兵力，沿大江南北两岸向武汉前进；保卫大武汉，成为当时全国军民的严重任务。

八路军各部，为配合保卫大武汉的战斗，遂积极在华北各地活动，吸引更多的敌人于自己的周围，以牵制敌之前进。其间之主要战斗，计有：

在晋西方面，我一一五师陈旅曾从九月十四日起，一周之内，三战汾离公路，先后毙敌千余，毁敌汽车三十余辆，大获全胜。其后敌图报复雪恨，于十月中又调集五六千兵力，向吕梁山地"扫荡"，我军苦战二月余，敌除占领数据点外，虽花了极大之代价，结果仍毫无所获，徒费消耗而已。

在晋西北方面，我一二〇师一部深入绥远，八月中旬袭击凉城；九月初越平绥线，袭陶林；中旬占武川北面之乌兰花，并粉碎四路敌人对满汉山的进攻；下旬在固阳以东之后窑子毁敌汽车四十余辆；十月占包头附近之石拐子，由是而创造起绥远大青山之抗日根据地。其另一部则在王震旅长率领下，深入雁北察南，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粉碎了敌人的十三路围攻。

在晋东南方面，我一二九师除在冀南，在晋冀豫边，曾不断的袭击津浦、平汉诸铁路干线，予以大破坏之外，并大举扫清周围所有敌伪，著名的伪军部队如李福和、崔培德、李台、苏明启等部，均先后肃清。冀南、豫北的游击战争亦为之大大开展。

在晋察冀方面，我军从六月间开始，即大举向平汉线攻扰，曾克安国、占保定北关、袭正定与大战徐水容城。七月六日晚并举行全线出击，从平绥线、平汉线、直到正太线，激战二天三晚，毙敌一千四百余人，炸毁北平城北石景山的发电厂，使北平顿成黑暗世界。在冀东方面，自冀东挺进纵队深入冀东之后，举行了七月十六日之唐山矿工大起义，各地起义亦风起云涌；由是而组织起抗日联军；八月间占迁安、蓟县，胜利地开辟了冀东广大游击区。

九月中旬，敌寇集中五万以上兵力，分二十五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第三次大“扫荡”；直战至十一月底，始将敌击溃，并毙敌常冈宽治旅团长，正亚、清水两联队长，山奇少佐等以下九十余人。

在山东方面，我八路军山东纵队一部曾于八月十三日攻入济南，十月三日破坏胶济路百余里，攻入张店、金岭镇两车站，同时并在滕县歼敌二百余人，数次攻入烟台与占领威海卫。山东游击战争于此时已大大展开。

统计在这期间内，八路军为配合保卫大武汉，曾牵制了三十万以上的敌军于自己的周围，进行了大小战斗约千次，毙敌二万余人，缴获步马枪八千余支，轻重机枪一百四五十支，毁敌汽车八百余辆；并继续巩固了晋察冀、冀中、冀南、山东各抗日根据地。此外，华北的游击战争于此时已发展到了绥远、冀东和热南一带。

（四） 从武汉失守到抗战第二周年

（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至二十八年六月）

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失陷。抗战形势转入由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此时敌对我后方采用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正面进攻为辅，敌后扫荡为主，以求“确实掌握占领地区”，并“开发华北资源”，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政策。因此敌寇“扫荡”华北的军队，也不断增加，由三十万人增至六十万人以上。

八路军各部的任务是：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决进行反扫荡斗争，破坏敌人的“以战养战”政策；而在政治上则揭穿敌寇诱降、招降的恶毒阴谋，暴露汪逆的无耻与罪恶，开展反汪、反妥协投降的运动，巩固团结、巩固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一期间，八路军各部的主要战斗是反扫荡战，计有：

1． 晋东南击退进攻和辽敌人：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敌十一师团第八旅团步、骑、炮五六千人，即开始向和顺、辽县进攻，经我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一部迎头痛击，激战达七八天，毙敌千余人，二月一日我收复辽县，残敌狼狈溃退。其后，从六月间起，敌又从平汉、同蒲、正太、道清四线抽调晋冀豫等地兵力，计十三四万人，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白晋公路，太行南北，展开了残酷的血战。这一反扫荡战斗，经过时间较长，一直到下一个时期，因此留在下面再来详细的说。

2． 山东各地，处处粉碎敌人“扫荡”：在山东各地游击战争蓬勃的发展之下，在敌人万分恐慌之中，敌人对山东八路军从各方面进行了残酷的“扫荡”，胶东方面，敌于五月十二日起，以二千余兵力分七路向我围攻，血战十日，至二十三日各路敌均被我击退，敌伤亡二百余人。鲁西方面，敌于五月二日起，动员五千以上兵力，炮百门，在飞机坦克之配合下，分九路向我围攻。我一一五师一部于十一日拂晓，在平阴东南之大苇庄与敌迎战，激战终日，敌伤亡八百余，消耗炮弹二千余发，予进攻之敌以严重的打击。鲁南方面，敌寇于六月间开始进攻，以津浦、胶济、及陇海东段为出发地，向泰沂山脉、蒙阴、沂水等区域合击，参加部队达二万余人，经我八路军山东纵队英勇抗击，卒将敌击溃。

3． 冀中区方面，我三纵队所部，在吕正操同志率领下，于二十七年冬，曾粉碎敌人二次围攻，获得极大胜利；而后我一二〇师主力一部开抵冀中又配合着冀中之纵队部队，粉碎

了敌人的三次围攻。这五次围攻，第一次为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九日，七千余敌人分五路向雄县、霸县前进；第二次为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敌一千五百人进攻安国、博野、蠡县；第三次为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四日，敌七千余人五路进攻河间、献县、任邱等地；第四次为二月四日至十五日，敌三千余人四路进攻饶阳、武强、深县地区；第五次为三月十八日至四月五日，敌七千余人七路进攻大城、文安、任邱、肃宁。其主要战斗计有：二月二日至四日之曹家庄、大曹村二次战斗，毙敌达五百余人；三月一日之黑马、张庄战斗，毙敌百余；三月二十三日之齐会战斗，毙敌七十余人；四月二十一日之河间齐会战斗，贺师长冒毒亲临前线指挥，战至二十五日晨，毙敌七百余人，缴获无数；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之白头沟战斗，毙敌二百余人。经过这些反扫荡的胜利，冀中根据地日益走向更加坚持与巩固的道路。

4．晋察冀方面，于十一月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大“扫荡”之胜利后，即大举向平汉、正太及同蒲北段开展胜利的袭击，其主要的为二月十一日夜袭满城，毙敌三百余；三月二十六日上社激战，敌伤亡五百余名；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灵山、党城战斗，毙敌二百余人；十八日平山伏击，毙敌百余，尤以五月七日至十四日之五台东北、上下细腰涧的战斗，我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配合军区部队，毙敌七八百人，缴获无数；二十一日涞源以东之大龙华战斗，毙敌五百余人，缴获枪炮弹药极多，并获密电重要文件一部。

5．平西方面，从二十八年一月至六月，曾连续粉碎敌人之三次扫荡，第一次为二月一日至七日，进攻之敌计二千余人；第二次为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一日，进攻之敌计三千余人；第三次为六月十九日至七月初，进攻之敌达五千以上。总结三次反扫荡战斗，计打了五十余仗，敌伤亡二千余人。

6．冀东方面，从二十七年十一月起，敌人便对冀东开始了残酷的进攻，年青的冀东八路军部队，突遭此扫荡，其艰苦困难的情形是可以想见的。可是在我全体指战员的英勇顽强的精神下，冀东游击战争始终是坚持着，而且获得了不少的胜利。计自二十七年十一月至二十八年六月止，与敌进行了二百三十三次战斗，破坏北宁路达十一次，并擒获敌宪兵司令赤本大佐。其英勇苦斗的精神，便可概见！

7．晋西北方面：敌于二十八年二月间开始第三次进攻晋西北，参加的部队达一万余人，分六路向岢岚、静乐、岚县分进合击。三月八日敌向岚县前进，与我一二〇师一部在岚县附近之侯家沟、杜安铺之间发生激战，歼敌三四百人，予敌重创。至三月底，完全粉碎了敌寇之进攻，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得以继续巩固起来。

8．绥远大青山区，亦由于我李支队之胜利的开展了游击战争，而迫使敌人于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路围攻武川东段区域；十二月中更大规模进攻归、武以西；二十八年四月又开始积极进行“扫荡”，实行最残酷的烧杀政策。可是，敌人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则在斗争中更加壮大与巩固起来。

9．在冀南方面，敌寇于二十七年十二月间即调集三万以上兵力，从平汉、津浦两线夹击我于冀县、南宫、威县一带。冀南县城虽在敌这次“扫荡”中全被占去，可是我仍失而复得，到处发展起游击战争；尤以二月一日曲周战斗，将进攻之敌四百余人大部歼灭，及二月十日香城固战斗灭敌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支，山炮三门，使进攻之敌无一生还，予敌严重打击。

10．此外，八路军留守兵团在保卫河防边防上，配合着河东部队，也击退敌人数度的进

攻。如二十八年一月一日，敌三千余分三路猛攻凉水崖、马头关，与我河防部队激战八天，毙敌八十余名，敌终于计不得逞，溃退下去。六月四日起，敌二万七千余人，又复犯宋家川、马头关、凉水崖，我河防部队又英勇抗击，经一周之血战，敌死伤达二百余人，结果仍溃退下去。由于河防部队之英勇坚决的牺牲精神，终使敌人历次渡河企图，俱成幻梦！

总结这一期间（八个月）八路军的反扫荡战斗，曾牵制了敌寇来华作战的四十二个师团的总兵力中的三分之一以上，进行了大小战斗一千二百余次，毙敌二万五千余人，缴获步马枪八千余支，轻重机枪一百七十余挺，俘虏敌骡马各千余匹，毁敌汽车六百余辆。华北敌后抗战不仅没有因敌人之疯狂“扫荡”而遭受失败，相反的却更加巩固与发展了。

（五） 从抗战第二周年到第三周年的一年间

（民国二十八年七月至二十九年五月）

这一年来，敌侵华方针仍是对我大后方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正面的军事进攻较少，而对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则实行残酷“扫荡”，并收买汉奸、反共派，积极向八路军进行磨擦，而美其名曰“收复失地”；以及加强其特务工作，企图从八路军内部来破坏八路军。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底，敌人对华北的“扫荡”更定下了一个半年计划，这计划叫做“治安肃正”计划，就是说“肃正讨伐”，加上“治安工作”；也就是说，除军事进攻外，再加上政治进攻。敌人为执行这个计划，又向华北增加了三个师团的兵力。

抗战的形势，在此时期已进到敌我战略的相持阶段。我八路军的任务，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所指示的一样：“在敌后方，必须坚持游击战争，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巩固游击根据地，战胜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占领地”（民国二十八年双十节）。

这一年来的斗争，比之过去任何时期都更艰苦而残酷；八路军所遭遇到的困难与牺牲，也比之过去任何时期为重大。然而，八路军的苦战也获得了比之过去任何时期更加光辉的胜利，以及更加英勇惊人的战绩。我这里不忍去说华北的磨擦专家们怎样来攻打八路军，打了多少回，给了八路军以多少的困难等等，只说敌寇对八路军的围攻“扫荡”与八路军在反扫荡中的主要战斗情形，计有：

1. 在晋冀豫区（包括晋东南，冀南之平汉路西，豫北）：敌人对这个地区的“扫荡”，从二十八年六月就开始了，调来的兵力计十三四万人，“企图首先打通白晋公路和黎城到临汾的公路，并加以巩固，然后再以这个十字架为基础，行分区‘扫荡’。”（左权“扫荡与反扫荡的一年”，解放九十一、二期）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一部遂与该敌进行了最残酷的斗争。虽在敌“扫荡”之开始时期，晋东南所有县城俱被敌占去，但不久我即连克武乡、榆社、襄垣诸城，先后毙敌万余人；白晋路、武涉路、平昔路、昔和路、高赞路等公路、以至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道清路等铁路，均不断为我袭击破坏，电杆电线被我收回极多，而后又于十月十六日在昔阳西击落敌机一架，毙机师六名，十二月底又先后克复黎城、潞城、涉县、东阳关，毙敌千五百余人。二十八年五月初间，我大破白晋铁路之太谷、襄垣段，共经二日三夜，毙敌八百余人，缴获步枪四百余支，炸毁车站三所，火车三列，大小桥梁三十余座，焚毁西药一库，汽油一库，子弹百万余发，挖毁铁道总长八十余里，运回铁轨千余条。一直到现在，敌虽仍占据我某些县城作据点，继续不断向我进攻。但我游击战争也

同样继续在发展中，使敌随时被袭击、到处被破坏，疲于奔命，得不偿失。

2. 在晋察冀边区：从二十八年九月起，敌寇曾连续不断的进行残酷“扫荡”；我军区部队与一二〇师一部，在反扫荡战斗中，迭获惊人胜利。如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之陈庄战斗，敌二千余人犯我陈庄，经六天五夜苦战，将敌全部击溃，歼灭千余之众，敌水原旅团长亦于此役被我击毙，缴获枪炮、弹药、辎重极多。从十月二十五日起，敌又以二万余大军，分十二路向边区举行“冬季扫荡”（此为第四次大扫荡），我军区部队与贺师长亲率之一二〇师一部，与敌血战四十三天，大小战斗达一〇八次，毙敌官兵自阿部中将旅团长、过村大佐、炮兵大佐以下四千余名，俘日兵十三人，伪军千余人，缴获步枪四百余支，各种炮六门，电台四架，及其他弹药辎重无数。“冬季扫荡”又为我完全粉碎。二十八年初以来，华北敌鉴于历次“扫荡”之惨败，乃采用“筑堡修路”之新办法，企图用据点来缩小我根据地，限制我活动，并便利其运输联络。因此从二月以来，我军区部队便开展了大破路运动，统计从二月到四月，破路达一百五十余次，计七百余里，毁桥梁十五座，铁路六段，收电线二万三千余斤。四月底，敌又调集七千余兵力进攻我五台区，企图切断我晋察冀与晋西北之联系；至五月初，又被我完全粉碎，先后毙敌达四五百人。

3. 山东方面，我一一五师主力一部及山东纵队所部，这一年来也在鲁西、鲁南、胶东及苏鲁边创造了伟大的战绩。计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底，我军粉碎了敌三万余人对鲁西之大举围攻，毙敌达四千余人，予敌以严重之打击。八月二日梁山大捷，我一一五师一个营歼灭敌人三百余，枪炮弹药全部缴获，开辟了抗战以来在敌我力量相等下之模范歼灭战。而后敌为报复泄愤，乃向鲁西、鲁南等地举行疯狂的“扫荡”，不仅毫无所得，而且只徒日益增加其消耗与损失而已。如八月十八日敌千余附坦克十二辆，汽车五十余辆，向我一一五师部队进攻，结果敌伤亡五六百人，毁坦克六辆，汽车十余辆，狼狈溃退。九月八日，徐州敌配合沛县等地敌八百余人，乘汽车坦克六十余辆分六路向沛南我军进攻，结果敌又伤亡百余，毁汽车七辆，坦克四辆。十月二十五日临沂敌二百余人，向我上下五井进攻，结果被我全部歼灭。象这样的胜利，都是不胜枚举的。直至二十八年一月初，敌又以一个师团及一个旅团约三万余人，分向鲁西及鲁西南等地大举扫荡，经月余之血战，毙敌达千余人，胜利地粉碎敌人围攻；“扫荡”胶东之敌五千余人，亦遭我痛击而溃败。四月十四日至五月十日，鲁南各处敌一万五千余人，分向我鲁南根据地临沂蒙阴山区、抱犊崮进攻，结果我毙敌数百，又将敌人之进攻粉碎。

4. 冀中区：从二十八年三月粉碎敌人五次“扫荡”之后，四月间敌又开始了不断的分区扫荡战，以便准备冬季之大举“扫荡”。这一战役从四月至十一月，在敌寇严重的进攻下，所有县城全被占领，重要交通线全被控制；尤其是七月间，冀中河流涨水，加上敌人掘堤，遂造成数十年来所没有过的大水灾，从七月到十月，被灾区域达三十余县，灾民达一百九十余万人，生命财产之损失更无可统计。这样就增加了冀中军民之莫大困难。然而冀中三纵队与广大抗日人民还是坚持着冀中平原游击战争，迭获胜利。至十一月中旬，敌便乘冬季之地理便利条件、从各线调集二万大军，分三个区域举行冬季“扫荡”。经两月来之苦战，毙敌一千二百余名，而完成了反扫荡的胜利。二十八年春以来，又先后与敌进行了二百余次战斗(至五月止)，毙伤敌伪达五六千人。

5. 平西方面：在我八路挺进军的英勇战斗下，平西抗日根据地已日益巩固起来；且自二十八年七月起，平西挺进军更派一部队伍，越平绥路到昌平及冀东，建立起北平明十三

陵之游击根据地及加强冀东游击战争的领导。二十八年三月，粉碎敌七千余人之“春季扫荡”，半月中经过二十余战，敌伤亡二千余，并击落敌机一架。

6．晋西北：二十七年冬晋西北新旧军发生冲突，一二〇师主力之一部，奉命回晋西北，调解新旧军冲突，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一二〇师刚到晋西北不久，敌即乘新旧军冲突后，晋西北局势尚未稳定之时，从五寨、宁武、静乐、及汾离公路调集一万二千余人，分六路进攻岢岚、临县、方山，合击兴县，以达到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之目的。可是结果敌人是失败了，从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一日，我一二〇师，一一五师陈支队及决死队等部，与敌战斗三十余次，毙敌一千一百余人，俘敌二百余名，使敌人终于惨败而逃。六月十七日静乐敌六百余人，经娄烦西犯，被我三五八旅全部歼灭，无一生还。

7．冀鲁豫区（包括冀南、豫东北、鲁西地区），我军于二十八年下半年内，连续粉碎敌人之三次“扫荡”，第一次为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二日，敌一万五千余人分七路进攻；第二次为十月十二日至三十日，敌装甲部队五千余人分三路进攻；第三次为十一月八日至十六日，敌机械化部队一个师团，乘汽车坦克分八路进攻。但结果均在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之下，打坍了进攻之敌，使其遭受极大之损失。二十八年以来，我军配合广大民众，粉碎敌人的筑堡修路计划，及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断的获得了许多胜利。

8．保卫河防的战斗：这一年来，敌人曾五次猛烈进犯我河防，每次都以飞机大炮配合，向我大施轰炸。计第一次为二十八年九月二日，敌梅津师团一部四千余人，犯我宋家川，发炮四百余发；第二次为十月二十五日柳林敌犯宋家川，发炮五六十发；第三次为十一月二十三日，敌万余人，附炮三十余门，猛攻我碛口、孟门，其先头二千余人在炮火掩护下，放船槽渡，被我击毙六十余名；第四次为十二月十五日，敌四千余人复犯宋家川，我军渡河击敌侧后；第五次为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敌一〇八师团一部三千余人，猛攻宋家川，并携带橡皮船数十只及渡河器材，扬言于五月间强渡黄河，进攻陕北。但每次的进攻都在我河防部队之英勇抗击下，使敌受到极大的损失与牺牲之后溃退下去。

总结从抗战第二周年到第三周年的一年间，我八路军各部曾粉碎敌人无数次的“扫荡”，使其“治安肃正”计划归于破产，筑堡修路的企图亦未能成功；而我则坚持着敌后顽强的抗战，巩固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更广泛地发展了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侵华敌军的总数的五分之二，计一年来我军与敌进行了大小战斗约七千次（至二十九年五月底止），伤毙敌军六万余人，伪军二万余人，俘日军数百名，伪军一万五千余名，缴获各种炮一百一十余门，轻重机枪七百二十余挺，步枪三万八千余支，步机枪弹九百余万发，手榴弹万余颗，瓦斯弹二百余箱，毁敌汽车一千二百余辆，装甲坦克七十余辆，毁各种炮五十余门，收回电线二十余万斤，破坏铁路五千余里，公路五万余里，缴获其他军用品及辎重不可胜计。

如果我们把八路军参加抗战三年来的战绩（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进入华北开始作战，至民国二十九年五月八日作统计时为止）列表如下，这是很可以给我们对于以上所述得到一个总括的概念的。计：

大小战斗九千六百二十五次；

甲、毙伤：

1．敌官兵：一十二万九千四百四十五名；

2．伪官兵：三万八千九百零五名；

3. 敌骡马：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匹。

乙、俘虏：

1. 日军：一千零七十四名；
2. 伪军：二万四千九百五十三名；
3. 骡马：九千六百七十四匹。

丙、缴获武器弹药：

1. 步枪：五万七千九百五十四支；
2. 手枪：七百六十八支；
3. 轻机枪：九百八十六挺；
4. 重机枪：一百二十五挺；
5. 山炮：四十九门；
6. 迫击炮：一百四十一门；
7. 平射炮：七门；
8. 高射炮：二门；
9. 飞机：三架；
10. 掷弹筒：五百零五个；
11. 信号枪：三百一十一支；
12. 机械摩托车：四十九辆；
13. 大车：四千二百二十一辆；
14. 自行车：三千九百二十五辆；
15. 无线电机：八十一架；
16. 有线电话机：二百五十八架；
17. 日本军毯：二万四千四百七十四床；
18. 黄呢大衣：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三件；
19. 望远镜：八十八付；
20. 日本刀：四百三十六把；
21. 钢盔：八千九百一十一顶；
22. 日伪军旗：九百三十九面；
23. 收音机：五十六架；
24. 照相机：二十四架；
25. 防毒面具：五千一百七十六个；
26. 瓦斯弹：二百一十二筒；
27. 步机枪弹：一万零三百三十一箱；
28. 炮弹：一千四百五十五箱；
29. 手榴弹：三千二百五十五箱。

丁、炸毁破坏交通：

1. 铁路：一千二百三十次，共计六千六百二十六里；
2. 公路：四千五百九十七次，共计一万八千八百六十九里；
3. 毁铁木石桥：一千零五十六座；
4. 毁火车：一百二十九列；毁火车头：一百二十二个；毁火车站：五十六所；
5. 砍电杆：四万二千二百二十根；
   收电线：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九十三斤。

戊、炸坏：

1. 汽车：三千九百六十九辆；
2. 装甲车：一百二十九辆；
3. 铁甲车：八辆；
4. 坦克车：五十一辆；
5. 自行车：一百四十九辆；
6. 山炮：五十八门；
7. 汽船：十五艇；
   民船：一百四十三艘；
8. 仓库：四十七所；
   炮厂：三十二所；
9. 击毁敌机：二十五架；
   击伤敌机：四架。

己、敌伪投诚反正：

1. 伪军反正：一百零二次，共二万八千四百八十一名；
2. 投诚日军：十九名。

如果我们再把八路军抗战三年来击毙的敌军大队长以上之官长名单列举一下，这也是很有兴趣的。可惜手头没有完全的材料，不能一一列举无遗；兹据前方各部队不完全之报告，为我八路军击毙之已知名的敌军官长（未知名及未获悉的又尚不知有多少），计有将级官长四名——阿部中将旅团长、常冈宽治旅团长、水原旅团长、及山口少将——；联队长九名——清水联队长、正亚联队长、过村大佐、炮兵大佐（与阿部中将同时击毙，缺名），谷见指挥官、山本司令、宪兵司令赤本大佐、临枣路指挥加滕一郎及高级指挥官净呀（缺军职）——；大队长十名——出原大队长、石川大队长、石井大队长、小西大队长、小林大队长、田中省三郎大队长、示内大队长、头辰寺清夫大队长、山奇少佐，另中佐一名（缺名）——此外尚有旅团参谋长一名。至于中队长以下之官长及宣抚官等，则简直无法统计。还不止此，我们还要看到因伤而毙之敌军官长，因战败而自杀之官长，这又尚不知有多少呢！

二　八路军的伟大战绩是怎样取得的？

抗战三年以来，八路军以低劣之武器，不充足之弹药而能获得如上所述之伟大战绩，原

因在什么地方呢？应该指出，这并不是偶然的。

八路军之所以能获得如许之伟大胜利，其原因是在于：

第一、八路军全体指战员对于国家民族之无限忠诚，表现在战斗中之英勇、顽强、坚决，不畏困难，不避牺牲，服从命令，前仆后继的可歌可泣的精神。这种优秀的中华儿女的伟大精神，是由于八路军的全体指战员之高度政治觉悟与政治认识而发展起来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八路军不是任何军阀、野心家的个人工具，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中国人民的军队，为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而奋斗的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的军队，才是最鄙视只顾个人利益、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狂妄的行为的。八路军每个指战员都懂得：什么是国家民族的利益，怎样才能求得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尤其懂得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民族利益。这并不是奇怪的事，因为八路军真正的进行了革命的政治工作，以革命的思想、理论来武装每个指战员的头脑，而提高了其政治的觉悟与政治的认识，因此而发挥了全体指战员的最高度的英勇精神、奋斗决心与牺牲的气概。请看一看三年来八路军的伤亡情形吧：

类别 \ 数目 \ 年份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统计
负伤	17,726人	20,086	20,026	57,838
阵亡	8,260人	7,351	20,811	36,602
统计	25,986人	30,437	40,837	94,440

注一：此外尚有中毒官兵30,475人。

注二：在医院中因伤致死的尚未计入。

注三：八路军领导下之地方游击队的伤亡未计入。

注四：此统计是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起，至民国二十九年五月八日止的。

在这些伤亡的数目中，共产党员的伤亡在主力部队中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新部队中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因主力部队中党员的比例数大），一般的说来共产党员在抗战三年来的伤亡则占总数之半。

这里负伤的官兵中，有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林彪将军、贺龙将军及其以下许多旅级，团营连排级的优秀干部与战士；牺牲的官兵中，有旅长周建屏、魏大光，团长陈锦秀、叶成焕、丁思林、朱仰兴、林龙发、旅参谋长郭征，支队政治委员邓永耀等同志及其以下无数的团营连排级的干部与战士。

如果没有这个严重的牺牲，如果不支付这种巨大的代价，则八路军的战绩是不可得的。

第二、八路军战略战术的正确，表现在他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说：“由于中国版图之广，兵员之多，但军队的技术与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与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辅助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还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论持久战》，八〇页）。又说：“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同上八二页）。八路军因为技术装备之低劣，补给之异常缺乏，以及富于游击战争之丰富经验，所以便以“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的运动战”

为战略的指导方针。三年来八路军正是这样灵活、机动、巧妙地执行这个正确的战略方针，所以它能够获得了英勇而伟大的胜利；如果没有或违反这个战略方针，则八路军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自然，人们是不会怀疑，而且也不应该怀疑“八路军是否专打游击战”这个问题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同上八二页）。而且事实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游击战争的发展，主要是为着求得在运动战中来歼灭敌人。象这样的运动战，三年来八路军曾打过无数次，所以八路军才能获得这样伟大的战绩。

第三、八路军与民众打成一片，发动了民众，取得了广大民众的协助与拥护。朱总司令说：“坚持华北抗战的三周年，应当归功于华北的广大民众”，这是与一切不要民众或害怕民众的人们的观点根本不同的。许多前线英勇抗战的将领们都知道，没有广大民众的参战，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最真实而最宝贵的经验。可是，要怎样才能使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使民众英勇而极积的起来协助军队作战呢？除了这个战争应当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这个基本条件之外，尚需要具备下列诸条件：（一）军队要爱护民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的疾苦，要有最高度的政治的群众纪律，并处处帮助民众，与民众打成一片；（二）要给民众以民主的权利，而不是压制民众，愚弄民众，把民众当作“阿斗”看待；（三）要实施改善民生的政策，减轻以至解除群众的痛苦。没有以上这些条件，发动民众则仅仅是一句空话，要想取得民众的帮助是不可能的。

第四，八路军进行了瓦解敌伪军的工作。我们向日军进行了宣传工作，指出侵华战争是日本军阀财阀的主意，对日本士兵及劳苦大众是没有丝毫利益的；指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不是日本士兵的敌人，日本士兵及劳苦大众的真正敌人是日本的军阀财阀，中日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共同打倒日本的军阀财阀；指出中日战争的前途日本是必然失败的，因为它进行的是侵掠战，不义战，而中国方面则是进行了自卫战与正义战等等。此外，我们的优待俘虏政策，在日军中也曾是起着重大的影响与作用。这样配合着其他条件，便使日军的士气日益降低，军心日益动摇，战斗力与顽强性日见消弱，而自动投诚到八路军来的先后已有十九人。对伪军，我们进行了瓦解与争取的工作，从宣传上、组织上去瓦解他们，争取他们，同时对于不可能争取的则坚决的消灭他们。因此华北伪军曾有大批反正的事实(计反正到八路军部队来的，第一年为3300人；第二年为16061人；第三年为9120人，总计28481人）。八路军进行了极艰苦的瓦解敌伪军工作，这也是八路军之所以能取得惊人胜利的原因之一。

第五、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八路军之所以能完成上述诸条件，而获取这英勇的战绩，是由于八路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且坚决实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就是说，实行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全国团结——反对国内分裂；坚持向前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英明的政治路线。八路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军队，在八路军中有共产党的支部，共产党的代表——政治委员、政治部；而这些便是八路军的生命线，八路军的战争力的源泉。

在三年来的抗战中，每次作战的伤亡，共产党员一般的总占半数以上（而党员与非党员之比，则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这就是说，在每次的战斗中，共产党员曾是以自己最英勇，果敢的牺牲精神，来作全体战士之表率，起着先进的模范的作用。因此，这就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保证了战斗胜利的基本条件。

以上就是八路军在抗战三年来之所以能获得如许伟大战绩之基本的原因。

三 答 复 造 谣 者

然而，国内却有少数投降派、反共派，以及顽固的先生们，他们对八路军极尽其造谣污蔑之能事，甚至在某些地区不惜武装进攻，必欲消灭之而后快，这不能不是令人惋惜的事。

比方他们说："八路军游而不击"，象这种卑劣的口吻，如果出之汪精卫之口，尚不足怪；如果出之尚在抗日营垒内的人们之口，则未免咄咄怪事！我不想把上述八路军的战绩重说一遍，我只把蒋委员长历次嘉奖八路军的电报抄几个在这里，就足证明上述谣言之无稽，造谣者之何等可笑！

"朱总司令玉阶兄：江午电敬悉，捷报传来，无任欣慰，袭敌侧背，断其联络，收效甚大。希更发动民众，扩大行动，使敌有后顾之虑，则于战局更有裨益也。蒋中正"。（民国二十六年十月）

"（衔略）俭申电悉，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除宣战绩外，希转电慰勉为要。中正"（二十八年二月）

"（衔略）艳电悉，河间战斗，得力官兵，应予以查明嘉奖。中正"（二十八年二月）

"朱彭总副司令：筱（十七日）电悉，各该部在鲁西奋勇歼敌，殊堪嘉慰。特复。中正"（民国二十八年七月）

"×电悉，杨支队予敌重大打击，殊堪嘉奖。中正"（二十八年十月）

"朱总司令：据敌皓日播音，敌十加过村部队本月江日向冀西涞源以南进犯，与我第一二〇师激战，当将该敌击溃。支日阿部中将率部来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语。查十加过村大队确系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之第一大队，阿部中将似系该混成旅团旅团长，经我歼灭，并将阿部中将击毙，足见我官兵杀敌奋勇，殊堪嘉慰。希饬将上项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具报，以凭奖赏，为要。中正"（二十八年十二月）

"朱彭总副司令：×电诵悉，贵集团军所部努力抗战，斩获甚多，殊堪佩慰。即希传谕嘉勉。蒋中正，李济琛"（二十九年五月）

是"游而不击"抑"努力抗战"，让大家来评判评判罢。

至于我们的敌人——日寇眼中的八路军是怎样呢？不妨在这里抄下敌人几段话，也许是很有兴趣的。

日寇桑木师团长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在部队长官会议席上的训话中说："尤以目下之匪情，多由于赤化共产之策谋，其行动计划贯彻于顽强之游击战与思想经济等诸方面。并在巧妙之组织强化之下，已获得有大量民众，其根基是很深的，致使肃整工作形成极为困难。""尤以共产军企图获得本师团作战地域内之平汉线方面的山地，以作扰乱华北之据点，其势力亦逐渐强大而难轻视"（大龙华战斗缴获文件之一，见《前线》十二期）。

敌寇华北派遣军最高顾问汤泽汉男在其"一年来的华北建设"（一九三九年作）中说："在河北与山西之边境太行山脉，据计有十二三万共产匪盘据其间，为有名的朱德所率领，彼等以共产的精神进行政治的训练，是有相当大之组织，对其讨伐是有相当之困难"（见《前线》十五、六期合刊）

敌酋这样估计了八路军在坚持华北敌后抗战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战斗力之后，因此便高叫：

"共产军实为皇军之大敌"，"若不剿灭共产军则华北明朗无望"。

因此，敌寇认为："讨伐的主要目标应放在共匪身上而努力剿灭之，以铲除祸根"（见敌寇桑木师团参谋长训话，及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颁布之"治安肃正纲要"）

因此，是"八路军游而不击"，还是敌寇在八路军面前惊惶失措，在敌酋的自供中已经很清楚的了。

* * *

他们又说："八路军不听命令"。这也是莫须有的谰言，不值一斥的。八路军对于抗战的命令，莫不坚决而彻底的执行；设若八路军不听抗战命令，那它还能取得如许之胜利么？自然，也许曾有人企图命令八路军全部退回山西，而将华北广大区域内八路军收复之失地，交回日本帝国主义。但这个"命令"是有益于抗战的么？象这样为"亲痛仇快"的"命令"，八路军也应该无条件执行的么？有识之士，自可判断。

* * *

他们又说："八路军发展实力"，可是，假如八路军完全遵照三个师的编制，只许四万五千人，那么八路军早就牺牲完了（三年来八路军的伤亡，三倍于此！）而八路军在华北所吸引的占侵华敌军总数五分之二的敌人，恐怕已不只是实现了其"确实掌握占领地区"的计划，就连西北也早已不保了。究竟是区区占全国抗战军队总数百分之八，但牵制了五分之二的敌人的八路军存在好呢？还是让八路军给敌人消灭，让敌人"确实掌握占领地区"好呢？

* * *

他们还说："八路军扰乱敌后方"，这更是荒谬之至的谣言，到处只看见扣留八路军来往人员，残杀八路军战士，断绝八路军交通，查禁八路军书报等之逆流横行，而前线八路军尚忍痛与敌苦战，何得谓为扰乱后方？

诚然，"欲加以罪，何患无辞"，早既有人把"赤色汉奸"的帽子加在八路军的头上，反而说"汪精卫并不是汉奸"了；甚至有人公开说："我们的敌人并不是日本，而是八路军"。象这种狂妄之人，任凭他怎样来污蔑八路军，都只有证明他自己的卑鄙可耻，而反证明八路军是忠诚于国家民族的。

四　目前华北抗战之空前艰苦与困难

抗战已进入第四个年头，这将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而在敌后作战的八路军，亦将处于空前艰苦与困难的环境。

华北敌后抗战之空前艰苦与困难，将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第一，将表现在敌人之最残酷最凶恶的进攻方面，"在目前的国际新形势下，被内外危机重重压迫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其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这是敌寇灭亡全中国的当前基本方针与手段。而对于在华北敌后最英勇顽强坚决进行着抗战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则仍以加紧"扫荡"为主，且敌人在其屡次"扫荡"失败后，已把加紧筑堡修路、封锁河川作为其

“扫荡”战术的核心，并与经济破坏、政治进攻相配合，以达其所谓“确实掌握占领地区”之目的。

在敌寇这一凶恶的企图下，华北的铁路公路修筑计划，便空前地发展起来，根据最近前方各部队的报告，敌寇除将道清路与陇海路东段接轨外，并把正太路改为大轨（原来的是小轨），改成直线；新建白晋铁路（晋东南），沧石铁路（河北），以及由塘沽经北平到大同的双轨铁路，又由河北省之邯郸起经聊城到济南筑一铁路，使胶济路能横贯津浦路接入平汉路。

公路的建筑，除原有的加以修复外，新建的干线计有六十九条，计晋察冀十九条，冀中十二条，冀南九条，冀鲁边十七条，鲁西南十二条。且为防我军民破坏计，其公路是筑在高出地平面五尺以上，两边挖深沟，沟深八尺至一丈，沟底宽六尺，沟口宽一丈六尺。

除修筑铁路公路外，并遍地筑堡，如在白晋路自子洪口到虒亭一段，即有三十九个大据点，四十八个小据点；辽县平定沿途有六十八个据点，平均每三里有一个据点。在冀中有五百多个据点，平均每隔十八里有一个据点。冀南有三百多个据点，冀鲁边有一百八十多个据点，其他各地亦正在构筑中。

对于河川，则将河流上之船只多加焚毁，并在渡口旁构筑据点，派兵扼守，以限制我军活动（如冀中）。

因此，这将大大增加华北各地我军活动的困难，使我在华北敌后各根据地处于更严重的情况中，使我较大的兵团行动受到限制，使我军战斗更处于艰苦困难的不利境地。

第二，将表现在敌后的根据地与抗日部队更困难得到我大后方的接济与联络方面。由于西南国际交通路线被切断，我大后方受敌人不断的残酷轰炸，这将大大地增加我国之困难，使敌后之抗日根据地及部队更难以得到大后方的接济。如果说，在过去几个月间八路军所得到的物质补充与弹药接济是异常微薄的话，则今后的困难是更可想见的。同时在敌人残酷严密的包围封锁下，使我前后方的联络，各抗日根据地相互间的联络，也要较之过去困难得多。

第三，华北抗战的空前艰苦与困难，尤其是将表现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本身上面，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与敌人的不断围攻、烧杀、抢掠、封锁等等，这将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内之资源日益缺乏，使抗战部队之人力、物力的补充与财力的供给都要更加困难。如果敌后的政权与部队不能很好的认识这一点，而采取长期战争的计划，一切都照顾现在，又照顾将来，从长期打算上着想，则将来之困难将更不堪设想。

这就是在全国抗战之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困难时期，今后坚持华北抗战不可避免的新的困难与艰苦的环境。

但以上这些困难是否可以克服呢？答复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华北的广大军民，不仅具有克服这些困难的毅力，而且亦具有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正如全国军民之能克服空前的抗战困难与空前的投降危险一样。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与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在蒋介石先生与国民政府的抗战国策坚持不变之下，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毛泽东：《团结到底》）

因此，认识当前的巨大危险与困难，坚信在执行我党的正确的方针与政策下，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危险与困难，而更紧张的更积极的向困难斗争，以便克服困难，渡过危险，争取抗战胜利，是继续坚持华北抗战走向最后胜利的当前中心任务。

在过去的三年中，八路军在敌后坚持抗战是异常艰苦的，尤其是在最近的一年来，其艰苦之情形，为国内任何友军所不曾有过。不仅是一般的物质资材缺乏，粮食不继，而且连弹药也得不到任何补充，而敌人的“扫荡”则更加恶毒而残酷。然而，八路军犹不避困难，艰苦奋斗，而取得了历次反扫荡战之最光荣的胜利，在今后我国抗战之进入更艰苦更危险的时期，八路军当更加发挥其一贯之刻苦耐劳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去战胜困难,争取胜利，成为全国之模范。

（原载《八路军军政杂志》2卷7期）

新四军的前身
及其组成与发展经过概况

原编者按：此材料是新四军参谋处于一九四六年编写的，原文记在抄写本上，显系草稿，当时可能未经很好校对，错误之处或难免，兹印发供各部参考。

第一、新四军前身——内战时期：

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支和共产党血肉相关的、大部分团营连干部是共产党员、并且全部政治工作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部队，参加了北伐，卓著勋绩，功高威远。

大革命失败后，整个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投降了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独立的来领导这个革命。由叶挺、周恩来、贺龙等同志组织举行了南昌暴动——大革命退兵的一战，继续保持中国反帝传统。从此，由国共合作进到共产党单独领导，继续深入这个革命到农村中去，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并创建工农武装。

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失败以后，带一千多农民到井岗山与朱德同志会合，组织红军第四军，并建立根据地，高举红旗，开展游击战争。这是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时代的游击战争（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开始，到一九三〇年彭德怀同志进攻长沙为止；嗣后即转为大规模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国内战争）。

一九三四年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受着损失以后，红军主力部队举行万里长征，留在以江西为中心的各个游击区域单独奋斗，坚持阵地。从一九三四年到抗战爆发二年零八个月，算三年。这就是新四军产生的最近的历史（主力部队九万八千人开始长征，留下的主力师——二十四师三个团，每一连有一架机关枪，每一个团有重机枪迫击炮，计留在福建、江西、广东交界地方的武装游击队有三千多枝枪，以江西为中心）。

当时在江西组织了中央分局来主持。

长征军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离开。国民党于是年二月以大兵围剿，图彻底肃清中央苏区。红二十四师主力被包围，游击队被歼灭。于是退出苏区，转到南岭山脉，重新组织游击战争。当时方志敏负责赣东北游击区，黄道负责闽北区域，粟裕负责浙江区域，闽东由叶飞负责，闽西游击区域由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负责，湘赣由谭云宝负责，湘鄂赣由傅秋涛、钟期光、张藩负责，赣南由陈毅、项英负责。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可是顽固派认为这个合作，只能是和西北朱毛率领的有组织有纪律的真正红军合作，而拒绝和南方游击队合作，并且进攻更加厉害；从一九三七年春天三月至五月，是清剿最严重的时候。

芦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以后，我党统一战线政策胜利，全民族团结成功，合作由西北方扩大到南方。于是南方红军游击队奉命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编者按：时间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

甲、是时红色游军在：

1. 闽西南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数同志领导下一大部游击队，约有一千二百余人，五百余枝枪。

2. 湘、鄂、赣傅秋涛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一千一百余人，三百五十余枝枪。

3. 闽东叶飞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九百二十人，五百余枝枪。

4. 闽、赣、浙黄道同志领导的游击队，约六百余人，三百余枝枪。

5. 浙江平阳刘英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六百人，二百余枝枪。

6. 中央苏区（瑞金）钟得胜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三百人，一百五十枝枪。

7. 皖南关英后、李步新同志领导的一个游击队，一百九十八人，七十五枝枪。

8. 湘、鄂谭云宝同志领导的一个游击队，三百三十五人，二百枝枪。

9. 赣南陈毅、项英领导的游击队及桂东×世雄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共约三百人左右。

10. 鄂、豫、皖高敬亭领导的游击队九百余人，五百余枝枪。

11. 鄂、豫边周骏鸣同志领导的约六百余人的一个游击队。

12. 湘南李林同志领导的共二部，计约三百人左右的游击队。

总共大小十四个游击队，约八千人左右，三千五百余枝枪，四挺轻机枪，及不能连放的重机枪三挺。这些参差不齐的游击队，即是新四军的基础。

第二、新四军的组成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时期：

第一阶段——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四一年一月

甲、军部成立：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成立新四军的命令，叶挺任军长，队伍开始集中。

三八年一月六日在南昌成立军部；是月底开始办公。斯时，机关没有建立，仅仅是几个人。

乙、从集中到开入敌后：

(一)一九三八年二月廿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我军限于×日集中岩寺。于是军部分头令促江西、浙江、福建、湘南、广东各省游击部队，兼程前进，向安徽岩寺集中。江北鄂豫皖及鄂豫边游击队分别向合肥、舒城、无为地区集中。

长途跋涉，远从江西的大庾、福建的龙岩，约二千里路，需一月的行程，最近的亦须七天行程；且饷额不足，粮秣不济，饱受饥馁；沿途又遭受各省军事当局及不明大义分子，挟持其十年反共成见，不断无理的阻碍与留难，并恶意造谣破坏中伤。我军战胜一切困难，于四月初集中岩寺；闽西南延到十八日始达。

(二)军部于三八年四月四日离开南昌迁移岩寺，着手进行部队改编，成立四个支队：以闽西南游击队一千二百余人，编为第二支队，闽东游击队九百余人，编为五(?)、六两团，湘鄂赣游击队一千余人编为第一支队第一团，闽浙赣游击队编为第三支队第五(?)团，浙江平阳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第四团，中央苏区游击队编为二支队三团一部队，皖南游击队编为二

团三营，湘赣游击队编为一支队二团一营，赣南及桂东游击队编为一支队二团二营及三营一部，湘南游击队编为军特务营，鄂豫皖及鄂豫边两游击队编为四支队七、九两团，集中七里坪。编制就绪，当即开始进行不到廿天的整训。

斯时，又接到命令云：四月廿日派员莅临点验。十五日复又接命令不能久驻岩寺。未及点验，我粟裕司令率领先遣部队，遂于是月廿八日出发，挺进江南敌后；军部亦于五月一日离开岩寺迁至太平。接着又接命令不准久驻太平，于是，复又进移至南陵地带。这时我一、二支队先遣部队已陆续深入芜湖以东，南京以南，溧水、溧阳以北狭小地区。

(三)鄂豫皖游击队，一九三八年春集中七里坪，改为新四军四支队，下辖七、九两团，约一千二百余人。又一部，原为河南桐柏山游击队，百余人，三八年在确山、竹沟改编，加上地方动员来的新兵及改编股匪，共约九百余人，是为八团。四支队及八团均于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分由七里坪、竹沟开赴皖东前线。四支队七、九团在舒、桐、卢、无一带活动。八团在卢、无活动一个短时间，即开至淮南路东合肥、全椒一带活动，进入皖东前线。

丙、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

江北四支队东进巢无地区及皖东前线，五月十六日首次与敌人在巢湖以南蒋家河口发生战斗，将敌全部击溃，缴获步枪十余枝，大旗一面，开江北第一次的胜利。

江南方面我先遣队进入镇江以南，六月十八日与敌在卫岗展开战斗，是谓卫岗处女战。此役摧毁敌汽车四五辆，毙敌土井少佐一名，梅岗武郎大尉一名，缴获步枪十余枝，日币七千元。这次战斗，与江北遥相辉映，从此展开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

第一个时期：

我军以严明的纪律，新军的姿态，出现在江南。当时群众一方面是赞美我们的军纪，拥护我们来抗战；另一方面对本军战斗力却表示怀疑，认为装备完好、武器精良的国军，尚且不能立足，何况这一小支武器窳劣、火力微弱之新四军？经过后来不断的胜利战斗，广大群众遂逐渐认识我军是真正抗日和无法摧毁的力量。于是我军威信大大提高。

在国军撤退以后，江南地区一部分士绅及民众所组织之游击队，云涌蜂起；但皆独霸一方，割据称雄，纪律极坏，敲诈勒索，无所不为，不抗敌而扰民，互相渔肉，勾心斗角，阻碍抗战发动。本军对这些武装进行了艰苦说服工作；在他们互相倾轧之际，从中排难解纷，争取团结到抗战一致的旗帜下。惟有朱永祥、陈得功等股游击队，一贯不顾民族利益，甘心附敌，为虎作伥，民众称之为“小日本”，成为敌人伪政权发展的支柱，普遍的从事建立伪政权，发展维持会，致使群情消沉。当时我们对这些武装则采取坚决手段解除之、摧毁之。从此广大民众消沉低落情绪，顿形好转，一扫乌烟瘴气，展开江南抗战的新局面。

在江北巢、台、桐、怀相继失守，国民党大军西撤后，局势异常混乱，地方士绅民众武装，遍地皆是。我军四支队进抵此间活动，虽然是大大展开游击战争局面，取得本身的部分发展与壮大，但当时在高敬亭错误的领导下，坐失时机，以致大大的限制了部队的发展壮大。

第二个时期：

(A)一九三八年冬，张云逸同志由军部渡江北来，并成立江北游击纵队，由地方党所组织的游击队编成，部队迅速发展。

一九三九年五月，叶军长和邓子恢同志相继渡江到皖北。六月三日在青龙厂将反革命高敬亭处决。从此使四支队转到了党的领导下，大加改进。是时，军部因感地区辽阔，统一指

挥困难，遂于五月五日在卢江东汤池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三个部队：

1． 四支队，下辖七、九、十四三个团，共约四千余人。

2． 五支队，下辖八、十、十五三个团，共约二千余人。

3． 江北游击纵队，下辖一、二两个大队，共约一千余人。其一大队系由江南四团过来的一个营编成，担任军部与江北指挥部之连络。

枪毙高敬亭后，把部队挺进到皖东定远、凤阳、滁县、全椒等县广大地区。

以原来周骏鸣为基础的八团扩大起来的，开始成立五支队。

(B)我军八团留守处，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织了两个新兵连，由彭雪枫同志领导。当一九三八年夏季，日寇打通津浦路，占领徐州、开封之后，郑州、洛阳日益吃紧，武汉告急，地方紊乱，伪匪蜂起，由彭雪枫同志领导的两个新兵连，经过艰难缔造，以游击支队第二大队名义，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誓师东进，东越平汉，道经西华，接近最前线，这时仅有一百七十八人。

自豫东沦陷后，国军西撤，政权瓦解，地方糜烂不堪。长期坚持地下工作的吴芝圃同志，在睢、杞、太边，组成了一支人民自卫武装——三支队，在党的领导下，日益扩大。八月间，萧望东同志率一先遣大队(七十人枪)赴睢、杞、太协助三支队活动。十月间，三支队会同萧大队入西华，至杜岗与游支会合，扩大了支队编制，共分三个大队，计九百四十五人。此即开始向敌后挺进，首次在淮阳西窦楼与敌骑发生遭遇战斗，将敌击溃。于是通过封锁线，十月卅日经过鹿邑县城到达鹿邑东刘大庄休整，开展统战工作。

是年十一月十九日，出征睢、杞、太；处处获胜。原三支队九中队十二月与原在睢、杞、鹿邑活动的三支队二团部队合编为第二团第一营，以游支第二大队为第二营，成立了第二团（团长滕海清，政委谭友林）。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睢杞地方武装李广南部追随主力与原第一大队（在鹿邑白马驿）合编为第一团。当时三大队则改为独立营，直接归支队指挥。三九年一月主力东进亳东，独立营再征睢杞。二月，独立营连同睢杞地武一部归还主力，编为支队第三团。这时人数已有一七五一人。

一九三九年四月，敌人扫荡豫、皖、苏边。中旬、鹿邑，亳县相继再度陷落。我除留第一团（太康大队一个连是时已编入）于原地活动外，主力于六月十五日抵怀远西涡河沿岸。是时永城地方武装鲁雨亭部自动请求编入我军，编为一总队。这时人员已扩充到四八二四人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六日，回师涡北新兴集，开展永、夏工作。一个月内先后成立了六个独立大队，成为游击支队发展的全盛时期。部队增加至四十一倍以上（七三六九人）。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游击支队改为本军第六支队。十二月反共浪潮高涨。是时第一战区自卫军第七路（我西华党所领导的）自动的由向明、王学武率领入豫皖苏边，组织第二总队；在萧东由耿蕴斋组成三总队（萧县游击支队与宿县大队组成）；皖东北由张爱萍组成第四总队；并将各独立大队补充主力，或扩编为独立团。至四〇年三月，全支队除三个主力团、一个特务团外，其余还有四个总队、三个独立营，计一万七千八百人。此时活动地区：东抵津浦路，西依黄泛，北达陇海，南跨涡河。四月一日，敌寇二千余扫荡，我一总队在永城东北山城集进行保卫战，鲁雨亭同志于是役光荣殉国。

随后又组成保安司令部，直辖萧县抗敌总队，萧县、永城、睢杞独立团，及亳北独立大

队。这时全支队共有一万九千五百余人。

(C)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原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之留守人员及八路军残废退伍人员和地方党员，发动地方武装，由李先念同志领导。原湖北豫南地方党所领导的红色游击队，是时仍坚持原地活动。党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将鄂中马家冲、八字门、白兆山、赵家棚、应城及汉川各地之游击队改为独立支队，编两个团，以鄂东之五、六大队及信、应部队（王海山领导的）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另以豫南的游击队改编为三、五两个团。部队虽经整编，但各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在指挥上不能统一；且当时日夜忙于应付反磨擦，环境恶劣，致各部独立活动，各自为政，产生浓厚的游击主义习气。

嗣后，为统一部队指挥，乃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统编为新四军游击挺进纵队，将以上各部编为九个正规团。其编制情形于下：

原五、六两大队改为第一团，四望山之三团改为第二团，鄂中二游击队改为第三团，鄂中湖区游击队（四团）改为四团，鄂中独立支队改编为第五团，第六团历史不详，信罗地方游击队改编为第七团，六团与×区独立团（地武）改编为第八团，鄂东独立团改编为第九团，伪军反正部队改编为十团。并成立纵队司令部与随营学校。从此由分散到集中，引起敌顽注意，于是处在敌顽夹击中，开展了平汉线及武汉近郊的游击战争。

(D)一九三九年七月，皖南部队奉三战区长官命令，以一个支队（三支队五、六团）接替青弋江友军防务。未几，敌人于十月底从湾沚集中兵力千余，分数路向我红衣铺、清水潭阵地进攻。敌人凭借强烈火力，向我追击。我军毅勇果敢，与敌人激战三天，取得延陵大捷，胜利推进，光辉地展开阵地战之先例。

随后，老六团由叶飞同志率领深入上海附近活动，与梅光迪部会合，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旋派老六团一部渡江到江北与管文蔚部（在丹阳发展起来的）会合，改为挺进纵队。

一九四〇年，张道庸同志率领二支队四团之两个营渡江至苏北活动于天长、六合地区，改为苏皖支队。

(E)为了便利指挥部队，加强部队发展，脱离顽军对我指挥机关之威胁，一九三九年十月间，江北指挥部以巡视为名，大部迁至皖东。

是年十一月江南指挥部在溧阳水西成立，展开了以后江南苏北之巨大胜利。

(F)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偕同徐海东同志安抵皖东，从此江北部队得到了党中央直接领导。在刘政委领导下，克服了过去许多缺点与错误，使部队蒸蒸日上，有了空前的发展，整理了部队，稳定了阵地；并着手开始根据地的建设。

是时，五支队挺进路东，在来安、嘉山、盱眙、六合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一度克复来安城，驱逐敌伪，使广大民众从敌伪奴役下解放出来，掀起了路东民众抗战情绪。

十二月二十日，敌人集中数千兵力大举向我周家岗、古河扫荡。徐副指挥海东同志亲赴前线指挥，于廿三日反攻，克复周家岗、古河，敌大败。是役，俘敌少佐一名（伤重而死），炮弹×箱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此为江北反扫荡首次大胜利。

丁、反磨擦斗争的胜利：

(一)一九三九年廖磊病故，李品仙继任皖省主席后，密令颜仁毅、李本一进攻津浦路西我四支队部队，阴谋假借护送点验委员之名，袭击我大桥指挥部。当时被我坚决拒绝通过。遂于五月七日在界牌集发生战斗。从此磨擦逐渐发展扩大，愈演愈烈；反共空气，日益嚣张。当时在南路我们击溃了李本一的进攻，将他逐回古河，消灭了顽李三分之二的力量。南路胜

利后，乃集中大部主力于北路，攻下定远城沿线各要点，颜仁毅全部被我消灭，颜本人逃避寿县。是时因我路东五支队增援路西，顽韩得勤，秦庆霖乃指挥十团大军进攻路东阵地，包围半塔七日不下。五支队于路西战场胜利后，回师路东，半塔解围，顽韩溃退，我军势如摧枯折朽，直追淮河右岸（编者按：时间在一九四〇年春）。

是时，顽在无为地区进攻我游击纵队，我军受挫，乃退至皖东。于是顽军首次有计划的进攻完全被我粉碎了。

继之，李品仙复又发动两个主力师向我皖东再度进攻，在八斗岭、王子城、青龙厂一线展开主力激战，战斗极其残酷。此后双方进入拉锯式及胶着状态，互有进展，失而复克。这次胜利后，八路军黄克城同志率领南下增援部队，九月间在津浦路东与我四、五支队胜利会合。

(二)一九四〇年八月间，黄政委克诚同志率领八路军二纵队三四四旅及新二旅至豫皖苏边，与我六支队正式合编，改为八路军第四纵队。随后，黄率新二旅及六八七团进抵皖东北与六支队四总队（张爱萍部）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

于是，我四纵队重新编制为直属队、四旅、五旅、六旅、保安司令部，共一万七千余人。

接着，反共高潮到来，汤恩伯率三十万大军向我进犯；形势吃紧。耿蕴斋率保安司令部之一部，刘子仁率十七团全部，吴信容率十八团二个营，于双十日叛变了。共有八百五十九人，轻机二十五挺。于是我重整地方武装，撤销保安司令部，组成萧县独立旅(旅长纵汉民，政委李中道)。至一九四一年元月，在睢、杞、太、淮边，顽敌十二军八十一师配合两个游击纵队，向睢杞独立团进攻。当时，我乃以一部控制原地进行游击，主力归还淮上，改为五旅十五团。

(三)苏南与苏北部队的会合。我挺纵及苏皖支队在大桥、江都等地展开游击战争以后，韩德勤、李长江等不相容让，屡加迫害；我军求全忍让，而顽方迫害有加无已。在江南，顽冷欣以大军进击，逼我渡江；在苏北，则集中十余团兵力，企图歼灭我军于扬子江畔，步步逼人，言之无不心寒。一九四〇年六月中旬，我江南指挥部率二团、新六团、九团（即江抗二团）先后过江。六月廿八日，李长江指挥十一团之众，开始围攻我郭村叶飞部队，于是展开自卫战争，陈指挥闻讯率师渡江赶援，援兵未到，进攻之顽十一个团已被我郭村部队击溃，退入泰州，我军稍有进展，苏南苏北部队就在这胜利中会合了。

郭村战役后，为统一与便利部队指挥，即以挺纵二、六、九三个团，及地方武装陈玉生、王澄（郭村战斗中由李长江部暴动过来）等部改编为一、二、三三个纵队（以挺纵为第一纵队，二团、新六团、九团——江抗二团——合编为第二纵队，苏皖支队及地方武装为第三纵队）。

(四)黄桥之战及八路军、新四军白驹大会合。

(1)一九四〇年七月廿五日，韩德勤使用十二个团第一次进攻黄桥，再度为我击溃，歼灭顽何克谦部大部分；接着就是营溪、姜堰战斗，连战皆捷，是为黄桥第一次大胜利。韩德勤顽心不死，遂于十月初下令对黄桥进行二次总攻击。黄桥决战，我军又获大胜，顽八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死八字桥河中。顽韩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我军反锋攻击，连克海安、东台、诸城镇，迫使顽韩退守兴化。与此同时，八路军闻讯从北面驰援，攻克东沟、益林、盐城，长驱直下，于十月十日与新四军苏北部队在白驹胜利大会师。这次反磨擦空前巨大胜利，创

造廿年来之奇迹；从此我军威震华中，顽军胆落。

(2)先是，华中磨擦日趋严重。于是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黄克诚同志率领）及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全部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前后，由晋东南及山东等地出发，南下增援新四军，于九月间到达皖东北及淮海地区后，即与张爱萍（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韦国清（八路军南进支队）等部合编，正式成立八路军第五纵队，以苏鲁豫支队改为一支队，以二纵队主力编为二支队，以张爱萍、韦国清两部编为三支队，南下增援。

是时，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亦南下至淮海地区。

(五)一九四〇年六月，江南指挥部率二团、新六团、江抗二团渡江增援郭村开展苏北以后，在江南乃另成立江南指挥部，在罗忠毅、廖海涛同志领导下，指挥剩余部队，坚持原来阵地。黄桥决战，我四团三营复渡江北增援，斯时，在江南仅剩下四团、新三团及同情我军之独二团。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发展，培养了一部分地方武装——独立支队（约三百人），社头游击队（约一百人），长漏游击队（七十人），长漏太游击队（二百人）。皖变后改为二支队。

在东路，苏、常、太等地区，在江抗西撤以后，没有留下武装，仅剩下在洋澄湖养病之伤员卅余人，和一个常备队廿余人。一九三九年八月，奉陈司令命令重组江南东路司令部，于是在苏常地区，以夏光、杨浩虚为首，成立了东路司令部，组织了一个特务连，并争取何家师（何教师）地方武装组第二连。另在常熟地方领袖任天石同志领导下，恢复了民抗司令部，组成三个连。江南指挥部党委会决定派何克希、吴仲超回东路。经过半年发展，部队扩大三百余，于是成立一支队（由常熟何部改编）、二支队（我们二个排的基础）。谭震林同志到东路后，成立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将江抗改为二支队，由何指挥，仍称东路；民抗改称一支队，称南路，由吴指挥。部队继续发展，培养常备队。另以昆山、嘉定两地地方党领导之一部分武装，转入苏常地区，改称第三支队。后，二支队开辟澄、锡、虞地区，解决马××一个支队，民抗复充实一个营，改为五支队。江抗二团东路与敌寇苦战十三次，进入无锡地区与当地地方党所领导之一部武装会合，称江抗独立支队，以后改称四支队。二支队进入澄西协助梅光迪部，迅速发展，改称七支队；同时争取无锡地方领袖张学增部组第六支队。

在党的领导下，这支新军迅速生长起来。

第二阶段——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一九四二年

甲、皖变后的新阶段：

皖南军部为顾全大部，团结抗战，委曲求全，遵命北移，叶军长与顾祝同面规路线，取道皖南渡江。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开拔。一月七日行经茂林地区，反共派顾祝同指挥七万大军将我重重包围。穷山大壑，血战八昼夜，弹尽粮绝，不能突出，造成皖南奇败，被俘消灭殆尽；叶挺军长被俘，项、袁、周等下落不明。反共派造此滔天大罪，破坏抗战，密布陷阱，诱我入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皖变后，重庆当局，复变本加厉，命令汤恩伯三十万大军向我华中各部全面进攻；反共气焰，甚嚣尘上。日寇亦不断向本军各地加紧扫荡，以配合反共。在敌顽四面夹击下，造成我在皖变后的空前危难处境。但是全军在我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党的政策，坚持自卫原则，抗抵反共进攻，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援助，胜利的突破危境，渡过难关，击退反共高潮，使本军发展走向新的阶段。

(一)新四军番号虽被取消，宣布为非法部队，但由于我们四年来光荣伟大的战绩，全国

及全世界一致公认本军为抗战强坚有力的支柱。这种坚持华中抗战的光荣事业，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与爱戴。这种拥护与爱戴，就是人民对本军合法之公认。公理自在人心。在民众中所树立的不能磨灭的合法地位，比任何“法令”皆要巩固与坚强。重庆当局如此措施，其结果是得到全国人民愤怒的抗议，与对本军给予无限的同情，日益疏彼而亲我。民众就是最高国法。

(二)新军部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和在华中十余万指战员以及千百万民众热烈拥护下，于一月廿五日在盐城成立。从他成立时起，就担负了比任何时期更加艰难重大的任务；并在陈代军长、刘政治委员英明领导下，迅速建立了统一指挥机关。

(三)全军改编为七个师。从此由游击兵团进到正规兵团，活跃在江淮河汉广大地区，纵横数千里。

(1)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编为第一师第一旅，以挺纵一团（原旅六团）编为一团，挺总四团（原管文蔚部）编为第二团，三团是黄桥决战后新发展的以田铁夫、陈宗保两部编成。

第二纵队编为第二旅，以二纵队二团（原一支队二团）为二旅四团，二纵六团（丹阳新六团）为二旅五团，二纵九团（原江抗二团）改为六团。

第三纵队编为第三旅，以三纵三团（原苏皖支队）改为七团，八团系王澄同志由李长江部暴动出来的（初编一纵五团），九团是原四团三营渡江增援后与四分区地方武装一部合编而成。

(2)江北部队改编为第二师，辖四、五、六三个旅。

四旅辖十、十一、十二三个团。十团系老七团改编，十一团系老九团改编，十二团系新十四团改编（原老十四团一个营与路西地武合编的）。

五旅辖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团。十三团系老八团改编，十四团系十团改编（由八团抽出一个营与地武合编而成），十五团番号仍旧（原系由路西游击队编成，至路东后，于一九四〇年五月份编为独一、独二团，四一年春复并为十五团）。

六旅下辖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团。十六团系老十四团改编，十七团系以江南四团的一个营及游击纵队的二大队合编而成（二大队后至无为活动，编为七师部队），十八团系地方游击队编成。

(3)八路军第五纵队编为第三师，下辖七、八、九三个旅（一九四一年十月，九旅与十旅对换建制）。

七旅系五纵一支队改编的（该旅在内战时期是中央红军的一部，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抗战开始时，是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之一部，随一一五师东征山东，即成苏鲁豫支队；一九四〇年南下，编为第五纵队一支队），下辖十九、廿、廿一三个团。

十九团原脉是南昌暴动时朱德同志所拖出来的国民革命军教导团。到中央苏区后，改为红四军十师廿九团；后又编为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经过长征到陕甘宁边区后编为第四大队；陕北直罗镇战役后改为第四团；抗战后改为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八八五团第一营；一九三八年，一一五师令该团东进山东后编为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一九四〇年，到达皖东北后正式编为三个营，到五纵队编为一支队第一团，现为十九团。

二十团原脉是红三军九师的一部分和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之一部合编成为红二师六团；在苏军活整军中又改为第二师第二团；到陕甘宁后仍是第二团；抗战后改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第三营；由山西东进山东后，改为苏鲁豫支队第二大队；后南下入江苏地境，改为苏鲁豫支队

三大队；到一九四〇年改为五纵一支二团。

廿一团是一九四〇年主力在苏鲁豫边活动时，以地方武装合编为湖西大队（三个营）；南下后即改为苏鲁豫支队第二大队；后改为五纵队一支三团。

八旅原为冀鲁豫支队；到一九四〇年又改为十八集团军第二纵队；东进时又改为十八集团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后率五、六两团南下到皖东北后，改为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现为八旅，下辖二二、二三、二四三个团。

廿二团前身是鄂、豫、皖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十五军团（廿五军）七十五师二百三十团；一九三六年春东征山西返陕时改为七十三师（小师）；开到陕西三原后，改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之六八七团；到一九四〇年随五纵队南下，改为五纵二支（但团的番号未改）；到皖变后，改为廿二团（该部队虽系很老基础，因经过了很多的残酷战斗，及整营整连调出充实其他新部队，所以老的基础也很薄弱了）。

廿三团原系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到一九三八年由常玉清同志率领东进山东曹县一带发展；到一九三九年二纵队司令部由山西东进到冀鲁豫边区；到一九四〇年即改为十八集团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第五团；后随二纵南下，到皖东北后，改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二支队五团。

廿四团原是华北党组织起来的；一九三九年编为冀鲁豫支队第三大队；二纵司令部由山西到冀鲁豫边区后，即编为十八集团军二纵队新编第二旅第六团；南下后，改为五纵二支六团（该团自到盐阜后，一、三营抽出与地方武装合编为地方兵团，仅二营和团直与阜宁大队合编为现今之廿四团）。

十旅前身是鄂豫皖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红廿五军及陕北刘子丹一部；到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后，改为十五军团，下属三个师（七三、七五、七八师）；到一九三七年，红军改为八路军后，十五军团即改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以七十三师编为六八七团，以七十五师编为六八八团，七十八师给六八七团六八八团各分一部；到平型关战斗后，即以七十八师为基础成立六八九团；到一九三九年，因部队日益壮大，三四四旅扩编为第二纵队，共辖三个旅；一九四〇年，六八八团抽出，纵队司令部率六八七团、六八九团由山西到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会合（即二旅）；后复从六八七团、六八九团各抽一部编成六八八团；南下，到苏皖边活动；后六八七团南下到盐阜区归八旅建制，六八八团，六八九团仍留苏皖边活动；皖变后，即编为四师十旅；该部因在苏皖边反顽斗争中损失甚大，乃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间与三师九旅对换建制，即移师淮海地区，归三师建制，因编额不足，即以二十八团与军区地方武装合编，现仅编成一个主力团（二十九团），即原六八九团。

（4）将八路军四纵队改为本军第四师，原四旅改为十旅，五旅改为十一旅（辖卅一团、卅二团、卅三团），六旅改为十二旅（卅四团、卅五团、亳北独立营），另有萧县独立旅（萧县独团，雨庭总队）。

自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顽敌向我进攻，四师便处在频繁残酷的敌顽夹击中。在三个月中，共损失轻机四十九挺，步马枪一千零八十二枝，战斗伤亡失踪者一千八百人。处此恶劣环境中，部队逃亡疾病现象极严重。故将萧县独立旅补充到十二旅，将十一旅特务营补充三十二团（因大小营集战斗损失过大）。

一九四一年四月，师主力进抵皖东北，将十二旅旅部撤销。其三十五团编入三十二团；三十三团除以一个连归三十一团外，其余编归十旅；并集中骑兵成立骑兵团；三十四团直属

师部指挥。这时部队仅有九四二四人，步马枪四七九四枝。

十旅东进淮海区，九旅编归四师建制。八月间，以师属特务团第一连，师政治部警卫连，东进宿东地区，与原留宿东活动之三十二团第四连，配合宿东独立团、独立大队，组成游击支队（以姚运良为支队长，周启邦为政委），开展宿东游击战争，控制顽军东进咽喉。

九月间，十旅东进淮海区归三师建制，以九旅编归四师建制。十月间，成立淮北苏皖边军区司令部；并以三十四团全部编为地方武装。

四师现除直属队、特务营、抗大四分校外，有九旅之二五团、二六团、二七团及独立大队，十一旅之三十一团、三十二团、骑兵团，游击支队及睢杞独立团，共一万三千余人。

（5）鄂豫挺进纵队编为第五师，下辖十三、十四、十五三个旅。

十三旅：以原三团改编为三七团，原二团改编为三八团，原五团改编为三九团。

十四旅：以原一团改编为四十团，原七团改编为四十一团，原九团改编为四十二团。

十五旅：以伪军反正的部队改编为四十三团、四十四团（该团后又编入四十五团），以原八团改编为四五团。

特务旅：以十四旅之四十团改编为特务第一团（另以折黄广独立团改编为四十团），另辖第二团（恐系师属特务团）。

随营学校改为抗大十分校，以原四团及×纵队三支队合编为抗大警卫团。

（6）江南部队编为第六师，以二支队改为六师十六旅，江抗、民抗改为十八旅。

十六旅下辖四六、四七、四八团。四六团原为老二支队四团；三九年抽调该团二营五、六两个连至皖南，编入老三团，另以当涂与独游区之两个连补充二营；三九年十一月张道庸同志率第一营北上渡江增援路东磨擦改编为苏皖支队，另以地方武装三个连改编为四团一营；一九四〇年十月，第三营又渡江增援黄桥，后改为三旅九团，另复以二游击区地武改编为四团三营。该团战斗力为六师第一位，虽均由地武改编，但老的作风还保持着。

四七团前身是四团派出的干部到句容，与教育界有名的巫恒通所组织的镇、句、江、丹人民自卫团（约二百人）；一九四〇年初，部队开溧阳整训，改编为新三团（约五百人）；皖变后，在二、三游击区遭敌长期性的反复扫荡，部队损失甚大，仅三百人左右；后与地武一部合编为四十七团。部队战斗力薄弱。

四八团前身是二团二营与地方武装、党所领导的太湖支队合编，五百余人（六个连），被顽方特务拖去一个连，后又经太湖敌扫荡与塘马被袭战斗，损失甚大，现仅二百余人。

独二团原是宜兴和桥汉奸儿子程维新组织的两面派游击队，在宜兴和桥一带活动；四〇年三月要求我军领导，改番号为武宜锡边区抗日人民自卫团；我主力过江后，改编为新二团，后又改为独二团。六个连，员额不足。

十八旅原是皖变后江抗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将原江抗一支队、五支队合编为一纵队，二支队六支队合编为二纵队，三支队四支队改编为三纵队，成立江南保安司令部，十四个常备队改编为二个警卫团和二个警卫营，四一年三月改编为十八旅。以三支队司令部改编为旅部，二纵队改编为五二团，一纵队改编为五三团，三纵队改编为五四团，警卫营改编为五四团三营，西路七支队（改编为五二团三营）改编为五一团。警卫一团、二团和警卫营均属保安司令部指挥。后因忠救军北上，为统一指挥起见，将五四团在苏常太活动之二、三营（四个连），与警卫二团合编为东路支队。该部自七月一日敌伪清乡后，部队全部损失。另五四团之二个连改为二营，后又补充五四团一营，五二团二营（江抗六支队）进入路南太湖区，

与太湖支队合编为四八团，归十六旅指挥。此时十八旅仅有五二团一营，五三团一、二营，五四团一营，警一团六个连（警一营补充警一团），五一团三个连，合计七个营。一九四一年八月底，师部率五二、五三、五四团各一营渡江北上。九月中旬，警卫团缩编为三个连。九月底敌清乡沙洲，保安司令部率一个连突围北上渡江，取消保安司令部，警卫团归师部指挥。五三团番号亦取消，其第一营改为五二团三营，第二营改为五四团三营。十月初，师部与旅部在靖西分开办公，部队进入江高地区。现在十八旅部队计有旅部、五一团（四个连）四百人，五二团（二个营六个连）六五〇人，五四团（二个营六个连）六百人，警卫团(二个连）二百人。战斗力最强是五二团，五四团次之。

（7）以无为部队及皖南突围部队编为第七师，其组成部分如下：

原无为游击纵队（前身系江北游纵，自我军退出无巢地区后，江北游纵即改编为四支队一部分，即现在六旅；嗣后为保持与皖南交通，又派孙仲德率江北游纵之二四两连恢复无为地区工作，番号为无为游击纵队，部队发展由二百人至八百余人）。

皖南三支队五团一营及皖南突围部队（皖南部队均系南方湘、鄂、赣、闽红色游击队；后改编为一支一团，三支三团，三支五团，发展了特务团及新一团、新三团；军部北上时，以新老一团改为一支队，新老三团改为二支队，军特务团与五团暂改三支队；军部被歼后，突围渡江共二百九十余人）。

长江两岸地方武装（由地方党领导的约四百余人）。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在无为成立师部（与十九旅合并办公）。以前述各部合编为五五团、五六团、五七团及挺进团（即五八团）、独一营、独三营、特务营。

各团略历：

五五团是皖南新老三团合计一个营，与无为游击纵队二个连合编，计共五百余人（五个连）；后又另调一地方独立营补充，共约六百五十余人。活动于无为西乡及青、繁地区；后挺进桐东，接替挺进团活动区；三官山桂顽进攻后，又退出三官山，转移无为西乡活动。

五六团是皖南军特务团一个营及一团一部，与无为游击纵队四个连合并，后又补充了无为二个地方游击队，合计一千一百余人；至九月抽出第一营，另拨入独立营编为第一营，原三营欠八连，将挺团一个连改编为八连。活动于巢南、无北。

五七团是以五六团第一营为基础，与皖南独立大队及数个地方游击队合编而成的（约五个连，主要担任恢复皖南敌后工作）。现以梁金华率二个连配合地方游击队在皖南活动，以陈仁洪率两个连配合地方游击队在含和活动。

挺进团是皖南五团一个营，由林维先率领过江，与桐西、桐南、桐东地方武装合编（六个连），向大别山挺进，开展大别山工作；于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桐西与五师鄂豫挺进纵队独立团张体学部会合，曾一度与独立团合编为二十一旅，又名为鄂皖挺进支队；至七月，独立团回鄂东，挺进团坚持宿、望间之湖区，配合赣北地方党领导的独立团行动，发展了桐西独立团与数个游击队；自一九四二年初被顽围攻后，部队分散突围，遭受一部损失，现已有一部到达无为，另一部在太、岳地区活动，桐西独立团亦回无为。

独立营即白湖独立营改编的，原系白湖地方游击队。独三营即巢湖独三营，系巢南地方游击队改编的。

另长江游击大队（皖南特委领导的地方武装）及含和独立大队，均是最近发展的。

（8）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改为本军独立旅。

独立旅的前身：一九三七年，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后，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成立之第二营，经过半年整训后，随六八五团东进至苏鲁豫边活动，部队迅速发展，当时有三个大队，老二营即为二大队。后一、三大队南下执行新任务，二大队仍留原地区活动。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即扩大至七千人；经肃托后，部队数量大减；至一九三九年底，即改为东进支队（当时只有二千），后即到郯马地区活动；到一九四〇年十月底，才正式改为一一五师教导五旅，下属两个团，即十三、十四两团；到一九四〇年底，南下至淮海区；皖变后归新四军建制，改为独立旅，现共辖三个团。

一团：是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在平型关战斗后所成立之第二营；到苏、鲁、豫活动时改为二大队，到郯马地区后改为教导五旅十三团，现为一团。

二团：是在郯马地区所发展的地方武装及由十三团抽出两个连所组成，当时即改为教导五旅十四团，现为二团。

三团：是一九四〇年淮海地区地方党所组织起来的一部武装——淮河大队，到一九四一年归独立旅建制后，即改为独立旅第三团。

乙、游击区的扩大与抗日政权的建立：

本军抗战五年，由分散零落的游击队，发展成为今天庞大而有力的正规军，成为抗日的坚强支柱，而为全国人民及全世界进步人士所拥护和同情。这种伟大的功绩，完全由于党的正确英明的领导，同时也是成千成万英勇的同志们用血肉换来的。

在岩寺集中时，国民党给我们的地方，云岭让我们暂住，以后划以天王庙为中心周围一些地方给我们活动，地图也只有几份，以后挺进到南京上海地区，这一块广大平原遂完全为我们控制。在江北，四、五支队由无、卢狭小地区，挺进到津浦线两侧，打开这一广大区域。六支队在皖北，挺进纵队在鄂中于武汉失守后，也都开辟了广大地区。磨擦以后，我们首先在皖东建立抗日政权，接着又在苏北建立广大地区政权，许多零散的游击区变成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慢慢连接起来，变成了敌后广大根据地。

今天，从陇海路以南，到皖南青弋江以北，京沪铁路两侧，西至湖北之汉水，东滨浩瀚之大海，包括湖北、河南（一部）、安徽、江苏四省；计辖盐城、东台、泰州、泰兴、如皋、南通、启东、海门、江都、仪徵、六合、天长、来安、嘉山、盱眙、高邮、淮安、淮阴、涟水、阜宁、东海、……等一百七十余县。我军散布其间，已经建立政权的达九十余县。在我军影响下之民众达三千余万，在抗日政权下的人民计达二千五百余万。

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以来，特别自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正确决定以来，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吸收了大批的优秀分子入党，建立了全国的群众性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的基础。但正因为在短时期内党得着了猛烈的发展，所以党的组织很不巩固，在征收新党员的工作中是有严重的错误与缺点存在的。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目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与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的征收党员。因此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加入了党。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使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党的组织之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使党的组织与群众抗日团体之区别，在某些地方模糊起来。使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有了一些机会来进行破坏我党的阴谋。这些办法都是错误的。这些现象都是党的严重弱点。同时，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对日投降与国内分裂的危险是存在与发展着，严重的困难的任务是放在党的面前。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为此，中央政治局特有以下的决定：

（一）估计到党的组织的现状与目前环境，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只有在某些个别地方与某些个别部门根据环境与上级指示有必要时才许可进行一些发展工作，但仍须注意发展党的已有经验，进行个别的慎重的经过审查的征收新党员，纠正追求数目字与采用突击方式的错误，只求精不求多。尤其在我后方地区更应注意，一切已有相当数量党员的地方一律停止发展，进行巩固工作。

（二）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份，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但是这种审查，不应当成为普遍的清党运动，而应当是个别的详细的慎重的审查与洗刷。这种审查工作，必须自上而下的进行。应由各局各区党委各省委首先审查各级干部，保证党的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掌握在经过考验与忠实可靠的干部手中。对于那些实际上是同情者，但已经加入党的分子，则劝告他们停止党的组织关系，变成党外同情者。再则党的一切工作，必须深入下层党员群众。支部工作必须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必须发展。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必须加以整理，以求得在巩固党的工作中收到最大的效果。

（三）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纠正各种左倾或右倾的不正确观点。各级党部必须根据具体环境与党员政治文化程度，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教育工作。

（四）为着巩固党，必须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中央特别指出：团结新老干部，提拔和教育新干部，建立新老干部间和协的相互学习相互遵重的关系，对于巩固党有一

等重要的意义。老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去教育新干部，去领导与巩固新干部。新干部必须虚心的向老干部学习，重视实际经验，接近工农群众，锻炼自己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任何新老干部间的相互对立、轻视或歧视，都是有害的，应该加以纠正。对于使干部实行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必须有专门的计划和经常的进行，以切实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准与工作能力。

(五)为着巩固党，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党内的锄奸教育与党的警惕性，必须大大提高，使保卫党的任务与反奸细的斗争，成为全党的工作。同时各级党部必须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保卫工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成立专门部门训练保卫工作的干部。在审查党员特别是审查干部的经常工作中去发现和洗刷混入党内的敌探奸细托派分子，叛徒和堕落分子。对于反奸细斗争的麻木不仁的忽视态度和宽大为怀的姑息观念，以及可能发生的张惶失措现象，都是极端有害的，应该迅速的加以纠正。

(六)为着巩固党，必须加紧党的秘密工作，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有正确的联系。一方面党的公开机关与秘密组织，必须严格的划分和清楚的分离；公开党员和秘密党员必须明白的分工，而不应由公开党员兼任党的秘密工作。他方面秘密党员必须有很好的群众联系与合法地位。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与各种规则，必须严格的遵守，任何自由行动与疏忽懈怠都是有害的，应该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七)为着巩固党，必须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必须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保证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提高党的铁的纪律，保证党的行动上一致。只有尽一切的努力来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才能使党有所准备来克服目前的困难，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团结全中国人民，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

中央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一）目前日寇汉奸托匪正加紧奸细活动，以实行其诱降反共的阴谋。敌人不仅公开的在军事上围攻八路军，政治上破坏共产党，而且隐蔽的派侦探奸细混入我们的内部，来瓦解我们的军队与政权，破坏党的组织。

汪逆汉奸最近在上海等地，以特务工作及暗杀等方法，进行投降反共的活动，实行个人恐怖。

反共分子，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发布所谓防制异党的办法，成立了反共的特务委员会，派遣特务人员到各地进行反共的特务工作，平江惨案即是这种有组织的罪恶行为的开始。现在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阴谋暗害工作，比任何时候都要加紧了，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最高限度的提高革命的警惕。

（二）党与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以来，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得到伟大的成绩与胜利，但在不少的地方及部门中发现了反革命混入党内活动的事实，值得全党严重的注意。

（三）自抗战以来，中央向全党严重的提出反奸细斗争的任务。党在六中全会中提出，如果不加强锄奸工作，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今年三月又发出开展反奸细斗争的秘密指示。但是各地党的组织及军队政权机关除了少数地方外，一般的说，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进行工作。反奸细斗争还没有被视为自己的任务；专门部门，还没有建立；专门负责这一工作的得力干部，还没有选出，没有培养；在全体党员中没有进行提高警惕性的教育；在革命群众中的锄奸运动，还没有发展；有些地方对敌人奸细活动的危害性，及我们锄奸工作的重要性，还没有足够的估计；甚至将这一工作和党的各部门工作对立起来，认为反奸细斗争对党的政治军事组织教育等工作没有关系，对锄奸工作有着神秘的及轻视的态度，甚至让自首分子担任负责工作；有个别地方因没有经常反奸细斗争的教育和工作，一遇反革命的活动，又表示张惶失措与扩大化的现象；许多地方对坚决废止肉刑与依靠证据不依靠口供的正确方针，并没有实行。所有这些错误缺点，中央认为必须立刻纠正。必须积极的动员全党加强反奸细斗争的工作，以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与党的组织的巩固，不使党与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

（四）为了执行动员全党发展反奸细斗争的任务，各地党的组织必须采取下列的方法：

1． 各地党要将反奸细斗争，认为是政治上组织上的重要任务；责成党的书记，军队的首长，对此工作首先负责，不要将此严重的任务仅仅划给少数人担任，而自己采取旁观态度，以及交与不能胜任的人员单独管理，要加强领导保卫部门的工作，把这部门工作视为党的工作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纠正个别的保卫人员留恋过去离开党的领导而形成独立系统的观点。对保卫工作的干部应经常给以工作指示和政治教育。十倍的提高党员的警惕性；党与军队的负责人，要在各种干部会议中、党员会议中、军人大会中公开讲演锄奸任务的重要性，

动员全党全军来担负反奸细斗争的任务。在有政权的地方，则要公开动员全体革命人民学校学生进行锄奸运动。

2．要有系统的考查干部和党员，坚决的同时是慎重的个别隔开的清洗敌探奸细托匪叛徒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采取一切的方法来防止这些分子混入组织，同时防止惊慌失措的态度及敌人诬陷同志牵涉无辜的阴谋，在审讯方法上要坚决废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证据。

3．从中央局到地委成立保卫委员会，由党的书记、组织部长、社会部长或专门负特别工作的人员组织之，在有政权军队的地方（如陕甘宁、晋察冀等地），由党政军及保卫部门的负责同志组织之。委员会由党的书记作主席。保卫委员会的任务是：动员和教育党的组织进行反奸细斗争，指导和审查专门部门的工作，决定保卫工作的主要问题与基本方针（军队的保卫委员会见军委在六中全会时所发之锄奸工作条例）。

4．建立专门的工作部门（社会部），或专门工作人员负责进行日常工作，由于此种干部须慎重选择，不易寻找，可照实际情形分别采用下列几种办法解决之：

(甲)中央局、区党委、省委，如有政治上坚定忠实，能力上胜任称职的干部，必须成立专门的社会部。

(乙)如没有适当干部任部长时，可暂由书记自兼部长，另找一忠实可靠的干部作副部长或干事，在书记领导之下工作。

(丙)暂由组织部长负责，下设副部长或干事专门作此工作，同时准备和培养能独立工作的干部。

(丁)特委、县委、区委无适当干部时，暂不设立专门部门，即由常委及书记负责，但必须有一人负责注意搜集敌探奸细活动的材料。

5．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报告中及最近中央巩固组织决议中所指出反奸细斗争的任务，配合当地具体情形，在全体党员中进行系统的教育；在学校中应有反奸细斗争的科目。

6．各地党的组织，应下大的决心，提调政治上坚定可靠、能力胜任称职的干部担负专门部门的工作，此种干部配备应慎重选择，以宁少勿滥自力更生为原则。但每个独立区域，必须选择培养能够独立工作应付全局的得力干部一人至二人；没有这样的高级负责干部不能掌握锄奸工作的全局。进行对敌探奸细的全线战斗。同时在华北、华中、西北、华南各地应尽可能派遣特委一级以上的优秀干部到中央训练，同时在当地进行开办专门的训练班训练下级干部。

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刘 少 奇

一、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产生

我们的党，是代表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在历史上已失去其进步意义并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阶级和势力，就成为我们阶级和党的敌人。在这里，斗争是免不了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的一方面，是我们的党和无产阶级并联合农民及一切要求进步的集团和人们，另一方面是国内国外阻碍进步的反动势力。在斗争中最基本的条件是这样的：（一）在我们方面，因为我们是进步的阶级和政党，努力要求社会的进步，所以我们拥护、阐明与主张一切的真理，不需要在群众面前隐瞒真理，欺骗群众，群众的觉悟程度愈加提高，就对于我们的事业愈加有利。所以我们总是要将我们的真实主张最广泛的公开到群众中去。这是社会进化的历史在政治上给予我们的优势；但是今天在力量上我们还没有优势。群众在政治上不独没有权利，而且受着种种压迫，缺乏组织，文化程度觉悟程度还不够；……（二）在敌人方面，因为他们是阻碍进步的没落的势力，努力反对社会的进步，所以他们不能拥护、阐明与主张一切的真理，必需在群众面前隐瞒真理，欺骗群众。群众的觉悟程度愈加提高，就对于他们的生存愈加困难。所以他们总是要将他们的真实主张隐秘起来，而要拿一套假的东西去欺骗群众（在这一方面，敌人要做秘密工作。）这是社会进化的历史在政治上给予他们的劣势；但是，他们今天在力量上还是占着优势。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还有极大的优势。

由于敌我双方的上述这种情形，对于我们有利的是采取公开的方式去进行活动、拥护、阐明与执行我们的主张。然而，敌人却能在力量上阻止我们的活动，逼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秘密的方式甚至处在地下去进行活动。如是这就产生我们党的秘密工作的必要。这是由于有敌人存在以及敌人在力量上的优势而产生的。这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不是由于我们主观高兴秘密工作。因此，党的活动，应该是尽可能的公开，而秘密活动，只是由于有必要。

党的存在与发展，是为了最后的战胜与消灭敌人。在敌人存在的条件下，党的秘密工作，也是会存在的。因为，敌我斗争的通常规律，是敌我双方都要最大限度的损害与消灭对方，最大限度的保存与发展自己。敌我双方都为了要达到上述目的，首先就必需了解对方的情况与企图（愈多愈好），而自己的情况与企图，就要使对方不了解（愈少愈好）。如是就要慎察对方，秘密自己。达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是每次战斗胜负决定的前提条件。因此，在敌人存在的条件下，党的工作就必需有一部分是要秘密的。这就产生了党的秘密工作之一般的长期性。而且也使党的工作分为互相对立的两种方式——公开工作方式与秘密工作方式。又由

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都同是党的工作，都是为了要达到党的同一目的，所以就产生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与配合。只有在国内外的敌人已经或差不多不存在的条件下，党的秘密工作，也才就自然无存在的必要了。

二、在各种不同时期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由于党与敌对势力的斗争在各地是不平衡的，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种不同的前进的与后退的时期，因此就使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在各种不同阶段与时期中有各种不同的联系与配合。一般的来说，我们可以分作下列三种不同的时期：

一、党处在地底下工作的时期。即党处在非法的被压迫的时期。在这种时期中，党的存在与组织和工作，都是非法的，都需要秘密。但是也恰恰在这种时期中，党就应该特别的注意去利用在党的各个工作部门内客观上存在的合法与半合法的可能性，去进行活动，才能建立、保存与巩固党，并与群众联系起来；虽然，在这种时期中，对于党来说，非法斗争与秘密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主要的一方面。

二、党处在公开合法地位的时期。即党虽然处于在野地位，但党的存在是受有合法保障的时期。在这种时期中，党的存在与组织和工作一部分是合法的，公开的；另一部分是非法的、秘密的。在这种时期中，合法活动与公开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主要的一方面。

三、党处在统治地位的时期。这时党的存在与组织和工作。都是合法的。但由于内外的敌人还存在，还有敌人的包围，党的某些部门中的工作暂时还需要秘密。但是这种秘密工作的性质，已经与前一二种时期根本不同。它是完全合法与受到政权支持的。

从我们中国党今天的特殊任务与特殊环境来说，由于各方面种种的特点，使我们中国党今天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具有下列三种不同的关系：

一、在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统治的地区。在这里党是处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之下，非法活动是党的主要工作。可能利用的公开与合法的机会，虽然不多，但对于这种公开合法可能的利用，也就特别重要。

二、在友党统治的地区。而友党中又有能与我们合作的与还不能正式与我们合作的，以及在合作的时期与在不能合作的时期等等区别。在这里，我们党今天的任务与口号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与友党今天所标榜的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党在这些任务与口号之活动，也就应该是合法的。但是由于友党对我还缺乏谅解，以及彼此都估计到在发展前途上可能的分歧，所以我党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合法地位，党的组织、机关和报纸等所有的合法范围，仍然是极有限度的。这种特殊的情况，就构成我党在友党地区的工作方式之特殊性，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特殊关系。这里的重要特点是在党的各个工作部门内有着相当广泛的合法可能给我们利用，但仍然有其一定的严格的限度。这种限度特别表现在我们常常不能以党及党员的面目去进行活动。

三、在我党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如陕北边区等）。在这里，党的组织与工作都是合法与公开的，但由于外部反对势力的包围，以及内部暗藏敌人的存在，在党的某些工作部门中还需要秘密工作。

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中，上述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也有各种的变化。这在以后再说。

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分及其相互转变

在一定历史时期，党与革命阶级的战略任务是不变的，但是党的策略就常常变动。即是党与革命阶级达到战略任务之具体方式与具体道路，就常常由于党与革命阶级在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内部的与外部的各种不同情况，不同条件，而发生变动。这就是说明党与革命阶级为达到一定战略目的，在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之复杂性和变动性，要求党与革命阶级在活动方式上要“因时因地制宜”，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反对呆板与公式主义。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两种方式，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表现形态。当着我们在决定采取公开的及秘密的工作方式之时，要求我们具体的去分析当时当地内外的各种情况与条件，才能区别党的工作何者应该而且可能公开？何者应该而且必须秘密？一般说来（只是一般说来），党与革命阶级的活动方式之合法与非法，是党与革命阶级的活动方式之公开与秘密的标准和尺度。即合法的活动一般是能够公开的，而非法的活动一般是不能公开的，即是须要秘密的（注意在这里是包括成文的及不成文的法律在内）。

当我们切实去了解当时当地党与革命阶级内外的各种情况，并熟悉统治者各种法律之后，我们就有可能来决定：对于党与革命阶级的活动，有一些什么法律条文是可以利用的？什么工作、组织和斗争方式是可以公开进行的？又什么是不能公开进行而必须秘密进行的？即是什么活动是统治者的法律所能容许的？我们可能采取合法的形式去进行，又什么是统治者的法律所不能容许的？我们必须采取非法的形式去进行。

被压迫的革命的阶级和党，它们的活动之合法与非法的限度，也不是不能变动的，因为（一）统治者的法律是用来压迫与束缚被统治者的，而不是束缚统治者自己的。统治者可以随时随刻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意志来颁布或取消与改变某些法律；（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力量之强弱，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及社会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之变动，亦可以扩大或缩小党与群众活动之合法的范围。一般说来，在革命的群众斗争的力量弱小与败退之时，合法的范围就要缩小，而在革命力量强大与前进之时，合法的范围就可能扩大。因此党与革命阶级就经常注意到在可能条件下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及某些活动之合法可能性之扩大。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情形又是另外一样，即革命力量愈加强大愈加威胁它的利益与生存之时，它就愈加要来限制与压迫革命（即如目前法西斯蒂的现象，并不表示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由于敌我双方斗争形势的变动及党与革命阶级的前进或后退，使党与群众活动的合法的范围常常发生突然的变动。因此就产生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相互转变。党的活动之某些部门或各部门常常要突然间地由秘密转入公开，或由公开转入秘密。

个别的群众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也常常发生相互的转化。群众在开始时采用合法的形式去进行斗争，但在斗争过程中常常走到非法的形式。而群众的非法斗争也可能逼使统治者承认这种斗争形式的合法化。

一般说来，党与革命阶级的活动，由秘密转入公开，是在环境顺利之时进行的，而由公开转入秘密，是在环境困难之时进行的，因此，由秘密转入公开是容易的，而由公开转入秘密是困难的。

党应该估计阶级斗争的整个趋势，估计在最近将来党可能提出的新的任务及可能发生的

环境的变动，由此而进一步的去估计：党与革命阶级的活动何者会转向公开？何者会转入秘密？而预为准备与布置，使这种公开与秘密的相互转变成为有准备有组织的转变，对于党的工作是有重大关系的。这可以免除或减少丧失时机，张慌失措及其他工作上组织上甚至生命上的损失。

四、非法的党怎样去利用合法的可能？

非法的党利用客观上存在的合法的可能去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就是所说的公开工作。在反动的时期内，党的合法地位是没有的，党员也没有合法地位；但是各个党员个人在不暴露党员面目的条件下，还有可能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合法的活动。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而适当的利用各种党员个人的合法可能去参加各种公开的半公开的社会活动，那即使党是处在绝对秘密的状态下，客观上给我们利用的这种合法可能仍然是很多的。在这种时候，党与党的组织是极端秘密的，但大多数的党员仍然要依照个人的可能去参加各种公开的社会的与政治的活动。这样，党就经过这些公开工作的党员，去深入到社会活动的各方面，去与比较广大的群众保持联系，去取得各种公开合法的社会团体机关和刊物。这对于一个秘密的党是极端重要的事情。因为(一)每一个这样的团体机关和刊物，都可能成为党在群众中的重要支点和堡垒；（二）党只有经过这样的方式，才可能与比较广泛的群众保持联系。并教育他们；(三）也只有采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更多的保存与巩固党的秘密组织，并且能够在群众中不断的去建立党的后备的组织。这样也就使得反动势力无法完全消灭非法的革命工人政党之存在。只有完全埋藏在亭子间中的秘密党是最容易被敌人消灭的党。

利用合法的可能，主要就是派遣党员去参加一切合法的社会团体和机关，即使这种团体和机关是怎样被反动派所把持的也不要紧。同时，还应该利用合法可能去建立各种合法的灰色的社会团体和机关；并在这些团体和机关中采用合法的方式去进行活动——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在合法的可能的范围之内拥护群众的利益，指导群众的行动。

在合法的团体和机关中工作的同志，必须耐性的长期的保持自己合法的面目，而不能暴露自己与党的任何关系，并且要尽可能取得这些团体和机关，保持这些团体和机关的合法地位到必要的时期，因此，这些公开工作的同志必须：(一）要采用适当的方式去参加这些合法的团体和机关；(二）要采用适当的身分和面目出现，他们的工作方式，态度，言语，作风，装束，以及私人生活等都要适合他们的身分与面目。在不妨害党与革命的实际利益之限度内，以能够表示得最普通最一般为最好；(三)要采用恰合环境的公开合法的方式去进行工作，去指导群众的斗争，去执行党的组织给予他们的指示，而不要超过一定的合法的限度（如提出非法的要求、口号、散发非法的宣传品等）。不能重复党内的工作方式；（四）要善于利用反动势力各派之间的矛盾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要善于采用适当的合法的方式去反对这些团体和机关中的反动领袖，同时又能善于敷衍他们；(五）要忠实于这些团体和机关的原来的任务（倘若这些任务不是根本上妨害革命的实际利益的话)。尽可能保持这些团体的合法地位；(六）他们要保持与党的秘密组织之必要的联系，并受党的指导与监督，但要采用特别技能的秘密的方法。他们一般不兼任秘密组织的工作，只能使最少的人知道他们与党的关系，并减少他们与党的联系至必要的程度。

这样去利用合法，就是使党员及党的组织尽可能在合法的形式之下埋藏到各种群众中，

各种团体与机关中去，并用合法的形式去进行党的各方面的工作，同时在情况允许的限度内掩护党的秘密组织进行工作。利用这种合法可能的公开工作应尽可能扩大，并应尽可能是完全合法完全公开的（自然半合法的可能也应利用）去进行。因为在党的各个工作部门内如有更多的合法可能利用去公开进行，就可以使得党的秘密 工 作 部 门减少和缩小到最低的必要的限度，就可以减少和缩小秘密工作的机关与人员及经费，就使秘密工作机关更易于组织。只有扩大公开工作的范围，才能缩小秘密工作范围；相反，如果缩小公开工作范围，就不可避免的要使秘密工作范围扩大。这在秘密党来说，是大大便利于敌人和侦探的。

党员参加在公开合法的团体和机关中工作，这些团体和机关有它们原来的组织系统和各种不同的职位。根据党员在这些团体和机关中的职位之不同，而有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之配合，有上层的合法斗争与下层的非法斗争之配合。一般说来，在上层负责的公开工作同志要掩护与援助下层工作的及秘密的同志去进行工作，而下层工作的及秘密的同志，就应团结与动员群众去拥护与援助上层负责的同志（如果在有国会的国家，就有国会内的斗争与国会外的斗争之配合），这种配合，是经过党的秘密关系和组织来达到。同时这种配合，依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要采用很技术的方法，因为如果超过环境的允许的一定限度以外，就要影响到某些同志的职位及这个团体和机关的存在。

五、秘密工作的规律

当着党处在地下时，一 切 党 员 都是秘密的，都秘密的与党的领导机关联系。但是党员除开参加公开公法的团体机关及在群众中工作而外，必须还有一部分党员来专门担负党的秘密工作，组织党的秘密机关，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如秘密的刊物发行、交通及党的领导机关等）。这些秘密工作是要有专门的人（主要是革命职业家）来作，而一般不应由担负公开工作的党员来兼任。同时党内的秘密工作方式与上述的公开工作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公开的群众中的工作方式绝不可重复党内的秘密工作方式。秘密工作者，他们一般不应在群众中露面，不应去直接指挥群众斗争，而应该长期埋头苦干。这些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在人员上及工作方式上划分清楚，而又经过一定的方式去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如果有人员上工作方式上的重复与混淆，对于一个地下党是有极大的危险。这不独 可 以 破 坏秘密工作与党的机关，而且也可以破坏公开工作与公开机关。

党的秘密工作的规律，秘密机关和人员彼此的联系及其与公开机关与公开人员的联系，须要遵守严格的一定的规定，并且要有严格的纪律来保证这些规定的执行。因为有敌人的严重存在，而且在党的组织内有奸细存在，秘密工作的任何疏忽，都可以引起党的严重损失。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才能保证一切规定的完全执行，才能使秘密工作具有妥当的确实性。

关于秘密工作的规定，大概须包括下列各项：（一）每一个党员和干部只应该知道他所必须知道的事情，而不应该知道他所能够知道的事情。随便将党内秘密告知不相干的同志，及随便在党内打听秘密的事情，都是不允许的。（二）某一个党的组织或党员与上下级组织或其他党员发生关系，须有详细规定。除规定应该发生关系者外，不许随便发生横的关系。（三）某些密码，代名词，记号，时间及其他技术 上 的 规 定。（四）各级党的组织的会议所讨论的事项，除开规定必要传达者外，不许参加会议者向任何人泄露。（五）在书面报告与文件传达中不许写人名地名及数目字，不要党员与干部名册，在必要作某些记录时以某种记号代替。（六）

一般不要党的秘密文件，如必须时也应该是不使泄露党的具体秘密工作者，而且在阅读后应即焚毁，在党的刊物与宣传品上，不要暴露党的秘密。(七) 党的秘密组织以短小精悍为原则，切忌庞大杂乱。并避免同志间不必要的互相认识。(八) 每个党员要尽可能保持个人的合法地位，尽可能少使人知道他是党员，尽可能少使党内同志没有必要的知道他的家庭及履历等。(九) 党内具体秘密工作方式，不要在党内作一般的传达。

严格的划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并使二者在严格的规定之下联系起来，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并最高度的提高党内警觉性，这就使敌人的奸细在党内难于活动，即使不幸发生党内的破坏，也只会是部分的破坏，而不致牵及到全局。

秘密工作的目的，是要在反动时期保存与巩固党，并在各部门的具体工作上，避开反动势力的耳目和注意，去准备胜利的革命袭击。因此，对于秘密工作来说，切忌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空洞的"革命的"叫喊（口头的和文字的）；因为这种叫喊，徒然刺激反动势力的警觉性，提高它们的注意力，破坏秘密工作，而没有真正的实际革命意义。我们决不可把这种无内容与实际意义的空喊，与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传播党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工作同等看待。前者是应该反对的，而后者则在不破坏党的具体秘密工作之限度内，是完全必要的。

党的秘密组织去指导公开工作的同志之时，必须清楚估计这些同志的地位和困难。只能给他们以能够担负与完成的任务，和他们所能采用的方式，而不能给他们以环境不能允许的任务及方式。因为这些同志，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非法的内容与合法的形式之间的矛盾，和他们的公开的地位与秘密的党的组织之不可缺少的联系。因此，他们在合法的形式之范围内所能执行的非法党给予他们的任务，是不能不有限度的。给他们以过高的任务，是他们在合法的形式之内所不能执行与完成的。

处在绝对秘密环境之下的党，应该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工厂作坊机关及农村中党的秘密支部中去，要尽可能把有指导能力的同志放到这些秘密支部中，尽可能减少依赖上级秘密领导机关的指导。这样，就可能使保存与巩固党的任务更易于达到，并能相当的去开辟党的工作。

六、在这个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当着革命发展到严重的阶段，党的组织已经转入秘密状况之下，新的革命高潮暂时没有，保存与巩固党的任务被提出，如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须要执行严格的划分与规定。这时候在党内就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右的取消主义——合法主义，另一种是"左"的取消主义——非法主义。

什么是合法主义呢？合法主义认为党处在这种被压迫的时期，不应该进行非法斗争与非法活动，而只应该进行合法斗争与合法活动。他们把党的活动群众的革命斗争限制在敌对势力所允许的合法的范围以内，抛弃与拒绝采用秘密方式的工作和非法斗争。他们被敌对势力的恐怖政策所吓倒，成为敌对势力的俘虏。即使他们也进行某些非法活动，但这都是为了要达到党的合法地位。然而在那种白色恐怖的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之合法化，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完全的幻想。这种合法主义的思想，对于一个地下党来说，是一种取消主义，因为这时党与革命阶级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非法的，如果拒绝秘密工作与非法斗争，实际上就等于取消党的工作，等于取消党。

这种合法主义者，他们不懂得在党的斗争未能使革命胜利，革命的任务未能解决，而党虽然转入长期秘密状态之下，但党原来的任务、纲领和基本的革命口号，仍不应放弃或降低，而只应该改变党的工作方式，改变达到这些任务、纲领和基本口号的方式与具体道路。但是合法主义者不愿改变党的工作方式，不肯进行秘密工作，而宁愿放弃与降低党的纲领和口号，去将就反动势力的法律，这就是放弃革命。所以他们成为革命的取消派。

什么是"左"的取消主义——非法主义呢？它与合法主义相反，是合法主义的另一极端。他们认为地下党的一切工作，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均须秘密的去进行，一切党员的活动，只应该是非法活动，认为在这种时期一切的合法斗争都是不可能的。认为党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去采用合法的斗争形式，某些党员去参加与组织合法团体和刊物，是"机会主义，合法主义，"是"蒙蔽阶级意识的斗争形式"。即使他们也去参加或组织某些合法的灰色的团体，然而他们也是为了要去打倒与破坏这些合法的公开的团体，使这些团体变成非法的秘密的团体。他们在这种时期反对利用合法的可能，反对一切的公开工作和合法的斗争形式，把党与革命阶级的工作和活动限制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之内，使党脱离与群众的联系，使党的秘密组织与秘密机关脱离公开机关与群众组织的掩护，给敌人更容易的来破坏党。所以这种非法主义，也成为取消党取消革命的另一种形式。成为"左"的取消主义。

这种"左"的取消主义者不懂得党在被迫转入长期秘密状况之下，党的未完成的基本革命任务虽然不变更，但是党的工作方式必须变更，必须改变达到这些任务的具体方法与道路。他们不改变党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他们坚持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只用一种非法的秘密的方式去斗争，反对与破坏那些在反动时期成为党之极重要的支点和堡垒的公开合法的团体，所以他们除开破坏党的工作之外，不能达到任何的党与革命的任务。所以他们是"左"的取消派。

列宁在反动时期关于《无产者杂志编辑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一篇文章上说："在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完成这一巨大的任务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要与从右边来的及从'左'边来的两种取消派作斗争。右的取消派说，非法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要社会民主工党的行动的中心，只应该完全是或差不多完全是合法的可能。而'左'的取消派就把这件事情弄到另一极端去了，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在党的行动上没有存在合法的可能，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党的行动都应该是非法的，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党的一切工作。无论前种或后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取消派，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因为他们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没有计划的适当的来配合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工作，不保存与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种情形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列宁全集》俄文本，十四卷九三页）

列宁又说："保存与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基本的任务。一切都应该服从这个任务。只有达到了党的巩固，我们才可以为党的利益而去利用那些合法的可能。"（同上九五页）列宁在这里为了保存与巩固党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的和"左"的取消派。右的取消派根本不要非法的党，自然就说不上在反动时期保存与巩固党。革命的工人政党在这种时期只能是非法的。不要非法的党，自然就更说不上为党的利益而去利用那些合法的可能。"左"的取消派在反动时期根本就否认保存与巩固党的任务，不去保存与巩固党，因此他们不去利用那些合法的可能。在反动时期不去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巩固非法党的基本任务也不能达到。

不论是"左"的取消派或右的取消派，他们都想使革命阶级及其政党之活动方式限制在

一定范围及公式之内，他们都不懂得革命阶级及其政党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起见，而必须毫无例外的去使用一切社会活动的形式或方面，并且随时都准备迅速的由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右的取消派说革命阶级及其政党不要非法的秘密的活动方式，只能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之圈子内进行活动；而“左”的取消派就说，革命阶级及其政党不要合法的公开的活动方式，只能在非法的秘密的圈子之内进行活动。“左”的取消派与右的取消派都这样把革命阶级及其政党的活动自己束缚在一定方式之内，所以他们在反动时期内都到达于取消派。然而列宁却反对他们说：“第一，革命阶级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起见，必须善于使用一切（丝毫不能除外）社会活动的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阶级须时时准备以极迅速的、突然间的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别一种形式。”（《左派幼稚病》）但是不论是“左”的取消派与右的取消派他们都不能这样去思想。

由于俄国的“左”右取消派都坚持自己的错误，列宁在当时不独是开除了右的取消派分子，而且从党内逐出了“左”的取消派——召回派分子。列宁后来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总结布尔塞维克党的经验时，认为开除这些“左”右取消派分子，是在反动时期保存与巩固布尔塞维克党及后来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列宁说：“布尔塞维克党之所以能如此（即保存与巩固党——刘），在其能够无情地揭破并逐出一般口头革命家；这些人不愿了解退却的必要与怎样退却，他们不了解在最反动的议会中，最反动的职工会中，协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等组织中，学习公开工作之必要。”“假使布尔塞维克党在最激烈的斗争中，不能保持联结秘密的与公开的斗争形式之职责，不能负责参加最反动的国会及受反动法律所限制的各种组织（如保险储金会等），那么，他们在一九〇八——一九一四年间，就决不能保存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中坚，自然更说不到巩固和发展了。”（《左派幼稚病》）

七、中国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中国党除开游击战争外，也曾经过长期的地下工作时期，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少的经验。中国党也曾经一般的提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的方针，反对合法主义与取消派，但在我们中国党内也同样发生右的取消主义与“左”的取消主义两种错误思想。

右的取消主义的代表者是陈独秀取消派及某些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阶段已经完结，旧的革命任务已经解决，反帝反封建已经不是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将走上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在这种时期，主要的只应该作合法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只应该是参加反动的国民大会，成为国民大会中的反对派。他们反对非法的斗争形式，以至反对当时革命的游击战争。另外一些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拒绝参加一切非法斗争与秘密工作，他们只在极有限度的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一些文字工作。这些取消派分子曾经我党开除党籍，而现在他们中之许多人已经成为凶恶的反革命分子。

在另一方面我们党内就有一些同志犯了“左”的取消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与机械性及对于当时革命形势与阶级力量对比的不正确的估计而来的。又由于党内反对这种“左”的取消主义的思想斗争之不够，使这种错误在党内存留很久的时间，并曾给党以严重的损失。这种“左”的取消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

一、当着党转入严重的地下的时期，不提出并且否认保存与巩固党是基本的任务。不提出

并且否认保存与聚积革命力量的必要。在每次群众的革命的行动之前，否认有严格估计斗争力量的对比及各阶级间相互关系的必要。

二、反对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及公开工作方式。认为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与公开工作都是“合法主义”，认为党只应该采取非法的斗争形式与秘密工作。认为党的一切行动，不论在什么条件下，只能是非法的，反对利用合法的可能。他们在党内进行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在大多数情形下，所反对的并不是真正的合法主义，而是当时党所必须重视的那种合法可能的利用。

三、认为在白色恐怖下，合法斗争形式是不可能的。或则只有极少合法可能机会利用，也是不值得重视的。他们不知道这种合法可能机会愈少，就愈值得秘密党重视的去利用。他们不懂得列宁这样的说法：“……现在与其说是在党的其他工作部门内合法可能性的问题，不如说是怎样去利用现有的合法可能性，对于党更为有益。”（《全集》，十四卷，九五页）

四、他们在事实上反对利用当时政府颁布的工厂法、工会法上对于党有利的条文，否认这些有利条文是工人长期流血斗争争取得来的（虽然是微小的，但是对于当时的工人阶级是很重要的）代价，而提出“反对工厂法，实行苏维埃劳动法”的口号。他们不懂得当时在大城市中实行（注意！是实行，而不是宣传）苏维埃劳动法是完全空洞的滑稽的口号。他们又反对在可能条件下去组织工人的公开团体。认为这种公开团体是“不黄不赤的中间工会或第三种工会”而抛弃。他们异常的不相信工人阶级，害怕工人群众一进行合法斗争，组织与参加合法的团体，就要蒙蔽工人的阶级意识。他们不懂得列宁这样的说法：“无产阶级参加的一切合法的机关，他们把自己阶级的觉悟带进去，公开保护劳动的利益与民主的要求，并将走向力量的团结与整个运动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自身每一步的发展，教育、团结和增加掘自己坟墓者的队伍，并加强他们的愤怒。”（《全集》）十四卷，二五〇页）

五、他们非常机械与错误的把“不应将就公开而降低党的纲领和口号”的说话，应用到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与刊物上去，要这些公开合法的团体与刊物提出党一样的非法的纲领与口号，用党一样的非法的态度、言语、作风与工作方式，去进行工作，使这些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变成第二党。他们并且决议要一切公开合法的灰色群众团体，一律转变成为非法的赤色工会。他们在这里不懂得党与群众团体的区别，公开与秘密的区别。

六、他们抹煞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性，而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完全混淆重复与等同起来。使秘密机关的负责人去兼任公开机关的职务，他们上午在公开机关办公，下午就到秘密机关办公。他们使许多可以公开组织的群众团体和工作都秘密起来，并且重复党的工作方式，这样就无限制的扩大了秘密机关，真正公开合法的机关就完全没有。又在党的刊物上登载党在群众中的各种秘密活动。这样就大大的便利了侦探和奸细，给敌人以无数的破坏党的机会。在完全取消公开工作与把群众团体也秘密起来之后，党的秘密工作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如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与群众运动，都同被破坏。

七、他们不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对照，而与群众工作对照。他们说：“只有群众运动作好，才能使秘密工作作好。”然而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在当时情况下，群众运动又如何才能作好的问题。他们不懂得秘密工作虽然与群众运动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到底还是两件事情。他们各自的发展过程，两者并不是完全合致的。党的秘密工作如果不好，在某种情形下是可能破坏公开的群众工作的。同时公开的群众工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也可能破坏秘密工作，有时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与党在群众中的秘密的堡垒，而不能不相当的限制群众工作。

从上面看来，中国的“左”右取消派与俄国的“左”右取消派虽有各自的特点，但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所不同的，就是中国党没有能够很快的克服“左”的取消主义的思想。这应该成为严重的教训。正如列宁所说，由于这种错误，“就决不能保存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中坚”。这正是过去白区党绝大牺牲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左”的取消主义者也在形式上反对合法主义与右的取消派，但他们是(一)站在不正确的“左”的取消主义的立场上来反对合法主义；(二)因此，他们不仅反对合法主义，而且主要是反对当时正确配合公开与秘密的那种行动和思想。再加上他们各种“左”的错误行动，如是他们在事实上不独不能真正反对合法主义，而且大大帮助了合法主义与右的取消派，给右的取消派以各种借口来攻击党，诬蔑党。同时，他们这种极“左”的思想在另一种情形下又转成极右的思想。后来他们甚至认为中国过去那种两个政权对立与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保存与巩固党是不可能的，白区党的组织之极大部分被破坏，以及无数同志之极大牺牲，是完全不可减少与不可避免的，是完全由于客观的困难条件所造成的。因此他们的错误也是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无疑，这当然是一种极右的思想。这种右倾的本质，又可以暴露在党员需要进行广大而残酷的武装斗争之时。在这种时候，原来极“左”的人，又表现他们没有足够的决心与胆量去确定与领导这种真正广大的群众革命斗争。这在中国抗战发生后党的工作中，也证明这一点。

八、几 句 结 语

利用合法，正确配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对于一个地下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上的错误，不独不能使党在秘密条件下去有效的准备革命，而且要使党的保存与巩固成为不可能。在中国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常常把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看成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中国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付了极大的血的代价，然而这个问题在今天中国党内还不减低它的重要性。每一个干部必须细心的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不只是为了要了解过去的教训，而主要是为了要更好的去进行今后的工作。关于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文件，我们在国内国外还很少看到，因此，就更加值得我们在原则上和实际工作中去系统的研究。

（原载《共产党人》创刊号，1939年10月出版）

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

（一）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争取民主政治，准备反攻力量，否则是不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必须深入群众工作，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在投降与反共危险没有克服以致发生突然事变时，使党与抗战避免意外的损失，否则也是不可能的。抗战以来，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工作，有了相当广大的发展，因此扩大了党的武装力量，创造了游击根据地，生长了全国的进步因素，坚持了两年多的抗日战争。但同时严重的存在着几种错误倾向，这就是：（甲）注重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忽视了下层群众工作。许多党的领导机关，或者根本不把群众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内，不去指导下级如何去做群众工作，或者讨论与指示的很少。许多支部，许多党员，脱离群众，有根本不做或不知如何做群众工作的。（乙）在初步发展了群众工作的地方，许多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深入群众工作的讨论与指导，使群众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中央责成各级党部立刻纠正这些错误现象，使全体党员懂得，共产党只有进一步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当前时局的危机，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在可能发生的不利于党与抗战的突然事变中，不使党与抗战遭受意外的损失。

（二）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用全力研究并指导下级直至支部如何在当地进行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工作，利用政府已经颁布的纲领法令及当地习惯许可的方式，尽其可能的使党的支部与当地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接近起来，把他们一步一步的组织起来，并领导他们进行各种有利于群众，同时有利于抗战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生活改善运动，那怕是从极微小的改善开始，也是好的。对于下级地方政府机关（保甲与联保）、地方文化机关（小学及教育会）、地方经济机关（合作社等）、地方武装力量(自卫队及民团)，应尽其可能使之掌握在共产党员、左派人员与公正士绅的手中。这一切，必须在同当地左派人员与公正士绅结成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在当地环境许可的条件下，在估计到可以长期保存党的力量积蓄党的力量而不破坏的条件下进行之。在国民党区域必须使党的群众工作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可能，才能进行，才有效果；而党的组织工作则须使之极端秘密起来，才能保存，才能巩固。必须使党的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严格区别而又适当联系，极力避免过去内战时期白区工作失败经验的重复。因此，一切国民党区域的共产党，必须有步骤的，有深远计划的，既不懈怠又不冒进的，利用一切公开合法可能而不影响党的公开工作与党的秘密工作相混同的去进行群众组织工作，群众教育工作与群众生活改善工作。以群众工作之好坏作为判断当地党的工作之好坏的主要标准。一切不了解群众、不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党部与党员，都不是好的党部与党员。关于沦陷区域工作，除应依照沦陷区特殊环境之外，原则上适用上述规定。

（三）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必须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与政

治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人生活。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凡尚未实行的，必须毫不犹豫的立即实行。在政治改革方面，必须实行民选制度。凡一切阻碍民众运动发展的人首先是地主阶级，必须在群众拥护的基础上，有步骤的排除于各级政府机关之外，而采取孤立他们的政策。只有工人、农民、抗日知识分子、及不阻碍群众运动的人，才能加入政府办事。尤须注意区、乡、村三级政府的整理，因为地主及坏分子，最易冒称抗日，躲藏于区、乡、村三级政府机关之中。这样使政权民众化，并不妨碍我们与一切公正士绅及还能帮助抗日的地主商人进行一定程度的统一战线，例如鼓励他们捐钱捐粮捐枪帮助抗日及和他们保持必要的联络等。所有各级政府的组织成份、及其政治经济设施，各级党部必须认真加以检查。至于地方民众团体，必须由党员领导，深入群众内而去发动为着群众自己利益而斗争的群众运动，依照自愿原则，将最大多数群众一步一步的组织于工会、农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儿童团体及民众武装团体（自卫军少先队）之中，为参加抗日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而斗争。这些民众团体，负有教育民众，发动民众积极性的重大责任。当地党部，必须认真检查民众团体的工作。党的支部，必须以群众工作为基本工作，每一支部必须变成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镇所有群众的核心，变成一切群众运动一切群众斗争的宣传者组织者与领导者。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委员与政治部，有积极帮助上述政府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责任，并须教育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不得有任何脱离群众的行为，不得有不尊重地方党政机关不尊重地方民众团体的行为，必须纠正把党政机关与群众团体看成军队办差机关的错误观念。地方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必须在一定时期之中总结群众工作的经验，以其结果指导下级的群众工作。

（四）在目前时期中，共产党认真的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根据上述方针，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具体口号之下，一步一步的组织他们，教育他们，领导他们改良生活，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于克服投降反共危险具有最后决定的意义。对于巩固共产党，对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中国共产党，也只有深入群众，并领导群众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有可能。中央希望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对此加以严重注意。

在祝贺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毛　泽　东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为吴老祝寿，引起我在两年前为徐老祝寿时的感想，我那时就说过，我们替他祝寿，不是无原因的。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喜欢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象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的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们都十分敬爱他们。党外也有许多受青年尊敬的老人，例如马相伯就是一个，他做寿时我们共产党还打了贺电去，因为他主张抗日与民主政治。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末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倍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旧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饥饿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这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我们今天大家欢欢喜喜的庆祝他的六十生日，我想主要的意义是在这里。

（原载《新中华报》1940年1月24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

这个农展会，我还没去看，好不好还不知道，但我听到说还好，比去年的好。去年我是看过的，今年比去年更是好，这是老百姓同志的努力，是政府工作人员努力的结果。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老百姓从几百里拿来一包两包面送来展览，这对打日本有大道理，这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边区政府受老百姓的拥护，作出许多好事，这也是热心作出来的，我们要发展这个热心。但还有一条，只有热心还不行，还要力求进步，今年的展览会就有进步，我们要奖励这些劳动英雄们，因为他们不但热心，而且求进步。这是有八路军，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在座有许多八路军同志，你们要向老百姓敬礼，不要骂人。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作的，房子是他们作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我们边区有二十三个县，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有些磨擦分子，派了兵来一打，打过我们几个县，这是不行的。你们到外面去的同志更要同他们讲一讲，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磨擦饭，吃了磨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今天我们开这个大会，有许多同志，还有张先生及蒙古同志，我们大家要吃团结饭，不要吃磨擦饭。磨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磨擦，将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内窝子磨擦。

（原载《新中华报》1940年2月3日）

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报导)

（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

毛泽东同志在如雷似的掌声中走上讲台首先说:“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又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

接着说:“边区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最后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原载《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八日）

（一）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是当前深入动员群众参加与坚持抗战，培养革命知识分子与干部的重要环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必须认真的把这一工作当做他们的中心任务之一，坚决反对党内历来对于这一工作的轻视与忽视的态度，及认为战地不能注意与发展国民教育的观点。特别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的打破过去宣传教育工作的狭窄的圈子而走进这个广大的活动领域中去。

（二）国民教育一般的可分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在学校教育方面，举其大者，必须：

1．尽可能的恢复与重新建立各地小学校，达到每村有一个初级小学校，每乡（或每编村）有一个中心小学或模范初级小学，每个中心区有一个两级小学或完全小学，以建立广泛的小学网。

2．大批的吸收与鼓励青年知识分子或旧知识分子，尤其是过去的小学教员，担任小学教员的工作，开办各种小学教师训练班或讲习所，给他们以必要的训练。必须计划在几个中心地区设立师范学校，大批的培养小学教员，并注意女教员的培养。

3．用说服解释方法及政府法令的强制力量，大量的动员学龄儿童入学，同时设法克服学龄儿童不能入学的实际困难。一切革命者家属的儿童，应首先入学起模范作用。

4．为了提高各地文化、政治、专门知识的水平，为了造成中级与高级的知识分子，为了吸收现在尚散伏在乡村中的游离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某些县区内公立中学校的设立，仍然是必要的。这种中学校的一切设施，应相当正规化。

5．为了吸收青年妇女进学校，同时估计到中国旧社会中封建思想的存在，应在某些地区设立女子两级小学或女子高等小学，女子师范及女子中学，但同时应该提倡男女同学，一切学校均应吸收女子入学。

（三）在社会教育方面，举其大者，必须：

1．在各村各乡小学校内或小学校外，建立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夜校，识字班（女子可同男子分开，上课应在白天），组织各种识字组、大众黑板、读报、演讲、娱乐体育、壁报、戏剧等一切适合于民众需要及为民众所喜欢参加的活动。小学教员即应成为该乡该村社教的主持者，他的小学校中的优秀分子即可成为他的助手（即小先生制）。该乡该村的共产党员首先应参加这个工作，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并经过他以团结与教育群众。

2．各级党部、政府、部队、学校、民众团体都应负责在其机关附近办理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组织及民众学校等，吸收机关周围的群众参加，以帮助社教的发展，并应

指定专人负责。

3．在自卫军内进行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社教工作。这是最便利于进行社教活动的场所。

4．大大发展农村中的戏剧、歌咏运动。但应注意于戏剧歌咏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地方化，特别注意于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

5．在每县内的中心市镇设立民众教育馆，使之成为推广社教的模范。

（四）应该确定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即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出发点的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与科学的教育。

（五）为了加强党对国民教育的领导，党的宣传教育部内应该有国民教育科。它应该经过政府的教育厅或科及其他国民教育的社团去领导国民教育。党委与宣传教育部应经常检查、讨论、督促、帮助并总结教学等经验。

（六）为了推动国民教育的进行，在上级政府的教育厅或科下可有专门的"督学"之类去分区负责巡视学校教育。可有社教督导团或巡回教育团之类去负责推广社会教育。党与政府应经过他们去了解下面具体情况，总结经验，并经常给各地以实际的帮助。

（七）上级政府的教育厅或部下应有专门人与机关负责编辑、审查、出版、发行各种国民教育的教科书、教材、参考材料，并力求其完备与统一。

（八）各种报纸、杂志，应经常披露国民教育的消息与材料，并加以指导与帮助。可能时，应专办推广国民教育的刊物与报纸。通俗的大众读物，今天特别需要。

（九）应经常召集各种关于国民教育的会议，讨论各种问题，吸收一切同国民教育有关的团体与工作者参加。

（十）应组织各种帮助国民教育的社会团体，如小学教育联合会，社教促进会，或国民教育研究会等。各种文化团体，如文化协会、戏剧协会等，应以帮助国民教育为它们的主要任务之一。

（十一）政府应提高用于国民教育方面的经费的比例，尽可能实行免费教育，对贫苦学生还应给以必要的书籍与纸笔等日用品。

（十二）要提高小学教员及社教工作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关心他们的学习与生活，并给其中的优秀分子以各种的奖励，反对任何轻视他们的不正确观点。对于在其他政党不良影响下的小学教员，应积极争取之。党员的小学教员，一般可兼任支部的宣传干事及政府教育委员会主任等工作。

（十三）党应决心动员一批党员知识分子终身从事于国民教育的事业，把这种事业当做一个党员的光荣任务。

（十四）青年救国会及其领导下的儿童团，其最主要任务之一，即为文化教育方面的活动。他们应该成为党与政府在国民教育方面的第一个助手。他们的会员的最大多数应积极参加国民教育的活动，在学校中，在社教中，成为成年、青年、儿童的模范。

（十五）在国民教育工作方面，共产党应力求同有正义感的名流学者公正士绅实行统一战线。这在争取全国中间力量同情我们上，有极重大的意义。

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

（一）加强对敌军的工作有最重大的意义，这是决定抗战胜利和引起日本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毅力与坚持性来进行这个工作，过去对这个工作的注意，一般的说是不够的。

（二）为加强对敌军的工作，必须健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无论如何要抽出得力的同志担负此种工作。望将旅以上敌军工作部及区党委以上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组织状况工作状况简略电告。

（三）收集敌人的各种文件是研究对敌军工作的重要准备，请各部队、各区党委把所获敌人的全部文件，交代表带来延安以资研究。

（四）对敌宣传品的内容值得深入的研究，望各部将自己的各种对敌宣传品带几份来延安以供参考，同时延安正在印刷传单、报纸及小册子分给前方散发。

（五）对日军俘虏工作除执行总政过去的指示，凡俘虏愿意回去者即给以鼓动招待令其回队外，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期的训练。现决定晋东南选三名（包含杉本）、晋冀察军区送三名、一二〇师送三名最进步的日本俘虏来延安受训，以培养出日本的革命者。

（六）各部队各党委必须总结对敌军工作的经验，在来延安代表中指定专人负责向中央报告，以便研究对敌军工作的方法，开辟对敌工作的新阶段。

中 央 书 记 处

总政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〇年六月）

关于对日军俘虏之工作，我们提出下列各点：

（一）严格遵守战场纪律，注意收集敌军文件，禁止枪杀已经停止抵抗的日军士兵官佐，禁止侮辱日军俘虏。

（二）俘获敌军士兵后，即给以好的招待与宣传。凡愿意回去者经过短时的宣传与谈话，使他们知道日本关于八路军的宣传是欺骗他们的，然后一律放他们回去；凡不愿回去者，禁止强迫送回。对新俘虏之工作，可利用旧俘虏去进行。

（三）凡自动过来的，查明真相后，一律不应强迫送回，而应争取帮助我们做敌军工作。

（四）凡游击区域不宜训练俘虏的地方，如俘虏愿意回去者放回，不愿意回去者可送附近比较巩固的根据地。

（五）各师、各纵队、各军区、各战略单位应力求训练出几个进步的俘虏，帮助我们对敌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不应轻视。

（六）对俘虏之训练，应注意多分配事情给他们做，如参加敌军工作干部训练队之日语教授，参加宣传品之起草，参加俘虏之训练，自愿的写信回国给其亲友等等。过去对俘虏工作之困难是因为没有日本人赞助我们，假若我们能训练出几个同情我们的俘虏，则今后俘虏工作及一般敌军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

（七）对俘虏之训练，应由浅入深，逐渐启发其阶级觉悟。不应一开始即以马列主义重要著作去作教材，而应有长期的渐进的教育计划。

总政治部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〇年七月六日）

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组织有力的伪军，对已有的伪军进行瓦解工作，削弱其战斗意志，争取伪军对抗日的同情与帮助，争取伪军反正，这是我们对伪军工作的总方针，这是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一）我们部队应不放松一切机会去争取伪军、瓦解伪军、消灭伪军，过去经验证明，凡对伪军采取积极的联络与打击的地方，则伪军在数量上与质量上均弱，反是则伪军较多较强。

（二）不应当把一切伪军的全部官兵都当做死心塌地的汉奸来看待。对伪军只采取军事上的消灭，而放松政治上的争取与瓦解是不对的；然而只作政治争取而放弃军事消灭，同样是不对的。我们应按照具体情况来灵活的配合军事消灭与政治争取。

（三）我们应从各方面强化对伪军的工作，选择适当的干部及当过伪军的军官和有关系的人员，加以训练派往做伪军工作。

（四）在伪军内部工作的方针，主要的不是发动士兵对军官的斗争，而是争取伪军官兵对抗日的同情，启发民族觉醒、增加其对日寇的不满与仇视，和抗日军队通消息，报告敌情，帮助抗日军队的物质资材，对日寇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但当伪军真诚帮助我们物质资材或交通工作时，不应作过多的过分的要求以致被敌发觉。

（五）对伪军反正要采取正确政策。在条件未成熟时或反正不能胜利时，或某个伪军区域有特殊作用时，不要轻易提出反正口号，而应长期埋伏，以待将来。在伪军不得已反正后，必须以最大的耐心进行教育工作，不可过急；不应剥夺原来军官的兵权，不可实际上解散其军队，因为这样便是阻绝其他伪军的反正。对于反正伪军，不一定要编入八路军，编制不一定要很快的八路军化，而可以作为八路军的外围军，但其编制、待遇、纪律、政治工作等均与八路军有别。

（六）对伪军的宣传工作要加强。主要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帮助日本人来压迫中国人，中国同胞大家联合共同抗日等等。不要骂伪军官兵都是汉奸，绝不要提杀尽伪军汉奸军官和活埋汉奸等等错误口号。对伪军家属要加强政治争取工作。

（七）对伪军的内部工作及伪军的关系等等，要严格保守秘密。这种工作应由团以上及县委以上的政治机关的一定个别人员负责进行。伪军内部不应组织庞大的抗日组织，而以短小精干为原则。

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

（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

虽然青年学生对政治现状继续不满与苦闷，但国民党对学生运动，采取极端压迫的反动政策；因此，我们今后在国民党区学生运动的根本方针，应是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故工作中心应由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转为校内学生工作；各重要的大、中学及地方教育界有地位的学校，应设法建立短小精悍的支部；并应在工作中遵守以下的原则：

（一）党员应首先注意功课、操行。开会不可每月超过两次，环境恶劣时少开或在一个时期内停开。参加群众组织不可超过一种。加强党员对马列主义学习，但以有领导的个别进行为主。暴露的党员应离校，或停止小组生活，暂时不活动。支部组织不应超过十人；学生党员多的学校，设平行支部；但必须注意在各年级学生中发展，使每学期能保持有党的支部。

（二）争取大多数的同学，应以思想的启发为主，其有效方法，是提倡尊重人格，研究学术，暴露社会黑暗，介绍文艺作品和不违禁的较进步的刊物。但并不放弃适当的共产主义教育。可能时，可组织学术性、生活性、友谊性的团体。

（三）团结积极群众，应指定支干会以外的少数党员与他们个别联系，或形成无定形组织，若组小团体则应防止突出。

（四）关于学生合法团体如同学会、女同学会、系会、级会、同乡会、青年会、音乐会、球队等，应以环境可能的程度进行组织，多注意学生福利事业及民主作风。这类团体一般不要与学校当局对立，可能时进行各种校外合法活动。

（五）应接近教员，争取好教员对我们的同情，麻痹坏教员对我们的敌视。

（六）经过一定积极分子，参加与领导学生群众的斗争，但不可制造斗争，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斗争中须向高级当局及各种报纸杂志揭露真相，并须注意适时的结束之。在斗争中绝对避免支部及支部负责人的暴露，支部及支部负责人应站在暗中推动、旁边赞助的地位，他们应深深的埋藏在学生群众中间。

（七）毕业出路，党员升学应尽量升入地位高、人数多或出路便于接近群众的学校和院系；就业时应尽量选择教育、实业、行政等机关，并应继续联络校友，参加与组织毕业同学会，扩展我在社会各部门、各阶层的影响和工作。

（八）领导学校支部的各县、区青委，应由详细考察过的并熟悉学校情形的干部组织之，并尽可能入校读书，已暴露的青年干部坚决撤退。

中 央 书 记 处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报导）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接着主席请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指示时，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微笑着站了起来，说："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现在，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绩。今年开过了这个年会之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的条件比过去好了，有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年会开了以后，新哲学会的前途是光明的。"

（原载《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指示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

你们的会议除应详细讨论中央七七决定及最近中央与总政各种指示以外，我们还有下列意见：

（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因此，模糊我们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原则，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作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一切作法。相反的，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在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一政策的有力武器。

（二）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种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应当承认，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军队对居民中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在政权及地方党未建立起来的地方，军队政治机关应负全责建立起政权与地方党，而在建立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实行党的政策。在政权及地方党已建立完备的区域，军队不应干涉地方政权及党的工作，而应尊重他们，成为遵守法令的模范。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对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格的斗争。

（三）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必须团结全党干部。因此，明确的规定下列关系，是必要的。

1．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更严的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论纠纷，应更多的责备军队党。

2．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

3．在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老干部。

4．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的要求和责备正规军及老部队。

（四）估计到部队的分散环境和政治工作现状，因此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应注意：

1．全般性。反对只顾局部利益和本位主义。

2．进步性。多研究、多总结，反对保守、不求进步。

3．复杂性、多样性。反对简单、公式主义、敷衍了事。

4．计划性、组织性。反对急燥盲动、乱来一顿。

5．统一性。以求分散与集中、自动与命令求得一致。

6．实际性。反对不着边际、铺张夸功。

7．仔细性。反对粗枝大叶、只求表面。

8．战斗性。以求政治工作真正适应战斗环境。

(五)敌伪军锄奸工作，总政已有电示；关于干部工作、民运、宣传、教育等，总政当陆续有电示。

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

（一）根据七七中央决定必须广泛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而在友军中则须扩大交朋友工作，以便争取二百万军队继续抗日，对于这种交朋友工作毫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重责备，你们必须根据这一决定检查你们自己的工作。

（二）三年以来有些地方党及部队根本不曾有系统的进行这种交朋友的工作。根本忽视这一工作，尤其是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以来，许多干部甚至某些重要领导干部，认为国民党及中央军都是顽固派，我们方针只是对立斗争与准备破裂，也不研究国民党的内幕了，也不研究各个中央军及非中央军的具体情况了，也不研究各个社会阶层的动态了，也不研究自己干部中的旧有社会关系以便利用这些关系开展交朋友工作了，也不研究宣传鼓动的内容形式了，也不研究统一战线的组织方式了。对于统一战线工作机关（统一战线部或联络部）及其工作人员，没有指导，没有检查，没有督促，大家觉得无事可做了，甚至根本没有设置这种机关。对于中央屡次号召统一战线的指示，有些人竟把它当作耳边风，当作官样文章，实际上置之不理，一味骄傲自大，等待内战，或悲观失望，束手无策。所有上述情形，是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内严重地存在着，因此许多地方对中央的报告中，只有战斗报告或其他工作报告，而很少或根本没有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中央现在严重的唤起你们注意，凡属存在着上述错误现象的，必须立刻改正。必须在党内开展自我批评，总结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发扬有成绩的地方，改正有错误的地方，中央现在等候着你们在电到一个月内用电报发出你们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带总结性的专门报告，尤其着重的是关于对友军工作的报告。

（三）研究对待友党友军及各阶级阶层的策略问题，是各级干部尤其是中级高级干部的中心问题。而要有正确策略，必须有正确认识，必须使自己及干部的头脑正确地反映各友党友军各阶级阶层的具体实际情况。到现在止，很多干部对于当前抗日统一战线环境中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真实情况如何及其在每一时期与每一事件中的意图政策方针作法如何，并无正确理解，有的根本是模模糊糊，不闻不问，有的则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这些干部的头脑根本没有政治化与策略化，必须明白，这种态度是不能对付行将到来之国际与国内的重大事变的，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加强对于干部的策略教育。而这种策略教育的首先一步是引导干部精密研究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具体情况及其在每一时期每一事件中的意图政策方针与作法。

（四）国际国内的重大变化行将到来，全党必须在精神上组织上有所准备，而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则是达到胜利的保证。我党在十九年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但也有过严重的错误。在大革命时期中，有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又有李立三及苏区中白区中一切打倒否认联合（工人农民以外的某些可能部分）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由于这两种错误，曾使大革命失败，又使土地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现在是第

三个时期，我们必须总结过去经验，避免前两时期的错误。在策略上，对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我们只反对当前直接向我进攻的极少数人，而联合及中立极大多数人，以便各个孤立与各个击破那些坚决的投降派与反共派。所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正确策略方针。

中央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九日）

(一)要让全党党员深刻认识，争取二百万友军的继续抗战，是今天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而扩大交朋友的方式，是今天友军工作最主要的方式。

(二)要对全国友军有正确的认识与正确的策略。应该看到，在今天抗战环境与共产党八路军强大的力量面前坚决仇视我积极与我磨擦的友军只是极少数。有些虽可接受命令，向我进攻，但主观上并不积极，甚至动摇的（包含最大部分的中央军和杂牌军），而有些则愿尽力与我保持友谊关系。就是在坚决仇视我，积极与我磨擦的部队中，其广大士兵群众及中下级军官，还是可以争取的。我们的策略是要尽力团结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是要善于争取广大的中间力量，是只打击当前直接与我磨擦的少数最顽固的势力。所以要极力纠正某些部分把整个中央军或某一整个杂牌军，全看成顽军，不知分别对待争取，以致多树敌人的错误倾向。要纠正顽军向我进攻时只有硬打，而不知对其部众宣传分化争取的现象。要纠正把顽军看成汉奸一样，乱加汉奸帽子，以及只有打击，不知并用争取策略的现象。要确定不杀顽军俘虏，不损害顽军家属，并善于经过优待一切友军家属，以扩大争取友军影响。对一切损害友军家属的行动，必须严格纠正制止，并公开的向友军道歉和赔偿损失。

(三)为了有计划的扩大交朋友工作，各级统一战线部一定要尽力做好两件事：第一要与组织部协作详细了解每个党员的社会关系，并充分利用与友军有社会关系的党员指导他们去和友军做交朋友工作。第二要对周围友军的各种情况，有详细的调查研究。

(四)交朋友的形式有以下几种（都要充分应用）：一是公开用党员面目出现的（公开党员与党和军队所派出的代表），二是用非党员面目出现的(秘密党员)，三是间接的交朋友（经过友军首长的至亲密友去影响他），四是部队的友军联络工作。

(五)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应经常派人与当地友军联络，主动的、积极的亲近友军，疏通彼此间的关系，解释与消除一切不必要的误会，以虚心诚恳的态度交换工作经验，对友军各级干部取尊敬与亲爱的态度，在他们同意与自愿的原则之下，进行部队的联欢，相互参观，帮助工作，作战时尽力给予协助配合。过去的经验证明，如果各兵团首长能经常直接与友军上层往还，影响极大；而每个战士，亦应不放过与每一友军士兵接近的机会，给友军士兵以很好的影响。

(六)为了认真扩大交朋友工作，各级统战部组织需要加强，经费需要增多，对这种交朋友工作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格责备。

(七)这一工作是长期苦干工作，不要因为一时或一地不能获得预期的成绩，便感觉失望，而应继续不断地坚决进行交朋友工作，以达到大多数友军同情我党的目的。

中共晋察冀边委目前施政纲领

（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十日公布）

为巩固与发展晋察冀边区，坚持敌后抗战，为根据本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纲领与边区实际情形，提出目前施政纲领，愿与边区各党各派各界各族同胞共同实行之。

（一）亲密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坚决保卫与发展边区，肃清一切破坏团结抗战破坏边区的特务奸细托匪妥协投降派。

（二）摧毁敌伪政权，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三）扩大边区人民子弟兵，充分保障其给养，和经常的人员。瓦解敌伪军，争取伪军反正，优待敌军俘虏。

（四）实行全民武装自卫，广泛武装人民，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并逐渐实现义务兵役制。

（五）彻底完成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在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争取并保证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边区一切人民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

（六）一切抗日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及居住自由，非依政府法令及法定手续，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均不得给人以逮捕、禁闭、游街、及任何侮辱人格、名誉之行为，以保障人权。

（七）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财产所有权，人民除每年缴纳一次统一累进税，及对外贸易时之出入口税外，任何机关团体不得另以任何名目勒索或罚款；在减租减息后，佃户须依约纳租，债户须依约偿付利息，一切契约之缔结，均须双方自愿，契约期满，任何一方均有依法解约之权。

（八）实行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税（以粮租钱三种形式缴纳），整理出口税或征田赋，废除其他一切捐税，非经边区参议会通过，政府不得增加任何捐税。整理财政，建立严格经济制度，肃清贪污浪费。

（九）肃清境内敌寇伪币，巩固边币，维护法币，平衡边币，派通健全边区银行机构，活跃边区金融，严格统制外汇。

（十）发展农业，积极垦荒，防止新荒，扩大耕地面积，保护并繁殖耕畜，改良种子、肥料、农具等农业生产技术，有计划的开井、开渠、修堤、改良土壤，发展军事工业，及公营矿业、制造业，和手工业，奖励合作社与私人工业，争取工业之自给自足，杜绝日货，发展森林、牧畜业、及家庭副业，发展商业，保证境内正当贸易之自由，严格管理对外贸易，禁止必需品出境，及非必需品入境，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调节粮食和物价。

（十一）设立专门机关，切实救灾治水，并发挥高尚的民族友爱的互助精神，以县区或村为单位，建立大众互助的储蓄互助救济组织，提倡清洁运动，改良公共卫生，预防疾病灾害。

（十二）普遍实行二五减租，保证地租不得超过总额千分之375，利息不得超过一分，如因借贷期满无力偿还而押出之土地，应依法清理，抗战义务之负担与组织，应力求合理化。

（十三）减少工作时间，实行工业部门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人实际工资，实行半价物工资制，改良运动条件和工人待遇，提高工人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安置失业工人，雇主不得违约解雇，女工生产前后例假五星期，工资照发，禁止使用青工、女工、童工从事妨害身体健康之劳动，并保障同工同酬。

（十四）保障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及家庭地位之平等，妇女依法有财产继承权，男女婚姻自主，反对买卖婚姻与一夫多妻制，反对蓄童养媳，溺婴儿，危害青年发育的早婚恶习，严防沦陷区敌伪淫乱恶风侵入边区，树立优良的家庭教育，养成儿童的优良的生活习惯，实行孕妇儿童保健。

（十五）减轻敌寇蹂躏区域同胞之负担，力求保护其生命财产及政治权利，反对敌寇绑架、奸淫、勒索、强抽壮丁，与奴化教育，抚恤被敌寇惨杀同胞的家属，凡因被迫一时错误触犯汉奸治罪条例之分子，准其自新，对死心塌地的汉奸严予惩办。

（十六）认真优待抗属，抚恤抗日烈士遗孤，及伤员残废。

（十七）严厉镇压汪派托派汉奸，对罪大恶极的大汉奸之土地财产，专署以上各级政府应依当地群众之要求，即依法没收之，对反共派顽固派、伪军官兵之财产，不得宣布没收，全家逃亡敌区的汉奸嫌疑犯之土地财产由政府暂管，待其重回边区抗日时发还之，所有上述之被没收及暂管之土地，应由政府低价出租与农民，或分给被日寇摧残之农民，或充作优待抗属田地。对汉奸审判，须依确实证据，其未参与汉奸活动之家属，不得株连，该家属财产仍须依法保障，汉奸犯不服初审判决时，得上诉至边区最高审讯机关。

（十八）在提高国民文化水准及民族觉悟的目标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建立并健全学校教育，至少每行政村设一小学，每行政区设一完全小学或高小，每专区设一中学，高小及中学应收容半工半读生，建立并改进大学及专门教育，加强自然科学教育，优待科学家及专门学者，开展民众识字运动和文化娱乐工作，定期逐步扫除文盲。

（十九）保护知识青年，救济沦陷区流亡学生，分配一切抗日知识分子以适当工作，提高小学教员的质量，改良小学教员的生活。

（二十）边区各民族应相互尊重，生活风俗及宗教习惯，在平等基础上亲密团结抗战，在民主选举中，应予回蒙满藏同胞以优待，对其贫苦无以为生者，特予救济。

（原载《新中华报》1940年9月29日）

中央社会部关于锄奸政策与锄奸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

关于锄奸工作，中央已有原则指示，本部根据这些指示与我党锄奸工作现状，认为对于锄奸政策与锄奸工作有使之明确化与具体化之必要。

（一）要加强保卫工作，须有正确的锄奸政策；要巩固党的组织，必须彻底的肃清内奸。因此，一方面要反对对敌人内奸政策的麻木不仁现象，又一方面要反对乱捉乱杀乱打乱罚的左倾现象。

（二）为了正确的进行锄奸工作，以加强反奸细斗争，首先要坚持下列的锄奸政策：

1． 必须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认清日寇是主要敌人，反对锄奸工作的一般化。因此不可笼统的把日探与国特混为一谈，也不可把国特普通情报人员与特务破坏分子混为一谈，不应把顽固分子都当作汉奸敌探，不应将一切国民党员绅士都当做特务人员，更不应将中间派当做顽固分子。应当经常记得党的策略方针是："联合多数""打击少数"。

2． 必须根据党的民主政治方针。真正的提高革命警惕性，反对锄奸工作的扩大化。因此要反对无证据无法律的乱捕乱杀，反对严刑逼供，虐待犯人。要以革命的法治精神，客观的慎重态度，依靠侦察，根据证据，废止刑讯，依靠政治。应经常记好这个原则："不放过一个敌探，不错办一个好人"。

3． 必须根据党的六中全会的锄奸方针。采用灵活的策略去反对敌人，反对锄奸工作的简单化。因此对敌人应各个击破，分别处理，打击主力，争取胁从。对主要干探严加处置，对胁从小卒准其自新，争取动摇分子潜伏敌内，感化无知乡愚，减少敌人。应经常记得这个原则："不放过一个敌人，不制造一个敌人"。

4． 必须根据党巩固组织的方针。反对对敌人内奸政策无警觉性，应将肃清内奸视为全党的战斗任务与巩固组织的重要尺度。因此必须认清目前日寇国特正以内奸政策为中心工作，国民党中央统计调查局对我党我军的领导机关正进行着内线突击，因此党的锄奸工作，须以"厉行肃清内奸"为主要任务。同时在反奸细斗争中，要防止造成党内恐慌，不相信党的与非党的干部。应经常记得这个原则："不放过一个内奸，不冤枉一个同志"。

（三）执行上面的各项政策时，必须广泛的进行反奸细斗争的教育，进行各种具体工作，建立各种正规制度，培养大批"德才兼备""奉公守法"的忠实干部。没有这些具体工作，正确的锄奸政策便不能实施。

（四）关于具体工作另有指示。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一月）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仍然未改。在新四军之其他部分，则在胡服、陈毅诸同志领导下，或则执行了正确的转变，例如皖东与苏南，或则自始即未受项、袁错误领导的影响，例如鄂中与淮北。在这些地方的新四军，适与项、袁直接领导之皖南部分(约占老部队三分之一，在全军则占九分之一)成为相反之对照。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复灭。该部于一月五日开至茂林，在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之反共军七万人合围后，仓促应战，除项英、袁国平等数人仍然表示可耻的怯懦动摇外，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七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当项英、袁国平一贯执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时，新四军军委分会委员与东南局委员中即有不满或反对项、袁错误的同志。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当胡服同志在皖东，陈毅同志在苏南，传达中央指示，执行工作转变时，当地同志全体对于项英错误的坚决反对与对于中央路线的热烈拥护，就是明显的证据。为了今后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胜利地进行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央对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特有如下之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

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复辙。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虽然在现时我们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还待他今后事实的证明，如果项英没有在战斗中牺牲与没有冲出包围而是被反共军俘虏，我们还希望他们在被俘后能够表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应该指出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而对于已经犯了严重错误又不服从中央或上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及时预防，加以调动与处置，这亦是从项、袁失败应该引出教训的。

（二）当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蒋介石与国民党实行坚决的反共政策之时，我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袁为戒，于坚持抗日立场之下，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方能粉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与胜利的进行抗日战争。

（三）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总政治部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〇年五月六日）

我们根据中央五月四日对新四军的指示，看了新四军政治部的少数比较旧的材料之后，对新四军政治工作有以下意见：

（一）我军的政治工作，是根据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因此，军队中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迁就国民党，迁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办法，都是有害的。

（二）在鼓动宣传教育工作中，我们应当依照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与目前策略路线出发，必须把阶级教育与民族解放教育正确的适当的联系起来。在目前特别着重说明投降妥协的危险，以及反对这种危险的斗争的必要，说明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两重性与动摇妥协性。不应把国民党首领的演说宣言编成讲话材料，这种方法是不妥当的。

（三）在组织方面，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基本上现在仍旧适用。你们起草的政治工作条例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办法，都应该坚决拒绝之。对战区政治部的反动命令，绝对不应服从，因为国民党的政治工作，完全是反共的特务工作。

（四）在居民中的工作，亦应当根据党的政策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央指示已提及，兹不赘述。

（五）总之，政治工作是共产党党的工作，我们应公开说明我军的政治工作这种特殊性，对抗战是有利的、必需的。我们不能向落后的看齐，而应当是落后的向进步的看齐。八路军、新四军中之有共产党与其工作，正如其他军队中之有国民党及其工作一样，所以我们政治工作的原则、内容、口号与方法都是光明正大的，有理由的。因此，我们政治工作不应当有对外对内两套，不能对外迁就国民党，对内说共产党私话。我们的立场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以上请讨论，并电复结果。

〔附〕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

命　　令

依据二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周副部长指示，制定本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公布

之。其一至六章即仰遵照执行。第七章在未公布前，仍照以前规定进行。在执行中望随时收集新的经验，提供来部，以便将来重加修正，使成为益臻完善之定章。此令。

政治委员 项　英
军政治部主任 袁国平
副主任 邓子恢

第一章　总　　则

一、政治工作为现代革命军队建军作战之必备要素。其目的，在培养将士笃信主义，忠实革命，使军队与人民结合，并成为人民之军队，从政治上树立军队革命化、民众化之坚固基础；为坚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争取革命胜利，完成革命任务，实现革命之最后理想而坚持奋斗到底。故政治工作，应视为革命军队之灵魂与生命线。

二、今日本军队之政治工作，应遵照　蒋委员长告国民书中训示：“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必经之途径，中国欲外求独立，内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缚，完成新国家之建设，终不能不经此艰难奋斗之役。故对于抗战乃三民主义与强权暴力帝国主义之战争，亦即被侵略民族反对侵略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以及“中国自抗战之日起，即为民族解放而战，同时即为国际和平正义而战。”着重教育全军了解中国民族革命之伟大历史任务及当前抗日民族战争之性质、意义与前途；并使了解中国革命之国际意义及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一致性。使全军将士深切认识与谁作战，为何作战，以发扬民族意识，坚定革命信念，提高对日作战敌忾同仇与必胜之心理。

三、政治工作方针，应遵循中央政府团结救国之既定国策，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主张，拥护　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实行三民主义，实施抗战建国纲领。为巩固统一，增强国力，驱逐日寇，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四、政治工作，应从政治上保证继承与发扬自己民族之一切优良传统，特别是自己军队固有的优良传统，以提高革命自信心、自尊心与觉悟性。因此在政治工作中，应注意发扬中国历史中之民族革命的传统精神，并着重发扬大革命黄埔建军北伐时代之革命精神，及本军十余年来一贯为中国革命之坚决奋斗精神及其一切优良传统。并应从此传统教训中，使将士认识自己军队之过去光荣历史、现在伟大任务与将来光明前途。

五、政党为革命参谋部，故革命军队应接受一定政党之领导，以坚定革命军队之政治方向。政治工作应依据党的政治路线，忠实执行；并加强党的组织，发扬党员在建军与作战中之优良传统，特别是坚苦卓绝，英勇奋斗之模范作用，造成革命军队中之强固领导核心。故党的工作，应使之成为政治工作之基础。

六、军队政治工作之对象，为部队、居民与敌伪军。依据军委会政治部指示与决定，对部队应以保证上级命令之执行，巩固部队长官之威信，提高士气，巩固纪律，实施政治文化教育，监督部队经理人事卫生为主要内容。对居民工作，应遵照　蒋委员长“民众重于军队”训示之精神，动员组训武装民众，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粉碎日寇一切政治进攻阴谋；其中心应注意前方重参战兵役，后方重兵役生产，敌后重自卫参战并负责恢复、保护与帮助地方政府实施事权。对敌伪军工作，应遵照　蒋委员长训示“宣传重于作战”之精神，努力推行，并应以清除汉奸，毁灭伪组织，瓦解伪军，动摇敌军为目的；其中心应注意对日本官兵，重

在动摇其信心，达到反战目的。对中国伪军，在瓦解并争取其反正。对高丽台湾官兵，重在引起其同情中国，反抗日寇。

政治工作之组织与实施，应使之适应工作任务之需要。

七、确立与强固革命军队之政治工作制度，为实施政治工作之必需前提。为此，应发扬光大　蒋委员长训示“政治重于军事”之精神，保持与发扬本军政治工作制度之优良传统。其主要特点为：(一)教育全体将士，尊重政治机关，接受政治领导，拥护与参加政治工作；(二)实施政治委员制度；(三)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之各级政治机关，确立自上而下的政治指导系统；(四)政治工作深入连队并透彻于各个部门之中；(五)密切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协同配合，保证军政工作之完全一致。

八、在当前战争时期，政治工作之一切努力，应以争取与扩大战争胜利为最中心的任务。为此目的，故政治工作之组织与实施，应针对战争形势，配合军事决心，估计部队特点，适合战斗情况，紧张、机动、敏捷而又准确遂行之。并须发挥政治工作在抗战建军中之双重任务，使一方面适合今日本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之作战任务，另一方面又能顺利完成正规建军，提高游击战到正规战，以至准备最后反攻胜敌之战略要求。

为适应持久战之局势与针对现代战争之要求，在后方勤务部门中，应有健全之政治组织与工作，以保证通讯联络之顺畅，前输后送事宜之敏捷，卫生救护工作之健全，以及供给补充之便利。在深入敌后远殖挺进之作战条件下，政治工作应配合军事，努力争取创立新的后方而努力；并使政治工作之组织与方式亦适合此要求。

九、政治工作人员本身模范作用之提高，为健全政治工作，提高政工威信，发挥政工效能之最基本条件。　蒋委员长曾训示政工人员应有如下品德修养，即：(一)廉洁，(二)牺牲，(三)勤劳，(四)笃实，(五)谦和及诚挚，(六)言行一致。凡此均本军政治人员应有之优良传统，应努力发扬光大。(廉洁，即不贪污，不舞弊，克苦俭约与士兵同甘苦。牺牲，即不怕死，不动摇，冒险犯难，见危授命，临难不苟免，誓死不屈服。勤劳，即不怕苦，不怕难，刻苦耐劳，积极负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笃实，即笃信主义，坚持操守，不虚伪，不轻浮，实事求是，深入群众，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谦和诚挚，即不自大，不骄傲，学习虚心，态度和蔼，举止谦逊，真诚坦白。言行一致，即以身作则，讲得到做得到，反对口是心非，只会讲不会做，实行行动重于宣传，服务即宣传，责己先于责人的口号)。

政治工作人员之培养、遴选与提拔，应以此为准则，务求选贤任能，宁缺勿滥。

第二章　政　治　委　员

(一)为确立军队中之政治领导，保证政府政策法令与党的政治路线在军队中之彻底执行，在团及团以上之部队，设立政治委员。

(二)政治委员为领导政党在军队中之代表，由上级派遣最有政治觉悟，坚决勇敢并有军事政治经验之党员充任之。在政治上对上级直接负责。

(三)政治委员在军队中之主要职责，在从政治上负责领导军队，忠实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忠实奉行政府法令，忠实遵照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忠实服从最高统帅之指挥，并彻底执行上级一切命令，坚决为抗战建国伟业而奋斗。(下略)

(凡“蒋”字上均空一格，系照原文形式——编者注)

关于中央对新四军策略指示项英复中央电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二日）

中央政治局九日电*今日收到，下午即召开东南、军分常委联席会讨论，曾、袁等对中央指示之方针与路线以及各种策略均完全同意，并无异议。对于我提出在中央未决定前由曾、袁代理书记，以保证中央指示之彻底明确实施，历久未决，认为须要中央决定。

对中央指示决定，现由袁负责传达，不日召集上中级干部开会讨论，江南由陈负责；因此对于我之请求，请中央立即决定电复。目前斗争局势仍紧张，变化甚快，请速派人或指定人负责，以应付大局，而利斗争进行。现对我之请求，再申明几点如下：

（一）中央指示及总政指示内，观其形式与精神实质，显然是我之领导已有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虽然上面未经公开正式指出，其内容与决定的严肃性，表现显然如此。我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为党的利益，应公开宣布撤职，以便利更能团结全军，坚决执行中央指示。

（二）中央指示一半系告同志书的性质，并且注明经中政局通过，已说明其性质之郑重性严肃性，非普通指示与普通文件可比，为尊重与服从，应改变领导。

（三）中央指示并未明显指出根据何种事实，但指示全部精神，系带有对错误的批评与指示形式，实非一般对工作指示，而是整个路线与策略问题。照此指示，我领导有严重错误，不可再忝负责。

*指1940年5月4日中央关于在抗日战争及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

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叶项复何应钦白崇禧佳电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

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叶参谋长剑英即转何参谋总长敬之白副参谋总长健生两公钧鉴：两公皓（10月19日）电，经叶参谋长转到奉悉。当以事关重大，处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时，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起见，经德等往复电商，获得一致意见，兹特呈复，敬祈鉴察，并祈转呈统帅核示祗遵。

（甲）关于行动者。职军所有部队，莫不以遵循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四年以来，抗御众多之敌军，收复广大之失地，所有战绩，为国人所共见，亦为委座历次明令所嘉奖。即如此次华北百团大战，自八月号日开始以来，已历两月有半，现方进入第二阶段。曾奉委座明令，勖勉备至，全军感奋。又如皖东皖南战役，粉碎敌之进攻，亦属最近期间之事。凡此所陈，非敢自矜劳绩，实欲以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实贯彻于全军之上下，而未敢有丝毫之乖离也。其中一部分，曾与他军之一部分发生龃龉事件，如尊电所指者，言之至堪痛心。其发生之原因与消除之方策，德等早经迭次陈明在案。最近苏北事件，德等已有马电详陈委座。鲁南事件，亦有复杂原因，深堪注意。除令该地部队服从钧令，约束行动外，拟请中央选派公正大员，予以彻查，如属咎在职军，德等决不袒庇，愿受国家法律之处罚。如属咎在他方，亦祈按情处理，以明责任。古人有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事理之正，贵得其平。况在艰苦异常之敌后抗战，多一分磨擦，即多一分困难，自非不顾大局专以磨擦为能事之人，未有不愿消弭纷争，团结对敌者。故德等主张彻底查明其是非曲直，期于永杜纠纷，以利抗战。倘承俯允，乞赐施行。

（乙）关于防地者。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缘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委座庐山谈话及告沦陷区同胞书中所示，彼等又正衷心遵循，毫无违异。忽令离乡别井，驱迫上道，其事甚惨。自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发生后，新四军后方各处，如赣南、闽西、湘赣边区、鄂东、皖西、豫南等地，其家属及留守人员，横被摧残，毫无保障。今又欲华中各部北移，彼等甚惧覆辙相寻，故无不谈虎色变。又况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树叶为粮，道馑相望，该地军民已甚感维持之困难，有请南移者，有请他调者，德等方勉为抑止，告以苦撑，实亦甚难容纳其他之部队。以此种种，故请恩来转陈中央，请予允许大江南北各部，仍就原地抗战。一俟驱敌出国，抗战胜利，自当移动，以就集中之防地。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遵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

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德等对于此事，深用腐心。欲顾全地方，则恐违中央之命令，欲服从命令，则恐失当地之人心。而抗战胜利，全赖人心之归属，两公高瞻远瞩，必不河汉斯言。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此则德等肺腑之言，深意为两公一吐者。两公虚怀若谷，全局在胸，必能维持调护，挽此艰难之时局，固不待德等多言也。

(丙)关于编制者。职军孤悬敌后，欲求杀敌致果，达成统帅所付之战略任务，不得不遵循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所示原则，唤起民众，组织游击部队，因而超过原来编制，此任务与组织之联带关系，实亦有所不得不然。然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故不得不要求民众协助。因而于敌后凡有敌寇而无友军之处，于驱除敌寇之后，建立抗日政权，创造抗日根据地，以民众之衣粮，给民众之武力，御凶残之敌寇，卫自己之家乡，诚有未可厚非者。虽衣单食薄，艰难奋战，历尽人间之辛苦，然不为法律所承认，不为后方所援助，则精神痛苦，无以复加，故有请中央允予扩大编制之举。中央亦为顾全事实起见，允予酌为扩编，如提示案内所示，职军闻之，实深庆幸。兹所求者，则请早日实行，并请对编制额数，酌予增加，以慰前线将士之心，亦为国家培养一支可靠之抗战力量。非第楚弓楚得，无庸怀轩轾之心，实亦卫国卫家，正赖此干城之选。

(丁)关于补给者。敌后艰苦，具如上述，而子弹与医药用品等件，尤为缺乏。职军已十四个月未蒙发给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则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其自然。虽明知中央亦处艰难境地，然职军之特殊困苦，不得不上达聪听，以求于艰难之中，获涓埃之助。其他补给各项，均曾列款上陈，敬求一并核示。

(戊)关于边区者。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一案，悬而未决者四年于兹。近且沿边区之周围，驻屯大军二十余万，发动民夫，修筑五道之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绵亘数省，规模宏大，耗巨额之经费，筑万里之长城。而于远道北来之青年学生及职军往来人员，或被扣留暗杀，或被监禁于集中营。以此道路惊疑，纷纷揣测，不曰大举进攻，即曰准备妥协。德等闻之刺耳，辩之焦唇。良以悬案未决，又加封锁，空穴来风，猜疑易启，亦无怪其然也。合应恳请中央，对于悬案则予以解决，对于封锁则予以制止，释军民之疑虑，固合作之根基，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耳。

(己)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者。德等认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盖帝国主义战争扩大持久之形势已成，日寇正忙于应付太平洋严重局面，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不为中途之妥协，不召分裂之惨祸，则我中华民族必能在我最高领袖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惟德等鉴于近月以来，国际国内之各种阴谋活动，诚有不能已于言者。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所祈求者，惟在国内团结，不召分裂，继续抗战，不变国策。故于钧座所示各节，勉力遵行，而对部属弱

点，则加紧克服。亦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复望改良政治，肃清贪污，调整民生，实行主义，俾抗战重心置于自力更生基础之上。此皆国家民族之成败所关，万世子孙之生命所系，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转呈委座，采择施行，无任屏营待命之至。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同叩佳(11月9日)

（原载《新中华报》1940年11月17日）

〔附〕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的皓代电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

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叶参谋长剑英即转朱总司令玉阶彭副总司令德怀叶军长希夷均鉴，民族之存亡，基于抗战之成败，抗战之成功基于军纪之严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在抗战之初期，均能恪遵命令，团结精诚，用克御侮宣传，不乏勋绩，孰意寇氛未靖，龃龉丛生，纠纷之事渐闻，摩擦之端时起，张荫梧之民军横遭解决，鹿钟麟之省政复被摧残，晋叛军之逋逃，石友三之被逐，不特自由行动，抑且冰炭相消，削减抗敌力量，中央以宽大为怀，事全终始，以济艰危，乃命应钦崇禧与周副主任委员恩来叶参谋长剑英谈商办法，几经研讨，询谋佥同，乃于本年七月十六日，综合商谈结果，提出极宽大之具体方案，呈奉核定，交周副主任委员于七月二十四日飞陕，与玉阶德怀诸兄切商遵办，并于七月二十八日，由应钦电令各部，饬与十八集团军新四军避免冲突，但周副主任委员返渝后，对于商定之案，迄无确切遵办表示，又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致中央处理更感困难，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八月十一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十四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据于总司令歌电复称，查徐向前部于十四日攻占鲁村，本部一再电徐制止撤出鲁村，徐当即复电愿遵令办理，但并未实行，迨新北一带之敌进犯鲁村，徐部乃于十八日不战而退，该地遂于十八日晨被敌占领，二十二日敌退，徐部复入鲁村，至二十三日始撤去等语。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尉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所属陈泰远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垻等地，又陷太兴黄桥及泰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交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虏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它

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十八集团军彭明治部，复自十月六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方案则延宕不遵，而及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使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饷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谕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它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它各问题之命令，至周副主任委员恩来所提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其第一第三两种，决难照办，其第二种应俟开到规定地境后再行酌办，特并附达，盼复。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皓秘印。

〔附〕何应钦白崇禧复朱、彭、叶、项齐代电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

特急，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叶参谋长剑英，即转朱总司令玉阶，彭副总司令德怀，叶军长希夷，项副军长英，均鉴，密，佳电诵悉，已转呈委座，另由命令由刘次长嘱叶参谋长传达饬遵，惟应钦崇禧深觉兄等来电所呈各节，大都以对外宣传之词令，作延缓奉行之口实，似此呈复命令，未免太乏真诚，夫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必须有彻底统一之军令，使各部队分工合作，共同一致，而后防战攻守，乃能悉中机宜，必须有严格整齐之军政，使各部队质量配备，皆遵规定，而后抗战御侮，乃能集中有效，同时地方行政系统，不宜擅加割裂，袍泽同心杀敌，不容阴谋兼并，是皆克敌致果不易之原则，亦即全国各军所应必守之纪律。兄等身为军人；自必深明此义，今披阅来电，按之事实，则兄等对统帅命令，仍以推委延宕为得计，迄无确切遵从之表示，而凡所指呈，更以避实就虚为掩护，绝无平心静气之反省。此实应钦崇禧之所大惑，且对兄等不胜其痛惜，而愿见竭精诚以相告言者也。

来电不云乎，该军所有部队，莫不以遵照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倘事实洵如所言，是乃统帅之所殷切期勉，举国之所共同仰望，然而兄等部队之实际行动，果何如者："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之始，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之作战目标与作战境地，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围；迄未终始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始则自由侵入冀察，继者自由分兵鲁省，终者阴移新四军渡江而北，明派犹鲁部队伺隙而南，桴鼓相应，夹攻苏北，似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

何命令。"而且所到之处，凡属友军，莫不视同仇敌，遍施袭击，苟非意存兼并，宁至一无例外，此种任意相残之战争，又系遵何命令！其尤可痛者：各该省区原有各军受命抗敌，对于兄弟部队之突来攻袭，事前既略无猜疑防范之心，临时复力避冲突为志，因之常受不意之夹击，竟由忍让而被创，及至事后，又须恪遵中央严禁阋墙之旨，未敢稍存报复之心，只有纷向中央呼号哀诉，佥谓苦斗前方，不败于当面凶悍之敌寇，而将亡于并肩作战之袍泽，应钦崇禧，每览前方此类报告，既不胜一一上闻，复无词可以相慰，往往揽电踟蹰，咨嗟累日。而兄等部队侵袭之计已售，割据之势坐成，来电所谓龃龉事件，所谓摩擦纠纷，胥属由此而生，祸端谁启，责有攸归，通国皆已共见，盖无论苏北或鲁南各区域，实与新四军及十八集团军所指定作战之地区，固风牛马不相及也。如果贵军能服从命令，不作此规外行动，则摩擦何由而起，纠纷更无由而生！此固不待智者而明矣。

且自兄等自由行动以来，统帅迭有命令制止，讵料兄等部队于提示案送到后三个月内，反愈变本加厉，相继大举攻击鲁苏，统帅又严令制止，然兄等遵令撤出鲁村之报告甫来，而苏北喋血之巨变踵起：默察兄等部队之所为，不惟不体念中央委曲求全之苦心，且更利用中央一再优容爱护之原意，冀逐渐扩充而一气贯通晋冀鲁苏，完成其外线长蛇之势，又无与大敌纠缠之劳。

驯至师行所至，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逐忘寇患之亟。我之所痛，即为敌之所利。河北方面，自鹿朱高孙等部因兄等横施攻袭，奉令调开以后，我军实力遽形薄弱，敌逐得舒其喘息，布置军事，发展交通，故一面兄等部队力庆握手苏北，既正渲染宣传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六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障碍，竟得迅速完成者，亦于十一月十五日大事铺张，举行开车典礼此则兄等排除友军自残手足养寇资敌所谓团结抗战中实际行为之表现也。

至对于政治方面，在兄等部队所到之处，凡县以下之基础机构，则假借民意以摧毁之，凡主管全省政务之省政府，则罪以摩擦口号，滥用暴力以破坏之。上自地方军政当局，下至县乡工作人员该军欲加排除，则一律诬以投降妥协之恶名，驱迫残戮，极人间之至惨，在晋冀各地如是，在鲁苏战区亦复如是。闻者惊心，见者错愕。而身受迫害之军民，局关幸免，怨愤相訾，至谓该军在晋冀鲁苏之所为，迹其手段，几与敌人到处残戮我同胞与制造傀儡维持会之方式，如出一辙，揆其居心，则凡敌后各地，非属该军设置之政治组织与民众力量，必须一网打尽，惟虎有伥，为敌前驱。此言虽激，亦既为道路所彰闻。而兄等乃称为"驱除倭寇之后，建立抗日政权"，其实凡在中央命令系统下设置之地方组织，何一非抗日政权。该军特为标揭，显存彼此之心，别抱扬抑之见。况若干敌后地方，原无敌人盘踞，该军开至其地，放弃原来任务，已违作战本旨，即该地系为该军所收复，如果服从命令，亦应将其行政组织交由中央设置之省政机关负责建立，不容别立系统，辄自把持，否则全国各战区作战部队，设均效法兄部所为，到处自由建立政权，则中央对于各省之行政组织，岂不根本解体，再无维持余地。不惟此疆彼界，形成封建割据之局，而当前领导全国民众艰苦抗战之大业，岂非纲纽尽解，再无提挈可能。此则兄等部队在抗战之中破坏政治军事之实情也。

抑兄等来电所称之防地，竟并指华中敌后该军所到地区而言，似谓该军由攻袭友军破坏行政系统而自由开入之各地方，均应为该军所据有，亦且有移动之困难，非中央所得而区处，否则且影响人心。夫部队作战地境及任务，皆由统帅部命令所指定决无固定而不能遵命移动之防地，如非别具作用，则任何部队，皆应奉令开调。更无失去地方人心之理由。须知冀察

鲁苏豫鄂皖等战区内，中央均于敌军后方配置正规军及大量游击队，其于地方团队及民众武力，则规定由地方政府统率，在军事统一指挥之下，一致抗战。实施以来，军政双方，极为协调，民众配合，亦极融洽，战绩昭著，实力增强，若无兄等自由行动之部队，擅自侵袭其间，不使各友军受腹背受击之忧，民枪被收交之害，民粮被征完之苦，损伤军民作战力量，逼其自相抵消，则我在敌后方战绩，庸讵止此！

至兄等谓“华中敌后，多属地方人民为抵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虏掠之惨于不顾，转赴华北，其事甚难”云云将谓此项部队为正规军耶？则正规军队岂有不能遵令调动之理，信如所云，则凡籍隶战区各省，如冀鲁豫苏湘粤桂等省之部队，均将不能调赴其它战场作战，有是理乎！将谓此为地方团队及民众游击武力耶？则中央早有明令概归地方政府负责统率管理，非兄等职权之所应过问，更不能谓与兄等所部发生关系，遂应将其人数武器全部纳入兄等部队编制之内反使各地民众倍增胁从之痛也。因此又证明兄等来电所谓编制方面因任务与组织之联带关系因而超过原来编制现在有五十万人之说者，果指此而言乎！夫统帅部对于各军任务分配，均视其军队之素质，与敌寇之情状，而规定作战地区与作战任务。第十八集团军原在晋北作战，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物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任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而且对外宣称中央未按该军兵额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兹兄等所称人数，若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兵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员！若本无此数，而漫为虚报，则法定编制尚应剔除缺旷，更无不经点验而滥发之理，苟有其一，皆悖抗战建国统一军政之原则。

至于补给方面，该军年来所领子弹药品，中央均按照该军法定编制及作战消耗状况充分发给，与其它国军一律待遇，毫无差别，乃兄等来电，竟谓“十四个月来未发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倘果如所言，则此十四个月来，该军在河北连续攻击鹿钟麟朱怀冰高树勋孙良诚各部，在山东连续攻击沈鸿烈等部，在苏北连续攻击韩德勤等部，以及其它各地攻击友军之一切行为，其弹药从何而来！而且最近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等多数师旅团长，皆被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不意袭击，南北夹攻，以殉职矣，国人方谓中央以抗敌之饷胥弹药，资为该军攻击友军蹂躏地方之资，多加责难，而来电抹煞事实，尚以久未补给为言，其将何以自解！

再如来电语及边区问题，称：“边区二十三县一案，悬而未决四年于兹”。又称“群相惊疑，纷纷揣测”及“悬案未决又加封锁”云云，查所谓边区，纯系兄等自由破坏地方行政系统之不法组织，中央迭经派人与兄等商洽，蕲求正当解决，而每度商洽结果，均以兄等坚持特殊组织，不容中央一切政令实施于该区，体制规章，必欲独为风气，更复对地域范围争持固执，以致迄无成议，此何得视为悬案！且中央虽不认所谓边区之法律地位，固始终为抗战大局而曲予优容，初未尝因该军之侵凌压迫，而有一兵一卒相还击，而兄等部队，则已驰突数省，军政大员之被残害者，已不可数计，以视兄等动辙夸大宣传之平江事件，确山事件，重轻之去，何啻天渊！何况平江确山等处，皆非兄等防地，无论中央与地方，亦未有明令之

许可，贵部更无任意擅留之理由，而且当此敌探汉奸潜伏各地，甚至冒充各军名义肆意扰乱为害后方之时，若不严格取缔，谁能认其真伪，辨其邪正，各地政府，职责所在，自不能不依法处理。如果贵部能严守法纪，不越规擅留，则此等平江确山事件，即无从发生。乃兄等不自反省，竟以此为口实，颠倒是非，信口雌黄，此岂团结一致精诚抗战之所为乎，今中央提示案，对于边区，已示宽大解决之道，若仍有意违延，不肯接受，专图散布蜚语，中伤中央，冀达扩张割据地盘之私欲，则视听昭彰，是非具在，岂能尽掩国人之耳目！

此外，来电中最足令人骇诧之点，即谓“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反共高潮，肃清投降道路，内外相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又称“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等语。查中央执行抗战国策，一贯不变，迩来敌伪势蹙力穷，我抗战方针之正确明显，抗战决策之坚强有效，不唯全国妇孺所共知，即友邦人士与国际舆论，亦皆一致称颂，曾不意兄等乃竟不察事实，而尚有请中央明示方针之要求！至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恐只有汉奸伪组织发此呓语，即敌寇亦已不敢再存此妄想，而兄等反为此言，诚可异为敌伪张目！更不知兄等曾否计及此言之将摇惑人心，而贻抗战以极不利之影响！抑兄等迭次对于各地友军之攻袭，均先被以妥协投降之名，今观来电所称，诚又未明意向之何在。

溯自抗战开始之时，中央以精诚团结一致御侮相倡导，兄等以取消原来特殊军政组织实行三民主义归属于中央统一指挥之下，矢诚矢信，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用能使举世刮目，敌寇丧胆，以奠抗战胜利之始基。诚使兄等率循初志，服从命令，遵重法纪，督率所部，恪守军人本分，发挥军人天职，始终一贯，为国效命，事之可幸，孰逾于斯，不谓抗战方及中途，而兄等部队渐有背离国策玩忽军令之行动，兄等不加戒饬，致使迷途日远，举措益非，诚不能不引为痛惜，检讨最近一年以来兄等部队之行动，弃置当面之寇敌，惟务地盘之扩充，遵照国策之谓何！逾越指定之战区，阻挠军令之执行，服从命令之谓何！日寻攻残之纷争，抵消作战之效力，坚持抗战之谓何！然而中央为顾全抗战之大局，统帅为爱护抗战之实力，对于兄等部队种种违令干纪之行动，不惟迄今大度包容，未加罪谴，而且始终顾全，期以精诚相感。始则改划作战地区，屡将被兄等攻击之国军设法他调，以避免摩擦，最后且不惜将抗战有功之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与该战区抗战有功之国军各部，均予调开，而如提示案中所示，准予玉阶兄指挥冀察区内军事指挥之大权。俾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全数集中该区域内，得有广大之作战地域，尽量发抗战之功用，并免与友军杂处，根本消除所谓摩擦之因素，借使全国各军，同仇敌忾，无所牵制，得以各对当面之敌专心作战。中央之所以维护兄等所部，委曲求全，盖已无微不至矣。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厚集兵力，扫荡冀察残敌，完成抗战使命。全国军民同胞所蕲求于兄部等，惟此而已矣。

总之，提示案中对于兄等希望之一切问题，均已剀切规定，平停至当，应钦崇禧十月皓电，复本革命大义，开诚规劝，此次委座续发命令，又更逾格体谅，宽展限期，务盼兄等恪切遵照，依限实施。应钦崇禧所以不惮再三申告，纯为贯彻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确认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始能策励全国军民，共趋一鹄。亦惟有举兄等部队听从军令调动，忠实执行任务，始能有裨于抗战。中央对兄等所部，自必爱护扶持之有加。若仍放弃责任专以扩地凌人为目的，任令智辩如何动听！而前方袍泽鉴于晋冀苏鲁之前军，势必人人自危，中央亦难终遏其悲愤，所愿兄等推察本源，抚躬循省，屏绝虚矫，凛念时艰，勿为敌

伪所称快，勿为同胞所痛心，深惟复巢完卵之戒，切悟焚箕煮豆之非，同仇御侮，必出以真诚，善始全终，宜持以贞信，本急公忘私之义，求追来谏往之功。时机不容再误，遵令乃见公忠，一枪一弹，皆为杀敌而施，同德同心，永绝萧墙之隙，现在举国军民，皆对抗战抱有必胜信念，而所鳃鳃引为忧虑者，厥为兄等部队之纵横争夺，以损及军事之效能，倘得由兄等之翻然悔悟，放弃规外之行动，负起抗敌之大任，将见寰宇鼓舞、精神愈奋、胜利愈近。来电所谓国家民族成败之所关，万世子孙生存之所系，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尚希兄等熟思而深察之！幸甚幸甚！　　　　　　　　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齐秘。

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

……上略……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泾县以南之茂林地区，突破国军七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至文，血战七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挺等率部遵令北移，并遵守顾长官祝同指定路线向苏南转移北上，不意全是诱我聚歼之计，在战斗中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次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布置周密，全为乘我不备，诱我入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德等远在华北，未悉命令移防底蕴，迄今始知聚歼计划。今不问对敌行动如何，但对我则是聚歼，何白两总长皓电齐电所称之仁义道德何在？所谓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者究属何人？所谓军政军令军纪者究在何处？似此滔天罪行，断不能不问责任。同时全国正准备大批逮捕，大批杀人，与袭击八路军各办事处，在西北则修筑万里长城之封锁线，在华中则派遣二十余师正规军实行大举进攻，国内局面顿改常态。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特电奉达，敬恳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敬恳诸公仗义执言，予以援助。临电悲愤，不尽欲言。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率全军将士同叩元。（1月13日）

（原载《新中华报》1941年1月16日）

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

（一）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主力八千余人于本月四日起，开始遵照党中央向国民党让步的决定服从蒋介石命令，向江北移动，不料国民党当局早有“聚歼”计划，我军行至泾县之茂林即为国民党军队七个师重重包围，激战七昼夜，全部复没。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二）国民党这一表现的原因是：

第一，亲日派何应钦及CC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

第二，顽固派头子及英美派代表，由于英美集团与德意日集团间矛盾之扩大与英美拉拢中国之积极，及日本在中国的进攻行动受到了英美的牵制等原因，他们的气焰大为高涨，认为此乃向我党进攻以巩固其统治的有利时机。皖南事变即是三国同盟以来国民党内亲日派英美派同谋的一连串反共事变的继续发展。

（三）皖南事变及国民党的公开处理，在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公正人士前面，暴露着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暴露着他们的阴险毒辣，没有信义，没有道德，它将使国民党的威信大受损失，同时揭破其关于统一军令政令之宣传的全部虚伪性。因此，皖南事变同时造成了我们在政治上给国民党亲日派英美派向我们的进攻以有力回击的有利条件。新四军是积极抗日的，北移是服从命令的，现在得着的是被消灭，被宣布为叛变与被交军法审判。一切理由都在我们方面。

（四）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进攻，中央特决定：

甲、在各抗日根据地内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并到处提出下列口号：

（1）立刻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将士，抚恤伤亡，惩办祸首！

（2）立刻停止华中二十万大军前进剿共，反对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前线国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日！

（3）立刻停止陕甘宁边区周围的碉堡线，把一万万元的碉堡建筑费，用到国防建设上去，用到改善人民生活上去！

（4）取消一党专政，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马寅初以及一切抗日救国的政治犯。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

（5）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驱逐亲日派头子何应钦陈立夫！

乙、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的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对人民，对革命分子则肆意压迫与屠杀，对日寇汉奸则消极应付与宽容，有功者罚，有罪者偿等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

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才能使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

丙、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丁、在大后方应经过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的水平。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

江南新四军遵命北移，突被当局下令袭击，发生消灭抗日军队之巨变，消息传来，中外震骇，本报记者特为此事走访中共中央发言人，承他发表谈话如此：

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查自抗战军兴，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不久即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编第四军。三年余以来，该军转战大江南北，抗御强敌，屡建奇功，不但国人所尽知，亦为环球所共见。此等抗日有功之部队，理应加以爱护；乃当局人员，于大敌当前国难益深之际，未能凛然于民族第一抗战第一之义，挟其十年反共之成见，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之军队，始终视为异己部队，侮辱虐待包围袭击之事，层出不穷，对新四军当无例外。该军在鄂中之李先念支队被程汝怀等攻击多次，在苏南之陈毅支队迭受冷欣压迫，在苏北之管文蔚部则受韩德勤压迫，在皖东之罗炳辉、淮北之彭雪枫部，则受李品仙压迫。该军在平江在豫西之后方留守人员及受伤官兵，则迭被惨杀，曾发生有名之平江惨案与确山惨案。即该军参谋长张云逸之老妻幼子，亦被拘捕。此皆过去数年之事实，昭昭在人耳目者。近数月来更变本加厉。苏北皖东鄂中各地，大举进攻，名曰剿匪，江淮一带早已闹得乌烟瘴气。不宁为是，去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总参谋长之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及新四军叶项军长，不顾事实，强调所谓军政军令，勒令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限期集中黄河以北。朱彭叶项为顾全大局起见，允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是以有佳电答复。至12月底，新四军叶军长等业将移动部队准备就绪。正欲开动之际，不意国民党各地言论机关，公开宣布该部北移消息，实际上不啻向敌人告密；同时即闻当局已对顾祝同上官云相下达袭击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之语。然外表则说已令各部协助通过，决无留难云云。叶军长等以言出负责当局，料可置信。乃于本月4日毅然开动，计新四军军部及部队共约万人。不意甫经开动，即遭袭击。行至泾县太平间之茂林村地区，即突被五十二师唐云山，一〇八师戎纪五，七十九师段茂林，一四四师范子英，四十师詹忠言，第七师田钟毅，第十师王劲修等七万余人，统受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分进合击，大举围攻。叶军长等一面仓促应战，且战且走；一面电告当局，质问理由。乃当局在该部被围血战七昼夜中，始终佯称已电顾祝同询问真相，并诡称已令顾氏撤围放行，实则密令各部实行其聚歼计划。至13日，激战已八昼夜，我遵令北移遭遇袭击之新四军，果已弹尽粮绝，全部牺牲，已达当局聚歼之目的矣！至昨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正式发出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并直认将皖南新四军部队歼灭，又谓该军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在逃，正缉获中，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等语。一篇堂皇文告，已将其阴谋消灭抗日部队之真面目，赤裸裸的表白于全国人民面前。事有凑巧，正是17这一天，日本同盟社亦从南京发出了一个惊人电讯。该电略谓“重庆政府严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之共产军，于12月26日以前移往江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使共产军早日移往江北，遂开始在东流附近围攻新四军及共产军各军队，共产军一部已于10日由荻港附近溃退江北，自14日以来，日军各部亦攻击宣城金坛附近之新四军，“国民政府”绥靖部队亦协助日军作战”。至此，一幕消灭抗日武

装摧残异己力量之大阴谋惨案之真实内容，乃益大白于天下，所谓限期北移者，不过诱我军入围配合聚歼之诡计。所谓军纪国法者，不过于聚歼之后，尚有宣布叛逆交付审判之一套而已。过去高唱军纪森严国法神圣之滥调，不过是摧残异己阴谋杀人之骗词。新四军为抗日部队，北移乃遵令行动，乃竟遭围击聚歼之惨变，军纪何在？国法何在？盖违令者即下令者，毁法者即造法者实已无置辩之余地。

当江南新四军惨被袭击歼灭之际，当局复令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共二十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之新四军，所谓"一网打尽"之计划，固不仅限于江南一隅而已。同时在西北方面，包围陕甘宁边区者亦有军队二十余万。西安特务机关对八路军办事处除实行封锁压迫外，竟于前数日将办事处挑水夫绑去，逼其回去在水内施放毒药；桂林军警机关则强迫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立即撤退。至对全国各地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则早已事先调查名单，又要来一个"一网打尽"，大概快要下手了吧！从这种种事实看来，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歼灭皖南新四军之无耻罪行，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仅仅是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全部阴谋公开实行之开端。此等为敌张目无法无天之罪行，不仅我们共产党几十万党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数十万将士绝对不能容忍，即全国军民爱国同胞和全世界主张正义人士亦绝对不能坐视。我们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我们号召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以达到下述各项目的：

一、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

二、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

三、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其家属！

四、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

五、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

六、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之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

七、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

八、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

九、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

我们深信：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大多数军民同胞，一定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中华民族正处在抗战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前面。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大多数军民同胞，深知在此艰危时局中，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采取的措置。

（原载《新中华报》1941年1月23日）

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全国人民公鉴：据1月17日中央社发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变，叶军长交付审判，群情痛愤，中外震骇。窃以两年以来，国事日非，倒行逆施之事，层见迭出，然未有过于此次者。此次新四军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实行北移。乃我军遵令移防之日，即当局聚歼计划实施之时，先则诱我入围，继则挥军环击，所有五十二师唐云山、一〇八师戎纪五、七十九师段茂林、一四四师范子英、四十师詹忠言、新七师田钟毅、第十师王敬修等部七万余人之众，自1月6日至13日继续八昼夜之久，使我不满万人之孤军，顿遭惨痛之消灭。对敌何怯？对我何勇？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者非耶？从此以后，发号施令者之全部阴谋已暴露无余矣。宣布忠勇抗日之新四军为叛变，则所谓非叛变者作何解释？且真正叛变者果何人耶？今日之事，乃真叛变抗日，叛变团结，叛变民族利益，叛变三民主义，叛变孙中山，叛变大多数，全国人民必须速起注意，监视真正叛变者。四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为团结抗战之大局，耗尽心血，为抗御敌寇，撑持最艰苦之最前线，乃枪声发于后方，暗算施于俄顷，我忠勇之新四军将士被歼灭矣，我领导全军为国奋斗之叶军长被击伤被交付审判矣。试问此鲜红之血，果因何而洒？为谁而流耶？朝有秦桧，岳飞不得不死，今之秦桧果何人耶？然而秦桧误矣！今日何日？乃民族必然复兴，汉奸必然歼灭，日寇必然打倒，帝国主义制度必然崩溃，三民主义必然实行，世界革命必然胜利之日也。夺去一叶挺，必有千百叶挺以继其后，复灭一万新四军战士，必有数百万数千万忠于民族国家之新战士以继其后，而一切丧心病狂倒行逆施之徒，虽逞志于一时，必难逃于复没，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此类是也。然秦桧辈之全部阴谋，今始见端，我民族之大难，方兴未已，朱彭叶项曾于佳电中所申述者，今已开其端矣。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乃秦桧辈之全盘计划。盖反共之极，势必至于投降，而投降之前，尤必猛力反共。国人慎勿谓今固犹未降日，须知翻手为云者复手可以为雨，行见今之日寇，将被尊为太上皇，今之秦桧，则正准备为袍笏登场之儿皇帝。而其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之阴谋计划，则为所谓各个击破，先消灭新四军，再消灭八路军，清除投降之道路，准备贝当之前途，固已肺肝如见矣。毅等今对此辈秦桧已无丝毫之要求，盖昔日之希望今已完全绝望矣。惟毅等认为叛变抗日者仅属若干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除此之外，例如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及一切不参加投降反共之人，仍须团结一致，坚持抗日。毅等完全相信，中华民族之神圣抗日战争，无论经历何等艰难困苦，必须争取最后之胜利。惟望全国同胞，努力奋斗，坚持不懈，勿使无法无天之秦桧得行其志，则国事犹有可为。迫切陈词，诸祈共鉴……下略……（1月24日）。

（原载《新中华报》1941年1月29日）

〔附〕关于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阴谋围歼江南新四军的几个文电

一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反共电文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日）

上饶顾长官祝同密(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该军们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三)右二项仰即遵办具报为要。

二　顾祝同转报袭击皖南新四军军部致何应钦密电

（一九四一年一月八日）

总长何极机密鱼未翱电计呈顷据上官总司令虞午利电称(一)支晚由湾滩章家渡南窜之匪军主力约五千余人因雨滞留于茂林铜山徐一带山地中鱼辰其警戒部队与我方师搜索部队在茂林铜山徐附近接触中(二)集团军基于钧座鱼未翱电要旨以迅速围剿该匪之目的于苏南及宣城方面对敌伪暂取守势以主力于本（七）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徐一带之匪军(三)第二游击区应严阵守备迅即扫清该防区内之残匪及其兵站设施与秘密工作人员(四)右翼军应以有力部队守备原阵地主力展开于后山湾滩李庄湾里风东流山之线与右翼军确取连系防该匪攻击(五)左翼军（并指挥七九师）任进剿之主力以一部扫荡清弋江以西匪区内之残匪进出于南陵戴家汇何家湾之线而占领之另以一部守备章家渡及沿无名河以防匪军回窜以主力与右翼军连系展开于屯仓徐杨家扇岭小山丁家孝河口之线向匪军攻击(六)两翼军作战地境为小葛村（三溪东北十二里）坦口流山茂林滩湾里南陵县城峨桥之线上属右（七）六二师控置于旌德芳川附近机动上七项除已分电遵照外谨电鉴核等情谨电鉴核。

三　国民党反共军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围击皖南新四军战斗详报中之有关部分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月）

（一）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

（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宁国万福村）

方　针

1．集团军遵照　司令长官顾智午攻召代电及宥未攻召电之指示以策应苏鲁友军作战决

先扫荡苏南皖南一带匪军匪党为目的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

进剿开始时日另有命令

指导要领

2．封锁长荡湖至固城湖间及泾县与马头镇间匪军行军路线确实隔断苏南皖南匪军之连系并肃清各防区内及沿途残留匪军与其秘密组织。

3．苏南方面严密守备现阵地肃清防区内之残匪及其诸设施。

4．任皖南方面进剿部队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秘密推进至南宁泾县茂林村铜山区小河口水东翟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了山镇之线扼要构筑工事确取连系对匪区严密警戒随时防止匪军乘隙逃窜并防其以各个击破之手段集其主力向我反攻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

5．攻击开始后随战况之进展逐步扼要构筑碉堡严密封锁一面继续向旧县荻港坝埂头江岸压迫之一面配合党政扫清残匪安抚民众救济农村恢复原有区乡保甲组织推行政令。

6．第二线部队于攻击开始后协同党政机关迅速肃清驻地附近匪党及其秘密组织并随时保持机动。

部署大要

7．第二游击区兼总指挥上官云相副总指挥冷欣指挥第八八军忠义救国军第六十三师独立三十三旅挺进二纵队及苏南地方武力担任原阵地守备肃清防区内匪军匪党并适当控制机动部队防止该方面匪军为策应其皖南方面作战向我袭扰或暴动等行为并于适当时机扫清在郎溪至竹箦桥之匪军兵站及其秘密工作人员截断匪军苏皖交通忠义军须准备一个团以便于必要时立即分路派出清扫郎溪至孙家铺间匪军之兵站及秘密工作人员。

8．剿匪右翼军指挥官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指挥第二十五军（欠四十师）附炮一团第二营（欠五六两连）应以一部担任宣城方面之守备主力与左翼军确取连系展开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向戴家会三里店汀潭附近匪军攻击尔后向繁昌方面追剿。

9．剿匪左翼军指挥官副总司令刘雨卿指挥第四十师第一四四师新七师之第二旅附炮一团第二营第六连及战炮总队直属第四营（欠十五连）展开于湾滩茂林村苏口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了山镇之线向云岭何家湾沙土角（戴家会西北四公里）各附近匪军攻击而占领之尔后与右翼军协力向旧县荻港坝埂头江岸追剿。

10．第七十九师位置于太平石埭间六十二师位置于榔桥河镇三溪间随时保持机动。

11．第一线各部队务于到达位置后立即完成必要之工事并即派部队占领附近主要山峰截断或堵塞通敌道路配备守兵严查行人或断绝阵地前之交通并多派侦探于远方一面与友军妥密连系。

12．各部于未奉攻击开始命令之前应取防守姿势并竭力避免冲突。

13．第二线部队务竭力准备须能随时立即出动以便追剿与应援。

（二）匪军失败之主要原因

1．状况判断错误轻离老巢南过章家渡投我部署上最强之包围圈内。

2．前有大山后有大河地形特殊不利。

3．天候阴雨迟滞行动。

4．战前匪军各将领因决定北移路线之意见分歧战时傅秋涛先逃叶项亦离心离德不能统一指挥。

5．携带有限粮秣困斗于贫瘠之山地中饥寒交迫失却战斗力。

〔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解散新四军通令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瞻远前途，病愤无已。职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关于该军叛变全部阴谋，业至元（十三）日将会获该军参谋处长之供词，电陈钧鉴。兹已将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地就地擒获，该军付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所有处置新四军叛变经过，理合先行呈报，敬候钧核示尊等语，据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特此通令，（三十年一月十七日）

（原载大公出版社出版：«中共重要问题文献»）

〔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

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缘中央为调整军事部署起见，曾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限新四军全部于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三十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并指定繁昌铜陵一带，为其北移路线，讵该军并不遵照命令行动，又复借端要索，希图延宕。顾长官为维持军令尊严，督令该军，遵由原地北渡。该军

悍然不顾，仍擅自行动，非特不向北渡江，而自由泾县向太平地区南窜，企图袭击上官总司令部。适第四十师由苏南换防，调至后方整训，新四军早已详悉其行军道路，及知该师由本月一日到达三溪，遂于四日晚，全部潜赴茂林，（泾县南约八十里），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该师袭击。该师仓卒被击，不得不加以抵抗，借资自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为整饬纪纲，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该军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获该军长叶挺，现已交军法审讯，该军番号已经明令撤销，此该军违反军令卒被制裁之经过也。

此次新四军违令叛变，非出偶然，而实本于该军一贯之阴谋，据顾长官元亥由转报拿获该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赵凌波之供词即可明了真相，该项供词如下：

(一)叶挺等奉令开动时，即决意不遵令北调，早已定谋，赴苏南，先盘踞金坛、丹阳、句容、郎溪、溧阳等县，扩充东南政治分局，加强机构，便于短期内，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区建立根据地。

(二)先以政工人员干部官佐武装士兵，陆续开赴苏南，在丹、句、郎、溧五县间，扩充细胞，以待全部到达后，展开反抗，并并吞第二游击区内之抗战国军，再演苏北黄桥之局势，以便向太湖浙西扩展。

(三)为要挟开拔费及弹药各五十万计，集中全部兵力于泾繁昌一带。

(四)嗣奉令规定由皖南原地渡江，颇为失望，但仍希领到款，再借口敌舰封锁，决不由皖南渡江，以贯彻盘据苏南之目的。

(五)第四十师由苏南换防调至后方整训，新四军详悉其道路。嗣知该师于一日下午到达三溪与郎桥镇之间，新四军为此乃其袭击第四十师唯一之机会。遂于江(三)日定谋，（四日）夜全军潜赴茂林，分兵左中右三路，取先发制人手段，以期各个击破。其所定计划，系歼灭第四十师后，即以其支队，在丁王殿板桥一带牵制一〇八师，以中右两支队急趋胡乐东岸一带，夺取仓库被服粮弹，直袭某地上官总司令部，然后与左支队分趋郎溪溧阳，会同苏南部队，再夹击在郎及郎溪一带抗敌之国军，造成扩大纷乱之局，使中央穷于应付，胁迫中央容纳其要求。

(六)叶项等微（五日）辰分发各电，婉转陈词，系故作缓兵之计，且佯示无意启衅，以便嫁祸国军等语。

该军叛变阴谋，昭然若揭，第四十师仓卒应抗，出于自卫，顾长官对该军相机处置，全部编遣，实为维持军纪上必要之措施。

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销，并将叛军官长分别交军法处审判严缉治罪。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戮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能用于数日之中，平定叛乱，此未始非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原载大公出版社出版：《中共重要问题文献》）

〔附〕有关“皖南事变”反动阴谋的回忆

岳 星 明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下，为了削弱共产党力量而发动的对新四军的突然袭击事件，形成了当时第二次的反共高潮。我那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的参谋处处长，参与了这次“事变”。现仅就我亲自经历过的、记忆得起的事实，写出这篇材料，以揭露蒋介石、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等阴险诡诈的嘴脸。事隔二十多年，而今提笔回忆，心情仍感到非常沉重。

一 事变前的军事概况

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包括长江以南的江苏和安徽南部，浙江、福建全境和鄱阳湖接连抚河以东的江西东部。在这一区域内，日本军队、国民党（第三战区所指挥的）部队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部署，在“事变”前夕概况如下：

日本军队方面：

在浙东以绍兴、萧山和杭州为主要据点，控制浙甬路交通线。在苏南以吴兴、长兴、溧阳和苏州、无锡、常州为主要据点，控制太湖沿岸，掩护沪宁铁路交通。在皖南以广德、宣城、繁昌为主要据点，控制苏皖交界地区，掩护南京、芜湖两重镇。在繁昌以东，则占据荻港、铜陵、贵池、东流、彭泽和湖口各点，控制长江交通。在赣东以九江和南昌为主要据点，控制南浔路，并占据抚河西岸和向塘以及赣江东岸市汊镇，掩护南昌重镇。

综计日本军队不到三个师团，另有一些伪军和地方汉奸武力。

国民党第三战区方面：

(一)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属湖南军队系统）指挥一个军和一个师和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的保安团队；担任浙东的浙赣路正面和浙西的防务；总司令部设在浙东的金华。

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已中央军化，属第四十九军）驻诸暨，对付萧山、杭州的日军。

第二十八军军长陶广（湖南军队系统）驻于潜；其所属的第六十二师师长陶柳守备天目山并向杭州、嘉兴、湖州（吴兴）三角地带游击；第十六师师长唐肃对付长兴方面的日军。

(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兼第三战区副长官）指挥一个军一个师和苏南行署（主任冷欣）的第一第二两个别动纵队，以及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苏皖交界一带防务；总司令部在徽州以西的岩寺。

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东北军队系统）驻宁国；其所属的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该师系以前驻海州一带的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而成，装备较好，有德造卜福式山炮四门，驻苏南宜兴、溧阳一带；第一零八师师长戎纪五（东北军队系统）对付祁溪、宣城方面的日军；第

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中央军化）驻旌德，为预备队，实际是对付驻泾县方面的新四军。

苏南行署的两个别动纵队和忠义救国军，明为向苏南日军后方游击，实际是同新四军在苏南日军后方不断壮大发展的各支队搞磨擦。

(三)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四川军队系统，唐兼第三战区副长官）指挥川军两个军担任从皖南青弋江西岸起沿长江南岸南陵、青阳、湖口（不含）再沿鄱阳湖东岸到鄱阳县间的防务；总司令部在徽州以西的唐模。

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驻太平县属的穰溪河；其所属的第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明为对付繁昌、荻港方面的日军，实际是防范新四军；新编第七师师长田钟毅对付铜陵、贵池方面的日军；第一四五师师长孟浩然为军的预备队驻太平、石埭一带。

第二十一军军长陈万仞驻江西景德镇；其所属第一四七师师长章安平，对付殷家江、东流方面的日军；第一四八师师长潘左，对付彭泽、湖口的日军，并负责鄱阳湖东岸鄱阳县以北一段的守备；第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抽调由战区长官部控置，驻赣东的乐平整训。

(四)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东北军出身）驻赣东的东乡，其所属预备第五师（由江西保安团队改编而成，师长曾戛初）担任从鄱阳县以南起沿鄱阳湖东岸经过瑞洪到荏港以北沿抚河东岸的守备；第二十六师（师长王克俊，川军系统）担任从荏港起经梁家渡到李家渡沿抚河东岸的守备，对付抚河西岸向塘方面的日军。(另该军建制的第七十九师，已调浙东的诸暨。)

(五)暂编第九军军长冯圣法驻浙东的嵊县；指挥原宁波、绍兴和嵊县的地方团队，对付绍兴方面的日军；其建制内的暂编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个师，因新由浙江保安团改编尚未完成，均分驻浙江后方，没有担负作战任务。

(六)浙东自宁波以南的沿海到福建边界，由各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指挥地方团队，担任海防警备。

(七)福建全省由省府主席兼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兼第三战区副长官）陈仪，以第一百军（军长陈孔达）为基干，配合地方团队，担任警备。

(八)第三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的总预备队，包括前述川军一四六师（驻赣东的乐平）和由江西保安团队编成不久的独立第三十三旅（旅长黄镇中，驻江西的南城）。

新四军方面：

在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指导下，新四军与第三战区联系，补给和经费的一部分，由第三战区负责。那时新四军军部驻在皖南泾县的云岭；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常住在那里。新四军的主力进入长江南北两岸、华东广大敌后地区，与广大人民结合，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不断的胜利。据当时的第三战区长官部的资料，新四军的敌后武装力量，已发展到十多个支队。记得陈毅元帅和张云逸、谭震林、叶飞、陶勇、黄火星等将军，都是那时的支队长。在泾县有教导团和后调整休的部队，还办有学校，加上皖南发展的武装力量，共计约有一万多人。但当时，正面是面对着湾址、繁昌和芜湖方面的日军，右边有国民党的第一零八师，后边有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左边有国民党川军第一四四、一四五两个师，加起来的兵力不下四万。在所谓对新四军采取“防范”和“监视”的情况下，新四军既要对敌作战，对国民党军队又要“有团结有斗争”，处境是十分严重和艰巨的，主要是为了建立敌后人民武装根据地，不断壮大人民武装力量，活跃在华东广大地区，打击敌伪。与此相反，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反动军队，畏敌如虎，视友如仇。写

到这里，附带谈谈第三战区走私腐化的情形，可以说上自司令长官顾祝同，下至营、团长，普遍走私营商，贪污腐化。举例言之，如：顾祝同因其妻许文蓉家在上海，假手小舅子许某（姓名忘记）伙同上官云相的老婆易氏，勾结伪军张少华，打通关节，大做其粮食、棉布、西药和海产品等走私生意。顾祝同有小妾是曾在苏州唱京戏的女角史文卿。长官部的参谋长邹文华，情报室主任卢旭，办公室主任朱华，兵站总监缪启贤，东南购粮处处长佘仲良，副官处长茅乃功，均有书坊妓院出身的小老婆。像这类的走私腐化行径，当时是众所周知的。

二　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阴谋布置

(一)借口“掩护”新四军北渡长江，抽调部队，增加皖南的反动兵力。

1940年10月19日，反动国民政府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发出，第三战区长官部收到了这一电报。内容是在“统一军政、统一军令”的借口下，限令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移到黄河以北，进行敌后游击。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电，照例交由参谋处主办。在接到“皓电”的次日，司令长官顾祝同在会报席上，研究如何对新四军执行这一电令的问题。他说：(从这里以下所有谈话和对话，虽加引号，但都是大意)“命令是要执行的，但新四军先要通过日本人的占领地区，还要渡过长江，困难不小。苏南方面虽有它们的敌后支队打接应，但为了能够比较有把握地‘掩护’它们北撤，安全通过日军占领地区，必须抽调些兵力去加强才行。另方面必须考虑到，如果它们不遵电令，向南或向西‘流窜’也得增加皖南方面力量，作堵止的准备。部队还要比较好的才顶用。参谋处照我的意思，拟定计划送给我看。”顾祝同又指示情报室主任卢旭，要他密切注意新四军接到这一电令后的行动，随时报告。

我照指示去拟订计划，首先考虑到新四军如执行电令，应经过哪条路线北撤，从哪方面渡江和如何“掩护”等问题。在第三战区区域内，长江由西南斜向东北方向流去，又近下游，江面宽阔，形成天险。自芜湖至湖口一段，因为1939年底到1940年夏，对长江布设漂雷和挺进江边炮击，日本人受过相当损失，那一段防务，日军特别加强。从那一段渡江，困难太大，势不可能，那就是说北撤路线，不能选在向西北的方向。向北是芜湖、南京重镇，日军兵力配备强，困难也大。向东转向东北方向，如像郎溪、溧阳、句容和金坛广大地区，虽在敌后，但日军兵力配备弱，空隙多，结合新四军特点，擅长游击和敌后活动，通过反较容易。并且只要进到金坛、句容附近的大小茅山一带，就有可能暂时立脚，逐步进行渡过长江的准备，还可以得到其敌后支队的接应和掩护。问题关键首先在于如何越过郎溪日本人的第一线。因而我们必须准备足够力量抗得住从郎溪及其以南，尤其是从宣城，两个方面来的截击和侧击。考虑结果，至少须抽调一个师兵力到旌德、绩溪前线，接替第五十二师的大部防务，把第五十二师和第一零八师防线缩短，集中兵力，才能对付郎溪、宣城两方面的日本人，进行“掩护”。新四军北撤路线，以经旌德转向宁国南侧，先经广德、郎溪间，再经金坛、句容间，从镇江以东地段渡江为适当。其次考虑到万一新四军不执行电令，集中力量向南，或者化整为零向东、向南、向西“流窜”，怎样才能堵得住的问题。当时战区全般态势和兵力（参考一节所述），总的是面广兵单，颇感为难。要勉强堵住，至少要增加两个师的兵力。考虑结果，浙东方面的第七十九师，和由战区控制的一四六师可调。第七十九师调出后可由在浙东后方整编的三个暂编师中的一个师接替。我将如上计划，向顾祝同报告，他大体同意；但对我说：“浙东暂编师用哪一个师去换下第七十九师，恐怕要和黄绍竑主席商量，

早作决定才行。”顾接着又说“黄主席那里，由我打电话去同他商量。第一四六师装备差，怕不顶用，你可以再研究一下。但第一四六师也可调去，不要用在前线，另外还加调一个师去才好。”当时要多抽调一个师，还要装备比较好的，确感困难。我想到过去曾由第九战区调来第四十师，现在还可考虑再调第十九师（师长唐伯寅，湖南系统）。顾祝同立说：“很好，并且要用在前线，由我通电话告知薛长官（薛长官系薛岳），催他赶快开来好了。”关于新四军北撤路线、渡江步骤、“掩护”打算、防备日本人以及堵止新四军“南窜”和抽调兵力等等，大体经顾决定后，我即草拟所谓“防堵计划”，大旨如下：

（1）新四军北撤路线为：旌德、宁国南侧，广德、郎溪间，金坛、句容间地带，并从镇江以东渡江；

（2）抽调诸暨方面的第七十九师开皖南，由浙东后方的暂编一个师接替该师的防务；

（3）第七十九师开旌德以北榔桥河附近，归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指挥；到后即接替第五十二师防务。第五十二师和第一零八师缩小正面，抽集兵力，加强对郎溪和宣城一带日军方面的力量；

（4）电催第四十师兼程启行，预定开旌德、三溪和太平以东间地域，归第三十二集团军指挥；

（5）第一四六师准备开皖南休宁、屯溪间地域控置。

所谓“防堵计划”经顾祝同核定后，由参谋处分别发出电令，调整部署，抽调兵力。第七十九师防务经顾祝同和黄绍竑商定，以暂编第三十师（师长黄权）接替。

从以上可以看出顾祝同一得“皓电”，即进行阴谋准备，兵力抽调唯恐不多，调去兵力，唯恐装备不好，装备好的，唯恐不用在前线。同时还要借口“掩护”，既要进行“防”，又要进行“堵”，用心实已昭然了。

（二）散布新四军要搞“三山计划”的谣言，动员“舆论”，企图推卸责任。

当时战区情报的搜集整理，关于军事方面的，由参谋处第二课（情报课）负责。对共产党的斗争和对内部人员的监视这类情报，由情报室负责。自“皓电”发出以后，有关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其中与军事有关的，由情报室抄副本送参谋处。记得自1940年11月9日叶挺军长发出“佳电”，为了顾全大局，答应将新四军驻皖南的部队北移。自此以后，新四军当然要作一些准备，但自此以后，先后由情报室抄送来的情报，不外是说“新四军北移是假，准备要实行三山计划是真，新四军是准备向南向西流窜，进据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以这三山为根据，发展势力”这类的情报。那时我站在反动立场，认为新四军要通过日本人的重重据点，再渡长江天险，困难大，难免遭受损失，恐怕不会干这样的“傻事”。我根本不了解共产党在日本人占领区内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解放区广大人民的抗日武装的伟大革命方针，所以对这些情报，是相信不疑的。顾祝同在每星期二、五的会报席上，也常常强调这些情报，督催有关处室，要特别加紧“防范”。责成参谋处要办的，是经常督率部署的调整和兵力的抽调，“防堵”工事的构筑，补给库、所的戒备等等。忆自叶挺军长“佳电”到来以后，在顾祝同一系列对各处室等单位的指示，不是如何帮助新四军较快较好地完成北移准备，而是在新四军要搞“三山计划”的情报散布之下，几乎完全忘了那时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军。“佳电”以前还要借口“掩护”新四军北移去掩蔽阴谋准备，“佳电”以后，可以说是在专心一意地针对新四军，去加紧准备了。以上所述，不过是长官部有关单位所做的。所谓“三山计划”这一诬蔑，当时对反动党政机关，是特别通报的。对在“三山”范围的浙江主席黄绍

竑、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皖南行署主任张忠良，更是严督“防范”。(对行政方面的文电是由办公厅主任朱华主办，有关军事的是同参谋处会稿，所以我了解。)至对新四军来往文电，则是“嘉勉鼓励”之类“冠冕堂皇”的另一手法。在所谓“三山计划”下,更主要的作用,固然可以借此通过党、政、地方，动员“舆论”，其真正居心,不外为将来推卸责任预留地步，用心是何等险诈。

(三)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来上饶接洽的情况。

新四军在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江西上饶城设有办事处。长官部是在距上饶城西约二十华里的皂头村。新四军办事处人员平时和参谋处很少接洽。自叶挺军长“佳电”发出后，其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曾先后两次到长官部商洽北移和渡江等问题。记得第一次，袁主任见过顾祝同后，顾要我和袁详细洽商关于军事和补给等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和新四军同志的接触。袁主任中等身材，深度近视，衣着朴素，谈问题率直诚恳，好像是苏北口音。我们见面是在参谋处（皂头村西北约八华里的石鼓村）,那时（约在12月中旬初）抽调的七十九师正在向皖南开拔途中，袁主任曾直接了当地问过我；我答以完全是为了“掩护”新四军北移，调去增强宁国方面，便于对付郎溪、宣城两方面的日军的。北移路线和渡江地段，均依上述计划初步商定。对粮弹补给，袁主任提出数目，并要求能尽快补充，以便早日完成准备，早日北移。我对所提出的数量，大体照袁的意见，签送顾祝同。顾对粮食器材，在核批时考虑不多，大体如数批准；惟对弹药一项，阅看签呈时，非常审慎，有时反复再三斟酌，结果每次都有所削减。他不只一次地当面交代我和兵站总监缪启贤，大意是:“粮食可分别送拨些去，在批准数量中，替他们在北移路线沿线代屯备些。器材也照这样办。弹药不必拨发，全部替他们屯备起来；可告诉他们，这样可以减轻北移的负累，等待第一批越过日军防线，在靠近最前线库所，拨发后继部队领去，比较妥当。”我当时照所指示，加添些道理，告诉了袁主任。在袁去后，来电催请补给的回电，也紧守顾祝同的指示，弹药总是借口迟迟不发。实际负责补给的缪启贤更是如此。

在“事变”前十天，袁国平主任又来长官部一次，和我商洽，主要是催领粮、弹、器材的问题。记得关于弹药，顾祝同交代缪启贤发过一小部，粮食器材分别拨发的多些，但还是照以前意见，当面再三交代我和缪的，总的仍然是弹药绝大部分口头上答应，而实际不发。

在袁国平主任两度来上饶，和我多次商洽过程，袁表现出切望帮助完成准备以便早日北移的诚挚态度。袁第二次来到后，我曾主动邀他在我家吃便饭，相谈间彼此都很自然。但那时在我思想上，对新四军是真心北移，还是要搞“三山计划”，是存在猜疑和矛盾的。因此在和袁商谈问题时，虽是共同在深入研究如何克服北移和渡江中可能产生的困难等等，但对袁催问弹药的补给时我也觉得领多了，带起移动不如逐点逐步领取为妥当，因而对袁解释，甚至有时争论，但在对答中并无不自然之处。同时在我内心也认为如果弹药发去了，而万一他们真的搞起“三山计划”来，我的责任不小，所以对此我颇为坚持。

顾祝同当面对待袁国平和对新四军文电的要求，表面上答应并且说得很好听，但实际是处处掣肘，一再为难。弹药为战斗所必需，更是控制特严，对我们叮咛再四。袁国平第二次来长官部催领，虽然拨发了一小部分弹药而粮食器材还发得较多，其目的仍然为掩蔽阴谋，不如此不足以暂弥新四军的怀疑。顾祝同的诡诈，只此又见一斑了。

(四)蓄谋削弱新四军力量的种种措施和准备。

早在“皖南事变”前，从1939年底起，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示第三战区，先后执行

了如下一系列的准备和行动：

（1）组织混城奋勇队，企图在苏南敌后地区与新四军摩擦。

1939年底，第三战区照军委会指示，组织混城奋勇队。借口将来使用在苏南敌后如南京、无锡、苏州、上海等大城市，混进城后，进行破坏仓库、炸毁日军的军事设施、暗杀日伪高级人员、扰乱交通和城市秩序等。从战区所属各部队中，每营抽调精壮士兵三名并要思想可靠、自带短枪，集中上饶附近广丰境内的五都编成混城奋勇队，直接归战区长官部指挥。总队约一百五十余名，分为三个混城奋勇队，每队五十人。总队长为郭履洲，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来。总队主要人员和三个队长，全是军统特务担任。关于行政和经费，由长官部情报室负责；一般军事常识训练由参谋处负责；技术和特业训练，由总队自己负责。记得我曾前往五都，作过两次军事讲话。参谋处各课课长也分别担任有关课程的训练，训练时间约三个月多。训练结束后编成小组，陆续派到苏南敌后活动。在“事变”前，记得由情报室通报的活动情况，较大的仅有对浒墅关、苏州、无锡间市镇的铁路机车修理厂小规模地破坏过一次，对沪宁铁路的交通扰乱过两次。在八九个月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中，活动当不只此；在情报室指导之下，主要在与新四军敌后支队进行斗争。

（2）编成忠义救国军，使用在苏南、皖南交界处，加强反共力量。

1940年春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来到上饶长官部与顾祝同商量编组忠义救国军问题。商定编成的忠义救国军司由战区使用，但有关人事、经费和指挥方面，则统归军委会掌握，并指定配置在皖南的广德附近，便于进入敌后。忠义救国军设总指挥，由军统特务二号人物周伟龙充任，下编三个纵队。至戴笠这次来到上饶，对外是说回浙江原籍省亲，实际上是密商反共军事计划的。关于编组忠义救国军一项，我参加商讨；至于其他方面戴笠和顾祝同商讨什么，我就不清楚了。但只就组织忠义军一事而论，如总指挥人选之指定和活动地区指定在皖南、苏南边境一带，显然是针对新四军作出的反共军事准备。

（3）重庆国民政府发表亲日派王懋功任江苏省主席，准备进一步勾结日本共同反共。

自1939年底以后原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在苏北的地盘益见穷蹙，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则日趋壮大。因而约在1940年夏，反动国民政府发表王懋功继韩为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即带了一批人员到上饶长官部，作为顾祝同的宾客，住在长官部直到“事变”以前。自王懋功来到后，韩德勤频有电催。自“皓电”发出后，顾祝同给新四军的文电中，常提到：掩护王懋功同时渡江，建立政权，共同对付日本之意。王懋功和亲日派头子何应钦私交颇好；这次江苏省主席的任命是何推荐的。从当时反动派中的一般较高级人员的谈论中，可以听到王懋功的“才干魄力”比韩德勤“高明”，此去较有“办法”。所谓“高明”和“有办法”，意思主要是指王有办法进一步勾结日本共同反共。王懋功住上饶一较长时期中，其言论表态，也看出其颇有一试身手之概。

（4）赶修重庆—上饶长途载波电话线，供蒋介石、顾祝同直接秘密通话之用。

上饶距重庆较远，通常电话要经过泰和、赣州、衡阳、桂林和贵阳等处接转，不惟声音不清且易泄密。从1938年成立第三战区和1939年初长官部驻上饶以来，这长途电话的设备并没有改善，重庆、上饶间的联络主要靠电报。1940年秋，忽然在战区长官部的星期二、五例行会报席上，每次增加了东南电政特派员赵曾珏列席。（赵是留美生，属宋美龄派。）在会报席上，每次都要向顾祝同报告重庆至上饶间的长途载波电话线材料准备和工程进行情况。在一提到材料有困难，工程进展迟慢的时候，顾祝同责备催逼很严厉。记得事变前一个多月的时

期中，顾曾有两三次声色俱厉地斥责赵曾珏说："如不能依限期通话，要你（指赵）负责"，甚至"要杀你（指赵）的头"这样的话。这条通话线，总算在1940年12月中旬修好。我从顾祝同的随从副官徐延辉口里，听说自通话线建成之日起，顾祝同常在夜里从其家里和蒋介石直接通话。据以上事实可以推想到他们谈话内容，必然是与"事变"有关的。

（5）调整指挥系统，把上官云相调到皖南，统一指挥对新四军作战。

1940年春季以前，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是驻在江西临川（抚州），指挥第二十九军（军长刘雨卿）和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担任赣东的指挥的。1940年夏，军委会调整全国军一级，撤消了第二十九军，赣东方面，仅有第四十九军一个军；皖南方面，那时是由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负责指挥的。按合理的军事部署，赣东前线接近南昌，且与第九战区分界，为日军进扰的目标，应付这种情况，理应有一较高级司令部，才能跨界统一指挥第九战区赣江两岸的部队；皖南一个集团军总部负责是尽够的了。但顾祝同当时即借调整军一级的机会，说什么赣东只有一个军，上面没有摆集团军总部的必要，指示参谋处，把上官云相总部调住皖南。记得我曾签具意见，认为战区东边的浙东，北边的皖南，西边的赣东，各以一个集团军坐镇为宜。顾祝同又借口必须加强对苏南敌后为尔后进击作准备，仍要参谋处照已交代的办理。我只好照办。顾祝同还说："新编成的忠义救国军和第二十五军归唐副长官指挥，不很方便，唐副长官指挥川军他自己的军队就行了。"这次指挥调整的结果，两个集团军总司令部，挤在徽州一地，上官云相不过指挥一个军（两个师编成的第二十五军）。忠义救国军受双重领导，即由军委会和战区双重指挥，实际是听军委会（骨子里是军统戴笠指挥）的多，确是太不适合。顾祝同为了对新四军作战做准备，预先下了这步棋，当时我尚不够理解。

（6）为了监督和加强皖南方面的指挥，对第二十三、第三十二两个集团军的参谋长进行调整。

反动派对共产党的"防范"和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在1940年以前，就第三战区来说，尚不敢向军以下部队造谣诽谤新四军。因此，军以下的部队领导人，绝大多数对新四军是以友军对待的。如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其军部驻地接邻新四军军部，在所办军士队里，曾请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赵凌波担任过游击战课程讲授。两军的领导人也间相来往。1940年春，可能由第五十军政治部主任陈去感的进谗告密，郭勋祺因此调离军长职务。又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周某，系共产党方面的地下工作者，竟被抓去杀害。可见顾祝同对川军颇不放心。为了"监督防范"所谓"异党"活动，于1940年夏初，以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吴鹤云调任为第二十三集团军参谋长；以军务处课长卢荣光调任为第五十军参谋长（吴卢二人均是福建人）；以战区长官部办公室副主任陈以忠（苏北人）调任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顾祝同先后对皖南方面第二十三、第三十二两个集团军参谋长的调整，绝非普通的人事安排问题，显然是为监督和加强皖南方面的指挥，以便对付新四军而采取的重要步骤之一。

（7）上官云相突来上饶见顾祝同的反常行动。

上官云相自1938年底归第三战区指挥以来，到长官部的次数不少。来时，多住在长官部副官处处长茅乃功的家里。因为上官云相有鸦片烟嗜好，茅也是瘾者，比较方便。再茅家也较舒适，饮食也较讲究，颇能迎合酒色之徒的上官云相的胃口。多次应酬，我常被邀参加，每次少不了要和上官云相碰头聊天。但在事变前几天，出乎我和长官部同级同事的意外，上官

云相来到长官部，却住在顾祝同家里，并且只住一宵，次晨即返徽州。此事当时严守秘密，事后我从办公室主任朱华那里才听到。上官云相这一反其常例的行动，结合几天后即发生的"事变"，不难看出顾祝同和上官云相这次诡秘行动的目的所在了。

以上七项，我在当时虽然意会到其中大部分措施是应付共产党和新四军的，但总还认为主要是在对付日本人；对人事的整调，还以为是反动派派系间的斗争。现在回忆这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无一不与"事变"密切连系。说明蒋介石、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之蓄意削弱、打击新四军为时已久，远在"皓电"发出以前。这一阴谋布置早已鬼鬼祟祟地进行了。写到这里，我联想起当时长官部的主要人事布置，也是以反共为中心的。如：战区政治部主任是复兴社的核心人物之一的邓文仪；军法执行总监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人物倪弼（号公辅）；东南经济分会负责人是CC的中坚人物赵棣华。这些都是早已布置的反共特务分子。后来华东方面的新四军力量日趋壮大，在敌后武装群众打击日伪日益加剧，蒋介石和亲日派视新四军如仇敌，必欲拔之而后已。自1939年底起，不断加强第三战区的军事准备，为发动"事变"准备条件。

(五)阴谋准备接近完成之前，顾祝同玩弄的手法。

约在1940年年底的一天（日子记不清）上午，我在参谋处接到顾祝同亲自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到了办公室，我看见战区参谋长邹文华，办公室主任朱华，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情报室主任卢旭已先在那里。顾祝同对我说："据情报室的报告，新四军近来行动，不像会遵命北移，而是想向南'逃窜'，可能先'劫夺'徽州仓库的弹药，再搞'三山计划'。如果堵不住，我们后方空虚，将来收拾就很难。我们当然希望新四军能遵命北移，大家需要研究一下，怎样才能'掩护'他们；还有懋功兄怎样随他们渡江，弹药如何补给这些问题；万一他们真地向南'流窜'，我们又该怎么办。我们正在考虑这些问题，找你来共同研究研究。"当时我有点窘，看看在座的人，半晌没有一个人开腔，我心里想，他们早在研究，不知道有过什么意见。问题很简单，新四军真心北移，我们应当尽力"掩护"，如果"南窜"，想"抢"徽州仓库，再搞"三山计划"，当然要加以堵止，有什么可研究的呢。在座的都是些老奸巨猾的人，世故深，都闷住不发言，我想，他们既然叫我来，我不能不谈谈我的意见。我将上述的意思说了一遍。顾祝同接着说："这是不成问题的，应该照你说的办。只是皖南唐式遵副长官资格较深，早就担任皖南方面的指挥。上官副长官，资历较浅，又后去皖南；但为了'掩护好'新四军或者堵住他们'南窜'，军事上必需统一指挥。你们看，哪一个担任统一指挥的好？"我想了一下，考虑这是参谋处的职责，应当提出意见，我说："唐副长官能力较差，川军兵力分散。现在任务很大，要'掩护'新四军或者堵住他们，使之不能'窜'到徽州，主要是靠新调去的第七十九师、四十师和原来在宁国、旌德的第一零八、五十二师；这些部队恐怕由上官副长官指挥为好。但川军第一四四、新七师也得准备好，如果新四军'南窜'，好在侧后牵住他们，也必需统一指挥才能奏效。上官副长官虽然资格较浅，但能力强，这就应该把资历问题摆在次要了，只好委曲一下唐副长官了。"顾祝同问问在座人的意见，大家都同意我的说法；于是顾祝同最后说："我也是这样考虑。参谋处应抓紧拟定调整指挥计划；最好你亲自在我办公室起草。"我当即遵办。这个计划是比较容易拟的，只要把第二十三和第三十二两个集团军的作战地境重新划分一下就行。部队的摆法和以前颁发的所谓"防堵计划"变动不大。记得原来第二十三和三十二集团军的作战地境是沿青弋江，通过泾县、三溪到庙首一线是属于第二十三集团军负责的。就是说，泾县、茂林村和三溪是在唐式遵负责范围，

现在应当改划一下，把地境向西移了，向南延长了，把泾县、茂林村、三溪都划归上官云相的负责范围，并且通过竹田铺东侧、潭家桥向南延长到休宁县东边的万安，也即是把徽州划归上官云相负责了。计划送顾祝同，没有多大修改，经他批准后，顾又交代我说："这个计划，你就在我办公室里誊正，你亲自送去盖印，亲自加封后保存。我已在电话上告诉过上官副长官，要他召集就近师长以上的负责长官，明天在徽州开一个会，你带着计划去代表我宣布。如果唐副长官方面有什么意见，你是四川同乡可设法向他们解释解释。我派一辆小汽车，不要带任何人，明晨出发，务必当天赶到。参谋处人员，不必告诉他们。"我一一照办。第二天早上我乘车前往徽州。

当日傍晚，我赶到徽州西边的岩寺（岩寺为原来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现在是该集团军的兵站分监部，总司令部已推进到宁国南边的万福村），我先见了上官云相，问他什么时候传达司令长官的计划。上官云相预定在今晚传达，并告诉我，召集人员都已到齐，就等我到后开晚饭，饭后开会。约在当晚8时左右，由上官云相主持会议，他向参加会议的各部队长，说明新四军北移可能性小，"南窜"可能性大，还有"劫夺"徽州仓库弹药，再实现"三山计划"的企图。同时也报告了一些郎溪、宣城和苏南一带日军的简单情况。随又说明会议目的，是奉司令长官的指示召集的，推我传达司令长官意旨。我照顾祝同在他办公室研究时告诉我们的意思，新四军北移要"掩护"好，如"南窜"务必要堵止住，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唐副长官担负的正面已宽，责任已经很重，所以这次打算暂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我随即宣布了长官部调整指挥计划。当然也问问出席人员的意见，更假意问问唐副长官和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的意见，以便转报。在反动派指挥上的一般情况下，既然已经当众宣布了计划，再征求意见，不过是形式，当然没有人发表任何不同意见，唯唯诺诺，会议即告收场。会散后我又与唐式遵周旋了一番。

出席这次会议的记得有：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第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上官云相的参谋长陈以忠和兵站分监李锡庆、第二十三集团军兵站分监郭叔皋等人。第一零八师师长戎纪五在宁国前线，第一四四师长唐明昭在南陵前线，新七师和川军第二十一军，因关系不大，且途程太远，均未邀出席。

会后，上官云相对第五十二师、第四十师、第七十九师另有些指示，我未参加。他们有的当晚、有的次晨分别赶回部队。次日晨我乘原车于当日傍晚赶回到长官部，立即向顾祝同报告了会议情况。

顾祝同和上官云相，阴谋早定。顾祝同找我去研究和到徽州传达计划，不过企图借我和参加研究的人，替他宣传新四军北移，本来准备"尽力进行掩护"，但"南窜"必须堵止，好为将来推卸责任。再则通过徽州会议形式，造成事实，压服唐式遵，授给上官云相以统一指挥全权，并增加其威信的手法而已。

三 "事变"爆发和经过的概况

1941年1月7日，天色还没有大亮，我尚未起床，忽然床边电话铃响，我接到顾祝同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接到上官副长官电话，昨日新四军向南移动，不听制止，半小时前竟向我前线部队开火，他们为了'自卫'已经'还击'，第四十师方面打得比较厉害。我已命令上官副

长官转令前线部队，务必要把新四军堵住。你赶快拟发一个'自卫还击'电令给上官总部，并报军委会。你选派一个联络参谋，马上赶到前线联络，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我在电话上回答打算派参谋处第一课课长萧西清担任联络。当经他同意."皖南事变"爆发了。我照指示补发了所谓"自卫还击"命令。萧西清于当日即赶往前线。

"事变"爆发后，战斗日趋激烈，尤以7、8、9、10日四天为甚。皖南由上官云相负责全权指挥。因时隔已久，许多小地名记忆不清，当时所用五万分一比例尺的军用地图，小地名也很不详细，印象更感模糊。仅就由上官总部和派去的联络参谋先后报来的电报电话，就其中记忆较实，印象较深的，综合概述如下：

总的来说，自上官云相全权指挥后，其所指挥的部队，照原来战区长官部颁发的所谓"防堵计划",虽出入不大，但前线位置，一般是以茂林村为中心，向前逼进了。尤其宁国方面的一零八师，原来是"掩护"新四军北移和兼防"南窜",主力是对宣城方面的日军，一部控置在宁国附近的，到"事变"爆发前夕，阵势反过来了，仅一部分对日军，而主力已完全向西正面，摆在周王村西边南北方向的线上，师部已推到周王村；第二十五军军指挥所，亦由宁国推进到宣城、宁国、泾县交界处的山门洞了。又第四十师于1940年约在12月中旬初将到达皖南时，早由上官云相调整与第七十九师互换了位置，即以第四十师当三溪以北一带（原"防堵计划"是第七十九师开榔桥河附近，以便把第五十二师向东缩小正面，依次向东北方向，再缩短第一零八师正面，抽集兵力控置，对付郎溪、宣城日军，"掩护"新四军北移的。)，而把第七十九师调到第四十师以西的观音桥、铜山一带，第五十二师仍在榔桥河一带，并未缩短正面，抽出兵力。

"事变"爆发前皖南反动派军队的前线，约在宁国以北的水东（正面向北和西北）起经周王村以西的南北一线，再向西南方面经榔桥河以北附近，经三溪以北的新潭、铜山附近、桃花渡、章家渡向北到北贡里的漫长战线上，是以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的茂林村为中心，形成了向东、南、西三方面的包围形式。共计兵力（由东起算）为第一零八师、第五十二师、第四十师、第七十九师、第一四四师、新七师、和预备队的第六十二师、第一四六师等八个师，人数不下八万之多；而新四军当时在皖南部队，只不过一万左右。

"事变"爆发后，以榔桥河、新潭、铜山三个方面战斗最为激烈；在新潭和其以北的皮岭，战况尤烈。记得皮岭、新潭几经易手；第四十师，在8、9两日，既放弃皮岭，又几失新潭，叫苦求援的电话、电报，频频上传。当时战区长官部曾急调浙西方面第二十八军所属第六十二师的一个团，驰归上官云相指挥，布置在旌德、三溪之间，作为预备队；第一四六师亦作向徽州推进的准备。据转来的第四十师战报：其当面系新四军主力所在，8、9两日，冲击震撼了第四十师前线达七、八次之多；并传项英副军长最后还亲率教导团冲锋几次，战况至为惨烈。10日以后，这方面情况较松，但记得在12日一天，新四军少数部队，顽强据守东流山，几乎是全部壮烈牺牲。13日在东流山为反动部队占领以后，包围了北边的石井坑，这里是新四军各部所在地，战斗也颇激烈。由于顾祝同紧扣弹药不发，粮食也补给不足，新四军抗击近八倍于己的反动部队，时间达一周之久，终因弹尽粮绝，叶挺军长和所部战余的几千官兵落入虎口魔掌之中，战斗才告结束。

在7、8、9、10四天内，榔桥河第五十二师和铜山第七十九师两方面，战斗也很激烈，同样是反复争夺高地，频传紧急战报；战场犬牙交错，彼此包围突围，双方伤亡均重。至于正东的第一零八师和西面的第一四四师正面仅是零星的警戒、掩护性小战斗。但第一零八师

防守的水东附近，在主力战斗基本结束后，在新四军小股突围过程中，有过较为大点的战斗。第一四四师方面，在主力战斗高潮时，它的部队曾进占茂林村、章家渡一带，企图从后合围新四军；但因川军战斗力不强，在13日以后，新四军从北向西突围过程中，在茂林村的第一四四师的指挥所，被新四军突围部队袭毁，师长唐明昭几被擒获。因此上官云相逞其淫威，必欲将唐明昭正法，以振军心。但战区长官部因川军情形较复杂，恐怕惹起麻烦，结果仅将唐明昭撤去师长职务，由上官总部派人押解上饶长官部处办了事。

新四军经由章家渡北渡青弋江经铜陵、繁昌日军后方渡过长江者不下千人。在第一四四师接近茂林村时，新七师曾抽出一个团东开到章家渡附近，意在防止新四军由这里突围；但该团到时已是“马后炮”，新四军早已越过章家渡陆续北渡长江了。

“事变”战斗中，项英副军长和来过上饶和我商洽联系的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闻均光荣牺牲。但反动军队方面并未取得项副军长遗体。仅由在茂林村西边一高地上，拾得钢笔一支，上刻有“项英将军”和“斯大林赠”的字样而证实的。

这次“事变”，上官云相是卖尽心机和力气的，事后闻其总部人员谈到：在战斗紧张的7、8、9、10日几天，他是在宁国南边的万福村，日夜都躺在鸦片烟灯旁边，床边安放电话，夜以继日，靠鸦片烟提神，专心一意指挥这次血腥的屠杀。

“事变”到13日基本结束，先后经过一周时间，在上官云相总司令部和战区长官部，照例在事后有一番战斗经验总结。除了“冠冕堂皇”的丑表“功”和自我吹嘘的一套外，记得有以下几项，值得写出来，说明新四军这次不幸遭受惨重损失的主客观原因：

(一)新四军主力突围方向，正对第四十师较强的方面。因为皖南的八个师中，以该师装备最好；更重要的，仅该师才有德造卜福式山炮的配备。对着强点，几天反复冲击，竟有一天冲锋七、八次之多，地形险隘，山岭重重，遭致了过大的伤亡牺牲，战斗力大受损伤。

(二)新四军突围时机过迟。因为前项关系，在战斗力已受损失较大的情况下，可能在9、10两日激战之后，才决定四面突围的。当时一方面战力已减，另方面反动部队的包围圈已压缩得很小，火力已到了可以交互穿射的程度，突围当然很困难。

(三)气候的影响。在战斗的几天中，大雨小雨几乎没有停过；结合战场地形，山高岭峻，隘路多，坑谷多，山势陡，道路少，到处山洪暴发，隘路坑谷成河，战场转运机动，大受限制。

(四)月令限止了新四军特长的发挥。战斗期间，正值月令下旬，天黑无月，星光也少，真是黑如锅底，伸手不见五指，新四军擅长的夜战和夜间行动，无从尽量发挥。

× × ×

上面的回忆，就当时我的地位而言，仅能涉及军事方面的阴谋，而且这方面也是不够全面的。但已显然看出蒋介石、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串通一气，蓄意消灭新四军的阴谋毒辣诡计。顾祝同还曾无耻地用“人格担保”，“保证尽力掩护新四军北移”。照商定的北移路线，必须先向南开，经过旌德，转向东开再经宁国以南和广德附近，才能在所谓“掩护”之下，安全北移。而顾祝同竟背信弃义，诬蔑新四军的照约南开为“南窜”，并事先散布“三山计划”的谣言，而且始终坚持不发弹药。上官云相在“事变”前，对所指挥的部队布置，完全置郎溪、宣城、南陵和繁昌的日军于不顾，集中兵力，以七、八倍于新四军的优势，完成由东、南、西三方面的包围形势，在重重的山岭地区设防，步步向茂林进逼，趁新四军北移，猝然进攻，反无耻地说成是“自卫还击”。至于蒋介石与顾祝同直接频繁的通话，顾祝同和上官云

相间的诡秘商量，上官云相对几个主要军师长的面示机宜，都是阴谋中的具体做法和步骤；对这些我虽不知其详，但回忆到“事变”中我的所作所为，已充当了工具，成了主要帮凶，心情万分沉重，更感到罪愧无已！

（原载《文史资料》40期）

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钧鉴：

关于政府对新四军之处置，我党中央曾有严重抗议，并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如下：

(一)制止挑衅；

(二)取消一月十七日命令；

(三)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重当军长；

(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十)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请政府采纳。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特此函达，敬希鉴察。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祖涵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国民参政会公函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公鉴：

关于我党七参政员碍难出席本届参政会事，曾有二月删电通知在案。兹为顾全团结，加强抗战起见，必武、颖超特将在渝所见各方奔走之结果，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附列于后。如此十二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令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此事已得延安我党中央复电同意，特此通知，敬希鉴察。并颂公祺。董必武、邓颖超同启。

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

（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

（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

（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

（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

（五）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

（六）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

（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

（八）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

（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

（十）发还皖南所有被捕人枪；

（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出席代表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付之；

（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共产党七参政员复国民参政会公函

（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

〔新华社延安9日电〕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已于3月1日在渝开幕，共产党七参政员均未出席。其不能出席之理由，已见于2月15日七参政员致参政会删电，及3月2日董必武邓颖超二参政员致参政会公函。3月6日参政会又有电致共产党七参政员，促其出席。七参政员接电后，当于3月8日复电，详细说明不能出席之理由。原电如下：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全体参政员先生公鉴：

鱼电诵悉，诸先生关怀团结，感佩同深。四年以来，中共同人为维护民族抗战与国内团结，心力交瘁，早为国人所公认；中共参政员，对于历次参政会，无一次不出席，亦为诸先生所共见。惟独本次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在。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巨变，其对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一一七命令之后，敌伪抚掌，国人愤激，友邦惊疑，莫不谓国共破裂之将至。中共中央睹此危局，自不能不采取适当步骤，以挽危局，以保团结，乃向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迁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新四军被称为叛军矣，八路军被称为匪军矣，共产党被称为奸党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等惊心动魄之口号，被正式之官府与正规之军队大书于墙壁矣。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耿耿此心，曾有删电致参政会秘书处，略述梗概，当蒙洞察。嗣后参政员同人中颇多从中奔走以图转圜者，泽东等感此拳拳之意，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二人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同时，即以此意通知参政会秘书处，亦未蒙政府置答。泽东等所提善后办法与临时办法诸条件，乃向聘请泽东等为参政员之政府当局提出请求解决，以为泽东等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之标准，政府固有予以解决与否之自由，泽东等亦有出席与否之自由。泽东等爱护参政会之心，今昔并无二致，如能在此次会期内由于诸先生之努力促成，与政府诸公之当机立断，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议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日。泽东等接受政府之聘请，为团结，为抗战也。皖南事变以来，对于国共团结所加之深重裂痕，一日未被消灭，则泽东等一日碍难出席政府所召集之任何会议。泽东等目前所处环境与诸先生不能尽同者，其故即在此。仅布区区，尚希谅察。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齐。

（原载《新中华报》1941年3月13日）

〔附〕蒋介石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讲话

今天已是一月二十七日，民国三十年的元旦快要过去了。在这尚未过去的五天当中，我们一般党政军同志，无论事务如何繁忙，应该将过去一年工作的经过，切实检讨一番，如期报告，而对于今后一年内工作的计划与程序，更要具体确定，努力推进，使我们今年所作的事业，比去年更有进步，更有成绩。大家要知道我们抗战到了今年，已经临到最后胜利的重要关头，因此我们格外要戒慎恐惧，奋发努力，以促进抗战建国的成功。如此，我们才不致因循坐误，以致功败垂成，才能报答我们一般为国家为民族而流血牺牲的将士和全国同胞，才可以上慰总理和一般革命先烈的在天之灵。

关于最近一月以来国际的形势，可以说是一天天好转，对于我国抗战更趋有利，而敌人方面，最近他的国会虽已开会，可以说是寂然无声，所谓宪政轨范者，皆毁灭殆尽。我们看了近卫与松冈对议会所发表的演说，更可以知道敌国崩溃的危机已迫在眉睫，而松冈更扬言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应包括南洋各地，昨天他甚至说日本应统治西太平洋全部，这就是连菲律宾、关岛、中途岛、澳洲和海参崴、北库页岛以及沿海州一带，都要划归日本势力范围之内。他这种狂妄侵略的迷梦愈暴露，就是他崩溃失败的末日愈接近，这是可以断言的。

这两周以来，敌人假借我们新四军案件，造出许多离奇怪诞的谣言，姿意挑拨中伤，不仅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国际间对我国抗战的视听，求逞其侵略中国的迷梦，他这种种谣言，大别之可分二项：一则说自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国家将从此发生内乱，重召分裂；一则说国际上同情并援助我们抗战的各友邦，将因此而转变之对我国的态度。但我们如果将新四军事件发生的经过和敌人所造各种谣言的内容，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种造谣的伎俩，徒然表示他因为看到我们整饬军队纪律，增加抗战实力，因而发生内心的恐慌，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自从抗战以来，全国军民在军令军纪与抗战建国纲领之下，共同一致，奋斗牺牲，只有少数汉奸败类如汪逆兆铭之流，甘心自投于敌阀宰制之下，进行他卖国降敌的傀儡组织，拿分裂或内乱名词来掩护他万恶的罪状。但是他这种汉奸傀儡，完全依附在敌人势力之下，只要我们中国一心一德才能战胜敌人，便可以连带消灭这汉奸傀儡组织。除此以外，在抗战中的中国，就只有执行纪律与服从军令的问题，绝对没有什么分裂，更没有内乱可言，即就我们是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件也很普通，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叛，袭击友军，侵占防地，防害抗战的军队，更必然的须解散。这是抗战治军的天经地义，除非象无法无纪的敌国少壮军人，才会把这件事看做一种特殊而不寻常的事件，故意来作夸大的恶意宣传。再从国际上来说，我们抗战迄今，将近四年，各友邦对于我国始终同情援助，无不热烈希望我们军队纪律森严，实力增强，而决没有任何友邦因为我们要整饬军纪，制裁少数违法抗命的军人和部队而表示疑虑或犹豫的。反之，他们只有关怀与欣慰而已。尤其各友邦贤明的政治家，看到我们的整饬军纪，使我们国家军队更能坚强进步，更没有不表赞助的。因为各友邦肯来援助我们抗战，就是希望我们民族有自立自强

的精神，就要注意我们政府有没有执法治军的能力。如果我们国民只知自暴自弃，我们军人任意毁法乱纪，不从命令，不听调遣，那这种没有纪律的军队没有精神的民族，谁还肯来援助我们，而且我们自身也更谈不到抗战了。因此，可知敌人所造的种种谣言，凡属稍有常识的人，必能明了其用意与阴谋所在，而决不致受其摇惑。尤其我们自抗战迄今，处置违抗命令，触犯军纪的案件，如韩复渠、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类，已不止一次，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破坏抗战，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第一点。

其次，我们当时对于韩复渠、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件是将他三个负责主管长官正法，而对于这次新四军事件，为什么要将他番号取消，部队解散？关于这一点，我亦要向各位说明。因为当时韩复渠、李服膺、石友三，只是其主官本人不服从命令而已，而并没有称兵叛乱，攻击友军的行动。各位应该都已知道，当时中央命令要韩复渠坚守山东，他却不守山东，而偏要擅自退在陕西汉中，想保存他个人的实力。中央命令李服膺在前线抗战，不许退却，他却不遵令前进，反要擅自后退，甘冒革命军的连坐法，至于去年石友三之伏法，亦是如此，当时统帅部命令他移驻豫西，他偏抗命不动，盘据豫东，骚扰地方，勒索人民，但这三个人虽然是违抗命令，而其部队并没有反抗叛变的行动，所以只要将他三人执行纪律，其部队官兵不仅无处分之必要，而且因其官兵皆能深明大义，遵令整编，所以政府依旧爱护保全。但这次新四军一案，就与此不同了。统帅部自去年十一月以来，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驻指定地区抗战，他偏按兵不动，到了最后限期已过，他还要自由向南移动，作一种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明目张胆来袭击第四十师及上官云相的总司令部，实行叛变，所以我们要执行军纪，将他全部解散。由此可知这次解散新四军一案，不过是我们在抗战期中整饬军纪普通之一例而已。并且过去因为违反命令与纪律的部队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以上的将领，现在尚在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之中的，还有十余人，而其中也尚有作战很艰苦曾经立过相当战绩的，但因为后来触犯了军纪，不能不忍痛的交付军法裁判，这就是表示凡是不服从命令，不遵守纪律，不履行作战任务的军人和军队，必须严格整顿，依法制裁。为了全军的生命，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抗战的胜利，是决不能姑息宽假的。同时我们又决不忍轻易判定部下的罪案，致误了我们的将士，使枉遭不白之冤。但自去年以来，新四军违抗命令，违反纪律案件，层出不穷，中央虽一再宽大为怀，剀切告诫，促其觉悟，无如他怙恶不悛，竟至称兵叛变，袭击友军。中央在此情势之下，就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严加处置。但在我个人对此事件，只有悲痛与惭愧，因为部属的罪恶，就是我作长官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耻辱。因此各位须知这不是一件什么可安慰的事，这是不得已的一页痛史。现在新四军事件虽然已经处理，而我国革命军在光荣抗战中间，毕竟留下了一个污点，我身为统帅，我的伤心实在任何人之上。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二点。

复次，我们为什么要如此严格整饬军纪，因为军纪是军队命脉之所在，亦即国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们抗战之成败，就看我们的军队能否执行纪律，而这次新四军之公然称兵抗命，破坏军纪，我们政府能否彻底执行纪律，就是我们国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个关键。因此，我这次抱定决心，要严肃军纪，以挽救全军的危亡，保障抗战的胜利，维护国家的生存。反之，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整饬军纪，任命部队军人违反命令，破坏纪律，那末，军队失败，国家就要灭亡。并且国家付托我以统帅大权，如我统帅个人希图苟安一时，不惜姑息养奸，致陷全军于危殆，那不仅有负职责，而且对不起我们全军官兵和一般已经为抗战牺牲的将士同胞。

并且严格言之，这就无异我统帅纵容部属军队违法乱纪，陷他们于灭亡自杀之途，那这就是我统帅莫大的罪过。因此，我宁使不顾一切牺牲，必须彻底执行纪律。凡属国民革命将士，必须明白军纪重于一切，军纪一律平等，决不能稍有偏袒不公之处，亦不能因为姑息一二少数人而置军纪于度外，以致抗战失败，陷国家于灭亡。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三点。

回忆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初起的时候，有几个朋友劝我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统一，还没有稳固，国防的准备，还没有充实，国际环境更是恶劣，有许多人表面上要求政府抗战，而实际未必是诚意来拥护抗战，所以我们还不能对日作战，否则就是冒险，怕要失败"。我当时就答复他们说：诸位对于抗战问题，不能作这样看法，须知现在我们政府是革命的政府，我们的军队乃是革命的军队，我们国家与军队的力量，不是单靠武器装备来与敌人较量，我们的抗战也不能顾虑到抗战以后可能发生的困难，而主要的关键，是要问我们有没有革命的主义，有没有革命的纪律，我们革命的精神如何，决心如何。如果我们自认是有革命的主义，有革命的纪律，有革命的精神和牺牲的决心，我们自问是诚心诚意为国家为民族生死存亡来抗战的，那我们就可毅然决然的对日抗战，而且这个抗战，必然是胜利的。至于国际形势之优势，这就全看我们本身的奋斗能力如何，如果我们只待国际形势好转，方敢抗战，那我们革命就永无成功可能。须知国际环境，是要由我们革命行动来创造来转移的。如果你只待机株守，那我们国家既到了如此危急存亡地步，就无异束手待毙。因为我们对日抗战，乃是革命，而不是投机取巧的。我当时还简切明白的告诉他们两句话："我们既要对外抗战，就不怕国内变乱，如怕国内变乱——就不能对日抗战"。他们知道我既下了决心，也就赞成我的主张，再无丝毫顾虑。到现在抗战将近四年，敌人已日趋失败，我们已胜利在望，就可证明我当时的决心和主张完全正确。所以大家要认清我们这次抗战，对国际始终要自爱自重，不辜负友邦的期望和援助，而对国内只有森严纪律，加强实力，以求自立自强，绝不致有发生内乱的顾虑。如在抗战期中万一不幸发生军队叛变之事，那也只是叛乱而已，只要我们依照国家的法令与军队的纪律，来严格制裁，彻底纠正，以维护革命大业，维护国家命脉，凡是自信为挽救国家复兴民族而努力的任何党派与国民，我相信其决不致因政府执行纪律而有所怀疑。我们政府不仅对于敌人具有抗战的实力，而且对全国军民具有整饬纪律贯彻命令的精神，唯有严肃的纪律和统一的命令，才是我们国家生存的保障，也才是我们最后胜利的基础。

大家都晓得，我们国民政府是革命政府，革命政府是能严整法纪，并能打破任何险恶环境与镇摄任何变乱的。我们从民国十三年到民国十五年北伐为止，如果我们因畏惧内部叛变，而放弃革命职责，那我们革命军就根本无从北伐。凡真正的革命者，在其革命过程之中，必须遭遇种种艰险挫折，但必能坦然无畏，而且应付裕如，无往不克。本来世界无论那一国的革命军队，皆难免有叛变之事，最紧要的，就是看这个政府是否真正的革命政府，有无制裁叛变的精神与力量。如果这个政府能本乎革命精神与革命纪律，将叛逆——尤其是武装的叛军——加以制裁，那就是革命的胜利，就可以促成革命成功。本席今天可以明告各位：我们中国国民政府，今天不仅具有维持法纪的精神，而且确有制裁叛军的力量，决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内战。何况当此敌寇深入，国家垂危的时候，我们正在拼全民族的力量，以与日寇作殊死战，我全国军民上下，凡具有民族观念和爱国心者，莫不拥护政府，效忠抗战。我们生死荣辱，真是整个一体，除了如汪兆铭汉奸之流，以分裂与内乱的形式来进行他降敌卖国的罪恶以外，再无如此丧心病狂者来破坏抗战，出卖民族，作千秋万世的罪人。

还有一点，我们此次之所以制裁新四军，有其不得不执行的原因，自从此次新四军事件发生以来，敌阀造作种种幸灾乐祸的谣言，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总括他们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中国的军纪废弛，军队变乱，以致国家根本动摇，而自陷于灭亡的地步。因此，我们此次对于新四军如果不能彻底制裁，整饬纪律，那不仅我们全国军队的抗战，将无所依恃，而且更要使敌人轻视我们民族正气，侮蔑我们革命的精神，就更将增高其侵略的狂焰。但是我们现在以事实和行动公开的来答复他，这就无异对敌阀作一次最严重的打击，使他们无所施其挑拨离间的伎俩，使他们知道我们全国的军队是有革命的纪律，有革命的精神，有民族的观念，决不是如它希望的无精神无纪律，可以被他们利用，来助他们侵略的迷梦的。我可以正告敌阀：这一次我们政府处置新四军，你们断不能收到什么乘火打劫侵略的利益的。反之，我们的纪律，从此将更森严，我们的抗战精神，必须奋发，我们全军的意志，必更紧密，必更统一，也必能振作，正与你们所预期的相反，简单一句话，是决不会于你日寇有利的。所以从这一点说，我们此次制裁新四军，就是打击敌寇幸灾乐祸的心理，亦即是保障我们民族爱国的精神。至于就我们国内而言，我们为了增加抗战的力量，森严抗战的阵容，对于违犯军纪，不从军令的部队，当然要依法制裁；否则，政府姑息隐忍，不敢伸张纪律，以至是非不明，功过不分，那我们抗战的力量，就要完全瓦解，我们军队的精神，就要完全丧失。所以我们为增加抗战力量，团结全军精神，与求得最后胜利，对于此次新四军的叛变，自不能不严加制裁，来维持我们抗战革命的纪律。

讲到这里，各位就可以得到明白的概念，就是新四军事件的处理，本是极平常极普通的一件事，也是我们抗战治军中必要的处置，所有一切夸大的宣传和恶意的推测，乃至企图耸动国际视听的谣言，我敢说完全是出于敌寇日阀之所为。我并且相信我们衷心爱国效忠抗战的任何国民，不但不为敌谣所迷惑，且亦断没有一个人会跟着附和，以为是怎样一件了不得的事。在这一次解散令快要发表的时候，新四军方面为要减轻他们的罪恶，也曾辗转设法，造出种种的危言和怪诞不经的传说。我当时就派人间接的剀切劝诫他们，一错不容再错，既为中国国民，就必要拥护抗战利益，新四军在江北江南所作违令干纪的罪恶，政府事前不来宣布，乃是爱护他们，而不是姑息，更不是怕事，现在你们已犯了称兵作乱攻击友军的大罪，如果还要无中生有，诬蔑上官，诋毁政府，不惜毁坏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种行为，这种企图，我们同胞一望而知是敌人和汉奸之行为，不然也正是敌人之所喜，这样不但不能掩饰你自身的罪恶，而且必为艰苦抗战的全国军民所唾弃，你们更无立足的余地了。吾人真爱国家，就要诚诚实实，尊重法命，接受纪律，补过自赎，以求有利于抗战，才不愧为中国国民。我说这一段话，实在是指示我们国民应有的义务和应守的本分，后来这种危言也就绝迹。我相信黄帝子孙，断没有一人甘心为敌人张目。所以在今天，如果还有将已解决了的新四军问题，辗转传说，夸大其词的，那就只是为敌人的造谣作应声虫，凡是我国军民，是断不会受其迷惑的。而且我相信一定是断然予以唾弃的。

大家要晓得，我们为什么过去不将新四军这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宣布呢？因为新四军乃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而本席乃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我常说我们国民革命军就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平时看待自己的部下，犹之于家长之看待他的子弟，子弟良好，固然是家长的荣幸，如果子弟不良，亦就是家长的耻辱，因之新四军过去虽然有种种罪恶，我总认为是我统帅的责任，为了克尽自己的责任，为了爱护自己的部下，我只有不断的警告，随时的督责，总希望他们觉悟自新，能走上革命成功的道路，真正为国家民族来努力，而不愿将他们的罪

恶揭露出来，以致断绝他们自新之路，而使他们为全国军民所唾弃，这是我所不忍的。可是我这种苦心，并不能感动他们，而反以为中央是柔弱无能，甚至以为我对他们有所忌惮，竟以影响国际视听与分裂内战为宣传，更不惜使敌人知道我们内部的弱点，用这种手段来相威胁。试问一个部下的行动放肆跋扈，荒谬绝论，其用心之恶劣，乃至不惜以对敌人揭发本军弱点为工具，来恫吓上官，如此倒行逆施，还可容忍吗？其实新四军在长江南北种种对中央违法乱纪的行动，敌人何常不知道，而且比我们知道或更明白些，所以我们决不是为怕敌人或国际间知道而不敢宣布他的罪状。我之所以始终隐忍，还有一点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中国社会，无论对朋友对部下向来有一个最重要的道德，就是“隐恶扬善”本席平时待人，向本此旨，何况自己的部下，于公谊为袍泽，论私谊如家人，部下的荣辱，就是我上官的荣辱，部下的功罪，就是我上官的功罪，所以他们的过失，只有由我自己担负起来，非到万不得已，决不情愿宣布。但是他们违法抗命，破坏抗战，到了如此程度，那我还能隐忍姑息么！如果再不出以断然制裁，就要动摇抗战国策，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大家看过圣经新约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条，训勉一般人，对于罪人，须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的罪过，而现在新四军的罪过，早已超过了七十个七次以上。我们就以耶苏的宽大为怀对于这种怙恶不悛，执迷不悟的军队，也决不能再隐忍，再饶恕，否则就是我们自己犯罪，就是我们贻害国家，要成为千古罪人了。

大家更要知道军纪是全军上下共同心理所公认共守的信约，没有阶级的区别，没有特殊的例外，也不能有偏差的待遇。上自统帅，下至士兵，在军纪之前一律平等。如果有人违犯军命，破坏军纪，而统帅因循苟且，甚至姑息养奸，不能依法制裁，那我统帅就不能辞其责任，全国军队亦就无法抗战。所以我们为求得抗战的胜利，为保障国家的生存，不能不尊重军令，整肃军纪，使全军上下一致了然于军纪的森严。大家在森严的军纪之下，共同效力于神圣的抗战，来完成我们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使命。大家都晓得敌国——日本——为什么到今天要陷于泥淖的深渊，不能自拔，就是因为他一般军人目无国法，军纪扫地，而他的政府又没有维护国法，执行纪律的能力，以致要陷敌国整个命运于今天这样溃乱自杀的境地。他们发生“九一八”的事变，就是由于一般少壮军人自由行动，不服从他天皇的命令，不遵守他政府的指示，肆行侵略，漫无忌惮，而他们政府，亦没有制止的能力，因此继续的有他所谓“五一五”的事变，演成现役军人惨杀他内阁总理的罪行。军人坏法乱纪到了如此地步，而他的政府仍不敢执行法纪，不敢照律枪决他的罪犯，因此更有他所谓“二二六”的事件，竟在他的首都东京发动叛乱，杀害元老重臣与重要阁员，乃至占领他的议会，捣毁他的政府，到了最后，所以就酿成七七事变，挑起东亚从古未有之战祸，来摧毁文明世界的基础。这都是由于敌国军队败坏军纪，敌国政府不能整饬纪纲之所致。但是敌军到今天之所以还能暂维现状，还能在我国继续作侵略战争的原因，还是靠着他们军部仍能保持着服从命令的习惯。敌军官兵，纵令心中厌战反战，不愿作此侵略无益的战争，而仍旧勉强服从作战命令，我们可以说，敌国纪纲荡然，而他前线军队还勉强维持着战斗纪律，这就可见争死生于呼吸的战争，全靠指挥有效与命令贯彻。敌军“师出无名”的侵略战争，而他的官兵，尚且不敢抗命，何况我们此次抗战，完全是为抵抗敌人的侵略，为保障民族生存而战，我们全国军民更应该如何自动觉悟，不惜生命，达成任务，来维持国家纪纲与军纪的尊严，然后才能保障我们抗战的胜利，求得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平等。只要我们全国各部队，从此以后，严守纪律，服从命令，遵照统帅部所规定的计划和指定的任务，切实执行，我们政府必定一视同

仁，扶持爱惜，使他们都能在抗战历程中有所贡献，而获得光荣的成功。现在新四军番号既已取消，这个问题自然是完全解决，再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们政府向来是宽大为怀，对于任何部队无不加意爱护，至于我个人，居全国统帅的地位，好象看到自己的子弟，受到这样不名誉的处罚，只有悲痛，只有惭愧，希望全军上下，大家要把此次事件视为我们国民革命中最大的耻辱，视为我们抗战史上最可伤心的一页，要以新四军为殷鉴，从此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不侵犯友军的防地，不防碍友军的任务，不勾引友军的士兵，不劫夺友军的械弹，不收缴民枪，不没收民粮，不骚扰地方，不杀害人民，而且更进一步要全国军队皆能保护人民，安定社会，尤其对于在沦陷区的民众，格外要尽力爱护，使得我们全国军民亲爱精诚，团结一致，那末，由于此次新四军事件所留给我们的悲痛而激发我们全军上下抗战建国的信心，自能因祸得福，更可以造成我们国民革命军全军将士的功业。

总之，这次处置新四军事件，完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主要的意义完全为加强抗战。语其要点，就是：(一)打击敌人忌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二)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得所观感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因为第一点，如果敌人知我国有自由行动，妨碍抗战，残害友军的军队而可不与制裁，则其轻侮我国家藐视我军人更将甚益，而侵略野心，亦必将从此更炽，现在我们断然执行纪律，加以制裁，依法解决，敌人就没有幸灾乐祸的余地。第二点，如果我们所有军队，都知道政府以前隐忍的苦衷，是为了抗战，今天执法如山，也是为了抗战，大家都以此次事件，引为殷鉴，就不会再有违令干纪的行动，从此全军一致在拥护军纪服从军令一条心思之下来抗战，再不会延玩命令，再不会袭击友军，以至吞并防区，扰乱地方，陷害人民，那就是国军精神上走上进步的道路，而加强了团结，也加强了抗战的实力。要知道命令的贯彻和军纪的执行，是保证抗战胜利最重要的关键，也就是国家生死存亡之所关。政府有没有抗战的能力，是不是具备革命性，视其能否执行纪律而定。军队有没有保卫国家和抗战建国的诚意，亦就要看他能否遵守纪律与接受纪律而定。唯有严守纪律服从命令的军队，才是抗战的真正力量，必为政府与人民所一致爱护；反之若不听命令，蔑视纪律，放弃作战任务，甚至侵袭友军，侵占防地　减少抗战力量，此种军队若听其存在，则国家就必致灭亡，不仅抗战不能成功而已。

最后，我要各位注意："政府此次制裁新四军，既然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这次处置新四军，纯然为制裁违抗命令危害抗战的军队，对于其他遵守命令努力抗战的军队，固毫无关连，也绝无什么政治性质。现在抗战期间，凡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之一切个人团体和党派，政府绝对尊重，其应有之自由与独立之人格，而予以法律之保障。只要不是利用武装军队抗拒政府法命的行为，就使偶有牵涉法律的问题，政府亦必根据法律正当手续来处置。我常常对一般朋友说：我们抗战到现在，虽然胜利日近，但还不能说已经脱离危险时期，当此生死成败的重要关头，全国上下格外要小心谨慎，不好有一事轻举妄动，否则就要使我们抗战建国的大业功败垂成。但是政府绝不能因小心谨慎之故就事事将就，苟且偷安，甚至有责任也不追究，连纪律也不执行。这样，国家根本既坏，革命亦必无成功之望。政府这次所以忍痛制裁新四军，其原因就是如此，其意义也就在于此。希望全国军民，同心一致，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共同协力，克尽职责，来完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达到我们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只要我们大家集中心力，积极担当伟大的抗战任务，我相信，我们抗战光明的前途，就在目前了。

(原载大公出版社出版：«中共重要问题文献»)

〔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通过的反共决议

（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

严厉整肃军纪：对外作战之胜利，以国内军政军令统一为前提。若内部各军不听调遣，不受指挥，甚至自由行动毁法乱纪，必致内削国力，外为敌人所乘。十八集团军违反军令破坏抗战及前新四军叛变之发生，实为抗战以来之不幸，同人深感国家纪纲之重要与军令之必当统一，军纪之必当严肃，本会应有至严正之表示。今后建国之方针，端在遵行蒋委员长对本会昭示军队属于国家之训，使全国一切军队，立于统一军令，统一指挥，统一经理之下，其有毁法乱纪，违抗军令者，自亦不容姑息，立于制裁。

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一）从去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开始的新的反共高潮现似已告一段落，而走向低降。

（二）这一反共高潮可分三个发展阶段：

甲、何白之皓电及齐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并在军事上，政治上，舆论上，积极对我进攻，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开端。

乙、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革命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并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是这次反共高潮的顶点。但国民党即因此受到国内外各方的非难，而我方则得到国内外广大同情，使我党能在政治上转为攻势，而彼方则转陷于防御地位。

丙、到三月一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开幕时，蒋介石曾用极大努力，诱骗我出席参政会，为我方坚决拒绝。彼方乃在参政会通过一个反共决议，以掩饰其面子，实则已为退兵时之一战。

（三）顽固派敢于发动这次反共高潮，是依据如下估计：

甲、正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后，英美苏均在财政上，军火上加强援华抗日；而日本也在经过亲日派及各种表示积极拉蒋。故蒋估计当时国际形势于彼极有利，反共不会遭到英美苏的反对，又可取得日本谅解，不向彼进攻。而到春季后国际形势将生变化，故决定此次高潮要在德意日春季攻势以前结束，而在此期间内将我党在华中力量压到华北去。

乙、因我们佳电（十月九日）所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态度，以为我们不敢破裂，可以逼迫让步，并各个击破。他们认为如不在此时压服共产党，将来就无办法了。

丙、这次反共高潮，是在蒋桂（地方反共派）何（亲日派）联盟下进行的。桂系参加反共，是使蒋介石敢于发动此次高潮的实力上的原因。

（四）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使反共顽固派冲昏头脑，发布一月十七日命令。蒋介石没有料到我们敢于和他的反革命命令采取尖锐对立的态度，于一月二十日发表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和谈话。又没有料到英美两国舆论发生如此大的不赞成的反响。又没有料到华中大举剿共的军队会遭到敌人的扫荡，破坏他原来的计划。又没有料到全国最大多数中间派及进步派人士及海外华侨都站在我们方面来非难政府的举措。上述原因，逼使蒋介石在政治上从进攻转为防御。蒋在一月二十七日演讲，已在力图使事件缩小范围，申明只限于军令军纪，不牵涉党派与政治问题。

（五）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开会的前夜，蒋曾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诱骗我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以粉饰皖南事变以来抗战营垒内存在着的重大裂痕，和减少国内外各方对蒋的非难。为此企图，他曾动员了重庆国民党全体和参政会的八个小党派来包围我们让步。我们则以三月

二十日的新十二条，打退了他这种企图，坚决不出席，这对蒋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六）中间阶层在这次斗争中的立场，是动摇不定的，但依然处在中间地位。十月十九日以后，他们是站在中间立场，劝我们让步，主观上对我们好，实际帮助了蒋。我们为争取他们及全国人民，采取了佳电的态度。在一月十七日以后，他们完全同情我们，表现了从来没有的好。但在参政会开会期间，曾对蒋允许他们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各党派公开活动问题发生幻想，又恢复到劝我让步的立场。这些中间派，可以大别为三类：一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救国会及第三党，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黄炎培、张澜等，对大资产阶级不满，但在紧急关头，便成和事老；一是失意政客，如张君劢、左舜生等，希望从国共纠纷中谋自己升官发财的利益。得了参政会主席团时，面孔就变了。但因他们都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等正在发起组织“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所以仍是一种中间地位。

（七）目前国内外的情势，已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缓和一下这次反共高潮。第一是日蒋矛盾没有解决，不可能同时抗日剿共。第二是国际的压力，不仅英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蒋发动内战，放松抗日，还有苏联援华的力量及态度，也使蒋不能不慎重考虑。第三是我们坚决态度，使他顾虑到全国分裂的危险。第四是蒋部下的政学派幕僚派及某些重要将领如陈诚、汤恩伯、张治中、卫立煌等对今天反共军事行动并不积极赞成。而桂系在这次反共行动中，并未得利，反受损失（一部分地盘被蒋系夺去），蒋桂矛盾正在发展。故蒋表面虽在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通过反共决议，但参政会仍选董必武同志为参政会常驻会员。蒋并约周恩来同志谈话，表示许多小问题都可以提前解决（如释放被扣人车，可以继续发饷及减轻对新华日报压迫等）。

（八）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我们以佳电迎接了他的开始，以一月二十日的攻势（老十二条）对抗了他的高潮，以三月二日的新十二条，打退了他在参政会上的最后一战。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并由于蒋的直接出面反共，被迫着一改过去隐藏在幕后反共的态度，使广大群众过去对于蒋的幻想开始消失，蒋之狰狞面目由蒋自己大大揭露了。这是蒋的最大损失，他现在已感到有重新改变这种态度的必要。

（九）这次国共斗争是两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皖南事变引起全国及全世界人士的注意，中国共产党更加成了中国团结抗战的重要因素，我党的地位已提高了。这次反共高潮的打退，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将产生严重的意义。他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蒋介石在这次反共高潮中的失败，使他在今后再要发动这样的高潮更加困难，使他不能不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与态度。

〔附〕宋庆龄等为皖南事变致蒋介石书

蒋总裁暨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诸同志：

抗战进入第五年度，敌人失败之局已定，国际于我有利之势以成，今年已迫近最后胜利

年，我国人自当坚信而共作决心以赴之。惟是日寇失败命运之决定，并非即我民族解放之最后完成，我之抗战尚未脱离危机，仍须经历更大之艰难困苦，则诚为总裁今年元旦所昭示。溯自我党前年临时大会确定抗战建国纲领以来，明示国策，为建国而抗战，亦为抗战而建国，实即指示最后胜利之机，系于国内种种适宜之设施与措置。如被沦陷区域之收复，被凌压人民之解放，三民主义之实现，国家民族独立自由和平地位之达到，均将以此为基点。然而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闻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堕于一旦，而时势所趋又非昔比，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有不堪设想者。

夫共党问题，原为世界性之问题。世界之病态不除，此种势力组织必存在，我总理早已揭示其端。此种世界性组织，既由世界资本主义影响之所及而存在，既或以武力作一时之侥幸之解决，仍必复生滋长，决不能以人力加以消灭，已为无疑之问题，此一义也。我总理过去提携共产党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伟谋远见，无待赘言。是以总理临终时曾致书苏联其本旨外在联合苏联，而内在训示吾人应以国内和平合作团结互助为重心，各同志对此当能念念不忘。今自日寇欲沦亡我国于殖民地，日寇为我党之敌人，也正为共产党之敌人，敌人之死敌亦即为我之良友，则我党不宜以如何消灭共产党为决定政策之出发点，实亦毫无疑义此又一义也。今日之中国共产党既在我政府领导之下，则俾其发展所长为我党之他山，成抗战之干城，此正合于总理天下为公之怀抱，亦即切符总裁昭示国人发挥国家无限潜力之意旨。是则无碍我党，有益国族，又更为目前迫切之要义也。

且党派问题，决非处理共产党一党之问题，而为处理我党以外各抗日党派之一般原则。各党依法自由发展，本为民主国家当然之定则，而各党各派在同一革命目标下不互猜忌，尤为我国在抗建时所必要。我党领导革命以进于创行宪政，权之所在，责无旁贷。今日大敌在外，内已一致，一切问题，在乎发展内容，而不拘泥形式，在乎统括大体，而不苛求枝节。设使有力于此无从运用以对外，迫而施之于内，以竟生存，在我为自孤其势，在人且将谓我领导无方，殊非我党诸同志之始愿。为期中国革命之完成，为保我党领导于不隳，要在示人以宽，感人以诚，动人以德，处人以信，我总裁及中央诸同志，知必已筹虑及之。

更有进者：总裁屡次训话，敌人所欲我者，我当避免，敌人所不欲我者，我当坚持。今日敌人既濒败境，惟欲我抗建实力之消弱，以至于消灭，于是惟欲我发动剿共以造成无限制之内战。而在我痛心敌人以战养战之阴谋，应从扶植沦陷区域各种抗日实力入手。力避敌人以华制华之毒计，当于保障国内绝不酿成分裂开端，盖已成为莫可争辩之关键。诚如此，国内前后种种磨擦事件，无因而生，敌人近来种种谣言攻势，不攻自破，总裁所痛恨过去敌人之挑拨离间脔割分裂政策，将永无实施机缘，功罪之分，成败之界，至为明显，匪独国人所深知，抑亦敌友所均悉。

我总理遗训，唤起民众，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至理昭垂，于今尤为切合，总裁所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日救国之责任，早已普及深入于国人之心，乃有胜利抗战，以进入第五年度。今年成为我国最艰辛最重大之一年，而剿共问题，恍若迫在眉睫，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又因以便利敌人之乘间抵隙，不得不有望于总裁暨中央诸同志之毅然决然，进谋国内和平之巩固。窃以为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一举手措足之劳，即可转

定抗建基础，安如磐石，至于共产党所言所行，苟系有违国人公意，必不为国人所爱护，何须施以武力。如其有力可用，我党自应询国人公意，而加以爱护导之于有用之地，亦无所用其危疑。我党政策彰彰在人耳目，如何发扬广大，责任在我。凡诸所陈，率兼爱国忧党之衷心，希垂察焉。

宋庆龄　柳亚子　何香凝　彭泽民

一月十二日

（原载《皖南事变面面观》）

〔附〕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我全民族英勇抗战已近四年，赖前线数百万民族战士及全国同胞的艰苦奋斗，已经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然而敌寇汉奸，民族败类，正出其全力，作最后的挣扎，以图挽救他们溃败的命运。所以胜利虽已在望，但是毋庸讳言，抗战已进入更艰苦的阶段，面临着更严重的危机。

日本帝国主义者近正集中全力，以求结束"中国事变"而遂其巩固亚洲大陆根据地，解除南进绊脚石的迷梦，并进而实行参加再分割世界的第二次大战，这表现在军事方面的特征是：各战场配合发动攻势，加紧"扫荡"，寻找我主力，企图给予致命的打击，动摇我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这表现在政治方面的特征是：一方面表示积极扶植傀儡政权，诱致妥协分子及失败主义者，加速投降的步伐；另一方面则散布各种烟幕，采取一切手段，促成中国内部的分裂。这表现在外交方面的特征是：以苏、日中立协定为烟幕，企图勾结我民族败类，煽起反苏空气，而破坏抗战以来中、苏间的亲切友谊，以暂缓南进为香饵，企图离间英、美在远东的平行行动，而改变其援华政策。这表现在经济方面的特征是：扩大封锁，流窜掠夺，疯狂轰炸，企图由此遮断我国际输给线，耗竭我物资，并窒息我工业生产机能，从而使我经济无法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者，这些阴谋和策动，自将多少增加我抗战的困难，实不容忽视的。

然而今天祖国抗战所遭逢的危机，不仅在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集中全力以结束"中国事变"，而尤在于国内根本的政治问题始终未曾获得合理的彻底解决。四年来的事实，昭示我们，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必须团结和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主要的条件是实现民主政治。这是全国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一致要求，不幸这一要求显然并未获得积极的反应。由于政治的不进步，民族统一战线只具形式，没有内容，不仅未能逐渐巩固，反而每况愈下，纠纷时起，党派摩擦事件层见迭出。由于政治的不进步，培养反攻的新生力量既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在若干抗日部队间，复强分畛域，以致抗战力量，蒙受牵制，甚至互相抵消。由于政治不进步，战时经济政策无从确立，因而影响到战费的筹措，影响到一般人民大众的生活。总之，由于政治的不进步，一方面未能使全民族的每一分力量组织到抗战中去，而予侵略者以最有效的打击；另一方面则妥协分子及失败主义者，随着抗战的更趋艰苦，而大施其破坏团结，挑拨

内战的伎俩，与日、汪的阴谋遥相呼应。目前正是祖国抗战能否迅速取得最后胜利，而且是能否继续抗战的重要关头。

民族解放战争是一个伟大而又艰苦的事业。在抗战过程中必然会不断遭遇新的困难，产生新的危机，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抗战必须获得胜利，而且是一定能够获得胜利的，因为只要有决心，有热情，有诚意，发挥全民力量，纠正种种缺陷，则困难必然可以克服，危机也必然可以解除。四年来，全国成千成万的文化工作者都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各就自己的岗位，在前线，在敌后，在大后方，不顾任何艰难，不辞任何牺牲，为祖国的自由与独立而战斗。文化工作者，对于督促政治进步，宣扬抗战国策，加强内部团结及激励军民抗战情绪，曾尽其最大的努力，这也是不容湮没的。

然而在这四年来，曾不断发生痛心的现象，至最近而愈烈。他们在工作上受到种种阻碍、嫉视、压迫和摧残，行动失去自由，生命遭遇危险。过去在南北各战场艰苦工作，鼓励士气，团结军民的政工队，服务团，演剧队，宣传队等，或被无故解散，或被勒令改组，或奉命停止活动，既不考核功过，也不宣布罪状，服务于各学校机关，各社团的公正人士与优秀青年，一举一动，都受“特务”的监视，根据片面的报告，就有名列“黑单”的危险，拥护团结，坚持抗战，力争进步的书店、报纸、杂志、通讯社及其他文化团体，则封闭的封闭封锁的封锁，甚至无故拘捕工作人员，因系经年累月，不经公开审讯。在兰州、西安、洛阳、綦江、曲江等地，则竟有所设“集中营”和“劳动营”，成为伤害青年身心的修罗场，无数纯洁的青年男女，因同情于进步光明，不满于倒退腐化，即被认为大逆不道。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政治上的逆流，更有急转直下之势。即以中外观瞻所系的陪都重庆而言，就有许多无辜而告“失踪”的青年被送入“防空洞”。而且不仅知识青年的自由安全毫无保障，甚至年高望重为中外人士所敬佩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也因暴露发国难财者的罪恶，坚持“有钱出钱”的战时经济政策，而被“遣送前方考察经济”。马先生的下落迄今音讯杳然。其他可悲可骇的事情，仍不胜枚举，但我们不忍尽言！我们所以不得不举出上述几点，无非要使吾同胞明白国内政治环境的一斑，而群策群力，共图挽救。

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文化工作者。在这样的政治逆流之前，在这样的倒退情形之下，向来在海外为祖国抗战文化而努力的，固已竭尽智力，贡其棉薄；而在后方坚守自身岗位的则对于最近的痛心现象，缄默于心不安，工作于势不能，不得已忍痛出走，寄身海外，而，耿耿此心，始终未忘为祖国之光明而奋斗。我们对于祖国抗战的前途，一点也不消极，一点也不悲观。因为从四年来参加的实际工作中，我们深切了解全国军民的进步，民族意识的觉醒，已使中国成为不可征服的力量。只要能够坚持抗战，只要能够确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只要能够在政治上力求进步，以保障团结的巩固，我们相信今天的局势虽属万分危急，然而凭着中国民族得天独厚的潜势力与抗战以来已有的进步，必然能够渡过此最艰苦的阶段。这是毫无疑义的。

今天令人痛心的另一现象，是国内的政治逆流，逐渐向海外侨胞中间扩大其影响。对于身居海外拥护抗战的文化工作者，对于坚持团结抗战，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忠贞爱国人士，或称为“异党分子”，或竟诬为“汉奸”与“第五纵队”，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企图由此掩饰国内政治上的倒退黑暗现象，隐蔽抗战危机的严重性，讳疾忌医，杜塞进步之路，而对于潜藏在抗战阵营中的汪逆残余，以及佩戴各种面具的主张妥协分子反熟视无睹，任其混迹市潮，危害国家。对于这种现象，各党各派明达公正之士，固已屡上诤言，即文化界同仁亦曾

一再呼吁，冀蒙采纳。然而效果未睹，逆流反炽，蒿目时艰，痛心已极，而又不敢自弃国民天职，所以不得不大声疾呼，希望唤起舆论，督促政府，共谋匡救。

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为了保证抗战胜利，我们提出下列几项原则，作为我们对于改革政治的最低度的主张：

第一、坚持抗战国策，求其更须彻底。抗战虽已四年，国土沦丧已五分之二，将士人民捐躯死难的不可胜数，然而和平传说，妥协空气，有如定期的虐疾，年必数至。我们固深信政府抗战之决心，然而我们亦不得不忍痛以告同胞，迄今抗战阵营中尚潜伏若干妥协主和分子，道路指目，当非空穴来风。故要彻底坚持抗战，必须肃清此等分子，而示天下以大信。

第二、团结须更具诚意。今日口头上无人敢言分裂，无人不吁求团结，然而事实昭示我们，欲求团结之巩固，必先除去阻碍团结的障碍。举其原则言之。一为必须取缔一切助长分裂的宣传与行动，二为遵循民主方式，开诚布公，以谋抗日各党各派间的精诚团结。

第三、民主政治须即实施。尽速成立战时真正民意机关，集全国优秀人材，共主国家大计。“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党员包办及用人先问其是否党员的作风，必须迅加纠正。关于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应予以确实充分的保障。

第四、确定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一国的外交须以民族利益为绝对的前提，不应追随人后，供作尾巴。我国今当全民抗战之时，固当争取一切外援，以增强我抗战的实力，但是对于助我独多的国家，更当力谋增进彼此间的友善关系。最近一般别有用心之徒，抓住苏日中立协定，而以各种方式煽动反苏宣传，其处心积虑，正要使我与援我最力的苏联关系疏远，而遂敌人的狡谋。是故确定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在今日已为迫切之举。

第五、严惩贪污，整饬官常。贪污横行，官常败坏，在今日已为公开的秘密。民怨沸腾，半由于此。今大多数的小民，不得一饱，而发国难财者多则十余万万，少亦数十万，道路指目，人心离弃。过去政府虽有所惩治，然仅窃钩者诛耳，神奸巨滑，未损毫末。今宜昭示大公，严惩著名贪污分子，没收其财产，以裕抗战军费。

第六、对改善民生，宜迅作有效的处置。战时社会经济，应以国防需要及军民生活为前提，应切实执行有钱出钱的原则，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彻底实行平抑物价，安定民生，绝对制止私人垄断，囤积居奇，权贵巨宦，有恃无恐尤须严惩，以平民愤。

第七、解除抗战文化的压迫与封锁。应即启封无故被封的书店、报馆、通讯社等文化团体，解放无故被捕的工作人员，废除摧残青年的集中营，使数万有为青年重新担任抗战工作。取消教育特务化的恶劣办法，以保障讲学研究之自由，保全青年之纯洁人格。

第八、特务工作必须改变方向。特务工作应以对付敌伪，不能用以统治人民。人权应受法律的保障，人民如有犯罪，应依法审判，不能以特务机关代替法庭，而开宵小假公济私作恶之门。

第九、应确实保障侨胞回国投资，及回国参加抗建工作的安全，保证侨胞捐款的合理运用，制止达官贵人在海外豪奢之生活，以慰节衣缩食踊跃输将的爱国侨胞。

以上诸端，我们认为当务之急，由之则全国团结必能加强，军心民心必能巩固，抗战必得最后胜利。国事至此，万不能再事因循，深望领导抗战之领袖与政府，以大勇大公之心，毅然决然，当机立断。但使政治进步有望，则我们不但对目前之流离与诽谤，视为无物，即使粉身碎骨，亦甘之如饴，至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我们无时不准备重返祖国，今虽身在海外，亦不愿自安于明哲保身，愿始终坚

守文化岗位，追随海内外同胞之后，力争祖国之进步与光明！

韬奋、茅盾等九人

民国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转自《韬奋文集》（3））

〔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①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今次成立，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同人等愿将此次结合动机及今后旨趣，作简要之叙说如次：

同人等从国人之后，奔走国事盖有多年，从来所见国事好转无逾今日者。第一，中国受外患侵凌数十百年，浸贫浸弱，几绝翻身之望。而今则对抗强敌既越四年，举世刮目相看，信为不可征服，民族自信亦以永固。以此基础，值兹国际反侵略声势日盛之会，解脱枷锁，要不难期，此从来之所未有者一也。第二，国内苦于不统一久矣，自民国初建以迄抗战之前，扰攘几无宁岁，国力之所用，不以对外而日以对内，不以求进而日以事破坏，我民族生命，其不毁灭于此者几希。而今则以同仇敌忾之故，地方对于中央，各党派对于执政党，无不竭诚拥护，上下内外居然统一气象，此从来之所未有者二也。凡此二者，固皆国人之所共见，是人心曾不以失地过半而有所动摇。

虽然，国事好转诚在最近之四五年，而其间前后又有不同，大抵国际情势后胜于前，而国内情势则入后转不如初，此其事亦皆在人耳目，无烦缕指。要而言之，国际阵线方明朗有利，外援渐增，而在我则反不得协力制敌，甚而至于内力相销，本末相衡，可忧实大。时机坐失，宁可复期？

同人于此，曾本严正之态度，为宛转之尽力，而卒未有补。瞻望徘徊，深惧国不亡于暴敌，功不败于寡助，而顾由吾人自丧其前途，是真民族之不肖子孙，上无以对先民，下无以对后世。同人因是不敢以无补时局。自息仔肩。爰自为结合，以作团结全国之始，将以奉勉国人者，先互勉于彼此之间。以言结合动机，端要如是。

同人对于时局之主张，汇为纲领十则，散布于世，将准此以致其力。十者无烦一一剖释，而有扼要一言必愿以陈于国人之前：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尽人可晓。而统一之道果何在，亦盍取三十年间事而深长思之乎？民国以来统一之可数者，元年革命成功，一度也；五年恢复共和，一度也；十七年北伐完成，一度也。每一度各有人心同趋者，其统一实为国人意志之统一。武力于此为统一之具，而非统一之本。最后统一，莫

①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6月成立。同年9月18日在香港出版"光明报"，同年10月10日于该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又称十大纲领）。

著于抗战，而为意志集中之结果，尤彰彰矣，今则并此统一之具，亦未尝用也。凡此事实，宁不足以资人深省！更转看此四五年间，统一气象后不如初者，其几之动，毋亦各恃其力，而有忽于人心之向背耶！不求于心而求于力；人心抑闭，武力充塞，寖假而至于今日，弥漫周匝，唯是强霸之力。以此为国，真可痛哭！

回忆抗战之初，政府延致党外人士，始为国防参议会，继为国民参政会，凡所以团结各方，集中意志者，其意岂不甚盛？而卒有今日，盖亦相激相宕，不期而然。今后领导国人，挽回大局，仍不能不以望于执政之国民党。古人有言："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今人顾信不及此耳。苟其信之，请以武力属之国家，而勿分操于党；彼此互以理性相见，而视大众趋向为依归。国家统一，夫岂难定，申言之，即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是已。此其事本相关而不可离，其言有二，其义则一，唯此乃永奠统一，必兴民族。苟不此之图，则相杀至于何时为止，不敢知矣！年来国民党以抗战建国领导国人，同人既从国人之后，相与勉于此一大事，而深维抗战建国之本，有在于是者。今后所为献其心力，将奉是为鹄的，以诤于国人之前，国人其谅许之乎？揭此衷曲，唯国人其惠教之。

（转自《民主同盟文献》）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8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编
页数=495
SS号=10273510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
目录
目　　录

总政治部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1940年7月6日）
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1940年6月3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1940年6月21日）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指示（1940年8月13日）
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1940年8月15日）
中央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1940年8月19日）
中共晋察冀边委目前施政纲领（1940年8月30日）
中央社会部关于锄奸政策与锄奸工作的指示（1940年9月1日）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1941年1月）
总政治部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1940年5月6日）
〔附〕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
关于中央对新四军策略指示项英复中央电（1940年5月12日）
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叶项复何应钦白崇禧佳电（1940年11月9日）
〔附〕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的皓代电（1940年10月19日）
何应钦白崇禧复朱、彭叶、项齐代电（1940年12月8日）
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1941年1月16日）
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1941年1月18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1941年1月23日）
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1941年1月24日）
〔附〕关于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阴谋围歼江南新四军的几个文电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解散新四军通令（1941年1月17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1941年1月17日）
有关“皖南事变”反动阴谋的回忆&岳星明
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1941年2月15日）
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国民参政会公函（1941年3月2日）
共产党七参政员复国民参政会公函（1941年3月8日）
〔附〕蒋介石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讲话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通过的反共决议（1941年3月8日）
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1941年3月22日）
〔附〕宋庆龄等为皖南事变致蒋介石书（1941年1月12日）
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1941年5月29日）&韬奋、茅盾等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1941年10月10日）